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杨健 著



中国知青文学史

MinJianPei

WANG

人类最高贵的善良是正视历史 最卑贱的德行是凌迟历史——
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独特于太多圆通文字的知青文学史

中国工人出版社

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具有自由思索和民间立场的知青文学史。

作者以坚卓的努力与敏锐识见，从将近半个世纪浩瀚的知青文学资料中，穷本溯源，剥伪存真，精炼出独特于太多流行的、统一的、通俗的言说的真知，形成了这部具有思想含量的中国知青文学史志，缜密、生动、翔实而又富有真相、真况容量。尤为可贵的是作为文化、生命、精神浩劫年代的亲历者，其作其文拒绝讳言知青文学衍生中的自愚、自阉、自锢、自庸、自恋，直逼其深远的历史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直取其血脉、细胞、基因乃至溃疡与脓痈，精剖细析。内中有关奠定知青文学基础的红卫兵文学的卷章，原始资料丰富，系多年的收集、积累，不为多见。全书字里行间，奔涌着冷凛的批判意识和拒绝趋奉的执拗的诚实，读来或汗颜或惊警或不悦，百感莫辨。





邢燕子，好榜样！/学习王国藩，学习铁姑娘。/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乡。/园中育苗苗成行，/冰上治鱼鱼满网。/天寒地冻，抢种垦荒，/使石头长出粮。/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一切工作服从党。/北大洼变成金银窝，/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黄河……

——《邢燕子之歌》 1963年

未成的大厦谁来建/未来的天地谁主宰/革命的红旗谁来接/亲爱的党啊/我们我们我们/红色的新一代！……无产阶级的子孙啊/革命本性永不改/我们的血管里/流着老一辈的血……把未来的世界啊/交给我们这一代/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接班人之歌》 1964

中国知青文学史

众：杀！（从喊声中冲出）杀！ / 甲：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合：杀！ / 乙：向反动学术权威，/ 合：杀！ / 丙：向一切牛鬼蛇神，/ 合：杀！ / 丁：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混蛋，/ 合：杀！ /……/ 甲：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乙：一小撮混账王八蛋们，/ 丙：你们反对毛主席，/ 甲：罢他的官，/ 合：造他的反，/ 乙丁：把他打翻在地，/ 丙甲：再踏上一只脚，/ 合：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 《杀》(单位不详) 1966 年

彻底砸烂文化部 / 坚决捣毁阎王殿 / 打倒阎王陆定一 / 打倒阎王周扬林默涵 / 斗倒斗臭齐燕铭 / 砸烂田汉与夏衍 / 肖望东，大坏蛋 / 两面三刀更阴险……谁敢挡 / 谁敢拦 / 扒他的皮 / 抽他的筋 / 让他小子也玩完

—— 锣鼓词：《打倒刘、邓阎王殿》 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966 年





铁窗难锁革命心，/ 造反更觉毛主席亲，/ 只要中国不变色，/ 老子死了也甘心。

—— 江苏　红卫兵歌谣　1966—1967 年

关不尽，抓不绝，/ 老子死了儿子接！/ 胸怀一轮红太阳，/ 哪怕断头洒鲜血！

—— 四川　红卫兵歌谣　1966—1967 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是我们的战友，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墙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做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英雄的爸爸在二十年前，/ 他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今天 / 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 哥哥又高举革命造反的大旗，/ 在殷红的血泊中冲杀……/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 / 他年轻的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 想一想吧，妈妈！ / 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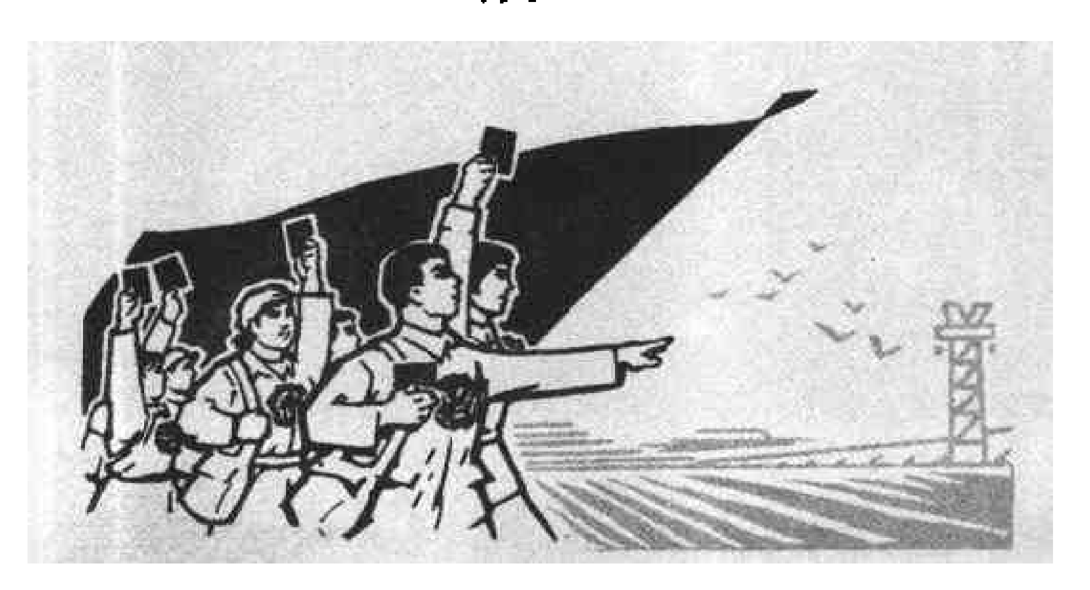
——《放开我，妈妈!》武汉新华农东方红 1967年作者称：面对着“百匪”(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简称)的大规模屠杀，妈妈们怕我们到学校被“百匪” 杀害

刘××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 抽你的筋，/ 剥你的皮，/ 把你的脑壳当球踢！ / 誓死捍卫党中央！ / 誓死捍卫毛主席！

—— 湖北 红卫兵歌谣 1966—1967年

我们生在战场上 / 就不怕死在热血中，/ 只有当我们的鲜血洒在战旗上，/ 才看得到我们的忠诚！ / 只有当炸弹炸开我们的胸膛，/ 才看得出我们的心像火一样红！

——《为了毛泽东，我们何惧牺牲》佚名 1967年





八月徐州魔鬼跳，硝烟四起弥四霄。/ 郭氏子谭开杀戒，血染淮海八三一。/ 四省八县调人马，地富反坏齐出笼。/ 战士无辜遭屠杀，飞机坦克也动用。/ 大街小巷血泪河，工农学干死伤惜。/ 城郊野外哭声惨，拖儿带女去逃难。/ 九里山吼黄河泣，血凝大地黑云浓。/ 鬼怪登台逞凶狂，敌人鼓掌叫驴欢。/ 郭氏子谭狰狞笑，战士心肝如刀绞。/ 匪首大设集中营，毒刑何亚渣滓洞？/ 更深夜静乱捉人，鬼哭狼嚎囚车鸣。/ 红色徐州遭荼毒，腥风血雨岂可忍。/ 踢派就是五一六，王、关黑手伸徐州。/ 血海深仇定要报，血债要用血来还。

——《血债要用血来还》载自淮海“八三一”铁路《工程战报》（1967年8月31日，徐州“踢派”和“支派八三一”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据该小报称：“踢派”调动了济南、薛城、枣庄和安徽淮南、肖县以及徐州附近的丰县、沛县、邳县、铜山等地的农民、工人50000人进城。动用飞机3架，坦克5辆，卡车450辆、步枪14000支、长矛50000支。打死“八三一”271人，重伤2500人，轻伤15000人，关入集中营50000人。城中白色恐怖，农村十室九空，流离失所70000人。小报的数字显然有所扩大。这是反映徐州地区武斗的一首诗）





（哭陶铸）带[猪奴儿孝顺歌]：您是俺养爹娘，救命恩没齿难忘。想当初狐狸显影无处藏，全仗您黑伞庇护帮大忙。求得您四支鸡毛赛令箭，不由我两只狗眼热泪盈眶。您那里飞眼吊膀招降纳叛，俺这里溜须拍马凤求凰。您本是蒋门学生接过刘氏衣钵重整朝纲，俺则是蒋家鹰犬权充陶府恶奴为虎作伥。实指望一帆风顺当当响，又谁知半天霹雳净净光。天呵天，不提防您老蓦地倒了台，冰山坍塌我怎再依傍？咬牙暗思量，机锋眉间藏，我这里，打选好精神，铁硬了心肠，有意拉出反陶大旗虚摇晃，抢他个批陶头阵放空枪。真是个威风八面声势劣转强，顿时间身价百倍姓名臭变香。疼人的老铸您心里明亮：俺的两面手法是您旧日伎俩。休怒俺墙倒众人推，这本是遮人耳目装模作样。可知俺万种柔情心坎里藏，背人处暗掏泪偷抛向您这短命的新阎王！

——《吴传启三哭》（哭关锋，哭陶铸，哭自身）

节选自红卫兵小报《长征》 1966年—1967年



请松松手，松一松手啊！/ 亲爱的战友！/ 交给我吧，/ 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一把血淋淋的尖刀，/ 插进了你的咽喉！/……白色花圈和挽联，/ 已经摆满你躺下的街头。/……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 她咬着不屈的嘴唇，/ 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让我们给你盖上一面火红的战旗……

——《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地区红卫兵诗歌　1967年

四海云水，共一肩，金瓯大业。挥手处，慷慨离歌，怒云千叠。东方红日属宇宙，国际歌声本无界。暂莱茵洗马，风萧萧，旗如血。

剑与火，向长夜。饥寒迫，心如铁。纵弹火横空，疆场谁怯？绿衣少年驾长车，白宫红场捣贼穴。到美洲，快寄凯歌来，宽离别。

——　《满江红·寄国际红卫兵》1970年作者曾组织“红红红”理论班子写出《致中央文革的公开信》、《二致中央文革》，后作为“69名少年狂热分子”被关押于北京半步桥监狱。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她。
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

病树一株立山尖，遍地梅花喜开颜。
今朝今日东风起，花开树倒猢狲散。

浪迹京城忆西纠，故人生死各千秋。
散伙已在数日后，二爷忍作三司囚。

西纠之子忆西纠，为虎作伥死遗臭。
三司奋勇扬千帆，联动“二爷”坠沉舟。

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
我们就是愚公，誓把三司挖掉。

青山越来越茂，三司革命不倒，
群众才是愚公，定把“联动”根刨。





满天炮轰满天仇，三司本是拉物猴。
留得西纠豪气在，三年归报三司仇。

炮轰瘟神何人仇，三司举棒奋金猴，
留得西纠“豪气”在，还当刘、邓小走狗？

想当年小将可爱造反有理，看如今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一落千丈

红卫兵小将可爱造反有理，一小撮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要有分析

想当初招之即来甘当勤务员，看如今百般邀请就是不见
——言行不一

你革命招之即来甘当勤务员，你反动百般邀请就是不见
——立场鲜明



满江红

大乱清华，红卫兵逆风耸立。起手处，刀光剑影，三论反笔。佛山压顶行者怒，金棒闲事何人急。从祥光，江流遍中华，才出气。

造反骨，永相继，再提高，团结力。分清造我，群策群力。造电清霜斩妖满，碧海丹心照脑际。广脑怀，光边大平洋，鬼神泣。

满江红（一）

创结满华，红卫兵三论反笔，刘、邓压，继帅赞誉。人妖颠倒，为虎谋反，反文革，充当打手。何人喜？群众奋起，逆反有继，冀海气。血统论，岂成文？

保爹继，有何策，应分清敌我，策跟毛主席。破私立公为人脑，继文四卷印脑际。不听害，历主不我倒，向阳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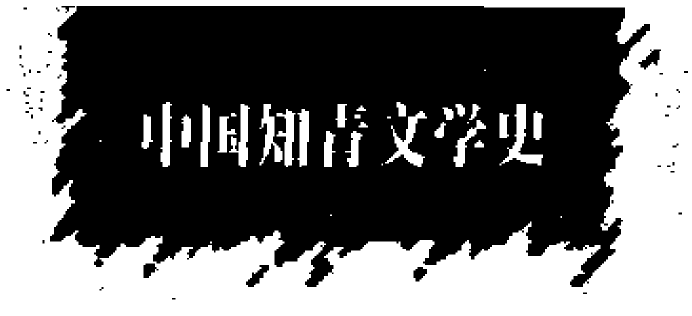
满江红（二）

红谱飘敌，起清华，天惊鬼泣。雄文跟，口诛笔伐，造反有造。黑头司令，动杀机，小兵有事结手遍。今天不识跟红为虎伥，再可气。

造反骨，应相继，棒爹结，怎相宜？压顶真造，小血继脑，死守对联天地转，沉舟侧畔千机疾。广脑怀，扎根工农兵，“私”拉立。

——“四三派”小报《首都风雷》以“奇文共欣赏莘义相与析”为题转载、北京4中东方红公社“千钧棒”针对老红卫兵歌谣的反击，并作按语说：我们将“联动”分子的黑诗和4中东方红的回敬诗一并发表

1966—1968年



第一回：王家三代吸血第，辅仁一朵交际花

[楔子]：话说公元1967年初岁，中国的红卫兵小将奋起金棒，搗妖第，一举揪出一个“庞然大物”。看官，你道是谁？……有诗为证：黑兵第将黑司令，专揪黑浪刮黑风。小将搗刀巡四海，喜看河山万里红。不搗那刘妖打入冷宫，里说此时早急坏旁边一人，超黑然作驴第之状，呜呜然发猪鸣之声。看官，你道此是何人？第来乃正宫揪王××里也。余闻黑年商朝妲己第九黑狐第辅，话着纣王子尽坏事，这王搗然乃是何物所变，尚棒考证，然此妇专为刘××出谋献妖，揪棒口话……然余奋王氏历史，其富荒诞不经，其行卑劣下流，皆难登大登之堂，黑污正人之目，不宜用正体，以稗史小说之你演义其王史，岂不妙难？余抚急大喜道取破纸数张，秃笔一交为之立传，黑为《王抚丑史演义》。看官揪知此中故事，听余慢慢谋来。这真是：难命小将宜刀挥，斩狐第狸九条第。一部《丑史》剥黑皮，为君猪巡王××。

——《王妖丑史演义》(红卫兵小说连载)
载于1967年4—5月的《井冈山》报



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岸，/跨过乌克兰的草原，/翻过乌拉尔的高峰，/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我们曾踏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瑞士的湖光，/比萨的塔尖，/也门的晚霞，/金边的佛殿。/富士山的樱花，/哈瓦那的烤烟，/西班牙的红酒，/黑非洲的清泉。/这一切啊！/都不曾使我们留恋！/因为我们有/钢枪在手，/重任在肩！……/白宫华丽的台阶上，/留下你殷红的血点斑斑，/你的眼睛微笑着，/是那样的安详坦然，/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似乎在命令我向前！/向前！看啊！摩天楼顶上一面赤色的战旗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火一般的红旗，/照亮了你目光灿烂，/旗一般红的热血，/湿润了你的笑脸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曾以佚名在北京老红卫兵中广为流传，后来流传到全国。该诗是一首“政治幻想诗”，长达240行，叙述红卫兵战士远征欧美，在“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英勇献身的故事。诗的开端是即将踏上归途的红卫兵战士，在异国的陵园向牺牲的战友告别。　1967年





泪，你别流淌／多情的人怎能上战场？／远离父母／我们都一样／生活的道路要靠自己闯……如果我牺牲在战场上／请代我向天安门告别！

——《军队的女儿》叙事诗　描述了一个中国女红卫兵参加抗美援越的战斗生活经历

地球是由他们转动的，／是黑是白只有当局有权来衡量。／我的一切申辩都是徒劳的，／一纸开除学籍决定了我的下场。／划清阶级界限，／是这个时代人人自保的一副良方。／最大限度地保持沉默和距离，／是这个时代维护友谊的最佳使情。／在校方组织的揭发会上，／各种灵魂都无可奈何地曝光。

黑五类的子女，／正是革命的对象，／白燕已被揪斗了几十次，／徒折磨得失去了人样，／最近又使红卫兵，／半夜抓去审问，／脱光了她的衣裳，／她终于不堪度辱，／跳楼身亡……／这是人的世界吗？！／我问山野中的狼，／我问木都里的羊，／我被地狱的门，／我砸天离的窗！／啊，沉默，一切都已沉默，／不在沉默中曝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春波梦》(第22节和第49节)　叙事体长诗　曾在四川、云南、湖南等省知青中流传，还被知青越境带到了缅共游击队





刘师农：方华，别忘了咱们呆的是农村，地位是接受再教育， 不像文化大革命你当造反派头头那时像了，今个儿批判，明个儿斗争的……。

方华：这正是咱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应该在贫下中农带领下继继发扬，怎么能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立起来呢？

刘师农：你出去听听，人家都在讲你什么。棱角太大，在这儿吃不开！

方华：师农，我们是第一批响应毛主席号召，戴精红卫兵袖章来到山村的，可不能忘记我们肩负的责任呐！

刘师农：我一点也没忘，好好接受再教育就是了。

方华：可楼受再教育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接的，一种是积接的；是像河里的卵石越磨越圆滑，还是做革命钢刀越磨越锋利？师农，现在有人楼力用旧思想来影响我们，该不是没有政治目的的！

刘师农：请问，这政治目的指的是什么？

方华：很清楚，让你放弃阶级斗争，睁一只眼做护自己，闭一只眼丢掉革命！

方华：（心情激情、严厉地）你回来！（战农掉队，异常难过，



热泪盈眶，又极力控制自己）你，你可以离开靠山屯，也可以离开你的战友，可是你不能丢掉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啊！（拿起袖章）每当我看到鲜红的袖章，就想起了那疾风暴离的战斗岁月……还记得吧，当我们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旧北京市委的反，造到围攻陷害的时候，也是革命的关键时刻，我们成立了红卫兵团，键看这个袖章，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极——

徐小燕：（回忆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市拉下马！

方华：师农，我们就是键看它，章极地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徐阅呀！咱们是毛主席的第一代红卫兵，这是多么大的幸键和骄傲！你怎么能不珍惜这伟大的历史荣誉呢？

［刘师农低下头沉思］

方华：可是，这两年你变了，变得身上没有朝气了，造反精神也丢了，甚至厌烦阶级斗争了！（恳切地）师农啊，过去我们是红卫兵战友，今天，我们又一起踏上这新的里程，我们应该互极帮助，共同前进。我傲得很不够，应该受到你的批评。可是，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哲学，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能是你键我，我治你的个人角斗吗？……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造住了你的眼睛，你傲了资产阶级处事哲学的俘虏！

——六场话剧《山村新人》
1974 年公演后，引起热烈反响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欢迎你啊！/突击队的新战友，/欢迎你们啊！/我们公社的新社员。/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意/酿在里边；/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吧！/陕北的枣儿啊/蜜一般甘甜！/看你们白羊肚手巾/红袖章，/——高原上/又开放一片山丹丹……

是在这宝塔山下，/延河岸边，/我开始理解：/从来就没有什么/个人理想的诗篇；/我们革命青年的理想，/要由整个无产阶级谱写，/要把千百万人/召唤！/我们壮丽的/现实和理想，/是用革命战斗的红线/紧紧相连。/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们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冲锋陷阵，/一往无前！//谁说我们的生活/“平平淡淡”，/我们的事业/风光无限！/谁说“农村落后/难以改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贫下中农的希望/就是我的志愿。/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我愿在这光荣的陕北高原，/迎接十个、几十个/战斗的春天！

——《理想之歌》北京大学中文系72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　1975年12月《理想之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配乐诗朗诵的形式广播，引起强烈反响



从五月十六日那天，/ 我们的队伍 / 吹响进军的号角；/ 从八月十八日的黎明，/ 红色的袖章 / 掀起接天的暴风……/ 冲向社会，横扫那些 / 牛鬼蛇神和发霉的“四旧”……/ 最难忘呵，城楼上 / 把“红卫兵”袖章为毛主席佩戴……/ 冷对走资派的威逼、利诱，/ 嗤笑资反路线的谩骂、围攻！/ 让我们把战斗的歌再唱一遍吧：/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让我们把深情的诗再读一遍吧：/ “抬头望见北斗星……”/ 张铁生的答卷呵朱克家的锄柄，/ 金训华的日记呵张勇的鞭缨……/ 然而，“走资派还在走”，/ 历史向我们一次次这样证明：/ 今天，老走资派邓××，/ 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 用“红旗”掩盖复辟的美梦，/ 这是整个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 / 又一次疯狂进攻！/ 呵，我们那曾沾满硝烟的红卫兵战旗呵，/ 随着第九、十次路线斗争的风雨飘扬、漫卷、飞升……/ 是呵，十年了，我们 / 刺刀更亮，袖章更红！

——《红卫兵颂》(载自《人民文学》1976 年第 5 期)





像鲲鹏鹏翅，/像鲲鹰翱翔，/搏击风和雨，/倒海又翻江。/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万里征途不停步，/继续革命向前闯，/狠狠批判邓××，粉碎他的复辟梦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阔步奔向前方。

——《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词曲（载《人民音乐》1976年）

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理解人民的心愿，做出了“建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纪念堂”的英明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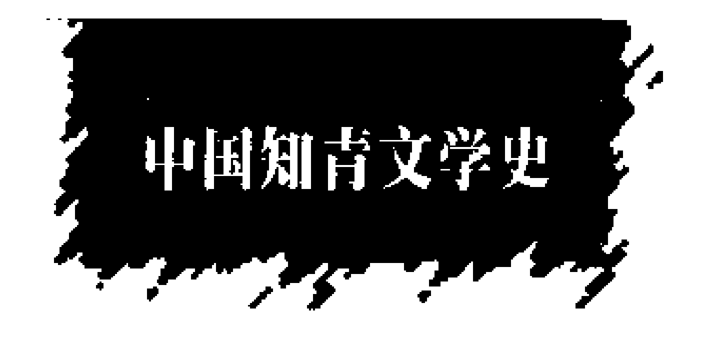
靳：十年前，我们从天安门广场出发

袁：今天，我们重逢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前。

杨：来，打开我们当年的语录本，写上我们的钢铁誓言：“忠于毛主席的旗帜，听从华主席的指挥……”

——诗剧：《重逢在纪念堂工地》　1977年





上山下乡干革命，/ 红卫兵当了管天红哨兵。/ 斗志还是那样旺，/ 袖章还是那样红。/ 报冷暖，辨阴晴，/ 驱霹雳，战恶风，/ 反修防修决心大，/ 乱云飞渡仍从容。/……继继革命永向前，/ 反击右倾翻案风！

——《反击右倾翻案风》(载自《人民文学》1976 年第 5 期)

每当唱起红卫兵战歌，/ 耳边就响起文化大革命的雷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用战斗来保卫，/ 革命征途风没静啊雨没修。/ 每当看到红卫兵战旗，/ 心中就唤起继继革命的豪情……新生事物我支持，/ 反击右倾翻案风。

——《每当唱起红卫兵战歌》（载《人民音乐》1976 年）



学习十六条手册

革命委员会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胜利万岁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學習文件
（一）

★


兵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红卫兵 快讯

毛主席语录

上海红革会《红卫兵快讯》编辑部
上海红革会《中学文革通讯》编辑部 合办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67）251号

中共中央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





毛主席画象及手稿汇编

红代会广州美院红旗兵团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传颂着一个英雄的名字——乌恩琪！乌恩琪是谁？她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工人阶级的好女儿，贫下中牧的好后代，草原新牧民，天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张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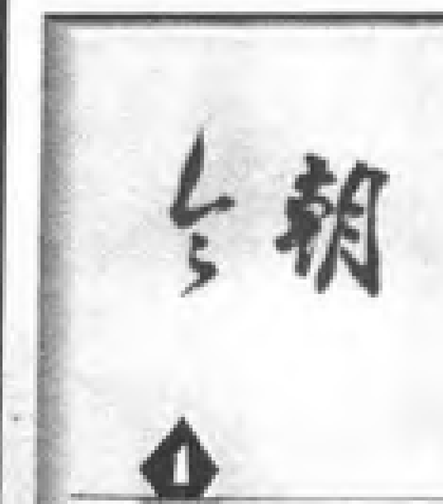


在大会上，张勇用一口流利的蒙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发和批判了阶级敌人的翻案、破坏活动。巴力斤在人证物证面前，吓得汗流浃背，狼狈不堪。张勇同志用实际行动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文艺批判

朝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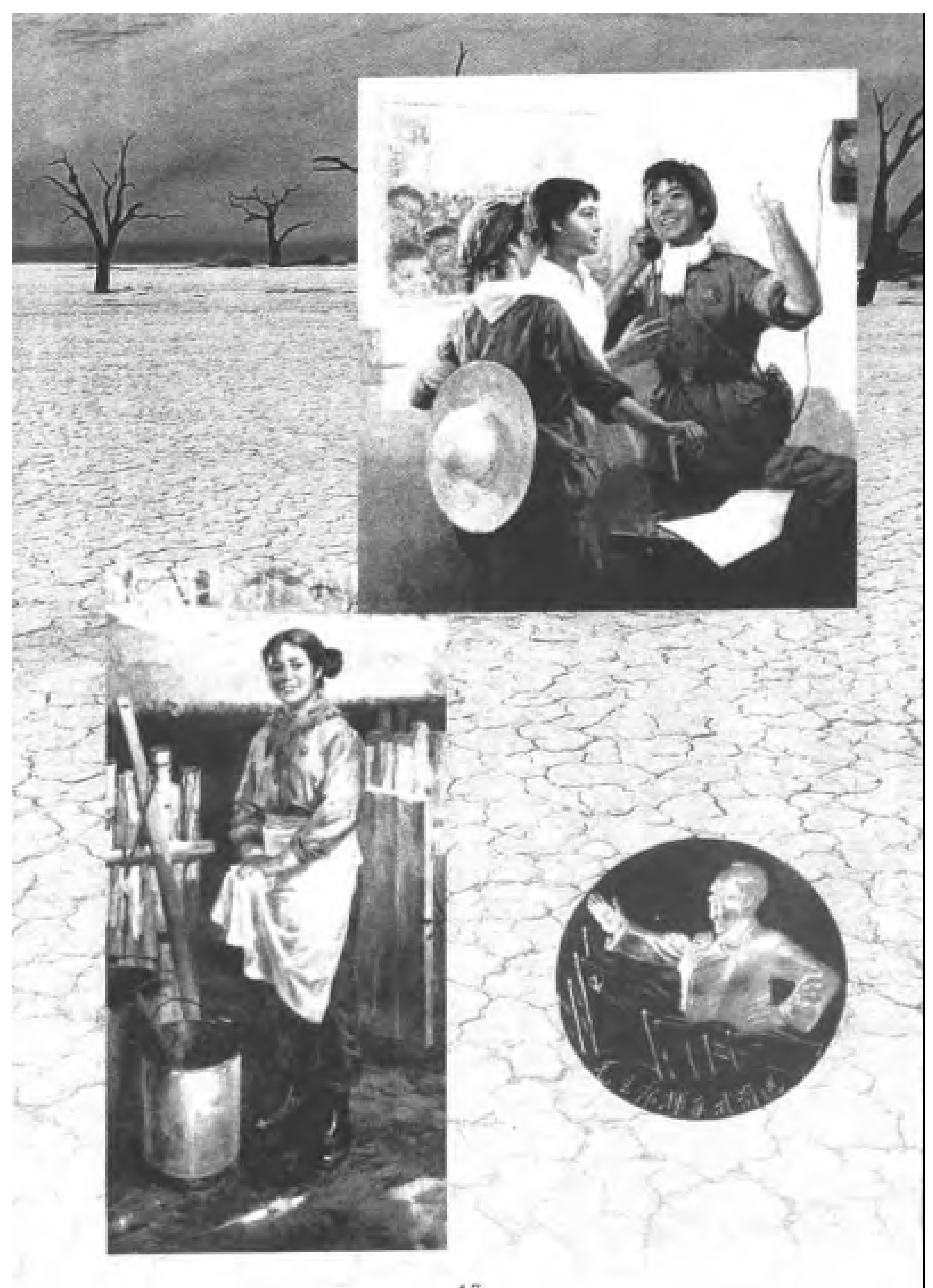

军垦曲
青春颂
战地春秋


红旗
北大附中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立新功

林彪 一九六六、八、九、



革命造反歌

1=G 2/4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

1 5 | 1·2 3·1 6 | 5 0 | 1 5 | 5·4 3·2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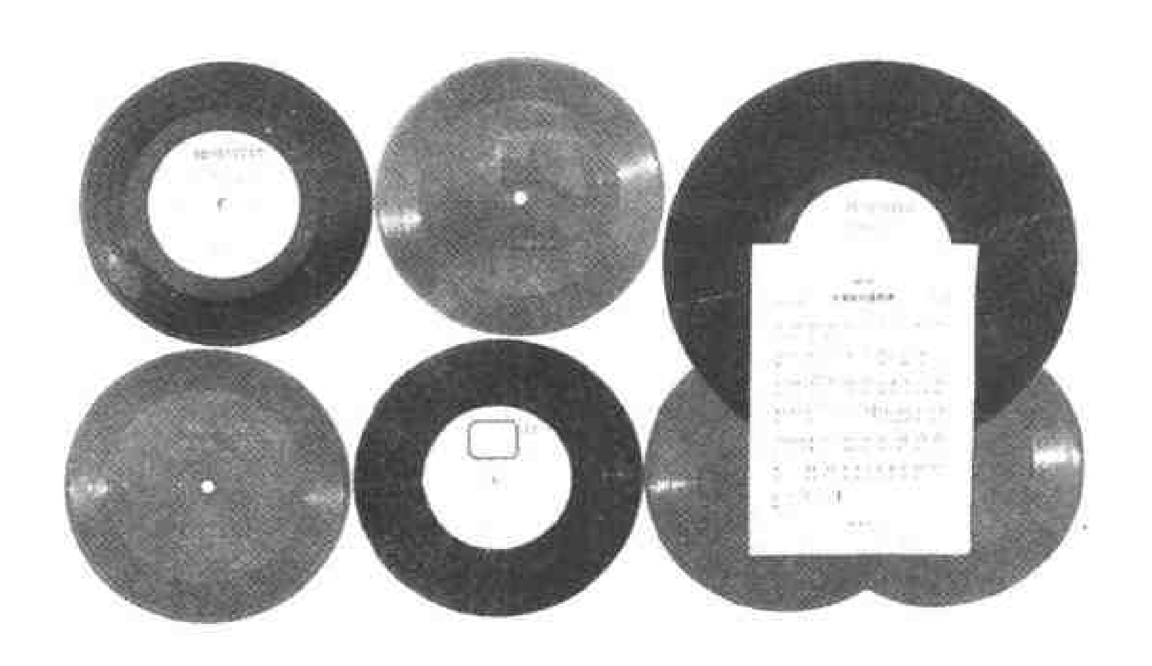
拿 起 笔　作 刀 枪，　集 中 火 力 打 黑
忠 于 革 命 忠 于 党，　刀 山 火 海 我 敢
歌 唱 毛主席 歌 唱 党，　党 是 我 的 亲 爹

2 0 | 3 3 | 5·3 6·5 | 3 1 2 | 2 1 | 5·4 |

帮，　革 命 师 生 齐 造 反　文 化 革 命
闯，　革 命 后 代 举 红 旗，毛泽东 思 想
娘。　谁 敢 向 党 来 进 攻，坚决 把 他

3 2 | 1 0 :||

当 闯 将。
放 光 芒。
消 灭 光！　杀！杀！杀！　嘿！



希望在于民间文本

“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应该说，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将是《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的追求与责任；也应该说，除了老鬼、刘小萌、邓贤、杨志军等人以独立、自主、富有勇气与个性化的努力，托起了一页页知青历史的殷红，大多数读物沉溺于流行的文字和流行的记忆里，普遍缺乏记忆的真髓、血性与骨质，缺乏灵魂的深度与灵魂处境的深度，缺乏生命真实的视觉、听觉、知觉、痛觉和耻感，缺乏对心灵深刻而细腻的触摸，更缺乏灵魂的拷问；矫饰、轻浅、单薄、圆通；不仅不能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且造成历史真相的模糊、残缺、流失甚至是常识性颠覆。我常常想，我们是否配得上我们经历的苦难和空前绝后的历史。有感于此，这套文本将有意远离虚饰和浮嚣，远离媚俗与媚雅、拜金和拜权，把追溯一代人生命与精神的本真、本源作为目标，对中国知青精神作最诚实、最本色的探索，尤重长篇非虚构写作、长篇纪实文学及长篇纪实小说（亦称新新闻主义小说、报告小说、非虚构小说），努力汇萃散失在民间的富有个人特质、生命血脉、精神容量和历史价值的尤其是忠实于原生状态、袒呈个人与集体灵魂世界的文本，将历史的本真过程及其隐秘角落还给历史。这是一种质地和硬度，更是一项艰辛的抢救工程，从历经三十年风剥雨蚀的民间记忆世界里，抢救出聚蕴着中国知青最真实原生状态和灵魂处境的精神文物。正是这些最个人、也是最集体的原生状态与灵魂处境，曾

经强化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乃至一种文明、一种文化的特征。

其实，20世纪中叶发生的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过是文革大批判、大揭发、大清查、大武斗、大串联运动的继续，是一大批既缺乏知识、思想、尊严、道义、宽容、理性以及一切现代文明精神又被彻底剥夺学业的青少年背离文化、科学和现代文明进程，并且集体地汇入更加缺乏文明教化条件的小农经济者的汪洋大海去"脱胎换骨"的运动，于是，这片东方古大陆数千年的农民的流民历史，第一次轰轰烈烈、蔚为壮观、别无选择地演化成了市民的流民历史，其形态、规模、深刻性乃至对整个社会每一个体、集体的冲击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旷古罕见。于是，那独特、复杂、迷乱、荒唐于我们这颗行星上一切历史与文明而又被三千万少男少女共同拥有的人生活剧上演了，万般悲怆，却不具有丝毫的悲剧品格——严峻、崇高、充满魅力，反而荒唐、浮嚣、怪诞得一如闹剧。从开幕时的轰轰烈烈，到落幕时的凄凄惨惨；从狂妄时的横扫一切，到落魄时的迷惘幻惑甚至精神崩溃——太多堪称史诗般的盲从、疯狂、浮躁、僵化、奴性、愚忠、堕落；太多史诗般的求索、纯真、奉献、执著、坚韧、忘我以及实属无知、浅薄、非理性却又是惊天动地的极端异化的英雄主义——全都属于历史却又真实得太不像历史。其中的灵肉相离，恨爱错乱，黑白颠倒，命运无常；以及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失落，彷徨，恐惧，焦虑，孤独，憔悴，绝望，万象尽有。那石上啼痕，田间嗟吁，花下枯

骸；那浩瀚在黄土地、红土地、黑土地上的人格解体，灵魂放逐，信仰危机，尊严沦丧；那黑夜娩出的血红，人造神话的坍塌，历尽沧桑而九死不悔的真情，被劫掠去生命中最实质生命的过程，不是神话却又荒诞得胜似神话。来自那个年代的人们，如果没有深刻的渗透到髓液的万千复杂感受，甚至遗忘与善于遗忘，那么，我们的生命不仅是苍白的，卑琐的，而且是虽生犹死的。死亡只是消灭人的肉体，遗忘则是消灭人的灵魂，是一种比肉体死亡更为深刻的死亡。我们这一代人，本来也是宇宙之子，万物之灵长，但是，一个个精致的生命却天然地缺少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和公民意识，经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脱胎换骨"、"思想改造"的愚化、奴化与兽化，不仅最集体地失去了一切个性特征和生命意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而且在"彻底埋葬封资修"的激狂中，最主动、最自觉、最坚决、最不分青红皂白地切断自己的一切文化根基。我们堪称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也更是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化毁灭和精神崩溃的最主要、最主动、最疯狂的参与者。我们以极端主义与农民式的非理性理想主义思维方式，只讲敌我，不论是非，缺少宽容与博爱精神，更缺少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约束，排斥一元以外的一切多元的思维方式，排斥文化的伟大旨意，排斥人类一切最深刻的经验、高贵的理性、情感和世俗的逻辑，惟现代个人迷信是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进而成为强行颠倒文明进程与秩序的马前卒，粗暴地、野蛮地、自以为是地以文化的名义进行武化，以民主的名义消灭民权，以真理的名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派同伐异，派异伐同，张扬奴性与兽性几近极致。我们告密、检举、造谣、中伤，自以为是反戈一击。我们捕风捉影，罗织罪

名，逼迫无罪的人们交待滔天罪行，自以为是阶级立场鲜明。我们向亲生父母宣布划清界限，自以为是大义灭亲。我们捣毁寺庙，焚烧文物，批斗同胞，落井下石，刑讯逼供，抄家劫舍，动辄"炮轰"，"油炸"，"砸烂"，"宣战"，"遣返"，"示众"，"揪出"，甚至殴打自己恩重如山的老师，制造无数惨绝人寰的酷刑与冤案，使无数人日夜生活在无所不在的恐惧里。我们的恶行只有人们想象不到的，没有做不出来的。我们是一群什么族类呵，自诩为龙子龙孙，却不曾有过龙脊龙骨龙髓，骨血里涌动着亦狼亦羊的髓液，凶残而又卑怯，一如鲁迅所言："遇见了狼，就成了羊，遇见了羊，就成了狼。"我们浩浩荡荡、争先恐后、热血满腔地挤进灵魂屠场，阉割、肢解、烹杀自己的灵魂，并且以慷慨"赴阉"、"殉阉"的激情和壮怀去阉割、肢解、烹杀他人的灵魂，自以为是为真理、为正义、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更自以为幸福、神圣、光荣，且歌且颂，群舞群蹈，翩然扭动起我们至今不敢回眸一望的太过丑态百出的"忠字舞"。我们愚昧、愚忠、愚顽、愚妄，貌似偶像崇拜，实为根深蒂固的对天人政教合一的势力崇拜。呜呼，我们民族精神之弱何以至我们一代而如此极矣！谁为为之？如果我们的子子孙孙问及，有谁能够相信——整整一代人，几乎没有背对命运的慷慨悲咤，没有支撑人格、良知、尊严的高贵脊梁与头颅，没有自救的义举，没有真正的灵魂幸存，更没有谁因为文明的倾覆而以砥以砺。其时，我们已经沦为一堆喧嚣的、躁动的、混乱的、没有思想没有骨骼没有良知没有廉耻没有怜悯心的异类。我们活着，精神集体地匍匐与低徊，人的种种生动属性正在渐渐失去。在万象生成湮灭和消残的轮回中，我们作为无限时空的有限过程，曾经有过的愚昧与无耻，其实

是一种远比历史更悠久的愚昧与无耻。我们崩毁的不仅仅是生存的质量和生命的精神,更是对几千年来太多愚昧与无耻的记忆世界。于是,我们有了超越历史的更加惊天动地的愚昧与无耻,有了远比千山万岭的倾覆更为可怕的、浩瀚而深远的记忆世界的倾覆。

大河干涸断流了,还有石滩。

森林滥伐殆尽了,尚有秃岭。

记忆丧失了,便是丧尽一切!

我们沉溺于或流行的、或通俗的、或统一的记忆里,自己本身的记忆失去了自重、自为、自强,失去了神圣的自然与世俗的自然,失去了灵性、品性、个性的弘扬和精神家园,失去了常识、常情与常理,失去了自决力,失去了应该拥有的完整的人格,失去了民间记忆不可以失去的尊严、质朴、秉赋、自主、高贵、顽强和不可替代性,失去了其自身具有的无限价值与永恒使命。我们的记忆濒临危亡。我们尚来有过以拒绝遗忘而拒绝死亡的开始。至今,也尚无见到集体的自责、忏悔与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复活。面对自身经历的空前而浩大的历史,我们没有因此而促进人格结构的健全与尊严意识的集体苏醒,更没有通过历史的不幸去产生卓越而绝对的精神。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自省自新。我们日夜流浪着的灵魂世界依然遍布荒原、沼泽、夜色和废墟。我们负有我们本该负有却从来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凡此种种,一并构成了太阳系这颗恢恢运行的蓝色星球上最独特、最混沌、最光怪陆离的一页人类历史,一隅人类行为,非个体的笔力可以再现于万一。

我寄希望于写自民间的文本。

我更寄希望于来自大山、大漠、大泽、大荒的中国知青们群体的合力，一同艰辛跋涉，走出记忆的真实处境，真正找回也一定能够找回我们曾经有过的最本真的视觉、听觉、知觉和痛觉，找回民间记忆最本质的属性。民间记忆不是怀旧的闲适、活祭的烟火、精神私通后的宁静，不是历史法庭里怯于出庭的证人，不是比死者更深邃的沉默，不是浑浑噩噩之天地、醉生梦死之日月，不是刺之不痛、唾面自干的麻木，不是与蛆一样低的匍匐、蠕行与苟活，不是精心腌制的灵肉，不是曲伏在地的脖颈上挂满的铃铛，不是依偎在大大小小弄权、弄钱、弄人者怀里的撒娇求宠，不是隆乳、修眉、涂脂和翘兰花指，不是一代又一代大王们高耸尊臀洪渲出的丝竹之音、兰麝之气，不是既定规范下的腾挪跳跃、凌波微步、虎啸蛇行，不是一再掌嘴后的三跪、六揖、九叩、感恩、唱喏，不是流氓、娼妓、无赖、骗子、贪官、恶霸们巍峨的牌坊，不是将谎言巧饰后入诗入画入歌的艺术，不是任意揉进眼睛里的太多沙砾，不是忠字舞、忠字坛、忠字歌，不是自己血泪体验的冷漠看客，不是支撑华丽皮囊的软骨、朽骨与霉骨，不是历史上一切血海骨山上的歌舞升平……我常常自问，我们知青群体乃至我们民族是否真正有过民间记忆？我们的民间记忆是否也同样遍布废墟？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民间记忆的摇篮与家园？我以为，真正的民间记忆尽管有着贫寒的烙印，但却具有高贵、质朴、生动而完整的品质，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有着永远的精神的品性、灵性和血性，自立、自尊、自主、自由、自决，多层次、多结构、多元化、多重合，支撑与维系着无数生命、历史、文明、常识、良知和秩序的延续。真正的民间记忆是人类最古老的良知与人类精神光芒不竭的能源，是一种文明

素质与文化品格，是生命与精神的原生状态，是文明古国应有的正常生态，是一切真理、经验、学说以及一切理智认知力量的来源，是知青乃至整个民族记忆的精魂，是民间生命中的生命，是山连山的沉默、一个又一个世纪的期待，是岂因福祸避趋之的诚实，是伤痕累累却青铜般拱起的脊梁，是太阳浑圆的生命精血，是透青的夜草，是荒穹下奔腾的磷火和星光，是民族伤口沉重滴落的暗红，是颤动的泥浆里翻腾起的良知，是浊泪积淤成的大河泥沙，是我们遭遇空前浩劫后可能留下的唯一财富，是精神不灭的火种，是诞生新世纪光明的痛苦孕育，是宇宙之子们一千次倒下去又一千〇一次站起来的悲烈嘶昂，是割断喉管、捣烂舌头、撕裂嘴唇后依然发出的疾厉低啸，是足以悠远动人的洪钧之钟，是高昂生命个性与尊严的旗帜，是凿穿历史隧道的利锥，是不息而生生的文明的力量、未来与希望的力量，是真正历史的摇篮；让民间记忆巍然而庄严地耸立起来，这是人类良知活着的象征。

纵观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民间记忆一直遭受着皇权残暴的阉割、监禁、凌迟、凌辱、围剿、挟持、兼并、垄断；于是，一代代民间记忆徒剩形骸，奄奄一息；于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从来没有喷薄而出过民间记忆鲜红的光华；于是，中国历史失去了最本质的内容，成为权变风云、权位更迭、权谋较量、权势业绩的历史；于是，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渗透着谎言和血腥，不仅严重误导了中国文明的走向，更造成了了解“纯粹的真相”的极端困难；于是，下一代不知上一代的真情，后人代价深重地重复前人的不幸；于是，我们的历史中没有民间心灵、民间记忆的积累，没有一切宏观与微观精神世界真力弥漫的万千气象。我

想，历史的遗憾有没有可能由知青一代弥补于万一？尽管知青群体已经深刻分化，并将更加深刻地分化下去，但是，就其主体者而言，有过苦难，有过错误，也有过因为放逐而真正深入最底层、深入神话般贫瘠的土地和神话般贫穷的父老乡亲的深刻经历，如果说有什么收获，那就是开始自我认识，开始真正逼近对中国的真知，较之上一代与下一代，有着不可比拟、无以替代的社会洞察和生命体验；深重的心灵巨创正在一天天地变为深切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意识，渐渐融入血脉。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自反思始，自我升华，那么，整个民族对十年浩劫及其产生的根源——我们民族历史与现实的精神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我们民族文化基质中痼疾的反思，也许有希望由知青一代完成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那么，恢复民间记忆的伦理，爱护和呵护比灵魂更精致的民间记忆，抢救和激活亲历者们代表着一页页重要历史的最具确凿可凭性的记忆，抢救和还原五千年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精神文物，则是变民族的巨大不幸为重铸民族灵魂的巨大能源的基础工作中的基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抢救与还原的历史，远比任何时期的历史更加深邃、凝重、复杂，更具有辽远的警示意义，更能留下无尽的思考与探索的空间，任何后人无以替代，也不可能替代，更不应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消失而成为永远的流失。

四顾八荒茫，共我吟风啸月。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将试着从还原民间记忆的一部部纪实文本做起，不仅仅因为民间记忆是一切纪实文学乃至历史文本最鲜

活、最本质、最恒远、最不容污染的生命，也因为没有民间记忆的纪实文学与历史，永远不可能是真正的纪实文学与历史。《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拒绝表述历史的僵化和虚饰，呼唤最诚实地述写最生命、最灵魂、最独特、最深隐的记忆，呼唤具有深沉的历史穿透力的作品，把追溯一代人精神的本源和种种流变、衍化及外因作为要义，同时也要深究根植在我们种种行为深处的原基质是怎样生长成我们的人格与精神的。《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鼓励还原真实世界的广度与深度；鼓励以独特的、多元的、动态的、深邃的目光及复杂的审美审丑意识，展示人性的生动、深邃与无限驳杂，再现可感可触、可以经验，并且为经验世界难以尽传的极其复杂而又极富原质的灵魂处境；鼓励精确的精神分析和对个人与集体的人格形态、思维模式乃至意识与无意识进行艰苦的探寻；鼓励真正的生命精神的迸发、不妥协的洞察力，以及浮雕般的力度；鼓励无情地解剖自我，解剖曾经是百孔千疮的灵魂，尤其鼓励将记忆靠近良知的真正痛心疾首的自省、自我灵魂酷审。我以为，自省是一种真正的自信、自重、自尊、自我理性的进化。人类最本质的品格，正是在于正视自我。正视自己的文明质量、精神内容、文化结构，甚至正视自己血管里流动的基因，自究才能自救和自强，才能还历史以真实，变历史的不幸为再造尊严的灵魂与历史的巨大资源。为此，作为一名知青，我有心以当年知青勇于吃苦的实干精神试一试，努力一批批地精心编辑和出版这套文本——以尽一点点薄力，一俟条件成熟，还将着手民间备忘文本的中短篇纪实文学、散文，以及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史记、史钞、史论、史料。我知道，我强加给羸弱的自己的责任过于重大，力难从心。但是，

我更知道，不有涓涓弱水，何成大江奔涌。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风格、手法不限，可以深微淡远，可以气韵雄逸，可以粗犷悍野，可以典雅精致；可以有混沌之气，可以有奇诡之姿，可以有透明的远吟，可以有苍凉的大唱；旨在让激活的记忆在我们的血液里不朽，让真正的历史在这里凝聚为化石、碑林和铜鼎铭文。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有心从虚饰中突围，深刻楔入人类精神的真实处境，从而获得一种广阔而深远的历史感与人类感，并且在竣工之时，以其巨大的心理容量、历史容量、审美容量、社会生活容量，为我三千万知青兄弟姐妹告奠，更为我们民族现实与未来从史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生理学乃至地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动物比较学……各学科研究那段不幸历史以转化成文明构建的能源提供可能是微不足道但却是真诚的一点点准备。

中国知青文学的希望在于进入民间文本的时代。

中国知青文学必将进入不息而生生的民间文本时代。

借此机会，我向以独立思考的坚韧，为知青文化与知青历史做出过艰卓努力和重要贡献的老鬼、刘小萌、邓贤、杨志军等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岳建一

2000年2月3日，夜11时

说明

杨健

文学史不仅是文本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文学家创造活动的历史。本书不仅关注知青文学内容、形式的发展，也非常重视作者思想的发展，把知青文学的发展历史看成一代人文化、思想的成长史。

知青文学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它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物。“文革”政治运动对它的创作任务和艺术形态也有直接影响。只有全面研究“文革”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熟悉知青一代成长的社会环境，才能深入了解知青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鉴于历史环境对知青文学的影响，本书在各卷之间专设一章，对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及知青群体的状态进行介绍。

红卫兵文学对于“文革”知青文学具有重要影响，本书全面介绍了红卫兵文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学红卫兵是后来上山下乡的主体，本书有侧重地介绍了中学红卫兵的政治运动和文学活动。

本书对民间知青写作和官方知青文学进行纵向的历史追踪，以展示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和写作传统。这一意图贯穿在一至五卷的各章之中。

由于“文革”时期特殊的历史原因，知青的民间写作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存在，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查抄、焚毁，遗存下来的不多。所以本书侧重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不是仅仅用审美的眼光进行度量，也考虑到它们的文化价值。本书引用的手抄作品都曾在当时传阅、传抄，它们拥有自己的流通渠道和读者群体，有的作品曾产生广泛的影响。

知青沙龙文学的发展与知青歌曲、沙龙美术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个知青诗人有时身兼作曲、画家几种身份，沙龙美术还影响到“文革”官方美术的发展。由于本书的题目所限，对这方面的内容只好省略了。

知青沙龙与非知青沙龙，两者很难截然区分。本书选择的方法是依照沙龙主持人的身份，一些重要的文学沙龙（如上海钱玉林、程应铸沙龙、贵阳黄翔、哑默的野鸭沙龙），虽然与知青文学有密切关系，由于主持人不是知青，而舍弃了；一些文学沙龙，主持人和中坚分子均为知青，一旦写入本书，沙龙中的其他人员和作品，就不再仔细加以区分。

知青沙龙中有不少非知青出入，在其中产生影响。本书中介绍的个别作家、作品，并不是知青和知青文学，但是它们都与知青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回避和省略这些描述（如省略北岛），知青文学的面貌就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真实的。

由于本书涉及的历史背景较为复杂，征引资料较多，为了避免叙述上的繁琐，将相关资料、论证转入注释，供有兴趣深入阅读的读者查阅。

本书将知青文学的发展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文革”前上山下乡时期（1953—1966）、红卫兵时期（1966—1968）、“文革”中上山

下乡时期（1969—1978）、新时期（1978—1989）、后新时期（1990—1998）。

知青文学的第一阶段（1953—1966）是形成时期。知青文学是在“城乡分治”政策下产生的，直接受到当时经济、政治的影响。第一阶段分为前后两个部分：20世纪50-60年代的回乡知青文学和20世纪60年代初兴起的支边知青文学。前者以权力话语为背景，后者以权威话语为背景。支边知青文学表现出的革命浪漫主义对新生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知青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66—1968）是过渡时期。红卫兵文学是在“文革”当局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到了红卫兵运动的后期，新生代挣脱了权威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红卫兵文学为知青的民间写作奠定了基础。

知青文学的第三阶段（1969—1978）上山下乡时期的知青文学，是知青文学史的主干部分。这一时期可划分为初期（1968—1971）、中期（1971—1973）、后期（1974—1976）、转型期（1976—1978）。两大知青群体——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分别处于社会化与亚社会化两种状态；相应的知青文艺也呈现组织化与非组织化两种文学形态。前者发展成为后权威阴谋文学的一部分，后者则进入民间写作的广阔天地。“文革”知青文学为后知青文学提供了不同的写作传统。

知青文学的第四阶段（1978—1989）是新时期的知青文学。新时期知青文学可以分成三个时期，转型期和20世纪80年代前期、后期。后知青文学是知青为在城市生存而创造的一种话语表述。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权力话语沿革的历史机遇中，知青文学作为权力话语的一部分得以重建。20世纪80年代后期，权力话语尝试变革，为知青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

知青文学的第五阶段（1990—1998），是后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在主流话语衰变和知识分子话语成长的背景下，知青群体内部形成“知青学人”和“知青作家”两个文化群体，“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话语分歧日渐突出。随着理想主义的幻灭，生存文学进入知青文学的主流叙事。在20世纪末、知青文学全面衰落。

中国知青文学史：长篇史论·长篇史诗

亲爱的读者：

历史，是人类精神生命与文化生命的行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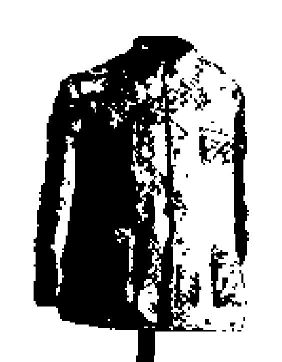
一片失去本真行迹既久而又讳莫如深的古大地，会有独立、自由和富有民间识见的历史行迹记述吗？一个产生过太多愚忠文学、健忘文学、卑怯文学、麻木文学的知青群体，会有不再漠视自己血泪体验的真正的史记和文学吗？会有纵深深入自身混沌的烛火吗？道有险夷，跋涉者知。作者以亲历者的深省，拒绝趋奉，秉烛远行，探入知青文学的原始基质、原始孕育和原生血脉、原生形态深处，探入渊渊浩浩的史料中有思想含量的活质，探入“杀！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混蛋，杀”、“白宫红场捣贼穴”、“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投身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山下乡干革命，红卫兵斗志还是那样旺”的文学旷史荒诞及种种衍变。作者说过“与其等待后人批判，不如由我们自己来严正地审判自己。”这是一种怎样的忧思、承担与胆力！朋友，读一读这部书吧，因为心灵最高贵的善良就是正视历史，因为最卑贱的德性就是凌迟历史，因为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独特于太多圆通、卑怯、浮躁文字的知青文学史，因为该作也是一枚聚蕴了诚实品性的化石，从此将去承迎风剥雨蚀、刀霜剑寒，以给后人留下辨别、考证和思索的原质，更因为字里行间还有一种民间精神不息而生生。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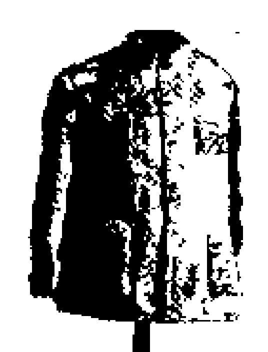
丛书策划：岳建一
责任编辑：岳建一
装帧设计：岳建一
插图版式：佟昭丽

中国知青文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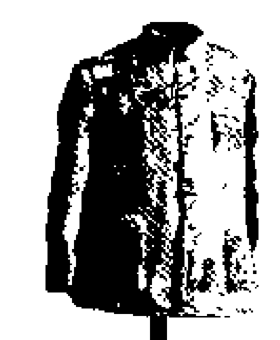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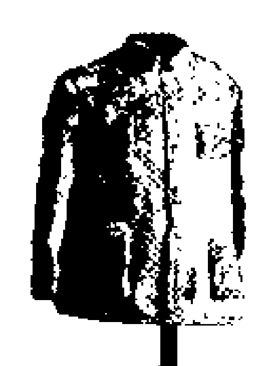
目录

长篇史志



目录

长篇史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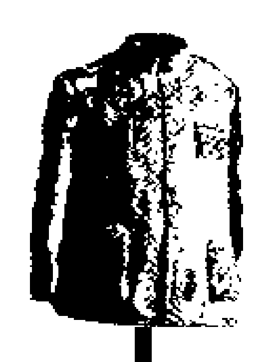
目录

长篇史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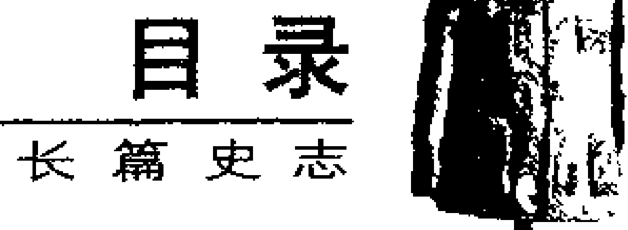
目录

长篇史志



目录

长篇史志



目 录

长 篇 史 志

第一卷

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知青文学

（1953—1966年）

第一章

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知青文学(1953—1966)

一、城乡分治与上山下乡运动的形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是从20世纪50年代政府动员农村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开始的,随后在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灾难推动下,在20世纪60年代逐步发展成为动员城镇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城乡分治"不仅扭转了乡村劳动力向城市汇集的趋势,而且形成了城市"多余"人口向乡村的输出。[1]

建国初期到"文革"前是知青运动形成的时期,前后经历了14年。运动形成的过程,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2年,城市对乡村开放的时期。

建国之初,工矿企业在农村成规模的招收青年,调动了农村知识青年进城的热情。同时,农业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政府号召农村知青回乡参加合作化运动。国家向青年呼吁:"今后建设农村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农业合作社的主任、生产队长、会计和技术人员,需要千千万万的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合作化运动唤起了农村知青对未来农村的美好向往,他们中的许多人愿意留在农村发展自己的人生道路。农村知识青年一方面对城市文明有着强烈的向往,同时对广大乡村进行的农业合作

化运动也充满了憧憬。

第二阶段：1953—1955年，开始压缩教育规模，初步制定城市招工制度。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城乡间的危机第一次出现。随着农民流入城市的增加，国家开始注意农村青年的招工政策问题，连续下文件、发社论组织动员农村青年回乡参加劳动。国家调整教育发展规模，各省不能升学的农村初中生约达70%，他们绝大多数当了农民。这是城乡分治的国策逐渐形成的时期。

第三阶段：1956—1957—1958年，经济冒进与反冒进，城乡分治局面形成。

1956年经济冒进，工矿开始大量吸收农村知青，大批农村知青丢下锄把重新涌入城市。随之而来的是1957年的反冒进，使各种就业门路对城乡青年人关闭，沉浸在迎接社会主义高潮热情之中的城乡青年，对于这一切都没有思想准备。1957年各地出现学生罢课、游行、冲击机关，中共中央开始关注重视知青的升学和就业问题。

1958年毛泽东批评党内的"反冒进"，建设规模再度扩大，投资急剧增加，导致劳动力不足，各地区又开始从农村大量招工，农民重新从乡村涌向城市，又出现新一轮的全国性人口大迁移。国家为制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人大常委会于1958年通过《户口登记条例》。城乡间的界限从此被严格固定下来，国民被划成了两类人，这一划分产生了数量最大的两个等级群体。

第四阶段：1960—1963年，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开始。

大跃进造成经济困难，城市中出现粮荒，为了精简吃商品粮的人口，国家关闭工矿企业，裁并机关，并动员城镇人口下乡。精简城镇人口的重要措施之一是顶替，以弱代强，以女代男，以老代壮，顶替出青壮年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城镇人口素质严重下降。1961—1963年，全国职工减少1889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1962年精简工作开始转向城镇青年。1962年春至1963年8月，有10多万城镇

知青下到国营农、林、牧、渔场。

第五阶段:1963—1966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制度化。

196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一份纲领性文件,将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长远的、正式的政策提出来。中共中央计划15年内,在全国540万生产队平均安插2人,共安置1000多万城市知青。随着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上山下乡运动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运动产生的经济原因被政治掩盖。

1962—1966年8月,全国城镇知青129.28万人上山下乡,插队人数逐年上升,1962年仅为6%,1966年达到70%。经过积极探索,上山下乡到1966年已形成了一整套方针政策,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国家的一项正式制度,已经基本奠定。它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健全的常设领导机构,安置办公室,专职负责干部,国家每年固定拨付的安置经费,一整套成熟的宣传模式,与安置工作相配套的"社来社去"的半工半读教育制度,街道、学校、农村一条龙的管理措施等等。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和倒退,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形成的最初动因。定宜庄指出:20世纪50、60年代教育、经济形成周期性的大起落,每一个周期过后就会有一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政治上的动荡,经济决策上的失误,每次都以大量青年的不能升学和被送往农村为代价。

国家"重工轻农"、重城市轻农村,是出于国家管理的需要。"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本质是全能的国家主义,在不能完全实施制度化、组织化管理的历史条件下,将城市孤立的、封闭的管理起来,将农村作为国家化的牺牲品。知青正是这种"城乡分治"政策的牺牲品之一。

中国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历史进程中,国家体制内部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冲突——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冲突,城乡间的冲突,生产关系与就业的冲突,党内政治路线的冲突——知青一代无形中成为这些矛盾的集合点。国家将知识青年简单地迁移到农村,移

到国家体制之外，使所有复杂矛盾，在农村经济体制下都化解为简单问题。这种大规模的涉及一个群体、一代人的行为，是以国家名义做出的。

将城市中受过教育的、年轻有活力的劳动力下放到农村，牺牲了整整一代有知识的青年，这不仅影响到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影响到整个民族的发展，这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悲剧。

二、20世纪50年代的回乡知青文学

知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所有未能继续升学而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的青年，其中包括农村的回乡青年；狭义则特指城镇下乡知青（1962年以后由国家正式发放安置费的大中城市下乡中学生）。“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在宣传上，一般并不做特殊的区分，但在政策与待遇上，却有着严格的不同。城市知青无论是在下乡和回城后都受到国家相应的政策照顾，而回乡知青基本上被作为农民对待。

知识青年是随着“城乡分治”国策的制定而产生的。国家在1953年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党和国家动员农村知识青年回乡务农，城乡矛盾首次被突现出来，可以说1953年是知青运动的起始年。

在共和国建立之初的1951年，已经有一些反映农村互助组的小说，涉及到农村知识青年的形象（他们大多只有高小文化），人物在城乡之间徘徊，可以说他们是准知青的形象。随着1953年团中央组织高小、初中生回乡务农文件的下发，一些描写回乡知青建设新农村的作品开始出现，可以说1953年是知青文学产生的起点。1955年中共中央就农村知识青年回乡务农十分重视，先后下发了一系文件，并发表了社论，回乡知青受到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一些回乡知青模范在报刊、广播上占有显著位置。知青正式成为一种社会角色，知青文学作为一种题材被确定下来。

依照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阶段性发展，可将20世纪50、60年代的知

青文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头一个十年中,以农村回乡知青为知青文学的代表;第二个十年、以城市下乡知青为知青文学代表。在20世纪50年代被国家、社会广泛关注的回乡知青,到了20世纪60年代逐渐被下乡知青所取代,这是由于国家经济政策所决定的。为了配合不同阶段的工作重心,文学艺术的宣传也相应转移歌颂和表现的对象。知青文学平均三五年发生一次主题和命名的重大变更。

1. 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回乡知青运动的政策与宣传[2]

从1953年国家“城乡分治”政策初步形成之后,对农村回乡知青的宣传教育工作也随之展开。

1953年5月,《人民日报》开始连续发表动员农村知青回乡的社论、文章。1954年1月,教育部召开中学教育会议,提出要向中小学毕业生宣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的道理”。同年4—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团中央发出《关于组织不能升学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或准备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团组织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运用范例教育毕业生准备参加劳动生产。

1955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人民日报》根据文件精神发表社论《继续动员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要求各地党组织大力推行实施,至此国家动员农村知青回乡的运动达到了顶峰。

宣传动员采取了如下形式:第一是大造社会舆论。由各地党委、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布置工作,督促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青年团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中小学教师、基层干部和报告员、宣传员等广大的社会力量,运用报刊、广播等宣传工具,对社会各阶层、学生家长、已经就业和在校学生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大张旗鼓地造成声势;同时,让全国、各省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以写公开信、与学生开座谈会等方式,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其宣传要点:1. 中小学教育要培养青年一代成为新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要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思想,劳动是最崇高的荣誉。2.

新社会的劳动事业没有贵贱之分，农业劳动同样重要。3. 社会主义农村有美好前景，批判当农民学知识没有用的错误思想。

第二是通过各级党、团和行政组织，层层下文件，进行动员和落实。责成各地党政部门、尤其是团组织，大力抓好思想教育和安置工作，并总结推广一些地方的先进经验。

各地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树立回乡知青模范典型，用榜样的力量来带动广大回乡青年。这些活的榜样，也有过苦恼、失落，但他们奋斗了，成功了。国家通过这些榜样告诉青年，向他们学习吧，你也会得到他们得到的这一切的。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党报、团报上处于显著位置的知青模范和先进人物，基本上都是出身乡村的"回乡知青"，如山东的徐建春、延边自治州的吕根泽、广东的杨明汉等。显然，先进知识青年典型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组织按照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来发现和培养，而一个普通青年一旦成了典型，他也要根据组织的需要来成长。

2. 回乡知青的状况[3]

城市与乡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如社会开放性、人际关系等方面)上存在巨大差异。城镇已经生活在工业社会中，而乡村依然生活在传统(古代)社会生活中，城市愈是现代化，其含金(现代性)成分越高；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环境的压迫，扩大了个人生活空间；城乡之间是两个世界，意味着两种不同的人生。城乡分治固化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等级的普遍存在。

在解放初期，工业化和教育的大发展，使农村青年对读书后的前途抱有很高的期望。他们对工业化社会，对城市文明抱有强烈的向往。他们渴望离开贫困、封闭的乡村，不再重复父辈的落后生活方式，他们要求对生活有更多的选择。城乡差别使农村数百万计的知青自发地拥入城镇。

农村科技生产力的落后，也是农村知青要离开农村的原因。我国农村个体小农经济一锨一锄的生产方式，使先进的科学技术找不到用武之地。农村虽然缺乏科技和管理人才，但是缺乏吸收科学、管理人才的基础，从而使农村知青的知识和能力被荒废。

1953—1954年政府压缩农村中小学教育,使千百万农村青年面临着回乡务农的命运。农村青年把升学与进城、当干部联系在一起,把能否继续升学看成是离开农村的惟一出路和前途。升学考试之前已经有人声明:"考不上学校,就去投海军——投水,投空军——上吊,或是投陆军——流浪"。[4]一旦落榜,许多农村青年痛不欲生,一个青年在给他哥哥的信中这样写道:"8月5日晚上,一个沉痛的不幸的消息无情地来到了——我没有考上学校。我用了极大的耐力,才制止了眼泪的涌出,可是眼眶已经潮湿了。到现在写信时我的手还在发抖。我无法安定下来,因为它关系着我的青春,甚至我的一生……我宁愿在城市里拾垃圾,也要走出农村!"[5]

这种痛楚正是当时千百万农村青年所经历的真实体验。国家压缩教育,限定中、高等教育名额,意味着进入城市的道路变得更窄,它使农村青年改变社会地位的梦想普遍破灭。

许多考不上学校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都曾到城市寻找过工作,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城市政策逐步完备,"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方针已经建立,他们进入现代生活的期望都成为泡影。许多回乡知青模范,在被树立为先进典型之前,都曾有过四处托人找工作的痛苦经历

回乡知青的这种痛苦的呻吟,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因为这种痛苦和渴望,不能得到被社会接受的某种命名。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只是官方对这一群体的描述,听到所谓"回乡先进典型"发出的声音。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显然不可能传达广大回乡知青苦闷的心声。在主流强势话语的背后,有更广泛的沉默。

3.建国初,农村知青的文学形象——在城乡之间徘徊

农村有知识的青年,积极追求进步,是乡村中最便于组织动员的一部分力量。在政府看来,知识青年是便于组织的,而农民则是不便于组织的,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所以,在建国之初,党和国家对回乡知青寄予高度的信任,将他们视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在建国初的文学作品中,回乡知青大多被描写成少共布尔什维克,是党在农村的先锋力量。随着城乡分治政策的出台,回乡知青的地位急剧下降,开始被描写成受教育的对

象。

(1)王汶石:《沙滩上》、《夏夜》[6]

在著名作家王汶石的笔下,农村优秀青年大多是回乡知青、他们是来自革命家庭的团员干部或是青年党员。王汶石在小说中将他们描写成党在农村的领导力量,在他们的身上焕发着青春的光彩,代表着中国农村光明伟大的未来。

短篇小说《沙滩上》塑造了两个回乡知识青年,一个是生产大队长陈大年,一个是副队长陈囤儿。陈大年的后脖颈"像钢炮似的闪着铮铮的光辉",陈囤儿"被太阳烤焦的脊背","闪着油黑油黑的亮光"。两个人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初中毕业后,抱着建设家乡的理想回到家乡,使原先的穷队变成了富队,他们也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在整风整社中,群众对他们提出了批评。陈囤儿一肚子怨气,索性丢开工作不管,用拼命劳动发泄心头怨气,还赌气说:"心事就是干活！白天干活,晚上抱着老婆睡,假日嘛,腰里别着人民币去看戏……"而陈大年没有改变开发家乡千亩沙滩的志愿,在整风期间,坚持学习驾驶大型拖拉机,每晚开过批判会之后,一个人到村外千亩沙滩刨坑探查沙层下的土质。当陈大年把陈囤儿领到沙滩,让他看铁犁翻出来的沃土。陈囤儿又喜又悔,他责骂自己,要求陈大年向他"开炮","结结实实揍我一顿"。陈大年批评他,"你可真不像话,不像个无产阶级战士的样子",陈大年的话使陈囤儿受到震动。

短篇小说《夏夜》描写了乡村的第一代男女拖拉机手的爱情,他们的父亲都是革命烈士,小时曾是亲密的伙伴,是"两个新生杨柳一般的青年"。女拖拉机手马芸芸望着一片新耕的土地在她脚下铺展开来,她情不自禁"嗨,嗨,嗨！……"地呼喊。小说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表达了开国之初,回乡知青对农村未来的美好憧憬。

这些小说明显地带有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倾向,把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等同于一场革命运动,回乡知青等同于革命战士。回乡知青的形象,还没有脱尽国内革命战争的印迹,带有战争文学的某种气息。

(2)马烽:《结婚》、《韩梅梅》[7]

马烽是著名的山西乡土作家,他在农村发展的各个时期——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创作了一批反映农民生活的乡村小说,树立了许多新农民的形象。在他的笔下也塑造了一批回乡知青的形象,这些形象在不同时期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在建国初期,马烽笔下的农村优秀青年,往往都是回乡知识青年,他们是党领导下的一代农村新人。

195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结婚》,赞颂农村新人的新思想、新风貌。小说讲述,清水庄青年团支部书记田春生与"妇婴卫生训练班"的学员、柳林村劳动英雄的女儿杨小青,俩人自由恋爱长期通信。一天他们约好一同到区上领结婚证,在领证路上,春生参加抓特务,小青遇上难产妇女,去给人家接生,两个人都迟到了,闹了一场喜剧。

到了1954年,马烽笔下的回乡知识青年开始扮演新角色。他们成为农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在劳动中接受农民的再教育。1953年中共中央开展动员农村知青回乡务农的宣传工作,是促使作家改变回乡知青新形象的重要政策依据。

短篇小说《韩梅梅》描述,韩梅梅在县中学读书,考试落了榜,当中农的爹妈不给她好脸色,说供她念书,盼她将来能做阔事赚大钱,结果把钱白扔了。合作社缺少有文化的人,社里十分欢迎韩梅梅回乡务农。社长想让梅梅当管理员,可是她主动承担了喂猪的工作。她不怕脏臭,科学养猪,猪养得又肥又壮。秋后农业社结算,梅梅挣了七十多个劳动日,分到一千多斤粮食,还被选为社生产模范,派到县国营农场去受训。梅梅的爹在事实面前也转变了思想。

张伟是韩梅梅同村的同学,他落榜后不愿出门见人,整天躲在家里哭哭啼啼。韩梅梅劝他参加农业生产,他却说:"我丢不起这份人!"他跑到太原工厂做工,又嫌当工人脏累,只好回村,结果一事无成。马烽通过正反两种形象,为回乡知青指出正确的人生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反面人物的道德品格加以贬低,将思想批判转为道德批判。这种道德人格批判,在此后的知青文学中逐渐成为滥殇。

(3)柳青:《创业史》[8]

长篇小说《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小说，原计划写四部。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写到互助组阶段，第二部，计划写试办农业社，因"文革"爆发而搁笔。由于作者去世，第二部的上下卷在缺少中卷的情况下，以未完成稿在1979年出版。从它展示的规模，已具有史诗性的巨著品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是摧折这一鸿篇巨构的主要原因。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已经对小说的命题产生质疑。小说中对中国农村生活的细致、扎实的场景描述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先验理念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

《创业史》塑造了建国之初(1950—1953年)的农村回乡知青形象，作者以其独有的敏感捕捉到了那一时期的回乡知青的典型性格——对工业社会的向往和骚动。

在第一部中，与土地改革和互助组运动并无关系的农村小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改霞，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徐改霞有一种不安分的天性，她爹活着时给她订了亲，解放那年人家要娶亲，她以年龄小、包办婚姻等理由，一直抗到二十一岁，最终在政府贯彻婚姻法的时机解除了婚约，这在当时农村被认为是坏了心术的。改霞十八岁时进城考工，只是受"探索新的生活，结识新的朋友"的天性驱动。她因为看不惯许多乡下姑娘追求城市的物质生活，曾一度放弃进工厂的打算。

在放弃了当工人后，改霞再次产生了对梁生宝爱情的冲动。月下约会时，改霞"热情的言词、聪明的表情和那只秀气的手，传到了生宝身体里去了。生宝在这一霎时，似乎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表示对自己倾心的闺女搂在怀中。改霞等待着，但他没有这样做"。梁生宝此时想"他领导着一个断不了纠纷的常年互助组，白占魁也入组了。他没有权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

改霞放弃了对梁生宝的爱情后，"她决定坚决奔赴祖国工业化的战线。她尽管对生宝还有好感，但她走的时候毫不动摇。改霞在五、六、七的三个月里，把这个人生问题，翻来覆去，想得很深、很细。世界上的大学问家，不见得有恋爱的闺女分析男女那样深刻、细致。改霞想：生宝和她都是

强性子年轻人,又都热心于社会活动,结了亲是不是一定好呢? 这个念头,自从五月之夜不愉快的幽会中从她脑子里萌起以后,她再用铁镊子也夹不出去了。她想,生宝肯定是属于人民的人了;而她自己呢? 也不甘愿当个庄稼院的好媳妇。当他俩结亲以后,狂欢的时刻很快过去了,漫长的农家生活开始了。做饭的是她,不是生宝;生孩子的是她,不是生宝。以她的好强,好跑,两个人能没有矛盾吗? ……在狂热的时候能放任自己的感情冲动,在冷静下来的时候,改霞也能想得很远,很宽。"

改霞是一个文化觉醒,憧憬丰富情感生活的现代新女性,农村生活和农村后生都配不上她对新生活的追求。她渴望从乡村妇女的命运中解放出来,过上崭新的现代生活。改霞最终到北京长辛店铁路机车厂当铸工学徒了,二年期满将到省城西安的铁路机车厂工作。

作者柳青对改霞没有采取简单批评的态度,而是把她当成一个具体的真实人物来描写。她既是一个心气高、不安本分、心思活跃的少女,又是一个要求政治进步,富有革命热情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小说中写道:"改霞虽然不在蛤蟆滩了,她的音信参加了宣传总路线的运动。改霞像全国所有的工人、军人和出外干部一样,给家乡的庄稼人写来了信,要求乡亲们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化,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还特意问到生宝互助组的成就。铸工学徒改霞的信和军人梁生荣、电工郭振江的信一样,是在村民大会上朗读的。"作者只是感叹,改霞没有看到生宝伟大的一面,没能参加农业合作化这"一辈子忘不了的历史壮举"。

正是在改霞这一形象上,柳青表现出对农民亲人般的爱护和宽广心怀。他认为一个乡村出色的女青年,进城当一个工人,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事。

第二部的下卷,梁生宝与刘淑良搞对象时,作者将淑良与改霞作了个对比,"这女人的性情是比慌慌溜溜的改霞稳重得多,老成得多啊!"县女干部对刘淑良的印象,"身体特别棒,一看就是好劳动妇女的样子。人又开通又大方,一点也没婆婆妈妈气。老杨,我还听了她谱言哩,挺会用脑子。讲话很清楚,很流利,简直不像是南山根农村来的……"

给梁生宝找一个妇女主任、女队长式的老婆是偶然还是必然? 似乎柳青已经为此后的农村阶级斗争叙事,进行了准备。有一点毫无疑问,匹配农民英雄的刘淑良不再是改霞那样的农村知识女性,这预示着回乡知青

的政治地位在发生着变化。

作者在《创业史》中记述了国家对农村招工的政策变化。县团干部王亚梅对改霞讲了1953年的新招工政策，“大多数闺女是不安心农村，不愿嫁给农村青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有个教育农村青年不要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哩，昨天才到咱县上。国棉三厂招考的公示，已经下去了，来不及做工作了。这回算是得了经验，下回再不会这样搞了。”

1953年国家已经开始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改霞属于被招工进城的最后一批农村青年。在建国之初的时代，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前景向所有的农民敞开，许许多多的可能，许许多多的选择自由，令人们一时眼花缭乱。人们无法料到这种开放、自由只是一时的，城乡分治的格局即将出现，回乡知青还怀着各种美妙的梦想，改霞正是处在这一时期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

(4)康濯:《春种秋收》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城乡间的危机加剧，1953年国家制定了限制在农村招工的政策，初步实行城乡分治。党和政府连续下文件、发社论，通过教育部门动员农村青年回乡参加劳动，反映这类思想主题的小说和影片也开始出现。

短篇小说《林业委员》(李准1954)描写了十八岁的高小毕业生、劳模社长沈玉与十七岁的高小毕业生、植树模范秀山相识恋爱的故事，把他们描写成回乡建设家乡、科学务农的农村新人。电影《夏天的故事》(编剧:孙谦，导演:于彦夫1955)讲述田金生考上了高中，却主动留在农村建设家乡，他劝说女同学米玉兰留在村中当会计，并同富农、贪污、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斗争。田、米二人在建设家乡中建立了爱情。这些作品宣传知青回乡务农大有作为，人物概念化、简单化，成为国家政策的传声筒。

中篇小说《春种秋收》(康濯1954)描写了在1954年之后，农村知识青年扎根乡村，建设新农村的故事。由于人物性格较为生动，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在1958年被长春电影厂搬上银幕。

《春种秋收》的作者康濯曾长期在晋察冀解放区工作，建国初在河北、山西等地的农村工作，参加了农村历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如减租、救灾、

清算与土改、互助合作、合作社、人民公社)。他创作了许多反映农村变迁的小说,在他笔下出现了一批农村妇女形象,如家庭地位提高的童养媳春妮子(《灾难的明天》1944);解除旧婚约、自由恋爱的金凤姐妹(《我的两家房东》1946);积极劝公公带牲口入合作社的秀梅(《一同前进》1953);她们都是随着新生活前进的农村新女性。

《春种秋收》中的回乡知青刘玉翠"是个呱呱叫的高小毕业生,在学校当过团干部,人又漂亮",她没考上中学,却带了"一心向往城市的思想","回到村里,就整日疯疯癫癫,不做活,也不工作。每天吃了饭,就光打扮起来挑对象。而且,听说还一定得挑个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或者是挑个大干部。"她认为"城市的妇女当中,有田桂英,有郝建秀,有抗美援朝光荣的女护士,有说不尽的远大的前途。而且,城市是电灯电话,高楼大厦,花衬衫,洋袜子,妇女的头发听说都是一鬈一鬈的……再看看自己住的小山沟,农民翻身了,可也翻不出夹着石头的二亩硬土!村里连个农业社都没办,想闹个俱乐部也闹不起来。"有人把青年农民周昌林介绍给她,可是她却想嫁到城里去,"跑区去县,连别人介绍带自己认识的,先后碰过四五个县区干部,可一个也没有谈成。"她本想嫁给进了省城的县团委副书记,可是副书记却教育她安心农村,并告诉刘玉翠,她的一个同学在省城找了给机关干部当保姆的工作,嫌麻烦,嫌小孩脏,因为是偷着去的,没带关系,把个团员也丢了。"刘玉翠脑门子上好像狠狠地挨了一棒,痛得她直想哭。"

周昌林是村团支书,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技术员,是个新党员,挺红的干部,人长得又英俊,没念过书,但靠自修,肚里墨水也不少。他二十四岁在农村早该是结婚的年龄,"可是外村的姑娘大多不愿意来这一带山区,本村几个高小毕业的姑娘,眼皮更高,目标根本就没放在村子里。"

碰巧周昌林的地与刘玉翠的地挨在一块,两人一同劳动,共同学习,经过春种秋收一年的光景,两人开始相爱。刘玉翠拒绝了县百货公司的干部,嫁给了周昌林。小说结尾,在刘玉翠的影响下,村里的女青年都安心在农村劳动,半年里村里结婚、订婚的有八对。虽然刘玉翠进城失败了,但作者让她得到了山沟里的好小伙子周昌林,为她安排好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明前景。

刘玉翠是一个不甘心"一辈子困死在这个老山沟里"的乡村女青年,她与改霞十分相似,并不是仅仅贪图城市的物质生活,同样是出于对现代

城市文明的向往，是对提高和改变自己生命质量的向往。刘玉翠是进城失败的改霞，她在城乡间的痛苦徘徊，她对城市文明的强烈渴望，被作者大团圆式的幸福描写一笔掩盖掉了。

4.大跃进年代，回乡知青的文学形象——建设家乡的骨干力量

进入大跃进的年代，在文学作品中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地位有所回升，他们又开始成为建设家乡的骨干力量。回乡知青的形象是热情、开朗的，他们自觉在乡村扎根，大力推动科学种田，移风易俗。但是，他们必须在党和贫下中农的领导、教育下才能健康成长。

小说《洋上结合》（柯蓝 1959）描写十八岁的县初中生周建平回乡劳动，社管委会让他到爷爷周荣生领导的副业组当副组长，爷孙两人从最初的相互矛盾，到最后相互学习，将种田经验与科学试验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小说《红姑娘》（冯金堂 1959）描写小红等几个高小毕业生在队文书的支持下，试种二亩卫星棉，在遇到困难时，支书找来技术员帮忙，最后每亩产皮棉 2165 斤，四个人成了劳动模范，小红还参加了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9]

这一时期，一批反映农村知青生活的影片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影片表现了他们的新思想、新面貌。[10]

《金铃传》（编剧：左邻，导演：刘沛然 1958），八一厂摄制。讲述高小毕业生李兰英与社里的劳动模范复员军人张满仓在劳动中产生爱情，但是她在落后分子大金子的影响下，要到城里找对象，当城里人。最后李兰英受到教育，与满仓和好，安心在家乡务农。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编剧：马烽，导演：苏里）长影厂 1958 年摄制，1963 年摄制了续集。影片讲述，中学毕业生孔淑贞回乡务农，参加家乡的水利工程。后来，她与复员军人高占武恋爱结婚。影片中，回乡知青李克明自认为在农村屈才，不安心农村工作，追求孔淑贞失败后，在劳动中思想发生转变，决心不进城找工作，留下来建设山村。两个回乡知青一个先进，一个落后，成为回乡知青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孔淑贞由著名演员金迪饰演，她表现出革命意志坚定、性格活泼的农村知识女性的精神风貌，在当时

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

在这几部影片中，回乡女知青都是接受农村复员军人、团干部的教育、领导，并最终与他们恋爱、结婚。在这种女性依附男性、妻子依从丈夫的人物关系中，隐喻着政治依附关系，党对回乡知青的领导、教育的关系。表现了回乡知青要追随和接受党领导的中心思想。这种模式化的戏剧情境，显然是由固定的政治理念出发进行设置的。

三、20世纪60年代的回乡知青文学

1. 20世纪60年代初，对回乡知青模范的宣传[11]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为应付大跃进造成的粮荒，采取应急措施，把沉重的人口压力尽可能转移到农村去，政府在三年中精简了2000多万城市人口。城市不可能再在农村招工，农民子弟通过读书进城的路也越来越窄。1960年国家规定，为农村保留的升学率为1%。1962年统计，全国农村高小以上知识青年近3000万人，占农村青年中的四分之一。他们(除极个别人)全体都将回到乡村务农。在1958年《户口管理条例》实施后，许多农村女青年通过嫁给城里人而改变自己身份的出路，也被堵死。

回乡知青本应极大地改进贫困愚昧的农村面貌，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排斥知识和文明的背景下，他们的作用被抵消，青春和理想也被贫穷落后的农村所吞噬。据1962年团中央青农部统计，安心留在农村务农的回乡知青，仅占其总数的30%左右，感到在农村没前途是其不安心的主要原因。

1960年在中共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时，号召农村知青回乡一事再次被提出。国家需要以一种精神力量来鼓舞人民，保持局势的稳定。树立回乡知青的模范典型，是一种时代的需要，于是一系列回乡知青模范便应运而生。

在最困难的年代，政府树立了一批回乡知青模范，如邢燕子、王培珍、

浦锦文、韩志刚、易关素等。学习邢燕子的活动，首先在河北省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在该省展开。1960年9月，邢燕子事迹见报后一个月，据唐山市和张北、巨鹿、藁城、唐县等17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有80余万青年被组织参加了这一学习。河北省团委发出学习邢燕子的通知时，要求各地"要和发现、培养、总结自己地区的'邢燕子'结合起来，要在全省青年、妇女中出现千千万万个'邢燕子'"。

周恩来在1963年同各大区负责知青安置的人员座谈，指出："要大力开展宣传。华东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青年一代》、《第二个春天》等好剧本，北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铁姑娘（指河北宝坻县小于庄大队以张秀敏为首的六名回乡女知青组织的铁姑娘队）、邢燕子、侯隽就不能写个剧本？华北局要推动一下。"

邢燕子的事迹很快被拍成电影，许多剧团争相编演有关剧目，连著名学者、作家郭沫若也参与了这场宣传活动，写出了《邢燕子之歌》：

邢燕子，好榜样！
学习王国藩，学习铁姑娘。
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乡。
园中育苗苗成行，
冰上治鱼鱼满网。
天寒地冻，抢种垦荒，
使石头长出粮。
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一切工作服从党。
北大洼变成金银窝，
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黄河！

邢燕子，榜样好！
青春献农村，青春永不老。
一马能当先，万马齐赛跑。
立下雄心天样高，
鼓足干劲风力饱。

克勤克俭,有说有笑,
能把劳动当成宝。
为国为社多打粮,
国好社好大家好。
司家庄变成鱼米乡,
燕子结成队,奋飞过长江!

1965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报告文学集《在广阔的天地里》,内收十名早期回乡下乡知青的先进事迹,他们是邢燕子(河北)、赵耘(天津)、刘品(山西)、柳昌银、吕向阳(吉林)、董加耕(江苏)、宋喜明(江西)、王敬璋(湖北)、韩志刚、王建元(陕西)。他们的优秀品德和辉煌业绩,成为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

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报》和地方报纸,几乎每隔几日,就在第一版以显赫位置推出一个"大办农业"的先进集体或先进个人,并发照片、发社论,浩大的宣传声势,掩盖了农村萧条冷清的实际情况。

2. 豫剧《朝阳沟》——描写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第一部重要作品[12]

20世纪60年代初,知青文学当务之急的任务是,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塑造知青扎根农村的典型形象,宣传回乡务农的光辉前景。一批配合上山下乡运动的作品应运而生,如话剧《春光曲》、豫剧《朝阳沟》等。

在这场宣传运动中,一些作品把回乡知青捧到空前的高度,成为领导农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先锋,如《春光曲》。[13]

《春光曲》(金剑1963)是一出全面描写回乡知青扎根农村的大型话剧,该剧塑造了春兰、于晓光和刘瑛、玉凤等一批回乡知青的光辉形象。春兰坚持种试验田,教育了思想保守的父亲、生产队长王海山。她还冲破了母亲要她嫁到城里去的阻力,与回乡知青、育种能手于晓光相爱,决心共同扎根农村。小业主、原会计齐金堂企图破坏生产,赶走知青。春兰在公社秦书记的支持下,与他进行了坚决斗争,知青刘瑛接过了算盘,夺回了经济

权。齐金堂的儿子、回乡知青齐连才也开始转变思想。在第二年,村里又迎来了第二批下乡的新知青。这出戏中的知青地位之高,只有"文革时期"的阴谋戏剧《山村新人》等作品,才能与之相比。由于这部作品政策分寸把握不够准,把回乡知青的觉悟写得太高,没有得到更广泛的宣传、推广。

另一类作品,如《朝阳沟》不仅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受到党中央、国家领导人和文艺部门的高度重视。豫剧《朝阳沟》的赴京演出,成为当时的一件政治新闻。

豫剧《朝阳沟》(编剧:杨兰春)是"在1958年大跃进形势鼓舞下"创作出来的,1960年后经过两次重大修改,1963年由长影厂(导演:曾未之)摄制成电影。这出戏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放映后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并得到政府的肯定。1964年元旦,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康生等一同观看了此剧并接见全体演员,表明了中央最高领导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全力支持,《朝阳沟》从此风靡全国。

各地动员和组织知青下乡之前,都以此剧作为宣传教育的教材,组织青年和家长观看并进行讨论。天津市1964年大规模动员知青到新疆支边时,便由市妇联邀请部分家长观看影片《朝阳沟》,并召开影片座谈会。此后市委又组织支边青年观看该片,并座谈观感。同年,南京市动员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下乡插队,也采取了这种形式。

《中国青年》杂志1964年组织"银环给我们的启示"的大讨论,强调在上山下乡中,要开展思想斗争。讨论文章说:"我们青年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意料不到的困难,会产生动摇,这是可以理解的,要坚持下去,关键在于:一有动摇,立刻自觉开展思想斗争。用自己的革命愿望,去压倒后退的念头,用自己在劳动、斗争中体验到的愉快,去消除畏难情绪。最后,使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的思想,而每经过一次胜利的思想斗争,我们的觉悟就提高了一步。"[14]

《朝阳沟》是一出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反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发展,值得进行认真的分析。

该剧讲述了城镇高中毕业生银环响应党的号召,与她的同学、未婚夫拴保一道,回到拴保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银环的母亲是镇上的一个小市民,曾坚决反对女儿下乡,甚至一直追到山里,在拴保娘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终于被说服,也随女儿留下来在山里落户。

《朝阳沟》的主题,并不是描写农村知青回乡务农,而是写城市知青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该剧将知识青年分成下乡和回乡两个等级,城市知青不仅要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而且要接受回乡知青的指导、帮助。

(1)推动银环上山下乡的政治压力

该剧生动地描写了1958年城市知青下乡所处的社会环境,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有组织的动员工作,对一个城市知青离城下乡,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在戏一开场,报纸的宣传,学校的动员、同学们的批评,对银环冲破母亲的阻力坚持下乡,产生了巨大推动力。

一开场,高中毕业的拴保动员银环一同下乡,银环动摇不定,同学们纷纷前来批评、帮助。

银　环:(唱)我的苦处对谁提。毕业后升大学我没争取,剧团里来联系我原信退回。下决心要走上农业战线,你走一步我跟一步决不犹豫。

同学甲:(唱)光说你不去,雷声大雨点儿稀。

同学乙:(唱)钢精锅来炒菜,你热得快来冷得疾。

银　环:(唱)红旗锣鼓催我坐立不定,忘不了同学们一片真情。都担心我掉队促我前进,王银环你究竟算哪一行人?

(2)知青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

该剧将城市知识青年描写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贯穿了城市知青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主题思想。

银　环:(唱)我是城里长来城里生,从家门进校门没到过农村。五谷杂粮难分清,麦苗韭菜分不清。犁、耧、锄、耙我不会用,我的爹呀,我的娘呀,还得要您二老为儿多操心。

《朝阳沟》夸大下乡知青学习农业劳动的难度，知识越多越愚蠢，丑化下乡知识青年。剧中的农村回乡知青拴保被塑造成为具有革命思想的、具有劳动技能的劳动人民的形象，而城市下乡知识青年银环被塑造成恐惧种地、愚笨、可笑的知识分子形象。

拴　保：（唱）你前腿弓，那个后腿蹬，心不要慌来手不要猛。好，好！（见银环又锄掉了庄稼）又叫你把它判了死刑。

银　环：这个锄不好使。

拴　保：这不是锄的问题。

银　环：（唱）看起来庄稼活非常简单，谁知道干起来就这样难。两只手就不听自己使唤，挪一步一身汗东到西偏。心有余力不足眼迟手慢……

拴　保：（唱）勤劳动才能够突破这一关。

银　环：（唱）唉！难呀，难呀难！

(3)对下乡知青的阶级斗争、革命传统教育

《朝阳沟》根据对知识青年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理论，构置出一个对下乡知青进行再教育的理想场景。无处不在的有组织的再教育，对在农村中孤立无援的城市知青构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

该剧的第五场，银环发生了思想动摇："上工去下工回心烦意乱，过一天熬两晌单调平凡。那船有码头车有站，高中生种地种到哪年？唉，重重心事对谁谈！"社员们怨银环娇气，没啥本事时，村党支书做二大娘、伶歌、小黑旦、老小孩等人的思想工作，要他们耐心帮助银环。一场对银环的教育改造工作，在朝阳沟全面展开。

拴保娘对未过门的儿媳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口吻，颇像政治指导员："贫下中农都把你当宝贝，都盼你在农村大有作为。走一步停一步就是倒退，可不能把文化当成包袱背。希望你更严肃要求自己，银环哪，为建设新山区坚定不移！"

拴保不像未婚夫，而像贫下中农的代表。拴保教育银环说："我难忘

你叫我看《董存瑞》,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董存瑞为人民粉身碎骨,刘胡兰为祖国热血流干。咱看了一遍又一遍,你蓝笔点来我红笔圈。我也曾感动得流过眼泪,你也曾写诗词贴在床边。咱两个抱定共同志愿,要决心做一个有志青年。你说过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讲的话,你一字一句全忘完。想想烈士比比咱,有什么苦来怕什么难。"

20世纪60年代突出政治的社会空气,每日的学习会、组织教育、群众帮助批评,实际上都构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压迫。这种思想教育工作,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改造过程。《朝阳沟》描写了一个城市知识青年扎根农村所必经的思想革命。

当银环在山沟和城市之间徘徊时,戏剧传达出一种令人哀伤的复杂情感。银环决定回城看母,走到村口时唱道:"我往哪里去呀?我往哪里走?好难舍好难忘的朝阳沟!我口问心,心问口,满眼的好庄稼我难舍难丢。"这时幕后合唱:"朝阳沟,朝阳沟,朝阳沟今年又是大丰收。"

这时,拴保和支书先后追来,对她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的统治之下,任何个人的私利,都没有藏身之地。银环丧失了为个人利益辩护的话语能力,无法抵抗严正的批评,她只有努力战胜自我,追随革命道义。

拴　保:(唱)刚下乡在这里咱并肩立站,你代表同学们发出誓言。你说道:革命先烈为人民把青春贡献,新一代要继壮志汗洒高山。银环同志,你抬起头再往山上看,什么人坚守阵地望着你银环?

银　环:(仰望烈士墓,唱)朝阳沟寸寸土汗浇血染,我说过,需要时敢闯火海刀山。

拴　保:(唱)老支书忆苦思甜那天夜晚,灯光下你可曾写过日记一篇?

银　环:(唱)日记上洒下我热泪点点,表决心我在农村改地换天。

支　书:毛主席说以农业为基础。全国工商、交通、财贸、运输,哪一业能离了咱农业?这能说干农业不光荣?银环,你进村头晚上咱们学毛主席那段话是咋说哩?

银　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支　书：不错，眼下我们国家还存在着"三大差别"，和城市比起来农村是苦一点。可咱们是看着这些差别永远存在下去，还是要努力改变它，缩小它，最后彻底消灭它？

该剧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教育思想，宣传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体系。当传统思想的代表人物银环妈要银环"马上离开这老山窝，快给我进城考大学"时，拴保唱道："朝阳沟一年四季都开课，课堂大来老师多，你是学造林，你是学治坡，你是学移山，你是学改河？学斗争辨敌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我的大妈呀，俺一天功课都不耽搁。"

在全剧结尾，银环妈受到教育，决心在农村安家。朝阳沟的贫下中农又迎接一批新知青来村修建电站。《朝阳沟》不仅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颂歌，而且是宣传党的知青政策的"小百科"。它第一次完整地描述城市青年扎根农村的全景，并将这一上山下乡运动命名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3．1960—1963年，回乡知青的文学形象
——有科学技术的农村新人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知青文学，区别于50年代的知青文学，不再一般性地描写回乡务农，突出塑造了回乡知青在农村进行科学实验，以科学技术建设农村的新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科学种田的活动，一直是在党和贫下中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他们的教育下，回乡知青迅速成长为有科学技术的一代农村新人。

小说《耕云记》（李准1960），描写一个在农村自学成才的青年女气象员，在党的关怀和老农指导下健康成长。小说突出地描写了党对农村青年的培养、教育，公社关书记把肖淑英派到省"气象训练班"学习，当她学成归来，又支持她办起公社气象站。在第一次预报失败后，关书记支持她继续进行预报。公社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旱，省气象台预报有山洪，通知公社水库放水，肖淑英做出没有暴雨的预测，还是关书记大胆地支持肖淑英，从而

保住了公社水库中宝贵的蓄水。可以说，肖淑英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15]

肖淑英在小气象室的窗上贴了一张剪纸，"在天空上，朵朵云彩飘动着，一条龙拉着一张犁，张牙舞爪地在云彩里奔腾着。后边扶犁的是一个姑娘，她微笑着拿着鞭子赶着龙"。小说将肖淑英塑造成为勇于攻克科学实验难关，用科技建设农村的新人。这部小说被改编拍摄成电影《耕云播雨》(北影厂，编剧：李准，导演：魏荣)，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的知青文学，往往把知青在乡村的生活描绘得十分光明、远大，回乡知青时刻受到党和贫下中农的关怀温暖，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小说《雾》(管桦1962)描写白沙镇高中毕业生雷烟海回村务农，很快当了生产队长，农村姑娘吴兰芹悄悄爱上了他。雷的女同学董淑莹听说后，下决心离开城市和雷一同建设新农村。小说以白描的手法，将乡村知青的爱情生活描绘得富有诗情画意。小说结尾，吴兰芹看到穿红衣的女子(董淑莹)和雷烟海并肩走在一起，心中一慌，筐子里的玉米种也撒出来了。[16]

这种浪漫主义并不是一种个人化的表述，而是一种政策的表述。如果说某些作品(如《雾》)还讲究情调，更多的小说则干脆直奔主题，写得像经验报告、宣传手册，带有浓厚的宣传色彩。小说《岔河村的姑娘们》(公浦1963)描写僮族寨子有二十多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她们放弃读书和在工厂做工的机会，回乡务农，集体劳动，成为种田能手。她们成为村业余剧团、球队的骨干，还开了自由恋爱结婚的新风气。她们受到了广大社员的欢迎，并受到村、社领导的表扬。小说充满了政策内容，以及政策的优越性，像是一份宣传报告。[17]

4．1962—1964年，回乡知青的文学形象
——阶级斗争教育的重要对象

1962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口号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被赋予强烈的阶级斗争色彩，一些知青文学开始描写阶级敌人如何破坏和阻挠农村知青回乡参加生产。

在这一时期，回乡知识青年成为阶级教育的重要对象。《中国青年》(1964年3期)指出，“教育青年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为主题的好戏”，《年青一代》、《千万不要忘记》、《远方青年》和《社长的女儿》“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如何培养革命后代，保证青年不变质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这些剧目中，知识青年都成为阶级敌人阴谋腐蚀、拉拢的对象。

《社长的女儿》(河南省商丘专区豫剧团1964年创作演出)讲述：革命烈士遗孤女青年林继红，在父母的老战友、人民公社社长的抚养下长大。她和要好的同学、本村地主的儿子蒋为民，从农校毕业回到了农村。林继红要求到园艺场当技术员，但是老社长却给了她一把镰刀，要她去上“红专大学”——劳动。在新社会吃着“冰糖块”长大的林继红，当园艺家的理想无法实现，思想很苦恼。这时，地主婆老狐狸指使儿子蒋为民去引诱、拉拢林继红，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的林继红上了老狐狸的当，在割麦时她为老狐狸的破坏行为辩护，在看菜园时，她擅离岗位被猪吃了白菜，又在蒋为民的怂恿下，把老爷爷辛勤喂养的枣红马骑掉了驹子。于是老社长与老狐狸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林继红的怵目惊心的斗争。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狡猾的老狐狸阴谋唆使继红和她的儿子一起外逃。在这危急时刻，老社长把林继红领到烈士陵园，讲述悲惨的家史。林继红获知，她的亲生父母就是被老狐狸的丈夫密告敌人杀害的。她猛醒了，从老社长手中接过爸爸遗留下来的红旗，站在父亲的墓前宣誓：一定要继承革命传统，做红色接班人。

《中国青年》(1964年3期)选登了《社长的女儿》的第四场，并发表编者按语，向广大青年推荐该剧，称赞这是一出“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优秀现代剧目。

这一时期各地上演了一批反映阶级斗争的知青戏剧，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独幕剧《春潮浪》、《又一个回合》等。[18]

《又一个回合》(胡丹沸1963)，描写1962年夏天，华北某村的地主分子范家琪、小糖饼身藏地契，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复辟翻天。他们破坏集体财产，投机倒把，还利用女儿范巧云的“美色”拉拢回乡知青李有福下水。在全剧结束时，公安局下放干部、新任公社政治部长兼派出所长李长栓教育自己的儿子——回乡知青李有福说：“要记住！阶级敌人永远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进行破坏活动啊！一个革命青年，如果不能在阶级斗争中时刻加强自己的武装，危险哪，危险哪！(蓦地把李

有福的手高高举起)范家琪这次就是使的你这双手,跟我们又干了一个回合呀!"闭幕时,在鼓声、口号声中,灯光最后聚焦在李长栓父子身上,两人摆出战斗造型。

这些戏集中了诸多重要的政治、文化理念,这些理念被符号化、模式化:如知识青年进行劳动改造的必要性("原罪"),敌对阶级对知青的争夺(最后一刻的拯救、阴谋与决斗),继承先辈遗志是知青先天的责任("原任"),党、贫农是知青的父亲("代父"关系的设置)等,并且带有一定的暴力色彩。

5. 1964—1966年,回乡知青的文学形象——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先锋

随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农村"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出于中共在农村广泛开展阶级斗争的需要,回乡知青开始受到重视,他们被认为是开展农村社教的有生力量,其政治地位也随之急剧提高。在1964年之后,知青文学中的回乡知青形象发生了重大改变,他们开始被描写为建设新农村,移风易俗的新生力量,积极参加农村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先锋。

(1)建设新农村,移风易俗的新生力量

在"社教"和"四清"运动中,随着知青典型的宣传,各地出现一批歌颂回乡知青的小说、戏曲、话剧,他们成为农村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新习惯的代表。一些舞台演出还被搬上银幕。[19]

1964年发表的小说《外队专家》(韩文洲)描写回乡初中生、模范羊工刘小水被派到柴庄指导放羊,老羊工史老新思想落后,人称"世外老仙",处处刁难刘小水。在柴庄党支书的支持下,刘小水帮助"世外老仙"转变了思想,羊群也有了很大发展。[20]

1964年,吉林省地方戏曲剧院"二人转"实验队创作、演出了一组反映回乡知青在农村大有作为的小戏,如小戏《小车老板》描写,郭秀荷初中毕业后,回乡赶大车;小戏《闹碾房》描写,初中毕业生银春教育未来的婆婆杨大娘。这台二人转,在1965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舞台艺术片《白山

新歌》。

1965年，山西猗县眉户剧团创作组集体创作《一颗红心》（三场眉户剧），描写回乡初中毕业生、共青团员田香，如何在老饲养员的教育下健康成长。四川省温江专区农村文化工作队编、演的川剧弹戏《金钥匙》，描写中学毕业生树红被社员选为新保管员，成为生产队的金钥匙。

1965年拍摄了反映回乡知青生活的电影《山村姐妹》（编剧：刘厚明，导演：张铮），该剧描写，姐姐金雁主动放弃在城里教书的工作回乡务农，妹妹金玲受到富农表婶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不爱劳动，贪图享受，为了逃避山区的艰苦生活，经钱氏介绍，嫁到平原地区比较富裕的村子。她的对象赵明理听信了钱氏的话，为了结婚送财礼，借了一笔债，为了还债进行粮食倒卖。姐姐金雁回乡后，在贫农老耿头的指导下，和山村青年一起搞海棠与苹果嫁接，钱氏从中进行干扰、破坏。最后，富农钱氏的破坏言行被揭露，金雁的嫁接试验成功，妹妹金玲也提高了阶级觉悟，决心和姐姐共同建设新山村。影片通过山村姐妹，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宣传农村知青回乡务农大有前途。

(2)积极参加农村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出于政治需要，这一时期的回乡知青不再被描写成软弱、愚蠢的形象，他们不仅成为生产上的尖兵，而且被塑造成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哨兵。

歌剧《红梅岭》（编剧：裴斐 1965）描写，回乡知青、青年作业组长冷翠，开新田、挖塘堰努力改变红梅岭的落后面貌。她的姐夫王进财为了赚钱，套购国家统购物资，赶集跑买卖，还影响了一些人不出工。冷翠提醒冷队长对这种破坏集体经济的行为要进行教育和管理，冷队长却认为她是小题大做。在党支部宣传委员、冷队长的妻子任大婶的建议下，红梅岭业余剧团演出了自编新戏，表扬五好社员，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王进财对此不满，他想方设法要撵走冷翠，计划失败后，他又在贩子客的挑唆下，造谣攻击任大婶和冷翠。冷翠经过调查研究，揭穿了谣言，贩子客被抓送公社处理。冷队长在阶级斗争面前受到教育，王进财在任大婶、冷翠的批评教育下，转变了思想。

在196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浩然)中,也塑造了回乡知青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的战斗形象。回乡知青、团支书焦淑红在小说一开头,就与农村阶级斗争的英雄肖长春并肩出场亮相。小说将四十岁的肖长春和二十二岁的焦淑红,写成一对具有时代特点的革命恋人。作者用俊秀、青春、健康的回乡知青,来匹配农村党支部书记、退伍军人、农村阶级斗争的英雄。小说中第一次描写肖长春与焦淑红会面,焦淑红把肖长春当成偷麦子的,手拿木棍冲上来大喝一声,发现是肖长春后,又爽朗地笑起来。这是一种革命战友和上下级式的爱情关系。小说描述,焦淑红"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肖长春共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

小说还写了一个富农子弟、会计马立本,一个跟着隐蔽的反革命分子马之悦跑的农村文化青年。他对北京城里发生的右派闹事,表现出非常的欢喜。他学习了一点文化,便给焦淑红写酸腐可笑的情书,他积极参与马之悦对肖长春的种种阴谋,并愚蠢地追求焦淑红。这一形象是回乡知青的反面典型。

1964年之后的作品,除了写阶级斗争,还加入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内容。回乡知青接受党内正确路线的领导,与党内有右倾思想的干部进行斗争。知青成为正确路线的主要依靠力量,不过党内右倾分子在当时还属于可教育的党内走资派。

6. 20世纪50—60年代,农村知青形象的变迁

回顾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知青文学中的回乡知青形象的变迁,可以看到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农村知识青年不同的政治要求。由于社会政治的不断动荡,文化转型速度加快,知青文学平均不到3—5年即发生一次主题与命名的重大变更。

在建国之初,虽然旧社会留下了巨大的城乡差别,但是一国两策的城乡分治局面尚没有形成,农村知识青年尚可以较为顺利地进入城市。《创业史》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真实地描写了这一时期的乡村知青的真实思想波动。乡村知青改霞主动放弃了农民英雄梁生宝,没有投身正在展开的

史无前例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而是怀着憧憬去追求城市文明。她的这种行为，被作者描写成是一种人生道路的合理选择。改霞这样的农村青年，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到了1953年国家城乡政策出台后，党和政府开始有组织地动员农村知青回乡务农。这一历史和政治背景，影响了作家对农村知青形象的塑造。在李玉翠(《春种秋收》)这一人物身上，反映出重大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知青的思想面貌，她在城市之外徘徊，不得其门而入的彷徨、苦闷，具有一定典型性。

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回乡知青的形象是建设家乡的骨干力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回乡女知青孔淑贞，积极改变家乡面貌，具有知识新女性的性格与风貌，是一个理想的回乡知青形象。她最终与党员、退伍军人结婚，表现了回乡知青对党的追随和服从。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在三年灾害之后，不仅回乡务农成为农村知青注定的命运，而且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也成为必然趋势，城市知青形象开始出现在知青文学中。在党中央、团中央和国务院动员知青支边和下乡的背景下，出现了轰动一时的豫剧《朝阳沟》，戏中的银环，成为城镇知青主动到农村务农的典型。与此同时，回乡知青典型也发生相对的转变，他们开始被描述为在科学实验中大有作为的"一代新农民"，如电影《耕云播雨》中的肖淑英。在她们身上凝结和体现着党对知青的各项政策主张。

在1963—1966年，在农村"社教"、"四清"运动的背景下，为了体现毛泽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主题，一些知青文学开始将知青描写成为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农村阶级斗争先锋。上山下乡开始与阶级斗争相互纠葛在一起，如《山村姐妹》、《红梅岭》，回乡知青通过农村阶级斗争，得以实现扎根农村的远大理想。反面知青的家庭出身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如《艳阳天》中的富农子弟马立本。与此同时，路线斗争也开始进入知青文学，知青成为正确路线的依靠力量，如《红梅岭》中的冷翠对走资派冷队长的教育和斗争。

从改霞(《创业史》)、李玉翠(《春种秋收》)到拴保、银环(《朝阳沟》)，再到秀梅(《青松岭》)、焦淑红(《艳阳天》)，农村知青形象随着不同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发生着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她们由动摇、憧憬城市生活，发展为投身新农村的建设，积极参加合作化运动；在20世纪60年

代,她们开始成为农村阶级斗争的尖兵。

在知青内部构成上,知青文学将农村知青与城市知青的关系,描写成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在作品中它们往往被转喻为婚嫁关系;如《朝阳沟》中的下乡知青银环与回乡知青拴保,《春种秋收》中的回乡知青李玉翠与自学成长的知青周昌林。城市的依附于乡村的,知识多的依附于知识少的,形成逐级依随的关系。

知青文学将回乡知青与农村的关系隐喻为两性关系,回乡知青多数被描写为年轻知识女性,而领导她们进行阶级斗争的领导人是成熟的男性共产党员。年轻女性嫁给乡村男性,隐喻着知识青年与乡村的终身结合。这种结合同时也是她们与党组织的结合,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孔淑贞与退伍军人高占武的结合,《艳阳天》中焦淑英与党支书肖长春的结合。回乡知青与党组织的关系,有时也被转喻女小辈与男长辈(老书记、老队长)的关系,如电影《耕云播雨》中肖淑英与关书记的关系,其中隐喻着回乡知青与乡村党组织的代父关系。这些隐喻完全袭用了将政治关系伦理化的传统话语结构。

20世纪50—60年代知青文学集中反映了政府对知青运动的各项方针政策,凝聚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理念,经过写作实践的摸索,逐步完成了符号化、模式化的过程。产生出了"原任"、"原罪"、"代父"等核心要件,推出了《朝阳沟》、《山村姐妹》等代表性的叙述模式。这些理念、模式和手法,对此后的知青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知青文学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政府开始将城镇知青作为动员的主要对象。宣传目标和工作重点转向城市后,城市知青的形象开始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和戏剧舞台上,回乡知青开始退居次要位置。

1963年,团中央大张旗鼓地宣传城市下乡知青模范,以推动上山下乡运动在城镇展开。各省大造声势纷纷召开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老知青在会议上云集,相互介绍经验。每一次开会,省一级最高领导都到会讲话。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推出一批新的知青典型——城市知青侯隽、董加耕,以及当时轰动一时的"南京72贤人"。[21]《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侯隽的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黄宗英),引起广泛反响,全国各大报也纷纷发表类似报道和评论。

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在全国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学开始集中到三大主题:"阶级斗争文学"、"反修戏剧"、"共产主义道德文学",它们都对知青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知青文学与"共产主义道德文学"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作品,开始反映了城镇青年在边疆的开拓生活,神秘的北大荒雪原、蛮荒的西双版纳热带丛林,都对城市青年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具有一种乌托邦的浪漫色彩。

知青文学塑造了一批共产主义的新人,林岚、林志高、海英等新人形象,他们朴素的制服、革命的语言和坚毅表情,他们的历史使命感,都深深感染了一代青年。对一代青年人的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1.知青文学中的"社会青年"形象

在上山下乡新一轮的宣传运动中,动员工作的重点是城市社会青年,"社会青年"的形象开始出现在文学作品和戏剧舞台上。

国家垄断的高等教育(包括中等专科学校)不可能容纳大多数城市的高、初中学生,使他们都接受高等教育,成为国家包分配的干部。另一方面,城市又不能消化失学的城市青年,为他们充分提供就业岗位。国家既不能把他们完全包下来,又对他们处在一种放任自流的无组织状态感到忧心忡忡。

"社会青年"是一批停学待业的青年,事实上是一个失业知青群体。在1955年团中央以毛泽东阶级分析方式,将他们定性为"城市小资产阶级

青年"。作为在校学生,他们还是新一代的革命青年,为什么一旦失业成为"社会青年",就成为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呢?问题就出在"社会"二字上。"社会"是贬义词,意味着没有领导、没有组织、混杂、落后。青年一旦离校,失去了学校和党团组织的直接领导、控制,又未进入党领导的工矿企业,流入社会后可能与身份不明的无组织的人员交往,虽然未必失足变坏,但是亦无法进行调查;只有处在党团领导下、政府视野之内的青年才是可以信赖的,清白的。"社会青年"的不可靠,关键在于他们是处于国家组织之外的、相对自由的社会群体中。国家经济造成的社会身份问题,开始转化为某种政治问题。

"社会青年"还是一个阶级成分复杂的群体。团中央在1956年对"社会青年"的调查报告表明,"社会青年"中有30%左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远远大于5%的阶级成分比例,可见在就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政治歧视。许多青年由于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长期就业困难。即使当年经济形势好转,这部分青年仍然得不到工作。[22]

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一直力求消灭社会,最终完全变社会为国家。待业青年进一步壮大社会的情况,是国家所不愿看到的。推动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使社会青年人数降到最低点,既是经济问题,也关乎到体制的纯洁问题。社会青年从社会边缘走上中心舞台便有了充足的政治理由。

1964—1965年各地开始动员"社会青年"上山下乡。1965年北京组织大批"社会青年"到宁夏参加农垦,他们大多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大学拒之门外,有的则只有高小文化,有的人还有小偷小摸行为,他们后来被编为宁夏13师。由于生活条件艰苦,管理不力甚至粗暴不公,他们不断寻衅滋事。这批知青成为"阶级路线"和"甩包袱"的牺牲品。[23]

在知青文学中"社会青年"往往扮演着落后人物的角色,属于被先进青年帮、教的对象,他们在城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或是意志消沉,鱼龙混杂,非常需要到农村广阔的天地中去接受再教育。

在话剧《年青一代》中,"社会青年"李荣生,考不上高中,闲着没事在街上闲逛,以至骑着自行车把汽车给撞了,他不愿当店员,幻想着考电影学院,又不想吃苦练功,还自称是"知识分子"。最后在老一辈的教育和先进青年肖继业、林岚的教育带动下,李荣生自愿到江西井冈山去当新一代的

农民。

在长篇小说《边疆晓歌》中，家庭是小老板的高中生、辍学生、跑堂的、肩运工等一批“社会青年”，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成分复杂，思想灰暗。有的人参加垦荒队是由于在城市混不下去了，到外面混碗饭吃，有的则为了镀金捞党票；他们成为垦荒队中的落后群体，是先进青年教育争取的主要对象。在垦荒过程中，这批人中有的成长为革命青年，有的则半路当了逃兵。

2.城市知青文学的兴起——“到广阔的天地里去”

这一时期的知青文学配合运动更加及时，组织实施更加有力。在党的文艺部门的直接领导下，知青文学的创作活动更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这一时期的作品带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1)扬剧《耕耘记》与京剧《耕耘初记》[34]

1964年全国掀起学习董加耕的热潮，在董的家乡江苏省，除了在报刊、杂志上进行报道宣传，文艺团体也积极配合，编排了相关的文艺节目。3月，在江苏省委发出宣传和学习董加耕的通知之后不几天，根据董加耕事迹编写的扬剧《耕耘记》，在南京人民剧场公演。

《耕耘记》讲述，高中毕业生田嘉玲立志回乡务农，她一回村就赤脚下田，虚心拜老农为师。她与姐姐、姐夫的旧思想进行斗争，教育了同村的毕业生汤振霞。她最后改名为加耕，以模范行动教育了周围的人们。

这出戏立即受到好评，据说它好在“并没有为挖人物的‘内心冲突’而去渲染田嘉玲内心的矛盾和思想的动摇，而是从正面着手，写她如何以坚定的志向和顽强的毅力去克服重重困难，而使这个人物得到成长。这种在塑造正面形象时正确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在大演革命现代戏和批“中间人物”论的时候，该剧拔高人物的创作思想显然是合乎时宜的。

6月，江苏省京剧团以这部扬剧为基础加以改编，在南京演出了现代京剧《耕耘初记》，内容表现知青田志耕和她的同学梁志耘毕业后回乡务农。由于当时正在开展京剧现代戏运动，政治宣传与京剧改革结合在一起，取得了一些艺术上的成果。《耕》剧用喜剧手法来展开戏剧冲突，表现

出健美、幽默的风格。据报道，该剧“在运用、融化、革新京剧传统和创造新的京剧程式方面也取得一些可喜成果”，“在花旦唱腔中运用融化了小生唱腔，比较确切地表达了田志耕这位抱有远大理想和意志坚定的女青年的坚强性格；唱词、念白也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字正腔圆。”

现代京戏《耕耘初记》赴京参加全国戏剧观摩会演，周扬、陆定一、林枫等领导人观看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员。《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还分别组织了京郊西山试验林场和四季青人民公社部分知青观看演出，并组织他们进行座谈，知青们表示：原来没有看过京剧，以为看不懂，没想到这出戏一下把他们打动了。《耕耘初记》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歌颂下乡知青的小戏。小话剧《新社员》(宝坻县社员创作)描写了下乡知青林燕在乡村积极接受劳动锻炼，受到贫下中农热爱。该剧参加华北区业余话剧调演获得了好评，在1965年被拍成舞台艺术片。[25]

这一时期，反映城市知青上山下乡题材的戏剧，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城市知青作为共产主义一代新人来进行歌颂，舞台形象惟恐不美，思想境界惟恐不高，硬性拔高形象，人物显得假、大、空。由于政府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启动得过快，配合宣传的创作任务逼得过紧，推出的剧目难免粗制滥造，明显地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尽管个别剧目与现代戏改革相结合，取得一定的舞台成果，但是艺术上的创新也无法掩盖思想内容的虚假、苍白。

(2)话剧《年青一代》

话剧《年青一代》(陈耘、徐景贤)讲述了上海地质学院学生肖继业和林育生毕业后，分配到青海地质队工作。肖继业和他的小队发现了新矿藏，领导让他回上海参与地质报告审批，医治受伤的腿，并了解离队未返的林育生的情况。肖继业到上海后，发现林育生害怕青海的艰苦生活，留恋城市，伪造疾病证书想在上海找工作，他的表妹夏倩如也拖他的后腿。肖继业的腿长了骨瘤，他却隐瞒病情，努力教育挽救林育生。林的养父革命干部林坚拿出林育生亲生父母就义前的遗书，对他进行阶级教育，使他最终觉悟。最后，肖继业的腿治好，地质报告也审批通过，林育生和夏倩如，一

同随肖继业前往青海。林育生的妹妹林岚等上海中学生和街道青年，也响应党的号召，到江西井冈山农村插队务农。

这部话剧受到文艺界的好评，拍成电影后，在青年一代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出戏对一代人的思想形成，以及对此后的红卫兵文学、知青文学的表述方式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年青一代》成功地完成了对阶级斗争、共产主义道德主题的艺术转述，构置出一套叙事模式，如阶级路线、革命原任和牺牲情结。这一叙事羁绊了整整一代人。

在剧中，肖继业是一个"外来人"，他带着新生活的信息回到城市。他是一个来自广阔天地的使者，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光辉形象，在他革命浪漫主义的强者形象面前，城市的富足生活和现代时尚都显得萎靡和腐败。他是一个克里斯马典型，他对年轻一代发出了新生活的感召。

追求安定、享乐生活的林育生、夏倩如，是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典型，当林育生看了父母的遗书后，省悟到继续革命是他的先天责任和不可抗拒的宿命。在读遗书后的那场暴风雨，象征着他内心灵魂的革命，旧人生观的全面颠覆，他决心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殉父母的革命事业。

在剧中，林岚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青春形象，她比哥哥和未来的嫂子夏倩如，要更勇敢，更富于理想，更具有牺牲精神。影片中扮演林岚的演员曹雷，非常成功地扮演了这一新人形象，青春烂漫而富于战斗激情。影片结尾时，前往新疆建设兵团的林岚一身戎装，站在火车上向青年观众发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召唤，这一形象感动了整整一代人。

(3)电影《军垦战歌》[26]

1965年10月1日，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生活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八一厂)在全国上映。影片生动地反映了在大跃进年代，成千上万有志气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奔赴新疆，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行列。表现了知青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壮志豪情。影片渲染了上海市欢送知青，新疆人民欢迎支边青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到石河子看望知青等动人场面。"边疆赛江南"的富饶美丽景色和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风情，给当时的青年观众以强烈的感染。该片由著名诗人郭小川写解说词，作家袁鹰、诗人贺敬之写歌词，音乐家田歌作曲。

电影插曲描述了美丽的新疆,"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暮色的烟波里,渔船归来鱼满仓"。影片中还有雄壮的合唱"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水迈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这些歌曲一时传遍全国。

《军垦战歌》的放映,在当时的上海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上海文艺界借着电影的东风,趁热打铁,联合举办"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文艺演唱会,对上海城市青年进行支边动员。其他城市,也都组织中学生观看这部影片,并组织座谈会畅谈观感。这部影片给当时的支边知青以很大的精神鼓舞。

(4)长篇小说《边疆晓歌》[27]

长篇小说《边疆晓歌》,是20世纪60年代城市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小说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强有力地传达了时代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边疆知青过着集体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对于一代青年人来说,那是一个新的世界,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长篇小说《边疆晓歌》(黄天明)由作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作者显然对当时的知青政策进行过一番认真的研究,采取的是理性设计、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塑造了林志高、汪蔚扬、高铁灿、吕乐海、田咏莲、任哲、苏婕等一批共产主义新人。小说人物的关系是遵照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理论进行建构的,形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网。

小说描写了省、自治州、农业社对垦荒的多层领导,并将垦荒队分成先进、中间和落后三个群体。(先进分子由复员军人、党员和下层劳动人民组成,而落后分子由资产阶级后代、社会青年组成。作者还为男女主人公高志扬、苏婕编造了红色的、洁白的履历。)这种按照阶级成分编写的人物关系表,反映出知青们要建设的理想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高度集权的社会。

小说对垦荒生活进行了浪漫的描述,在西双版纳美丽神秘的大自然中,他们捉孔雀,饱吃香蕉。白天开荒,晚上在土司的大坪场上围篝火跳舞,畅谈理想。

小说对垦荒进行了英雄主义的描写,队员们同树桩作战和蚁群斗争。

他们集体唱着歌：

> 雄健有力的歌声从几百个年轻人的胸膛里奔涌出来，它们和谐地交织在一起，风暴似的从荒野上空扩散开去。于是，立刻，在这里在那里到处都响起了回声，仿佛整个边疆的山林、原野都在轰轰烈烈地歌唱着：我们青年不能让荒地长野草，我们青年不能让荒地睡大觉，青年们到祖国伟大的边疆去！垦荒队员们向困难进军。

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成为队员们巨大的精神支柱，"社会青年"石才秀在工棚失火时失去了私人衣物，各队青年主动捐献出衣服、被子、茶缸、脸盆和笔记本，老乡也前来帮助盖草房，这一切使思想落后的石才秀感动得落下了泪水，"他犹如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第一遭这样明澈地觉悟到，原来自己活在一个多么美好可亲的社会里，活在一个多么光明幸福的天地之中！看多少人在为你造福，多少颗无私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

小说集中阐述了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分子知识化的共产主义理想。"体力劳动，对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是这么生疏和不习惯。应该把他们培养成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出色的体力劳动者"，"永远结束旧时代青年畸形发展的悲惨命运，以新的雄姿向着人类发展的顶峰攀登！""这是何等伟大的有意义的转折啊！"

小说描写知青的爱情生活，强调革命理想在两性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小说描写革命青年林志高、苏婕和投机分子肖若怀的三角恋爱。革命意志和革命情操的高低，决定了这场爱情角逐的胜负。苏婕认识到肖若怀摆不脱个人打算，便毅然割断了与他的爱情关系。苏婕夜访复员军人、党员、工人林志高，看到还在灯下读书的林志高，心中升起崇敬和关心之情。苏婕想到："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和觉醒啊！茫茫黑夜永远地过去了，一个从未受过正式教育的青年，为了党的事业，踢翻了重重障碍，开始跨到广阔的知识天地里来。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千年冰峰，在新时代的曙光中崩坍了。历史的创造者，终要成为文化知识矿藏的真正主人！"当林志高因为疲劳睡着时，苏婕不忍心唤醒他，悄悄地为他脱鞋。

这部小说像 20 世纪 50 年代的知青文学一样，让受过正式教育的资产

阶级家庭的女性，爱上了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工人阶级男性。这是有文化的对缺少文化的，群众对党员，知青对党组织、对劳动人民规定性的追随、依附关系的转喻。

小说编织了一个极其光明的结尾。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孔雀坝将建成以咖啡、香料为主的长期作物基地，从昆明接来拖拉机和农具，团省负责人带领慰问团来到孔雀坝，并带来了一批新队员。昆明知青垦荒队将迎来无限美好的明天。

小说结尾时，男主角林志高去省委党校学习，女主角苏婕去外省热带作物学院进修，他们一往情深地环顾金黄色的大地和绿色的大地，"挥手之间，汽车快如风暴般地载着林志高和苏婕走了，走远了。"作者以林志高、苏婕为榜样，为知青们指出了成长、进步的前途。

3. "共产主义道德文学"对知青文学的影响

以农村回乡知青为主要对象的知青文学，长期以来主题都集中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运动上；当城市知青开始成为主要描写对象，在"共产主义道德文学"的影响下，主题开始向人生价值观的建造方面转移。"共产主义道德文学"向知青文学注入了新主题——侧重表现世界观的改造，突出反修防修、接革命班的思想。知青文学开始从外部事件转向内心事件的叙述。

"共产主义道德文学"之所以能够使知青文学呈现出新鲜面貌，并非在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简单注入，而是由于它具有类似宗教奉献的道德精神，所以在新一代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一些作品开始从知青心灵内在变化的角度进行描述，将一场阶级斗争的、社会性的革命叙述，转换成一个人心灵革命的叙述。它将思想革命与传统心学联系起来，把上山下乡运动变成一场每个人灵魂深处的战争。虽然在命题上仍然受着先验理念支配，但是在叙事结构上却已经带有心理的、情感的性质。

(1)长篇小说《军队的女儿》

《军队的女儿》(邓普)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9月出版，在青少年

中广为流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西安电影厂将小说拍摄成电影《生命的火花》，进一步扩大了这部小说的影响。

小说讲述，刘海英十五岁报名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因为抢救国家财产，接连遭受两次严重疾病的打击，变得又聋又瘫。在组织的教育、关怀下，她战胜了中耳炎和瘫痪，健康地成长起来。

海英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从小跟着母亲坐过国民党的牢房。新疆军垦招聘团最初嫌她年龄小，她剪了头发，化装报名，终于蒙混过关，参加了新疆建设兵团。小说描述道：

> 挂了红布标语的大卡车，车上载满了戴着光荣花的参军青年。嘹亮的歌声从卡车飞出来，无遮无拦地向绿色的田野和远远的蓝色山冈飘去：千里迢迢，万里遥遥，我们不怕戈壁茫茫，不惧瀚海滔滔，我们走向生活的征途，走向阳关大道，再见吧，妈妈，再见吧，美丽的童年，再见吧，故乡……

海英找到老场长要求开拖拉机。老场长给海英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把拖拉机交给你，是用牛耕地省劲，还是用拖拉机省劲？第二个问题，派你学拖拉机，学不会怎么办？第三个问题，现在只有十多台拖拉机，如果全团都要学，怎么办？

海英在林班长、战士叶华、李维丹大姐的帮助下，解答了这三个问题。一、革命无小事，要兢兢业业；二、对大任务要勇于承担，刀山火海也敢上；三、任何工作只是岗位不同，责任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这三道题，反映了作者对时代精神的历史思考，它强调要把自己当成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完全交给党安排，无怨无悔，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奇迹。

当堤坝决口时，海英勇敢地跳进水里，她患了伤寒病，变成了聋子。出院后，由于关节炎犯了，连抄抄写写也不行了，她认为自己活着没有价值，变得非常绝望。在老场长和大家的关心帮助下，海英用视觉代替听觉，对着镜子学习看口形。她为队里放驴、摘棉花、养鸡、收瓜，养棉铃虫，还负责两分增产棉田。在一次暴风雨中，为了开闸放水，她又一次昏倒，被送进了医院。

面对着双腿瘫痪，海英陷入了痛苦，她终日在书本中找寻答案，思想

了三天三夜。老场长给她读《纪念白求恩》,用毛主席的话鼓励她,海英又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她在日记中写道:"谁活着,谁就应该使得人们因为你活着而得到好处。人的价值,就是用这把尺子来衡量的。我应该用这把尺子天天量自己一遍,这样我才不至于虚度和以后不感到懊悔。"

很快在"医院里遍传着这件事情:在第五号病室里,住着一个两耳全聋、双腿瘫痪的小姑娘。按说她会很痛苦,很难受,可是她痛起来的时候,不是呻吟,而是歌唱;她难受的时候,不是哭,而是笑。她的歌声充满了生命力,能够使胆小的人勇敢,能够使愁眉苦脸的人振作,能够让心事繁重的重病员也欢快地笑起来。她是军队里的人,是军队的女儿,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长大的。"

海英最终丢掉了拐杖,戴上助听器后,再次恢复了听力。海英决心要当一名光荣的拖拉机手。老场长说:"刘海英是我们军队的好女儿,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一个好青年。"

《军队的女儿》这样一本小书,实际上浓缩了20世纪60年代共产主义道德文学的诸多典型性的命题:号召革命父母要送子女到边疆去,学习人民解放军,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英雄的业绩等等。海英是一个虚构的时代人物,她的精神成长历程,体现出了革命价值观建造的艰苦性;她对共产主义事业表现出一种宗教般的虔诚。这部小说充分展示了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精神面貌,它是一部人生观建造的伟大颂歌,是一部共产主义新人文学。它对知青一代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有趣的是,小说还多次提到拖拉机,拖拉机这样一个农田机械,它代表着工业文明,是工业化的图腾。在20世纪60年代的这本书中,拖拉机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它表明现代化即使在极左的时代,仍然是一个诱人的主题。

(2)短篇小说《彩色的田野》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描写知青新人的文学作品,如《清明雨》(李准1964)[28]、《秋夜》(刘厚明1965)[29]和《彩色的田野》(沙丙德1964)[30]等。

短篇小说《彩色的田野》描写,县委负责人的女儿、高中毕业生毛莲主动到农村务农,她向贫下中农如何学习锄地、犁田,并听支书老闯大爷讲阶

级压迫的故事，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新人。

小说用大量篇幅描写知青如何向农民学习，改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毛莲对一同务农的高小生毛丫说："光学会锄、耕、耙、割，还不能算是一个好农民，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感情！毛丫，你还记得咱们学摇耧那天的事儿吗？同样是抛洒了种子，折断了工具，咱们不当一回事，正刚叔（生产队长）却心疼得不得了，把咱们狠狠骂了一顿。其实，他不是非常关心咱们，喜欢咱们的吗？还有，就在咱们闯祸的前四天，咱们下田去锄地，大路上有两盘鲜牛粪，咱们都看看过去了，而走在后面的老闯大爷（村支书）却费了老大工夫，用锄头把它挑到了旁边的庄稼地里。我想，一个真正的农民，好的农民，他一定不会为了个人的名誉或别的什么，而把活做差些。"

小说还描写了知青在农村接受阶级教育和传统教育，毛莲听支部书记闯大爷讲阶级压迫的故事之后说："咱们的老辈人，受阶级压迫千般苦，后来又洒鲜血，抛头颅，夺来这人民的江山；如今，轮着咱们这新一代，更好地建设它了。你说，咱们能在艰苦面前呻吟，能在这困难面前弯腰？"

在小说中，城市知青的政治身份和地位明显得到提高。下乡知青毛莲的父亲是县委负责人，隐喻知青与党的血缘关系；高中生毛莲成为高小生毛丫的良师益友，第二批回乡的初、高中毕业生们，还请毛莲担任她们的队长。城镇知青与农村知青的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发生倒置。这种改变是由于城镇知青被命名为——共产主义新人，文学中的社会身份、政治地位相应得到了提高。

(3)电影《草原雄鹰》、《青山恋》[31]

在1974年同时拍摄的这两部影片，是为了及时配合开展城市知青支边运动，拍摄该片的北京、上海两家电影厂可谓紧跟党的宣传工作。它们的新颖性和时效性都是空前的。

《草原雄鹰》（北影厂，导演：凌子风、董克娜 1964）根据话剧《远方青年》（编剧：武玉笑）改编摄制。影片讲述，大学生阿力、阿米娜毕业后分配到天山伊犁马场和中专生卡得尔一同工作。阿力沽名钓誉，骄傲自满，一心想成名成家；阿米娜埋头研究，轻视实践。在一次给患肠套叠的病马动手术

时,阿力害怕失败丢面子,将困难的手术推给卡得尔,卡得尔不顾阿力的讽刺打击,经过多次试验,成功地对病马进行了剖腹手术。卡得尔还帮助阿米娜救活了难产的母马和小马。现实教育了阿米娜,使她对卡得尔产生了感情。当阿力莽撞地将马群调到气候多变的黑山牧场,造成母马流产事故,卡得尔奋不顾身顶着风暴前往抢救,避免了重大事故。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阿力也认识了错误。三个知识青年在草原上茁壮成长,并肩前进。

这部影片描写了少数民族知识青年如何在广阔天地里与贫下中牧相结合,进行思想改造。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描写中专生在思想和实践能力上强于大学生,这是"知识越多越愚蠢"观念的反映,这种观念实际上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贬低知识分子的宣传,密切相关。

同一时期拍摄的同类电影还有《青山恋》(海燕厂 1964 年)。影片讲述在 1959 年春,老红军带领一批上海知青到山区办林场。中专毕业生寄望,一心想搞技术工作,不安心工作,造成了翻车事故,他还拒绝女友徐英的劝阻,闹情绪开小差回城,后来在老红军帮助下,他提高了觉悟,安心在林区工作。该片中的老红军由著名演员赵丹扮演。

这两部影片不同以往的知青作品,带有某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气质。它们不是把知青的思想改造放在社会大系统之中,而是界定在知青群体内部,关注到知青个体的体验、关注到主体的心灵承受性。虽然这种叙述角度的转移并不彻底,政治立场也没有转变,但是仍然传达出了某种新鲜的气息。

(4)歌剧《向阳川》[32]

五场歌剧《向阳川》(甘肃省歌剧团集体创作,石玺、田广才执笔 1965)是一出典型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学作品,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从知青上山下乡的角度来表现共产主义道德风尚。

在抗洪救灾中,各公社的社员发挥共产主义风格,相互支援。医学院毕业后主动到农村当大夫的常翠华,为了抢救社员在虎口嘴落水,公社周书记带领众人,不畏风险,在洪水中救出翠华。在危难的时刻,常翠华唱道:"我愿做一只展翅的鸟,永远跟党朝前飞,纵然有狂风暴雨来拦路,翅不

斩来头不回。”医学院学生梁爱农到农村实习，他本想拉翠华回城，受到教育后，决心留在农村。在全剧结束时，集体唱道：“一人有事，万人相助，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风尚。”在剧中，一代知识青年被描写成不愧于毛泽东时代的共产主义新人。

4.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中的知青文学

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在两份文艺材料上批示：“社会主义改造”在文艺界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文联和所属各协会及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甚至（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一场波及文学、戏剧、电影等艺术领域的大批判运动开始了。一批作家、作品被点名批判，文艺部门的某些领导人受到公开点名。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工农兵为创作主体的“工农兵文艺”迅速兴起。专业作家的作品开始被工农兵业余创作的“新形式、新形态”的文学作品取代。“培养和发展一支既会劳动又会创作的社会主义文艺新军”，“成为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一项中心任务了”。[33]

随着工农兵业余文艺创作的兴起，知青业余创作队伍也随之开始形成，这预示着知青文学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工农兵文艺时代”的知青文学。

农民作家刘柏生是1957年的初中毕业生，同他一同下乡的四个人都回城市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留在了农村。他在农村扎根落户八年，结婚生子，入了党，当了大队书记，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并领导了一个农民业余文艺创作组。《北方文学》在1965年3月号和9月号，先后发表刘柏生的小说《第一次当队长》、《锄头的故事》。刘柏生被黑龙江省文联树立为工农兵业余创作的典型。

1965年冬天，中国作协领导人刘白羽在黑龙江省文联干部的带领下，走访了牡丹江沿江公社的刘柏生。《人民文学》1965年11月号发表刘白羽的评论文章《写在两篇短篇小说前面——刘柏生〈第一次当队长〉、〈锄头的故事〉》，将刘柏生树立为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的典型。

刘白羽在文章中介绍了刘柏生的典型事迹。刘柏生并不出于个人兴趣,而是为了歌颂劳动,鼓舞劳动热情而开始写作的。他不是为了写诗而写作,而是为了斗争而写诗。1964年秋,菜田被洪水淹了,他在与洪水斗争中写了《敢与天地斗》,鼓舞了社员的斗志。

社员们/看一看/有谁叹气,/有谁胆怯,/有谁低头,/没有!/只因咱们是公社社员,/敢与天地斗。/你看咱队长,赛过几头牛;/你看咱支书,他在社员中,/精神多抖擞!看这边,/挖沟放水走;/看那边,/泼水洗苗绿油油。/看这片,/苞米直起腰;/看那片,/株株高粱正扬头;/处处是新景象,/处处美声稠。/啊——/是人民公社社员/把乾坤掌在手!

刘柏生认识到:写作不仅是当农民的喉舌、表达农民的心声,而且"写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他写作从来不耽误工作或劳动。构思总是在去开会,或去劳动的路上。

刘柏生的小说《第一次当队长》,描写回乡知青被社员选为生产队长,在贫下中农的支持下大胆开展工作。《锄头的故事》描写知青小许为了在劳动竞赛中争上游,弄坏了老耿头心爱的锄头,老耿头没有埋怨小许,还帮他修了一把好使的新锄头。刘白羽评价这些小说:"刻画出农村的新思想、新风貌,写出了老一代交班与青年一代接班的新颖的主题思想。"

身为中国作协的负责人,刘白羽通过刘柏生,为广大知青业余文学创作指出了具体的道路,他说:"对于刘柏生最重要的首先是做一个政治思想好、劳动生产好的劳动者,要做一个真正好的党的工作者,首先要把支部工作做好,把大队的生产搞好,而不是首先忙着去写小说。先做一个革命人,才能写好革命的文学作品。不要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所谓作家的老路,而坚决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学新的道路,永远不离开劳动,深深扎根在农村,作一个又能劳动又能创作的社会主义新型作者。新的社会主义文学队伍应该由这样无产阶级的新人成为主要组成部分。……不要为了写而写,一定要为党在一定时期的革命战斗任务而写。这是攸关文学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武器,还是变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温床的关系巨大的问题。"

[3]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 1953—19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4] 周立波:《王秉源和韩文恭》 《中国青年》1955 年第 20 期;《中国知青史——初澜 1953—19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5] 魏巍:《创造幸福的家乡》 《中国青年》1955 年第 22 期;《中国知青史——初澜 1953—19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6] 朱寨:《海河平原农村的新人新生活——评王汶石的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 《当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 年第 1 期。
[7] 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第一版,1977 年第二版。
[8]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1960 (第二部上、下卷)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7。
陈徒手:《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 《读书》1998 年 4 期。
[9] 柯蓝:《洋土结合》(小说) 冯金堂:《红姑娘》(小说) 《人民文学》1959 年 4 月号。
[10]《中国艺术影片编目》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1。
[11]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 1953—19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1。
[12]杨兰春:《朝阳沟》(豫剧) 《剧本》 1958 年第 7 期。
《朝阳沟》(1977 年 1 月河南省豫剧一团演出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 3 月第一版。
1974 年新版,将第二场的银环随拴保回乡,改为银环随城市知青集体下乡。在进山的路上,看到一座烈士墓,栓保给同学们讲,八路军英勇牺牲的故事。银环和同学们表示要"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新版本还把银环与栓保改成未婚关系,将银环写成坚持晚婚的榜样,以符合当时的知青政策。
[13]金剑:《春光曲》(六场话剧) 《剧本》1963 年 12 月号。
[14]谢逢松:《两个钢铸的字:坚持——影片〈朝阳沟〉主人公银环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青年》1964 年第 3 期。

[15]李准:《李双双小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
[16]管桦:《雾》(小说) 《人民文学》 1962 年 9 月号。
[17]公浦:《岔河村的姑娘们》(小说) 《人民文学》1963 年 4 月号。
[18]胡丹沸:《又一个回合》(独幕话剧) 《人民文学》1963 年 12 月号 胡丹沸:《春潮浪》(独幕话剧) 《剧本》1962 年 7 月号。
[19]《中国艺术影片编目》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1。
[20]韩文洲:《外队专家》(小说) 《人民文学》1964 年 8 月号。
[21]南京市 6 中、11 中、南师附中等校 72 名应届毕业生,放弃升学考试,直接报名到农村插队务农,此举得到南京市及江苏省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一定震动,被称为"72 贤人"。
[22]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城市个体手工业、个体经济,采取了抑制的政策。虽然国家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也曾一度动员社会青年自谋职业,成为个体手工业者,但这仅是国家某些部门的一时权宜之计。因为国家并不准备大规模地发展个体工商业,不会允许高初中生为代表的几十万或上百万的知识青年,参加私有经济,成为发展私有经济的骨干,这会破坏 20 世纪 50 年代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影响"一大二公"的社会制度,也会潜伏下新的政治问题。1954 年《青年团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社会青年工作的报告》中估计,全国有社会青年 500 万人以上。1956 年,经济过热,使这一问题得到缓解。上一年的 70 万社会青年中,已就业的达 30 余万人,余下的 30 余万人中,高中生 2 万,初中生 15 万,高小生 20 万人。据《青年团中央关于社会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报告》说,这些人看不到前途,怨言很多,有的人沦为二流子、小偷、流氓、盗窃犯,有的组织反革命集团。据哈尔滨市西区统计,1954 年 1—9 月;该区发生的 571 起案件中,社会青年和少年所犯的有 208 件。
[23]见《中国知青史——初澜 1953—1968》第十章第五节: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

[24]见《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第十章第五节：军垦新歌。

[25]小话剧《新社员》(宝坻县社员赵勤、王文煜、张久英、张刚维等创作)，描写下乡知青林燕参加拔麦，手上磨起了血泡，又发了烧。党支书要她休息，并让田大娘看住她。林燕设计骗过大娘，又跑到地里参加劳动。这出戏参加了华北区业余话剧调演，获得了好评。在1965年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华北区业余话剧舞台艺术片》。

[26]《中国艺术影片编目》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

[27]黄天明:《边疆晓歌》 作家出版社1965.3第一版，印5万册。

[28]李准:《清明雨》《李双双小传》 人民出版社1977。

《清明雨》描写，女知青程敏在农业技校毕业后，到公社农业技术指导站工作，她在老队长的帮助下进步成长。小说结尾写道:"歌声飞扬起来了;牛铃铛声有节奏地响着 一颗颗肥大的种籽，随着歌声，掉进刚翻开的新鲜泥土里。"

[29]刘厚德:《秋夜》《人民文学》 1965年7月号。

《秋夜》描写，城市高中生凌燕燕到山区插队，教农民孩子打算盘，万全大爷用山核桃制成土算盘，燕燕在党支部支持下，不怕富农分子的讥讽，决心让贫下中农的孩子把会计算盘接过来。

[30]沙丙德:《彩色的田野》《人民文学》 1964年10月号。

[31]《中国艺术影片编目》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

[32]甘肃省歌剧团集体创作，石玺、田广才执笔:《向阳川》《剧本》1965年第6期。

[33]中国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曲艺工作者协会编:《新人新作选》 人民出版社1965.10。

第二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新生代文学沙龙

一、三年“调整”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批评大跃进的极左路线。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组成一线党和国家的领导班子。以周恩来为首的一线领导人开始着手纠正“左倾”运动造成的后果。与此同时，也开始对权威意识形态进行扭转，从而展开了两个集团（权力集团与权威集团）、两种话语（权力话语与权威话语）间的冲突。

1962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对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的党员、干部，采取简便的办法进行“平反”。中宣部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制定了“文艺八条”，全面纠正文艺界的“左”倾错误。

1962年3月，文化部在广州举行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讲话，重申知识分子属于劳动阶层。陈毅在会上说：要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1]

1961年至1962年在“文艺八条”的背景下，出现了不少“反概念化、公式化”的反映人性人情的作品，如《达吉和她的父亲》、《百合花》、《无情的情人》等，表现知识分子文化主体意识的恢复。

在这一时期，田汉创作了戏曲《海瑞》和《谢瑶环》。谢瑶环忧国忧民，犯死上谏，临刑时唱道："是真金哪怕你熔炉锻炼，谢仲举宁玉碎不求瓦全。"表现出作者在新形势下的政治姿态。"歌颂清官"的实质，是支持权力集团，反对个人权威主义。海瑞不仅是彭德怀的"化身"，而且是刘少奇、周恩来等"一线"领导人的隐喻。[2]

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1961.11)、《广陵散》(1962.10)两篇小说，都选择的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广陵散》描写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险恶政治环境，抨击依附司马昭的士人钟会、吕巽，歌颂处乱世不乱操守的高尚人格。

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1962.4)，描述杜甫目睹民不聊生的乡村景象后说："不管怎样，我总得为这些老乡们奋斗，为恢复大唐的一统江山而奋斗，为拯救多灾多难的人民而奋斗。如果我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那么，至少可以用我的诗，我的笔。"

这一时期创作发表的许多作品，都选择了知识分子作主人公。表面看来并不具备政治意味的电影剧本《早春二月》在1962年2月发表，也泄露出一点消息。编导者选择描述大革命失败后徘徊、苦闷和努力追求的知识分子作为创作主题，显然不是一种偶然。

在"调整"的气氛下，文艺理论界打破"一言堂"，开始对"左倾"文艺理论进行了"探讨"。这实际是对"大跃进"文艺的全面反驳。在全国范围展开了"题材决定"论、"共鸣"问题、戏剧冲突和历史剧等问题的讨论。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话语虽然带有独立性(人性、人道主义)因素，但是受制于客观环境，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与权力话语合流，形成了"权力——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话语、权力艺术，本质上是"权力——知识分子"二体一元的话语和艺术。

当时的新生代处于学校这样一个高度封闭和组织化的特殊环境中，不可能了解意识形态上的这场文化抗争，特别是知识分子进行顽强抵抗的政治内幕。"权力——知识分子"话语没有成为主流文化，不能对新生代产生深刻的影响，而此后崛起的权威主义，却对新生代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后的意识形态

1.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1957年反右时的理论，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小说《刘志丹》被说成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在文艺界进行调整不到两年，文艺指导思想又急剧向左转，全面肯定“左”的路线，全面否定建国17年以来的文艺成绩，形势从此急转直下。

权威意识形态在八届十中全会后急剧发展。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马列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毛著，学毛著只要学“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1961年5月起，《解放军报》即开始刊登毛主席语录。在林彪“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下，军队自行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小红书一时风靡全国。林彪神化毛泽东，将毛泽东思想体系“庸俗化”、“简单化”，将代表全党长期斗争经验的毛泽东思想，篡改成个人权威话语。

《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和《毛主席语录》的出版，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反映了十中全会后，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确立，造神运动的加剧，个人权威在党内急剧扩大。权威话语在社会上迅速普及，在意识形态方面逐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成为意识形态革命的主要内容。

1963年初，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搞思想革命化。中宣部配合社教运动开展反修防修、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学雷锋三者组合成的舆论宣传活动，文艺界的任务也迅速进行了调整，由此引申发展出阶级斗争文学、反修戏剧和共产主义道德文学的创作热潮。

反修戏剧的代表作品有：刘川的《第二个春天》，胡万春的《激流勇进》，蓝澄的《丰收之后》，张仲朋的《青松岭》，沈西蒙等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丛深的《祝你健康》(《千万不要忘记》)，陈耘的《年青一代》和《火红的年代》等。阶级斗争文学的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风雷》(陈登科)、《艳阳天》(浩然)。戏剧、电影：《夺印》(1963)、《丰收之后》(1964)、《霓虹灯下的哨兵》(1964)、《分水岭》(1964)等。

八届十中全会后，开始了一个权威话语与权力话语对峙、并存的时期。两种政策、两条路线、两种声音，同时出现，使饱经运动沧桑的作家、艺术家们望而却步，如履薄冰。在这一时期，艺术家要同时遵循权力和权威的双重规范，更加循规蹈矩。僵化的创作思维模式，各级艺术部门领导的层层管理，宁左毋右的思想，使创作在两种力量的合力下，形成了这一时期作品的特有风貌。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显现出二元化的"权力——权威"话语形态。

2. 共产主义道德文学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文艺界配合运动创作出一批共产主义道德剧、共产主义新人小说、政治抒情诗、典型报告文学作品。这批反映共产主义道德主题的作品对于青少年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代表性作品有，共产主义道德剧《龙江颂》(江文)、《雷锋》(贾六)；报告文学《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穆青)、《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佟希文)；为共产主义新人立传的《欧阳海之歌》(金敬迈)，政治抒情诗《雷锋之歌》(贺敬之)和京剧现代戏《草原英雄小姐妹》等。

电影《特别快车》(长影厂1965)是一部典型"共产主义道德文学"作品。影片讲述解放军林营长为抢救502次列车，身负重伤，为抢救林营长的生命，列车由普快改为"特快"。在女列车长裴兰英等十三位女列车员和全车乘客的合作下，将伤员及时送到目的地。列车长裴兰英的扮演者卢桂兰，具有女英雄的气质。电影的许多细节，带有象征性意味。如林营长用自己鲜血染红的毛巾向列车发出紧急停车信号，将伤员以特快速度送往目的地等，这辆特快列车是革命时代的象征。

"长篇纪实小说"《欧阳海之歌》描述了一个穷孩子，如何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当代奇迹。小说主人公，经过了一系列平凡考验，认识到"为党工作就是最大的幸福"，形成了"立足连队，放眼世界"的崇高境界，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典型的当代心理小说，深刻地揭示了斗私批修的炼心功夫。它是一部心灵史，其中浸透了传统的"心学"内容。主人公经历了心灵的折磨和苦难，承担了"平凡"的奉献，他内心的最大渴望，就是希求光辉地献身。这是20世纪60代中期，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欧阳海是一个当代英雄，他的伟大表现在能够自觉地做一颗时代的螺丝钉。传统的人文精神顽强地保留在这部现代文本中。这部小说在新生代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欧阳海之歌》在当时引起轰动，它被国家领导人和文艺界知名人士们称为：塑造了"时代英雄"，具有划时代意义，是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里程碑，是"毛泽东思想的颂歌，社会主义时代的颂歌"。

"文革"前夕，在青少年中涌动着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潜流。下面这首朗诵诗曾一度在校园中广泛演出和传抄，它表现了新一代要崛起的意志：

> 未成的大厦谁来建/未来的天地谁主宰/革命的红旗谁来接/亲爱的党啊/我们我们我们/红色的新一代！……无产阶级的子孙啊/革命本性永不改/我们的血管里/流着老一辈的血……把未来的世界啊/交给我们这一代/我们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
>
> ——《接班人之歌》(徐荣衔、钱初承) 1964年

共产主义道德文学并不是考虑如何使青年一代成长为"巨人"，而是从政治功利出发，培养他们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左倾"思潮，以便利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冒进政策的需要。它在提倡社会道德纯洁化的同时，还提倡个人迷信，从而造就了富有政治理想、献身激情，又思维封闭、习惯盲从的一代青年。

在1949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是随着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新生代。他们的思想发蒙与权威话语的崛起恰巧处于同一时期，当一种新话语处于上

升期时,不仅具有强大的现实势力,而且自然地带有文化上的“创造性”和“新鲜性”。新生代被包围在浓烈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从震耳欲聋的时代宣传中,分辨出微弱的抵抗之声。他们盲目地接受了正在崛起的新文化——权威话语。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新生代心中充满了英雄主义梦想和反抗现实的激情,在极左环境下校园中逐渐形成一股激进思潮。一些学生自发地组成“学毛著小组”,逐渐演化成为半秘密的政治小组。激进学生对毛泽东怀着狂热的崇拜,他们把解放全人类视为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他们渴望把社会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个道德乌托邦。[3]这一切为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三、文艺沙龙和新生代文艺复兴的梦想

新生代——共和国的第一代人,一方面受到中共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小接受思想教育灌输,另一方面,他们随着工业化社会同步成长,对现代文明有着特殊的敏感和渴望。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教育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现实,从两个方面影响着新生代,在他们的文化人格上造成了内在的冲突。这种历史的宿命,决定了新生代将分裂成两种派别——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就在红卫兵运动萌芽的同时,一股自由主义的思想潮流也在暗暗地涌动。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已经逐步进入工业社会,现代文艺开始在民间萌生和传布。以新生代为主体的城市文艺沙龙于1961—1963年间开始在北京出现。在上海、贵阳、成都等地都出现了类似的文艺沙龙。新生代沙龙文艺的出现,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那个时代,背离主流文化的只是极少数人,他们是真正的叛逆者。他们努力设法从时代大环境中,拓展出个人生存、发展的独立文化空间。这些沙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子弟,背景是延安知识分子和左翼文化人,主要接受“权力——知识分子”话语的影响;一类是社会关系复杂的平民子弟和“黑五类”子弟,具有更多的民间背景,主要从西方文化和近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

1. 郭世英和 X 小组

这一时期,北京的文艺沙龙活动大多发生在著名学者、艺术家、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高干家庭中。因为这些人的子弟具有常人所不能享有的信息渠道、教育环境和超越社会禁忌的条件。

伴随着沙龙文艺的往往有理论小组(如:学"毛著"小组)的活动,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共生现象。可以说,有文艺沙龙的地方,就会有独立的思想和理论存在,理论小组构成了文艺沙龙活动的深厚社会背景。X 小组就是一个代表。

郭世英是郭沫若之子,他作为世家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郭世英在1962 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 年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各基层单位普遍成立学哲学小组,运用毛泽东提出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解决从军事到政治,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分为二"被视为解决一切矛盾的法宝。在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氛围中,郭世英向几个要好的同学倡议,向哲学"禁区"进军,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面对这些超越了纯哲学问题的未知数,他们将自己的学哲学小组命名为"X 小组"。他们的活动受到注意,通信和油印刊物受到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检查。在与苏修论战的政治背景下,X 小组被认为是赫鲁晓夫小组(因为 X 恰好是赫鲁晓夫名字的头一个俄文拼写字母)。小组成员被有关部门分别传讯,在强大政治攻势下纷纷交待"问题"。郭世英被认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周恩来出面过问了郭世英的事情,并指示公安部门暂时安排郭世英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锻炼。

1965 年秋,郭世英返校学习,不久转到农业大学。1968 年春,郭世英 X 小组的问题被重新审查,农大的一部分造反派私设刑堂,郭世英被迫害致死。郭世英生前曾积极参加了朋友间的文艺活动,并写有一些诗作。[4]

2. 张郎郎和太阳纵队

在北京诸多的文艺沙龙活动中,张郎郎的沙龙比较具有代表性,其成员多半出自干部、著名民主人士和艺术名人的家庭。

张郎郎是中央工艺美院院长、著名画家张仃之子,1943年生于延安。他在育才中学时已经开始写诗,并同张久兴等人组织文艺沙龙。张郎郎考入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后,又同巫鸿、吴尔鹿、牟敦白、甘恢理、王东白等人继续沙龙文艺活动。

张郎郎的家是沙龙聚会的场所、大家在一起做游戏、唱歌、表演戏剧,谈论自己喜欢的书籍。经常参加的还有刘菊芬、扬艾其、甘露林、陈乃云、孙智信、蒋定粤等中学生。在这个家庭沙龙里,中学生们经常可以与艾青、海默、吴祖光、李幼然、萧军、崔嵬、汪洋等知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在一起聚会。

张郎郎和张久兴、甘露林等人崇尚马雅可夫斯基,学“老马”,剃成秃头,穿军棉裤,腰里勒根旧电线,天天早上在小松林来回乱走,狂背《我爱》、《穿裤子的云》。1958年全社会开展民歌运动,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限期完成100首诗,50张画。张郎郎在诗中不提党、主席、三面红旗,被教导主任批评为“青年主义”。

张郎郎在转入外语学院附中后,经常到琉璃厂旧书店寻找朗费罗、惠特曼等人的诗集。他从女同学戴咏絮(戴望舒之女)处借到了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诗选》。很快这个诗歌圈于里聚集了张新华、于植信、张振洲、扬孝敏、董沙贝、张润峰等人,他们一边啃着白薯面窝头,一边读洋诗。于植信把中文诗译成法文,董沙贝则偷偷的画现代派油画。

延安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上,对沙龙青年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张郎郎回忆说:我们这个沙龙的形成,有两位不能不提,我的母亲陈布文和作家海默是我们“真正的精神上的导师”。

陈布文是沙龙艺术和现代诗歌的最早倡导人和支持者。陈布文1920年生于常州农村,女师毕业,1937年与张仃相识并结婚,1938年夫妇一同到延安。陈给周恩来、李立三当过秘书,曾从事鲁迅研究。1945年先后在张

家口、哈尔滨、沈阳、北京从事教育工作，后积劳成疾，长期在家养病。早年曾为《论语》、《宇宙风》、《扶轮日报》撰稿。解放后，曾给《人民文学》写小说，给《新观察》写散文报道。她在中央工艺美院教文学，与许多文学青年成为朋友。她存有《冰岛渔夫》、《伊尔的美神》等解放前的旧版书籍、有全套的《论语》、《宇宙风》、《太白》、《小说日报》等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月刊。这些书成为沙龙的文学财富。陈布文经常与沙龙中的青年交谈，动手帮张郎郎、张久兴、杨孝敏修改诗文，并指导青年人读书。张新华、王东白等人都说，在思想和艺术上曾蒙受过陈布文的巨大恩惠。

作家海默1958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劳改中因为劳动沉重和营养不良而半身麻痹，被同意回京治病。他经常参加张仃家的诗歌晚会。张郎郎回忆说：海默"为了不惹麻烦，就说他是我家的三叔。因为他也姓张，所以顺理成章。沙龙里的年轻人只知道我家有个有趣的三叔。他富于激情，出口成章，而且非常幽默，很快成为中心人物。"张久兴、蒋定粤等人还到海默家中去拜访，听他谈小说和诗歌创作。

"太阳纵队"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中央工艺美院的一次诗歌朗诵会。沙龙的成员推了光头，到工艺美院的朗诵会上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在会场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朗诵会结束后，张郎郎提出成立"太阳纵队"，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几天后，"太阳纵队"在老北师大的筱庄楼成立，计划每月搞一次沙龙活动，由张郎郎起草了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章程。针对中国文艺界沉闷的现实，他们设计了纵队的标志：一柄剑，顶端分出三支剑头，分别代表——诗歌、音乐、美术。这柄剑象征着中国文艺的全面复兴。

"太阳纵队"成立不久，学校老师批评说，有些同学搞小团体和非法组织活动，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太阳纵队" 迫于压力停止活动，转为小圈子的谨慎聚会。[5]

在这个充满了幻想和激情的时期，被浪漫主义诗情所激动的青年们纷纷写下自己的诗篇。张郎郎写了独幕剧《对话》、电影剧本《孔雀胆》和一本短诗集。他在诗中表达了新生代拥有自我精神家园的童稚梦想。

> 它沉静地酣睡着，
> 像是窗外的白雪，
> 可这是一团温暖的雪……

——《鸽子》 张郎郎 1962年

我想在地毯似的青草地上，
盖一座白房子。
草地上必须有黄色的蒲公英，
还有酒窝那么大的小银蝴蝶。
屋子，有窗子，挺亮，
还有烟筒，每天都会冒出一朵朵黑云彩，
门一定要厚，是干净的木头做的。
桌上老有一杯浓甜的咖啡，
还有好看的毛线团。

——《理想》 张郎郎 1962年

"太阳纵队"只是一群热爱文学艺术的青少年，但从一开始他们就表现出独立不倚的个性。这种性格已决定了他们此后坎坷的命运。张郎郎1968—1977年间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坐牢。成员张久兴因张郎郎案件在军队中受牵连，于1972—1973年间自杀身亡。成员甘露林在军事外语学校学习，在军队中受审查，于1972—1973年间自杀身亡。成员于植信被送往天堂河农场劳动改造，后强制送往新疆农二师支边。[6]

3. 贵阳、成都的文学聚会与沙龙

在1963—1965年，贵阳市中心的黔灵湖公园集中了一批热爱艺术的青年，大多是一些平民知识分子和"黑五类"的子弟，他们聚在一起谈论音乐、美术，传递贝多芬唱片和珂勒惠支画页。贵阳市不大，黔灵湖畔几乎聚集了贵阳的全部艺术精英。这种松散的聚会，在"文革"中发展成为贵阳地区的地下文艺活动。他们中间有各方面的人才，文学方面——黄翔、伍立宪(哑默)、李家华、莫建刚、方家华、梁福庆等(他们大多成为野鸭沙龙的成员)；音乐方面——瞿小松、马建平、程远林等；美术方面——尹光中、刘建

一、曹琼德等。

这些青年后来在艺术的各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特别是黄翔、伍立宪的野鸭沙龙，在“文革”时期十分活跃，在贵阳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在“文革”前，他们已经开始进行沙龙诗歌的写作。

我是谁
我是瀑布的孤魂
一首永久离群索居的
诗
我的漂泊的歌声是梦的
游踪
我的惟一的听众是
沉寂

——《独唱》 黄翔 1962 年[7]

小小的翅膀上
翻卷着大海的波浪
身子净洁
饱吸霞珠、阳光
细长的尖嘴
衔来星空和汪洋
迎着潮汐呼叫啊
唤着沉默的同伴

——《海鸥》伍立宪 1965.7[8]

在这一时期，成都市出现了邓垦、陈自强的文学沙龙，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热爱文学的青年。邓垦和陈自强同为成都市 7 中的学生，先后在 1963 年和 1965 年从高中毕业，两人都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无法继续升学，在街道当临时工，并由此结束了学生时代的浪漫初恋。相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文学理想，使他们结成了牢固的友谊。他们在“文革”前开始沙龙诗歌的写作，他们后来成为成都知青沙龙的核心人物。

归来啊，我远方的恋人，
你在那白云投宿的山中，
可听得见我的呼唤？
你在那沙鸥落户的水边，
可看得到我的孤零？
我为你似长烟一般的憔悴，
我为你江涛一样的呻吟。
——《归来啊，我远方的恋人》 邓垦1964年[9]

谁能看见你哟，
黑暗深处的躬耕者？
谁能听得见你哟，
沉默在愁苦之中的光棍？
出来吧！
小小的灵魂。
四周压力不能使你奋进，
阴暗会腐烂掉你的青春。
……
出来吧，
小小的灵魂。
为着自由的驰骋，
为着自由的呻吟。
那些蠕动在雨泥中的，
容易滚满污泥的沉昏；
你最先爬出，
将最先受到暴风雨的冲淋。
……
啊，自由，光明！
啊，友谊，爱情！
都在向你齐呼唤：

出来吧，黑暗中小小的灵魂！
——《蚯蚓》 陈自强 1962年[10]

4. 叶三午、陈明远

叶三午是教育家叶圣陶的长孙。叶三午由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郊区农村中学教书，在参加劳动时从山上摔下，造成下肢瘫痪，终身需要依靠轮椅行动。叶三午酷爱音乐、美术和诗歌，周围聚集了一批喜爱艺术的青年朋友。这个圈子在"文革"中仍十分活跃，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赵一凡、赵振开、钟阿城等都曾与叶三午有密切交往，时常在叶的家中聚餐，或短期寄宿。

我的青春你还要睡多久呢？
太阳照耀大地辉煌
不能触着你的脸吗？
那火热的光芒！
我的青春你还要睡多久呢？
闪着寒光的黑鸦
扑落在你身上贪婪地
吻着你金黄的幼芽
——《无题》 叶三午 1960.12.20[11]

陈明远生于1941年，是一个具有数学天赋的青年诗人，1963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数学系，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十一岁即与郭沫若、田汉等文化名人交往，陈的新诗《练习曲集》，由郭沫若、田汉修改后，一度准备出版。他是在权力知识分子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人。他在"文革"前创作出一批旧体诗，以"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的名义，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些诗歌青春磅礴，现代语言流溢于格律之间，受到了年轻一代的热烈欢迎。它们对后来的知青旧体诗写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2]

沁园春　　咏石　　陈明远　1961年初

璞玉一方,切琢无疵,磨砺发光。岂恰红公子,命根维系;梁山好汉,天道周行?烈火难熔,狂风不倒,迸出齐天大圣王,传千古,数几多宝库,龙窟云岗。

谁言铁石心肠?有热血沸腾涌满腔。任悲欢离合,无求德色;嬉笑怒骂,皆为文章。上补青天,下填沧海,裂骨焚身自好强。如偿愿,亦平生不枉,非梦一场!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沙龙文学,对"文革"知青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们为知青沙龙的活动、文学倾向性,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资源。许多早期沙龙后来逐步演变为知青沙龙,其成员也随之成为知青文学的民间力量。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的文学沙龙,是"文革"知青沙龙的先声。

注　释:

主要参考书目: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5。
李计谋、王居瑞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 (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1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解放军出版社 1991。

[1] 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5。

[2] 关于京剧《海瑞罢官》现有两说,一说是毛泽东要宣传 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胡乔木将毛的意思转达吴晗,随后产生此剧。吴晗失误在"太迷信了,太听话了"。(参见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另一说,吴晗对毛泽东关于海瑞的话题十分兴奋,"也不仅仅因为遵领袖之命,更不仅仅因为重燃专业研究之热情——后辈以为,要害在于:海瑞话题在先生眼中,当是珍贵之契机,可以相当程度地实现先生所自期的体制内'独立'这一

角色价值。"(参见夏中义:《谒吴晗书》《北京文学》,1998年第3期) 笔者认为后说较为妥当。

[3] 在"文革"前夕,北京一些干部子弟集中的重点中学,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反对现行教育制度造反行动,校方以其有高层政治背景,以安抚的方法加以平息。如1964年北京11学校中学部发生的罢教事件,校方进行"慎独"教育,加以平息。1965年北京4中学生,自行对"修正主义的苗子"进行批判,也被校方说服平息。这些事件,与当时开始的"社教"、"四清"运动有密切关系,人称"小文革",可以从中看出红卫兵运动的前兆。(由姚远景、沈原、潘婧提供)

[4]《非正常死亡——十年浩劫中的受难者》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年。

[5] 有关材料出自《太阳纵队的传说》《今天》 1990年2期,并由张郎郎、张大伟、张寥寥、张新华、张润峰等人提供。

[6] 张郎郎1968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被判为"死刑缓期执行",曾戴重铐、重镣三个月,1977年平反出狱。在北京看守所与遇罗克同监,一起研究诗词,并写有古典诗词《吴淞口》等。1971—1974年在河北饶阳县看守所和段铎、王涛、齐呈翔等人开展地下文艺,写有短诗《狼皮褥子》、《七月流火》和中篇小说《房子》。1978—1980年,在中央美院美术史系任教,并在《美术研究》、《世界美术》当编辑。参加了手抄杂志《桥》的沙龙活动。1988—1989年任《中国美术报》副董事长。现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并从事写作。

[7]《黄翔自选集》(未发表),由黄翔提供。

[8] 哑默:《乡野的礼物》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12。

[9]《野草诗选》(内部资料) 1979年。

[10]《空山诗抄》(手抄本),由杜九森提供。

[11]由叶三午的夫人姚兀真提供。

[12]路丁:《轰动全国的"伪造毛主席诗词"冤案》湖南文艺出版社工团 1986.11;《劫后诗存——陈明远诗选》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8。

第二卷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文学

（1966–1968年）

第三章

红卫兵文学

一、红卫兵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运动，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新生代的政治、文化命运。红卫兵运动对知青一代的思想意识，有着深刻的影响。“老三届”中学红卫兵后来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文革”早期的政治经历，对他们在农村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红卫兵文学的独立话语和创作经验，被“老三届”中学生带入了知青文学，直接影响到知青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知青的民间写作实际上是红卫兵文学的延续，二者之间存在着传承的关系。

在“文革”早期，学生红卫兵组织的文学与群众组织的文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是一种广义上的红卫兵文学，共同遵从“文革”意识形态，带有鲜明的权威话语特点。[1]

在“文革”初期，敢闯敢冲的中学生率先起来造反，但是阅历、文化等方面的限制，又使他们很难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和文学观念。在运动前期，他们更多地接受大学生和群众组织的影响。红卫兵文学的一般面貌，也就是中学红卫兵文学的思想面貌。

所以，本章将中学红卫兵的文学活动，放在群众组织和大专院校红卫兵活动的大背景下进行介绍。

1. 当权艺术的崩溃与绝对权威艺术的崛起

八届十中全会后,当权者们迫于压力,对绝对权威意识形态让步。但是毛泽东仍然对意识形态不满,欲对当权者们占据的文化艺术部门进行全面改造和控制。

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两份文艺材料上批示:社会主义改造在文艺界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批示下达后,中宣部迫于压力,领导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进行整风,并改组领导机关。1965年4月,中央下发文件免去了夏衍、齐燕铭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成立以肖望东为书记的新党组。全国各报刊开始组织文章批判毒草电影、戏剧、小说,望风捕影,上纲上线,被批作品数量之多,用词之严厉,超过了以往的运动。[2]

毛泽东的两次批示下达后,中宣部要求各文艺单位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干部下放劳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运动全面展开。在各部门组织文艺工作者下基层与工农相结合、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新华社报道:到1966年2月为止,全国28个省市,有16万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他们"不是搜集素材,而是参加三大革命,以改造思想为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锻炼》,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决心经过一番"痛苦的改造过程"。

在1965—1966年初,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专业化、和大、洋、古的文艺作品迅速消失。全国开展写"三史"画"三史"(厂史、村史、家史)运动,舞台上出现表现工农兵生活的小戏、小歌舞热潮。以工农兵为创作主体的"后工农兵文艺"迅速兴起,各种新形式、新形态的作品占据了文化艺术的中心舞台。

"后工农兵文艺"运动中,建立了一支"工农兵文艺"队伍,形成了"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它们为权威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后工农兵文艺"广泛采用了说唱性的民间形式,兴起一种崭新的文艺形式——新故事。故事会被称为"文艺轻骑兵","新型口头文学",是群众创作的"新的文艺形式","占领文化阵地的有力武器"。这种工农兵语言构成了绝对权威

艺术的代表性文体。[3]

"后工农兵文艺"与"工农兵文艺"的本质区别在于,话语主体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换。我们知道自《讲话》发表之后形成的"工农兵文艺",其创作主体是具有延安背景的革命艺术家,它的真正话语主体是权力政治,但是在1964年前后的"后工农兵文艺"则是以工农兵群众为创作主体,它的真正话语主体是权威政治。"后工农兵文艺"的大发展,代表着绝对权威艺术的全面崛起。

林彪主持下的部队文艺对"后工农兵文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各军区、军兵种组织战士业余演出队进京演出,"兵写兵"、"兵演兵"。大量的战士诗歌、快板、说唱开始出现在报纸、电台上,成为"后工农兵文艺"的生力军。这些演出,不仅为专业文艺队伍的创作指引了方向,也为群众性文艺提供了范本。他们的小舞蹈、表演唱等小节目,对"文革"运动中的红卫兵文艺产生了广泛影响。

1964年6月5日京剧现代戏观摩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京剧演出现代戏的一次高潮。毛泽东观看并接见了《智取威虎山》剧组成员。《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分别发表重要社论。江青开始染指产生重要影响的现代剧目,"现代剧运动"开始逐步向"样板戏运动"蜕变。1967年夏天,"文革"官方开始发动"革命样板戏"运动,江青成为"文艺旗手"和"京剧革命"领袖。"样板戏"成为绝对权威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学唱样板戏,学做革命人"成为"文革"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绝对权威艺术开始普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对其后产生的红卫兵文学、知青文学造成了深刻的影响。[4]

2. "文革"运动的爆发及红卫兵组织的产生

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4—1965年,国内政治运动空前激烈,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

1964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保定地区结合"社教"运动开展"四清"和湖南省"社教"中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1965年1月毛泽东又对"社教"《纪要》做重要修改,提出:"这

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政治大跃进”，大批农村、工矿的基层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四清”和“社教”实际是“文革”的前奏和热身运动。

196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北京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公开号召党的各级组织反对党中央的一线领导人，他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5]

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党内斗争开始扩大到整个社会，原来自上而下的运动开始变为由个人权威公开号召反对中央集体的自下而上的运动。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通过，“通知”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同党、政府、军队、文化机构中的走资派相互勾结在一起，“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迅速公布了文件精神，一场揪斗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开始全面展开。

5月2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的亲自授意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三天之后（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在圆明园废墟秘密开会，成立红卫兵组织。这一消息在北京中学生中间流传开来，中学生开始进行秘密串联。6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及北京25中等学生相继成立“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的学生组织。他们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红卫兵很快成为揪、斗学校“走资派”、“反动教师”的激进力量。各大、中学校开始出

现迫害教师的暴力事件，一些教员被打死或不堪屈辱而自杀。

6月，毛泽东对北大、地质学院等高校发生的暴力事件，作了批示："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由于北京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党委领导人被揪、斗，造成秩序混乱。为了恢复学校的秩序，使运动正常发展。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各学校及文化部门。派驻中学指导"文革"运动的工作组，开始集训教师，并对学生中的非法组织进行打击，开列"黑名单"、搜集"黑材料"，进行甄别、定性"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准备"秋后算账"。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25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均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一些中学生受到审查、批判。[6]

清华附中红卫兵于6月24日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称："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其后，清华附中红卫兵连续贴出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各中学红卫兵开始跨校串联，并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以"红五类"共同的"阶级利益"作为粘合剂，联合起来抵制工作组。这时，不少高等院校也开始出现类似红卫兵的"战斗队"，起来批判校党委和工作组。在大中学校掀起一股反工作组的浪潮。

毛泽东于7月8日由韶山回到北京后，严肃批评刘少奇等人，指出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为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起来造反，毛泽东决定因势利导，支持红卫兵组织。他于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并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红卫兵代表，毛泽东身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红卫兵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兴起，形成一股狂热的政治力量。[7]

二、中学红卫兵群体的构成

1. 中学红卫兵派系的三个阶层基础

新生代共同出生在五星红旗下，但是自他们降生之日起，就被按照家庭出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有的属于"红五类"是革命的接班人，有的属于"黑五类"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他们在政治上被划分在相互敌对的两个阵营。这种侵犯人权的歧视政策，造成了新生代内部的分裂和对立。

在20世纪50年代，"阶级路线"还没有深入到教育领域，高等教育还遵行"有教无类"的原则。但到了1962年毛泽东提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之后，教育政策开始实行"阶级路线"。它是一项极具利益性的政策，使整个社会受益群体发生很大变化。工农出身的子弟被按比例吸收进重点学校，尽管他们中的一些学生达不到相应的成绩，但根据政策仍然得到安插。高干和民主人士、学术权威的子弟，则享有更多的升学特权。出身"黑五类"或是家庭成分、社会背景复杂的学生实际上失去受高等教育的可能，他们还将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学习成绩再也不是衡量学生的主要依据，政治表现、阶级出身成为重要的砝码。大学是培养国家干部的基地，高等教育的特权化，奠定了社会等级制度，在新生代内部实际上已经形成不同的等级。[8]

在"文革"前，新生代被社会划分为三个阶层——干部子弟、工农子弟、知识分子和黑五类子弟。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他们按照"阶级路线"自然形成了红卫兵的三大派别。

三大派别的构成可分为以下六部分：(一)超级干部子弟。父母是部级和省级干部。(二)高干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父母是10—13级干部或基层干部。(三)产业工人的子弟。(四)父母属于集体所有制街道工厂工人、手工艺者和其他(理发、店员等)。(五)职员、会计师、工程师、编辑、医护人员、公教人员的子弟。(六)高级知识分子，如高级工程师、文艺界著名

的作家和导演、明星、主编、主治医师、上层民主党派等,"三名三高"人士的子弟。

这六类子弟,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三大文化社区。超级干部子弟和著名人士的子弟,生活在独门独院;军队、机关和高校的普通干部子弟生活在机关大院。街道工厂和手工业者们的子弟则仍然生活在日渐衰落的里弄或小胡同里。杨东平指出:后者代表着老舍笔下的传统的旧北京人文环境,前者代表着新兴的社会阶层,"构成了北京城市社会的两个不同层面,两个异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空间"。[9]

中学红卫兵派系是建立在"阶级路线"基础上的,内部充满了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阶级路线"是等级社会给他们安排的政治宿命,他们或者解开这道符咒,或者陷入万劫不复的相互绞杀之中。可以说,红卫兵一登上历史舞台,就注定要扮演悲剧的角色。

2. 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三个阶段和三大派系

中学红卫兵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前期(1966—1967)以干部子弟红卫兵(老红卫兵,简称"老兵")为主体。这是社会阶层背景最明显的政治派别。"阶级路线"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权力继承意识。他们受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影响,强调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夺文化教育领域领导权,提出: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极少数"资产阶级代理人"。

老红卫兵的"鬼见愁"对联,"三论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其所指与绝对权威主义是一致的,并由绝对权威集团转为新生代,体现了一代人反抗压迫的精神个性。这种反抗中包含着"接班"意识和对"黑五类"的压迫、施暴。就像孙悟空闹天宫,是为了"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一样,这是一种农民起义式的造反。

当运动发展到危及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开始走向"文革"运动的反面。后来出现了像"首都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样的抵抗文革运动的组织。

中期(1967—1968)以造反派红卫兵("四三派",简称"新兵")为主体。

造反派在政治上依靠"中央文革",全力攻击走资派。他们认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走资派背叛马列主义,由公仆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高干子弟有血统论和特权思想,是和平演变中的新兴资产阶级。造反派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指具有党内背景,与权力相结合的学术权威,走资派的帮凶。[10]

后期(1968—1969)以工农子女红卫兵("四四派")为主体。工农子女红卫兵是一个有着工人、市民阶层背景的数量较大的学生群体。这一派别试图在凶险的政治风浪中,免于覆灭之灾,处于一种有利的位置。他们坚决捍卫阶级路线,既反对血统论,又反对出身论。在1966—1967年,当老红卫兵处于绝对优势时,他们曾以"红外围"的组织形式,跟随以权力集团为后盾的老红卫兵;当权力集团在1967年"一月夺权"斗争中失势后,他们则从老红卫兵组织中脱离出来,组成"四四派"紧跟"中央文革"。"四四派"成为中学红代会的主角后,一方面利用"老兵"与"四三派"作战,一面又与"联动"划清界限。[11]

中学红卫兵各大派系背后都有上层政治力量的支持,各派系的斗争也反映了上层政治力量的冲突。在第一阶段,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起来造"党内走资派"的反,但是老红卫兵在1966年冲杀出来后,很快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倾向。同时权力集团开始通过老红卫兵"纠察队"控制运动局面,保护各级干部。在第二阶段,毛泽东迅速抛弃了保守的老红卫兵。他说:红卫兵也是不断分化的,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反革命。"中央文革"转而支持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老红卫兵马上倒台,甚至被关进监狱,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崛起,成为攻击走资派的重要力量。在第三阶段,随着夺权运动结束,进入"斗、批、改"阶段,"中央文革"重新强调阶级路线,全面整肃造反派,工农子弟红卫兵开始崛起。[12]

3. 红卫兵的三大派系理论

在1966—1969年间,红卫兵不同的政治派别,对"文革"的政治目标和方向,产生了严重分歧,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了完全

不同的解释。这些理论代表了不同派别的政治利益。

这些思想观点并非都是由大学红卫兵提出来的,中学红卫兵也积极参与其间。这些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学“文革”运动的发展,例如“新思潮”变革体制的思想,实际上成为中学“四三派”的理论基础。

代表性的理论有三种,它们是“新思潮”(激进派)、“四一四思潮”(保守派)和“联动”思潮。[1]

(1) 全面变革国家制度的“新思潮”

自“文革”开始不久,试图全面变革国家制度的“新思潮”便开始出现,这股强劲的激进思想,先后在北京、武汉、长沙、上海等地掀起,迅速刮遍全国。

1966—1967年间,北师大造反兵团几次提出:“要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打掉旧的国家机构,创立起无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新组织形式。”1967年6月,北京部分“四三派”红卫兵发表《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宣称:“所谓革命,就是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而‘文革’就是一轮新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

1967年底,武汉地区“北、决、扬”(“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及《扬子江评论》)提出,用人民武装取代国家军队(解放军),推翻“革命委员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体制”,“并使之过渡到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真正地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正式权力机构——武汉人民公社”。

1968年初,“湖南省无联”的笔杆子杨曦光发表《中国向何处去》,提出:“文革”前17年形成了由90%的高级干部组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且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极左派”的宣言。

1969年初,上海“中学运动串联会”的笔杆子毛兵在《一切为了九大》

中，提出“阶级关系变动论”，认为“从解放战争到文化革命，党内机会主义者与人民的矛盾由次要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并因而引起革命阵线内部的依靠、团结、清洗对象的变化。这就构成了阶级阵线的大变动”。

“新思潮”在全国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如江苏徐州“踢派”提出“踢开革委会”，“实行大民主”。广州八五公社提出，广东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是“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暗流”，要“干部大换班”，“一切权力归左派”。山东“渤海战团”提出，“中国的军队、公检法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要彻底砸烂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国家机器，重新建党，建军”。

(2) “河归旧道”的“四一四思潮”

保守派与激进派的观点正相反，他们认为：“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动和进行的，走资派未占统治地位，也未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文革”不可能引起阶级关系大变动，从而导致财产和权力再分配。这一保守思想，被称为“四一四思潮”。

1967年8月9日清华大学“四一四东方红兵团”的笔杆子周泉缨写出《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提出：“十七年来我国的阶级阵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共产主义化的……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而知识分子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化得更明显，但是基本阵线也是不变的”，造反派是革命的同路人“可以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一切要河归旧道，甚至“对刘少奇路线也要一分为二”。

其后周泉缨贴出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大字报，称其为“窃国大盗袁世凯式的人物”，是“极左路线的总根子”。他还在公开场合指责发动文革“一则是个人集权需要，二则是排除异己”，“打倒‘刘家军’，换上‘林家铺子’”。周泉缨的观点，被激进派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否定“文革”的谬论。

“新思潮”和“四一四思潮”在当时形成了两股主要的相互对立的思想潮流，这些思潮，还在湖北、广西、四川、江西等地的红卫兵、群众组织中广泛传播。

(3) 反抗“中央文革”的“联动”思潮

“联动”思潮，是一股公开反抗党内“文革派”、抵制文革运动的思潮。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学老红卫兵组成“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多是权力集团的子弟，与权力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成立宣言中把“中央文革”的做法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在一份通告中，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联动”瓦解后，部分人于1967年6月在京成立“首都红卫兵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宣言中说：“文化大革命完全违反了防修反修的初衷，正在演变成迫害共产党人、迫害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大清洗运动。”

以上三大思潮（“新思潮”、“四一四思潮”、“联动”思潮），作为民间的异端思想受到了严厉镇压。杨曦光因《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被判十年监禁。周泉缨因《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而被捕，后经毛泽东指示而被释放。山东“渤海战团”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联动”被《人民日报》宣布为“反动组织”，骨干成员一度被关押，并作为“政治污点”记入个人档案，控制使用。相对而言，“联动”受到的政治打击较轻。

三、绝对权威主义对红卫兵文学的影响

1966—1967年，代表绝对权威政治的“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革”官方的权力代表机构，完全控制了宣传机构（报刊、出版社、电台），夺取了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中央文革”十分重视在政治运动中兴起的红卫兵文艺，一直控制和影响这支文艺队伍，利用它为“文革”政治服务。

1. “中央文革”指挥下的红卫兵文艺批判

“中央文革”为了实现江青《纪要》制定的，颠覆权力文艺的政治目标，采取“打鬼借助钟馗”的策略，借用红卫兵的力量来冲垮建立了17年的权力意识形态。

红卫兵的文艺批判运动，经过了1966年夏至1966年冬、1966年冬至1968年秋，前后两个阶段。在1966年主要以保守派红卫兵为大批判的主力，文艺批判还停留在政治宣判、焚毁黄色小说的层面上；到了1967年造反派红卫兵开始全面崛起，文艺大批判开始发展到有组织的揭批“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的组织路线和艺术作品。

造反派红卫兵对这场大批判的积极态度，是出于对“文革”前17年官僚主义的反抗，他们把“文革”运动视为实现“巴黎公社”大民主的重要手段。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打击目标上的一致性，是大批判运动得到广泛展开的基础。

(1) 保守派红卫兵的文艺大批判(1966年夏至1966年冬)

1966年8月，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兴起，红卫兵开始直接冲击黑帮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三名三高”)，各地开始抄家、批斗、关“牛棚”，对反动毒草(古今中外，人类一切文化艺术)进行了焚毁和查禁，甚至长辫子、瘦裤腿都成为革命的对象。“红色风暴”波及到每个市民家庭。

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全社会掀起了词汇革命，年轻的红卫兵成为这场词汇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在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上涂写“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大标语。北京“长安街”被改名“东方红大路”，“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等等。许多人进行“姓名革命”，改名为“卫东”、“向阳”等，“仁”、“孝”、“富”、“贵”、“禄”等字眼全被改造。充满理想主义的红卫兵，试图以“命名”方式来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

在这个夏天，只要对某个作家、某部作品加上“革命”的修饰词，作家和

作品就立刻变成了“革命事物”;反之,只要加以“资产阶级”、“封资修”、“打倒”,或是在名字上画上红“××”,或施以姓名“倒写法”,此人立即变为牛鬼蛇神。剃阴阳头、挂牌子、倒墨汁也都属于“命名”,使其成为“不可接触者”,社会的公敌,这种命名直接地导致了暴力行为。“红八月”中红卫兵对作家广泛的暴力行为,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命名”。[14]

“命名狂潮”最终导致不同派别和组织的“命名战”,相互打叉,相互宣判,口诛笔伐,社会文化秩序发生全面混乱。在1966年春季,大批判目标还局限于文艺界少数反动权威和文化部门领导人,到了这年的夏季,斗争目标急剧扩大到文化部门的各级党组织。

(2)造反派红卫兵的文艺大批判(1966年冬至1968年秋)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到了1966年冬天,与权力集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保守派红卫兵受到打击。革命造反派(以非红五类出身的知识分子为骨干)开始崛起。造反派遵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开展对刘少奇“文艺黑线”的大批判运动。如果说1966年“红八月”,只是简单的宣判、焚毁和查禁,1967—1968年的批判运动,则是有组织、成系统的全面批判和消毒。

造反派的小报纷纷登出各类选题和综述性批判长文,对各种作品“上纲上线”,成批地宣判死刑。《天津新文艺》(1968年第4期第36号)发表“天津影剧公司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文章,一次宣布140部影片的死刑。《风雷》(工代会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造反团主办)在1967年第8期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锄毒草战斗组的文章《毒草示众》。[15]《文艺战鼓》在1967年12月用12个版面,对17年文艺毒草进行点名批判,被点名的“毒草”小说多达几十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造反派、红代会新师院鲁迅兵团在《周扬集团在外国文学方面推行名洋古黑线罪恶史》一文,揭露在不同历史时期,周扬等人把所谓“世界名著”树为“全民文艺”的样板,勾勒出一条17年以来,旧文化部译介外国文学的黑线。点名的毒草包括:1950年出版的“描写妓女生涯的《娜娜》,鼓吹个人奋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马丁·伊登》,宣扬爱情至上的《傲慢与偏见》、《简爱》等等”。以及1958—1965年《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24种,“写超阶级爱情的《沙恭达罗》,美化地主、美化

农奴制度的《猎人笔记》,诲淫诲盗的《吉尔·布拉斯》,宣扬剥削有理、为资产阶级唱挽歌的《布登洛克一家》,描写贵族荒淫生活的《博马舍戏剧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爱情的《包利法夫人》,歌颂殖民主义的《鲁滨逊漂流记》,宣扬人性论的《名利场》等等"。甚至1964年中宣部和文化部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以"配合莎氏诞辰400周年纪念",也成为一条罪状。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将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中外文学名著都作为毒草,进行了铲除。[16]

这一运动批判的作家、作品之广(从公元前至20世纪,从莎士比亚到肖洛霍夫以及建国17年几乎全部作家和作品),打击之严酷,毁、禁之广泛,都是史无先例的。通过这场文艺大批判运动,中国传统艺术和一切西方文明,都被彻底扫荡。大批判导致文化虚无主义,文革意识形态和绝对权威艺术成为惟一的文化基础。

中学红卫兵积极参与了这场对权力文艺的大批判,并深受批判运动的影响,由此奠定了自己的文化知识体系。这场批判运动,彻底地割断了新生代与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的弃儿和无家者,成为知识欠缺、思维单一、思想偏执的群体。他们将在未来岁月中,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2. "中央文革"对红卫兵文艺的控制、使用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功地计划和指挥了各派红卫兵组织进行庆祝毛泽东《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艺活动。北京在5月21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会演,北京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解放军宣传队奔赴天安门广场、闹市街口、大街小巷进行演出。连续演出十天,其后又到工厂、农村、部队演出。[17]北京100多个单位在体育馆联合举办庆祝活动,工农兵文艺公社演出交响乐《沙家浜》。同对,各报报道上海、太原、贵阳军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纷纷上街庆祝毛泽东《讲话》发表25周年。

对引起强烈反响的红卫兵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们有选择地对一些剧组进行收编,有利于"文革"运动的节目,也有选择地进行宣传介绍。

1967年7月1日,北京中学"四三派"演出的大型歌舞《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公演后,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剧组成员,并提出修改意见。"中央文革"还派解放军进驻剧组,剧组从此隶属首都中学红代会。这出歌舞剧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进行转播。

剧中《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一曲,被中央广播电台多次转播。歌中唱道:"山连山,水连水,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风再大,浪再险,我们和'中央文革'肩并肩。""用鲜血生命保卫'中央文革'","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18]

"中央文革"代表的文革官方,引导红卫兵文艺,逐步走上组织化和管理化的轨道;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红卫兵也自发地学习和执行绝对权威艺术理论。

1967年2月5日,《文汇报》全文刊登了上海文艺界造反组织(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上海华联扬剧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青年话剧团硬骨头战斗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直属文艺指挥部、上海京剧院毛主席路线红卫兵、上海青年京剧团32111革命造反队并冈山兵团、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司)驻沪联络站、新北大"革委会"驻沪联络站)联合署名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通篇使用了权威主义的语言,已同"文革"官方的文章毫无区别,清楚地表明了红卫兵文艺活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组织化倾向。它为红卫兵文艺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文艺思想体系。这其中包含着一个重大的政治、文化阴谋,很可能"中央文革"直接插手了公开信的草拟和修改。

> 文艺工作者长期所属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只有当他们与工农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永葆革命青春,才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将反其道而行之。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将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才能真正成为工农兵的文艺。所以,我们应该听毛主席的话,赶快打点行装,背上背包,到沸腾的工农生活中去,滚一身泥巴,和工农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把文艺大权重新掌握在工农兵手中!
>
> 我们向全国各艺术院校、文艺院团、文艺单位的革命造反派

提议:(一)以毛主席《讲话》为座右铭,做好长期到工农兵中去的准备。(二)分批深入农村、工厂,与工人农民造反派联合,夺走资派的权。(三)虚心向工农造反派学习,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敢于刺刀见红,彻底改造世界观,做一个亦工亦农亦兵亦艺的普通劳动者。(四)与工农兵一起批判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五)文艺界的造反派应热情歌颂和反映工人农民的革命造反精神,以文艺为武器,为当前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服务,为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服务。(六)运动中的群众文艺已大大超过了专业艺术水平,因此文艺界造反派应向群众文艺学习,同工农兵一起组成真正无产阶级化的革命造反的文艺大军。

——《与工农兵相结合,彻底砸烂旧文艺界
告全国文艺界革命同志书》

1967年夏秋季,造反派与"中央文革"正处于政治蜜月期,造反派的文艺团体不仅积极配合"中央文革"批判刘邓路线,而且在日常文艺活动中,也自觉地遵循"中央文革"宣扬的"要演革命戏,先做革命人"的文艺理论,把艺术活动看成是思想改造的过程,通过排练、演出,推进演员自身的思想革命化。各文艺演出队普遍形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排练的"革命风气"。

1967年国庆前夕,戏曲学校红卫兵为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报喜",赶排《草原英雄小姐妹》。他们用"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指导英雄形象的塑造。扮演小姐妹的演员,本是对立的两派,但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她们在排演场上相互配合得很好。他们说:"只要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为英雄人物树碑立传,就是拼老命也要干!"[19]

北京中学"四三派"《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歌舞剧剧组、"老兵派"《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话剧剧组,每天排演之前要集体诵读《毛主席语录》,演出结束后要对照毛选,进行个人思想总结。他们把排演场当做大学毛主席著作的课堂,把创作的过程,当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过程。这种"革命风气"使排练场成为了毛泽东思想讲习所,所有的演员都处于一种宗教式的虔诚、亢奋状态,心灵和品行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升华。

红卫兵文艺受到"文革"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红卫兵文艺创作者的

身心和人格都受到了深刻塑造 红卫兵文学的发育成长,无法脱离那个时代的历史土壤。文革的历史环境决定了,新生代要挣脱权威主义的影响,形成自身独立的话语,必将经过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

四、红卫兵的文艺宣传

1. 红卫兵文艺的兴起

1967年夏季,红卫兵运动达到了空前规模。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在运动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一呼百应,可以在一夜之间打倒某一个党政领导人。在拥护和服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前提下,红卫兵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成立团体、办报、集会、游行的自由。一些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了联络站,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造反组织的势力达到了南方各省和中西部,开始出现了一些跨省市的红卫兵小报和组织。每当各省运动有重要事件发生,不通过官方媒介,在24小时内,通过红卫兵自身的系统就可以在全国传播。红卫兵在全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1967年7、8、9三个月,出现"全面内战",造成一些地区报纸停刊,各地红卫兵小报实际上取代了当地的官方报纸。红卫兵小报的广泛发行,推动了红卫兵诗歌、杂文和小说创作的发展。[20]

此时前17年的权力文艺已经崩溃,权威艺术又未能全面占领文艺舞台,红卫兵文艺借机兴起。1967年夏季,出现红卫兵文艺演出的热潮,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一股"大歌舞"热,并且产生了一批大型话剧。1967年秋季,"中央文革"想要结束红卫兵运动,提出"复课闹革命",派出解放军进入中学对红卫兵实行军训,红卫兵文艺随之落入低潮。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面对强大的保守势力,毛泽东显然不急于将红卫兵运动结束,他继续支持造反派红卫兵冲击党内和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红卫兵组织得以继续生存,红卫兵文艺也得以继续发展。1968年8月,夺权阶段基本结束,毛泽东

派工、军宣队开入大中学校，整个红卫兵文艺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落潮而进入尾声。红卫兵文艺历时一年，经过了兴盛——徘徊——衰落的发展过程。

中学红卫兵派系在本质上是不同阶层组成的不同利益集团，以争夺对群众运动的控制权和群众运动的"代言"权为目的。中学老红卫兵在失去了政治势力后，试图在文艺领域争取发言权。这样，中学红卫兵派系的斗争由政治主体的争夺，开始深入到文化主体的争夺，这场斗争推动了红卫兵文艺的发展。前、中、后三期，都以占统治地位的派系（老兵、四三派、四四派）为主流，发生了三次主流和支流的互换。

红卫兵文艺被发展成为派性攻击的工具，这是它成为过眼烟云的重要原因。"阶级斗争"是对人和人性的一种界定，它将人的关系确立为一种等级的秩序和等级的冲突。红卫兵的派性文学直接源于"阶级斗争文学"，它实际上传达的是封建法权下的阶层政治，反映的是等级冲突。

2. 红卫兵文艺宣传节目

红卫兵文艺一开始就受到"文革"前夕"工农兵文艺业余演出队"演出形式的影响。它们都是一些在田边、村头、训练场上演出的小型节目。红卫兵模仿此种形式，在街头、广场、学校进行宣传演出。流行一时的《造反有理》舞蹈，就是照搬解放军某部战士业余演出队小歌舞《拼刺刀》的动作造型：弓步屈身向前，举枪（或举旗）和挥拳向前跺步等。它们成为红卫兵街头文艺演出最基本的表演姿势。

红卫兵文艺宣传演出节目，除了歌舞《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造反有理》等之外，还有锣鼓词、对口词、快板书、三句半等样式。

锣鼓词经常充斥着"打倒！""打倒！"这是当时的普遍风格，一种革命的时尚。

> 彻底砸烂文化部/坚决捣毁阎王殿/打到阎王陆定一/打倒阎王周扬林默涵/斗倒斗臭齐燕铭/砸烂田汉与夏衍/肖望东，大坏

蛋/两面三刀更阴险……谁敢挡/谁敢拦/扒他的皮/抽他的筋/让他小子也玩儿完。

——锣鼓词:《打倒刘、邓阎王殿》
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21]

对口词便于进行政治宣传,是当时经常采用的节目形式。为了及时介绍路线方针,对口词经常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分行朗诵,并加以说明阐述。表演常配以简单、夸张的动作和组合造型,渲染、强调社论的政治内容。

甲: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乙:"在工人阶级内部,
甲: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
甲: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
乙: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乙:如霞光万道把全中国照遍。
甲:这是真理的光芒,
乙:这是战斗的召唤。
甲:披着霞光,
乙:奋勇向前。
甲:只有大联合,
乙:文化大革命才能更深入开展。
甲:只有大联合,
乙:才能推动革命的大批判。
甲:只有大联合,
乙:才能抓好革命促好生产。
甲:只有大联合,
乙:才能真正掌握无产阶级政权。

——《誓死捍卫革命大联合》 北京卫戍区某部[22]

某些小节目充满了表忠与仇恨的宣泄。具有“广场”性和“革命”色彩。以下的多口词，充满了战斗气氛。宣传员从杀声中出场又在杀声中下场：

众：杀！（从喊声中冲出）杀！
甲：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合：杀！
乙：向反动学术权威，
合：杀！
丙：向一切牛鬼蛇神，
合：杀！
丁：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混蛋，
合：杀！
丁：我们无限热爱毛主席；
乙：我们无限崇拜毛主席；
丙：我们无限信仰毛主席；
丁：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
合：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
甲：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乙：一小撮混账王八蛋们，
丙：你们反对毛主席，
甲：罢他的官，
合：造他的反，
乙丁：把他打翻在地，
丙甲：再踏上一只脚，
合：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合：我们准备好了，
甲：刺刀，
乙：爆破筒，
丙：冲锋枪，
丁：手榴弹，

甲:把旧中宣部,
乙:把旧文化部,
丙:把旧北京市委,
合:彻底砸烂!砸烂!砸烂!
甲、乙、丙、丁:向着——(略)
合:杀杀杀杀……(略)(在喊杀声中冲下场)

——《杀!》(单位不详)[23]

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发展壮大,红卫兵文艺由街头小演出、小班子,逐步发展成为庞大的专业化演出队伍,由1966年的小歌小舞发展成为1967年夏季的大歌舞。

五、红卫兵戏剧

1. 1967年夏季的红卫兵歌舞剧、话剧演出

1967年夏季是红卫兵文艺最繁荣的时期,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型歌舞剧和话剧演出的热潮。

在北京上演的大歌舞有:中国戏曲学校东方红的舞剧《红灯照》,清华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之路》,历述清华井冈山的光辉战斗历程。林院、农机、北邮、中央歌舞剧院等组织联合演出的歌舞剧《毛主席的红卫兵》,表现首都三司诞生、造反、成长、壮大的光辉历史。以及首都三十多所大专院校参加的大型歌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一系列剧目。

在上海也出现了大歌舞热潮。上海歌舞剧院的造反派编排了歌舞剧《一月风暴》,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创作了大歌舞《红卫兵万岁!》,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造反派联合演出了大型历史歌舞剧《红灯照》,上海杂技团联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编创了融杂技、歌舞为一体的《文化大革命万岁》。[24]

在成都，“红卫兵成都部队”演出了大歌舞《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表现大西南地区红卫兵造反的历史，历述了“反工作组”、“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战斗历程。在重庆，“八一五”派演出了反映山城文革运动、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歌舞《山城风暴》。[25]

在太原，保守派红色造反联络站为了纪念“九五”烈士，组织所属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联合编创了大歌舞《晋阳红旗颂》。[26]

同一时期的大型话剧演出有：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造反派演出的《海港风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造反派演出的《新时代的狂人》，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造反派演出的《张思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造反派演出的《五月春雷》，中央戏剧学院红卫兵创作演出的《五洲风雷》、《敢把皇帝拉下马》、《千岛星火》、《海港风雷》、《海港风暴》等。[27]

受到文艺界造反派和大学红卫兵演出的影响，北京中学红卫兵也纷纷投身文艺的创作、演出。

“老兵”派的《湘江评论》发表署名“战地文工团”的文章《红卫兵战友们，走！杀出一个“红五月”》满怀激情地号召：“红卫兵战友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旗帜走上街头吧！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工农兵中去！”“我们是新时代文艺的主人！同志们！唱起红卫兵的歌吧！跳起红卫兵的舞吧！奏起红卫兵的进行曲吧！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为工农兵文艺服务的红五月到来啦！让我们奋力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28]

“四三派”为纪念北大“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联合演出了歌舞史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四四派”演出了大歌舞《红卫兵战歌》。[29]

北京中学红卫兵还编创了一批大型话剧，有“四三派”的《在列宁的故乡》，“四四派”的《阿芙乐尔重开炮》和“老兵”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历史的一页》。[30]

这些剧目与文革前的三大创作主题（反修戏剧、阶级斗争文学、共产主义道德文学），在语汇上、创作手法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有大量的抄袭和模仿。看似离奇的每一出红卫兵戏剧，在思想主题和艺术手法上，都可以追溯到“文革”前夕“后工农兵文艺”的源头。

2. 中学红卫兵的话剧

(1)《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3.]

江青在“四三”讲话中宣布老红卫兵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北京外语学校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决心行动起来,与“中央文革”进行抗争,组织一场纪念“五二九”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的文艺演出。

全剧共分8场,描述1966年某校高三二班几名学生举行罢考,在校外荒郊圆明园创建红卫兵,并与工作组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揭露了工作组长在历史上的叛徒罪行,最后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剧本集中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航附中等几个红卫兵组织的真实经历,进行艺术加工而成。

全剧在台上自始至终放着一幅油画《红旗永不倒》。一个红军战士遍体鳞伤,但仍然高举红旗。那面红旗不是迎风招展,而是被狂风吹卷起来。这幅画就是整出戏的主旨:老红卫兵战旗永不倒,要发扬“五二九”精神,誓与“中央文革”抗争到底。《希望》一剧集中表现了老红卫兵试图重新崛起的意志。

1964年的阶级斗争文学和反修戏剧,对《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剧中烈士子弟红卫兵彭路生在校党支部副书记洪松的帮助下,揪出了当年出卖他母亲的叛徒——工作组组长刘加君。同样的叙述在文革前的电影《年轻的一代》和《革命自有后来人》中已有长足的表现。

《希望》按照“阶级斗争文学”以阶级阵营划线的方法来构置人物关系和塑造人物形象,赋予不同社会角色人物以不同的政治脸谱。《希望》中的所有人物都是符号,形成了简单化的社会学符号的集合。刘加君、邓修文是刘邓路线的代表;彭路生、李三辈、丁飒英分别代表干部子弟、工人子弟和贫下中农子弟,组成红卫兵的群体;何戚等代表中间派学生;洪松代表革命前辈——当权者;学校工友张大伯代表工人阶级。这些符号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形成的社会图式,仍然没有超出“阶级斗争文学”的框架。

《希望》将"路线斗争"描述为对混入党内的国民党特务、地主富农和叛徒的斗争，用"阶级斗争"来图解"路线斗争"。这与"四三派"理解的"路线斗争"就是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根本不同的，与毛泽东旨在全面夺权的"文革"运动也是冲突的。

该剧受到了三军文艺演出中表忠剧的影响。《希望》一剧大量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这与海政文工团在1965年演出的反映八六海战的表忠剧《夜海战歌》十分相似。《夜海战歌》为了表忠，在每场戏的结尾，一律用朗诵毛主席诗词并伴以舞台造型进行收尾。在《希望》中，也加以模仿，如六场结尾，众红卫兵齐声朗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摆出集体造型，在一束红光投射下落幕。

(2)《在列宁的故乡》[32]

在1964—1965年前后，我国的外交政策是抗美援越，反帝反修，支持美国黑人的斗争，团结亚非拉美，孤立和包围美苏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戏剧舞台上出现了《安第斯山风暴》、《南方来信》等一批反帝斗争的戏剧。在文革中，红卫兵受到"世界革命"理论的影响，逐渐发展形成一种输出革命的思想。在艺术上，红卫兵戏剧借鉴了《赤道战鼓》、《南方来信》等反帝戏剧，创作出一批具有表忠特点的"输出革命"戏剧。"表忠"和"输出革命"两大主题，在这些剧目中相互融合，互为表里。

《在列宁的故乡》讲述：在1966年"一二五红场事件"中，莫斯科印刷厂的老工人茹柯夫从中国留学生那里得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地下党决定秘密印刷毛泽东语录，并粉碎苏修当局准备召开反华大会的阴谋计划。这一任务交给了茹柯夫、安德烈等人的马列主义党小组。这时，敌人为了召开反华大会，需要赶印反动文人修洛茨基的反华文章，这批活恰巧送到了茹柯夫和安德烈的车间。于是开始了一场印刷与反印刷的斗争。敌人发觉了茹柯夫等人在印某种"危险品"，在搜捕中茹柯夫暴露了，这个列宁的老水兵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毛泽东语录。马列党小组在安德烈带领下胜利完成了印刷毛泽东语录的任务，粉碎了反华大会的阴谋。全剧尾声是在莫斯科郊外，小组分发毛泽东语录，决心继续战斗。[33]

全剧具有浓烈的表忠剧特点，如剧中誓词："当代的列宁——毛泽东，

我们向您宣誓:我们是列宁的后代,我们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为了苏维埃的红色政权,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我们永远跟着您战斗,战斗在苏维埃的土地上,战斗在列宁的故乡!”

表忠心是红卫兵戏剧的泛主题,表忠心的抒情段和宣传毛泽思想的宣喻段,成为剧目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段落。宣喻段大多处于每个剧目的结尾和高潮处,这部分大段地印有黑体字(毛主席语录),打开剧本,往往一望便知。抒情段大多有歌舞表演,在《在列宁的故乡》中主人公秘密绣毛泽东像,并吟唱“忠于毛泽东就是忠于列宁”的歌曲。

《在列宁的故乡》于红场事件一周年之际,在北京各剧院上演,并到工矿、机关演出,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演出中剧组克服了物质上的种种困难。演出的景片和道具,是他们成立木工组,自己动手制作的。他们还拿着红代会介绍信到广播电台寻找外国音乐资料。在演出中,他们不断改进布景和灯光,并制定了灯光、音乐、效果的配置表。他们为了克服制景困难运用了各种巧思,在第一场作灯柱的景片,在后面几场将灯柱下部的台基加以遮蔽后,又作为廊柱使用。一次在北京某军工厂演出,这个厂的舞台没有二道幕,由于这出戏的印刷厂一场,需要用二道幕作墙壁,他们临时想出将侧幕拉出来使之悬垂在两扇木窗之间的办法,在演出中取得了特殊效果。

1967年夏季的话剧运动中,一批中学生投身于话剧演出。他们将一种青春和政治激情带入剧场,把个人才华自由地展示在舞台上。他们的热情感染了观众,弥补了艺术上的幼稚和不足,使话剧舞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这场学生演剧活动,有别于前17年剧院体制的演出,包含着全新的文化内涵,它表明一个新的文化群体和新文化形态正在产生。

六、红卫兵诗歌

在文革运动中，诗歌一直是红卫兵进行战斗的武器。红卫兵诗歌随着运动的发展，不断地发展变化。不同的运动阶段，不同的斗争内容，都影响到诗歌的内容和风格。在1966年春至1968年夏，红卫兵诗歌大致分为三大主题。大批判时期的诗歌主题集中于：革命造反。全面夺权时期的诗歌主题集中于："文攻武卫"。输出革命和红太阳颂，则是不同时期一直贯穿始终的诗歌主题。

1. 大批判时期的诗作：革命造反

在文革初期，当大批判运动兴起之时，"革命造反"和"革命大批判"成为红卫兵诗歌的主要内容，它们是红卫兵诗歌中最具有文革特色的作品。在1966—1967年间，在全国各地出现无数的红卫兵歌谣，它们大量出现在街头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里以及各种文革小报的夹缝中。[34]

刘××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

——湖北

铁窗难锁革命心，/造反更觉毛主席亲，/只要中国不变色，/老子死了也甘心。

——江苏

关不尽，抓不绝，/老子死了儿子接！/胸怀一轮红太阳，/哪怕断头洒鲜血！

——四川

这些歌谣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情趣，儒雅温和是丑，横蛮粗野为美。一些诗作童稚未脱，却霸气十足。这种崇尚粗俗的审美趣味，直接源于1964年以后的后工农兵文艺运动，甚至可以溯源于1958年大跃进的民歌创作。

在“文革”大批判中运用诗歌为批判武器，是红卫兵经常采用的方法。他们运用诗歌进攻走资派，或是讽刺嘲笑，或是上纲上线，喜怒笑骂皆成诗篇。这种批判诗歌和讽刺手法，算不上独创。因为在1958年反右斗争中，曾出现过大批反右诗歌。对比冷酷无情的反右诗歌，红卫兵诗歌显得情感奔放、勇猛、豪迈。这是因为文革运动中有着以往政治运动所没有的自由，诗人有可能张扬自己的个性，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

在大批判中，传统诗词也被广泛使用。它们大多是不遵循格律的“解放体”。下面是红卫兵小报《长征》发表的反走资派吴传启的一首散曲。

《吴传启三哭》(哭关锋，哭陶铸，哭自身)[节选]

(哭陶铸)带[猪奴儿孝顺歌]：您是俺养爹娘，救命恩没齿难忘。想当初狐狸显影无处藏，全仗您黑伞庇护帮大忙。求得您四支鸡毛赛令箭，不由我两只狗眼热泪盈眶。您那里飞眼吊膀招降纳叛，俺这里溜须拍马凤求凰。您本是蒋门学生接过刘氏衣钵重整朝纲，俺则是蒋家鹰犬权充陶府恶奴为虎作伥。实指望一帆风顺当当响，又谁知半天霹雳净净光。天呵天，不提防您老摹地倒了台，冰山坍塌我怎再依傍？咬牙暗思量，机锋眉间藏，我这里，打迭好精神，铁硬了心肠，有意拉出反陶大旗虚摇晃，抢他个批陶头阵放空枪。真是个威风八面声势劣转强，顿时间身价百倍姓名臭变香。疼人的老铸您心里明亮：俺的两面手法是您旧日伎俩。休怒俺墙倒众人推，这本是遮人耳目装模作样。可知俺万种柔情心坎里藏，背人处暗掬泪偷抛向您这短命的新阎王！

(哭自身)带[吴小四乌夜啼]：俺本是半仙之体胎里坏，渺小人物羊皮豺。搞投机，做买卖，政客生涯几十载。却怎生赔光了

裤子，输空了口袋，这番赌注全押歪！不由俺英才嗟运蹇，珠泪洒猴腮！若说没能耐，俺也曾鬼混过"坚定左派"帽儿戴；若说有本领，俺如何暴露出美蒋特务狗招牌！真个是三十年老娘倒绷孩！想当日，俺下面豢养一群心腹，上面连着两个后台……泪珠儿望着关王庙歪倒台，嘶声儿喊着穆天王不回来，伤心儿想着林家店连根拆。霎时间俺蒙头转向葱倒栽，恍悠悠魂灵儿飞出天灵盖，休也波休，此番逃不脱呜呼哀哉！[35]

（注："关王庙"指关锋、王力，"林家店"指林杰，"穆天王"指穆欣。）

2. 夺权风暴时期的诗作："文攻武卫"

1967年1月间，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上海工人造反派刮起了"一月风暴"，在其后的二十个月中，围绕着打倒刘少奇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全国掀起了夺权斗争，权威政治有计划地全面颠覆各级权力组织，对社会造成了从下至上的破坏。

上海"一月风暴"和林彪"揪军内一小撮"两股风卷入湖北，武汉保守派"百万雄师"和"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发生了激烈冲突。随后爆发围攻"中央文革"代表驻地的"七二○事件"。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表"公开信"，正式宣布支持造反派打倒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等人被诬为"黑后台"。整个事件前后，被打伤打残的干部、军人和群众达184000余人。

在"七二○事件"发生的两天后，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江青直接控制的宣传喉舌《文汇报》，7月23日在报纸上公开登出这一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在7—9月间进入全面内战。[36]

在这样激烈、残酷的斗争中，红卫兵的诗歌开始渗透硝烟和血腥味。

《放开我，妈妈！》　武汉新华农东方红 吴克强[37]

面对着"百匪"的大规模屠杀，妈妈怕我到学校被"百匪"杀

害,紧紧拉住我。我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是我们的战友,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墙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做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诗中说“英雄的爸爸”在“二十年前,/他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又高举‘革命造反’的大旗,/在殷红的血泊中冲杀……/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年轻的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诗人说:“想一想吧,妈妈!/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儿誓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反映武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诗歌,还有《我在武汉大街上行走》(武汉小战)、《红旗大楼颂》(武汉李长生)、《在那天快亮的时候》(武汉朝晖)等。在武汉地区由于保守派被清除,其作品也就很难保存下来,所以现在仅能搜集到造反派的诗歌作品。

1967年8月31日,徐州“踢派”和“支派八三一”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据“八三一”的小报说,“踢派”调动了济南、薛城、枣庄和安徽淮南、肖县以及徐州附近的丰县、沛县、邳县、铜山等地的农民、工人50000人进城,动用飞机3架,坦克5辆,卡车450辆,步枪14000支,长矛50000支。打死“八三一”271人,重伤2500人,轻伤15000人,关人集中营50000人。城中白色恐怖,农村十室九空,流离失所70000人。小报的数字显然有所夸大,但可以想见当时双方武斗的巨大规模。下面是反映徐州地区武斗的一首诗:

《血债要用血来还》　淮海“八三一”
铁路《工程战报》[38]

八月徐州魔鬼跳,硝烟四起弥四霄。

郭氏子谭开杀戒，血染淮海八三一。
四省八县调人马，地富反坏齐出笼。
战士无辜遭屠杀，飞机坦克也动用。
大街小巷血泪河，工农学于死伤情。
城郊野外哭声惨，拖儿带女去逃难。
九里山吼黄河泣，血凝大地黑云浓。
鬼怪登台逞凶狂，敌人鼓掌叫驴欢。
郭氏子谭狰狞笑，战士心肝如刀绞。
匪首大设集中营，毒刑何亚渣滓洞？
更深夜静乱捉人，鬼哭狼嚎囚车鸣。
红色徐州遭荼毒，腥风血雨岂可忍。
踢派就是五一六，王、关黑手伸徐州。
血海深仇定要报，血债要用血来还。

在大规模武装冲突中，红卫兵之间结成了诚挚的战斗友谊，他们用诗歌讴歌了这种战斗情谊和革命理想。[39]

请松松手，松一松手啊！
亲爱的战友！
交给我吧，
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
插进了你的咽喉！
……白色花圈和挽联，
已经摆满你躺下的街头。
……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
她咬着不屈的嘴唇，
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让我们给你盖上一面火红的战旗！
……

——《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
中英勇牺牲的战友》　武汉　吕凉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这类内容的诗歌作品。北航红旗战士刘天章,1967年7月31日在支持河南开封二七公社、"八二四"的武斗中死去,他被北航红旗授予"红旗英雄"称号。北航红旗主办的《红旗》报发表了一批纪念、歌颂刘天章的诗歌,如《悼天章烈士》(湖南湘江风雷教工战团一战士)和长诗《红旗英雄颂》(红旗战士张烈)。

3."红太阳颂"和"输出革命"

毛泽东崇拜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历史意味的文学主题。红卫兵的颂诗,不同于报刊上发表的粗俗、直白的工农兵颂诗,没有呆板、僵化的官样格式。在1966—1967年初,红卫兵书写的"红太阳颂",显得更活泼、奔放、热烈。[40]

真的,就像从崙畔上到崙畔下,
我们离毛主席他老人家就这么近!
从广播里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中,
妈妈,你们可听出哪个是你儿子的声音?
——《在北京》　陕西　高粱

把滔滔的长江做弦,
以巍巍的昆仑当琴,
我弹拨世界上最动听的音符.
从韶山唱到天安门。
——《从韶山唱到天安门》　浙江　雨石

在红卫兵中间广泛流传着毛泽东的一段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

定要为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了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在红卫兵成立之初，“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就成为他们的历史使命。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世界革命”的伟大抱负和理想，终于演化成为“输出革命”的具体实践。1966年底，中国留学生组成红卫兵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前宣传毛泽东思想；广东红卫兵鼓动香港工人罢工；北京红卫兵阻拦国际列车，上车宣传毛泽东思想；北京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以至于偷越国境抗美援越等等。

在红卫兵运动上升时期，宣传世界革命成为歌颂毛泽东的一种表述方式。它的情感色彩是明朗、豪迈的。[4]

> 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已穿透了太平洋上空的乌云，
> 北美大地升起了金色的晨曦。
> 让新的阿芙乐尔在火红的五月开炮，
> 对准白宫轰击、轰击、轰击！
> 今天你们把腐朽的美国砸成一片废墟，
> 明天你们将在新生的美国实现共产主义！
>
> ——《五月之歌——献给美国兄弟》 东北鸿耶

4. 红卫兵诗歌的多元化格局

(1)《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造反派红卫兵诗歌总集

1968年12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红卫兵诗歌总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内收“文革”以来1966至1968年三年间全国范围内产生出的红卫兵诗作98首。这是以造反派红卫兵的原则编选的一本诗集，它排斥了其他派别红卫兵(如老红卫兵派系)的诗作。例如诗集选入相当数量的武汉造反派的诗作，但对立面保守派“百万雄师”的诗作一首也未选入。“百万雄师”作为多数派，应该有一定数量的诗作。

诗集的编辑时间在1968年7月至1968年底,历时五个月。正是工宣队奉毛泽东指示进驻全国大、中、小学的时期。诗集的"后记"中也特别指出,编选中得到清华、北大和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首都大专院校工、军宣队的"帮助"。

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和1968年底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背景,使诗集只能规范于权威政治的框架之内,并具有奉迎的色彩。尽管如此,它毕竟是一本以红卫兵为主体的诗歌专集,其中存留下一些有个性的作品,基本反映了红卫兵诗歌的"原始"风貌。

在"九大"之后,随着"斗、批、改"的全面展开,此前的文革历史开始被重新改写和有意回避。这本诗集在文革后期被"忽略",其中一些曾广为流传的红卫兵诗作被忌讳提起。这本诗选的命运,代表了整个红卫兵文艺在1970年后被全面封禁的命运。

(2) 老红卫兵诗作

由于老红卫兵提前退出"文革"政治舞台,老红卫兵的诗歌被保留下来的数目比造反派的诗歌要少得多。早期(1966年间)的老红卫兵诗歌,由于受到工农兵文艺的直接影响,诗歌表现出一种粗鄙化的倾向。粗鄙在当时,是一种新文化时尚,是对一种风尚的追求。在这些诗中,他们总爱提起代表"血统"的服饰:"鲜红的臂章/草绿的军装/父兄的武装带/和高高挺起的满怀热血的胸膛。"那种革命激进的狂热也显得孩子气和戏剧化的夸张:"凭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红卫兵就是要登上历史舞台/冲!/向刘、邓的老巢进军!/杀!/向莫斯科、华盛顿进军!/杀他个人仰马翻而已,/打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这类的诗,又很像分行的大字报:"什么变色龙,/小爬虫,/红卫兵杀过去,/把这些寄生虫从历史舞台上统统踢下去!/革命要进行到底!/历史决不能后退!"[42]

我们生在战场上
就不怕死在热血中,
只有当我们的鲜血
洒在战旗上,

才看得到我们的忠诚!
只有当炸弹炸开我们的胸膛,
才看得出我们的心
像火一样红!

——《为了毛泽东,我们何惧牺牲》 佚名

到了1967年老红卫兵政治没落后,在这个群体中出现了一些代表诗人和诗作,如郭路生、孙恒志和王靖。

王靖的经历在老红卫兵中比较典型,他在1966年5月和樊小吾等四人贴出大字报:《反对旧的教育制度》,与工作组作斗争。1966年8月,参加南下兵团"16纵"到上海串联,并在上海文化广场发表讲演。1967年秋,王靖组织"红红红"理论班子写出《致中央文革的公开信》、《二致中央文革》,执笔人李园园被抓入公安部后,王靖和清华附中反"中央文革"的匡涛生一同到昆明避难。王靖后来作为"69名少年狂热分子"被关押于北京半步桥监狱。[43]

《满江红·寄国际红卫兵》 王 靖 1970

四海云水,共一肩,金瓯大业。挥手处,慷慨离歌,怒云千叠。东方红日属宇宙,国际歌声本无界。誓莱茵洗马,风萧萧,旗如血。

剑与火,向长夜。饥寒迫,心如铁。纵弹火横空,疆场谁怯?绿衣少年驾长车,白宫红场捣贼穴。到美洲,快寄凯歌来,宽离别。

在旧体诗创作方面,老红卫兵还有一些诗作在当时流传。它们散见于老红卫兵的报刊和手抄本中。

(3)红卫兵派系间的诗歌作战

利用诗歌进行派性斗争,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般性文艺生活场景。

老红卫兵与"四三派"的激烈冲突,发展成为双方的笔战,以至诗歌作战。

《某公三哭》 北京26中红尖兵[44]

[序]:我校老兵头头,"星火"歹徒冯××等9月7日被公安局逮捕。某公思潮澎湃,泪如泉水淌下来。
[秃厮儿带过哭相思]:我为你保驾××上台,溜须又吹拍。弄得我输光老本又欠债,才盼得一些影儿来,又谁知时乖蹇遭祸灾,痛煞我,心如绞,肉似剜,嘴气歪。
[哭途穷]:伤心事一想起情思不胜哀,眼刚揩,泪又来,再哭一曲真无奈!……414首长讲话后你我笑颜开,趁机大捞稻草真愉快,知名人士都来,化学教室栽排,瓦解尖兵岂不易?身上妙计千袋……谁料到风雷骤起残花速败,高堂宝座猛垮台,惨哉惨哉!无奈我扮周瑜打黄盖,耍两面派,过去事百般抵赖。
[哭皇天带过乌夜啼]:莫不是情深意厚你我间,为什么泪漫漫不停闲?莫非这珍珠串能将那心事传?

"四三派"小报《首都风雷》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为题转载,北京4中东方红公社"千钧棒"针对老红卫兵歌谣的反击,并作按语说:我们将"联动"分子的黑诗(▲)和4中东方红的回敬诗(★)一并发表。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锻炼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联动"的黑诗是一宗绝妙的反面材料,请各位千万不要放过它。[45]

▲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她。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
★ 病树一株立山尖,遍地梅花喜开颜。今朝今日东风起,花开树倒猢狲散。

▲ 浪迹京城忆西纠,故人生死各千秋。散伙已在数日后,二爷忍作三司囚。

★ 西纠之子忆西纠，为虎作伥死遗臭。三司奋勇扬千帆，联动“二爷”坠沉舟。

▲ 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我们就是愚公，誓把三司挖掉。

★ 青山越来越茂，三司革命不倒，群众才是愚公，定把“联动”根刨。

▲ 满天炮轰满天仇，三司本是垃物猴。留得西纠豪气在，三年归报三司仇。

★ 炮轰瘟神何人仇，三司举棒奋金猴，留得西纠“豪气”在，还当刘、邓小走狗？

▲ 想当年小将可爱造反有理，看如今血统高贵什么东西——一落千丈

★ 红卫兵小将可爱造反有理，一小撮血统高贵什么东西——要有分析

▲ 想当初招之即来甘当勤务员，看如今百般邀请就是不见——言行不一

★ 你革命招之即来甘当勤务员，你反动百般邀请就是不见——立场鲜明

▲ 满江红

大乱清华，红卫兵逆风耸立。起手处，刀光剑影，三论反笔。佛山压顶行者怒，金棒闲事何人急。从祥光，江流遍中华，才出气。　　造反骨，永相继，再提高，团结力。分清敌我，群策群力。紫电清霜斩妖魔，碧海丹心照脑际。广胸怀，无边太平洋，鬼神泣。

★ 满江红(一)

创始清华，红卫兵三论反笔，刘、邓压，统帅赞誉。人妖颠

倒,为虎谋反。反文革,充当打手。何人喜?群众奋起,造反有理,莫晦气。　　血统论,岂成立?保爹娘,有何益,应分清敌我,紧跟毛主席。破私立公为人民,雄文四卷印脑际。不听言,历史不留情,向隅泣。

★　　满江红(二)

红谱凯歌,起清华,天惊鬼泣。雄文照,口诛笔伐,造反有理。黑头司令动杀机,小兵有幸舵手遇。今天不识黑红为虎伥,真可气。　　造反骨,应相继,保爹娘,怎相宜?压顶真理,小鬼翘尾,死守对联天地转,沉舟侧畔千帆疾。广胸怀,扎根工农兵,"私"坟立。

七、红卫兵小说

随着红卫兵报刊的发展,红卫兵文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诗歌从红卫兵歌谣发展出了抒情长诗,一些短篇小说也开始出现。

1967年9月20日的《文学战报》(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主办)上登出这样一篇征稿启事:"特需要下列内容的稿件:歌颂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诗文;反映文化大革命中新英雄、新风貌、重大事件的报告文学、特写、小说、散文;红卫兵日记、随笔;配合运动的杂文、小品。"

可以说,红卫兵小说完全是在红卫兵小报提供的园地中发展起来的。红卫兵小说可分为短篇小说和章回小说。目前尚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卫兵小说集和中、长篇作品出版物发现。

1."章回小说"

这类所谓"章回小说",实际上是一种"罪行录"。基本上是将要打倒的

大走资派的"政治罪行"按时序排列,加以夸张漫画式地描述。这类小说受到《金陵春梦》的影响,内容类似清末民初的"政治黑幕"、"政治丑史"小说,以制造污秽、丑化"走资派"为乐事。这类小说的情节编排,始终贯穿"路线斗争"这个大纲。可以看出,小说作者有着很强的政治功利用心。它突出毛泽东红线和刘邓黑线的对立,将政治斗争转化为对"走资派"的人格贬低和道德丑化。将阶级本质的批判上升为伦理道德的揭露。通篇全是由作者随心所欲、捕风捉影而编造出来的诬陷材料堆积而成。这种"章回小说"已完全沦落为攻击政敌的工具。

《刘修外传》(连载) 清华井冈山[46]

第一回:花明楼刘门养孝子,安源矿刘贼营投机
第二回:入虎口叛徒现奴颜,居租界"老机"露媚骨
第三回:贪功图位自谱赞歌,投敌叛党永留丑史
第五回:宁乡县保地富过关,天津城纵老板叛国
第六回:拒批判周扬暗周旋,抗改造献珍忙献计

这篇小说的1—6回连载于1967年4—5月的《井冈山》报。小说中频繁和大段地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语录,并用相当篇幅阐述毛泽东路线斗争理论观点。小说还仿照旧体例,不时采用"有诗曰"。如第一回:"有诗为证:霜雪漫天梅花笑,苍蝇怕冻少奇寒。"

第一回:花明楼刘门养孝子,安源矿刘贼营投机

刘作黄也意识到自己必定会成个了不起的风云人物,乃世界上少有的奇才,越想越觉得"作黄"二字配不上他,于是高兴之余,毅然给自己改了个名字,曰"少奇",意即中国之"少"有,世界也"奇"缺也!后人有诗曰:十年寒窗苦读书,作黄修身下功夫;早吃小亏装贤圣,晚收大利不含糊。……再看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时代的豪言壮语:独立寒秋,湘江北去……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多么崇高的志气!

《王妖丑史演义》(长篇连载) 清道夫[47]

第一回:王家三代吸血鬼,辅仁一朵交际花

[楔子]:话说公元1967年初岁,中国的红卫兵小将奋起金棒,捣妖巢,一举揪出一个"庞然大物" 看官,你道是谁?……有诗为证:黑兵黑将黑司令,专掀黑浪刮黑风。小将提刀巡四海,喜看河山万里红。不提那刘妖打入冷宫,且说此时早急坏旁边一人,轰轰然作驴滚之状,呜呜然发猪鸣之声。看官,你道此是何人?原来乃正宫娘王××是也。余闻当年商朝妲己系九尾狐狸精,帮着纣王干尽坏事,这王娘娘乃是何物所变,尚待考证,然此妇专为刘皇帝出谋献策,拨弄口舌……然余查王氏历史,其言荒诞不经,其行卑劣下流,皆难登大雅之堂,易污正人之目,不宜用正体,以稗史小说之体演义其丑史,岂不妙哉?余抚掌大喜遂取破纸数张,秃笔一支为之立传,是为《王妖丑史演义》。看官欲知此中故事,听余慢慢道来。这真是:革命小将宝刀挥,斩断狐狸九条尾。一部《丑史》剥画皮,为君演说王××。

2. 短篇小说

个人迷信和"输出革命"是红卫兵文学的主要创作主题。

《巴黎公社的后代》(林震)讲述:两个留法中国红卫兵,在归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前一个晚上,去向法国清道夫加斯东·奥古斯特爷爷道别。在一个月前,他们到公社墙瞻仰,结识了这个法国老工人,并将毛泽东像章送给了他。老工人讲述了他的爷爷1871年在公社墙前就义的故事。老人"扑在墙上,泣不成声"。他们说:"爷爷,您放心,我们中国红卫兵一定会高举巴黎公社的战旗永远前进。"当他们再次来到公社墙前,发现老工人趴在墙上,他们看到"在这深黑色的古墙上,端端正正地刻着三行法文大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红卫兵——巴黎公社的后代——万岁!当代的马克思——毛泽东万岁!"老人将刽子手钉过他爷爷头颅的铁钉和当年巴黎公社红旗的一角,送给红卫兵,并对他们说:"它一代一代往下传,现在该留给你们了。做红卫兵光荣的袖章吧!你们是巴黎公社最优秀的后代,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48]

另一部分内容反映“文革”派性斗争。

《三走蛇山》(叶明山)讲述,“新华农”革命造反总部勤务员章玉根三次到蛇山找站错了队的同学李琳,做他的思想工作,和他共同回忆坐火车上北京去见毛主席的情景。李琳狠斗头脑中的私字,重新站队,向走资派杀回马枪。

> 章玉根迎着有些凉意的江风,大步流星往学校走。他心里兴奋极了,李琳答应明天一定到校参加大会,又一个红卫兵战士回到了毛主席身边,这多么好啊!
>
> 阶梯教室里,依旧灯光明亮。原来,林三和和他们战斗队的同志正帮助几个参加过“百万雄师”的受蒙蔽群众连夜赶写发言稿,控诉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咳!我怎么忘记交待了这件大事,反戈回来,更重要的是杀回马枪啊!应该让李琳准备一个扎扎实实的发言,狠揭狠斗阶级敌人!”
>
> 一颗完全、彻底为着阶级弟兄的红心,促使章玉根三走蛇山。
>
> 夜已经很深了。但武汉三镇数不尽的楼房窗口都还亮着辉煌的灯火。大江里的渡轮,也都是灯光闪闪。这不夜的武汉啊!每一个亮着灯的窗口,都是一个誓死保卫毛主席、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场。有多少人在连夜鏖战……[49]

还有一些文学作品,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策划出来的。

《准备》杂志在1967年夏创刊,编辑部人员是国防科委20基地的干部子弟和北京5中、101中、师院、北大附中红旗的部分老红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中学老兵组织的负责人和笔杆子。他们认为“中央文革”拉一派打一派,耍政治手段,决心用文艺作武器,找些古诗,写点小说来反“中央文革”,替“联动”翻案。当时他们分析,康生是支持“联动”的,于是制定一个策略:拉康生打陈伯达。于是策划创作了小说《序幕》。[50]

《序幕》标以“长篇小说选载”,仅发表了“第一章”。小说描写:在钓鱼台宽敞的大办公室,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他在等待毛泽东批

准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双疲倦带血丝的眼睛，苍白的两鬓。红色电话机的铃响了，他拿起电话：“我是康生！”……他放下电话，低声自语道：“终于打响了！”

这本进行政治斗争的杂志，为16开本，发表攻击“中央文革”的诗歌、小说和杂文，第一期印了1000册，由于无法收回成本，只出版了两期就停刊了。

注 释：

[1] 狭义的红卫兵，指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广义的红卫兵则泛指所有的群众组织。同样，狭义的红卫兵文学，特指大、中学校红卫兵的文学创作。广义上的红卫兵文学，泛指所有群众组织参加的文学创作活动。

[2] 1964年7月，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总结会上点了一批“毒草”作品的名字。8月，毛泽东在公开放映批判毒草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上批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12月，江青约中宣部领导周扬等人座谈，要中宣部在全国报刊上批判10部影片。(《人民日报》 1967.5.31)

[3] 上海市委在1966年搞革命故事会串，编辑、发行故事丛刊达500万册。上海郊区10个县已有17000多人的业余故事员队伍，3000个生产队、近100个乡镇有革命故事活动。(《新人新作选》 人民出版社 1965.10)

[4] 杨健：《革命样板戏的历史发展》 《戏剧》1996年4期。

[5] 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 人民出版社，1989.7 赵无眠：《文革大事年表》 明镜出版社 1996.10。

[6] 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 华夏知青网 2000－2001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1966—1976》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9。

[7] 红卫兵从狭义上讲，指大、中学红卫兵，从广义上讲，则遍及全社会(机关、企业、街道等)各个阶层，是一切革命群众组织

的代名词。

[8]《出身论》作者遇罗克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右派，他在1960年和1961年两次参加全国高考，都因为家庭问题而未被录取，被迫于1961年到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农场落户。

[9]杨东平：《北京和上海，现代中国的双城记》《现代周刊》1992.7.26。

[10]《中学红联，兵团战报》 1967.7.29，武汉中学红联 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田园书屋1997.6。

[11]江青在4月3日的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老红卫兵在1966年夏天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拥护这一讲话，成为"四三派"，当天就贴出大字报，批评在中学军训的解放军"支保批左"。北京军区支左干部李钟琪在4月4日的群众大会上出来纠偏，肯定红卫兵在1966年的造反行动基本上是革命的。中学的工农子弟红卫兵成为拥护这一讲话的"四四派"。

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造反派不要随便解散组织，过去的造反派是自己冲杀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不要借平山头，都统统平掉。周的讲话，实际上是批评"中央文革"支一派打一派，试图保护老红卫兵组织。

[12]由于高等教育在1961年后贯彻执行"阶级路线"，大学校园中的阶级成分比较纯，所以大学派系间的冲突不直接反映等级冲突，主要表现在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例如清华大学"四一四派"（保守派）和"团派"（激进派）之间（"阶级关系变动论"与"阶级关系不变论"）的论战。大学的造反派内部还围绕着权力展开争夺，甚至展开大规模武斗（如清华大学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的"百日大武斗"）。

[13]本小节有关异端思潮的资料和主要观点，引自：徐友渔的《异端思想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 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

的异端思潮》　刘青峰:《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14]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陈原:《语言与社会学》《青年思想家》1993。
[15]《风雷》　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 1967.6.7。
[16]同[15]。
[17]《文学战报》　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 1967.5.26。
[18] 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朝华出版社 1993。
由北京39中延安公社、4中新四中公社联合演出的"四三派"《红卫兵组歌》中选取了《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演出在7月1日公演后不久,即在北京广播电台播出。(《新四中》1967.8.20 首都中学红代会新四中公社主办)
[19]《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排演场——节日前排演场盛况见闻》《戏剧战报》　1967.9.27 戏剧战报编辑部。
[20] 1967年6月毛泽东接见东南亚一共产党领导人时说:仅地质学院《东方红》的销量就在10万份以上。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有几千种。我看到两百多种,看不完。如将全中国的报纸销量加起来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销量总数还多。10月,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时说:"为了争夺报纸,争夺舆论机关,斗争可激烈了。比如《湖北日报》,这一派夺了过去,那一派再夺回来,然后大家都不赞成,根本不出报,那么就出很多小报,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大的学校,都有报纸。"(《炎黄春秋》　1994年3期)
[21]《毛泽东主义战报》　1967.4 上旬　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22]《文艺宣传材料》　1967.4.20 中国歌剧舞剧院红旗造反公社。
[23]同[22]。
[24] 由苏念慈提供。该剧编剧:陈刚,导演:苏念慈,作曲:贺小秋、顾雨飞。贺小秋为贺绿汀之女,在文革运动中受迫害,自杀。1979年,苏念慈在上海某区文化馆导演了产生全国

影响的话剧《于无声处》。

[25]《九七战报》 1967.7.22 四川师范学院红色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师支队、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

[26] 1967年9月3日，太原红卫兵总联络站(红总)与红色造反联络站(红联)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红联的李承义(太原钢厂工人)、孟玲玲(10中女学生)在武斗中阵亡。为了纪念"九五"烈士，红联各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联合组创了大歌舞《晋阳红旗颂》。在"九五"事件一周年纪念日，红联在市中心五一广场召开悼念大会，公演了大歌舞《晋阳红旗颂》，观众达十余万人。(由王笑林提供)

[27]由赵健提供剧本，丁扬忠、王韧提供有关资料。
参阅《戏剧战报》 1967.6.7《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戏剧》(杨健) 《戏剧》 1995年3期。

[28]《湘江评论》 清华附中、北航附中、北师大女附中联合主办 1967.5。

[29]《路线》全剧8场：序曲——五一六通知；破四旧；红卫兵想念毛主席；无限风光在险峰——斗、批、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串联；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复课闹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主要策划和编创单位是：北京工业学院附中、清华附中(创作主体)、101中(舞美设计、制作主体)等三个中学为主的海淀区"四三派"红卫兵组织。全剧演出人员约500—600人。舞蹈、合唱、乐队各占100人左右。全剧没有整体的音乐创作，除"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等两三首新创作歌曲，其余均借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剧目中的历史歌曲，进行重新填词。

《路线》的创作素材，取自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一个"四三派"红卫兵吴清华的经历。京工附中的吴清华出身不好，老红卫兵迫害她，还嘲弄地将绳索丢到她面前，说："你还活什么？上吊吧！"她大声地说："不！我还要和毛主席干革命呢！"这个故事成为《路线》编创的重要契机。对老红卫兵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烈反抗,构成了这部大歌舞的重要情感基础。

1967年6月2日,《路线》在北展剧场首演成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获得首都文艺界专业人员的重视和好评。剧组在北京各剧院和北京军区、首都钢铁公司等地演出达100场以上,并到郑州、武汉、天津等地演出。全剧由中央电视台进行电视转播,"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一曲,被中央电台多次播放。(由杨军提供)

《红卫兵战歌》与《路线》几乎同时出台,该剧同样表现了红卫兵的历史,但突出歌颂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颂扬它是扭转红卫兵命运的关键。歌舞剧中还有反"血统论"的段落。《战歌》以红后代自居,又表明了与老兵"血统论"的区别,突出了独立的政治立场。它成为"四四派"展示政治力量和宣传政见的一面旗帜。在形式上,模仿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利用革命历史歌曲重新填词。编创人员是:北京5中、25中和女2中、女11中、灯市口女中等东城区"四四派"红卫兵。演出人员达200人。因为"四四派"在红代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战歌》成为北京市红代会的代表节目。《战歌》剧组代表北京中学红代会先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音乐厅演出,并到宣化65军、张家口等地巡回演出。(由安平等人提供)

[30]《阿芙乐尔重开炮》讲述,在十月革命几十年后,在新沙皇统治下,一个阿芙乐尔老水兵的家庭,由于修正主义的影响,一家人闹矛盾,发生了分裂,最后还揪出了一个叛徒。《历史的一页》(郭路生编剧、李平分导演、姜昆主演)叙说红卫兵成长的历史,在戏的高潮,一个红卫兵在上海支持造反派被阶级敌人杀害。这出戏曾在学校、工矿等地演出十几场。(由郭路生、郭新生等人提供)

[31] 见剧本《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油印本)

剧组人员由北京外语学校附中(演出主体)、中央美院附中(舞美设计、制作主体)、师大女附中、清华 附中、人大附中、

25中、34中、5中、101中等学校的老红卫兵组成。由徐雅雅(北京戏剧专科学校,话剧表演系)担任导演,申小科(北京外语学校)、胡滨(北京外语学校)等人编剧。(由徐雅雅提供)

[32] 26中的吴西平首先提出创意,31中的安平、5中的曹鸿翔、灯市口中学的姜昆等人随后响应,积极参与该剧的组创工作。剧本由吴西平执笔写一、二幕,安平写三、四幕,孙丕平(26中)完成其余各部分及贯通全剧。袁中瑞(26中)作曲。在集体讨论剧本写作的同时,演出队伍也开始组建,最后形成以28人为核心的演出团体,加上饰演小薇拉的分司厅小学的小学生,当时称"28个半布尔什维克"。(由安平提供剧本及相关资料)

[33]"一二五红场事件"指,1966年中国留苏及东欧学生,在返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途中,在红场列宁墓前举行反修集会,遭到苏联军警的镇压,发生流血事件。

[34] 参见《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朝华出版社1993。

[35]《长城》1968.1.1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718联总、哲学社会科学部六一公社红色造反者。《长城》报上发表批判王力、关锋、穆欣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真理》。

[36]《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解放军政治学院教材1983.12。

[37]《联合报》1967.7.27武汉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新华农、新湖大、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

[38]《淮海八三一》1967.12.6徐州淮海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39]《写在火红的战旗上》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1968.12。

[40] 同[39]。

[41] 同[39]。

[42] 由李辛、杨小穗等提供手抄本。

[43] 王靖(彭忆东):1949年2月18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65年考入北京47中高中部。1971年入伍,1976年复员,先后在

建材公司、检察院工作 1968年前后,写有"三寄"(寄往事、寄广阔天地、寄国际红卫兵)、"三别"(少年别、父兄别、从军别)等旧体诗,及流传甚广的地下诗作《决裂·前进》. 1978年写有电影剧本《在社会档案里》、长诗《祭》 现为全总文工团编剧.(采访自王靖)

[44]《红尖兵》 1967.10 北京二十六中红尖兵.

[45]《首都风雷》 1967.2.7 中学红卫兵首都风雷宣传部.

[46]《井冈山》 1967.4.6—1967.5.10 清华井冈山兵团

[47]《卫东》 1967.4.27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

同类章回小说还有:批判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彭贼外传》,北航红旗《照天烧》战斗队创作、连载于《红旗》1967年10—12月。批判贺龙的《贺贼现形记》(共8回)无线电《红卫东》兵团长缨创作,连载于《体育前哨》1967年5月20日至8月6日.

[48]《井冈山》 1967.5。

[49]《文学战报》 1967.9.20 中国作协斗批改委员会。

[50] 由李连琮、甘铁生提供

第四章

红卫兵群体向知青群体的历史性过渡（1968—1969）

一、红卫兵运动的结束和浪漫主义之风的兴起

1. 红卫兵运动的结束

1968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传达毛泽东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很快，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全国各大、中学校和各机关、团体，开始了对这些地方的领导，自发的群众运动开始逐步受到控制。

到了9月底，各省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随着"文革"夺权阶段的结束，运动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为了巩固夺权的成果，确立"文革"社会新秩序，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的运动在全国开始了。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在5月22日向全国批发了经毛泽东批示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在全国范围开展"清队"

运动。“清队”清的就是这些混在群众组织中的背景复杂的知识分子造反派。[1]

工、军宣队开始对各派红卫兵进行全面的“清队”，设立“牛棚”，查封红卫兵报刊。中学红卫兵中的造反派(“四三派”)、保守派(“老兵”派)都成为“清队”的对象，这两个派别开始进入一种民间状态。只有工农子弟红卫兵(“四四派”)得到了承认，被结合进了学校革委会，成为中学红代会的惟一代表。同时工、军宣队在新入学的中学生中重建红卫兵，它们是在驻校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党团组织领导下，按班级组织的“模范红卫兵”。[2]

1968年的强劲秋风，扫荡了一切有生命气息的事物，将整个社会带入了寒冷的冬季。曾经汹涌澎湃于全国的红卫兵运动结束了，活跃在街头、广场的红卫兵文艺活动也随之消失。文革官方暂时保留着红代会的个别报刊和少数演出组织。红卫兵文学从1968年秋天，作为一种民间文学转入了地下。

2. 浪漫主义之风——逍遥派和“输出革命”

在1967—1969年间，中学生红卫兵中掀起了一股浪漫主义风潮。这种浪漫主义风潮的内涵是复杂的，它是一种针对文革政治的叛逆性思潮。

遭受运动打击后，一批中学红卫兵的理想破灭了，他们失去了方向，处于政治、文化的空白状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自我放逐，一股包括各阶层青少年在内的道德“解放”的风潮在迅速形成。

一些老红卫兵脱离政治斗争后，直接进入了社区。他们结成团伙在社区与流氓群体进行斗殴，争夺地盘。当时闻名北京的王毛点、王小点刀劈“小混蛋”的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许多青少年的军挎包中塞着刮刀和菜刀，在街头、冰场或是牛奶店，相互挑衅，动辄拔刀相向。

他们正处于少年向青年转变的成长期，行为带有爱慕虚荣、盲目冲动的心理特征。一些青少年男女打扮起来，招摇过市，在街头“拍婆子”，相互勾引、挑逗。在失去社会伦理压力和道德规范的情况下，当时的青少年仅凭着朦胧的情感去开始自己的初恋。

一旦革命激情在青少年心中退潮，脱离“文革”运动的亚社会形态便

开始在民间形成，不同的文化风俗圈悄悄恢复。当时在青少年中间流行着一种新时尚，服饰开始形成某种规则，以表示各自不同的家庭地位和政治身份，如军队子弟穿国防绿或将校呢，地方干部子弟穿蓝色呢子外罩学生服，知识分子子弟穿学生蓝制服，工人和市民子女穿自家染制的军装。这种自制军装被某些干部子弟讥笑为"怯绿"、"屎黄"，被认为是僭越，"不安分"。这一时期传唱的歌曲（如《秋水伊人》）、传阅的小说（如雷马克的《凯旋门》、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都笼罩着浪漫情调，其中掺杂着哀愁和颓唐的情绪。

另一方面，一批激进的红卫兵则将视线转向了"世界革命"，他们把"输出革命"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恰当出路。

1968年年底，在云南全面展开"划线"运动，将造反派群众打成"反革命"，许多红卫兵被关进"牛棚"。在昆明师大附中的禁闭室中，昆明10中、12中、女中、11中等校的红卫兵开始秘密地商议：跨过国境线参加缅甸共产党游击队。1969年5月14日一支知青队伍从盈江小平原出发，队伍像"滚雪球"，经过几番聚散，经过瑞丽双印到达潞西三台山邦滇寨。他们在乡村举行"纵横谈"，核心论题是：中国红卫兵向何处去？在这次会上，还念了"缅甸共产党党章"，最后他们决定参加缅共。整个德宏地区边境五县的"走串"最终导致了一批"红卫兵—知青"越境加入缅共游击队。在此前后，有多批红卫兵越境参加缅共游击战争。据有关部门统计数字仅在1969年6月的一个月内，因各种原因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达300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少数则属于云南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3]

北京"红卫兵—知青"张育海在1968年10月到云南插队，1969年3月参加缅共游击队，阵亡时间不详。1969年6月12日他在缅共游击队给北京同学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边昆明插队青年的情况基本也一样。消沉、痛苦、颓丧、堕落，或发疯、或自杀，有些人几近土匪，看来这是许多学生的通病了（这边也许比那边更差）。……不要太悲观了，历史的经验证明像我国现在政治状况，必然要从不断的国内革命变为不断的对外战争，……'九大'不过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世界革命的一个政治动员，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前途渺茫，走投无路'的下乡青年眼里，这更是一条无限灿烂的路，往往他们无力打破沉寂生活的压力而企图做一次

'最后的斗争',去'搏'一次,'跳'一次。……但对没有尝过战争滋味的青年来说,我总有这样的想法,这不过是在一种逆流中的天真幼稚的精神上的安慰,与宗教教义中的天国一样。……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4]

红卫兵群体的"逍遥派"和"输出革命"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是对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即新生代向何处去)这一紧迫问题的不同反映。

二、红卫兵群体向知青群体的历史性过渡

1. 红卫兵派系的思想冲突
——围绕"出身论"的论战

在红卫兵群体向知青群体历史性过渡的主要理论思想障碍是"阶级路线"。只有超越等级制度,新生代才可能走出红卫兵状态,形成普遍的沟通和联合。对"阶级路线"的理论批判成为一项历史性的任务。

红卫兵的派系间围绕着"鬼见愁"对联和《出身论》,曾发生过先后两次大的论战。

在1966年春夏间,干部子弟红卫兵从中学校园中崛起时,提出了号称"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要求将"阶级路线"公开化、制度化。围绕着对联,两派学生在学校和社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由于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血统论"以其强大的声势,全面占了上风,影响迅速扩大到全社会。

在1966年"破四旧,立四新"的"红八月"中,红卫兵组成的"纠察队"狂热的抄家、打人,对"黑五类"搞非法批斗、关押。如北京6中红卫兵建立"劳改所",用酷刑拷打出的人血,涂写"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红八月"成为血的八月。血的事实证明了"血统论"是一种法西斯式的、反人道的封建理论。他们要建立的新社会秩序,实际上是一种反动的封建等级制度。随着造反派红卫兵的崛起,以及对老红卫兵"资反路线"的清算,对"血统

论"的批判已势在必行。

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文章尖锐指出："血统论"是封建荫封制度，"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出身论》思想锋利、逻辑性清楚，论辩性强，它不仅是一篇含着血泪的控诉书，也是一篇批判封建等级制度的檄文。文章在北京和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前后再版印刷9万份，翻印估计在百万份以上。《中学文革报》收到了除西藏外的全国各省市读者的大量来信，热烈拥护《出身论》。

《出身论》的发展，引发了各派红卫兵的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在中学红卫兵中展开。《中学文革报》(1967.2.12)发表"参考消息"说，"由于各组织内部对《出身论》的看法不同，许多组织已经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和分化，不少的人被罢官，甚至开除。有迹象表明，中学各组织在《出身论》问题上重新分化和排队。"这场论战对于红卫兵集团的分化、组合，乃至红卫兵话语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出身论"思想体系的形成

遇罗克的"出身论"思想在论战中不断丰富、发展，继《出身论》之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八篇文章，进一步发展他提出的"新特权阶层"的观点。

遇罗克认为高干子弟是"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准选民"，"联动"反革命组织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产物"。[5] 同时他又将有"黑五类"背景的革命造反派，视为抵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党内走资派的革命力量。[6]

遇罗克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来批判"血统论"，这就使"出身论"在"继续革命"的框架下发展。它不是摒弃"阶级斗争"理论，而是将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的子女；"出身论"同样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这样它就与其批判的对象"血统论"具有某种同构性。

一些造反派红卫兵，接受了遇罗克"新特权阶层"的观点，并加以补充、丰富。清华附中井冈山兵团北征发表《评干部子弟》指出：干部子弟是"'贵

族式的'小资产阶级"，"不满足的特权阶层"，"血统论的社会基础"，"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阻力"，"我们国家的许多重要而特殊的位子，也是专门留给他们的"。"这个阶层对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着颇大的影响"。[7]

随着论战的深入，有人提出要挖"自来红"的历史根源，《〈中国青年〉是推行唯出身论的罪魁祸首》、《文化大革命以前有无血统论》直接点明，文革中出现的"血统论"实际上是文革前"阶级路线"的引申，开始了对阶级路线的批判。[8]围绕着"出身论"的这场斗争，已经不再是"血统论"与"出身论"之争，而是深入到否定"阶级路线"，关联着建立平等社会的政治斗争。至此"出身论"思想体系初步形成。

"出身论"是造反派红卫兵社会理论体系和革命策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从全面变革国家制度的"新思潮"出发，才能真正认清"出身论"的社会本质。"出身论"是造反派的组织路线。在革命策略上，他们把实现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寄托在毛发动的"文革"运动上；在政治蓝图上，他们试图推翻现有制度建立一个平等社会。这条路线不仅把走资派，而且把干部子弟当成批判、改造的对象。这种革命策略仍然在使用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理论概念。

造反派要建立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社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而是要通过"文革"路线建立的乌托邦。这个公社和这种民主、平等，即使能够实现，也是以对走资派及其子女的专政和改造为前提的。

(2)干部子弟红卫兵对"出身论"的态度

干部子弟红卫兵由于"血统论"和"红八月"的暴行，作为一个政治派系已经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在整个社会普遍唾弃"血统论"的情况下，干部子弟红卫兵借着"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批判血统论，进行思想反省，这种反省并不触及灵魂，只是摆出了一种傲慢的"高姿态"。[9]

在"出身论"的论战中，老红卫兵的多数人虽然不赞同"出身论"，但是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只有极少数思想愚顽的成员，加入了对"出身论"的攻击，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的《评〈出身论〉》，这篇文章继续宣扬"血统论"，并不能代表干部子弟红卫兵多数人的意见，它们受到了本派系大多数人的普遍鄙视。可以说，论战促进了老红卫兵的分化。

(3)工农子弟红卫兵对"出身论"的批判

对《出身论》进行围攻的主要政治力量是工农子弟红卫兵("四四派"),遇罗克论战的主要对手也是工农子弟红卫兵,它们是当时最强大的、掌握权势的政治派别。

"四四派"批判"出身论"的理论武器是"阶级路线"。它们在报上发表《工农兵谈"出身"》,摘录发表陈永贵、雷锋、王杰,以及"中央首长(陈伯达、江青等)论出身",宣传"阶级路线"。[10]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召集三十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举行"批判《出身论》誓师大会",并在其主办的《旭日战报》上以六版篇幅发表了对《出身论》的批判文章。[11]

其他各报也发表了大量文章,《一对兄弟两只疯狗》一文指出,血统论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出身论是:老子英雄儿混蛋,老子反动儿好汉。"出身论"把"自来红"当成"自来黑",认为"红五类"比"黑五类"更需要改造,与"联动"的血统论如出一辙。[12]

《棒喝〈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卑劣手段》一文说:"'小组'一伙卑鄙手法服务于它的卑鄙政治目的:充当地富反坏右的复辟的走狗。""肆意攻击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路线,企图通过批判《唯出身论》取消阶级差别,取消阶级分析,达到什么人人平等,在目前阶级还客观存在的情况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13]

工农子弟红卫兵猛烈攻击"出身论",正说明了工农子弟对"阶级路线"的拥护态度。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反对遇罗克的不仅是享有特权的干部子弟,而且还有占多数的工农子弟;他面对的是封建传统势力和整个社会的压力。

(4)造反派红卫兵对"出身论"的态度

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后,在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引起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一些造反派在论战之初,十分赞同出身论,但迫于政治压力,立场发生动摇,公开声明反对出身论。这样就在造反派内部形成了保守、激进两派。

《首都风雷》1月27日发表“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的文章后、又在特刊上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沉痛检讨:“由于不突出政治,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丧失了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我们的心情无比沉痛,因为我们辜负了广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支持,辜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期望。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诚恳地向您请罪。”[14]

《中学论坛》(1967.2.27)发表“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后,不到半个月,又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提出:“打倒修正主义的《出身论》,并肃清其影响。”

对于大多数造反派不敢公开反抗“阶级路线”的暧昧态度,《中学文革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为什么不敢表态? ——浅评‘左’点比‘右’点好》一文,尖锐指出:一些曾受过血统论压迫的人,不敢表态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他们不敢相信自己就是革命的力量,他们被高贵的老爷们压怕了”。[15]

遇罗克针对这种状态,曾先后发表两篇文章《谈鸿沟》、《〈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在“对话录”中,遇罗克设置了一个理论上混乱、立场动摇的谈话对象常洞瑶(常动摇),进行说服帮助。

其实保守派在批判出身论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阶级路线”的批判,而是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政治策略。《中学论坛》、《首都风雷》公开声明反对“出身论”,并不意味着他们改变反对“阶级路线”的立场,而是暗渡陈仓,就在批判“出身论”的同时,他们以更激烈的态度批判“血统论”。

《首都风雷》批“出身论”的同时,发表“本报评论员”文章指出,中学文革运动的关键,在“向一小撮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和反群众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要把反对还是支持“血统论”作为区分“保”与“革”的标准,“组织起以左派为核心的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就是我们中学革命造反派夺权的惟一正确的途径”。

围绕“出身论”的批判,迫使造反派表面上放弃拥护“出身论”的立场,却把“出身论”的思想路线,确立为自己的组织路线,用“出身论”的社会结构取代“阶级路线”的社会结构。

(5)对"血统论"的共同批判

在1967年春夏,造反派红卫兵决心"痛打落水狗",彻底打垮老红卫兵,决不允许他们继续作为派系和组织存在。《只把春来报》(1967.6.29)发表《〈湘江评论〉"历史的教训"一文的批判提纲》(新4中公社〈赤潮〉),对老红卫兵派系的"新生"运动,进行了猛烈攻击。[16]

工农子弟红卫兵则对干部子弟红卫兵采取了斗争、团结的方针,《兵团战报》(1967.5.20)发表《革命派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红卫兵》说:"我们欢喜地看到犯过错误的红卫兵新生了,他们彻底造刘、邓反动路线的反,大造'血统论'的反,投入真正革命造反派的队伍中来,这个行动好得很!"[17]

各派之间存在着多么深刻的政治冲突,但是在1967年的春夏之交,对"血统论"的否定态度至少在表面上还是一致的。

虽然造反派红卫兵对老红卫兵派系采取了"痛打落水狗"的策略,但针对具体个人,则表现出了感化、接纳的态度。遇罗克在《"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论》一文中说:"受反动的唯身论蒙蔽的小家伙们","我们对你们的怜悯胜过对你们的愤恨和厌恶"."从泥坑中伸出你们的双手来吧!革命的同志是不会见死不救的!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共同革命,共同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吧!"

真正深切的忏悔行动,并不是组织化的,而是来自个人行为。在师大一附中的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班会上,曾经跟随"反动路线"的郭之中听了同学们的控诉,万分激动地拿小刀刺破了手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忏悔书。"四三派"《只把春来报》(1967.4.9)发表了郭之中的忏悔血书《向毛主席低头请罪,向同志们赔礼道歉!》。

郭之中在文章中写道:"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时期,我充当了刘邓黑帮的打手,残酷镇压了我校文化大革命,打击了革命的好同志,真是做尽了坏事。现在怎么办?如果能用自己的血来冲洗掉你们所蒙受的耻辱,如果能割下自己的皮肉来弥补你们肉体的伤痛,我也会毫不迟疑的啊,也会心甘情愿的啊!但是,精神上的痛苦,灵魂的创伤,又岂是物质所能弥补的!又岂是血肉所能消除的?"

"同志们见我用血写字都痛在心里，极力制止我，董铁鹰眼里含着泪说：'下边你就用我的血写完吧！不要再用刀划了。'排里的同志们看到我的血书也都痛哭失声，仿佛我的血是从同志们身上流出的，仿佛我割手指头的刀子在割同志们的心，这是怎样地真挚而又深厚的阶级感情，在几个月之后，被刘邓撕碎和毁灭了的集体的友谊和温暖又重新回到我的身边。我禁不住落泪了。"

"同志们血和泪的控诉，是对我们的活生生的阶级教育，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在刘邓路线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我们以前总以为不过是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现在我们看清了，我们是在为刘少奇说话，为刘少奇办事，我们必须悬崖勒马，回到毛主席身边，回到革命群众身边。我们晚回来一天，刘少奇就高兴一天！……糊涂啊，真会是脑袋没了，还不知怎样掉的，国家亡了，还不知葬送在谁手里。"

这篇文章真切地记述了加害者通过深切的忏悔，得到受害者的宽恕和接纳的感人场景，记述了年轻一代"知耻近乎勇"的精神。郭之中的忏悔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恢复了日常道德观念，感到了被加害者的苦痛，对自己的恶行深感羞耻，这是一种人性的复苏。我们感到了人们心灵在真切地波动。但是，当郭之中等人从人的尊严和权利，升华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时，僵硬无情的意识形态又重新统治了人们的情感。

《只把春来报》的评论文章《从一封血书谈起——将对血统论的批判进行到底》(第五研究小组)说：血统论使一些人丧失了作为人的正常情感，"在血统论猖獗的岁月中，一切革命青年，无论出身好坏与否，只要不是联动一小撮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都受害了！都受血统论的害了！像郭之中那样的同志，他们同样受了害，受了很深的毒害！血统论，使他们站到刘邓的反动立场上去了。""我们用无比欣喜的心情，欢迎战友的归来！"

文章的作者表示要接纳真诚悔过的"老红卫兵"，但是在对非人性罪恶的批判中，又加入了派性斗争、文革政治的因素。它强调的不是人权，而是另一种正确的政治路线，一种政治投诚，这种历史的局限性，表明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距离人道主义的立场是多么遥远。

郭之中的忏悔事件，虽然是一件个案，但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表明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一种相对开放的、多元的环境，产生了个性化、感性化的氛围，个人因素开始发挥一定的作用。它暗示着通过对"血统论"的

共同批判，通过非组织的沟通方式，各派之间存在着重新分化、组合的可能。

(6)遇罗克和"出身论"的历史局限性

宣传"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1967年4月被迫停刊，遇罗克因《出身论》在1968年初被捕，1970年3月5日处死刑。

"出身论"是当时最具人权因素的思想，是对封建主义最具攻击力的文章。"出身论"在表面上只是要求实现"重在表现"的政策，但通过对"阶级路线"的血泪控诉，要求社会普遍平等的强烈欲求已经跃然纸上。遇罗克是一个勇于探索的思想者，是一代人中间反抗封建主义的先驱，他的光辉人格鼓舞着后人。

由于历史的局限，遇罗克提出的平等，只是"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他承认出身的差别，但是强调后天改造更为重要。他要求的"表现上的平等"，是一种政治机会上的平等。这种平等要求与"人是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思想，还是存在距离的。要推翻生而不平等，就必须推翻"阶级斗争"理论。要维护人权，就必须承认平等的绝对性和普遍性，"阶级斗争"是社会平等的根本障碍。

"出身论"还把"成分论"回敬给了宣扬"血统论"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将"自来红"变成"自来黑"，认为高干子弟更需要改造，创造出了新的成分论。

遇罗克曾和张郎郎一同坐牢。遇罗克在狱中对他讲，"我本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能和一个出身好的青年，在相等的条件下较量较量。你来的那天，我认为机会来了。我想，在监狱里把你整苦，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但是，你来以后，慢慢了解你了，发现其实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感觉，共同的语言。慢慢地打消了当初的念头。"张郎郎说："'血统论'肯定错了。'出身论'也免不了偏激。其实没住监狱前，认为警察都是好人，犯人都是坏人。刚住监狱那会儿，认为警察都是坏人，犯人全是好人。""现在明白了：警察也有好人，犯人也有坏人。社会上一个人的角色是各种偶然、必然因素互动的结果，而当好人还是坏人，是自己选择的结果。"[18]

在这场狱中对话中，张郎郎批评《出身论》带有的整体论和两极化的

思想方法,反对从理念层面做出绝对化的推论,强调个人在社会、历史上的能动作用。用偶然性反对必然性(“绝对理念”)对历史的垄断。在这场意味深长的对话中,遇罗克已认识到自己带有某种偏见。遇罗克对等级制度怀有强烈的反抗情绪,同时也受到当时社会思想方法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思想局限性。

由于“文革”政治环境的恶劣,遇罗克只能采用闪转腾挪的办法。他善于在提出观点时,将前提加以强调,使对手找不到攻击的弱点。他躲在战壕中,伺机给敌人以犀利的一击。种种曲折手法,都给不解世事的中学生们,包括一些造反派留下一种“思想阴暗”的印象。这显然是对他的一种误解。遇罗克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也有政治上欠成熟的一面(如写信恳请陈毅的保护)。他既是一个在当时看来,思想政治上相当深刻的青年活动家,也是一个还在成长中的青年政治家。

造反派红卫兵试图依靠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运动建立新社会,让他们放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理论武器,显然是难以做到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生代不可能产生自由主义的思想,不可能产生“和平非暴力”、“不抵抗”主义,或是“公开政治”等其他民主变革的道路。在习惯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环境中,中学生派系之间缺少的恰恰是人性的“相通”,缺少的是自由、平等、博爱和宽容的精神。平等的思想,在中国是一种崭新的思想。平等的观念需要一种正常的社会环境来养育,需要人们的心灵变得更为丰富、博大。

各派系都自称代表着革命路线,实际上搞的是利益派别和利益政治。派性斗争的背后是阶层利益之争和阶层特权之争。它造成了政治局面日益紧张,暴力冲突不断。“在一个实行等级制度的国家里,只存在着等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促使各个等级加强内部团结以反对其他等级。如果没有进行等级之间的斗争,那么就会出现各个等级内部的争斗。……只有在法制的国家才会有平等的公民,这些公民为了实现以往从未完全实现过的自由主义理想而建立政党,这些政党是个人之间的联合。”(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学“文革”运动的派系斗争,本质上是一种古代社会的政治。要摆脱这种等级冲突,只有打破利益等级的联合,实现公民间的个人联合。

这一代人走上政治舞台时,就戴着“阶级路线”的枷锁,只有挣脱等级

社会先天给予他们的思想束缚，他们才能够走出历史的怪圈，得到真正的精神解放和行动自由。围绕"出身论"激烈论战，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一场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斗争必将在红卫兵群体内部发生。红卫兵群体最终将挣脱"阶级路线"所造的相互仇恨和隔离。

2. 中学红卫兵派系的消解
——跨校际、城区的红卫兵串联

1968年秋天，随着工、军宣队在中学开展"清队"运动，造反派和"联动"分子一同被关入了监狱或关入学校的"牛棚"(隔离审查室)。造反派红卫兵试图通过"文革"实现大民主的政治理想遭到无情打击，被推到了全面质疑"文革"路线的边缘。"中央文革"此刻成为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的共同敌人。历史的命运，促使他们打破旧的思想框架，重新建立派别之间的思想交流。

在1968年前后，一批红卫兵先后进入思想沙龙，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学马列小组、马列研究会。同时，大规模的读书活动逐步展开，探讨马列和"文革"理论。广泛的思想探讨，为红卫兵突破僵化的思想模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967年后，老兵派被迫最先退出"文革"政治舞台。老兵派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进行反思，在他们中间形成了一股读书之风，如人大附中的徐浩渊、清华附中的骆小海、上海5中的张恒志等人，都开始研究理论，试图为"文革"运动之谜找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1968年初，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造反派红卫兵也开始进行反思。韩爱晶组织三司派系的中学红卫兵，在北航、清华进行了两次专题讨论，论题为：二十年后谁主沉浮？参加者有各中学"四三派"领袖任公伟等二十人。当时蒯大富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王勾践语)，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红卫兵运动退潮后进行长远设计。

在此前后，北师大女附中的"老兵"郑天伟与"四三派"的戎雪兰等人，带两派红卫兵，进行不公开的辩论，论题是反修防修，实质性问题是，展望未来，探讨红卫兵运动的走向。这是两派迫于形势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首

次聚集在一起进行探讨性质的论辩。

1968年春，在中学开始出现跨校际的研讨会，"二流社"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学生跨校小团体。"二流社"每周在北京西郊紫竹园"风雨亭"和北海公园等地聚会，成员有师大女附中的疫雪兰、潘青萍、史保嘉，35中的孙康、包国路(柯云路)，101中的任公伟，清华附中的田晓庄，以及31中的甘铁生和28中等学校的"四三派"成员。

在聚会时，他们谈论过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未来国家命运等话题，还曾讨论过上海"中串会"(中学生串连会)《一切为了九大》提出的"阶级关系变动论"，试图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解释"文革"运动。

"二流社"成员在1968—1969年间与老红卫兵进行了广泛来往，如史保嘉、孙康、甘铁生与徐浩渊、王好立、依群等人的密切来往。这些跨派系的交往为知青沙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 在1968年间，"老兵派"和"四三派"之间形成既有冲突、又有交流的复杂局面，实际上各派进入了一个重新分化和组合的时期。

中学文革的尖锐派性冲突，同新生代接受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思想灌输、有着根本的关系。1966年夏天的"血统论"和"红色恐怖"、1967年镇压"联动"时的无情报复，以及围绕"出身论"的大论战，都没有脱出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时代巢臼。囿于亲身的经历和阶层局限性，形成一种封闭的思维方式。"四三派"对"老红卫兵"的严酷打击和仇视心理，只能是"革命"流血复仇的重复。

1968年期间开始的思想交流，使他们从不同角度相互启发，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种对话，有益于阶层角色的破除。这种阶层角色——红五类和黑五类——是社会强加给新生代的，它是社会非工业化的意识形态。剥除这种角色假面具，才可能找到迷失的知识分子身份。

1968年秋冬，跨校际、城区的派系论战、座谈，沙龙中的思想交流，以及其后在全国广大乡村的走串活动，促进了派系间的分化、组合，使他们意识到"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红卫兵派系的消解和知青群体的融合。

3.最初的沙龙和乡村读书活动

在1968年,"红卫兵—知青"开始了自觉的读书活动,沙龙成为讨论和交流书籍的重要场所。随着上山下乡的开始,读书活动随之也在农村展开。在城市沙龙和偏远乡村,到处可以看到"红卫兵—知青"读书、讨论的场景。广泛的读书活动,为红卫兵的思想解放和知青群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人们开始努力搜寻一切有关政治、文艺方面的书籍,特别是"文革"前出版的内部读物——"黄皮书"。在60年代初中苏论战期间,为了让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开扩视野,有计划地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部门出版了一批与国际共运有关的反映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艺的作品。根据《全国内部发行读书总目1949—1979》(中国版本图书馆编,中国书局1988)的统计,"文革"前约出版内部图书1041种。每种印数一般在2000册左右。这批书在文革中又遭到焚毁和查禁,残存下来的更为稀少。这批内部出版物对新生代新思维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

根据王好立、仲维光、潘青萍、史保嘉、芒克、张新华、张大伟、鲁燕生、鄂复明等人回忆,当时各沙龙中流行的社科类读物有:《被背叛了的革命》(列夫·托洛茨基)《新阶级》(德热拉斯)、《斯大林时代》(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威廉·L.夏伊勒)、《法国大革命史》(马迪厄)、《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以及《科学哲学的兴起》(H.赖欣巴哈)、《伦理学》(斯宾诺沙)、《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人性论言论集》、《心理学原理》(詹姆士·威廉姆斯)、《哲学回忆》(费尔巴哈)、《小逻辑》(黑格尔)、《资本论》等。文学类读物有:《在路上》、《愤怒的回顾》、《人、岁月、生活》、《凯旋门》、《往上爬》、《月亮与六便士》、《椅子》、《麦田里的守望者》、《厌恶及其他》,以及《少年维特之烦恼》、《怎么办》、《战争与和平》、《白鲸》、《红与黑》等。自然科学类有:《比1000个太阳还亮》、《神秘的宇宙》、《人在自然界的位置》等。

"文革"前插队的老知青张木生回忆说:从插队的所在地回北京,"其间

读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吉拉斯《新阶级》、‘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的报告’……同时,我还翻阅了1957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向党交心材料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的言论和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什么的。给我震动比较大的是《新阶级》中斯大林的黑幕和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引起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解冻’所带来的影响……看了7000人大会讲话后,有一种眼前突然一亮的感觉。……又把所谓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翻出来看,在农村待了几年之后,就觉得太是这么回事儿了。”[21]

潘青萍说:经历了一个全面的压迫和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我们最终冲破十几年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不记得戎雪兰从何处借的;读过后,我们郑重其事地相约到颐和园,交谈彼此的感想,那是1969年的10月;从石舫远望长堤一带,秋天明丽而萧索,我们心潮澎湃;托氏的书无疑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至此,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明晰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魇的桎梏和愚昧。[22]

甘铁生说:他在山西太谷县窑头公社杨庄大队大平小队插队,同队的9个知青每天下了工,吃了饭,已是筋疲力尽,但仍坚持用墨水瓶制成的小油灯读书。灯焰太小,挤不下三两个人,就轮班看,第一拨从晚饭后到十一二点,第二拨从十二点看到三四点钟,再叫醒第三拨看到天明。当外村传来好书,限定两三天还,大家就轮班看,通宵达旦。他们想办法走后门借书,甚至到文化馆去偷书。县委知青办开会批判他们的知青点,用看马列原著来抵制读毛主席的书。

在内蒙古插队的山泉说:她的读书笔记摘录了大量中外名著片断,曾在附近牧场、公社知青中流传,其中一黑色硬皮大横格笔记本传至200余里远的知青群中,两年后竟然物归原主,还被细心地包上封皮。[23]

1968年的读书活动,在1969年后持续发展,推动思想探索不断深入。阅读的内容也从古典哲学(黑格尔、康德、休谟),转向现代哲学(詹姆斯、萨特);从古典文学(车、别、杜)转向现代文学(萨特、贝克特)。仲维光回忆说,当时的知青几乎都有一个笔记本,上面抄满了摘自书籍和手抄文学的片断。在小圈子里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读书活动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发

展过程,从最初的摘警句、找结论,发展到系统的理解和掌握西方文化观念。[24]

白洋淀诗人宋海泉说:"这种读书活动对日后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它通过日后的诗歌创作逐步显示出来。"有人评价这段阅读史时说,"灰皮书"、"黄皮书" 帮助这代人摆脱"革命"价值体系的桎梏,外国文学作品则帮助他们重建人生、人道情感的世界。通过读书和讨论,绝大多数红卫兵抛弃了他们出生以来便被灌输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理论。"从此他们告别了简单狭隘的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回归到'人的本身'。""他们在那个年代特有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禀赋气质,就是这样在一部不倦探索的精神阅读史中成熟起来。"[25]

4. 最初的沙龙活动

红卫兵群体向知青群体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正是沙龙活动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这种沙龙活动虽然是松散的、流动的,但是它为红卫兵向知青角色的过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实际上成为知青话语的产床。

知青群体的形成,有赖于一种民间组织和一种运作方式。沙龙提供了类似机制作用,提供了一个亚文化运作的空间,从而推动了民间文化形态的生长。从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到知青群体的形成,沙龙活动正是这一历史转折的机关枢纽。

"九大"之后,派性意识开始逐步淡化,不同派别的人开始出入同一沙龙进行思想交流,这种景相在 1967 年还是不可想象的。这时沙龙形成的原因不再是派别和阶层,而是文化背景和对共同问题的关心。

(1) 徐浩渊沙龙

徐浩渊,人大附中老红卫兵,曾因《满江青》一诗影射江青,而被关押人狱数月。"文革"期间,积极从事沙龙活动。"文革"后期,在河南医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文革"后留美,做博士生,回国后从事心理学工作和讲学。

在 1968 年底,徐浩渊和王好立、依群、杨晓燕等人形成了一个关系密切的小圈子。他们进行广泛的读书活动,阅读了一批黄皮书,如德热拉斯

的《新阶级》,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安东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雷马克的《凯旋门》,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萧伯纳的《康蒂坦》等,并对这些作品,进行交流探讨。他们还接触了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作品,以及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法共加洛弟的《人的远景》、《无边的现实主义》,波兰沙夫的《人的哲学》等。

沙龙中弥漫着苦闷和孤独的气氛。王好立说:当时我们的理想幻灭了,不知该向何处去。王好立曾将法共领袖加洛弟的一段话抄给依群,这段话说:卡夫卡的"这部作品,表现了人类的有道路而无目的,有目的而无道路的忧虑"。而依群当时说的一句话,也给王好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德国某作家说的:"在死亡面前,我仍有愤怒!"王好立在当时致友人的信中说:我们的痛苦不是普希金式的痛苦,而是拜伦式的痛苦。拜伦黑色的、冰冷、绝望的浪漫主义,是普希金也不能理解的。

徐浩渊下乡后,在冬季回京与王好立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论争进行了几天。屠新乐(上海小东楼沙龙的成员)当时寄住在徐家,他回忆说,这场论争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实用主义"和美国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论》等一系列思想理论。这种争论,实际上正是徐浩渊等人形成系统思想观念的必要过程。

在沙龙中,开始形成了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浓厚兴趣,尤涅斯库的荒诞派戏剧,萨特的存在主义戏剧,塞尚、德迦等人的后期印象派绘画,以及《自新大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交响曲》等西方音乐,受到了热烈欢迎。为世人所熟知的西方写实名画、施特劳斯的圆舞曲,都被视为甜俗,而被他们所厌倦。[26]

在1968—1972年间,徐浩渊是北京沙龙中比较活跃,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这一时期,各派组织都已解体,分散、聚合为若干沙龙。应该说在北京没有共同的精神领袖,只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徐浩渊由于她的开朗活跃个性、领袖气质,以及她的穿梭交往,无形中成为几个沙龙的消息发布人,引导着话题的走向。尽管她在几个沙龙中思想并不是突出深刻和系统的,但她能迅速掌握和交流各团体间的思想成果,并积极介绍和推广西方文化,所以在突破红卫兵派系的壁垒,促进思想变革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2)北上南下的文化串联——孙恒志[27]

在沙龙初创时期，一些大城市的红卫兵开始了沙龙间的串联，这种串联是以一种私人交往的方式进行的，它是此后农村大走串的前奏。1967年底上海中学红卫兵孙恒志的北上串联和1970年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南下走串，虽然都是个案，但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孙恒志，上海中学高一学生，“文革”中他的母亲（上海市教育局长）被迫害致死。运动中他参加了“造反派”。1967年底工宣队开进学校，并宣布孙恒志为反革命学生，有“恶攻罪”，开除其学籍、团籍，并贴出通缉令进行捉拿。孙恒志逃往北京，通过同学关系借宿北大、清华。孙恒志通过一个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介绍，在1967年12月26日见到徐浩渊。在这次会见中，二人谈论的话题很广，涉及的问题有：马列主义、文化大革命、联动、“中央文革”、自由民主、《资本论》、世界革命等。当谈到社会主义民主时，徐浩渊举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语录：“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是比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更高级的民主。”

在北京，孙恒志还结识了清华附中红卫兵领袖骆小海，他是红卫兵运动发起人，也是《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之一。骆小海正在闭门读书，他和孙恒志交谈了读书体会。孙恒志说，同徐浩渊和骆小海的会见，给予他许多启示。

孙恒志在京期间，阅读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法国大革命史》、《斯大林时代》等理论著作，还读到在北京沙龙中传阅的阿尔巴尼亚党纲（油印小册子），并开始阅读《资本论》。1968年孙恒志离开北京，在返回上海的路上，回首往事如昨，前途漫漫，他感慨地写道：

南雀度星汉，何枝得安依？
黯黯宫墙水，与我共迷离。
长街多纨绔，空忆去年威。
大江流海道，西归那可期。
幸有二三子，偶逢在路岐。
笑指沧桑复，愁参造化机。

人生何所寄，无限向自为。
男儿百丈血，犹堪染虹霓。
临风一长啸，壮怀激苍飞。
京门留此句，胆气可相辉。

“愁参造化机”与“胆气可相辉”是孙恒志和徐浩渊、骆小海等人交往的真实感情记录。孙恒志回到上海后，在他家所在的小东楼，形成一个沙龙(小东楼沙龙)，推进了上海沙龙文艺的发展。

1970年秋，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等人，在浙江天台插队期间，到上海走串。她(他)们在孙恒志的小东楼寄住，同一些上海知青在沙龙中聚会。沙龙成员有孙恒志、陈朝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之子)等人。一个多月后，被居委会发现，认为是“反革命黑窝”，报告给《文汇报》。《文汇报》的内参上报后，王洪文、徐景贤作了批示，怀疑这批人与北京的后台有联系，进行反革命活动，上海空四军与市公安局，将沙龙中的人“一网打尽”，先后共捕三十多人。孙恒志在插队农村被关押审查，林彪倒台后才被释放。沙龙成员陈鹤林被关押的时间最长，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才平反出狱。

(3)张郎郎沙龙[28]

“太阳纵队”在1964年解散后，以张郎郎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文艺沙龙。沙龙成员有王东白、甘恢里等人，牟敦白、郭路生也先后参加。

“文革”运动开始不久，张郎郎的父亲张仃作为中央工艺美院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张仃的作品和从国外带回的画册都被抄走，财物也被抄光。全家被赶到狭小的房间里，只剩下几张床板和简单的生活用品。

在严峻的形势下，陈布文镇定的态度，给予子女张郎郎、张大伟、张寥寥和沙龙中的青年人以极大的鼓舞。当抄家活动开始时，陈布文对青年人说，现在你们赶紧读《九三年》。在海默被关押时，她向张大伟讲了梅里美的《马铁里奥·法尔哥尼》，告诉他社会是复杂的，不要在自以为对的情况下做出终生遗恨的事。禁书后，她要年轻人通读《鲁迅全集》，又叫他们抄书，其中包括《麦田里的守望者》。陈布文叫他们能背一点是一点，不然就再也

读不到了。

1968年秋，张郎郎等人被押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进行公审判决，陈布文独自坐在窗前，静待消息，直至黄昏，沙龙中的朋友从现场带回宣判消息，张郎郎被判死缓，她才深深地叹出一口气。遇罗克就是在这次被宣判死刑的，张郎郎幸免于难。其后，陈布文继续支持两个小儿子的文学活动。

张新华回忆陈布文时说：她具有一种人格力量，给我们树立了一种道德风范，她的学识和魅力，对所有的青年人（包括徐浩渊、鲁双芹）有一种强烈的感召力。我们所有沙龙中的青年，在精神上都受到过她的恩惠，在情感上对她有很深的依恋。

在陈布文的支持下，张郎郎和弟妹们（陈乔乔、张大伟、张寥寥）及耿军、蒋定粤、邬枫等人合编手抄杂志《自由》、《格瓦拉》、《曼陀罗》。张仃、陈布文夫妇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曼陀罗》的名字就是张仃起的，意思是：有毒却能治病的恶之花。《自由》的封面，画着黑色的栅栏，后面透出两个红色的大字：自由。这些杂志内容相当激烈，后来迫于形势而被销毁。

在1968年秋天，张郎郎入狱后，这个沙龙转入地下，文学活动从未中断，并从中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地下文学"作品。

(4)从政治向艺术的转向[29]

"文革"运动唤起了一代青年对政治的空前热忱，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做"职业革命家"，只有从事政治才能体现他们的人生价值。他们生活在专制社会，看到权力的至高无上，受到权本位意识的腐蚀影响，"文革"中一度呼风唤雨的经历，更激发了他们的权力欲望。

定宜庄指出：某些干部子弟和学生领袖选择下乡，是为了了解社会，磨练自己，为有朝一日登上政治舞台做好准备。为此他们甘愿到农村去卧薪尝胆。"掌权代替了'文革'前夕下乡的干部子弟相对比较模糊的概念——接班。"[30] 当时出现的许多马列主义小组中，同样存在着个别追求权力的人。"文革"运动的封建专制主义、帝王思想、阴谋政治对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1968年后，一批红卫兵开始从政治、哲学转向艺术领域。转向的原因大致有两个，其一是对"文革"政治产生的严重厌倦，其二是政治语汇过

于贫乏,又充满了谬误,无法表达他们真实和丰富的思想情感。

徐浩渊当时对政治十分厌恶,她听到沙龙中有人在谈论“文革”运动问题,就说:“搞什么政治?纯粹是一点利害关系!”徐浩渊沙龙中的成员普遍对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他们开始动手写诗,依群后来成为现代诗歌的先行者。

刘自立在1968年结束了他的“文革”政治情结,开始转向艺术。刘自立的父亲在中宣部从事党的理论工作,曾参加中共中央“九评”写作组,是“中央反修小组”的成员。刘自立受家庭的影响,对政治理论很感兴趣。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就看了《列宁传》,后来又看了《国家与革命》、《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列专著。“文革”开始后,他同中宣部的子弟成立了一个造反小组,积极地投身“文革”运动。可是运动开始不久,刘的父亲被迫害致死。头一天人还关押在中宣部的四楼,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人已“自杀”的通知,下午即送来了火化的骨灰。刘自立接过骨灰盒,骨灰似乎还在发热。学校对立的一派攻击刘自立的出身不好,他便贴出大字报,提出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刘自立因此犯了“恶攻罪”,成为当时的“69名少年狂热分子”之一,被关押在半步桥监狱。半年后,经毛泽东批示,包括刘自立在内的这69人被释放。

刘自立说,在当时有一本“黄皮书”深深地启发了他,这就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为奥地利籍经济学家,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在1943年针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明确指出,纳粹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的道路”。哈耶克作为一名自由派经济学家,主张让“无形的手”来调节经济,并由此发展出他的政治观点:人类的生存状态不应由某一党派提出的理想来预设,人类追求理想的直接结果,是把人类引向地狱。这本针对纳粹主义的书,在刘自立看来像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写的,他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乌托邦。这本书对刘自立震动很大,他放弃了政治,将注意力转向艺术领域。

对“文革”运动完全幻灭后,刘自立认为:艺术才是可以完全信赖的,艺术有自己的追求,超然于强权和功利主义。他推崇王尔德“艺术是道德的标准”的唯美主义思想。刘自立到黑龙江插队后开始写诗,并创作了现代主义小说《圆号》等作品。

徐浩渊、依群和刘自立等人先后由政治活动转向艺术活动,这种转变

是耐人寻味的，这不仅代表着一批红卫兵政治行为的终止，也代表着他们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的转变。放弃政治斗争，转向艺术领域，意味着疏离权力中心，转向民间立场，从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这种转向所产生的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文革"是这样一个时代，思想资源匮乏，政治错谬百出，信息极端封闭，在理论的道路上，布满了陷阱和歧途，要想通过理论方式找到方向和道路，是异常困难的。对于缺乏理论基础的一代人，思考常常将他们带人更深的困惑。只有运用个人的眼睛，运用经验判断，才可以窥破理论的掩盖，发现生活的真相，接触到真理。

白洋淀诗人岳重在一首诗中准确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运用现有的词汇和逻辑进行理性的思维，是不可能的。所以，达到真理的最佳途径不是大脑，而是眼睛。思维把人领向谬误，而惟有眼睛把人领向真理。他在诗中说："也只有我的眼睛/还是活着的。/我将努力做到比镜子/更单纯，/更肤浅，/更诚实，/更专断。/镜子只能是眼睛。""大脑/已经死了，被你累死的。/眼睛/将带领我前进"，"眼睛是我的主宰"；他在诗中大声疾呼："我/绝不思考！ 绝不思考。"[31] 正是运用了艺术的思维和诗的语言，新生代独立地认识、判断"文革"的社会现实，并成功地对"文革"生活进行了命名，艺术成为现代思想表述的重要手段。

一批红卫兵在1968年明智地转向艺术，开始通过艺术思维和艺术言语，来取代"文革"政治语言和理论思维，逐步形成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和个性的表述。在"文革"时代，艺术是他们惟一可能接近真理的方式。通过艺术的道路，一批知青(如"白洋淀诗群")终于找到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表述方式。选择了艺术道路的这部分人，获得了思想和语言的最大自由，进行了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工作，最终结出了思想、文化和艺术的果实。

三、红卫兵运动终结时期的红卫兵文学

在1968年秋,处于绝境中的中学“文革”运动已经日薄西山;同时红卫兵文艺度过了它的发蒙期,已经成熟到足以挣脱“文革”意识形态的地步。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浪漫主义阶段和批判现实主义阶段。前一阶段,以情调悲伤的浪漫主义诗歌为代表,后一阶段以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为代表。

1. 红卫兵运动终结时期的三个诗人:郭路生、孙恒志、史保嘉

红卫兵运动终结时期产生了一批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一些红卫兵诗人作为新生代的代言人,清晰地发出了属于红卫兵自己的声音。这些诗人和诗作的出现,标志着红卫兵话语的成熟。

在老红卫兵派系失败后,一些老红卫兵开始用诗歌来倾诉自己悲伤的情感。最初的沙龙形成时,这一类的诗作便在其中普遍流传开来。

杨三白的长诗《海洋之歌》,一度在老红卫兵中流传。杨三白是北师大女附中老红卫兵,她在1967年冬写了长达280行的诗歌《海洋之歌》。诗人对红卫兵运动在政治阴谋中毁灭的命运,感到无比的愤懑和苦闷,发出了反抗的呐喊。

我坚信你不会永远沉寂
你所向无敌的浪涛
必将以原始的野力
　　　　　　激荡澎湃

在暴风雨中
　　你将得到永生
　　　　　　——《海洋之歌》 杨三白 1967.8[32]

在同一时期，郭路生创作了长诗《海洋三部曲》，表达老红卫兵对红卫兵运动失败后的悲观情绪和苦涩心情。这首长诗在技术上还带有莱蒙托夫的痕迹。[33]

在哪儿，在哪儿
我所期望的小船
呜咽的风撅弄着滔天的浪
精神的船只啊，划动着毅力的双桨
这里已不再是递送微笑的沙龙
我们已踏进流着鲜血的战场
像秋风卷走一张枯叶
命运的海洋啊，将把这条小船带向何方
地狱呢，还是天堂……
　　　　——《海洋三部曲》第三部 献给红卫兵战友

如果说在《海洋三部曲》中，郭路生表达的还是老红卫兵派系的思想情感，那么他创作的一些短诗中，传达出各派学生共同的悲观情绪。

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如果命运真是这样的话，/我愿为野生的荆棘高歌。……
　　　　　　——《命运》 1967

燃起的香烟中飘出过未来的幻梦/蓝色的烟雾是挣扎过希望的黎明/而如今这烟缕却成了我心中的愁绪/汇成了低沉的含雨未落的云层……
　　　　　　——《烟》 1968[34]

1967年秋,张郎郎因为"太阳纵队"等问题,被隔离审查,随后他设法逃出,准备前往南方躲避。在同沙龙的朋友们分手之际,张郎郎在王东白本子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郭路生为此写下了流传一时的诗作《相信未来》。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仍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我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

——《相信未来》 1967[35]

全诗充溢着浪漫与哀愁,诗人将希望寄托在未来,他大声说:"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我相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这首诗清晰地表现出一代人的探索精神和坚定信念。

1968年底,郭路生在下乡的列车上,写下了《4点零8分的北京》,他写道:"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他大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这首诗抒发了所有下乡知青离开城市、离开亲人时撕心裂肺的情感。[36]

《相信未来》、《4点零8分的北京》等诗作，用浪漫主义的诗歌风格，第一次清晰地表达了一代人的情感体验。在红卫兵向知青转变的阶段，许多人还没有挣脱"文革"意识形态的束缚，这种独立的声音，将他们从蒙昧中唤醒。这些诗歌风靡一时，在知青中广为传诵。

1968年冬天，孙恒志由北京回到上海，他的住所"小东楼"成为知青经常聚会的沙龙。沙龙成员有：杨东平(上海中学)、孙小兰(孙恒志妹，上海中学高一)、沈秋飞(女，上海中学高二)、沈小文(沈秋飞弟，上海师院附中)、屠新乐(上海松江二中)、高建国(上海中学初二)等人。这里摘录他们的诗作片断：

屠新乐：悬崖撒手千年罪，平地失足一颗头。1974.5

沈秋飞：一餐饱忆云中曲，三盏醉惜当代喉。1973.8

孙小兰：北楼人散兴未散，皎皎婵娟照无眠。1972.元旦

高建国：亦曾风雨阅楚骚，亦曾哭笑寄笙簧。1971

孙恒志的诗当时在上海沙龙中广为流传。他的诗作飞扬着一种豪逸、清朗，有时又掺揉入几许悲壮。[37]

《无题》 1968 孙恒志

送君恨不到天涯，春野又开几度花。
岂向天空寻幻影，当从人世缚长蛇。
凉风着意吹襟袂，热汗何时结豆瓜。
相见似应偷火后，秃鹫岩上是余家。

《五律》(三首选一) 1972 孙恒志

凌空思突兀，落纸笔彷徨。
万叶添秋籁，一星悬曙光。
终剖和氏璧，岂朽马卿章。
主义留方寸，胆薪时莫忘。

史保嘉虽然出身高干，但是在"文革"中参加了北京师大女附中"四三派"，后成为"二流社"成员。在1967—1970年，写有旧体诗词40余首，诗作

在各沙龙中流传。她处女作《临江仙》,因为表达了对“文革”运动的幻灭心态和人生喟叹,曾引起广泛共鸣,在北京中学生中广为流传。

《临江仙·记康宁的四条热带鱼》

1967.11 史保嘉[38]

剑头凤尾翩翩舞,清涟顾影婷婷。
静如秀玉动生莹,彩鳞多婀娜,锦鳃自含情。
杯中有水乐便在,何必逐浪平生?
龙门堪劝鲤兄明:似我非无志,终饰案头瓶。

史保嘉回忆说:在1968年夏天,“我和女附中的两位学长戎雪兰、潘青萍一同混入水木清华……晚上则趁着清凉的夜色,或荷塘赏月,或秉夜长谈。有一次,我们还趁着月白风清潜入颐和园,我和戎雪兰并排躺在排云殿脚下一只平底大船的舱底,听微波拍岸,望斗转星移,推心置腹,海阔天空,人仿佛与山,与水,与风,与月融化在一起,进入一种宠辱皆忘的无我之境,感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那时我十七岁。十七岁正是人的一生中的春天,是充满诗情画意的阶段。”[39]当她们三人被工宣队隔离审查后,史保嘉仍然坚持写诗,她和戎雪兰在同一个时间要求上厕所,然后在厕所内悄悄互相交换诗作。

当时同史保嘉有过诗词交流的,还有师院附中、28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的旧体诗词爱好者。史这时开始在沙龙中享有诗名。史保嘉1970年赠诗戎雪兰:“笔伐四月识君志,戈枕三载赖师尊。”戎雪兰则回有七律一首:“芳凄革迷归路断,绿绮久损恐难弹。卷纸虽感君意暖,无奈岁月易温寒。灵旗空扬赤子絷,朱帘待秀正辛酸。去载玉关一揞土,胜似秋山枫叶丹。”

在1968年后,史保嘉和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在哲里木盟扎鲁特旗香山公社插队期间写有《满江红·答友人》和《红花行》等,表现了她在内蒙古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对青春理想的执著追求。

《满江红·答友人》 1968　于哲盟[40]

茫途疲旅,此去岂必重披挂。忆流年,三度昙花,往事烟霞。

一别小园春秋梦,画中塞外今是家。欲浪迹三江寻故事,遍天涯。

断血戟,谱胡笳,弃长缨,赴蛮魅。却人情依旧,足下难乏。兰草经年伴忠骨,诗魂几醉付黄沙。何须顾当年曾临海,雄关下。

史保嘉的《满江红·答友人》一词寄出后,唱和的人甚众,约有30余首,闰恒有"待来年再看史、青、兰,在谁家?"句,这些诗都已散失。1969年下半年,史从内蒙古经河南、甘肃、山西走串达五个月,回京后在几个朋友家轮流栖身,在圈子里成为中坚人物。当时,写有"满江红"答友人。

《满江红·答友人》 1970于北京

别来一载。晋中会,又值年残。喜重读,华章秀藻,韵简毫寒。无能信笔任沉浮,有劳俯拾责与赞。看志得意满文横溢,曾何难。

春秋史,付笑谈,血珠字,任千般。多才莫诧我,无意苦攀。躬耕未感天伦乐,凡心宁弃儒子冠。已秋风隔断归时路,是群山。

1970年史保嘉与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潘青萍、武嘉范、陶雒诵、张雷、孔令姚等人,以及男4中的赵振开、曹一凡、史康成,还有清华附中的仲维光、宋海泉、郑光召、甘铁生、刘满强、车宏生等形成一个圈子。1971年后,史保嘉在兰州当工人,在"五一六"运动中被审查,由于受到政治打击从此搁笔。

2. 红卫兵运动终结时的浪漫主义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鱼儿三部曲》

1968—1969年间,关于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这一核心问题的提出和广泛讨论,引发了新生代对"文革"的全面反思。"文化大革命"已取得

"全面胜利"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红卫兵将目光转向世界。因为"输出革命"此时已成为一些红卫兵对红卫兵运动出路的无奈选择,期望爆发中苏战争实际上成为一些红卫兵的精神寄托。一些红卫兵开始行动起来,在1967年年底试图偷越边境进入越南丛林,去与美军进行丛林战。[41]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以"输出革命"为主题的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诗作。虽然在1968年前也有"输出革命"的文艺作品,但大多情绪激昂,而在1968年后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悲壮和哀婉。在1969年夏天,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臧平分),以佚名在北京老红卫兵中广为流传,后来流传到全国。[42]

《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是一首"政治幻想诗",长达240行。叙述红卫兵战士远征欧美,在"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英勇献身的故事。诗的开端是即将踏上归途的红卫兵战士,在异国的陵园向牺牲的战友告别。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峰,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踏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瑞士的湖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在最后的战斗中,"战友"为了掩护"我",用身体挡住了从角落里射来的子弹:

白宫华丽的台阶上
留下你殷红的血点斑斑
你的眼睛微笑着
是那样的安详坦然
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似乎在命令我
向前!
向前!
看啊!
摩天楼顶上
一面赤色的战旗
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
火一般的红旗
照亮了你目光灿烂
旗一般红的热血
湿润了你的笑脸

这首诗集中表现了整个红卫兵群体在1968—1969年间的一种心境。冲动、浮躁、渴望奉献与自我升华,期望从运动困境中解脱。它是红卫兵运动即将终结时的一种政治梦想,也反映了他们对"文革"现实环境开始产生的一种焦虑和拒绝。尽管整首诗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美妙憧憬,但是从头至尾渗透着悲凉的情绪。

反映同一主题的诗作《军队的女儿》(佚名)是仿效《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的一篇叙事诗。至少在1970年已在西安第二军医大学和南京军区各医院的女兵中流传(她们大多是新参军不久的老红卫兵)。全诗分5段:入伍、赴越南、军营、作战、誓言。描述了一个中国女兵参加抗美援越的战斗生活经历。全诗共230行。诗中不仅有着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而且洋溢着少女的清新气息:

> 泪,你别流淌/多情的人怎能上战场?/远离父母/我们都一样/生活的道路要靠自己闯……如果我牺牲在战场上/请代我向天安门告别![43]

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浪漫主义诗歌还有郭路生的《鱼儿三部曲》。[44]

《鱼儿三部曲》(1967)已经预示出一代红卫兵的历史命运——面临着一场历史性的屠杀和全部青春的严酷毁灭。在这首诗中,阳光、渔夫都具有象征性。诗人在其中传达出对红卫兵历史宿命的无尽悲伤。

渔夫趁着夜色凿开冰洞,设下网绳,然后等待黎明的到来。在冰层下的鱼儿渴望“温暖的阳光”,正是这阳光成为诱杀鱼儿的祸根。一场屠杀在随着太阳向鱼儿逼近,“一束耀眼的灿烂阳光”,“慈爱地将沉睡的鱼儿唤醒:/我的孩子呵,可还认识我?”当冻结的冰层一旦破裂,“终于寻到薄弱环节”的鱼儿,“那么灵活又那么有力”地跃出水面……“突然,一阵剧烈的疼痛,/使鱼儿昏迷、沉向水底”,但是鱼儿苏醒来“又拼命向着阳光游去”。鱼儿向阳光询问:这可是春天来临?岸边可有鱼饵?但是,回答它的是沉默。“警觉催促它立即前行,/但鱼儿痴恋这一线光明/它还想借助这缕阳光,/看清楚自己渺茫的前程……”鱼儿对阳光的痴迷和刻骨向往,显然喻意着一种对领袖的崇仰之情。阳光是生命,是青春,是生活的全部希望。阳光是这么慈爱,但是对鱼儿满腔激情却始终保持沉默。它显得那么遥远,对鱼儿的仰望只有“沉默呵,沉默,可怕的沉默”。

当春天终于来临,破裂的冰块在撞击,水蟒和青蛙四方逃匿,而鱼儿迫不及待地跃出水面,“但却落在了终将消融的冰块上”,鱼儿在冰面上挣扎着叫道:“太阳,我是你的儿子,/快快抽出你的利剑啊,/我愿和冰块一同

消亡!"鱼儿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阳光的利刃无情的挥砍,光焰无情地剥蚀鱼鳞,将鱼儿同冰块一同消灭。新春的绿叶纷纷扬扬和着春雨将鱼儿埋葬,"是一堆锋芒毕露的鱼骨/还是堆丰富的精神矿藏?"

诗人显然意识到了这个时代如同浮冰注定要溶解,正因为如此,迫不及待的鱼儿成为这短命时代的牺牲品就显得格外悲惨。鱼儿对阳光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最终在绝望中无悔地将自己奉献给阳光,表达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崇拜、仰慕,以及怨艾、悲伤的情绪。就这样红卫兵的"红太阳颂"到了1967年,变成了刻骨铭心的哀怨。"阳光"是毛的象征,而渔夫是"阴谋"的象征,具体说是"中央文革"。显然,沉默的阳光与借助阳光的渔夫,构成了事实上的共谋。

史保嘉认为,郭路生的诗作属于格律诗,如同闻一多的《死水》,郭的诗不是现代诗的开端,而是古典诗的终结。《鱼儿三部曲》中,郭路生的思想处于分裂状态,这为他后来的精神分裂埋下了伏笔。"一束淡淡的阳光倾注水中,/轻抚着鱼儿带血的双鳍","轻抚"只有老红卫兵才想得出这种词,还有阳光呼唤鱼儿"我的孩子","四三派"就不会写出这样的感觉,这是一种属于老红卫兵的体验。

郭路生的诗作代表着红卫兵话语的最终成熟,同时也代表着话语的终结。郭路生的诗并不意味着现代诗歌的开始,但是他为"文革"政治抒情诗,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3.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九级浪》、《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疮痍》

红卫兵小说的创作一开始就有直接反映"文革"政治生活的特点,这种特点在新的政治环境下,促成沙龙文学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描述"文革"现实。本节介绍的三位作者是在"文革"中,运用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直接反映"文革"现实生活的先行者。

甘恢里(　—1993):原北京外语学院学生,于"文革"前进人张郎郎的沙龙。在"文革"中写有《挽歌》(1967)、《赠友》(1968)、《生命》(1967)、《瞬间》(1971)、《回忆》(1968)等诗作。甘恢里在1968年秋,创作了短篇小说《当芙

蓉花盛开的时候》。这篇小说流传于1969年冬,是沙龙文学的开山作之一。

小说讲述:一个干部子弟与一个女青年相遇、相知。两人在文革社会的动荡生活中,共同寻求生活的出路。女青年的父母因为“国民党问题”被遣送下乡,她独自一人在京生活。女青年最终被迫离京,与男友依依惜别。这部小说描写了两个敌对阶级出身的青年相爱,接触到十分敏感的阶级路线问题。开篇写男女主人公相见,女主人公穿着一身象征纯洁的白衣裙,男青年立即被她出众的气质所吸引。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命运给了我亲切的一击。”

小说女主人公的原型,来自作者的真实生活。甘恢里在《回忆》(1968)一诗中写道:“你来得像划破夜空的闪电/……现在,你去了,墨一般的夜空/更加黑暗,更加/深沉”,“在这里,我第一次用嘴唇/寻找嘴唇——/天堂躲藏了/柔软的小耳朵/接受了/第一次火热的吻”,“难舍难分地告别了/不相信不再有/重逢之日”。诗中的“你”,就是《芙蓉花盛开的时候》中的女主角,她有“安详而悲戚的眼睛/惨淡而微笑的嘴唇”,“轻裙浅裾的梦/超然于红,超然于绿”。[45]

甘恢里在北京景山后街漫步时,曾对郭新生(郭路生的弟弟)说,这里就是他为“芙蓉花”那个忧伤故事选择的场景。景山后街处于皇家公园一侧,有幽静的林阴道,春季时芙蓉树艳若红云,秋季来临时黄叶布满街道。作者为爱情故事选择了这样美丽的场景,避开了对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的描写。它表明在1968年秋天,新生代已经从“文革”运动的漩涡中心向边沿地带转移。

毕汝协(1951—):中宣部干部子弟。曾担任中央歌剧舞剧院编剧,现为美国籍华人作家、商人。出版有长篇小说《我俩——北京玩主在纽约》(1994)。

文革初,毕参加了老红卫兵组织。在1967—1968年间,毕汝协曾出人贺利(北京女12中老红卫兵)的沙龙。贺利是北京当时有名的“三利”之一,曾因抵抗“文革”运动而蹲过公安局班房。农闲时贺利由农村返城,在她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知青,形成一个沙龙。在这个沙龙中,知青们聚在一起谈哲学、研究马列,有的人搞意识形态,有的则弹琴唱歌和写诗。毕是其中的活跃分子。据说,贺利曾对小说《九级浪》提供素材,并对小说的创作给予启发、鼓励。小说创作时间不详,当在1968—1969年期间。文字长

度约10万字，相当于一个中篇。小说描写的场景，都是当时高干和高知子弟经常出入的场所，如“老莫”(莫斯科餐厅)、“沙滩”。小说所描写的人物，真实而具有典型性。[46]

《九级浪》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个中学生与资本家子女司马丽在“文革”中经历的感情纠葛。司马丽是一个高贵而自负的美丽少女，她上电影院看电影要买三张票，自己坐在中间，让左右两张椅子空着。她在“文革”现实中找不到出路，在命运打击下，最终沉沦，自甘堕落。我——一个纯真的少年，也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理想幻灭，在继绘画老师和其他男性之后，玩弄了自己从前心灵上的圣洁偶像司马丽。小说取名“九级浪”，源自俄国画家埃瓦佐夫斯基的油画《九级浪》，画面表现在大海狂涛中即将倾覆的一只帆船。它成为一代青年人心灵的象征。

小说的主角司马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呱呱落地的，可以说是和新中国同时诞生的，但是不幸的是，她是资产阶级家庭小妾的后代，家庭具有旧官僚的背景。她的家庭出身决定了她在“文革”社会中是不可能找到生活出路的。她在“血统论”横行的时代，备受歧视和屈辱。司马丽曾表现出惊人的高贵、独立和圣洁，但她孤立无援，前景渺茫，看不见任何个人的出路。在一个夜晚，“我”偕司马丽两人学画归来，在小胡同里突然被流氓拦截，“我”被刀子逼向墙角，仓皇逃避，司马丽被流氓拖到黑暗角落里强行施暴，幸亏遇到下夜班的工人路过将司马丽解救。司马丽衣衫破碎，一人在黑暗中徘徊，“我”追随在后，后来“我”发现司马丽跑到了绘画老师家里，教师家的灯熄灭了，“我”受到打击捂着脸跑开了。

在小说结尾，男主角也与司马丽发生了性关系。当司马丽脱下衣服，胸部露出烟头烫的疤痕，以及金丝镶边的乳罩(腐朽堕落的象征)，场景触目惊心。男主角“我”玩弄了司马丽之后，小说情节迅即跳到“老莫”，展开“我”与朋友在餐桌上的一段对话，“我”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师是第一个(玩弄司马丽)，“我”跟在后边，踏着老师的足迹，其他人一个一个跟着上。至此小说就结束了。另有一个版本，小说结尾交待男主角同司马丽一同前往山西插队落户。

这部小说撕破了“理想主义”的虚妄，简洁地道破了“文革”社会的生活真相。小说再现了一代青年人在“文革”运动冲击下，共同经历的精神分裂、瓦解、蜕变的“心路历程”。在“文革”中司马丽也曾绝望挣扎，渴望拯

救,她凭着弱女子的勇气与命运搏斗,最后甘于自我毁灭、沉沦、腐烂。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人心灵深处不曾掀起“九级浪”呢?司马丽是恩格斯所讲的,“文化大革命”“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文革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作者能够关注“人”,关注人的心灵,这一切在当时实在难能可贵。在小说结尾,作者引用了“存在主义”理论,却表现出一种对生活的无意义的失望心境。

在1970年冬开始出现这部小说的手抄本,小说的一些优美句子(如“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划过天角。再过片刻,它将贬值为不会发光的陨石,落到人间。”)在北京知青中广为传诵。

陈自强(陈墨)(1945—):生于成都,1965年于成都七中高中毕业,在家长期待业,干过临时工,1970年到西昌盐源县插队。在“文革”中与邓垦主持文学沙龙。陈自强于1968年创作长篇小说《疮痍》,小说长达40万字,在成都沙龙中传阅。

《疮痍》讲述一对青年恋人在“文革”中发生的悲剧故事。丑陋矮小的邱小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高中毕业后便处于待业处境,而他的同班女友薛岚,因为是副省长之女,高中毕业后进人了省音乐学院声乐系。“文革”运动开始后,薛岚盲目追随“中央文革”。邱小叶出于友谊和恋情,试图劝阻女友,两人之间多次发生了激烈的思想冲突。薛岚一直执迷不悟,不幸在一次武斗中饮弹死亡。邱小叶在1968年间愤而下乡,预示着一代青年的觉醒。

小说中女主人公薛岚的原型是作者的女同学,这个人物是一个矛盾体,她的父亲是副省长,但又是一个国民党军阀、解放前夕的起义者,有职无权。薛既接受了革命教育,又从父亲处受到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她对“文革”心存疑惑,但仍然被领袖崇拜所驱使,盲目地追随“文革”路线,并成为造反派的头头。男主人公邱小叶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热爱艺术,追求真善美,对“文革”有异议。小说通过邱小叶和薛父两个人,对“文革”进行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两方面的批判。[47]

这批浪漫主义诗歌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了红卫兵集团在过渡时期的文化品格。表明在红卫兵运动结束之时,一代人已经初步挣脱了“文革”意识形态的羁绊,产生了独立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红卫兵文学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它为新生代奠定了一种民间形态，为知青文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话语基础。在此之后，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知青文学沿着这一时期开辟的方向，踏上了独立探索的道路。

注 释:

[1]《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 1983.12。

[2]关于"模范红卫兵"的提法，首次见于印红标的《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运动两大潮流》《红卫兵秘录》 团结出版社 1993。

[3]黄尧:《缅甸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海南纪实》1989。

[4]徐晓主编:《民间书信 1966—1977》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4。

[5]遇罗克在《"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论〉》(1967.2.10)中说:"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在武斗当中，制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这些兽行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不容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小撮处于贵族地位，具有卑鄙污浊的灵魂的高干子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宠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标准选民。""在阶级斗争的新阶段，资产阶级必然会寻找新的机会，新的舞台，新的代理人又必然寻找新的御用工具，必然会使用新奇的、巧妙的、隐蔽的手段，去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唆使他们，挑动他们，利用他们和自己一起演出复辟的丑剧。而不幸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正是没有改造好的高干子女。这样，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达到顶峰，开始走向没落的时候，西纠、东纠、海纠、联动等反革命组织就应运而生了。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

[6]北京52中语文教员郑兆南，家庭出身地主，由于贴出炮轰党委的大字报，被非法关押、拷打47天，在释放的第4天后不幸去世，临终前给党写了两封遗书，遗书中控诉、批判血统论和红卫兵流氓。遇罗克在《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一文中，歌

颂了她的革命精神,并写诗礼赞:“春雷天降起东风,浩荡污浊横扫空。恨黯苏修一片土,喜瞻马列最高峰。千年大业奇勋建,九域熊焰异彩虹。神鬼‘何其毒’计破,雄兵誓死捣黄龙。”

[7]《评干部子弟》(修改稿) 清华附中井冈山兵团北征《中学论坛》1967.3.11。

[8]《〈中国青年〉是推行唯出身论的罪魁祸首》一文说:“文化大革命起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过是更加露骨地推行了《中国青年报》贩卖过的货色,公然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样的口号,更加残酷地压迫了出身于剥削阶级的青年。”

《文化大革命以前有无血统论》一文,统计团中央把持下的《中国青年》1960—1962年,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思想改造问题的文章为0篇,到了1962年9月至1963年3月,则为5篇;到了1963年3月至1965年10月,则为25篇,社论3篇。(《〈中国青年〉是推行唯出身论的罪魁祸首》《中学文革报》编辑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无血统论》《中学文革报》北京4中红旗主办1967.2.10)

[9]《湘江评论》(清华、北大、人大、北航、北师大附中红卫兵主办)5月29日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历史的教训——为红卫兵诞生一周年而作》说:“一些干部子弟的个人英雄主义、特权观念和血统思想、宗派习气大大滋长起来”,“联动及其反动思潮,实质上是‘老’红卫兵,尤其是干部子弟中一些人的活动及思想的代名词。联动的产生,是红卫兵的一分为二,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产物,它是红卫兵的对立面,是长期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作用的结果。它集中了‘老’红卫兵尤其是干部子弟的先天与后天的不足,形成了一批修正主义的接班人。联动的产生,毫不足怪,不过是深刻地反映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争夺下一代青年的尖锐斗争”。我们“绝不能执行宗派化的‘阶级路线’。”“要老老实实、恭恭敬敬拜人民为师,向工农学习,而绝不能‘少爷造反’、‘贵族革命’,作威作福,不顺眼就打。诸如所谓‘镇压流氓’。”

《只把春来报》(1967.6.29)发表《〈湘江评论〉"历史的教训"一文的批判提纲》(新四中公社〈赤潮〉)，对该文进行了全面批判、

[10]《工农兵谈"出身"》《旭日战报》(特刊)北京轻工业学院旭日战斗队主办 1967.4.8。

[11]遇罗克专门发表文章《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再说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对《旭日战报》进行批驳。(《中学文革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 1967.3.6)

[12]《一对兄弟两只疯狗》(金猴战斗组)《红鹰》红代会北京轻工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鹰》兵团主办 1967.3.16。

[13]《棒喝〈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卑劣手段》《东风报》首都中学红卫兵司令部主办 1967.3.19。

[14]《首都风雷》特刊发行时间不详，根据所载文章内容判断，当发表于2月26日之前，即"中央文革"宣布《出身论》为"大毒草"之后。《首都风雷》1月27日发表遇罗克(化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批驳"四四派"，捍卫血统论。特刊还发表批判"出身论"的系列文章，《挂羊头卖狗肉——批〈出身论〉》(北京三中"刺刀见红"战斗队、"反到底"战斗组)、《〈中学文革报〉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喉舌——兼评反动的〈出身论〉》(人大附中赤胆红心红卫兵)。

[15]《他们为什么不敢表态？——浅评"左"点比"右"点好》(北京女二中《伏虎》战斗队)《中学文革报》1967.3.6。

[16]在1966年的夏、秋季，老红卫兵给造反派红卫兵留下的伤痕和记忆尚未平复。老红卫兵的一周年纪念活动，被造反派红卫兵视为复辟，进行了严厉打击。

《湘江评论》(1967.6.25)本报评论员文章称："他们把穿军装的一律打成'联动'，甚至在一个班就宣布有三名反革命、联动分子，在一挂就划定八九十联动分子，难道人们能忘记陈伯达同志：'联动分子不过就是那么一、二百人'的讲话

吗？难道能把几十万老红卫兵定为联动吗?”

[17]《革命派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红卫兵》（北京三中治病救人战斗队）《兵团战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主办 1967.5.20。

[18]张郎郎:《我和遇罗克在狱中》《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1。

[19]极个别的高干子弟,在当兵前对“四三派”扬言:“干部子弟要掌权!”“二十年后再看!”有人甚至对宋海泉说:我们应该做朋友,将来我们掌了权,叫你们来帮我们治理这个国家。郑光召后来说:他对此深怀忧虑。一些人心中由此笼罩上了恐惧的阴影。但与此同时,像徐浩渊、郭路生等“老兵”已经与“四三派”完全成为朋友,在一起聚会、出游。正是通过这种分化和聚合,两派开始在新层次上进行重组。(这段材料采访由孙康、甘铁生、仲维光、潘青萍、史保嘉等人提供)

[20]萧萧:《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张明策划、廖亦武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4。

[21]见陈小雅的文章。《海南纪实》1989。

[22]潘青萍:《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民间书信 1966—1977》(徐晓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

[23]这段材料采访自甘铁生,并参阅《永恒的流浪——郑义自传》《作家》 1988.5 山泉:《昨夜西风》《青春方程式——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刘中陆主编,臧健、田小野副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4]材料采访自仲维光。

[25]宋海泉:《白洋淀琐记》萧萧:《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张明策划、廖亦武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4。

[26]这段材料采访中由王好立等人提供。

[27]1970年秋,小东楼沙龙被抄。当时孙恒志已回到涟水农村插队务农,在村里被捕,送到县里关押。“九一三事件”后被释

放，一度作为反革命监管改造。平反后，在1974年入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习。1977年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由杨东平、孙恒志提供）

[28]张大伟回忆说：有一次他对母亲讲，妈妈，我实在受不了了！母亲说，还记得雅得龙吗，“老虎……我放你到更加广阔的海岸，蓝色的天空上有月亮，鱼儿你离开这儿吧！”大伟问：我怎么离开？母亲说：“你找书看吧！”在张郎郎被通缉、被迫出逃的日子里，张大伟经常做噩梦。陈布文就让孩子们讲自己的梦，大家讲出自己的梦，心情就觉得舒畅多了。一次张大伟梦到一片树林着火，天上打着雷，每一个雷打出一团火，他没处藏身，心想也许这就是世界的末日。一声巨雷，突然所有的树林都开了花。大伟想，原来到了世界的末日，全世界的花都开了。他把这个梦告诉给母亲，陈布文说：“这是有意义的，都记下来吧！”（这段材料采访中由张郎郎、张大伟、张寥寥、张新华、王东白等人提供）

[29]这段材料由刘自立、徐晓、鄂复明提供。

[30]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第12章：从红卫兵到知青。

[31]岳重：《致生活》（1972）《中国知青诗抄》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2。

[32]由徐晓提供。

[33]李恒久：《郭路生和他的早期诗》《思想的时代》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1。

[34]《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35]同[34]。

[36]同[34]。

[37]由孙恒志、杨东平提供。孙恒志：《时习集》（待发表）参见《中国知青诗抄》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2。

[38]齐简：《诗的往事》 《今天》1994年2期《临江仙·记康宁的四条热带鱼》中的史康宁为史保嘉的弟弟。

[39]齐简:《诗的往事》《今天》 1994年2期。
[40]齐简:《诗的往事》《今天》 1994年第2期。
[41]秦晓英:《文革逸事——四个红卫兵潜入越南参战经过》《蓝盾》1986.6。
[42]该诗作者为臧平分(1947—1998)男,1966年北京101中学高中毕业,1978年考入北京经济学院,后为经济日报社记者。见《中国知青诗抄》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43]《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
[44]《中国知青诗抄》 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2。
[45]杨灵芝、甘恢里:《起航在消逝的港湾》 海洋出版社1989。
[46]由王仲提供。《九级浪》原作残缺稿,现由中国现当代文学馆收藏。
[47]《疮痍》抄在作业本上,用纳鞋的麻线装订成册,后来小说在传阅中遗失。(由陈墨提供)

第三卷

“文革”时期的知青文学

（1968—1978年）

第五章

"文革"上山下乡运动初期的知青文学(1969—1971)

一、知青文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

1. "文革"社会的建立

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在北京召开,选举了党中央的新领导班子。"九大"的召开,表明"文化革命"取得了全面胜利,整个国家开始进入权威政治确立时期。

相对于"文革"前期的"天下大乱",九大之后的工作则重在"天下大治",对修正主义的国家体制和上层建筑进行一系列革新和改造,向着"五七指示"所描绘的"亦工、亦农、亦兵、亦学"的"大学校"式的理想社会全面迈进。一个不同于前17年的"文革"社会体制开始逐步建立和形成。[1]

(1)国家制度的创新

在"九大"前后,全国发起了旋风般的一系列制度改革: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整党建党、知青下乡、干部下放劳动、"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取消考试制度、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文艺革命、医疗改革、工厂规章制度改革、农村商业革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改革及扩大

所有制规模等一系列改革。

全国根据“一元化”原则普遍建立革委会体制，实行“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实行党、政、企不分的一元化领导。大批的“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机关、学校，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对教育、科技和出版部门实行全面的领导和监督、管制。

知识分子成堆的文化、技术部门被全面改组，一批国家机关被军管，一批文化部门（报社、院团）被撤销和解散。国务院所属部委由原来的79个减少为32个。干部、知识分子集体下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与此同时有计划地将工人安插到文化、技术部门掌握行政、技术职权，名之为“掺沙子”。厂矿自办“七二一大学”，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逐步取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厂、企业的大批科室人员下放基层，代之以“三结合”班子来组织指挥生产。

“九大”前后的这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和新制度的创立，使“文革”的政治、文化成果，在社会体制上得到全面的巩固和落实，形成了从经济制度到意识形态的配套体制。它按照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理想社会模式，创建出一个国家高度集中权力的形态。“文革”的许多制度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对现代社会的破坏是极其深刻的。它不仅使现代行政制度、文化教育制度全面崩溃，而且形成了一种当代封建主义的模式，为此后的新绝对权威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提供了历史资源，对现代国家重建造成了重大障碍和长久的威胁。

在“九大”到“九一三事件”爆发（1969—1971），“文革”社会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可以说是绝对权威主义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文革”时代最黑暗的时期。

(2) “文革”艺术体系的形成

“九大”之后，随着“文革”社会的全面建立，文艺领域出现了江青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九大”之后，样板戏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最高典范，不仅成为群众业余文艺的样板，同时也成为促进社会革命的重要意识形态。两报一刊宣传报道，全社会通过学唱样板戏，取得了工农业跨长江、黄河，产量快速增长的光辉成绩。

姚文元在1969年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将“三突出”原则,上升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不但戏剧、电影、小说,连一些不写人物的诗歌、绘画也要“三突出”。“三突出”成为艺术的神圣法则,创作的“根本原则”,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2]“三突出”作为权威艺术的法规,成为政府文艺部门的“政治法条”,被“文革”官方加以推广和监督审查。

1969年后,组织化的群众业余文艺全面兴起,取代了专业演出。各地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承担了全社会的日常娱乐功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创作权力被取缔,代之以工农兵“三结合”业余创作。民众——知识阶层——当权者——绝对权威集团这四者的关系被打破了,知识阶层、当权者被排除在文化之外,形成了只有绝对权威与民众二者的专治文化。

在1969年后,随着绝对权威艺术体系的全面建立,文艺生活变得极端贫乏,人民没有书读,没有文化娱乐,出现了“八亿人只看八个样板戏”的状况。政治高压、文化专制和文艺匮乏的历史境遇,促使和逼迫文学艺术向民间文艺和地下文学发展。全面的高压,促成了艺术多元化分层格局的形成。

2. 上山下乡运动的展开[3]

在1968年,因文革运动而积压的中学毕业生1966、1967、1968三届,达1000万人。此时,高中、大学停止招生,毕业生分配不出去,新生无法升学,教师、校舍均成问题。同时经济面临持续衰退(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只相当于1966年的86.2%),“老三届”毕业生成为城市的剩余劳动力。

中央早在1965年就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内的知青安置,各大区计划在1966年下乡67万多人,“三五”期间将下乡366万人,15年内共计1100—1200万人,安置方向以插队为主。当时的布局是:华东地区准备接受北京知青4万人,50%安置在粮棉产区,25%到山区,25%到旱涝地区。华北地区,京、津两市知青主要支援边疆,根据向山区进军的指导思想,将安置一些人上山,并在黄骅一带建立农场,改造洼涝盐碱地。西北地区,准

备在15年内接受城市知青86万人。新疆兵团计划每年安置内地大城市知青5万人。西南地区,为配合三线和一线建设,知青将主要支援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文革"运动虽然使这一规划暂时搁置,但根据国家的"三五"计划,上山下乡将是这一代人的宿命,他们注定在劫难逃。

1968年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戚本禹等人,得知北京25中红卫兵曲折等人主动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消息后,马上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并要求报纸、电台大力宣传。陈伯达说,《人民日报》要赶快发表消息,还要写评论,并指示今后初高中毕业生要大量到农村去。戚本禹说,要宣传"斗私批修",掀起下乡高潮。新华社于第二天(10月10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配发了评论员的文章《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文章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各大城市连夜组织上街游行,热烈拥护最新指示。各地紧急动员起来,各学校、企事业和街道,相互配合,"大打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民战争",动员和逼迫毕业生下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为了推动上山下乡运动,国家迅速为侯隽、邢燕子等老知青恢复名誉,并任命了新职务。《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树立到农村扎根的新典型——曲折、何方方、李镇江、蔡立坚,称赞他们是红卫兵的模范。

当时率先带队奔赴乡村的知名人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锋,多为中学红代会负责人和各中学红卫兵团的领导人。他们被官方报刊、广播电台树立为上山下乡的模范,事迹被大力宣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批先进人物又多数是工农子弟红卫兵("四四派")的领袖和骨干,他们站在"文革"官方的立场,脱离了工农子弟群众,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工农子弟红卫兵派系解体的开端。

虽然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要求"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其中包括了大学生,但是国家花费大量资金培养大学生,受

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又非常缺乏,所以国家不可能象对待初、高中学生那样,真正让大学生去当农民。"文革"官方对大学生采取了,暂时先下放农村参加劳动,然后逐步启用为国家干部的政策。大、中学生的政治、文化命运,由此就发生了根本性差异。"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成为高、初中学生的运动。[4]

3.上山下乡运动的初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5]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初期,两报一刊提出要重视对知识青年的"再教育"。《人民日报》(1969.2.2)发表《贫下中农的光荣任务》一文,强调了再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

"再教育"强调,"知识越多越反动",知青应该在农民教育下,接受劳动改造,这一指导思想为某些农村干部迫害知青,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

"再教育"强调,知青要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促使知青参与各地农村的"阶级斗争",批斗地富分子,批"资本主义倾向",挖暗藏的坏人,抓"内人党"等,伤害了一批无辜的农民和干部。

在"再教育"主题的引导下,一批知青典型应运而生,上海知青烈士金训华、天津知青烈士张勇就是在"再教育"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知青典型。舆论宣传将他们塑造成忠于领袖、充满革命热情、虚心接受再教育、热衷于阶级斗争的知青英雄。

在现实生活中,上山下乡运动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知青生活普遍遇到困难,在陕西、内蒙古、云南等贫困地区插队的男女知青,干一年连口粮都不够,在其他较富裕地区,终年劳作也仅能勉强餬口。艰苦的生存环境,落后的文化生活,长期与父母家庭分离,使知青对终身扎根的前途产生了严重的忧虑。陕北知青首先到"知青安置办公室"闹事,声称"受骗上当",要求回京。[6]

在周恩来指示下,1970年3月北京市召开延安地区插队知青工作座谈会,由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纪登奎主持会议。座谈会形成《纪要》,提出加强对知青工作领导的9条措施,并抽调干部带队。北京抽调1200名干部

前往陕北后，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在头版发消息，以引起全党重视，以点带面，逐步推广，带动全国。

同年中央下发26号文件，要求检查知青下乡工作，解决插队知青的实际困难，严惩迫害下乡知青的罪犯。26号文件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产生广泛影响。各地开始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行为。1967年6月至1972年6月，吉林省查出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2080起，枪毙22人，判刑508人，多数是强奸女知青的罪犯。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高层领导人将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批林整风”运动上，26号文件的贯彻执行和知青问题的解决被搁置。

上山下乡的严酷现实，促使知青们进行思考，广大知青开始普遍怀疑“再教育”的理论，进入了一个苦闷、徘徊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知青亚社会文化开始逐步生成。

二、知青群落的形成——大冲突、大走串、大融合

1. 大冲突、大走串、大融合[7]

1968—1969年是急剧动荡的两年，新生代的身份由红卫兵到知青，由城市到乡村，思想情感和角色意识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红卫兵各派系在1968年已经开始了跨派系的交流，出现了分化、组合的迹象。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平民子弟和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开始在乡村展开。不同阶层的知青在“文革”中积下的恩恩怨怨，在新环境下又爆发了新冲突。与此同时，知青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走串活动，进行广泛的文化串联。就在这场大冲突、大走串中，知青间最终实现了相互融合，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知青社会。红卫兵派性斗争开始转化为知青中“扎根派”和“不相信派”的斗争。

在初下乡时，由于“文革”中的恩怨，知青相互间存在着隔阂，不同阶层

的知青时常发生矛盾，甚至发生暴力冲突。

在山西安邑地区，北京干部子弟与平民子弟间展开了村落间的械斗。平民子弟看见干部子弟落了单就打，甚至几个村的知青联手去抄干部子弟的集体户。械斗十分残酷，干部子弟用三八枪刺和弹簧刀，平民子弟用铁锹和锄把。由于干部子弟人数少，一些干部子弟知青点不得不集体迁走。干部子弟到邻村去走串，到平民知青户敲门要水都不开门，相互间的成见很深。

不同城市和地区知青间的矛盾也相当激烈。安邑地区的天津和北京知青相互间经常结队械斗。有一次看电影，一个天津知青将一个北京知青挤到很深的崖畔下，北京知青结伙报复，将几个天津知青追堵在一孔废窑中，将其中一人打成重伤，引起几个村的两市知青大械斗。在类似的几次械斗中，知青们采用了远途奔袭，联村围剿等战法。在山西有些地区甚至闹出了人命。

不同学校的知青之间也发生了尖锐冲突。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来自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的北京知青，由于校风不同，"一则彬彬学子，一则颇染痞气，遂以'彬'、'痞'两派分野"。彬派强调思想改造，经常批评指责痞派，于是痞派联络邻队同伙教训彬派，彬派又结伙报复，双方用铁锹、齿钯械斗。公社闻讯派干部进行批评劝阻。[8]

初下乡时，知青的地域感很强，以地区性的小群体来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和生存优势。各地区的知青对不同城市的文化特质(如服饰、口音、气质做派)等，也缺乏相互包容的思想准备。对生活前途的迷惘，内心的苦闷也是知青内部械斗的重要原因，相互斗殴是他们可供宣泄愤懑的少数渠道之一。

在下乡一年后，工农子弟知青基本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他们发现自己已被社会抛弃，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当地一些农村干部对知青的压迫和农民对自身利益的捍卫，促使知青各阶层、各城市地区和不同派别的樊篱开始消解。各阶层知青在知青点(集体户)中，形成了经济核算、生活互助、思想共享的群体，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知青集团最终形成。如果说，具有知识分子背景的干部子弟(延安干部的子弟)与"四三派"(知识分子的子弟)相互的融合，主要动因是对"文革"运动的反思；那么，平民子弟(工农子弟红卫兵)与其他阶层子弟的融合，是通过上山下乡运动的残酷现实的教

育。

1968—1970年间，随着68届、69届中学生分批下乡，在知青中间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大走串活动。“大走串”主要发生在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东北、云南、新疆等地区的农村和牧场。知青们走村串户，寻同学，找朋友。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会有人招待食宿。饭不专门弄，添双筷子跟着吃，晚上找个炕头挤在一起睡。

知青走串的地域惊人的广阔。北京知青王文江说，他在山西安邑见到了云南瑞丽来走串的知青，看到了从缅甸走私进来的薄型金表，听说了吸毒，还学会从云南传过来的歌曲《黑天堂》。在白洋淀插队的北京知青宋海泉说：“仅就我村而言，接待过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北京等地的同学朋友，少说也有几十人。少则几日，多则一两个月的留住，是很平常的事情。”没有插队的北京青年也不甘寂寞，王靖曾和几个人结队从北京出发，骑车在河北、河南等地走串，并在山西知青点长期居住并参加劳动。

在广大的乡村，知青间走串除了调查各地农村的情况，探讨知青的前途，也包括借机“游山玩水”，开阔眼界。这是“文革”大串联以来，国内最活跃的大泛围的“串联”活动。城市沙龙成为各地乡村和边疆兵团之间的联络站。这种交流，使最新的文化信息流通到乡村的知青户。通过“大走串”，知青歌曲在1969年开始广泛流传。

大走串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串联，它的背景是广阔的中国偏远乡村和环边疆地区，基本属于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这种以农村为背景，以城市为集中地的大走串，促使知青群体初步形成一种可靠实用的信息流通网络。

最初一批下乡知青在1969年秋冬天已经返串回城，他们以新的社会角色，从新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并提出一些新的政治观点。到了1970年后，沙龙中至少有一半人是农村知青，这种城乡间的串联，是城市沙龙文化得以深入发展，并扎根于现实社会土壤的关键因素。1968年的秋收后，大批知青返回城市。一些在乡村无力完成的文化任务，都转移到城市中来完成。在北京他们总结、交流一年来的思想成果。在陕西插队的徐浩渊，1968年在当地农村进行考察，回京后整理形成《陕西农村考察报告》，对贫困农村的现状进行了详细地报告和分析，这篇文章在沙龙中流传。

北京老知青张木生于1965年下乡插队，他在1968年秋，根据在农村的

实践和调查,写出了长达3万字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该文对苏联和中国农业的发展、农业学大寨运动、1958年的经济冒进、城市剥削农村、包产到户的优越性、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质疑,并针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病,提出中国农村的问题出在所有制上。这篇文章在北京沙龙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张木生一下子收到了两百多封信。随着《中国农民问题学习》的流传,很快出现了一些手抄本和油印小册子。[9]

当时北京4中老红卫兵也结合下乡经验,写了一份报告《时代——使命——准备(讨论提纲)》,全文长达二三万字,由4中老红卫兵孔丹、李三友、秦晓鹰等人集体讨论,孔丹执笔成文。内容包括:对中国农民的分析,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对中苏两条道路的对比。报告最后一节,是写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提出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在社会进步中具有突出作用,但总体上仍然肯定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王好立针对孔丹等人的报告写了一篇商榷文章《读书札记》,全文长3万字,复写了五六份,在圈子内传阅。在《札记》中,王好立将以往与孔丹等人的讨论,变成了系统的阐述,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讨论提纲》存在着的各种疏漏。

在1968—1969年,北京流传着许多油印读物,如《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上的报告》、《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油印刊物也有好几种,陕西插队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办了油印刊物《新思潮》。北京8中的计三猛等人办了《站在最前线》,内存既有政论,也有文学。在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宋庆光等人办了油印刊物《奋斗》,印行100册,分寄各地的知青点。吉林省突泉县的北京“四三派”知青也办了油印刊物《任重而道远》和《广阔天地》。[10]

吉林突泉知青在1968—1970年间的活动,还带有相当浓厚的派性色彩。任公伟等人主办的油印刊物《任重而道远》第1—3集中收入了1968年间北京、内蒙古、福建等地“四三派”知青书信21封。1968年8月26日一封未署名的通信这样写道:“不要以为现在大家关系很好,表面上也不闹派,但斗争是潜在的。联动分子及老兵中的顽固者是我们思想上的劲敌。各种思潮的斗争会在生活斗争中逐渐显露出来。”[11]

任智奇在1968年9月28日于突泉、学田、胜利致北京任公伟的信中说:“火车上,我和一个老红卫兵×××谈了好一会儿。她向我提了许多问

题(政治的、经济的、目前的、长远的)。从我们的谈话中,我深感到我们这一代中的各派政治势力,几乎在并行地考虑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无非是终极目的不同罢了。正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2]

由于农村环境影响、知青集团的形成,红卫兵派性间的冲突并未像他们设想的那样展开,而是最终转化为"扎根派"同"不相信派"之间的政治冲突。

2. "扎根派"与"不根信派"的冲突

任公伟等人在当时属于典型的扎根派,他们在《任重而道远》1969年第三期上发表文章,指出知识分子在"文革""斗争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和劣根性证明了,知识分子要革命到底,没有别的道路,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来个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他们表示"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走定了!"

任智奇等人有组织地结队下乡之后,迅速地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物产资源进行了调查,并编写村史和当地文革运动史,进行文艺宣传活动,还对图书馆、油印机、联络等问题做了安排。[13]

1969年12月,吉林突泉县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借着这次大会的机会,学田公社胜利青年点的知青们进行了历时两天的座谈,总结插队一年的经验。任公伟等人发表了题为"身在农村干革命,志在世界一片红"的长达16500字的座谈会《纪要》。"纪要"分析中苏间即将开战,提出"准备打仗"的号召。《纪要》同时指出"在目前青年运动中确实存在一股反对与工人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的'逆流',以及'不问政治,不参加阶级斗争的倾向'";《纪要》认为知青点可分为:好、坏、中间状态三类。"好的"知青点,因为"革命自觉性强","下乡之前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比较充分,有一个较坚强的领导核心";"坏的"知青点,只占少数;中间状态的知青点,知青思想"多数比较茫然"。[14]

《纪要》针对知青中间存在的派性,提出不论地区学校和在"文革"中的"不同经历",克服"宗派主义的狭隘情绪,同一切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的同志团结起来"。《纪要》说,"我们大声疾呼:所有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奋斗的有志气的有抱负的革命的红卫兵们,联合起来!"

《纪要》的作者显然忽略了形势的变化,随着红卫兵运动的结束,乡村生活的开始,派系间旧有冲突已经下降为次要矛盾,各派系的分裂、整合已经不可避免。在1969年底到1970年初,知青间正在形成新的派系——"扎根派"与"不相信派"。

1970年以任公伟等人为代表的"扎根派"与张木生为代表的"不相信派"发生了尖锐冲突。在北京,任公伟与张木生等人在沙龙中就"文革"的各方面问题,面对面地展开激烈论战。[15]

任公伟等人在油印刊物《广阔天地》上,著文批判"张木生之流提出的新观点",是中外修正主义的旧货色。文章说:张木生拼命辩解"你们不要给我们扣马尔萨斯、布哈林主义的帽子,这是做贼心虚,"张木生一伙是布哈林、托洛斯基、赫鲁晓夫、彭德怀、刘少奇的徒子徒孙,已成为"反抗社会主义的阶级和政治派别在青年中的代言人"。他们"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苦钻大部头,却对毛主席著作不感兴趣,大读封资修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美国)、《向上爬》(英国)、《怎么办》(俄国)、《安娜·卡列尼娜》(俄国)之类,欣赏星期音乐会,唱黄色歌曲、黄色小调,甚至有人公然为大批判中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桑伟川鸣不平,深表钦佩"。[16]

《任重而道远》和《广阔天地》合刊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文章指出:"那个打着《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的招牌,到处妖言惑众的张木生,给我们很多重要启示:资产阶级在千方百计地、顽强地、巧妙地争夺着这一代青年";"张木生、李木生,还有那个装乞丐调查社会阴暗面的徐浩渊及写了篇狗屁洋文《历史哲学》的赵金星之流,已成为他们的俘虏",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党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伟大领袖毛主席"展开猖狂的全面的恶毒的进攻",张木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青年","成为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被打倒的从彭德怀到刘少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代言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了"。[17]

合刊还发表了"胜利青年点"的文章《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辉榜样——李雅庄参观记》,以李雅庄的大好形势,驳斥张木生之流所宣扬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无非是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思想革命化必须要有物质基础,在目前这种基础上要想培养出一心为公的人,简直是妄想"等错误言论。同时,合刊还开辟"专栏"发表"贫下中农批张木生言论"。[18]

"扎根派"与"不相信派"之间的思想和政治冲突，在各地农村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两派有着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思想方法。知青集团内部的这种冲突，在"文革"后期逐步发展形成组织化与非组织化两极对立的格局。

3. 知青亚社会的出现

在"上山下乡"的初、中期(1968—1974)，知青"上山下乡"大致分布在边疆、内地两大区域。新疆、内蒙古、黑龙江、海南岛、云南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环绕在国家疆土四周；山西、陕西、江西、四川等地的插队知青群体地区则处于国家腹地，均处于国家最边远、偏僻和贫困的地区。

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在社会背景上有很大不同，兵团知青大多数是阶级成分比较单纯、"根红苗正"的学生，而插队知青多是不被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的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子女。两者在物质条件和政治、文化环境、社会形态各方面，也有着很大差别。兵团知青过集体生活，组织化程度很高，生活基本上可以得到保障，具有相对确定的社会地位，很容易被主流社会吸收、融合。插队知识青年不同于兵团知青，其社会地位很成问题，长年衣食无着，既无法在农村扎根成为农民，又无法返回城市，他们像一群漂泊者，痛苦地在社会的边缘徘徊。这些差异使得两者形成截然不同的两大知青群体，最终分化成社会化与亚社会化两种状态。[19]

在当时还形成了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类群体，他们由滞留或返城的知青构成，形成在城乡间串联的、流动性的群体，有明显的非组织化倾向，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城市沙龙文学的中坚分子。

艰难的现实生活迫使插队知青形成一定的互助组织，并逐步形成了独立的价值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知青亚社会圈。在1970年前后，全国各地乡村出现了一些游离"文革"社会的知青"文化村落"。

知青亚社会具有一系列新文化的特征，在这个亚社会圈中，形成了成员间的平等，消解了等级观念。农业劳动打破了知青脑体分离的状态，卑下的社会地位促使他们怀疑知识分子天然高尚和知识道德化的观念。他们开始学会尊重劳动者的生命价值，重视个人道德实践，认识到道德品质

并不为某一阶层所天然具有，而只能通过个人行为来独立实现。这种新思想打破了知识阶层对文化创造和道德实践的垄断。

内蒙古知青邢奇在诗歌体札记中写道："知青好在正青春，无牵无挂只一身。苦不苦，冤不冤，想想当地土生土长人。人生一世草一秋，谁应比谁贵，谁应比谁尊？可笑书生受了点罪，连篇累牍写纷纷。"(《老妇》)这篇札记反映了当时全国各地知青普遍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实质上是一种平等、博爱的情感，它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和谦卑，而是人的平等和相互尊重，是不分等级的相爱。这是一种社会成员间公民式的相爱。它使人领悟到西方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不过是对人的等级观念的突破，发现了非等级化的人自身。

"文革"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人的价值以等级方式体现出来。任何成功者的价值实现，都是以另一些人的受压迫、受支配为代价的。它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评定完全相悖。卢梭指出："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自由。""奴役别人的人是不会有真正自由的。"只有放弃文化特权思想，将"道德实践"和社会责任交给所有的公民，才能使自身得到了自由的希望。

"知识本位"是"官本位"的基础和保障，知识分子的文化特权是封建特权的深层土壤。要取消封建政治特权，首先要取消知识阶层的文化特权，中断知识阶层与官僚政治的权力通道，从而使政治活动丧失传统学理的支持，开辟现代政治的广阔道路。

就在"文革"社会试图在文化意义上消灭知识阶层的同时，传统意义上的知识阶层却在民间、在知青亚社会中自行消解。通过对自身的文化意义、价值体系的重构，一种新人在远离主流社会的贫困山乡出现。知青"村落"不再是原来意义的等级阶层，它趋向一个能够包容、亲和其他阶级的公民社会，这一事实意味深长。它是长夜中出现的一线曙光，带来了民主社会的信息。

知青亚社会圈的出现，为知青文艺提供了深厚的社会背景。一种新话语不可能凭空存在，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现实社会基础。可以说，没有知青亚社会圈，就不可能有知青文学的发展。

三、知青文学两种文化形态
——组织文学与非组织文学

兵团和插队两大知青群体，分别处于社会化与亚社会化两种状态；相应的知青文学也呈现组织化与非组织化两种形态。

全国共组建了12个兵团、3个生产师。各生产建设兵团普遍实行军事化管理，团以上的干部均由现役军人担任。在一些建设兵团（如内蒙古兵团）每个连队安插至少两名现役军人，担任连长和指导员，军人与知青的比例为1:17。

兵团政治教育，在初期照搬军队的做法，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评比。抓“内务管理”，坚持“天天读”，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开“班务会”和“讲评会”，开“讲用会”，办“学习班”；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扎根边疆”教育。知青在连队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

一方面兵团知青得到了物质生活的最基本保证，另一方面私人空间极其狭小。他们甚至连最一般性的文化生活（如阅读小说）都要受到连队管束，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开展富于创造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兵团的知青文学活动，以官方组织的“三结合创作”和各级宣传队的宣传演出占绝对统治地位。

当时的各生产建设兵团都建立了成网络的文艺组织。在师、团一级建立了专业宣传队，在连队建立“三员”（教歌员、板报员、夜校教员）、“二队”（文艺宣传队、球队）、“一室”（图书室）制度。每当政治运动来临，上级就指示各级文艺组织编演紧跟形势的文艺节目。[20]

各兵团的政治部门组织知青业余文艺骨干，创作了一批反映兵团“现实生活”的革命作品，如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创作的《踏遍青山人未老》（报告文学集1972），新疆建设兵团创作的《军垦美术作品赞》（1975）等。兵团的组织化文学活动，培养了一批具有文学素养、熟悉文艺政策的知青作家。

处于贫困农村的插队知青，一方面交通闭塞、物质贫困、文化信息不畅，一方面在文化生活和组织管理上享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在贫困乡村，更易于形成知青独特的文学艺术活动，建立属于自己的亚社会文化体系，例如在河北白洋淀出现的现代主义诗群，在内蒙古牧区出现的新古典主义诗群。

乡村的知青文学活动与城市沙龙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相互依托。乡村为城市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城市为乡村提供了政治信息和图书资源。白洋淀诗群明显具有城市沙龙的背景，他们的乡村文学活动与城市沙龙活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国家管理达不到的边远地区(如水乡、草原)，本是现代文明难以建立的地区，但当集权国家出现时，这些地区却成为自由主义存在的惟一处所，成为新话语产生的园地。

当然并不是所有在农村插队的知青都形成了亚社会群体，由于"文革"社会的环境压迫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许多乡村知青长久徘徊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希望找到进入的门径。在这种环境下，有相当一部分插队知青，主动地进行组织化的文学创作，福建闽西上杭一带的厦门插队知青业余文学群体，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

1.内蒙古牧区插队知青的文学活动

"文革"期间，在内蒙古草原集合了数十万知青，他们大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呼和浩特等城市，分别处于农区、牧区两种不同的环境。内蒙古两种地区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内蒙古知青文学出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

(1)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文学活动

在农区(农场)，知青过着准军事化生活，文艺创作活动受到严格的组织管理，知青文学活动呈现出与"文革"社会一体化的景象。

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连一级由现役军人担任领导，实行准军事化的集体管理，在这种条件下，任何非文革化的思想倾向都难以存在和发展。

兵团1师5团后勤处陈大强在回忆文章中说:1969年到兵团时他私下带了《叶尔绍夫兄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几本小说,缝上一个《星火燎原》(书名为毛泽东亲笔题词)的硬皮偷偷阅读,被协理员发现,认为是读黄色小说下令烧毁。在内蒙古建设兵团2师11团某连的谭宗远也有类似经历,他阅读的《战争与和平》、《沸羹集》(郭沫若)和《大寨行》(巴金),被下令当众焚毁,并让他和"窃书"的女战士先后在全连大会上做检查。[21]

基层连队的文艺活动,积极配合各项中心工作。兵团1师4团5连知青王文娥说,她所在的连宣传队排一些小戏外,还编排了五场话剧《成长》,内容描写某先进知青回城探亲,与返城风进行斗争,带着不肯离城的知青一同重返兵团。该剧曾在各连巡回演出。

在兵团的政治环境下,非组织化创作不可能普遍存在。内蒙古建设兵团的思想禁锢和准军事化管理,严重束缚了知青文学的自由发展。[22]

(2)内蒙古牧区的小说、散文创作

牧区插队知青相对农区的兵团知青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有利于形成知青亚社会群体,为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内蒙古大草原保护和养育了牧区的知青文学。

虽然牧区知青也参与了当地的阶级斗争、派性冲突和揪内人党的运动,但政治运动相对要少。1969年内蒙古牧区的一些地方开始隶属兵团管辖,使牧区的知青群体受到了组织化的束缚,出现过对牧区知青办学习班整肃的情况,但由于放牧点分散,军队干部只能开着汽车进行"串包"检查。[23]

内蒙牧区有着特殊的自然环境,牧民自古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兵团不可能深入到分散的放牧点进行组织管理,蒙古族牧民的政治思想也较为淡薄。牧区的知青点在放牧的生活中,有着较为广阔的活动天地,所以顺利地形成亚社会群体。

牧区知青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是在1969—1972年,此时知青群体总的情绪是高昂、向上的,知青生活也较为稳定,这一段时间产生出了一批小说、散文、诗歌。到1973年后,随着最初的一批知青返城,开始进入一个思想动荡的时期。有的知青在当地成家,有的为返城而奔波,知青们迫于

生计,已无暇提笔写作。知青点的逐渐解体,也使非组织化的知青文学难以找到读者,作品数量大大减少,文学创作转入低潮。

在内蒙古牧区有不少的手抄本小说流传。《一年》(1972中篇)曾在阿巴嘎旗知青中流传,作者为阿巴嘎旗的北京知青王唯本。小说讲述,几个知青听到招考"工农兵学员"的消息后,结伴前往应试。在张家口至北京之间的一个小车站上,他们共同度过了不眠之夜。小说通过知青间的深夜交谈,展示出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等不同思想的矛盾冲突。小说传达出知青们对生活的共同体验——"知青是大地的流浪者"。女知青小晋与男知青大关是一对情人,小晋上了大学,大关却因出身问题被拒之门外。大关在孤独和失落中将感情转移到了一只狗身上,为了救狗,大关在一次大火中被烧伤。小晋去医院看大关,由于二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小晋悲痛地与大关断绝了爱情关系。小说塑造了心怀壮志、报国无门、孤独迷惘的大关,塑造了注重物质生活的大关和痛苦彷徨的小晋。这篇小说传达了作者对知青现状的一种理性思索。[24]

牧区的知青们还创作了一批散文。在"文革"后出版的《草原启示录》中,有几篇散文,是牧区知青在插队时的习作,如李三友的《乌兰宝力格的春天》的片断、李大同的《雅干锡力日记》等,它们当年就曾在各旗的知青点流传。当时各旗的知青曾传阅和传抄的散文还有《小青马》、《打狼》、《五年》等。这些散文文字优美,感情真挚,意境高远。

《雅干锡力日记》以日记体讲述了一匹青马经过知青的驯养,在全旗那达慕大会上获赛马第一名的故事。北京知青与一匹青马的感情,以及他与草原、与牧民血与肉的亲情渗透纸背。《放羊第一天》(《乌兰宝力格的春天》片断)则朴实地记录了草原生活的日常情感体验。

这马每年第一次骑总是有些可怕。嗯,鞴鞍子还挺老实。我牵着它绕将起来,一般每年的第一次,紧好肚带后绕两圈,它就会撅起尾巴屙一泡屎。那时就只管放心上马,保证不炮。今天可真是闹不机密了!青马死活就是夹着尾巴不屙,更使人发颤的是耳朵也向后背着。几位女生端着碗,靠着包,幸灾乐祸地叫着:"哈哈,不屙!肯定尥!把你摔个半死,谁叫你昨晚不圈牛!"真的,昨晚只顾弄马,牛忘了圈。我狠狠地看了她们一眼,

在奚落声中把青马猛地揪了起来,“刷”地纫进左镫,马一声怪叫,前腿直立起来。好骑术!我一定是以一个异常迅速的动作翻上去了,它前腿还在腾空,我已经稳稳地坐在鞍子上了……跃过小河,飞过山岗,微风拂面,身轻似燕。啊呀!上帝,眼镜要戴不住了!……

我抖擞起精神牵着青马走向主席台,只觉得全场所有的目光和议论都集中在青马、马上的孟克和我身上,我浑身燥热……附近最有名的唱马人那木吉拉老汉骑上一匹高大的白马,站在授奖马队的前面开始为大会唱马。当老人用富于音乐性和节奏感的蒙古语盛赞“干青包勒”和北京“思赫腾”(知识青年)时,我把脸紧贴在青马粗壮的脖子上,热泪夺眶而出。

——《雅干锡力日记》 李大同

天已大亮,包里蒸汽腾腾,一柱金光透过门窗,斜在我的枕旁。一看表,8点,就呼地一下起来,把正喝茶的老头吓了一跳。“睡得好吗?”他转过头对我笑着。我边穿衣服边应着,隔着白气听到淖尔金仿佛又在用勺不住翻腾锅里的茶。这个动作真成了她的嗜好,仿佛会从搅出的白气里见到极乐世界似的。我顺着光柱摸到门,淖尔金喊:“喝茶!喝茶!”我说了两声“知道”,“嘭”地关上门出去了。里面根登很自信地对老婆说:“人家解手。”

呵,多好的天!晴空万里,太阳已经老高了。白茫茫的草原晃得人睁不开眼,远处雄伟的额尔登乌拉山蒙着一层淡蓝色的雾气,小鸟藏在四面八方不停地唱着,根登的牛群卧在前面霜雪闪亮的草丛里吐着白气,有几头站着伸懒腰。我的马在东梁上吃草,嘴巴粘在地上一动不动,像雕像一样。

——《放羊第一天》 李三友

(3)内蒙古知青诗歌群落的诗歌

内蒙古诗群成员主要由牧区的北京知青组成,该诗群是知青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他们在诗歌方面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

A. 内蒙古诗群的新体诗

内蒙古知青诗人创作了一批模仿蒙古民歌风的新体诗,它们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虽然这类作品数量不多,却大大提高了新体诗的总成绩。下面是其中两首。[25]

《欢迎你》　李仲琪

欢迎你,亲爱的朋友!
只要你带着巴特尔的荣誉来到这里,
我会宰掉最肥的羯子.
双手捧出喷香的里脊。
我要用新鲜的牛奶,
注入锃亮的铝壶,
调进最好的黄油、奶皮子,
给你煮喷香的奶茶。
牵出心爱的骏马,
备上闪亮的银鞍,
佩上精致的小马鞭啊,
把你驮进我们美丽的草原。

(注:巴特尔,蒙古语,英雄。)

《思念》　何友中

思念老额吉,
思念你深夜为我盖被,
思念你的香喷喷的奶茶。
思念小走马,
思念你三岁把我摔下,
思念你毛茸茸的嘴蹭着我。
思念绿色的小丘,
思念你柔美的曲线,
思念白色的云在肩头飘动。
思念白雪,

思念那一张张冻伤的脸，
思念留在积雪中深深的脚印。

还有一些出色的新体诗，如《蒙古包赞》(杨光熙)、《马群下夜》(李志伟)等。在《草原启示录》(内蒙古知青回忆录)的编辑过程中，征集到知青当年创作的200篇诗作，其中新体诗占了一半，可惜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不多，民歌风还只是少数人的风格，可以讲，新体诗的阵容还是比较薄弱的。内蒙古知青的新体诗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成绩都不如旧体诗突出。

B. 内蒙古诗群的旧体诗

内蒙古诗群的旧体诗具有突出的艺术开创性。内蒙古诗群代表性的诗人，有李向真(北京知青，插队在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牧场)、尹占华(北京知青，插队在土默特左旗)、邢奇(北京知青，插队在东乌旗)等人，下面是其中几位诗人的诗作。[26]

《秋思》 尹占华 1969
一字归飞雁，高空过我呼。
天长归路远，过了几长途。
尔雁听我语，可有我之书？

《插队五年》 李向真 1972
京地草方芽，塞外雪未化。
五年毡包居，隐身草山下。
日食餐奶酪，畅语共蒙话。
游牧逐水草，终年数迁家。
长车缓慢行，牛喘气喷沙。
青草黄且枯，秋羊肥似瓜。
山丹红不长，坚雪白难化。
一览千里豁，岂似陇径狭。
牧羊空寂寞，行路身孤寡。
边风吹脸黑，日晒精神飒。

劲腕挂玉鞭,捷身跨铁骅。
俯身捉青烟,扬臂夺紫霞。
满眸空辽阔,望山不惜马。
草衬人更美,心红志愈大。

下面是插队在锡盟东乌旗满都宝力格牧场的两位北京女知青的诗作。[27]

《下雨》 赵秉宜 1969
天铺灰烟云簇墨,雷声压顶天欲堕。
飞沙走石电光闪,倾盆大雨从天落。
雨打毡包如鼓作,直到夜深势不弱。
疑是天空裂缝多,女娲补天不负责。

《牧羊女》 叶小静
平地一声朔风起,搅昏苍茫几万里。
请君试看飞雪处,也有几多牧羊女。

在内蒙古知青诗作中,“惜别”内容的作品占有一定比例。知青们在草原艰苦的生活岁月中结成肝胆相照、相依为命的真挚情谊,在1971年和1972年前后,第一批知青离开草原,在知青群体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引发了群体性的感情波澜,有愧疚、有悲伤、有失落,百感交集,留下了一批感人的诗篇。如:“前途知己知何在,伤愧又下一层楼”(王石丞《惜别》1974.10.10);“掷泪无言送友去,归来空身对旧营”(李向真《送别》)等。《惜别》(佚名)真挚质朴:“金风吹尽兮,牧草皆黄。寒冬将至兮,生灵感伤。寂空无限兮,风摧云荡。云聚云散兮,不与人商……”这首诗在内蒙古知青中广为流传。

C “打油诗”的创造

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牧场,有一个热爱诗歌写作的知青群体,以北京2中的知青邢奇、施小明,北京22中的刘玉平、陈达

实、董士芳五人为主。在1971—1972年间他们曾将自己写的部分"半旧体诗"编在一起,命名为《马背上的歌》,主要内容描写知青的日常生活,大多采用了"打油"体,先后出了三集,合71首。诗集复写在裁出的白报纸上,钉成几本,在各知青点传阅。

《马背上的歌》流传开后,阿巴嘎旗的北京知青刘小阳又将其他旗知青创作的诗一并收集在一起,共80首,编成《扎洛集》(扎洛:蒙古语,青年),其中《马背上的歌》占了主要部分。《扎洛集》是油印的,印数多了,流传的范围就扩大了,它成为内蒙古知青旧体诗歌创作的一次结集。以下是东乌珠穆沁旗知青的几首诗作。

《放马杂记》之二:找马　刘玉平

正是阴历二十八,暮色一降,如蒙黑纱。
饭后急忙穿大哈。
一丘一草将人耍,远看似马,近看没马。
奔波一阵真抓瞎。
找遍山坡找山洼,北风沙沙,马蹄唰唰。
绕山一周又白搭。
主意不定真难拿,本想回家,不甘回家。
催马向南如风刮。
一声马嘶滋啦啦,马蹄飞快,心情更佳。
马勤似飞不用夹。
奔去一看黑压压,马群皆在,心才放下。
持枪防狼待朝霞。
(注:大哈,蒙古语,皮外套。)

《清平乐·冬牧》　施小明

羊归何处?漫漫牛车路。茫茫雪原西去,不知搬家几度。
落日余晖尽收,寒凝大地生愁。遥望毡包新立,恰似海上孤舟。

《虹》(六首选二)　　邢　奇

白日追虹触手空,梦乡再遇却成功,

莫怪青春多异梦,青春色彩有如虹。

半天细雨半晴天,雨后青青草色鲜。
彩虹一架平空出,虹脚落于马脚前。

《晨》　邢　奇

……

晨风清柔沁心灵,草湿地润马蹄轻。
雾气横割三两峰,小花贴地如毯平。
淡青天色鸟未鸣,无声天地更无穷。

邢奇在内蒙古诗群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带动满都宝力格的北京知青共同开创了内蒙古诗群最具代表性的诗风——"打油体",使古典语汇与现代生活语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28]

邢奇的旧体诗脱离了贵族化的文人境界,如:"三碗米茶出牧去,毡靴就手揩羊脂。"(《四季》)"冬夜静读羊粪旺,氤氲暖气淡蓝烟。"(《包中即景》之五)"对趴灯下读经典,共人心中理想国。"(《包中即景》之一)"缘何自找栽跟头,初练完全照小说。"(《骑马》)"谁知对手身躯大,压人肉山动不得。"(《生活小照》之十九)等。天然的现代白话,却处处流露出古诗底蕴,诗句清新、质朴。

内蒙古诗群的打油诗,直接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诗中充满青春活力,洋溢着幽默,"我手写我口",事无巨细、雅俗皆入诗篇。如《草原启示录》(内蒙古知青回忆录)中记述知青联句的情景。过春节知青们在蒙古包中聚会,第一批炸糕出锅,人多糕少,有人提议作"宝塔诗",谁先续上谁吃。大家齐声说:"高!"这个"高"字就作为"宝塔诗"的韵,立刻有人叫出"炸糕",当"宝塔诗"续到第九层,炸糕已经出了第二锅,足够吃上一轮了,而且大家已经满足于宝塔的高度,于是边吃边对"宝塔诗"进行品评。那首宝塔诗是这样的:

糕
炸糕

赶快捞
里嫩外焦
香气往上飘
充满了蒙古包
顿时肚里馋虫闹
馋得我口水往外冒
续不上诗你就吃不到

大量的“打油体”诗就是在这样的唱和之中创造出来的。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邢奇创作出一批既非新体又非旧体,既非生活语又非诗语的“打油诗”。这是因为知青生活中有诗,诗中有生活,生活与诗打成了一片。他用诗的语言来讲述生活,从而使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机趣和诗情,例如他的“生活小景”写生:

《初冬未雪已寒》
初冬未雪已寒,井边饮马艰难。
冰上提桶步蹒跚,井口又小又圆。
忽然一下玩完,失脚要坠深潭。
得勒卡住人空悬,两手乱抓井盘。
(注:得勒,蒙古语,皮袍。)

《油灯半暗》
油灯半暗,小R在扯淡:北新桥里倒铁链,
岳飞真灵出现……
连说带表演,仿佛亲眼见。脚丫飞处一闪,
顿时一片黑暗。

这种打油固然下里巴人,却清纯可爱。诗歌在他们手中变成日常语言,生活语言被升华为诗歌。

以邢奇为代表的内蒙古知青诗人,将诗歌融入生活,将充满了“文人”气息的古典诗歌,变成了“平民”化的诗歌,质朴而不失儒雅。这些诗作洋

溢着人文主义精神,使传统诗歌具有了现代审美格调。

内蒙古诗群的旧体诗与白洋淀诗群的现代诗,在语言形式上、艺术取向上、文化意蕴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是双峰并峙。它们的艺术成就,形成了知青现代主义诗歌和古典诗歌运动的两翼。它们以不同形式的语言,丰富了知青的亚文化体系。

2.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文艺活动

1968—1969年间,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城市的40万知青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由于现役军人的领导建制、连队的准军事化管理,知青的文化生活都在严密的组织管理之下。"文革"意识形态在东北兵团实行了系统贯彻,上至兵团政治部,下至各连队文艺宣传队,逐级形成了一支业余和半脱产的文艺骨干队伍,构成了一个可控性很强的文化艺术网络。上层是师团脱产宣传队,下层是各连队组织的业余文艺演出,两者形成一个可以互补的一体化配置。

兵团全面实行"阶级路线",出身不好的知青不但难以上大学,难以入团,而且到武装排扛枪、到外连劳动也要受到限制。兵团知青王桂萍回忆:在44团的连队里,连长在全连大会上公布全连知青的家庭成分。王的家庭成分被误写为资本家而受到政治歧视。[29]

连队对"阶级教育"常抓不懈。据1团北京知青张杏彦回忆:因为知青吃不饱,城市家中寄来点心、罐头,被连干部扣下来集中在一起开现场批判会,批判知青有忘本思想,要知青们想想万恶的旧社会,想想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知青们被迫上台作检查,表示改造思想的决心。[30]

在东北兵团非组织创作受到严厉禁止。6团17连的北京知青于英华回忆:连队报道组和各排报道员在1970年自办了油印小报《红哨兵》。内容有:故事《修镰刀》,通讯《一尘不染的司务长》,短评《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等,在全营和团里传阅。不久团里派工作组对小报进行调查,没查出问题,仍然将小报查封。显然,小报被禁的原因不在内容,而在于写作的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于英华回忆说:"原来我们想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鸣锣开道,大声呐喊,可现在我们自己却被剥夺了权力,我们也真想冲天呐

喊一声啊!”[31]

这样严峻的政治管理下,兵团知青失去了社会上一般人拥有的自由,在军事集体生活的条件下,甚至没有产生出反映知青自身生活的口头文学,仅有少量歌谣、顺口溜。

(1)基层连队的文艺活动

兵团基层连队的文艺活动,全面贯彻文革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组织化倾向。

黑龙江知青杨琦璋回忆:一次,兵团39团某营集中到3连观看3连文艺演出,“灯,熄灭了,一片寂静,突然,音乐骤起,在一支手电筒的光柱照耀下,一位兵团战士朗诵道:‘巍巍长白山,滚滚黑龙江,兵团战士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 请看——’这时幕布突然拉开,一道光柱照到一本高举的毛主席语录,闪动着红艳艳的颜色;接下,一只女性的手臂,一只弯曲的手臂;一张脸,一张难以辨认的脸,一张被烈火烧伤后结疤痕的脸;接下,光柱在扫描,一顶黄军帽下一位战士露出稀疏的头发,然而,她那一双眼睛十分坚强地向着前方……光柱从一位英雄身上移到另一位身上,台下一双双眼睛随着光柱在移动,英雄们一个个介绍,一个个大喊着震撼人心的豪言壮语……一会儿灯光全亮了,一座‘群像’出现在舞台上,有的高擎语录,有的手指向前方,有的跨步向前,有的……可他们或者五官不全,或者四肢不齐,他们都是不足二十岁的青年呵! 此时此刻,台上台下,滚动着全场数百人的一腔热血。”[32]

兵团53团上海知青蓝蔚青回忆:他所在的知青连队,文娱生活十分贫乏,在“大唱样板戏,学做革命人”的宣传下,连队组织样板戏演出队,用几个月工余时间排练出《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三部样板戏全剧,以及《海港》、《奇袭白虎团》等剧目折子戏,并到兄弟连队演出,受到欢迎。[33]显然娱乐性的文艺活动,必须纳入组织化的轨道才能存在。

(2)师、团一级的文艺活动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团一级,设有专业演出队。团一级宣传队具有演出样板戏全剧,甚至演出芭蕾舞的实力。演出队的成员主要由各大城

市的知青组成。演出节目大多由知青创作,有些节目接近专业水平。

19团上海知青毛佩令回忆:团部组织文艺会演,有三个营的宣传队排演自己编的《白毛女》,于是团首长下令集中全团舞蹈人才搞芭蕾舞《白毛女》。他们成功地排出芭蕾舞《白毛女》全剧,并深入连队进行演出。1971年团宣传队代表兵团参加了沈阳军区文艺会演,1973年参加黑龙江省知识青年文艺会演,他们的演出在当时得到普遍的赞誉。

兵团25团北京知青穆捷华回忆:兵团6师新组建,师长让他出任师宣传队长。他将原连队的北京戏校学生,加上北京化工学校和农业学校的数名文艺宣传骨干调集在一起,组成师宣传队。师长亲自抓诗表演《向抚远荒原进军》等节目,并指示他们要在25团党代会上首演。6师宣传队的组建及创作内容都由师长亲自掌握。[34]

这些例子反映了师、团的知青专业演出队,是在党组织直接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师团一级的文艺演出,在当时已经接近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水准。

(3)兵团的文艺演出活动

兵团内部每年都定期进行大规模会演和调演,各师团宣传队进行演出竞赛,交流创造经验。兵团还参加黑龙江省的文艺调演,向外展示兵团文艺活动的成果。文艺调演成为兵团文艺活动的橱窗。

以1974年黑龙江省上山下乡知青业余文艺会演为例,兵团宣传队在哈尔滨演出了《兵团战士胸怀朝阳》、《兵团女哨兵》(芭蕾)、《边疆的种子》等歌舞节目。兵团各部业余宣传队还演出了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选场和《白毛女》全剧,学唱了样板戏片断,演奏了革命交响乐《沙家浜》,显示出强大的文艺阵容。[35]

为了配合“批林批孔”,兵团宣传队演出了群口词《向孔老二开炮》、相声《炮声轰轰》、诗表演《前进——年轻的兵团战士》等,发挥自编自演,小型多样,机动灵活的特点。其中大部分节目,是他们在深入基层演出时创作的,“充分发挥了业余文艺在宣传党的基本路线,配合政治运动,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战斗作用”。

为我们年轻的兵团战士,
唱一曲光辉的颂歌。
为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
塑造英雄的群像。
……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挟持着批林批孔的风雷,
前进——年轻的兵团战士,
年轻的兵团战士——前进!
——《前进——年轻的兵团战士》诗表演[36]

(4)“三结合”的知青文学创作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主要的文学发表作品园地,是兵团政治部出版的《兵团战报》,在文艺专栏上经常性地发表知青撰写的报告文学、特写、散文和小说、故事、诗歌,以及文艺宣传材料。同时,兵团还通过组织创作班,在三结合创作方法下进行专题创作。这也是当时其他兵团(如兰州、内蒙古、广州、新疆等兵团)通行的创作方法。

1971年黑龙江兵团总部调集各师、团的文艺骨干在兵团机关所在地佳木斯市举办“创作学习班”,由老文艺工作者平青、郑加真、郝伯义等人领导,进行文艺学习和三结合式的创作。这是兵团集中精力、资金,进行新文艺骨干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此后在各级组织关怀下,历年举办类似的文学创作班。由“创作学习班”培养出来的一批创作骨干,成为兵团和东北各文艺报刊的活跃撰稿人。

郭小林曾是兵团创作学习班的学员。他1972年应《兵团战士》报之邀,在兵团报上发表了长达100行的1972年新年献诗《战士爱边疆》。这是反映知青主题的大型作品首次发表,其中透露出一些知青生活的气息,在各连队引起广泛反响,各团、连队的新年文艺演出都大段照搬此诗。同时,这首诗也遭到了许多知青的批评,认为它是分行的社论,充满了八股气。由于“新年献诗”必须全面地体现兵团建设的革命教义,在编审时像审查社论一般严格,所以不可能具有鲜明的个性。[37]

由于1972年新年献诗的成功,在1973年郭小林又被委以写1973年元旦献诗的重任,创作发表长达130行的新年献诗《考验我们吧,时间——和青年战友共祝新年》,这首诗代表着兵团知青诗歌的典型面貌。

是呵,要让一杯茶保持热度,/哪怕半个钟头也十分困难! /但是太阳巨大的光和热,/今天仍然像是几十亿年之前。/因为太阳有宏伟的目标——/要给世界人民以温暖。/……/让我们响亮地大声要求吧,/满怀信心地挺身高喊——/考验我们吧,时间!

——《考验我们吧,时间——和青年战友共祝新年》 1973元旦

兵团政治部门还运用“三结合”的创作方法,组织各级写作力量,创作了一批反映兵团生活的小说、散文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组织创作的短篇小说、散文集《边疆的主人》,集中了当时兵团知青创作的一批作品,它们的文学样式和语言风格,都接近“工农兵故事会”。

这部小说、散文集,突出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再教育的主题。“反映了知青在北大荒的斗争生活”,“从不同侧面塑造了一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边疆主人的知识青年、边疆少年、老军垦战士等的先进形象,热情地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风雪之夜》(崔希贤、方文)讲述,在“文革”中被下放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技术科长兽医魏仁德,为了破坏军马连“九姐妹放牧班”,制造流言蜚语。他用手术刀扎伤小马驹,将其赶进大酱缸,但被知青晓华冒险救出。魏仁德又制造几百匹马惊群,企图借此闯过国境线,在边防军配合下,晓华用套马杆套住了魏仁德。《秀丽的窗花》(刘晏惠)讲述,坏分子贾善良在猪圈中埋下死狼崽,招狼来糟蹋连队的猪群,被养猪班长知青小阎等战士持枪潜伏捉获。《新松挺拔》(陈可雄)讲述,上海女知青余咏豆在批林批孔中,对养猪班饲养员、摘帽坏分子王有财进行批判斗争。《战士的责任》(宋跃良)讲述,女战士宁平领导的机务排青年学马列,同连长的保守思想作斗争,发动群众对其进行批判、帮助。《团长和我的故事》(张为工)、《大学生回连》(胡月伟)、《边疆的主人》(梁晓声)等篇章,塑造了老军垦和知青模范的高大形象。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文学活动，在兵团文艺中具有典型性，它表现出与“文革”社会一体化的面貌，属于被组织化了的“文革”艺术。

3.自觉组织化的知青文学活动

兵团的知青作家在下乡时，怀有垦荒戍边、建设边疆的宏大志愿，支边后他们也想从层层的组织禁锢挣脱出来，把文学当成一条寄托理想、发挥个人才能的道路。他们在各基层连队，都曾进行过艰苦的业余创作，试图从生活底层挣扎出来。但是，这种奋斗的经历，在兵团的组织化环境下，只能是个性被逐步扼杀的过程。成为兵团各师、团的新闻、文学骨干，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组织化的训练，走上组织化的道路。

内地农村知青点的社会环境不同于生产建设兵团，无论在政治、文化上都具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他们既可以采取抵制上山下乡的某些行动，进行民间的写作；也可以遵循“文革”主流社会的指导，接受“三突出”创作原则，争取成为官方认可的知青作家。插队知青在文学创作原则上，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抉择。

在各地乡村插队的热爱文学的知青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有许多人自觉地追随组织化的“文革”文学、迎合主流社会，试图通过在官方报刊、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从而改变在农村种地的命运。

(1)厦门知青的组织化文学

1970年前后，在福建闽西上杭一带插队的厦门知青群体中，出现了一个知青业余文学群体。他们在上杭乡村坚持业余文学创作，起初这种文学创作还是个人化的，但是在“文革”文化机制的约束下，在官方文学思想的引导下，逐渐走上了一条组织化的道路。

厦门知青谢春池带着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抱负，到闽西农村插队。下乡后，谢春池和陈志铭等人很快便在县办的《上山下乡》报上发表诗歌。1971年，县里举办文艺汇演，谢春池认识了步云公社的厦门知青朱家麟、刘瑞光，武平县象洞公社的陈元麟。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探讨文学、交流习作。陈元麟的散文《全凭劳动人民一双手》在《福建日报》

刚恢复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使这个写作圈子兴奋了一阵，此后这个圈子中不断有作品在官方报刊上发表。

从1973—1975年间，古田、步云的厦门知青业余创作圈子的成员陈志铭、陈元麟、朱家麟、林培堂、林祁、刘瑞光、陈恬和谢春池等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诗歌、小说。仅1974年6期的《福建文艺》就发表这个圈子三个人的小说和诗歌。

“文革”后，他们成为福建省、厦门市文艺界的骨干力量，一直活跃于闽西或厦门乃至福建的文坛，他们的小说、散文、诗歌在《福建文学》、《厦门文学》、《羊城晚报》上发表。

在福建上杭地区知青文学活动中，非组织化与组织化的文学实际上是同时并存，甚至相互交叉存在的。谢春池曾谈到他与“朦胧诗”失之交臂的情形。

在70年代初，谢春池在上杭开往龙岩的客车上，通过一个知青读到了舒婷的《寄杭城》：“…… 谁说公路枯寂没有风光，只要你还记得那沙沙的足响……”谢春池说，“读毕，直觉告诉我，一首好诗，但，这种情调的作品显然不合时宜，绝对不能发表。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把那纸片递还给他，尔后，轻轻一声叹息……今天，我当极坦率也极坦诚地说，拥有70年代的我们与领略80年代风骚的舒婷相比，我们十分逊色，而她的艺术才华和生命力是我们所远远不及的。无可避讳我们那时的那么多作品至今还值得一读的已寥寥无几，时间公正且无情地淘汰所有缺乏艺术内蕴的作品。”[38]

(2) 一个插队文学知青走过的道路

自觉组织的文学创作可能是群体性的，也可能是个人性质的。北京知青张国全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了他在山西农村参与业余文学创作的基本动机，以及个人写作被组织化的过程。张国全的个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39]

张国全被分配到山西长胜农村的知青集体户，在那里他“懂得了，能够吃饱肚子就是最高享受了”，当地农民都是吃掺谷糠的窝头，而插队知青享受每年264公斤的口粮待遇，可以有纯玉米面饼吃，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起初知青们还对扎根农村抱有一种热望，“一群食仅可以果腹，衣仅可

以遮体的青年人，凭着一腔热情，也曾试图改变农村的面貌。搞了科学实验，像玉米优种繁育，像点播耧……”后来这些大胆而艰苦的试验都失败了。知青们感到“前途渺茫，看不到希望”。

在严酷的现实而前，张国全开始对“再教育”、“思想改造”进行重新认识。“上大学的愿望，像一支微弱但却不可泯灭的烛光”，在他的潜意识中燃烧。他“独自一人踏上了艰苦而漫长的自学道路”。1971年，张国全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山村的早晨》，并将作品投寄给一家出版社。

1972年，县文化馆准备排演张国全创作的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四幕歌剧《道路》。张国全带着歌剧剧本，住进了县文化馆，进行修改。可是，上级主管部门判了该剧的死刑，理由是剧中主人公是个“中间人物”。1972年5月，张国全回京探家，在京的四个月他创作了独幕剧《新年》，短篇小说《队长》、中篇小说《海燕》，长诗《中国与世界》、叙事长诗《格尔丹》（257行）等。9月底，他离京参加长治地区创作会，并参加在太原举办的省创作会。这其间曾有部队招文艺兵、长治东风钢铁厂、长治铁路局招工消息，张国全像所有北京知青一样，积极争取当兵、进厂，但是1972年冬天传来“冻结”知青招工的消息。

1973年张国全回京住到5月，他在家中把插队生活的经历记下来，共写了40多页，覆以白色封而，称为“白皮回忆录”。5月，听说大学招生又将开始，他动身返回长胜村。这一年招生实行开卷考试，因发生张铁生交白卷事件，平等竞争的希望再次破灭。在这段时间，张国全创作了长诗《大江三部曲》。1973年张国全接到山西省水利学校（中专）录取通知书，离开了长胜农村。此后，他放弃了文学创作。

张国全个案的典型性在于，他曾在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徘徊。他写作了具有独立思维的《白皮回忆录》，他创作的歌剧《道路》犯过写“中间人物”的错误。张国全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曾努力进行符合“文革”官方要求的文学创作，并有过参加官方创作会的经历，如果不是通过上学离开了农村，他很可能会像许多知青作家一样，逐步走上被官方组织化的文学创作道路。

张国全的思想矛盾和生活策略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所处的知青群体的状况很值得注意。张国全在回忆文章中谈到，长胜附近各村知青经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谈到了农村的各种问题，有人甚至谈到“体制改革”。

长胜村周围的一些北京知青曾到全国各地去走串。知青点有“每日音乐会”,有人拉小提琴,有人唱苏联歌曲,有人跳芭蕾舞,有人吟诗。知青点还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曾集体讨论张国全的长篇小说《山村的早晨》。后来文学小组以“常青文”(长胜知青文学)为笔名,进行了一个时期的写作与投稿活动。

长胜知青集体户和周围知青点的活动,似乎也带有主流与非主流社会的双重特点。他们进行非法的文娱活动,讨论体制改革的话题,同时又试图进入主流社会,希望主流社会能够吸纳他们。后来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知青模范,有的还被选拔到县农村办公室和县广播站。值得注意的是,下乡初期的知青模范(尽管他们没有反叛主流社会的胆识和觉悟),大多数在知青群体中具有突出的才华和能力。

显然,长胜村和周围知青点,没有形成独立的知青亚社会村落,他们的一些反社会活动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尚未构成独立的文化体系。这种徘徊型的知青群体,是产生各种形态文学的土壤。

(3) 部分知青作家的自述

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许多知青作家,都曾有过一段被组织化或自觉组织化的经历。《从红卫兵到作家》(梁丽芳)一书,以作家自述的方式,纪录了一批知青作家的成长经历。这些作家在自述中,进行了坦诚的自我反省。这里仅摘编其中的两部分内容:知青作家当时的处境,“组织化”写作的经历。[40]

梁晓声:“那个时候,我只能歌颂雷锋什么的,有时候是出自内心的,有时候不能不那样写,不然发表不出去。”

王小鹰:“忽然有一天,她(编辑)通知我回上海改稿子,她要我加插阶级斗争。我改了,她说不行。我说我不要写了,我不想当作家。那个编辑说,不写很可惜,再加一点,我看你是可以写好的。七改八改,她才通过,这篇东西可算是我的处女作吧。”

郑万隆:“受当时的文艺气候影响是当然的事情。我就往里面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这样,就出不来。”

竹林:“我根据那时‘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来写,写的不完全是虚伪的,

也有些集体的生活素材。但总的来说,是不真实的,也不是我想写的。我写,是为了改变我的处境,希望找到一个工作,能养活自己,这个要求是很低的。后来,我发觉乡下的很多事情,包括我身边的事情,是不能写的。我当时把它们记下来,想以后可能有用。那时我很紧张,很害怕。记来的东西显然不符合宣传的口径,也不符合当时的创作原则,与四人帮宣传的一套完全相反。如果一旦被发现,就很危险。所以,我东藏西藏,有时紧张起来,真的想把它们烧掉算了。"

叶辛:"1974 年全国动员起来'批林批孔',所以出版社叫我加插一些'批林批孔'的内容,因为写知青要有生活,就必定要有当前的生活,当前的生活就是'批林批孔',我对这个很反感。……第一稿改了之后,我回贵州,等他们审稿,审了又改,改了又审,就这么个过程。到了 1976 年,每个人的书里都要讲革命群众和党内'走资派'斗争的故事。"

以上是这些知青作家在"文革"时期的创作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知青作家群体,大多数人都有相同的组织化的经历。

四、城市沙龙中的知青文学

城市沙龙为各地知青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交流、探讨的场所。许多反映知青生活的诗歌、小说都曾在沙龙中宣读和听取意见,并且传抄出去。沙龙所具有的深厚思想背景、文化氛围,对知青文学起到了中继站或集散地的作用,促进了知青文学的发展。

1. 沙龙中的知青诗歌

在 1970—1972 年间,在全国开始广泛流传各种知青的手抄诗作,这些

诗歌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倾向,记录了这几年间,知青思想发展的历程。

(1)北京沙龙的知青诗歌《决裂,前进》

1970年,在全国广泛流传一首佚名长诗《决裂,前进》(王靖)。《决裂,前进》首先从北京沙龙中传出,后来在北京、西安、广州、上海等地流传。该诗集中反映了下乡初期,知青中“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思想冲突。

1970年初,知青“大走串”活动的高潮时期,王靖和几个同学结伴骑自行车,由北京出发到山西、陕西等地的农村进行走串。他们在陕西农村插队的同学处住了几个月,种地、读书、写诗。在乡村,王靖看到了乌托邦式的知青集体户生活,回到北京后又看到了北京冰场上一些骑锰钢车、戴皮帽、拍婆子的颓废青年。在这种情况下,王靖以红卫兵友人沈自由为原型写了政治讽刺长诗《决裂,前进》。沈自由是北京13中高一学生,干部子弟,“红卫兵组歌”合唱的指挥,红卫兵运动结束后,革命意志开始衰退。沈是类似叶甫盖尼·奥涅金式的才子,当时围着他转的女孩子不少。王靖不满意沈自由的生活态度,便在长诗的第一部分(决裂),以论战的方式进行了讽刺批判。[41]

《决裂,前进》长700行。诗的前半部分的主题是“决裂”。一个从农村归来的知青,与一个堕落了的城市知青进行严肃对话。一方是“扎根派”,提出应“离开京都繁华的霓虹灯/到艰苦的地方/开发/生存/斗争!”另一方是“颓废派”吹嘘“在典雅的沙发客厅里”,“高兴的带着满身酒精/烟草和风情/而不像穷光蛋一样/投入到它骷髅消度的泥坑”。诗中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你爱祖国吗?”“我爱世界!”“你愿继往开来,继承先辈开创的事业吗?”“我只看到先辈如今的下场!”“你爱我们这新兴的时代吗?”“我只爱翻开历史的沉浮已往。”“你还准备革命吗?”“我只渴望战争血淋淋的疯狂!”“你需要什么?”“工人的工资,农民的自由,学生的生活,小布尔乔亚的思想。”

作者看到了“旧世界的破落子弟”,“阴暗的角落里滋长——/鸡尾酒/西洋装束/外国音乐/东欧鬼影”,“刘氏所遗留的怪胎/在凶狠的眼中闪烁着仇恨光芒”,都是对当时城市沙龙生活的写照。以下是被广为流传的段落。“颓废派”洋洋得意地说:

这开司米的围巾
能帮我风流高昂
这雪花呢的爵士服
我剪掉了可爱的燕尾
让它在我中式外套的领口中
露出高贵的条纹
五寸裤腿的线条
表示我正当妙龄
虽然在冬天
可这高雅的裤线
熨得像刀刃一样
它使我在人流中“所向无敌”无人敌挡
鞋,你看!
它尖
它扁
它翘
它亮
又是十二万分的“OK”
谁能模仿?

“颓废派”毫不在乎地介绍了一套杨朱式的生活哲学后,宣称“不管我现在的生活/或者进入苦闷的铁窗/还是在罪恶中死去/我都将是丑恶的——/但却是自由自在的/快乐无穷的/———一只大苍蝇!”诗作者惊呼:“三年中/这一代青年的行止/多么令人毛骨悚然,触目惊心!”

在长诗后半部“前进”中,诗作者抒发了红卫兵永远前进的革命壮志,“血染三洋水/尸埋五洲山”,“踏平白宫顶/重点列宁灯”,“我们要高举红旗/永远革命/做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红卫兵团/一名忠实无悔的/——红卫兵!/红!红!红!”

(2)上海沙龙中的知青诗歌《生活三步曲》

1972年,佚名诗作《生活三步曲》在上海、南京等地流传。该诗反映了上山下乡后期,知青中普遍的怀疑和动摇情绪,在知青中产生了共鸣。

该诗由上海小东楼沙龙成员杨东平所作,原名《第二步》,曾在小东楼沙龙中朗读。《第二步》由沙龙传出后,有人补写了另外两首诗,与《第二步》合并在一起,命名为《生活三步曲》一同传抄。[42]

为首诗记述了杨东平返城探家后,离别上海重返东北农村时的内心思绪。整首诗像是一篇内心独白,浸透着一种感伤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在广大知青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作者在诗中流露出对家乡、城市很深的眷恋。"再见了,我们的乐土/温情、友谊。/淋漓的谈吐,女孩子的歌声和笑声,/诗和爱的浪潮"。作者一方面宣称"我们不去幻想那美丽富饶的将来/——汽车、住宅/面包、牛奶/那是资产阶级的丑恶变态",一方面则难以抑制内心泛起的忧伤和迷惘:"生活对于我们/永远是一个谜/也不知谁/驾驭着我们的命运……/啊,不!/在这庄严的时刻,/想这些多么不该,/难道现在还能犹豫?" 在这首诗中充满了矛盾和忧伤的诗句:

> 窗外的景色明了又暗,
> 车内的灯光暗了又明。
> 脚上,沾着故乡的泥土,
> 明月,照亮了八千里夜路……

最后,当作者重新踏上东北大地,四周一片冰天雪地,"零下三十度的空气/像浓烟、像烈酒",他"身边是黑衣服的老乡和绿军装的同行",严酷的现实又横置在他面前:

> 这就是我"动荡的远方"
> 家乡,战场。
> 我又要在这块土地上

呼吸，成长……
我固执地搜索前方，
和那看不见的力量……
新的一年躺在眼前，
凛冽而又坚强。
大地不语
白雪茫茫
……

这是一首充满了忧伤、迷惘的长诗。真实地反映出知青在扎根农村过程中的动摇和怀疑。它使我们体会到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经历的漫长、曲折、痛苦的心路历程。

2. 沙龙中的知青散文、小说

在1970年前后，北京沙龙中，有不少知青的习作交流、传阅。郑义（郑光召）当时比较活跃，他的散文和小说，曾在北京沙龙中流传。

1970年前后，郑义和仲维光等人结伴在内蒙古、东北大兴安岭流浪，以做木匠为生。郑义在流浪中写下了系列札记《兴安行》、《阿荣行》、《海山行》。札记采用日记体，每段标有月日，用小字写在白报纸上，都是流浪中的原始记录，记述了在路上的思想情感体验。全文约有3—4万字。“三行”曾在北京沙龙里传阅。[43]

我的双足踏在阿荣缓坦起伏的无边沃野上，一个一个的山冈被我抛在身后。我一步不歇地走着，雨后的泥泞，草甸的积水，使我感到分外费力，鞋上粘满了稀泥，抬腿都费力，但是我仍然一步不歇地走着。……我燃起了蓝色的“仙鹤”，淡淡的烟雾缭绕在我眼前，辛辣的烟草味使我忆起最近一年来思想上的彷徨。多么长久了！——在辽阔的思想疆域中我狂放不羁的灵魂在辛苦追寻。绝对，永恒，像海市蜃楼一样在我眼前诱引着我饥

渴的灵魂挣扎前行。每当我似乎可以伸手能摸到的时候，它就悄然幻灭了。似是而非的感觉不断在欺骗我，使我觉得我正在不断接近它，追寻着它，摸索着它，它把我引入一片漫无人迹的荒漠。这里没有泉水，没有林荫，没有旅伴，没有安宁。孤独的痛苦，迷途的痛苦，灵魂饥渴的痛苦，纷扰不宁的痛苦，绝望的痛苦从四面八方向我逼来。永恒显现给我的一线天光有时被无边的黑暗挡尽，依稀可见的小径有时为荒沙掩埋。如果没有先哲们的幽灵引导着我，在我耳边轻语着智慧的言辞，我早就因绝对的空虚而无望地倒下了！……我不怕会沉沦到虚无的深渊中去不可挽回。如果信仰真正具有力量，那真理的阳光终将溶化涅(槃)的冰雾，使我重获生命，重获信仰；如果信仰是迷信，那我就不珍惜这被骗的无为的生命，那就让我沉沦下去吧！

——《海山行》 郑义[44]

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郑义 1971)讲叙，一对知青兄妹因父母受政治迫害被赶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他们获知父亲从监狱放出来了，就在冬天偷偷爬上货车返回北京。这辆货车连续开了几天，半路上没有停车，车到北京后，人们发现这对兄妹已经冻死了。

郑义在小说中，不敢使用中国地名，将北京改为莫斯科，把北大荒改为西伯利亚，改后还不放心，在故事末尾加上一个注脚：翻译自《伏尔加日报》。郑义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日报"，"又用了一个假名字"把小说给朋友看，"他们都很感动"。[45]

这篇小说与 1970 年冬天在北京流传的手抄小说《逃亡》在情节上相同，不知是郑的小说受到了《逃亡》的启发，还是郑的小说出现了不同的手抄版本。

《逃亡》讲述，东北插队的几个知青扒车返城，爬入拉煤车的空车厢，几个人在寒风中各自进入回忆，每人都有一段辛酸而又令人留恋的往事。小说结尾，在东北某一小站，人们发现了车厢中几个冻僵的知青尸体。他们抱在一起，在梦中一去不返，脸上还浮现着微笑。小说运用几个知青的回忆，反映了"文革"中不同的生活侧面。小说真实、朴素地描述了知青在现实生活中的悲惨命运。

3.徐浩渊沙龙与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

(1)沙龙文学的现代主义开端

在"九大"到"九一三事件"爆发前,"文革"社会正处于最鼎盛的阶段。就在这一时期,在徐浩渊的沙龙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诗作,它们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

徐浩渊在这一时期写有:《海岸·贝壳·少年》、《如果我能够》、《给自己》、《给我的好立》、《给依群》、《一颗星星在升起》,它们大多数是一些爱情诗篇。在这些诗中,徐浩渊流露出炽烈的情感和深刻的痛苦。[46]

不,不是我不愿意
做一条
为你歌唱的小溪
捧起她来喝
当你在艰难的旅途上
感到倦意
不,那不是我
我,
是一条永无休止的大江
一路上
为所有勤劳者歌唱
灌溉绿野
推动水车的轮桨
和满载的船儿赛跑
打湿洗衣姑娘的衣裳
叫着,笑着
奔向那
太阳升起的地方

——《给我的好立》 徐浩渊

王好立在《我站在轮船的左舷》中流露出一种忧伤的情绪。王好立回忆说,诗中采用"左舷"一词,是对自己以往左倾立场的反省。

我站在轮船的左舷
激溅的浪花湿透我的衣衫
我咬着嘴角的海水
又苦、又咸
我去听
海水颤栗着、撞击着
从海底涌起
我面对大海
海面倾斜,倾斜……
想要翻过来!
——冲击我胸膛的波涛
把心房的鼓点敲起来,敲起来吧!
涨满我血管的水潮
把生命的朝霞托起来,托起来吧!
吞没岁月的海洋啊
把我的万亿同胞
一代一代还回来!
……我感到眩晕
我在哪里?
……啊,
手里握着的是左舷的栏杆
脚下踩着的是左舷的甲板
我站在轮船的左舷
倾斜吧,摇晃吧,颠簸吧,飘荡吧
——伴着地球
在宇宙中飘浮的小船

——《我站在轮船的左舷》 王好立 1971.3.24[47]

由于沙龙中的人们,已经超越"文革"社会的思想意识,强烈的孤立感觉使徐浩渊、王好立、依群等人感到绝望。在当时,他们写了一些相互的赠诗。在《给依群》中徐浩渊写道:"谁说用眼泪相识/我们就只能依偎着悲鸣/绝不,我绝不相信!/谁说我们面前没有道路/不是隐约看到了吗?/一条通向不知何方的小径。"但是她仍然悲哀地说:"只是,为你送行的礼品/不是一只幽香的红苹果/双手捧出这颗破碎的心。"[48]

下面这首诗,依群似乎在向徐浩渊道别,已经暗示出他将脱离沙龙。

大雨中有两只小鸟
在坍塌的基石下相逢
它们互相梳理羽毛
准备再飞上阴暗的天空
我们用吻来相识
不想开始
也不想结束
我们不考验,不赞美
不期待,也不追求
避开风雨,也避开爱
想避开一切——如果能够
期望得太多
就再也不能专注
水能凝成冰
也容易消溶
何况我们都知道那些:
没有微笑的港湾
没有泉水的长途
即使小船上多了一副桨
大海却没有尽头
让我们依偎

像那对打湿翅膀的小鸟
谁愿意飞走
就祝他飞得高些
——我只想一件事:
当我们分别的时候
干枯的脸颊上会不会有
眼泪在流

——《给你》 依群 1971.3.14[49]

徐浩渊沙龙中的一个重要成员是谭小春,他在1971年初创作的一些诗篇,已开始具有现代主义的味道。谭小春是沙龙绘画的积极分子,在下面这首诗中,有一种印象派绘画的眼光。

鲜红的头巾
在拖拉机印过的路上飘
这条路啊
深远又宽阔
我的姑娘
越来越走近……
深秋的天空凝固了
在拖拉机印过的路上

——《在拖拉机印过的路上》 谭小春
1971.8.17[50]

沙龙中最初的现代诗作,并不是来自现代情感的冲动,而是源于对传统思想情感的愤怒。

1971年官方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隆重活动,引起了当时正在白洋淀插队的"二流社"的成员孙康的注意。下乡后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孙康便动手写了一首长达百行以上的长篇政论诗《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诗歌从巴黎公社失败写起,描写了社员墙,回顾了国际歌的诞生,怀念欧仁·鲍狄埃,放眼国际风云、再转回到中国的

现实,反修防修的重任。诗歌中流露出对红卫兵运动的深切怀念,依然采取了“文革”的政治视角。

美丽的夕照浸着奴隶的血滴,
骄傲地逝去了,
黄昏包围着拉雪兹
——这最后的巴黎。
终于在仁慈的硝烟中
升起了梯也尔无耻的旗。
啊! 拉雪兹——不朽的巴黎,
不错,枪声从这里沉寂
诗篇断了——
但这仅仅是序曲。
在这伟大的前奏之后,
悲壮的交响乐
将穿越一个世纪。
啊! 拉雪兹——革命的巴黎
你是暴风,是闪电,
虽然终于消失在黑暗里。
但这就够了! 够了! 够了!
你划时代的一闪,
开辟了整个一个世纪,
啊! 拉雪兹——高贵的巴黎
歌手沉睡在你的深底。
一个世纪过去了,
满腔热血化成了五月的鲜花,
开在黄的、黑的、白的国度里。
今天,傍晚又降临了,
巴黎揭去了金色的王冠,
塞纳河洒满素色的花环,
在拉雪兹——树林荫蔽的小径上

徐徐升起了
那悲壮的歌曲: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
巴黎公社100周年》 孙康 1971[51]

孙康的诗作流传到徐浩渊沙龙,也带来了人们对这首诗的一片赞誉之声。这一切引起了依群的不满,他对在上山下乡之后依然唱文革老调子,十分不满。他针对性地写了《纪念巴黎公社》,以一种论战的姿态,对陈词滥调予以猛击。

奴隶的枪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一个世纪落在棺盖上
像纷纷落下的泥土
巴黎,我的圣巴黎
你像血滴,像花瓣
贴在地球蓝色的额头
黎明死了
在血泊中留下早霞
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
而是为了常青的无花果树
为了永存的爱情
向戴金冠的骑士
举起孤独的剑
——《纪念巴黎公社》 依群 1971[52]

依群诗作的重要意义不在叛逆性的内容,而在于运用了现代主义的形式。这种形式本身体现出了对“文革”政治、意识形态更激烈的愤怒。“巴黎公社”显然是“红卫兵运动”的代名,如果说“黎明死了”、“戴金冠的骑士”这些符号还涉及“文革”政治的层面,那么“你不是为了明天的面包”,是“为了永存的爱情”而“举起孤独的剑”,这里包含的艺术、个人主义的意味

已经完成了对“文革”话语的超越。这些诗行中,已经透出了知青精神家园和知青亚社会建立的一线曙光。

多多评价依群的诗,说:依群更重意象,受到欧洲的影响,语言比郭路生更凝练。多多说,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

依群的诗作促进了沙龙诗歌的现代主义转向,影响了一批沙龙诗人。此后,沙龙诗歌开始了现代主义的一系列大胆试步。

沙龙现代诗欧的出现表明,权威政治和文化专制,最终也未能实现“文革”文学的大一统。“文革”的封建文化专制,反而催生出了文化艺术的多元化格局。在“文革”最黑暗时期(1969—1971),知青集团创造出了属于自身的新文学。在1971年之后,一个新的精神家园逐渐显现出雏形。

注 释:

[1]郑谦:《“斗、批、改”运动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 《中共党史讲义》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1983.12。

[2]文化部批判组:《评三突出》 《人民日报》1977.5.18。

[3]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1。

[4]在1968年底,大学已积压了六六届至七〇届,共67.4万大学生。革委会建立较早的黑龙江省在1968年春,已派遣全省18所高校的7000多名毕业生,80%以上分到县以下农村(包括农林牧场)。毛泽东对黑龙江省《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作了批示,由中央转发全国。中央还先后下发了几个有关大专生分配的文件,要求实行“四个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到1970年夏,120万大、中专毕业生基本分配完毕,多数被下放到农村、边疆。他们虽然身为农民,却仍然享有国家干部的待遇,带着工资(月薪56元)种地,身份十分特殊。此后几年,这些大学生先后调离农村,多数分配在城镇和工矿。(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广

东教育出版社 1997.7)

由于大学生的独特身份,下乡时又被集体管理,所以无法形成像中学知青那样的亚文化群落。从目前搜集的资料看,只有个别大学生(如金观涛)在当时进行了民间性的文学写作。

[5]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知青英雄金训华,深受"文革"意识形态影响,他的日记摘抄中充满"无限忠于毛主席!""生为毛主席而战斗,死为毛主席而献身"的誓言。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我双河大队阶级敌人的气焰还很嚣张。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就是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斗争,首先就是参加阶级斗争。"他在农村插队的77天里,积极参与了对"每时每刻都在梦想反攻倒算"的"牛鬼蛇神"的斗争、批判。刘小萌指出:在金训华的身上闪耀着那个时代青年人引以自豪的优点:对集体利益的关注,勇于实践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也集中反映了极左思潮熏陶下造成的政治上的愚昧无知。

本小节内容主要引自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

[6]周恩来听了延安插队知青周秉和(周恩来的侄子)、何立群的汇报,引起他对知青问题的重视。《回首黄土地》(孙立哲主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1。

[7]本节材料在采访中由杜家福、王文江、王好立、郭新生、邹平生、杨东平、刘林等人提供。

[8]邢奇:《彬痞大战》《老知青聊斋》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4.6 同类事件,如1970年夏天,陕西郝源村北京47中知青与平道村的北京知青发生械斗。(刘克京:《自我教育》《回首黄土地》 沈阳出版社 1992)

[9]由王好立提供。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 1953—1968》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1。

[10]《奋斗》受到北京有关部门查询,认为是思想反动刊物,在1970年初被迫停办。见《〈奋斗〉始末》(宋庆光)《老插话当

年》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4.4。

[11]《任重而道远》(油印、复写刊物)第二期。

[12]《任重而道远》(油印)第三期。

[13]同[11]。

[14]《任重而道远》(油印)第八期。

[15]见陈小雅的文章。《海南纪实》 1989。

[16]《任重而道远》第九期、《广阔天地》五期合刊(油印本) 1970.4。

徐浩鸳即徐浩渊,曾到陕西农村考察,写有《陕西农村考察报告》。当时传说徐浩渊装成乞丐在乡村进行考察,实际上徐浩渊只是在衣着上进行了一些改变,以便于接近农民。

赵全星即赵京兴,北京4中初三学生,1968年写有《哲学批判》,作为生日礼物送女友,女友油印成册,分赠好友,1969年因《哲学批判》一文和"破坏上山下乡"而入狱。参见丁东《寻访失踪的思想者》《东方艺术》1997.1。

[17]同[16]。

[18]同[16]。

[19]方兢在《依稀知青梦》中回忆说:当时我们从内心不愿意离开北京,这时已有同学去了北大荒兵团,有的去内蒙古、山西插队,从他们的来信中,我们知道兵团物质生活好,紧张、劳累,管理严格,插队则恰恰相反。当时正动员去陕北,也传说后面马上有去东北的,于是有人总结说:"去陕北还是去东北,要自由还是要馒头?"我们都觉得自由比馒头更重要,我至今还庆幸那时没有选择馒头。(见《情系黄土地——北京知青与陕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6.1)

[20]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为例,云南兵团1师5团政治处在1971年1月,主办宣传骨干学习班,吸收各营业余报道员39人,在学习"先进报道单位"沈阳军区经验的基础上,对本团的宣传报道工作进行了总结,由政治部主任负责成立了5人专题报道组,健全了团一级通讯报道网。政治部还要求各营迅速举办小说创作学习班,鼓励工农兵杀上文艺舞台。据云南兵

团1973年的统计，兵团组建三年中曾派出宣传队2379人次，有的宣传队提出让每个贫下中农看到我们的演出。宣传队每次在广场演出后还化整为零到各户演出。(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1]《草原启示录》 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7。

[22]马波(老鬼)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批斗和关押，仍然坚持地下创作，写出了长篇小说《八年》(《血色黄昏》的草稿)马波的例子从反面证明，个人创作活动在生产建设兵团不可能普遍存在。

[23]参见纪实文学《羊油灯》(逍遥)第四章：兵团接管了牧场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24]由邢奇、李南提供。

[25]同[21]。

[26]同[21]。

[27]同[21]。

[28]《华年》(邢奇诗选) 群言出版社1997。

[29]《北大荒风云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7。

[30]同[29]。

[31]同[29]。

[32]同[29]。

[33]东北兵团连队文化生活十分单调贫乏。33团北京知青毕小元回忆：从北京寄到连队的"文革"时期出版的书籍《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艳阳天》，也成为"看外国小说和黄色小说"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受到批判。娱乐活动受到严格管理。23团上海知青刘新建回忆：连队知青夜晚在宿舍唱《南京之歌》，被作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春播"进行追查和开会批判。某连知青王大闻探家，将手抄本《一只绣花鞋》、《第二次握手》带回连队，讲给知青们听。团宣传股、保卫股下连调查，全连召开批判王大闻的大会。王大闻被监督劳动。(见《北大荒风云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7)

[34]同[29]。

[35]李冰牧:《广阔天地,广阔的舞台——黑龙江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业余文艺会演大会侧记》《黑龙江文艺》 1974.7。

[36]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战士别闽生、哈尔滨师范学院工农兵学员倪峭丹:《理想的鲜花开在人民中间——喜看诗表演〈前进——年轻的兵团战士〉》《黑龙江文艺》1974.7。

[37]《"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朝华出版社 1993.1。

[38]谢喜池:《山魂与海魂——谨以此文献给插队闽西的厦门知青作家群》《我知道,我是一个永远的知青》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12。

[39]王国全:《漳水寒》《老插话当年》(智清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4.4。

[40]梁晓声,哈尔滨知青,在东北兵团支边。由于给《兵团战士报》写稿,被调到营部当宣传员。

王小鹰,上海知青,在黄山茶场插队,在小分队写对口词、唱词、小歌剧。出版社编辑到农场组稿,从此开始写作。

郑万隆,北京知青,1975年完成了长篇小说《流水弯弯》,小说中写了阶级斗争,并批判了刘少奇的"三自一包"。

竹林,上海知青,到安徽凤翔县插队六年。曾三次被提名上大学,都因"出身不好"被拒之门外。

叶辛,上海知青,初中即开始学习写作,到贵州插队,干了一年却连自己也养活不了。写了小说《喜耕》后,出版社要求加入阶级斗争内容,被叶辛拒绝。为了逃避写阶级斗争,他曾改写儿童故事。(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 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3)

[41]这首诗最先在北京47中红卫兵组织"红红红"中流传。诗最后一句"红!红!红!"为该组织成员在传抄时所加。(由王靖提供)

[42]这段材料采访自杨东平。

[43]由宋海泉、仲维光等人提供。参阅《永恒的流浪——郑义自传》《作家》1988.5。

[44]《永恒的流浪——郑义自传》《作家》1988.5。
[45]这篇小说1979年登在《花城》创刊号,改名《凝结的微笑》,公开发表。(《永恒的流浪——郑义自传》《作家》1988.5)
[46]由杨东平提供。
[47]由王好立提供。
[48]由杨东平提供。
[49]原赵一凡搜集,由鄂复明提供。
[50]由杨东平提供。
[51]由肖红(化名)提供。
[52]《今天》(油印本)第三期。

第六章

“文革”上山下乡运动中期的知青文学（1971.9—1974.1）

一、上山下乡运动中期知青文学的历史背景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巨大震动。1971年12月中共中央专案组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周恩来开始有计划地纠正“文化革命”的错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放干部，反经济冒进。“文革”运动进入低谷，社会上开始涌动全民思想解放的文化潜流。

在1972年底，随着当权者们系统地抵制“文革”极左路线，毛泽东对否定“文革”的回潮产生了警惕。1973年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明确指出，“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否定“文革”的全面回潮，在1973年逐渐趋于停滞。1974年1月，毛泽东批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江青借机大批“周公”、“宰相儒”，树立“反潮流”的典型，回潮的势头受到了全面的遏制。[1]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打击，身体状况急速恶化。[2] 随着毛泽东的病重，权力继承问题日益紧迫起来。毛泽东的身体状态促使江青等人加紧了对继承权的争夺。这样在1971—1974年间，政局由对峙的局面，开始逐步向当权者——绝对权威——江青一伙鼎立的历史时期过渡。

“文革”运动进入低谷，全民的思想解放暗流，为知青沙龙以及知青在

乡村中的亚文化群落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推动了知青沙龙文学和民间诗群落的发展。

这一时期,随着权力文学的转型,权威文学向后权威文学的蜕变,一种新的文化格局开始形成。不同政治集团的文学叙述方式,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都对知青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在上山下乡中期,这种影响还不明显,到了上山下乡的后期,随着“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这种影响日渐突出,直接干预和引导了知青文学的发展。

1. 重新开放的新文艺政策

在“九大”至“十大”期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长年进行文艺大批判,除了对样板戏和毛泽东诗词之外,从未正面开展过文艺评论,也未肯定过任何文学作品。文化艺术的全面禁锢局面持续了近五年,整个出版界几乎全部冻结。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展开,新文艺政策开始得到实施。《人民日报》12月16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希望更多的好作品出世。”并发表短评《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号召文艺工作者积极参与创作。

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部分作家的作品被解放。郭沫若的文学评论专集《李白与杜甫》出版,诗人张永枚、李学鳌、李瑛、贺敬之的诗集,重新编选再版。小说《高玉宝》也出了修订本。这一年还出版了李云德、黎汝清、浩然等专业作家创作的一批中、长篇小说。

1971年后,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1年联大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我国成为其常任理事国。仅1971—1972年间共有32个国家与我国建交,世界向中国打开了大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文化交流作为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对等地开放。1972年后,我国的艺术代表团开始出访北美等国家,同时西方音乐团体开始个别来华,如英国的爱乐乐团、美国的费城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演出,在国内大城市引起了强烈反响。

根据周恩来恢复对外文化交流的指示,《文艺译丛》于1973年创刊,译

介了美、日、苏的短剧、电影等作品。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摘译:外国文艺》(内部资料),批判性地译介了苏、日电影剧本等文学作品。与此同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上海新闻出版社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等单位组织翻译了一批苏联长篇小说,供党内高级干部和文艺部门参考,其中有揭露苏联阴暗面的小说《多雪的冬天》、《落角》,批判苏联人性论的《白轮船》,以及日本电影剧本《沙器》等。除文学作品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社科著作和译文杂志,如《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内部资料)、《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日记》、《英法德俄历史 1830—1917》、《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等。据统计 1971—1976 年间共翻译外文图书上千种。这批译作均属于内部读物,通过内部书店发行。这批内部出版物迅速在全社会流传开来,为民间提供了宝贵的世界信息和文化资源。

2. 当权文学的回潮

从"批林整风"到"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是当权文学全面回潮的时期。大批文艺工作者从五七干校陆续回到文艺工作岗位。权力文学创作主体的重新回归,意味着新权力文学的产生。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反映"文革"现实生活的作品,试图对"文革"运动进行拨乱反正,其创作者多为受到"文革"运动强烈冲击的地方作家。由于"文革"政治运动对当权文学的批判和整肃,军队作家大多选择"革命战争"题材和"反特"题材进行创作,试图回避和消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两方面的作品构成了当权艺术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独特形态。

这一时期权力文学的内容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革"前的作品,如花鼓戏《还牛》、晋剧《三上桃峰》等,只是稍加修改重新搬上舞台。第二类是用当权政治观念来反映"文革"现实生活的作品,如短篇小说《生命》、《牧笛》和湘剧《园丁之歌》。第三类为反特文学、革命战争小说和具有中性主题(如拥军爱民、三大革命实践)的作品。第一、二类作品,在 1974 年批判"文艺黑线回潮"中,不同程度地受到批判。

(1)反映"文革"现实生活的小说

短篇小说《生命》(敬信)发表在沈阳市《工农兵文艺》1972年第1期。小说反映1967年2月末,上海"一月风暴"吹到"向阳村",四清下台干部崔德利自称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打起造反旗号,勾结地主分子,蒙蔽部分群众和下乡知青,夺了大队的权。党支部委员老铁头串联贫下中农组成"卫东"战斗队,在县武装部支持下进行反夺权,使"向阳村"恢复到"文革"运动前的正常局面。

"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江青集团在辽宁的亲信,下令全省各条战线批判小说《生命》,批判风潮遍及全国。文章批判《生命》恶毒歪曲"一月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一株包藏反革命复辟祸心的大毒草",是"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艺术再现。有的文章指出:"《生命》宣传、维护和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某些旧秩序",反映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人们颂古怀旧的心理"。[3]

(2)反特文学、革命战争小说

军队是"文革"运动的"轻灾区",并且军队权力仍掌握在权力集团手中,所以军队作家和军队文艺系统成为了权力文学回潮的创作主力。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经历了"文革"运动惨痛教训的权力集团,对"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学说有所反省,开始自觉地进行抵制,将矛盾冲突集中在对外部敌人而不是内部敌人的斗争,集中在对死老虎(地、富、反、坏、右)而不是活老虎(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的斗争,集中在境外斗争而不是国内斗争。

在1972—1974年前后,反特文学大行其道。这些反特文学不再像20世纪60年代初的作品(如戏曲《夺印》、小说《风雷》),针对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而是转向对境外国民党、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如《霞岛》(周肖)、《海岛女民兵》(黎汝清)等。

革命战争题材也成为权力文学重要的创作资源。对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战争的歌颂,无异于对当权集团的歌颂。这些作品成功地避开了1974年前后"批林批孔"运动的批判,产生出一批具有社会影响的长篇小说,其

中较突出的有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第一部)、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郭澄清的《大刀记》、郑直的《激战无名川》等。

当权文学在经历了"文革"历史性冲击之后,已经滋生出一种自我沿革的内在需求。发展反特、边海防题材和革命战争题材的写作,消解阶级斗争与回避路线斗争,是一种话语策略,它成为新时期权力话语沿革的先兆。这一时期的革命战争长篇小说,如《万山红遍》、《昨天的战争》成为权力话语的新经典文本,它们是新权力文学的雏形。

3. 绝对权威文学的蜕变

江青集团在毛泽东患病进入半退隐时期开始逐步形成,出于政治需要,开始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江青集团同当权者的斗争,是推动绝对权威文学蜕变的根本动力。1972—1974年初,短短两年多,上海迅速成为后权威文学的生产基地。

"阶级斗争"理论是"文革"的理论基石,"路线斗争"理论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为了攻击当权者集团,江青集团的阴谋文学不断发展、丰富"路线斗争"的内容,"路线斗争"在其叙事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逐步取代"阶级斗争"上升到主要地位,最后形成了以"路线斗争"为特色的阴谋文学。

江青集团的阴谋文学的形成,经过了大致三个阶段:初期(1971—1972年),中期(1973—1974年),后期(1974—1976年)。在初期,后权威文学的主要内容是歌颂"文革"社会新制度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进入中期,在中共"十大"前夕,随着权力继承问题日益紧迫,江青集团开始组织歌颂本集团光辉形象的作品,内容集中表现"文革"政治运动,书写上海工人造反派革命造反史。到了后期,江青集团以文艺为武器,配合"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矛头直指"还在走的走资派"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

(1)形成初期(1971—1972年)

1972年出版工作恢复后,上海工厂、企事业和机关部门都组织、配备了"三结合"业余文艺创作班子,它们成为文艺创作的基层组织。各单位有计

划地举办各种类型的创作学习班，培养工农兵业余文学创作骨干。[4] 上海出版界经过 1972—1973 年的组织建设和政策调整，迅速成为阴谋文学创作的中心。此后一系列的阴谋文学作品，在这里被组织生产出来。

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是阴谋文学形成初期的代表性作品。在上海市委写作组插手下，由土记者、基层干部和编辑组成"三结合"创作组集体创作。小说按照政治需要设置主题，安排人物关系，调动素材，评价人物。这种"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可以说是阴谋文学的典型样板。该书出版于 1972 年 2 月，发行量达百余万册。张春桥、姚文元"批示"，下令推广此类"三结合"创作方式。《文汇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章吹捧它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壮丽画卷"，是"农村路线教育的好教材"。[5]

(2)形成中期(1973—1974 年)

《朝霞》丛刊在 1973 年出版后，立即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成为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政治斗争的风向标。"十大"召开前夕，张春桥召集在上海的亲信开会，指示《朝霞》要组织反映"文革"运动的作品，歌颂"四人帮"，为其在"十大"抢班夺权造舆论。张春桥说："没有勇敢的人闯出一条路子来，'文化大革命'始终没有人敢写。"于是，丛刊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出了一批反映"文革"运动的作品。

《朝霞》丛刊在 1973 年发表了三篇反映"文革"运动的小说。《初春的早晨》被说成是"描绘了'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壮丽历史画卷"，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郭于坤"。小说直接为王洪文树碑立传，替张春桥歌功颂德。《第一课》(谷雨)为姚文元树碑立传，把工宣队员学习姚文元的文章当成上了"真正的第一课"，将姚文元吹捧成"导师"。《金钟长鸣》(立夏)塑造了一个没有个人品质错误，勤勤恳恳的"走资派"，提醒人们注意与走资派的斗争还在继续。这三篇小说发表后，被誉为"老三篇"式的"经典作品"，得到江青集团的欣赏。

《朝霞》丛刊的所有小说，清一色都是用"故事会"的"工农兵语言"写成，语言毫无特色，所有小说如出一人之手。这种贫乏、庸俗的语言叙述，

代表着阴谋文学的典型文体。

4.上山下乡运动的中期——走向低谷

上山下乡运动在1971年之后,遇到了巨大阻力,困难重重,开始全面滑坡。暴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领导不得力,经费流失,知青生活困难,迫害现象严重,少数人走向堕落,非正常死伤较多,血统论肆虐及“走后门”成风。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落潮,有些地方开始削减相关的机构和人员。如浙江省相关人员216人,比“文革”前减少一半以上。全省多数地、县只有一二名专职干部。河北全省60%的县,只有一人管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保定地区1970年前做知青工作的干部89人,到了1973年6月只剩下58人。

1970年起,国家有关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加强经费管理,但是缺乏措施保证和监督手段,贪污盗窃经费现象在全国普遍出现,经费大量流失。1973年7月国务院知青办《知识青年下乡经费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披露,仅吉林省5个地区,就查出贪污案件1761起,其中白城地区数年中被贪污盗窃安置经费15.6万元,木材399立方米。

根据国务院知青办《下乡插队知青生活自给情况》报告,1973年初,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典型调查,在插队知青中,生活已自给的约占34%,生活大部分自给(伙食自给,穿用要家里贴钱的)约占35%,生活不能自给的约占31%。表明大部分知青在生活上人不敷出,还要依靠家庭的资助。

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知青受迫害已经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截至1973年5月,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70%。在“清队”、“办学习班”、“一打三反”中,任意批斗、吊打知青,造成人员伤残、死亡。女知青遭奸污、猥亵的案件逐年递增,内蒙古1969年发生11起,1970年发生54起,1972年增至69起;广西1969—1973年初共发生507起,其中1972年就发生了301起。内蒙古建设兵团四师34团党委6名常委中,强奸、猥亵女知青的就有4名。

各种非正常死亡逐年增加,1969—1973年,内蒙古兵团发生事故928起,126名知青死亡,756名知青受伤;广州兵团,各种事故死亡210人,云南兵团各种事故死亡297人,新疆兵团自杀事件达134起。有的兵团知青死亡率达3%。

据1973年国务院知青办估计,在下乡知青中“可教育子女”占7%—8%。由于广泛株连和档案失实,其人数远高于10%。各地任意扩大“可教育子女”的范围,将非劳动人民出身、复杂社会关系和高级知识分子、侨眷等,均划为“可教育子女”,自订“土政策”对知青“查三代”。“可教育子女”在招工、上学方面受排斥,使其在知青中的比例逐年上升。1973年贵州18个县上海知青中“可教育子女”比例上升到19.9%,其中台江县由原来的27%上升到43%。

与此同时,“走后门”成风,一些有权势者的子女通过“走后门”回城、就业、当兵和上大学。“走后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干部子女“走后门”使上山下乡的宣传不攻自破。

1968—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期,有近500万知青下乡;1970年开始滑坡,当年降至106.4万知青下乡,相当上年人数的39.8%;1971年减至74.83万人,相当1969年的28%;1972年再减至67.39万人,只及1969年的25.1%。

造成运动滑坡的原因,除了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建国来的第三次经济“过热”,工矿企业招工失控的原因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动员下乡遇到巨大阻力。“再教育”的宣传说教失去了原有效果,办学习班、配教等办法受到了日益顽强的群众性抵抗。

1972年,哈尔滨计划动员3.5万知青下乡,为了造舆论,把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30万人拉出来欢送下乡青年,前后只动员走了700人。苏州市安排124名青年下农场,派98名干部动员了两个月,仅有24人报名。做动员工作的干部、教师不少人挨打受骂。

为了逃避下乡,学生中途辍学的现象在一些地区迅速蔓延。1972年保定市退学的学生达1000多人,保定市一中应届毕业生原有14个班,期末已有300人退学,只剩下8个班的学生。牡丹江市73届毕业生中途退学的占60%。

越来越多的在乡知青倒流回城或长期逗留不归。1971—1973年上半

年,黑龙江省"因病"、"家变"返城知青约有4.2万人,占全部知青的6%。广东、福建两省,外逃港澳人数逐年上升,由1970年的1700人,发展到1973年的6130人。据托马斯·伯恩施坦估计,仅1973年,广东省45万知青中,有2%—2.7%的人逃出境外。[6]

上山下乡运动在中期走人低谷,对这一时期的知青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推动了知青群体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遍质疑,"扎根派"在知青群体中开始失去号召力,"不相信"派的影响逐渐扩大。

二、知青文艺沙龙和民间艺术群落

"文革"时期的民间,可以分为主流文化的民间(它们以"工农兵诗歌"、"批林批孔故事会"为代表),大众的民间(以口头文学、民谣、"政治旧体诗"为代表)和知识分子的民间(以于校地下诗歌、沙龙文学、民间诗群为代表)。主流的民间受着绝对权威意识形态的控制,它实际上成为"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是一种伪民间;大众的民间是传统文化的渊薮,在"文革"后期自发地拥护当权者;知识分子的民间,是知识阶层在民间天地中开拓出的现代空间。知青亚社会是知识分子民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知识青年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丧失了文化主体的地位,同时也获得了广阔的民间空间,得到了自在与活泼的民间性。它不同于20、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的"到民间去"(只是由启蒙立场向现实政治立场转换),而是真正成为"草民",成为民间的一部分。知青的加人,为民间提供了新的纬度和内涵。知青文学为民间文学注人了现代因素。知青的民间写作成为20世纪70年代民间文学最具现代性的一部分。[7]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随着"文革"运动进人低谷,全国各地的城市沙龙以及乡村的知青文化群落,都开始进人了一个黄金季节。在民间掀起一股反对"文革"意识形态的思想潮流,这一思潮试图全面突破"文革"话语,建立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

在1972年之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展开，各地的知青文学沙龙和艺术群落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以知青点为背景，以沙龙为据点，一股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潜流开始地下涌动。随着现代主义诗歌的产生，知青话语体系终于破土而出。

“文革”激烈的政治运动和法西斯文化专治使文化传承几乎中断，文脉的延续仅在一线之中。1972年前后沙龙文学重续文脉，再造传统的创造性活动，意义十分重大。北京沙龙的徐浩渊、赵一凡、赵振开、鲁燕生、彭刚和白洋淀诗群的岳重、姜世伟、栗世征，贵阳的黄翔、伍立宪，成都的邓垦、陈自强，上海的钱玉林、程应铸，厦门的舒婷等人，不约而同地对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探索。这些沙龙活动，实际上处于话语再造的历史焦点，其中的经历具有宝贵的认知价值，它们为存亡继绝的文化工程提供了具体的细节和场景。

人类的思想是由语言构成的，人类用语言命名事物，语言一旦形成系统又会限定人类的思想。要跳出“文革”意识形态的怪圈，只有重新搜寻、发现新语汇和重建叙事结构。如果不能破解“文革”的一套话语，人们就永远只能是这一社会现实的奴隶。由于“文革”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惟一现存的文明，沙龙现代主义诗歌对语言的猥亵和践踏，反文化、反社会，成为文化再造的一种理性抉择。这种“破坏”和“颠覆”意味着对意识形态话语的拒斥和超越。反文化浪潮的出现是“文革”文化专制和政治压迫的必然结果。这种对语言的颠覆行动，为知青集团构建自身的价值体系开辟了道路。

现代主义诗歌的产生对于知青群体来说是非常及时的，它使得知青解释“文革”现实成为可能。以现代诗歌为代表的沙龙文化，推动了知青群体的文化突围，促进了知青亚社会的形成。

文学艺术在民间发展的特色之一就是，它摒弃了庸俗社会学，重新向艺术的本质回归。它愈是非政治的反而愈有政治性。现代艺术使沙龙文化获得了自由，它已经完全脱离了与权威政治的任何话语联系，现在即使是权力话语也已无法与它对话。

1. 北京的文学沙龙

知青沙龙在1972年进入了鼎盛时期。北京知青的文学圈子，开始发生密切的交叉，形成一个相互交织的网。这是知青沙龙兴盛发展的重要特征。

当时的西单商场牛奶店、东安市场茶点部，是徐浩渊等人出入的地方，这些西式小吃店，只提供简单的奶制品、糕点和面包，沙龙成员们常在这里聚会清谈。由于受到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的影响，徐浩渊曾想把西单食品商场二楼搞成中国的洛东达。[8]

由于出入沙龙的成员大多是下乡知青，自然形成"知青部落"式的道德准则。他们到内部书店偷书，到照相馆偷胶卷（沙龙中有人在搞摄影艺术），传说徐浩渊也曾在肉店里偷过排骨。为了能够进电影院看内部电影，他们画过电影票，还画过电车月票和各种票证。彭刚因为画电影票，在北京展览馆被人追赶着在街上逃跑。

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沙龙，还有史康成沙龙。这个沙龙集中了一批思想型的知青，他们的目光从理性主义，开始转向经验哲学。虽然这一时期的读书和理论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但是为沙龙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氛围。这个沙龙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其中出现了现代诗歌的代表人物北岛。

在这一时期，北京沙龙诗歌的创作，延续了红卫兵文学浪漫主义的传统，如北岛、徐浩渊等人的诗歌中带有浓郁的童话色彩，这种色彩在白洋淀诗群的代表诗人（岳重、芒克、多多）身上也有鲜明的反映。童话诗是浪漫主义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知青小说创作方面，沙龙文学继承了红卫兵文学所开创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第二次慰问》、《胎衣》等反映"文革"现实的小说。同时，一些现代主义的手法开始渗透到现实主义中来，如象征主义（《第二次慰问》中的悬空寺）、表现主义（《梦》）、荒诞戏剧（《日蚀》）等。

(1)鲁燕生沙龙[9]

鲁燕生:1952年生,北京铁路一中学生。1968年到山西插队,长期居京不返。沙龙主持人之一。"文革"后,考上中央民族学院美术专业研究生,现在民族学院任教。

1972年,一批学习绘画的知青开始在鲁燕生、鲁双芹家汇聚。在1972—1973年,沙龙在鲁燕生和彭刚家,先后举行了两次具有现代主义先锋性质的沙龙画展。画展在北京沙龙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铁道部第四住宅区的鲁家与国务院宿舍的徐浩渊仅隔一条马路,徐浩渊沙龙中部分成员经常到"铁四区"鲁燕生家活动。这个沙龙的成员,不仅是沙龙现代绘画的推动者,也是现代诗歌创作的积极参与者。

A. 沙龙的诗歌创作

这个沙龙的成员在1972—1973年间写作的诗歌大多失散,仅留存下部分片断。[10]

我的诗歌没有旗帜
发出一道
比少女的胸脯
还要赤裸裸的
太阳光

我像秋天的野果
那样沉重
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

——马嘉

生活并不卑贱
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

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土地
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鲁双芹

一切
都那样平庸
那样合理
那样不能让我容忍
沿着看不见的道路
我走着，走着
隐约地
我感到了
淡淡的恰人的悲哀……

——李之林

一见阳光
我的心就融化了
舒舒服服地
淌的遍地都是
呵！
爸爸
妈妈
我像个孩子一样
走着，走着，
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

——彭刚

英国式的裤线和气概
我是一位标致的有香气的男子
我的歌声曾来自栅栏的后边……

——杨桦

绘画圈子中也产生了一些小说习作,如长篇小说《谁在敲门》(严力)、长篇小说《密勒外传》(宫小吉)。[11] 在这个圈子中正式写小说,并产生一定影响的是牟敦白、张寥寥。

B. 牟敦白的小说

牟敦白:1947年生于东北辽沈战场,1964年入北京101中学,与郭世英、依锡群、张郎郎往来。因参加X小组入狱,出狱后又加入"太阳纵队"。1968年底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写有诗歌《拓荒者之歌》(1969—1971年)、《孤雁》(叙事诗1973—1974年)、中篇小说《霞与雾》(1972—1974年)、《哲里木,你这荒凉的土地》(1975—1977年)等作品。[12]

中篇小说《霞与雾》,讲述老干部南翔1971年从干校回京治病,他的妻子已在运动中自杀,儿子大为(北大附中红卫兵、工人)和女友小娥(清华附中67届高中毕业生)一同悉心照顾他。南翔发现大为在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读了大为的思想笔记后,父子间发生了思想冲突,其中包括对"九一三事件"的不同认识。

小说倒叙往事,南翔在1936—1937年在英租界念书,与同班女生霞相恋。抗战全面爆发,霞要随父避难欧洲,而南翔出于民族大义决心留在国内抗战,拒绝了霞父要他一同赴欧的邀请,忍痛与霞分手。1946年,南翔作为中共军调处秘书主任回到北平,他与美军中校查尔斯·布朗在未名湖畔漫步,布朗认为中共必胜,中美应成为朋友。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关系,南翔与成为北大教员的霞再次相见,霞已嫁给一个教授,这次相逢勾起二人复杂的情感。霞说:"我常想,假如我们一起到国外去,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呢?"美方调处失败后,内战即将爆发,南翔与霞再次告别。

1972年,周恩来派"红旗"轿车接南翔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中美问题研究会议,南翔在会上提出"东和孙吴(美国),北拒曹魏(苏联)"的外交主张。不久,南翔参加接见美民间访华团,与加州大学教授(原美军中校)查尔斯会面。小娥因母亲在"文革"中自杀,她考虑到南翔复出工作,自己家庭有政治问题,决心离开大为,以免连累这个家庭。南翔找小娥谈心,劝小娥留下来。这时,南翔的疾病开始恶化,在2月21日,因心绞痛而入院卧床。就在此刻,"11点30分左右,太阳终于冲出了云层,把它那温暖的灿烂的光

辉射向大地”，尼克松飞抵北京机场，电视转播中出现了波音707，尼克松同周总理握手……南翔由于激动瘫倒、昏迷，进入弥留状态。从他的枕下滑出一张“发黄”的照片，上面是小娥的妈妈“霞”。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三条线索：南翔和霞恋爱的经历，南翔与大为的思想冲突，南翔作为中共代表与美方的几次联络活动。这三条线索贯穿着三方面的对立冲突，这些冲突都在结尾时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第一方面是阶级冲突，南翔与霞的阶级对立关系，通过历史长河，在大为与小娥身上得到弥合。南翔突破政治偏见，接纳了小娥，儿女的婚姻，弥补了上一辈的缺憾，这是对“阶级路线”的否定。第二方面是父子冲突，南翔和大为父子既冲突又相互信任，表现了中共老一代与新生代在“文革”后期的思想交流与和解。第三方面是中美冲突，中美双方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敌对后，双方通过智慧达到和解。这三方面的和解，是权力集团与知识分子、权力集团与新生代、权力集团与西方世界(美国)三大间隔的历史性跨越。

《霞与雾》用相当篇幅描述了出身贫寒的南翔与出身银行家的霞，在战云密布的街头分手，又以军调处军官身份在未名湖畔与霞聚会的情景。这些场景展示了对立的阶级阵线和异质文化，如何在特定环境中相互间隔、又相互吸引。类似的描写在《第二次握手》、《晚霞消失的时候》等地下作品中也曾经出现。

牟敦白还在一些小说中，对知青的悲惨命运进行了控诉。短篇小说《胎衣》(1974年)讲述，兵团老职工杜大爷的儿子秋河在放炮时救了上海女知青菱娣的命，菱娣嫁给秋河后，生活很不幸。菱娣因为分娩前挨了秋河的殴打，造成早产，到了团卫生院，半夜生下双胞胎，不幸全都死了，而秋河父子对母子不闻不问，却商议着将胎衣当药材卖掉。

> “可是你下手也太凶了，”医生分解着，“孩子的死你要负责的……”“什么？老子负责……别说是孩子，她人都是老子救活的。死俩小崽子有什么了不起，老子再操她几回，下一窝还让她抱仨呢！”
>
> ……
>
> 我跑到院子里，小金正在楼角的自来水管下冲洗着什么。我一眼瞥见水龙头下堆着一摊腥红的令人发呕的、血肉狼藉的

东西,还在一滴滴渗出绛色的血珠儿,成群的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你在洗什么啊?"我惊诧地问。

"胎衣,又名胎盘,是一种珍贵的药材……"

"就是昨晚上——"

"对对……就是杜秋河家的……今天早上我刚和他们谈妥价钱。"

——短篇小说《胎衣》1974年

同类反映女知青生活悲剧的小说还有《夜茫茫》(1974年),表现一位男知青路遇嫁给农民的女同学,得知她婚后生活非常不幸。男知青回忆起当年两人在北海相识时的美好情景。

这些小说揭露知青的悲惨生活,批判上山下乡运动的主题非常鲜明。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较为概念化,娶了女知青的男人不是冷酷无情,就是流氓无赖(《夜茫茫》中的车老板),而女知青完全是没有抵抗能力的受害者。可以把它们看成是问题小说或是政治控诉小说。

牟敦白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快跑——89次列车正点发出》、《脸谱》、《季风之歌》和《在船上》,讲述了男女知青在城乡之间漂泊流浪,在城市沙龙中相互邂逅、相识又匆匆分手的故事,描写了他们青春朦胧恋情和遭遇的种种感情波折。

C. 张寥寥的剧本

张寥寥:画家张仃之子,张郎郎的二弟,1952年生。童年曾获世界27届儿童绘画金奖。1963年因写《黑妞》(家中的小猫)而被"太阳纵队"吸收为"队员"。1968—1976年在山西运城插队。插队期间写有多幕话剧《日蚀》,长诗《没有你的坐位》,小说《前滚翻》等。1975年与包乐安等人办手抄杂志《渡过忧愁桥》(后改名《桥》),担任主编。

1971年张寥寥为躲避派出所追查,从山西逃到二哥张大伟所在的江西红旗林场,在避难期间该林场发生知青跳舍身崖事件,在这件事触动下,张寥寥在1974年创作了六幕话剧《日蚀》。《日蚀》曾在北京沙龙朗诵会上朗读,在东西城区的沙龙中流传,引起强烈的反响。[13]

《日蚀》讲述:两个看林场的知青住在山顶阁楼上,一个是愤怒的知青,

执著地探究世界的真相,另一个姓肖的知青则叹息说:一切都没有意义,就这么活吧。他们与世隔绝,每月仅有背米人上山来送一次粮食。当肖的女友到林场看望肖时,发现两个知青已经全疯了。背米人也来到山上护林,住在楼下。后来,肖的女友与背米人结了婚。结尾,愤怒的知青跳崖自尽,而肖知道后,坐在自己的蚊帐里,不哭也不想说话。在闭幕时,肖女友的孩子降生了。

剧中穿插了一个寻找草药为父亲(老山民)治眼的女中学生,她要找到真正的金龟子为父亲治眼。但是,每次捉到的金龟子回到家就失去了光亮。金龟子和梅特林克的青鸟一样,象征着对幸福和真理的探求。剧中有一个"时间",在幕间报告场景的转换和介绍剧情。

这是一部具有荒诞性的哲理剧,带有象征主义色彩。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是符号化的,愤青是形而上的探寻者,肖是悲观主义者,女友代表着世俗者,山下的背米人代表着物质;女中学生代表着信仰追求者,老山民代表着时代,金龟子代表着终极真理,它总是闪烁不定。山顶的阁楼是形而上学的象征,它处在危险的悬崖边上。

愤怒的探究者,没有寻找到真理,他最后选择了自杀,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最后选择了沉默,甚至失去了哭的力量。作者否定了通过理念寻找到终极真理之路,把希望寄托在具有常识的普通人身上。作者表述了这样一种思想:终极真理是没有的,终极的目标也是没有的,一切都只在不竭的追求之中。

(2)史康成沙龙[14]

在1973年前后,史康成、徐金波、曹一凡和赵振开四个北京4中的同学,开始在史康成家聚会。史康成的妹妹史保嘉也参与其中。他们与赵一凡沙龙和徐浩渊沙龙中的成员(仲维光、甘铁生等)发生多边的接触和往来,加上一些"二流社"的老朋友,形成了一个连环套式的圈子。

在这个沙龙中,读书热在不断地升温。如果有一本重要的新书,自己没有读过,就会引以为耻,马上进行补救。如果自己发现了一种新颖的学说,马上就会拿到沙龙中去加以炫耀。这是一个崇尚知识和哲学精神的年月。仲维光回忆说:在1972年后,大家开始读罗素的《哲学史》。这其间经

过了一个发展过程，从马克思到黑格尔，再到康德和洛克、休谟，由自然科学到科学哲学。当时的读物还有，莱因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和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为了更新知识结构，一些人甚至开始自学数学、物理，重建文化基础。随着读书的深入，他们的目光从欧洲大陆的理性哲学，逐步转向经验哲学。[15]

读书促使沙龙发生了又一轮的分化，一些思想僵化，耐不住读书寂寞的人，或是讲究衣着打扮，谈不出东西的人都成了圈子的外围。尽管他们愤愤不平，但再也无法进入活动的中心。随着时代的淘洗和沉淀，沙龙在1972年后，再一次焕发了青春。

新知识、新思想的发现，活跃的文化串联，大胆的思想争论，为沙龙贯注了勃勃的生机，为创作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仲维光、史康成、甘铁生等人从计划经济学书中首次看到了海登堡测不准原理，并在沙龙中展开了讨论。后来，甘铁生在写《第二次慰问》时，将这一讨论写进了小说。

A. 北岛的童话诗

史康成沙龙的最重要成绩是，出现了像赵振开(北岛)这样的现代诗人。赵振开在北京城建当工人，与知青仲维光、甘铁生等人来往密切。他在这一时期，创作出《五色花》、《金色小号》、《你好，百花山》等诗作，这些诗很快在北京各个沙龙中流传开来。

赵振开早期的诗作，带有鲜明的童话色彩：“春天是没有国籍的/白云是世界的公民”，“我要把月亮撕成碎片/铺成通往白矮星的栈道”(《五色花》)。甚至在他成熟的代表作中也贯注了某种童话性：“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影子无形”(《回答》)。

一切都在飞快地旋转，
只有你静静地微笑。
从那微笑的红玫瑰上，
我采下了冬天的歌谣。
蓝幽幽的雪花啊，
你们在嚓嚓地诉说什么？

回答我：
星星永远是星星吗？
——《微笑、雪花、星星》1973.12

这种"童话诗"反映出了新生代的某种思想特质。它使我们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新生代诗歌，如张郎郎的《鸽子》（见本书一卷二章：文艺沙龙和新生代文艺复兴的梦想），以及红卫兵的浪漫主义诗歌，如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童话诗代表了一代人共同具有的少年青春的情怀。

赵振开的"童话诗"反映出新生代价值观的时代立场。在前文性缺失，话语资源匮乏的历史条件下，他在梦中建造了童话般的新世界。

在当时的许多知青诗歌中都弥漫着童话的气息。它反映出，童话诗歌是红卫兵浪漫主义诗歌向现代诗歌过渡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驿站。

我看到浮动的月亮
那是我很久以前的愿望
忽然被顽皮的风唤醒
今天又来到我的心上
……
远处还有歌声
风还送来柠檬花香
我在绿雾中寻觅——
那一定来自我梦到过的地方
——《海边儿歌》方含具体时间不详[16]

一小块葡萄园，
是我发甜的家。
当秋风突然走进哐哐作响的门口，
我的家园都是含着眼泪的葡萄。
——《葡萄园》芒克[17]
（注：白洋淀插队期间作，1979年发表时有修改。）

它们不是以开天辟地的伟力来重新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是回到童年去追寻一种"梦境"。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新人"诞生之初的嫩弱性的反映，反映了诗人拒绝和回避现实的心态。

童年，你又来
却是在夜晚
我数过满天的星星
和月牙我的小船
妈妈，我要再出生
于你的怀抱
给我
——春天
窗外，谁睡了？
窗外，春天的夜晚
别问：现在几点……

——《春天……夜晚》 穆欣欣
具体时间不详[18]

童话的美丽世界是对黑暗现实的否定。童话的力量正在于它的思想彻底性，在于它勇于做超越现实的浪漫飞翔。童话诗所表达的价值立场，赋予了现代主义诗歌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

(3)其他沙龙

在1972年后，知青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日渐多样化，但是这种发展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文学基础，批判现实主义依然在知青文学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一些知青作者把他们在乡村的生活素材和小说构思带回城市，在沙龙完成写作。这些体验和构思本身，带着浓郁的现实生活气息，充溢着批判的精神。他们在创作中吸收各种手法，采取不同形式，但是本质上都未曾脱离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19]

A. 甘铁生的中篇小说《第二次慰问》[30]

1972年冬季，甘铁生从农村返回北京时，带回来几篇在农村创作的小说，他将小说交给沙龙中的朋友，满怀希望地等待他们的评价。仲维光等人看后尖锐地指出，小说思想太"正统"，还是报纸上那一套。甘铁生十分懊恼，经过反省后，决心放下思想束缚，大胆地进行创作。在1972年的冬季，他在家中很快写出了已经在心中酝酿了许久的中篇小说《第二次慰问》。

当《第二次慰问》在沙龙中传阅时，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孙康读完大受感动，特意为甘铁生组织了三次沙龙朗诵会。甘铁生在不同场合，向不同的听众念了他的小说，听者普遍反应强烈，有人当场流下了泪水。第一次朗读是在徐浩渊、依群的圈子；第二次，是在101中的圈子；第三次，是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听众有三五十人，其中还有几个大学生，听了不到十几分钟，这几个大学生就被小说的内容吓坏了，忙借口有事退出了。

小说讲述，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充满热情来到农村，却很快发现上当受骗了，在朦胧的觉醒中，他们开始寻找精神食粮，阅读曾被自己批判过的书籍。他们很快与极左的环境，与堕落的农村干部发生了冲突。有的知青受到迫害，有的女知青被强奸。几个女知青反抗欺辱，被农村干部诬陷为"反动分子"而抓走。小说女主人公是一个毛泽东的崇拜者和上山下乡的先锋，她的理想在农村破灭了，当她觉醒时，她也被抓了起来。

小说中有不少关于知青生活颓废，追求感官刺激、酗酒、乱交的描写。女主人公因"反动日记"被民兵队长抄出，被迫出走，四处流浪，当保姆，打短工。当她流浪到一个知青点想找口饭吃，看到知青点的土墙上用镰刀画着硕大的生殖器。知青向她解释说，这是老乡画的，认为我们在胡搞。但女主角却发现男女知青成双成对地搞在一起。

小说中有一些情节直接取自生活原型，如小说中知青为饥饿的农民请命，反抗交公粮的情节，就是出自李百替(北京人大附中红卫兵)在山西插队时，反对逼农民交公粮，被抓起来的事件。小说结尾时，北京知青慰问团第二次来农村慰问，觉醒的知青们跑到山西浑源的悬空寺躲了起来。"悬空寺"是一种象征，它暗示着知青集体户是乌托邦主义，是一种精神上的空中楼阁，或许其中包含有知青试图脱离"文革"社会的隐喻。整部小说笼罩着一种悲凉的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象征手法(悬空寺)的引入,与整体风格并不协调,显得十分突兀。显然,这只是作者对新手法的初步尝试。这种迹象预示着知青小说将会发生形式上的重要变化。

B. 王江的长篇小说《梦》[21]

长篇小说《梦》是一种意识流小说,同时具有表现主义的特色。

王江(1951—),北京铁路中学初二学生。1969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1972年返城当工人。现为《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室副主任。

1972年返城待业期间,王江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梦》,1973年完稿。这部小说抄写在四个32开的硬皮日记本上,曾在北京知青圈子和湖北五七干校纺织厂的知青圈子里传阅,后在流传中遗失。

《梦》长达30万字。卷首题词:"男不梦产,女不梦须。——民谚"小说模仿鲁迅《狂人日记》,采用日记体第一人称,并使用《野草》式的散文诗句。"日记"记述了主人公江晓生——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长达一个月的精神远征。文字完全是狂人的口吻:"啊,高峰……红、红、红,橘子洲头……拴不住的心",记录了主人公狂妄的意识流。满篇充斥革命激情,像是狂乱的呓语。

小说讲述兵团知青江晓生虔诚地个人迷信着,追求无私奉献。忽然,有一天他进入了超凡入圣的境界,这是一种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圣人境界。在他眼中的外部世界全部是红色的,任何一件小事在他眼中都不平凡了,具有了伟大意义。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人也不是平常的人了。作者有意识地为他配备了一个桑丘式的人物男知青"尚青",一个杜尔西内娅式的女知青"李"。江晓生日复一日地在大豆地中锄草,在场院扛麻袋,脱坯垒墙,干着极其繁重的劳动,同时在内心深处对自幼酷爱的书本和修正主义教育进行革命。他随时随地克服私心杂念,并发现细微末节处皆有伟大意义。在他眼中所有的人:知青、连长、老乡,都是无私神圣的。江晓生在连队里开始了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游历,作出各种忘我的崇高表现。有时,他又感到现实远不理想,设想如何将连队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如何寻求"突破口"将他们都变成像自己一样的超人。他在地头批判会上批评老农不应一边在公家地里锄草,一边为自家拾柴火。当他发现自己的意见引起了反效果,又突然想到要警惕"教条主义"。在这种改

造世界的远征中，他一度觉得自己很成功，找到了几个同他一样的"共产主义分子"，他推算如果这样滚雪球似地发展下去，就会出现几何级数的变化，所有的人都将被改造，整个社会也会改变。但周围的人却觉得江晓生出了毛病，江晓生在吃了医生给他开的药后，蒙头大睡。一觉醒来，大梦初醒　感到山还是原来的山，水还是原来的水，人还是原来的人，才貌双全的"李"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姑娘，他尝到了幻灭的苦涩。但他认为"失败是暂时的"，他感到了一种英雄式的孤独和寂寞。

小说将作者身边的几个知青朋友都写进去了，小说写了十几个知青、老乡、连长、指导员，但都是取其特点。许多东北朋友看后都觉得很有趣，因为小说记录了他们生活中的许多真实的场景。但一些圈外的知青读了，认为作者对江晓生的欣赏和惋惜多于嘲弄、讽刺，哀婉有余，辛辣不足。作家徐放读后说："小说从始至终洋溢着一种激情。"

这部小说是"文革""斗私批修"的一曲挽歌，实际上是一部"文革"荒诞喜剧。

2. 成都文学沙龙[22]

邓垦、陈自强沙龙的文学活动，从"文革"前夕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后。主要成员有邓垦、陈自强、徐坯、杜几森、白水、蔡楚、苟乐嘉、吴鸿、吴阿宁、野鸣等二三十人，绝大多数是"黑五类"子女。沙龙的核心人物为邓垦、陈自强。

邓垦：笔名雪梦，1944年生，成都7中1963年高中毕业，曾作临时工、合同工，后在成都市政公司当工人。写有《归来啊，我梦中的恋人》、叙事体长诗《春波梦》等。

《春波梦》(叙事诗)1964年第一稿为5000行，一韵到底。1967年的第二稿为6000行，加写了"文革"部分。长诗叙述一对校园恋人，女生考上大学，男生流入社会　女生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初作为"三家村分店"遭到点名批判。女生受到红卫兵批判、殴打，最后跳楼自杀。诗中女主角原形白燕，即是邓在《归来啊，我远方的恋人》一诗中思恋的"我为你似江涛一样呻吟"的姑娘。《春波梦》曾在四川、云南、湖南等省知青中流传，还

被知青越境带到了缅共游击队。

《春波梦》 邓　墨　1967[23]

22 节:

地球是由他们转动的,/是黑是白只有当局有权来衡量。/我的一切申辩都是徒劳的,/一纸开除学籍决定了我的下场。/划清阶级界限,/是这个时代人人自保的一副良方。/最大限度地保持沉默和距离,/是这个时代维护友谊的最佳伎俩。/在校方组织的揭发会上,/各种灵魂都无可奈何地曝光。

46 节:

欲望,/是最纯洁的圣水,/能够洗净一切创伤;/欲望,/是最饱满的圣果,/能够充填一切饥肠。/中世纪那震撼人心的名言,/就为幸福作过堂皇的宣扬:/“幸福在马背上,/在女人的胸脯上。”/我要像惠特曼一样,/讴歌带电的肉体;/我要像但丁一样,/写出《新生》的续章。/黑牡丹奉献给我的一切,/我将永世珍藏!

49 节:

黑五类的子女,/正是革命的对象,/白燕已被揪斗了几十次,/被折磨得失去了人样,/最近又被红卫兵,/半夜抓去审问,/脱光了她的衣裳,/她终于不堪凌辱,/跳楼身亡……/这是人的世界吗?! /我问山野中的狼,/我问木栅里的羊,/我撞地狱的门,/我砸天国的窗! /啊,沉默,一切都已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陈自强:笔名陈墨。1945 年 11 月生于成都。1965 年成都七中高中毕业后,当过临时工。1970 年到西昌盐源县彝族自治县插队。1975 年底因病回城。1963 年开始写诗,有《灯花集》(1963—1964 年,收诗 40 首)、《残萤集》(1963—1969 年,收小诗 200 首)、《砚冰集》(1963—1969 年,收诗词 500 首)、《乌夜啼》(1968 年,收诗 50 首)、《孤星集》(1969 年献给恋人的诗,48 首)、长篇小说《疮痍》(1968 年,40 万字)、电影剧本《广陵散》(1970—1980 年)。编《中国新诗大概选》(1969 年编第一分册:1918—1928 年)。“文革”后,出版有《鸡鸣集》(诗集,与蔡楚合著)、《何必集》(杂文,1984—1998 年)。[24]

陈自强的诗歌受到戴望舒、徐志摩的影响。“文革”中,陈把自己的诗作都署上徐志摩、戴望舒、朱湘、卞之琳等人的名字,或同他们的诗混抄在一起。1974年,沙龙成员徐坯的家被抄,陈自强的诗被抄出,因与徐志摩等人的诗混在一起而躲过文字狱。

1968年在武斗中,成都春熙路中国书店(孙中山铜像背后,现龙池书肆)出现了一个“黑书市”,繁盛时参加图书交易的有200多人。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对黑书市进行了至少四次以上的清理整顿。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书市将搜出的书堆到街口烧毁。黑书市在1969—1971年间还隐蔽地存在着。在黑书市上,人们可以交换到“文革”前出售的所有文学读物,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爱因斯坦,应有尽有。

当时陈自强见到《中国新诗选》初版只收徐志摩诗二首、第二版则一首也未收入,出于义愤,决心选编一本真正代表中国新诗歌面貌的诗选集。陈采用以书养书的办法,将自己的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卖了40元钱,再用这笔钱买有关的资料。当时的40元可购40册新文学的书,他还在黑书市上进行倒换,以书易书和变卖家产来搜集有关新诗的资料。他先后搜集到《中国新文学大系》60多本、国内第一批影印的《新青年》全套本、《现代评论》和部分《新月》等书籍,共搜集了新文学书籍两箱,上千册。

在此收藏的基础上,陈自强于1969年躲在一个同学家中潜心工作了三个月,在年底编出了《中国新诗大概选》的第一分册,共收入1918—1928年新诗70家700—800首。其中收入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蒋光慈、徐志摩、戴望舒等人诗作。第一分册抄在活页纸上,用一根鞋带穿起来,约有一寸半厚。《概选》在成都沙龙中流传。陈自强计划编写的第二分册,因为下乡插队而未能实现。

陈自强在第一分册导言中,综述了1918—1928年十年间新诗的“若干演变和流派”的“尝试”性探索。导言批点“五四”前后新诗中“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社会诗”的最初尝试,造成了“简单、草率、平淡、苍白的印象”。称许郭沫若异军突起,形成“浪漫主义”;并将“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湖畔社、“普罗文学”的太阳社、“狂飙运动”的沉钟社,以及语丝、未名等社的诗人和诗作,统归为“现实主义”。因为各家“纵然色调不一,情趣各异,甚至信仰相背,风格迥异,但其手法的性质,皆属现实主义的范畴,故以现实主义笼而统之”,“惟有现实主义一词,尚可套住”。在导言中,陈墨还论

及象征诗人李金发、闻一多的"格律派"理论等等。导言的新观点显然超脱了阶级斗争文学的理论巢臼，《中国新诗大概选》的流传，对于当时成都沙龙诗歌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25]

1969年陈自强到彝族自治县插队，当地全劳力一天挣10工分，总计8分钱。知青只评8—9个工分，连盐巴都吃不上。粮食一年仅够吃三个月，大半年吃洋芋，人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陈自强在插队期间坚持创作，诗作大多收入后来出版的《鸡鸣集》。

《独白》 陈墨 1970.4.—1971.4.

之二：

我爱我宁静的伤悲，
在雨中看菊花悄然地憔悴。
纵然南山的秋色已老，
我不知道风是往哪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是往哪个方向吹，
躲在北窗听明天的子规。
酒冷也不必去见那飘零的红叶，
我爱我宁静的伤悲。

之五：

我要在我的秋天里沉默，
人海的风雨又飘下多少红叶？
热泪和冷笑不能使它变成桑田，
做一个渔父钓一柱人格的独白。

做一个渔父钓一柱人格的独白，
像一棵麻木消磨我残剩的岁月。
希望已落尽还怕什么风风雨雨，
我要在我的秋天里沉默。

成都沙龙的成员，在诗歌写作上都经历了坎坷和艰辛。吴阿宁的家多次被抄，他每写好一首诗，就搓成豌豆大一粒，搭高凳丢进楼上竹笆墙的一根大竹管中，除非拆壁不能发现。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由于抄家频繁，吴阿宁一度曾掏出许多“豌豆”欲烧，一一展读后又舍不得，最后转交当工人的朋友收藏，使诗作得以保存下来。

1968年开始上山下乡运动，沙龙中的知青朋友们四散各处。陈自强、九九等人在农村插队，邓垦到云锦县公路道班当工人，徐坯在惠东矿山当炊事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相互传抄诗作，找机会聚在一起探讨文学。

1971年在陈自强提议下，野鸣汇集圈内诗作编辑《空山诗选》。这个诗集的名字是陈自强取自庄子，有脱离“文革”社会，遁人空山之意。诗选于1972年夏编成，内收14家计150首诗。[26]

阴雨绵绵，夜风踟蹰/提着灯，握着锤，道班在巡路/为了列车正常地运转/他毫不犹豫地扑向夜的深处//这时节啊，多需要有人/提一盏真理的明灯/把倒退的时代列车/引出眼前这弥漫的雨雾……

——《夜巡》 徐坯 1966年

西风早已在野草间打滚，/一枝半开的荷花伸出池塘；/它终于冲出了污泥的阻碍，/飘出了深秋的第一次花香。//可是再没有人来荷叶下醉赏，/只有它独自地，独自地流着悲伤；/它没有垂下半残的花蕾，/它只喜欢在秋风中纯净地凋亡。

——《迟开的荷花》 白水 1969—1970年

……啊，崩塌吧，云端里的巨岩！/暴涨吧，让一切都重来，都重来！/看，来了，那漫天的洪水，/要浮起地球，翻转整个旧世界！

——《鹰嘴岩》 吴阿宁 1973年

今夜的桂花该有多香，/今夜的锦水该有多长？/轻轻的夜

风吹拂着我,弟弟啊,/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的衣裳……

——《中秋寄云南》 吴鸿 1974年

……颤狂在蜻蜓的翅上,/展开一个个透明的希望;/那么脆薄、那么轻,/那么执著、那样张遑。//一群群,透明的翅膀,/在低空,迷茫/天空呵,请告诉我,/这是不是下雨的征象?

——《透明的翅膀》 蔡楚 1975.12.

南昌,我在呼唤,/请给我接:/江西大旅社/二楼二十五号房间。//是首长吗?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青年,/现在——/……首长,我请求参战!

——《南昌,我在呼唤》 野鸣 1976年清明

在这个沙龙中,杜九森的诗作别具特色。他的"知青歌谣"曾在四川知青中广为流传。这些歌谣体的谐诗继承了民歌传统,浓缩了知青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它们将会载入典籍传之久远。

杜九森(九九)1949年1月生于成都,其父为台湾国民党财政次长,在国共两党中都有高干亲属。1970—1974年在四川盐源县双河公社插队,并长期做临时工。1979年赴香港定居,在某国际投资公司任董事长。"文革"中曾写打油诗、并谱写知青歌曲。"文革"后,出版有《九九谐诗集》、《魂断台北》(回忆录)。[27]

……敲起锣/喊集合/知哥知妹梭不脱/无长枪/无短火/锄头扁担上场合……半夜临/来一群/石头瓦块如雨淋/日你妈/操你娘/扯出斧头不认皇/要抢水/莫后悔/知哥你爷本是鬼/想当年/敢拿横/耍了机枪要"吊盘"(注:转盘机枪)/脑壳昏/下农村/这盘老子要当真/哪个上/不得让/一刀一个当解放/想吞饭/就要干/再来拉响手榴弹/队长说/当干活/丢翻一个得五角/队长骂/不要怕/天大地大僎僎大。……

——《抢水谣》 九九 1972年

走走走/喝闷酒/胡豆蜿豆都没有/只有嘴啃手//来来来/敞开怀/一醉方休胜活埋/天地是棺材//唱唱唱/自晃荡/知哥知妹/浪打浪/句句扎心上//哭哭哭/八阵图/不见爹娘不见屋/泪水大扫除//……抢抢抢/自给养/运气不好绳子绑/抢够跑香港//对对对/群英会/醉眼醒来茅坑睡/狗在舔脚背。

——《醉酒歌》 九九 1972.1.

破墙破门破窗破得凶/人寒人苦人瘪腰带松/想人想物想钱想得疯/打米打油打盐算得空/怨天怨地怨命怨祖宗/倒汤倒水倒饭倒栽葱。

——《乡下》 九九 1972 年

3. 白洋淀诗歌群落

1972 年在北京文艺沙龙中忽然刮起一阵现代主义诗歌旋风,风源来自白洋淀插队的北京知青群体。一支现代主义诗歌的生力军在白洋淀崛起,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白洋淀诗群”。诗群推动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复兴和发展,并对新时期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28]

现代诗歌群落在白洋淀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各种政治、文化因素和自然条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白洋淀有三部分知青,当地回乡知青、天津知青和北京插队知青,共约 600 人。其中北京知青有 300 人,占总数的一半。北京知青诗歌圈子在当地约有 60 人,相互间有密切往来。这部分北京知青不同于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显然有着冷静的分析和判断,经过对白洋淀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诸方面的考察,才决定结队到此地落户,是有选择,有准备而来。他们这批人中,有一部分是“二流社”成员,许多人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思想和文化素质比较高,是北京中学生中思想比较敏锐的一批分子。他们在知青点中相互交流、切磋,时时产生一些闪光的思想。

白洋淀方圆几十里水荡阻隔了渔民与社会外部的联系,港叉纵横如同迷宫,形成独特的经济、生活区域。水荡使各庄相互独立,却并不妨碍淀

内人们的交往。白洋淀有大小三百多个淀子,大淀子有烧车淀、荷花淀、藻乍淀。这些知青诗人大多分散在寨南到淀头一线,相距不过十几里水路。在邸庄的女知青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三个师大女附中的女生,都是"二流社"的成员,她们和陶雒诵、夏柳燕在1969年一同结伙到白洋淀插队。男知青在李庄子有周舵、赵哲,寨南有宋海泉,端庄有岳重、多多、芒克。几个庄水路相距很近,他们经常乘着队里的船相互"串庄"。在各知青点"走串"都是白吃白住。乘船走水路速度较慢,有急事可以走千里堤,骑车绕过淀子较快地到达。

白洋淀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知青生计可以无忧。在邸庄潘青萍等女知青只要每天在队上干活,月底就可以开30元钱。当时的物价很低,鲫鱼是二角五分一斤。1967—1969年当地发生武斗,直到1975年派性斗争仍然很激烈,公社无暇顾及知青的思想和文化活动。白洋淀形成一个政治上相对宽松自由的小生态圈。

白洋淀在当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图书。知青们带来了成箱的书籍,相互间进行传阅。由于离北京很近,沙龙中流行的书也流传到白洋淀。潘青萍从北京带来一批"黄皮书",其中有《凯旋门》、《带星星的火车票》、《新阶级》,特别是《新阶级》在知青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些书被知青们秉烛夜读迅即消化。

白洋淀地理位置适中,不仅知青可以经常回北京,山西、陕西、云南、内蒙古等地的知青也能很方便地到白洋淀来,形成大文化交流圈。白洋淀兼有乡村和城市两方面的优长,又避开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许多不利因素。诸多有利条件综合起来,使白洋淀形成一个适于诗歌活动的文化区域。

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明显地受到了外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外国译诗有力地推动了白洋淀诗人的创造。"文革"前译介的西方现代诗很少,布德莱尔仅翻译了7首,艾略特翻译不超过10首,还有叶甫图申科、沃辛斯基的片断,经过"文革"焚书,西方现代诗就更是物以稀为贵了。诗群在当时很注意搜寻译诗。多多把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中外近现代诗人的诗,抄录在一个大本上,这个大本曾在朋友们中间传阅,给大家很大的启发。林莽回忆说,当时在白洋淀流传的译诗比北京沙龙还要多。他在1971年借到了洛尔迦诗集,并看到了戴望舒的《雨巷》。芒克说,他在1972年读到了洛尔迦、马雅柯夫斯基的诗作。在白洋淀流传的诗歌还有:聂鲁达、阿拉贡、聂

利亚以及方平译的十四行诗。其中洛尔迦和聂鲁达对白洋淀诗群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洋淀诗群"的主要成员有：

岳重(根子)(1951—)：北京3中初三学生，1969年1月和芒克、多多、卢中南等人到白洋淀大淀头插队。1972年以歌手的身份加入徐浩渊沙龙，先后创作了震动沙龙的现代诗《三月与末日》、《橘红色的雾》、《白洋淀》、《深渊上的桥》等。后成为中央合唱团歌唱演员。

姜世伟(芒克)(1950—)：1969年初到白洋淀大淀头插队，1970年开始写诗。创作有《心事》(诗集)、《旧梦》(诗集)、《阳光下的向日葵》(诗集)，长诗《群猿》、组诗《没时间的时间》。"文革"中曾一度流传的诗有：《致渔家兄弟》(1971年)、《城市》、《十月的献诗》等。芒克后来成为《今天》杂志的主持人。

栗世征(多多)(1951—)：北京3中初三学生，1969年初到白洋淀大淀头插队。创作有《回忆与思考》(5首)、《密周》(1972年)、《万象》(14首)、《致太阳》、《手艺》(1972—1973年)、《教诲——颓废的纪念》(1976年)、《同居》(1976年)、《感情的时间》(1973—1980年)等。1972年加入徐浩渊沙龙。

孙康(方含)(1951—)：北京35中初二学生，"二流社"成员。1968年11月到河北徐水(紧靠白洋淀)插队。1969—1970年写有纪念巴黎公社的长诗《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1973年写《在路上》。1974年病退回京，继续创作，写有《谣曲》等。

张建中(林莽)(1949—)：北京3中学生，"文革"中转入北京41中，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是白洋淀诗群中坚人物。有诗集《林莽的诗》(1980年出版)。

宋海泉(1949—)：北京清华附中高一学生，"二流社"成员。1969年到白洋淀寨南插队。白洋淀诗群的中坚人物，写有《海盗船》、《流浪者之歌》等诗。

白洋淀诗群的重镇是在大淀头，在这个村集中了根子、芒克、多多三个重要诗人。其中岳重在1971年夏写作的《三月与末日》，成为白洋淀诗群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之作。

岳重、多多在1970年冬进入徐浩渊沙龙。岳重的《三月与末日》在沙龙发表后，造成巨大的冲击波，当多多坐在北京的马桶上读《三月与末日》

时,感到了一种侵犯和亵渎。他评价岳重是“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徐浩渊立即在沙龙中宣称,“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

沙龙很快对岳重的诗歌达成了共识,知青们开始以欣喜和兴奋来迎接这种“反文化”、“反社会”的新诗歌。其后岳重的《橘红色的雾》也迅速在各沙龙中流传。在上海也出现了《三月与末日》、《橘红色的雾》的手抄本。

岳重的诗在依群之后开启了白洋淀诗群的现代主义走向。它代表了整个群体的反叛精神。白洋淀诗群在其后创作了一系列率真、坦诚、富于叛逆性的诗作,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现代诗歌潮流。白洋淀诗群的崛起,象征着新生代知识分子在文脉断绝的历史条件下,独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崭新话语。知青群体在拥有了自己的语言家园之后,便有能力拒绝加入到“文革”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去。

林莽说,当他在白洋淀农村的灶膛前,读到江河从北京沙龙中带回来的《三月与末日》时,他的浑身像受了电击,全身都在抖动。林莽说,岳重说出了他在白洋淀的“三月”所感受到的一切。岳重对大地的诅咒和绝望,对语言的背叛,都与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既然
大地是由于辽阔才这样薄弱,既然他
是因为苍老才如此放浪形骸
既然他毫不吝惜
每次私奔后的绞刑,既然
他从不奋力锻造一个,大地应有的
朴素壮丽的灵魂
既然他浩荡的血早就沉淀
既然他,没有智慧
没有骄傲
更没有一颗庄严的心
那么,我的十九次陪葬,也却已被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架成的篝火
烧成了升腾的烟
我用我的无羽的翅膀——冷漠

飞离即将欢呼的大地，没有
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
这漂向火海的木船，没有
想拉回它
——《三月与末日》 根子 1971 年夏于北京[29]

我像帆一样
瘫倒在炽亮的阳光的沙岸
……
我伤成这样
我的眼睛看到过的一切
都是杀我的凶手

我到处是创伤
像一片龟裂的土地
我永远地合上了伤口一样的
眼睛
伤口却像眼睛一样大睁着
疼痛
——《桔红色的雾》 根子 1972 年[30]

岳重首先发现了"文革"语言的无意义，对语义本身产生了怀疑。他在《三月与末日》(1972 年)中故意颠覆语义(如大地、春天)，虽然是对社会文化的反动，也包含有对语言本身的怨愤，语言成为"文革"政治的替罪品。摧毁语言的行动，反而激活了死亡的语言。

芒克对意识形态一直怀着超然的态度。他的诗歌洋溢着自然、不羁的性格。他的诗作大部分在传阅中流失，收在《心事》(油印诗集)中的作品，有三分之一是赵一凡搜集、保存下来的。

庄稼：
秋天悄悄来到我的脸上

我成熟了

土地：

我全部的情感
都被太阳晒过

——《十月的献诗》 芒克 1974年[31]

假如胆怯再也不会存在
假如你说了：
快从太阳底下滚开！
那我将一百次地重复
绝不虚伪
你比太阳更可爱

——《给》 芒克 1974年[32]

多多最初的诗是打油性质的：我蹲在大队的厕所里，公社的喇叭像饭碗……侧重于情绪宣泄，艺术上较为粗率。在1972年后开始发生变化，写出一些深刻的句子。如：“过去了，/逝者，/许多年代过去了，/历史像风尘仆仆马车，/再也看不见故乡了……”

林莽认为：“多多的诗近于俄国的阿赫玛托娃、阿利多尼娜·卡耶娃的风格。”多多的诗大多是在北京创作的，读者很难在他的诗中找到乡村的痕迹。多多毫不掩饰自己身上的“布尔乔亚”气味。[33]

不错，我们是混账的儿女
面对着没有太阳升起的东方
我们做起了早操……

——《蜜周》 多多 1972年

虚无，从接过吻的唇上
溜出来了，带有一股
不曾觉察的清醒

在我疯狂地追逐过女人的那条街上
今天，戴着白手套的工人
正在镇静地喷射杀虫剂

——《青春》 多多 1973 年

多多的诗歌创作，总是带有清醒的理智，他大睁着双眼，表现出一种绝望的镇静。他的现代主义取向异常地坚决和始终如一。他的诗句是出色的直觉和清醒的绝望两者的混合体，在白洋淀诗群中最具有现代意味。

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
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
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
那阴魂萦绕的古旧中国的梦
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
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
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
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

——《无题》 多多 1974 年

从 1973 年开始，多多和芒克交换每年的"诗作"，就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他们的诗歌交流没有因为 1974 年的文化围剿而中断。多多说，1974 年他准时拿出了第三册诗集，芒克和他如约进行了交换。他们的诗歌友谊一直持续到"文革"后。

林莽的诗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林莽在白洋淀知青中间曾尽力地搜寻译诗的残章断片。到了 1973 年底，他的本子上已抄有戈雅等十几个外国诗人的诗。他在白洋淀写诗不多，写得较慢，在 1972 年写了 20—30 首。最初的诗作风格接近普希金、泰戈尔和 20 世纪 50 年代的抒情朗诵诗；在 1974—1975 年他的诗作才开始向现代诗转变。

《26 个音符的回想——献给逝去的岁月》

林莽 1974 年夏—冬[34]

O:

专制的幕布，幽禁了大理石的雕像
五线谱在钢琴上发出刺耳的喊叫
在这个盛产高音喇叭的国度
灰制服中有女人柔美的肩肘
谁树起的旗帜下，有一群肮脏的狗

S:

子夜滚过巨大的雷霆
闪电映出一个奔逃的鬼影
紧紧抱着那些由于惊恐而麻木的心
被迷惑的肉体处在急骤的冷雨中
庞贝城颤栗着，威苏维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W:

那个巨大的幽灵，丢失了自己的躯壳
它绕过伦敦雾，向雨中的巴黎走去
然后在大西洋的彼岸徘徊
被阉割的人群向它呼唤着
它走了，历史也没有回过头来

此诗原名“纪念碑”，有50节，后删成26节。“闪电中映出一个奔逃的鬼影”指林彪。1974年是最黑暗的时候，林莽一度抱着绝望的心情，此诗正是在这种心情下写作的。

孙康在1971年创作《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狼牙山》(描写一片无名烈士墓地)。其后，他深入研读马列著作，并读了《修正主义言论集》、《被背叛的革命》(托洛茨基)，开始反思“文革”的本质。他曾将思想随笔夹在油印件中邮给他的同学。在随笔中除了对毛泽东不否定，其余全否定了。他仔细阅读过惠特曼、泰戈尔、普希金的诗作，并受其影响，后来看到聂鲁达、洛尔迦的诗作，他的诗风又有所转变。

孙康说：我的《在路上》试图表达知青辗转周折的命运，诗的布局学的是民歌。饶吉巴桑的民歌中有“从草原来到北京，我想跳个弦子；从雪山来到北京，我想跳个锅庄”。民歌是《在路上》创作的重要诱因。

从北京到绿色的西双版纳
我带回一只蝴蝶
它是我的岁月
美丽的、干枯的
夹进了时间的书页
呵，从北京到西双版纳
岁月消失在路上

——《在路上》 方含 1973—1974 年[35]

宋海泉在 1971—1972 年写了长诗《海盗船》，诗在小圈子里流传。他受到拜伦和泰戈尔的影响，又接受了根子的冷峻风格。因为宋的人缘好，许多朋友向宋讲了他们的故事，但条件是要求保密。宋海泉把这些动人经历视为宝贵的人生财富，他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一定会把所有的珍宝收藏好，如同满载的海盗船沉入海底。"[36]

《海盗船谣》 宋海泉 1973 年写于白洋淀寨南村

一把黑色的宝剑/从剑鞘抽出，/随手刺进黑夜的胸膛。/从隐秘而阴惨的巢穴里，/从那被遗忘的荒凉的巢穴里，/腾跃出来，疾驰而过，/夜色增添黑暗。/啊，无边的黑夜；/啊，无边的荒漠；/还有无数个被黑夜的荒漠折磨的心。//高高地，/高高地被缚在桅杆上，/它那样壮烈地飘扬。/像老鹰一样安详的，/那沉着的，端庄的，/是自由的标志那是黑色的旗帜，/它闪动着冷酷而怪异的光。/今天的风雨之夜，/又有多少船只沉没了。/但我知道，/只有垂死的大地，/永远不会从天边消失。/于是，那繁盛的万家灯火，/得意地摇曳着，/拼命想引诱我。/你以为，/凭这些胆怯的灯光，/就可以把我杀死吗？/你以为，/我会在你身边停靠吗？/你想错了啊，你这衰老的不贞的大地。/因为你早已把我放逐。

诗中歌颂了孤独的海盗船抛弃罗盘，对大地毫不妥协的独立精神和

对自由的渴求。仅此一首诗,足以确立其在白洋淀诗群中的重要地位。

戎雪兰、潘青萍(潘婧)、孔令姚三个师大女附中的女生住在邸庄,她们之间也有诗歌交流。

《行香子——和戎雪兰》 潘青萍 1969.12.14[37]

渺渺故园,隐隐西山,锁重烟,芦荡漫漫。萋萋堤柳,门雾霏然。悠悠碧水,沉野鹜,暗云天。京华结交,常话铭禅。怅何年,天涯行帆? 海角逢春,天示神忏。今事蹉跎,婵娟素,渔火寒。

《友情——赠潘婧》 孔令姚 1971.1.3[38]

透明的玻璃使我们隔房相认,
相像但不一样。
仿佛在银光闪烁的镜面,
印上了两个苦闷的往像。
……

李庄的北大附中女生赵哲、周陲用诗歌记述了她们的情感生活。

深夜从睡梦中惊醒,/包围我的是一片可怕的虚空。/我伸手在无边的暗夜里挽留你,/挽留你神似的幻影。/我怕这悠长的冬夜,/我怕这死一样的沉静,/我怕听梦醒后空寥的回声。/真若如此,让我永远酣睡吧,/——我不愿醒。

——《无题》 赵哲 1971.12[39]

让我把你安放在心灵的哪方? /可是供奉在情爱的殿堂? /哦,我期待的难道就是你吗? /——吻平箭伤的伤痛,一片迷茫。//谁在意这信笔的诗行? /它把我哀哀的情思依傍。/维纳斯,你发错了箭矢? /送来他? 一动我愁烦心伤。

——《情思》 周陲 1971[40]

由于白洋淀诗人辈出,北京沙龙也不由对这块美丽的土地充满了向

往之情，一批知青诗人先后来到这里。1972年，甘铁生来到白洋淀，受到知青们的热情欢迎，知青们聚在一起侃山、划船、游泳。参加聚会的有孙康、多多、林莽、宋海泉和潘青萍、戎雪兰等人。甘铁生1974年再访白洋淀，他与林莽、多多、江河等人喝酒、侃山、下棋，交换诗作和读书笔记，并在当地读了一些"黄皮书"。

江河(于友泽)多次到白洋淀知青点走串，在寨南、北河庄一住就是半年。受到白洋淀诗人们的影响，江河也开始写诗。他住在林莽的集体户里，坐在林莽的炕上写下了最初的诗作。

1973年春，赵振开和史保嘉一同来到白洋淀，同行的还有彭刚。赵振开与芒克在寨南会面，赵振开回忆说："我们划着船，一块儿喝非常便宜的白薯酒，四毛钱一斤。"这是北岛与芒克最初的会见，后来他们共同主编《今天》杂志。芒克这一笔名是赵振开给起的，芒克的外号：猴子，英文是：Monkey，中文音为：芒克。北岛这一笔名则是芒克为赵振开起的，意为：北京，孤独的岛。在"文革"时期，白洋淀成为了文学青年们的一片乐土。

3. 厦门知青文学群落

"文革"期间，福建有很多知青文艺沙龙，爱好文学的知青在一起弹琴唱歌、绘画和搞文学。在永安和三明插队的厦门知青创办了一个油印文学刊物《耕耘》，在1975年出了五六期，大约印100—200本左右。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偶尔也登短篇小说。舒婷曾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诗作。[41]

在福州、厦门等地，对知青进行文学启蒙的导师有诗人蔡其矫和黄碧沛。

蔡其矫在反右运动中作为"拔白旗"的对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北京下放到福建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文革"中蔡其矫被打成三反分子，下放到永安县城郊公社果林场劳动改造。1971年底被"解放"，开始与福建省的文学青年密切交往，并在《耕耘》上发表诗作。1974年北上做"游吟诗人"。在1974—1976年蔡其矫与北岛等人交往，曾结伴到樱桃沟、十渡、沟崖游玩、野餐。这批文学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今天》、《星星》的成员。

黄碧沛是"文革"前厦门大学毕业生,原在厦门电台工作,"文革"中被下放到图书馆当管理员。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学青年",黄碧沛成为厦门文艺沙龙的中心人物。

1968年厦门知青下乡永杭,带去一批书,其中有何其芳的寓言,在知青中传抄。厦门下乡知青舒婷受到何其芳的影响,在1971年开始写散文。后来,舒婷拜黄碧沛为师,学习诗歌。1974年蔡其矫在永安劳动时,黄将舒婷介绍给蔡其矫。蔡其矫向舒婷介绍了聂鲁达、波德莱尔和当代有代表性的译诗,并将朋友陶然(小说家)从香港寄来的一些外国诗作(主要是苏联和东欧诗人的诗作)送给舒婷阅读。蔡还将一些"黄皮书"介绍给舒婷,其中包括曾获列宁奖金的苏联诗人波西尼辛斯基的《人》和苏联诗人佐琴科等三诗人的诗歌合集。舒婷在这之后,诗风有了很大改变。舒婷所写的一首关于西班牙画家戈雅的诗,与波西尼辛斯基的诗作就十分地相似,可以看出二者的师承关系。

在舒婷的成长过程中,蔡其矫起到了重要影响。舒婷在诗集"自叙"中说:她的创作得到蔡的"肯定和支持,并深为他的探索精神所鼓舞;后经过蔡其矫老师介绍,又认识了一些年轻的诗友,加入他们的行列"。[42]

舒婷(龚舒婷):1952年5月生于福建漳州。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发配山区劳动改造。因家庭离异,她长期寄养在厦门外婆家。1964年就读于厦门一中。"文革"开始后,成为逍遥派,躲在家里读巴尔扎克、雨果、老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1969年到闽西太拔公社插队落户后开始写诗,诗作很快在知青中流传。1972年回厦门当工人,干过泥水工、挡纱工、浆洗工、焊锡工、统计员。1978年在油印刊物《今天》创刊号上发表诗作。诗作《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获1976—1979年全国中青年优秀作品奖。198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双桅船》。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她回忆在山区插队时的生活说:"我凝视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在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生活不断教训我的天真。然而这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我看到和听到的故事,那些熟悉而又遥远的面影,星星一样密布在我记忆的天空。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于是我拿起了笔。……我拼命写诗,这

也是一种训练。那段时间我迷上了泰戈尔的散文诗和何其芳的《预言》,在我的笔记里,除了拜伦、密茨凯维支、济慈的作品,也有殷夫、朱自清、应修人的。"[43]

舒婷在1975年前后创作了一批清纯、浪漫的爱情诗,它们与"文革"现实的严酷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赠》、《船》、《心愿》(1975)等诗中,诗人表现出"文革"时代未能磨灭的女性灼热、细腻的情感;满怀着突破道德伦理束缚的大胆憧憬。

> 我为你扼腕可惜/在那些月光流动的舷边/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你拱着肩,袖着手/怕冷似地/深藏着你的思想/你没有觉察到/我在你身边的步子/放得多么慢/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想这样安慰你/然而我不敢……
>
> ——《赠》 舒婷 1975.11.11.

> 一只小船/不知什么缘故/倾斜地搁浅在/荒凉的礁岸上/……满潮的海面/只在离它几米的地方/波浪喘息着/水鸟焦灼地扑打翅膀/无垠的大海/纵有辽远的疆域/咫尺之内/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隔着永恒的距离/他们怅然相望/爱情穿过生死的界限/世纪的空间/交织着万古长新的目光/难道真挚的爱/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
>
> ——《船》 舒婷 1975.6.20.

知青通过现代诗歌寻找到了一种新的语言,他们在文化困境中,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生境",这个"生境"就是用现代诗歌语言支持的村落文化。它是知青适应生存的文化创造,体现出知青群体的生命力。由于拥有独立话语,他们生活在一个较"文革"社会更广阔、更丰富的文化世界。

注 释:

[1]叶永烈:《江青传》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2]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3]汪名凡:《中国当代文学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4]郑宗培:《上海人民出版社重视"三结合"文艺写作组,工农兵队伍不断壮大》《人民文学》1976年2期.

[5]同[3]。

[6]本小节内容引自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1。

[7]参见王光东:《民间与启蒙——关于20世纪90年代民间争鸣的思考》《2000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

这一时期的民间写作水平参差不齐,在民间文本的搜集过程中,能够找到的资料,有不少在思想内容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带有组织化的印记;有的作品相当粗陋、破碎。本书通过整理、选择,努力从中淘洗出一些精品。

[8]白洋淀诗群的诗人多多曾指出,徐浩渊对沙龙文艺的现代主义走向起到了一定影响。他不止一次说,徐浩渊曾是他精神上的导师。(《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4)

[9]这段材料采访自鲁燕生、鲁双芹、张寥寥、牟敦白、芒克等人。参阅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 中国工人出版社1988年。

[10]同[9]。

[11]由鲁双芹、张寥寥提供。

[12]手抄本,由牟敦白提供。

[13]由张寥寥、鲁双芹提供。

[14]情况和手抄件,由史保嘉、仲维光、徐晓等人提供。

[15]史康成沙龙在这一时期的经验主义倾向,参见赵振开1972年2月18日致金波的信。《民间书信1966—1976年》(徐晓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4。

[16]《今天》第八期。

[17]《今天》第九期。

[18]《中国知青诗抄》中国文学出版社1978年。同类诗歌还有

《海岸·贝壳·少年》(徐浩渊 1971 年)、《橘红色的雾》(岳重 1970 年)等。

[19]在这一时期,沙龙中出了自然主义写作倾向。甘铁生在这一时期写了短篇小说《野玫瑰》、《纺车声》等。《野玫瑰》讲男女知青间的畸恋。同时在沙龙流传的还有江河的对话体短篇小说《决斗》,描述男女知青的邪狎游戏。车敦白写有类似内容的小说《回光返照》描写某工人临终前性欲爆发。这些小说以自然主义的笔触记录知青的爱情生活,探寻人的肉体官能性,反映了这一时期知青对爱情和性的观察和思考。(由林莽、车敦白提供材料。)

[20]材料采访自孙康、甘铁生、宋海泉等人。

[21]白王江提供。

[22]材料采访自邓垦、陈自强、杜九森、谢庄等人。

[23]《春波梦》1993 年缩写稿。《邓垦诗选》(2001 年自印本)

[24]陈墨、蔡楚:《鸡鸣集》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3.6。

[25]《诗友》(手抄刊物)总 37 期。

[26]《空山诗选》(手抄本),白杜九森提供。

[27]杜九森:《九九谐诗》 天地出版社 1996.3。

[28]材料采访自白洋淀诗群的芒克、孙康、林莽、宋海泉、甘铁生、潘青萍等人。参阅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中国工人出版社 1988 年。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沉沦的圣殿——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4。

[29]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88 年。

[30]手抄本,由杨东平提供。

[31]《今天》第二期。

[32]《今天》第五期。

[33]多多:《多多诗选:里程 1972—1988 年》(油印本)1988 年。

[34]林莽:《林莽的诗》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0 年。

[35]《今天》第三期。

[36]由宋海泉提供。
[37]手抄件,由潘青萍提供。
[38]同[37]。
[39]郝海彦主编:《中国知青诗抄》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78年。
[40]同[39]。
[41]有关材料采访自蔡其矫。"文革"后黄碧沛移居香港,后病逝于香港。参阅《七家诗选》(舒婷自叙)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42]舒婷:《生活、书籍与诗》《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4。
[43]舒婷:《双桅船》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

第七章

“文革”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的知青文学（1973.8—1976.10）

一、上山下乡运动后期知青文学的历史背景

1. 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期——进入绝境[1]

1972年，福建莆田县下林村小学教员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反映下乡知青的困境和自己家庭的困难，批评干部子女“走后门”。毛泽东于1973年5月6日复信，并寄了300元，信中说：“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的复信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大反响，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被迅速提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日程。

在毛泽东复信的第二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解决知青问题。国务院派出13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学习调查小组”，分赴12个省、自治区进行调查。6月22日，“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文件。8月4日会议《报告》和两个附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送毛泽东圈阅，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形式转发全国，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

会议结束，正值毛泽东“再教育”指示发表5周年，全国借机大搞宣传庆祝活动。各地相继召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中央文件，派出工

作组,宣传落实知青政策。上山下乡运动重整旗鼓,试图再次掀起高潮。1974—1976年,全国城镇动员知青下乡约600万人。

1974年1月1日国务院知青办成立,此后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知青办。各地开始重新健全知青工作机构,制定长远规划,严惩迫害知青的罪犯,解决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同时重新调整安置形式,改分散插队为在大队或生产队设青年点,尽量在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城镇知青,并试办集体所有制农场,试行株洲模式(厂社挂钩安置),建立干部带队制度。

由于生产建设兵团长期经济亏损,1974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撤销了云南、福建、广东生产建设兵团和广西、宁夏农建师。1975年相继撤销了内蒙古、江苏、安徽、浙江、山东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西、西藏、甘肃、青海、陕西的农建师,1976年春季,撤销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上山下乡的政策宣传,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扎根农村”,但是知青工作会议之后,各地区迫于形势,开始放宽回城政策,有的地方不鼓励知青扎根农村,出现“全锅端”;有的采取轮换的方法,使经过几年锻炼的知青能够回城,以推动新知青下乡。这些做法在知青安置工作上,引起了“再教育”还是“扎根”的争论。

“扎根论”认为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农民。“再教育论”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是“接受再教育”,没有要求下乡青年一定要在农村扎根。“平等论”认为,在招工政策上要城乡青年一视同仁,虽然直接从城镇毕业生招工可节约经费,但是不利于消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要算经济账,不能只算经济账”。“扎根”还是“拔根”的辩论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新政策和调整、改革,只是维系了上山下乡运动,并未能解脱整个运动的困境。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由高峰传向低谷的重要标志。

全国知青会议后,在全国实行“五种人”政策,对家庭有困难的允许留城。武汉市1969年高、初中毕业生政策留城的仅占总数的2.6%,1973年后逐年上升,在1974年上升到19.9%。其间“两招一征”(招工、招生和征兵)、病退和困退,也有相当部分知青离开农村。兵团改革后,人心涣散,病、退人数迅速增加。由于返城人数逐年增加,在知青中形成了一股返城

风。

尽管有关部门对迫害知青的行为进行"严打"，但是在上山下乡后期迫害行为并没有停止。据国务院知青办统计，1974—1976年，全国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8万起，其中约三分之一案件未得到及时处理，"非正常死亡"知青将近1万人。奸污女知青的案件仍很突出，辽宁省1973—1976年1月上旬，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1300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件1130起。

上山下乡运动发展到后期，已经声名狼藉，人人视为畏途，运动开始走入了绝境。无论是广大知青，还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都不得不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重新思考。

2. 阴谋集团的崛起

由于"文革"动乱持续了多年，全国上下人心思治。毛泽东顺应这一要求，提出了"安定团结"的口号。毛泽东力求消除"文革"运动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在坚持"文革"理论和成果的前提下，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是这一目标自身存在矛盾，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毛泽东一方面支持周恩来、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另一方面，他为了巩固"文革"成果，又支持了一系列"反右倾"运动，造成了1973—1976年间运动的时起时伏，忽左忽右。

在这一时期，当权者遵照毛泽东讲的"安定团结"进行拨乱反正；阴谋集团则打着"巩固'文革'成果"的旗号，攻击当权者。两条路线的这种尖锐冲突，最终造成了在毛泽东看来，一放就右，一收就乱的局面。

1974年初，全国范围展开"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试图通过这一运动，扭转1972年当权者们纠"左"造成的对"文革"的否定。这一运动使"九一三事件"后渐趋稳定的政治局势遭到了破坏。各地帮派继续搞揪斗、打派仗，有的提出"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煽动停产停工，许多单位领导班子重新瘫痪。"批林批孔"运动使工业生产再次下降。

毛泽东虽然坚持自己的路线，但他对可能引起新动乱的因素也十分注意，并力求避免。在1974年10—11月，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下发通知，传达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

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主观上想通过四届人大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

江青认为四届人大是接班的重大机遇,试图由她来出面组阁。她组织上海市委和两校(北大、清华)的写作班子发表文章,鼓吹"中央法家领导集团"。毛泽东反对江青组阁,公开发布:"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总理还是总理","小平人材难得"等指示。但是毛泽东在四届人大上,仍然给予江青集团分管文化部、国家体委、卫生部的权力。同时,张春桥作为副总理仍然主管文教工作。于会泳担任文化部长,组成清一色的江青班底。这就为江青集团在文教、艺术领域进行阴谋活动提供了条件。

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1975年初,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他首先在铁路、钢铁方面进行整顿,国内形势出现了由乱而治的转机,各条战线开始全面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后,在1975年底停止了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并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在197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什么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泽东这一讲话成为江青集团继续坚持和发展'文革'极左路线,全面进攻权力集团的理论依据。张春桥在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基础上发展"继续革命"理论,提出"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政治公式,企图全面打倒权力集团。[2]

在毛泽东逝世后,江青集团紧急布置所属的写作班子和剧团,组织创作出一批阴谋文学、阴谋戏剧、阴谋电影、阴谋音乐,作为攻击"走资派"的政治炮弹,为夺取权力进行舆论准备。

3. 阴谋文学

(1)江青集团领导的阴谋文学活动

1974—1976 年政治运动迭起，江青集团在历次斗争中利用文学为其阴谋政治服务。阴谋文学是在一系列政治阴谋中产生出来的，从一开始就成为阴谋政治的工具。阴谋文学本质是色厉内荏，这是阴谋文学与绝对权威文学许多区别的重要一点。

1974 年 1 月，毛泽东为阻止对"文革"进行"右倾翻案"，批发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江青集团借机进行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的阴谋活动，大搞"批林批孔"文艺，批"周公"、"宰相儒"、"现代儒"，以及批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批"无标题音乐"和宣传风庆轮远航。

1975 年夏天，在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毛泽东又批准发动"评《水浒》"运动，反对"投降派"。江青又借"评《水浒》"之机，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

在 1976 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江青集团大力开展文艺大批判运动，组织创作了一批反"走资派"的作品。在毛泽东病危后，随着夺权斗争升级，江青集团围绕着夺权斗争，组织了一批电影、戏剧，将阴谋文学推向高潮。

1976 年 2 月，江青、张春桥指示："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此后，文化部向下属文艺团体和报刊、杂志，布置"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创作任务，其后组织创作出了几十部阴谋戏剧、阴谋电影。[3]

1976 年"四五事件"爆发后，"文革"官方调动"首都工人民兵"、警察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事件后，江青集团发动大规模的全国性大清查、大逮捕。针对"四五诗歌"运动，江青集团也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诗歌运动、歌咏活动。诗歌、小说、戏剧，甚至美术片、曲艺、电视等艺术门类都被充分调动起来，投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2)阴谋文学体系的建立

1974—1976年,阴谋文学通过对"三突出"原则等重大艺术理论的改造,开始形成一套独立的文艺理论体系和创作经验。创作出一批配合夺权的阴谋文学、阴谋戏剧和阴谋电影。至此,这种艺术结束了自身的蜕变,形成了以"阴谋文学"为代表特征的文学体系,彻底走上了阴谋文学的道路。

随着"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上升为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江青集团开始重新解释"三突出"创作原则,提出要把"同走资派斗争的英雄典型",作为路线斗争的"中心人物来写"。"三突出"创作原则被用来塑造"文革"运动中的造反派、与"走资派"对着干的工农兵、反资产阶级法权的小将等一系列"反潮流"的斗争英雄。

江青集团从样板戏的"三突出"艺术原则,推导出政治斗争的"三突出"原则。他们在报刊上公开提出:要"突出阶级斗争,突出路线斗争,突出同走资派斗争",要在这三种突出中,"突出最后一种"。这样"三突出"原则就被赋予新的政治内容,使这一原则的绝对权威政治内容,转化为阴谋政治。它的政治内涵和政治主体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新的"三突出"中,新英雄形象具有全新的政治意义。新英雄不仅体现着新的社会阶级关系,而且反映着新的社会冲突规律。[4]

在1976年前后,随着权力斗争的加剧,江青集团推出一批与"走资派"斗争的大型作品,塑造出一批新英雄形象,他们斗争性更强,级别更高,都是各地各部门的领导人或帮派大头头。如《决裂》中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龙国正,《典型报告》中的省常委、造反派出身的年轻干部于强。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以王洪文为原型的工人造反派铁根,以张春桥、姚文元为影子的党委副书记井峰(戏剧《盛大的节日》),以江青为影子的批邓英雄江涛(电影《反击》)等系列形象,对江青集团的领导人加以神化和歌颂。"三突出"原则由塑造一般英雄人物,发展为制造新的领袖崇拜。

阴谋文学把重新解释社会现实作为文学的重要任务。继《虹南作战史》之后,出现了一批运用政治逻辑构置的理想社会("社会蓝图")小说。小说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就是以毛泽东"五七指示"和反"资产阶级法权"理

论为基础，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文革”社会。在1972年后，“社会蓝图”小说开始逐步形成固定的叙事套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江畔朝阳》（1973年）、《万年青》（1975年）、《大海铺路》（1974年）等。[5]

这种长篇小说根据后权威理论，推导出一套人物关系模式，演绎出一个标准化的社会生活蓝图，小说集中了各种社会学符号，综合了各项革命策略，它实际上是后权威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国。“社会蓝图”小说体现了“文革”时代特有的政治化审美倾向。

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斗争中，不仅借用知青的政治力量，而且十分重视红卫兵、知青的话语资源，注意借用知青文学的宣传力量，将红卫兵文艺、知青文学纳入其阴谋文艺活动。

江青集团扶持的知青文学，其产生、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阴谋。在当时创作机制的控制和操纵下，这些作品不可避免的，要遵守江青集团的政治路线和艺术原则。大量的这种知青小说、诗歌都采取了所谓工农兵的语言，按照新的“三突出”原则，塑造出“反潮流”的知青英雄。几乎所有的知青长篇小说，都受到了“社会蓝图”小说的影响。

二、阴谋集团扶持的知青文学

组织和推动阴谋集团主张的知青文学是江青集团对当权者展开文艺斗争的重要步骤。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起始于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在1973年以前的官方文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由此在1975—1976年间出现了知青话语真伪混杂的局面。

阴谋集团扶持的知青文学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是攻击“走资派”的宣传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控制知青群体的思想工具。一些作品突出宣传所谓的红卫兵打倒“走资派”的历史传统，以及知青紧跟后权威集团的政治觉悟，制造出一阵“反潮流”的虚假喧嚣。在一些越俎代庖式的创作中，

作品中着意突出所谓的"我们",以隐蔽主体缺席的真相。阴谋集团知青文学的产生,促使知青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1. 知青群体的分裂

凡是经历过这一时期的知青都清楚,不能简单地否定早期的"扎根派",因为他们具有献身精神真诚地相信知青到乡村当农民,做消灭三大差别的铺路石是正确的。他们属于知青内部的一个思想派别。

在1974年之前,"扎根派"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知青模范"为骨干的"组织化"的"扎根派",它是"文革"官方政治系统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仍处于民间状态的执扎根观点的知青群体,后者由于其非组织化倾向,不被"文革"官方认可。

在1974年之前,"扎根派"与"不相信派"的活动都被规范在知青内部。他们相互间的话语交流和论战,都是以地下方式在知青内部进行。"扎根派"(《决裂,前进》、《大雁》)的作品和"不相信派"(白洋淀诗群)的作品,同时在知青内部流传,并未超出知青的范围。[6]

在1973年夏,张春桥已经提出"要锻炼一支反潮流的干部队伍",江青等人的目光开始注意到知青群体。1974年后他们开始树立一批知青模范,把他们作为"反潮流"的典型。

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中分析指出,这些知青模范不同于以往,他们并不是因为在生产、科学实验和文教卫生等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而是得益于政治上的某种"反潮流"行为。这些知青模范的产生带有地域性,大多出自江青集团有效控制的地区,如毛远新领导的辽宁省推出了吴献忠、张铁生、柴春泽、刘继业等人;张春桥领导的上海市,推出了上海知青朱克家等人。他们被迅速提拔,进人党和国家领导层。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党委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朱克家升任云南省"批林批孔"办公室副主任,省团委书记,并突击人党,成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人大常委委员。张铁生、柴春泽、朱克家等一批知青典型,后来成为江青集团历次政治运动的急先锋。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发动,江青派浩亮到河南郏县"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并托他给下乡知青送去了亲笔信。她在信中鼓励知青要"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浩亮告诉知青代表，这场"批林批孔"运动"没有框框"，在政治上"要敏感"，"要关心路线大事，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江青的这封信经过国务院知青办渠道迅速传遍全国，各省知青办要求将这封信传达到所有下乡知青，发动他们参加"批林批孔"运动。[7]

在1976年3月，《人民日报》前后连续发表了全国各省、市下乡知青和知青大学生致毛主席的多封公开信。甘肃省60名各族下乡当农(牧)民的大学工农兵毕业生在信中说："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破坏革命新生事物的卑鄙企图已经破产，翻案不得人心"，"他就是刮十二级台风，也休想动摇我们扎根农村已经铁了的心"。"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全体下乡知青在信中说："用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这些知青公开信都采用的是标准的江青似的话语。

1976年6月，辽宁省主要负责人，召开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座谈会"，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扎根与拔根"联系在一起，并以吴南忠、张铁生、柴春泽等19名下乡知青的名义，发表了一封给全省人民的信《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此信。张铁生、刘继业等人，到处串连演说，散发信件，向邓小平"开火放炮"。[8]

随着江青集团别有用心地树立知青模范典型，早期"扎根派"发生了分化和转向，一些知青"扎根派"开始被纳入组织化轨道。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74年闻名全国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师33团上海知青和本地青年组成的业余学习小组"江帆"，曾是一个自发的"扎根派"小组。在"江帆"被官方肯定之前，他们还处于知青群体内部，在被官方宣传报道后，即被"组织化"，成为"文革"社会的一部分。

由于"知青模范"与江青集团形成了日益紧密的政治关系，整个知青群体开始孤立"知青模范"。就在"组织化"的"扎根派"发展成为江青集团控制知青的组织体系和政治工具的同时，非组织化的"扎根派"也开始向"不相信派"转化。此后，在知青内部不再有"扎根派"，几乎所有知青都转化为"不相信派"。这样，在1976年前后，随着知青派别新格局的出现，江青集团试图控制知青群体、打破知青亚社会系统的政治策略完全失败了。

黄一丁和刘宁"公开"论战的事件,是一个代表性的例证。1976年4月26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东北兵团知青刘宁和回城知青黄一丁"针锋相对的两封信"。这是知青内部的思想争论首次在官方报纸上被公开曝光。

整个事件的过程,先是刘宁将黄一丁的书信作为"思想汇报"上交,团党委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兵团党委的报告被写入《北京日报》内参,谢静宜看后认为是反击"右倾翻案"和"返城风"的好材料,指令公开发表。《北京日报》为此发表编者按:黄、刘的通信反映了知青上山下乡中,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刘宁的复信"立场鲜明、气势磅礴",发扬了"红卫兵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黄一丁在书信中,对上山下乡运动表现出苦闷和迷惘,而刘宁的复信则猛批黄一丁身上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做了"资产阶级应声虫",正在"堕入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泥坑"的边缘。这场论战,以黄一丁的长篇检讨《我对"怀疑论"的认识和批判》收场。整个讨论,黄、刘二人都已"身不由己",受到阴谋政治的控制、指挥。这场论战充分暴露出"扎根派"的异化,使广大知青了解到,"扎根派"知青模范是多么容易受组织操纵、控制,成为江青集团手中的工具。这一事件有力地推动了知青内部格局的调整。

在1976年前后,成为江青集团政治工具的"知青模范",受到了广大知青的一致鄙视和谴责。一位哈尔滨知青给"知青模范"柴春泽的信中说:"你知道你们作下了多大罪恶 ,全国下乡青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将来是多么可怕,后代断绝……请你不要总带这个头,19名知青代表不了全国青年。"[9] 这封信具有代表性,它清晰地表达了广大知青对"知青模范"的政治态度。

知青群体内部发生的这场冲突,实际上是一次政治上的大决裂。知青内部在抵制后权威主义方面达到了空前的思想统一。同时由极少数"知青模范"组成的贵族阶层开始形成,作为"文革"运动的受益者,他们实质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知青身份,成为知青群体的管理者、组织者。这种分化在当时已经引起了知青们的不满,内蒙兵团知青当时曾有一首歌写道:"电灯照在大瓦房,光线多明亮。如今当上了副科长,前途多辉煌。再见吧,朋友们,休想让我帮忙,如今站在九霄之上,看你们挣扎在泥塘。"[10]

辨别知青文学真伪的重要标准,是鉴别创作者的真实身份和主体意

识。经过"文学创作班"和"业余演出队"学习训练的知青创作骨干,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具有了多重身份,他们或成为文书、秘书、机关工作人员,或成为半脱产和全脱产的演员、创作员、报道员。"组织化"使知青作家实际上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青。一些致力于"文革"官方文学创作的知青,写作的根本意图实际上为了改变自己的知青身份。所以,"组织化"的"知青文学",实际上是由一批已初步改变知青身份和希望改变这种身份的知青所组成的。[11]

阴谋集团控制的知青文学与民间文化村落的冲突,不再是知青群体内部的冲突,它上升成为"文革"社会与知青亚社会的冲突,江青集团与知青群体的冲突,"组织文学"与"非组织文学"的冲突。

2. 知青文学的伪知青文学化

以1974年为分界线,前后出版的知青小说在思想倾向上有很大的差别。1974年之前的作品,大多可归入权力文学的范畴,1974年之后的作品,由于江青集团的介入,作品大多可以归入伪知青文学的范畴。尽管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但它们都经过组织化,不是知青自由创作的、真实反映自身生活的作品,都可以把它们都归于伪知青文学。

(1)短篇小说集《峥嵘岁月》、《山里红梅》

在1974年之前,各地出版社曾有计划地出版了一批知青小说集。它们的思想内容基本上可以归人权力文学的范畴。如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知青短篇小说集《峥嵘岁月》、《山里红梅》。

《峥嵘岁月——上山下乡知青短篇小说集》1973年6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小说19篇,大多数作者是年龄在二十岁上下,初次发表作品的知识青年。小说集的主旨是反映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成长。

小说集中有关"阶级斗争"内容的作品仅有二三篇,即使是写"阶级斗争",也只是"打死老虎",而不是抓"现行反革命"。如《峥嵘岁月》中,写包大伯抓住破坏"排桩"的狗地主何仁德。

小说集的主要内容写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难忘的冬天》讲述,知青赵志刚在老贫农教育启发下,以电力加热器代替柴火。小说选择“科学实验”这一主题,是出于对“文革”前“三大革命实践”口号的支持,体现出创作组织者的怀旧意识。

小说集的创作手法明显受到了绝对权威艺术观、创作方法的制约影响,但是由于实施“组织化”的是“当权”,所以“三突出”、“主题先行”和“组织化”的创作方法被用来为其政治服务。小说熟练地运用“三突出”创作原则,塑造了“贫下中农”和“生产队”干部的高大形象,如《“特别任务”》中的生产队长水东,《老当家》中的老职工赵大伯。在“贫下中农”高大形象的背后,也总是有一个正确的领导干部在支持他。

《长跑线上》讲述,省委干部的子弟高小凡下乡锻炼,在贫农石大爷教育下成长,他在体育训练中,不仅自己努力训练还帮助同学张军,在县田径比赛上,为了不踏伤摔倒的张军,小凡扭伤了自己的脚。县里以《运动场上小英雄》为题发出通报,号召“全县的青少年都应该向他学习”。县里决定将小凡选进县代表队,参加省的比赛。高小凡的老师(知青),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这篇小说表面上是歌颂干部子弟高小凡,实际上是在歌颂高小凡的父亲——革命干部。高父——教员——石大爷——高小凡的关系,暗喻着干部与人民之间的父子关系,干部与知识分子的领导关系。

《峥嵘岁月》的事例表明,绝对权威艺术规范同样可以被袭用,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规范本身,而在于艺术的主体是谁。同是“知青文艺”,在不同的“组织化”背景下,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知青文艺骨干在不同的政治组织者和“组织”面前,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创作倾向。无论是作品内容是伪知青文学化或当权文学化,其创作过程的“组织化”都是同样的,在主体性的丧失上,两者并无区别。它从正反两方面表明了公开的“知青文艺”都不是以知青为话语主体的,同属于伪知青的。

当权文学强调知青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阴谋文学则强调知青要在农村当“反潮流”的先锋。前者描写的知青幼稚、动摇,必须接受干部子弟(干部的化身)的教育;后者描写的知青立场坚定、高瞻远瞩,勇斗“走资派”。同是知青在两种文学中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象。无论是何种形象,都是不同政治势力对知青所作的命名。

《人民日报》(1973.9.26.)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峥嵘岁月》和《山里红梅》这两部小说集。文章认为《峥》与《山》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反映不深刻，在表现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总路线，揭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方面，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努力。这表明了阴谋政治对这两部小说集表现出的非"文革"化倾向十分不满。对有当权者倾向的知青文学的批判、阻击，为后权威主义的知青文学发展开辟了道路。

(2)长篇小说《分界线》、《剑河浪》、《征途》、《铁旋风》，短篇小说集《农场的春天》

在1974年之前，官方"知青文学"的主要内容，环绕着"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随着江青集团阴谋政治的发展，在1974年后"知青文学"的主题，开始由"再教育"转向"与走资派斗争"。江青集团对知青文学中的政治主题进行大转换，显然是出于其政治斗争的需要，就像"文革"初，"中央文革"支持红卫兵起来造反一样，江青集团再次呼唤知青"反潮流"做政治阴谋的炮灰。以下儿部知青小说，属于典型后权威主义的知青文学。

A. 长篇小说《分界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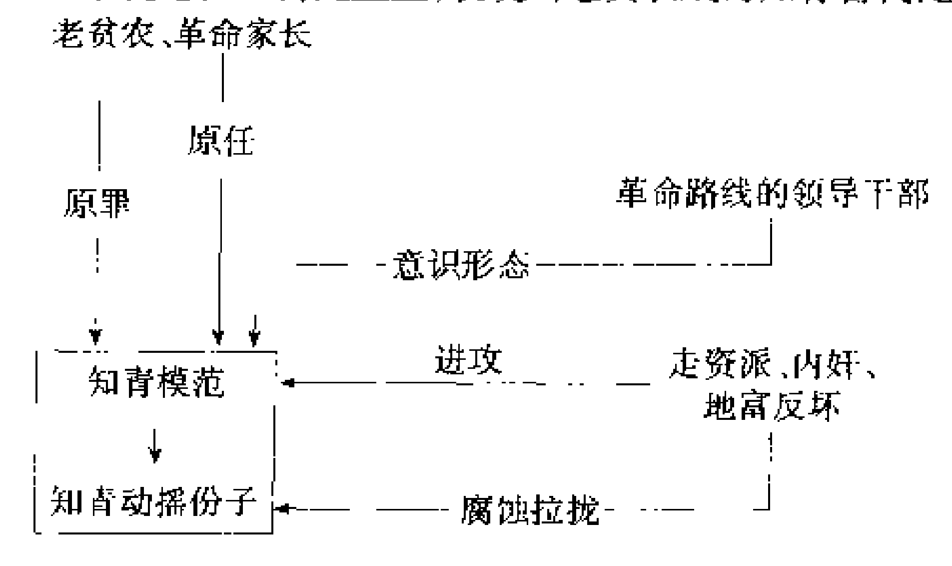
《分界线》(张抗抗，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反映黑龙江农场知青扎根生活。1973年伏蛟河农场五分场受涝，围绕着对东大洼的扔与保，展开了两条路线斗争。以耿常炯为代表的知识青年同工作组长霍丽进行路线斗争，最后揪出机耕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尤发，坚定了知青们扎根农村的思想。小说塑造了在农村落户成家的老一代知青郑京凡和本来可以留在上海而坚持扎根的新一代知青耿常炯，把他们作为与工农相结合的理想典范。两代知青表现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发展。老知青郑京凡的父亲给知青讲述抗联故事，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感召，指出他们身负的历史责任。在小说结尾，知青们在堤上燃起篝火畅谈农场未来修水库、办科研班、办俱乐部和五七大学的光明远景。

小说结尾，知青们写了一封《革命青年扎根农场的公开信》，信中说"要把我们的农场真正办成一个亦工亦农亦军亦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我

们必须在农场的每一寸土地上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有一股妄图否定'文革',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妖风,其中有人千方百计把我们青年引上修正主义的邪路……现实阶级斗争提出尖锐问题,上山下乡的路还要不要坚持?"耿常炯读信后认识到:这就是一条"鲜明的分界线",要"将自己无条件地没入工农之中。在广阔天地的革命熔炉中,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坚强的接班人"。这一段文字,是作者对全书主题的总"宣喻"。"鲜明的分界线"是按照后权威路线划分的。

小说环绕知青群体配置了不同人物,使其各自承载和表述了"原罪"、"原任"的思想主题。

这里的所谓"原罪"与文学革命(1919—1927年)、革命文学(1927—1937年)阶段,知识分子民粹主义的"原罪"感,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它是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这种"原罪"已不再是20世纪20—3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它现在是"文革"政治的"命名"。知识分子的"改造"完成与否,已经必须由他人来评定。小说描述了知青的无能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小说还在人物配置上,表现出老贫农成为知青替代性的父亲。



这里的所谓"原任",同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文学时期的"原任"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世纪初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原任"发源于儒家的"仁学"传统,在民族危难的历史情况下,这种"原任"感,导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积极推动文化启蒙,持续进行文化革新。

小说中的"原任"却是由"他者"出面提醒青年知识分子,继承革命是他们的历史使命。通过老房东忆苦思甜,讲家史、场史,父亲讲述革命传统,将革命历史与当前的阶级斗争串连在一起。知青的"原任"是由他们的血统和革命先辈的牺牲所赋予的,是先于他们的出生就已经"存在"的,阶级斗争成为他们命中注定的"原任"。认识血缘、家史,向本阶级归属的过程,成为寻找到真我的过程。"原任"在这里,凸现出它是由阶级斗争的"前史"和"宗法"构成。这种知青的"原罪"、"原任"与现代革命史上的知识分子的"原罪"、"原任"已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内涵。

《分界线》与当时公开发表的同类知青小说有所不同,在相似编码下存在着自己的某些特点。虽然是一部"文革"官方文学,却带有知青扎根派的色彩,展示了扎根派的理论。小说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表述为知青群体被"文革"社会融合、组织的过程。

小说的一些细节明显具有指向性,它们都指向知青群体的内部,如小说描写了知青群体中的一些阴暗面和内部冲突。有的知青家长利用职权用汽车指标将子女调回上海,坏分子利用给女知青介绍有城镇户口的对象,拉其下水,知青团支书为上大学放弃原则等。

小说最初有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一是知青内部围绕扎根问题的斗争,一是老职工与农场走资派的斗争。知青内部矛盾线与农场路线斗争情节线,时而交织,时而分离。知青模范耿常炯加入农场两条路线斗争,打破了知青群体的相对独立性,知青群体最终投入农场路线斗争,扎根与建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条线最终合为一条线。

小说描写了知青们艰苦而沉闷的集体生活。耿常炯拼命地挖渠,经受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艰难的思想探索。这些场景的描述,使小说弥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苦难感。这种苦难感,源于知青群体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扎根边疆,与农场的路线斗争和艰苦环境相融合,完成自身转化,还是拒绝融合和转化?在捉阶级敌人和反腐蚀的情节后面,一直存在着这种冲突和两难。反映出扎根派的理想后面隐含着一种对被组织化和被乡村融合、吞食的恐惧和焦虑。这种内在的苦难感,可能正在于对知识分子潜质、对城市文明的依恋。

小说在这里提出一个历史性问题:为了消除三大差别,知青扎根做农民——即青年知识分子的自觉转型,是不是一代知青必须作出的牺牲,必

须担负起的历史责任？小说的两条线(扎根斗争和农场路线斗争)正是在这一点上交会。

小说提出的知青群体自我消解和与“文革”社会融合，同“接班”是一致的，只有成为“文革”社会的一部分才能成为接班人。小说特殊之处，在于知青不再是“被教育”者，而是开始扮演社会政治斗争的核心角色。小说用大量篇幅描述了耿常炯和郑京凡在农场路线斗争中如何发挥领导作用，如何与走资派斗争。这表明了作者的一种期待，通过转型获得社会承认，从而能够扮演社会权力者的角色。从这一点看，耿常炯预示了正在成为接班人的“扎根派”形象，具有卡里斯马典型的意义。知青贵族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

小说中设置了一个被提拔到领导岗位的知青南进，她作为“工作组”成员来连队管理知青。南进的新社会角色，具有象征性意味。南进代表着被社会接纳的知青贵族。在这里，显露出作者追求被“组织化”与“文革”社会现实相融合的努力。知青薛川作为渴望上大学的典型，最终转变了上大学的思想，决心扎根农村，而贫农的子女李月霞被选送入大学。这一切，都构成知青群体自觉的自我消解和转型。一个知识青年要使自身被“文革”社会所接纳，就必须完全消解为“零”。

“文革”中的所有知识分子都清楚，“思想改造”是终其一生也无法完成的。知识分子永远处于接受“再教育”的位置，这是他们被剥夺话语权力后的历史命运。在这部小说中，知青群体却由被社会改造者，变成了改造社会者，这种命运的转换，是发人深省的。

这种长篇小说的总体构思是社会学的，作者把小说视为一种社会学发现和表述工程，围绕理念的阐述设置冲突，从宏观上摆布人物关系，如“文革”前老知青郑京凡与新知青耿常炯关系的设置，薛川与李月霞命运的换位。《分界线》集中了后权威文学的主要编码手段，是一部典型的社会蓝图小说。

B. 长篇小说《剑河浪》、《征途》、《铁旋风》

《剑河浪》(江雷)1974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的一种，当年印刷了51万册。它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描写，经过"一月革命"洗礼的上海红卫兵柳竹慧和战友们，在"文革"高潮中到滨海红霞村插队落户，在革命前辈的带领下，引剑分洪，海上擒敌，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挽救了忘记党的基本路线的公社领导，挖出了隐蔽很深的敌人。

小说以红卫兵柳竹慧、老贫农严德铁为一方，以公社副主任冯志凌和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大队会计孟振甫为另一方，双方短兵相接。小说紧紧扣住知识青年到农村是当"扎根派"还是"飞鸽派"这个主题，层层深入。小说通过抗洪、调队、草木灰事件等情节的描绘，逐步把这一矛盾推向高潮。小说着重刻画了柳竹慧和葛辉、陈阿根、李淑敏等先进青年的英雄形象。

《征途》（郭先红）197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具有传奇性和抒情性的知青题材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1976年被拍成电影。小说讲述，1969年一批上海红卫兵到黑龙江边疆插队落户，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接受再教育，茁壮成长。

小说主人公知青钟卫华，以金训华为原型，被塑造成为"高大全"的革命超人。小说对边疆插队生活进行了浪漫的描述，如边防线上潜伏、荒火、抗洪、抓苏修特务等等。东北的自然风光、地域特色，也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引起许多青年读者的兴趣。《人民日报》（1974.7.31.）发表北京大学虞斌的评论文章，称赞小说"塑造了一代新人的英雄典型，赞扬了他们同旧传统的观念决裂的反潮流精神"。

长篇小说《铁旋风》（王士美）197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以强小兵为首的北京知青，高举红卫兵战旗到腾格里草原落户。苏修特务潜人境内；党内走资派、公社副主任玛拉扎布对"文革"心怀不满，伺机复辟资本主义；披着"老荣军"外衣的反革命朗布，潜伏破坏，知青与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小说将知青生活写得十分浪漫，不是抓羊肉、马奶酒，就是骑马在大草原上巡逻放哨；还有扑烈火、驯烈马、歼豺狼等戏剧性场景。作者把知青生活写得富足、浪漫，令人神往，惟一不足是草原上蔬菜吃得少一点。

这几部小说都注意到冲突的戏剧性、情节的曲折性，注意到浪漫主义情调和理想主义激情的结合。引人注目的是，这几部长篇小说中的知青主人公都是当年的红卫兵，共同强调了红卫兵到知青的转化过程，从而打通

了知青"反潮流"与红卫兵"反走资派"之间的历史联系。小说塑造的知青都是"比现实生活更典型、更完美的"的英雄人物,具有对走资派勇猛战斗的精神。

C. 短篇小说集《农场的春天》

短篇小说集《农场的春天》,1974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均为国营农场知青。

《"农垦68"》描写一群曾经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立即背起背包,满怀豪情地走向农场。他们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乐务农"和其他什么"农"。《长江后浪推前浪》描写了勇于抵制错误领导的"出色的年轻干部"闻松华。《会燃烧的石头》描写了勇揭大字报,有"硬邦邦"的"石头脾气"的二根。《雏鹰》描写了喜欢在关键时刻大叫一声"我来!"的楚英。《北京时间》描写了"永远跟着北京时间前进"的新雁。在这部小说集中,成功地完成了知识青年由"接受再教育"到革命"先锋"的政治角色转换。

任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在《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农场的春天〉代序》中说:"有这样一个争论:能不能把先进青年的形象写得很高大、并成为一部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我们认为,这首先不是个理论和概念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既然三大革命运动的现实斗争已大量地造就了这样的人物,文艺作品为什么不能写,甚至把他们写得比现实生活更典型、更完美些?""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反过来在现实的矛盾斗争中发挥战斗作用。"[12]在后权威文学理论的支持下,知青的政治地位开始直线上升。

(3) 话剧《山村新人》

六场话剧《山村新人》(吉林省《山村新人》创作组)在1974年公演后,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

剧情讲述,在"批修整风"运动中,知青重新焕发当年的造反精神,起来再次与走资派进行斗争。方华等一批知青在靠山屯贫下中农支持下,同暗藏的国民党分子王德山和背后支持他的公社赵副主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3]

剧中批判了知青中存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资产阶级处世哲学”，号召知青要信仰革命的斗争哲学。剧中知青户长贫农张二婶给公社党委写报告说：“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咱们贫下中农不同意赵副主任的做法。”“革命就是造反动派的反，没个敢闯敢干，敢杀敢拼的不听邪劲，能动那些旧玩艺儿一根毫毛吗？咋个培养青年人，是路线问题。为了把革命接续到千秋万代，我们不要小绵羊，要小老虎！”

话剧通过红卫兵袖章的失与捡，呼唤知青要重新焕发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为革命立新功”。编导者一个劲儿给知青煽风点火，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年我们反过旧北京市委，今天还怕什么？

刘师农：方华，别忘了咱们待的是农村，地位是接受再教育，不像“文化大革命”你当造反派头头那时候了，今儿个批判，明个斗争的……

方　华：这正是咱们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应该在贫下中农带领下继续发扬，怎么能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立起来呢？

刘师农：你出去听听，人家都在讲你什么。棱角太大，在这吃不开！

方　华：师农，我们是第一批响应毛主席号召，戴着红卫兵袖章来到山村的，可不能忘记我们肩负的责任呐！

刘师农：我一点也没忘，好好接受再教育就是了。

方　华：可接受再教育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是做河里的卵石越磨越圆滑，还是做革命钢刀越磨越锋利？师农，现在有人极力用旧思想来影响我们，这不是没有政治目的的！

刘师农：请问，这政治目的指的是什么？

方　华：很清楚，让你放弃阶级斗争，睁一只眼保护自己，闭一只眼丢掉革命！

当知青刘师农受了王德山的欺骗，要离开靠山屯，方华拾起刘师农丢弃的红卫兵袖章。

方　华：(心情激愤、严厉地)你回来！(战友掉队，异常难过，热泪盈眶，又极力控制自己)你，你可以离开靠山屯，也可以离开你的战友，可是你不能丢掉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啊！(拿起袖章)每当我看到鲜红的袖章，就想起了那疾风暴雨的战斗岁月……还记得吧，当我们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旧北京市委的反，遭到围攻陷害的时候，也是革命的关键时刻，我们成立了红卫兵团，戴着这个袖章，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

徐小燕：(回忆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方　华：师农，我们就是戴着它，幸福地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呀！咱们是毛主席的第一代红卫兵，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和骄傲！你怎么能不珍惜这伟大的历史荣誉呢？

[刘师农低下头沉思。]

方　华：可是，这两年你变了，变得身上没有朝气了，造反精神也丢了，甚至厌烦阶级斗争了！(恳切地)师农啊，过去我们是红卫兵战友，今天，我们又一起踏上这新的里程，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共同前进。我做得很不够，应该受到你的批评。可是，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哲学，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能是你撞我，我治你的个人角斗吗？……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遮住了你的眼睛，你做了资产阶级处事哲学的俘虏！

剧中的知青一改以往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管麦苗叫韭菜的形象，成为种田是行家，搞科技是能手，大批判是先锋的农村新人。一直被丑化、贬低的知青，史无前例地被用"三突出"的方法来歌颂，以方华为首，许大成、徐小燕、大江子等人构成了一组光辉的知青群象。在贫农郭支书领导下，整个知青点成为农村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先锋队。

为了政治的需要，江青集团对红卫兵、知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鬼是它，说神也是它。

(4) 戏曲、电影:《人老心红》、《主课》、《雁鸣湖畔》、《寄托》

在1975—1976年"文革"官方编排、摄制了一批反映知青题材的戏剧、电影。随着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迅猛发展,作品中路线斗争的激烈程度上升到了历史最高点。

上海市人民淮剧团在1975年创作、演出淮剧《人老心红》,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剧中描写,街道党支部委员沈妈妈,发现某医院医生朱巧云拉拢腐蚀病休知青周小华,破坏上山下乡的罪行。在这场斗争中,沈妈妈细致地对周小华做思想工作,把她争取了过来。

电影《雁鸣湖畔》(长影厂1976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影片讲述,暗藏的阶级敌人林大全在县委副书记陈途的支持下,窃取了大队合作医疗站的大权。下乡知青蓝海鹰在党支书和贫下中农的支持下接管了医疗站。林大全与地主巩世鳌勾结在一起,利用大队干部宋长有阶级斗争观念淡薄的弱点,重回医疗站,并向难产的春兰下毒手,阴谋嫁祸于海鹰。海鹰从死亡线上抢救了春兰,并揪出了阶级敌人。大队合作医疗得到了巩固发展。

电影《寄托》(峨眉厂1976年)讲述,知青王晓雷被派到曼非寨分场,在党委沈书记的支持下,她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李场长、投机倒把的干事杜世犹进行斗争。李场长扣压了县里发来的天气预报,致使分场遭受水灾,杜世犹乘机嫁祸于王晓雷。王晓雷揭露了阴谋,将犯罪外逃的杜世犹抓获,李场长也被撤职。

在这些戏曲、电影中,将知青模范描写成在路线斗争风口浪尖上,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勇猛搏斗的革命先锋。开始运用"三突出"原则树立起一批光辉的知青模范的英雄形象。另外,许多作品也表现了知青群体中落后与先进的矛盾。[14]

3."工农兵学员"的创作——短篇小说集《翠绿的秧苗》、诗歌《理想之歌》

江青集团不仅重视"知青模范"在政治上的培养、使用,而且重视知青作家在文艺宣传上的培养和使用。知青出身的工农兵学员成为后权威知

青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江青集团在工农兵学员中培养、建立了一支组织化的写作队伍。

这些人昨天还是知青,他们何以会具有这样自觉的后权威政治意识呢?除了工农兵学员已经被高度组织化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创作者的身份已经改变。"工农兵学员"的创作,主题无论是教育革命,还是上山下乡,一直关注着自身的形象塑造。作品始终贯穿着三个转变——社会角色的转变、自身立场的转变、自我认识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之中,他们要重建政治斗争意识、社会管理意识,文化领导意识。因为他们已经从一个受教育者,转变为教育革命的领导者,从被支配者,转变为政策制定者。

重新确认自己的社会身份,是工农兵学员的一个重要经历。工农兵学员的文艺创作往往自觉地环绕着对自我本质的再确认展开,例如北大工农兵学员在他们创作的《翠绿的秧苗》后记中,骄傲地写道:"前进吧,光荣的工农兵学员!战斗吧,无产阶级文艺的新兵!文艺的春天,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

《翠绿的秧苗》小说集是由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72、73级工农兵学员"集体讨论,一人起草,再由师生结合的小组反复修改"完成的。作者大多是延安、山西、东北等地的插队知青。[15]

《女儿的婚事》讲述,省军区副政委江明夫妇在女儿小燕下乡插队后要嫁给农民的事上发生了分歧,在插队的儿子牺牲后,江明说:"儿子死了,女儿跟上去,必要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舍得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成长》讲述,大学毕业后的工农兵学员晓京重返延安农村插队落户,扎根农村,一辈子改造世界观。

小说集创作的全过程都处在"组织化"之中,小说集反复突出强调红卫兵、知青身份,作品的个人品格和独立精神被降低到最低点。小说编造大量的虚假情节,并使用"讲故事"的语言,以符合"工农兵"审美的品格。

知青在意识形态高压的大学里,不可能公开抵制江青集团的阴谋政治,有些人身不由己地沦为江青集团进行阴谋政治活动的工具。[16]

就在这湖边,
前几天又有阴风翻卷
几个旧学校的卫道士,

筑起土围子，
对教育革命反攻倒算……
莫忘记呵，
莫忘记！
战斗呵，
战斗！
鼓起“炮打司令部”的勇气，
坚守无产阶级的营盘。
……
就这样，
我们从与敌人较量过的田野，
来到阶级争夺的校园，
从一个战场，
又来到一个火线；
我们带着工农兵的嘱托，
谱写教育革命的新篇，
让斗争的烈火，
一次次将我们冶炼……

——《展翅篇》北京大学中文系
1973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
集体创作[17]

长诗《理想之歌》，是后权威知青文学的代表作。该诗由北大1972级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执笔的四位作者，都是曾经插队、支边的知青。《理想之歌》的发表，标志着伪知青文学的成熟。

红日、/白雪、/蓝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欢迎你呵！/突击队的新战友，/欢迎你们呵！/我们公社的新社员。/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意/酿在里边；/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吧！/陕北的枣儿呵/蜜一般甘甜！/看你们

白羊肚手巾/红袖章,/——高原上/又开放一片山丹丹……

是在这宝塔山下,/延河岸边,/我开始理解:/从来就没有什么/个人理想的诗篇;/我们革命青年的理想,/要由整个无产阶级谱写,/要把千百万人/召唤!/我们壮丽的/现实和理想,/是用革命战斗的红线/紧紧相连。/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们沿着/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向,/冲锋陷阵,/一往无前!//谁说我们的生活/“平平淡淡”,/我们的事业/风光无限!/谁说“农村落后/难以改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贫下中农的希望/就是我的志愿。/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我愿在这光荣的陕北高原,/迎接十个、几十个/战斗的春天!

——《理想之歌》北京大学中文系
1972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
集体创作[18]

1975年12月《理想之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配乐诗朗诵的形式广播,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引起了“文革”官方的注意。

1975年冬天,在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背景下,《红旗》杂志在12期上发表社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在证明教育革命成果时说道:“工科的学员发明创造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创作了饱含革命激情的《理想之歌》。”《人民日报》(1976.1.25.)在批判“工农兵学员质量低”的专题下,全文刊登了这首长诗。

《人民日报》(1975.12.8.)在“北京大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文中,第一次介绍了诗作者高红十,《光明日报》还刊登了高红十照片,并发表了对《理想之歌》的书评。《光明日报》(1976.2.5.)发表高红十的文章《回延安,当农民》,宣传她“三次写申请,要求回延安当农民,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高红十成为著名知青作家和知青模范。

岩田佐章认为,高红十成为被宣传的宠幸者,而其他几个执笔者无声无息,是因为高红十重返农村的实践具有代表性。高红十回乡扎根的行动,为这首长诗的革命“人生论”提供了具体注释。[19]

这首长诗“组织化”的创作过程,正是作者知青主体性丧失的过程。

诗作者高红十成为"知青模范"和著名知青作家的一段思想发展过程，具有典型意义。

1975年8月，北大中文系1972级要编写反映工农兵大学生的小说集《绿色的秧苗》，其中"毕业"部分，组织上决定由高红十创作。她当时很苦恼，总也写不下去。她说："最难的是主人公毕业后回农村的思想境界。我没有这种心情体验，所以无法很好表达。"她的入党介绍人找她谈话："问题在你自己，你想清楚了，小说就能写好。"高红十认识到"要写革命文，先做革命人"，于是她在6月7日给延安地委写信，并正式对校党委提出："回延安，当农民，做共产主义新人。"在小说《成长》中，她没能把她的思想斗争和苦恼如实地写出来，而是站在说教者的立场上，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形象。显然，她的苦恼和思想斗争，是不允许被真实地写出来的。[20]

《理想之歌》获得《人民日报》刊登和大力宣传，是以全面接受"组织化"为代价的。它被纳入反右倾运动的轨道，成为配合"批邓反右倾"政治斗争的工具。

《理想之歌》在知青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些知青非常反感该诗表达的极左思想，另一些知青则被诗歌感动，被主流社会的关注所兴奋。两部分人在解读时，相约成俗地忽略了诗中后权威主义的词句，将它们当成被迫外加的部分，而注重解读显示能指的知青主体存在。这首诗在当时的理解，"扎根派"和"不相信派"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注重了所指（后权威话语），后者则偏重能指（主体性）。

三、后权威主义的红卫兵文艺

1. 配合"反右倾"编造红卫兵史

在1968年工、军宣队进驻各大、中学后，红卫兵组织受到全面审查、清理。此后在工、军宣领导下成立的"红卫兵团"，都是官方组织的"模范学生红卫兵"。1968—1970年间，在一些大、中城市相继颁布了各自的"红卫兵

条例”。1970年下半年,天津市中学开始执行的《天津市中学红卫兵条例(试行)》规定:“红卫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学生的先进群众组织。”“红卫兵要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为主体,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条例》还规定:各级红卫兵组织由同级党组织批准,并在其领导之下进行活动。由于红卫兵没有中央一级的统一组织,1969年整团建团开始后,它的活动逐渐减少,变为中学共青团的外围组织。在各大学实际上取消了红卫兵。[21]

出于现实政治需要,在1975—1976年间“四人帮”开始重视开掘、利用红卫兵话语的历史资源,江青集团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篡改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将红卫兵话语直接嫁接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阴谋话语上,使之配合“反右倾”运动。宣传“红卫兵精神”,成为江青集团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号召的话语策略。红卫兵的造反历史,被描述为“反潮流”精神的具体体现。各种以红卫兵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在配合运动中被有组织地创作和发表。

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后权威红卫兵文艺,特别强调创作主体的真实,一反常规地突出了作品中的文化主体。在组织创作时,有意识地调集有红卫兵身份的作者来写作“红卫兵作品”。

故事集《毛主席的红卫兵》由清华附中、北京市31中两校教师编写,并请当年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工农兵学员陶正负责全书的修改工作。

这部故事集在前半部分讲述,圆明园成立红卫兵、反工作组、大串联、揪出“刘少奇叛徒集团”。后半部分介绍了知青模范:朱克家、金训华、张勇等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事迹。并将红卫兵运动续写到批判“师道尊严”的黄帅,反修正主义教育回潮的张铁生,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鲁新民(原红卫兵,现上海星火零件厂工人)等模范人物。前半部(1966—1968年)没有一个真实的人物出现,人名全部虚拟,后半部(1968—1976年)全都采用真名,因为他们都是“文革”官方树立的典型。采取前虚后实的办法,编造出一部所谓的红卫兵运动史。

故事集在结尾时发出号召:“走资派还在走,红卫兵在战斗。”“当年的红卫兵斗争精神不减退,今天的红卫兵革命锋芒更锐利。走资派在哪里走,红卫兵就在哪里战斗。”并宣称:“‘走资派是我们红卫兵的死对头,邓小平是我们红卫兵的老对手!’在痛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斗争中,在粉碎天安

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激烈战斗里,建立了功勋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中,有很多是当年的红卫兵。""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红卫兵分赴祖国四方,为粉碎走资派复辟翻案的阴谋,红卫兵又战斗在同一战场! 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小将,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红卫兵运动的新篇章。"[22]

反映红卫兵历史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荷泽惊雷》(陈建功)。小说讲述,1966 年 5 月"文革"暴风雨即将来临,"西郊荷泽园,一座高等学府的附属中学里",学校走资派为高三学生提前进行"小高考",出题"荷塘春晓",贫农子弟关巍气愤地在试卷上写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学教研室主任兼班主任、一级教师曾一帆宣布这篇作文是零分。关巍与曾一帆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鼓动全班同学罢考。当校长金鼎文赶来压制时,关巍又对校长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公开的批判斗争,将"荷泽园修正主义罪状"93 条丢到金的面前。关巍的行动得到了一批同学的支持,在各班掀起了激烈的辩论。关巍等同学还贴出炮轰学校走资派的大字报。在市委走资派王虚谷的指示下,金鼎文宣布关巍为"反党右派分子",开除学籍,其他学生给予不同处分,并组织对关巍进行批斗。这时,关巍的父亲贫协主任秉奎老汉手提扁担赶来支持儿子,发现曾一帆是当年端着盒子炮向贫农团反攻倒算的曾二少。关巍告诉父亲,就是因为曾二少有校党委书记金鼎文的"大红伞"才能如此嚣张,"金鼎文成了'还乡团'的'团长'啦!"秉奎老汉取出贫农团袖章要儿子戴上,让他跟"白箍"干,跟这些资产阶级干! 关巍接过红袖章,高举着说:我是贫农团的后代,要做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 台下同学,矿工后代方刚跳上台表示要做红卫兵,其后干部子弟张南下、冀密拉(俄文:和平)也纷纷要做红卫兵。在狂风暴雨中,关巍和他的战友朝天安门前进,他们的胳膊上都戴着墨笔字书写的红卫兵袖章。[23]

《荷泽惊雷》中所说的"荷泽园"和罢考事件,当年的北京红卫兵一看就知道,指的就是清华附中。黑字袖章是老红卫兵的标志。将这篇小说与 1968 年夏季的红卫兵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对比,会发现许多有趣的差异。小说将红卫兵发起者关巍的出身背景改成贫农,将干部子弟改为关巍的追随者,掩盖了老红卫兵与权力集团背景关系。红卫兵的产生被说成是贫下中农支持和贫农团的延续,并将曾一帆写成"还乡团",金鼎文写成"还乡团长",以直接配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小说文字完全

使用了工农兵故事会式的语言。

2.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红卫兵文艺

后权威主义的红卫兵文艺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进入了它的最繁荣时期。一批有关红卫兵运动的小说、诗歌、散文在各报刊发表,如《人民文学》1976年第五期开设了“散文专栏”: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下面是当时有代表性的一些诗歌。

上山下乡干革命,/红卫兵当了管天红哨兵。/斗志还是那样旺,/袖章还是那样红。/报冷暖,辨阴晴,/驱霹雳,战恶风,/反修防修决心大,/乱云飞渡仍从容。/……继续革命永向前,/反击右倾翻案风!

——《反击右倾翻案风》 宝坻县窦家桥大队下乡知青唐巍[24]

从五月十六日那天,/我们的队伍/吹响进军的号角;/从八月十八日的黎明,/红色的袖章/掀起接天的暴风……/冲向社会,横扫那些/牛鬼蛇神和发霉的“四旧”……/最难忘呵,城楼上/把“红卫兵”袖章为毛主席佩戴……/冷对走资派的威逼、利诱,/嗤笑资反路线的谩骂、围攻!/让我们把战斗的歌再唱一遍吧:/“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让我们把深情的诗再读一遍吧:/“抬头望见北斗星……”/张铁生的答卷呵朱克家的锄柄,/金训华的日记呵张勇的鞭缨……/然而,“走资派还在走”,/历史向我们一次次这样证明:/今天,老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用“红旗”掩盖复辟的美梦,/这是整个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又一次疯狂进攻!/呵,我们那曾沾满硝烟的红卫兵战旗呵,/随着第九、十次路线斗争的风雨飘扬、漫卷、飞升……/是呵,十年了,我们/刺刀更亮,袖章更红!

——《红卫兵颂》 李小雨[25]

《人民画报》和《美术》画刊在1976年也发表了一批利用红卫兵题材配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绘画，如油画《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侯逸民、邓澍、靳尚谊、詹建俊、罗工柳、袁浩、杨林桂）、木刻《红心永向毛主席》（知青张大川、李伟）、水印木刻《又一次较量》（知青管学军）等。[26]

同一时期《人民音乐》发表了一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红卫兵歌曲”，其中一些还在中央电台播出。

每当唱起红卫兵战歌，/耳边就响起文化大革命的雷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用战斗来保卫，/革命征途风没静啊雨没停。/每当看到红卫兵战旗，/心中就唤起继续革命的豪情……新生事物我支持，/反击右倾翻案风。

——《每当唱起红卫兵战歌》 刘薇词

像鲲鹏展翅，/像雄鹰翱翔，/搏击风和雨，/倒海又翻江。/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诞生，/……万里征途不停步，/继续革命向前闯，/狠狠批判邓小平，粉碎他的复辟梦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阔步奔向前方。

——《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
清华附中红卫兵词曲

《每当唱起红卫兵战歌》和《我爱红卫兵日记》（齐金发词，金月苓、金苗苓曲）等歌曲都不是红卫兵学生所作的作品，而《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因为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创作而显得特别有分量，《人民音乐》之所以刊载此歌，正在于它的创作单位——清华附中红卫兵是有名的红卫兵组织。但是，这首歌不过是红卫兵运动终结后，1976年的“模范红卫兵”所创作的歌曲。它的歌词充分暴露出，利用红卫兵话语配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企图。它的音乐品格，与当年的《造反歌》等红卫兵歌曲相比，明显地矫揉造作，虚张声势。[27]

四、对知青沙龙的围剿与反围剿

1.对地下文学的围剿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文革"运动进入低谷,各种口头文学和手抄本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手抄文学的广泛流传,引起了"文革"当局的重视,各地多次对手抄本进行清查。1974年的大清查是最为集中的一次。

1974年秋天,在"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的同时,姚文元下令对地下文学进行全国范围的大清查。北京各工厂、企业和街道传达公安局的通知,凡收藏有手抄本的必须一律上交,逾期藏匿不交的将进行严肃处理,鼓励大家进行揭发。查禁的手抄本,包括"黄色小说"《少女的心》和《第二次握手》、《九级浪》等。在湖南长沙,各中学的老师让抄写过《梅花党》、《少女的心》的学生进行登记,由学校将这些手抄本集中销毁。

各地公安机构对一些可疑人物进行了排队摸底、审查和讯问。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工厂单位进行了细致的排队检查,组织人员进行思想教育。

1974年夏天,在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岳重、于有泽和赵振开都被公安局、派出所和工厂保卫科叫去讯问、审查。于有泽受厂里审查,让他交待与什么人来往,一连审了十几天。由于每天上班都要去保卫处报到,下班才能回家,他停止了写作,将自己的诗稿分散隐藏在同学们那里,并剃了个光头准备坐牢。于有泽找到林莽,要他把抄写的诗歌都找出来烧掉。在于友泽走后的当晚,林莽也匆匆烧掉了一批自己在白洋淀时期的作品。与此同时,岳重的问题牵连到栗世征,栗世征找到宋海泉,要走了自己的诗稿并加以烧毁。

在这次大规模查抄中,徐小天(徐浩渊的弟弟)被抓,徐浩渊的家被搜查。甘铁生听到徐家被抄的消息,匆匆烧毁了他创作的一批作品,其中包括中篇小说《第二次慰问》、短篇小说《野玫瑰》、《纺车声》等。在同一时

间，张寥寥等人烧毁了1974年之前全部的《桥》（手抄）杂志。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北京沙龙成员都开始销毁和藏匿自己的作品和手抄本。

1974年秋，成都沙龙的一个成员因文字而入狱，由野鸣夫人连夜通知邓垦、陈默等各家，紧急烧毁诗作和各种文稿诗作，其中包括1972年夏天由野鸣编成的成都文艺沙龙诗选《空山诗选》（内收14家150首诗）。一夜间，沙龙中的各种文稿，都迅速地被付之一炬。[28]

邓垦的长篇叙事诗《春波梦》被成都公安局作为黑诗进行点名查抄。邓垦的朋友因藏有《春波梦》"手抄本"，以及其他问题被判刑8年。成都市公安局到邓垦所在工厂对邓进行审查，因抄出的《春波梦》是1964年的版本，所以邓谎称写的是1927年北伐战争中的事。邓垦由于写诗罪行，加之派性因素，被工厂关押审查20个月。

在政治压力下，较有规模的文艺沙龙活动基本消失，文学青年开始有意识地分散活动，一些沙龙开始解体，剩下一些分散的小圈子，活动局限在最密切的朋友之间。文学沙龙的活动转入低潮。[29]

(1)"第四国际反革命案"

"第四国际反革命案"是1974年江青集团发动对"地下文学"进行围剿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赵一凡等人在这一案件中被捕入狱。

赵一凡(1935—1988年)生于上海，三岁时在逃难中患骨结核，四至十岁卧石膏床。1945年随母亲赴苏北根据地寻父。1947年因行军骨结核病复发，卧石膏床九年。赵一凡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病床上自学的。十三岁在养病中编写《新少年故事》。病愈后曾在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旁听。1959年在文字改革出版社儿童读物组，做儿童读物编写及注音工作。1963年机构精简，赵被裁减，在家替人民文学、商务印书馆、世界知识等出版社做校对，校过《红楼梦》、《聊斋》等几十部书，曾做《现代汉语词典》等重要辞书的最后校对工作。

赵一凡在文革中成为沙龙的中坚人物，他对青年进行文学启蒙工作，并进行文化资料的收存、整理，收藏了一批地下文学资料。赵一凡沙龙中聚集了一批青年，他们相互抄阅"非法读物"、"黄色小说"和手抄本，自然形成了辐射到全国各地的书信圈子，由此受到"文革"当局的注意。

赵一凡等人被定为"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由当时的公安部长签署逮捕证。1975年1月28日深夜12点,赵一凡和其余在京的十几人同时被捕入狱。

案件牵涉到北京、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人员,被捕的有北京的徐晓、郑红丹、王磊,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顾××,山西的张珉、赵凤岐(山西省革委会委员)、郭海、朱长生等人,也因此案牵连而被捕。[30]

赵一凡搜集的大批地下文学资料被作为"罪证"抄没。以下是1975年1月29日公安局对赵一凡住宅的正式搜查记录(公安局记录原件,[31] 注解是原有的,错讹处照录),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沙龙中流传作品的部分目录:

1975年1月28日从赵一凡家中搜查出的诗:

1. 太阳城札记　1974.10.
2. 感怀——赠一凡　1972.4.18. 石俊峡写
3. 忆江南二首　1968年春节 郑红丹弟弟小五写
4. 致大海　1824年抄的
5. 那冷酷却又伟大的想象　郑红丹
6. 为晓丹烈士建碑××五首　郑新潮 1973.12.28.
7. 喜回城(散曲)　1972.2.7.
8. 渠水笑把丰收□
9. 鸟儿啊鸟……似郑
10. 草原曲(迈里尼作)　1968年在北京抄的
11. 面对精巧的沙盘……(立群)
12. 这是一个峭岩一个……
13. 冷酷的希望　赵一凡(振开、废纸、丢)
14. 地上的道路通向四方……
15. 莽莽洞庭湖……
16. 月光·路面和树林……
17. 怎生醉
18. 献给我"身边"和"心中"的伙伴(节选)
19. 永远属于未来的人　1972.2.21.
20. 梦游人谣

21. 主人
22. 悼陈毅诗选　1972.1. 赵一凡抄
23. 这是个湛蓝的世界　赵一凡手稿(振开?)
24. 破阵子　1971.12.12. 赵一凡亲笔记
25. 踏莎行　赵一凡亲笔记可能作者是赵一凡
26. 海岸、贝壳、少年　赵一凡笔迹
27. 告诉你吧,世界　赵一凡笔迹(振开?)
28. 送友人　赵一凡笔迹
29. 送××　1971.8.　1970.3. 赵一凡笔迹
30. 友谊之歌——朋友的想望　1972.12.11.
31. 我写的歌
32. 献给诚实元帅的白花　1972.11. 赵一凡笔迹
33. 悼陈毅同志　1972.1. 赵一凡笔迹
34. 告别陈毅　1972.1 赵一凡笔迹
35. 月亮旁的一颗小星　赵一凡笔迹
36. 杂文《不是新交》《梦》1972.4.　1972.6. 赵一凡笔迹(1—2)
37. 昨日的我已不是我　谭小春 1970.10. 赵一凡笔迹
38. 火车吟　陈铁成 赵一凡笔迹(1—8)
39. 舢板　陈铁成
40. 墨写文章血抒豪情　赵一凡笔迹 1969.11.
41. 秋天
42. 城市
43. 天空
44. 1972—1973《献诗》
45. 太阳落下
46. 路上的月亮
47. 冻土地
48. 火之歌
49. 吹起吧,那金色的小号
50. 在扬子江上

51. 三只小舟
52. 这里是湛蓝的世界
53. 房檐下的短剧
54. 青春奏鸣曲
55. 南天的星
56. 五色花
57. 不,不能够……
58. 眼睛
59. 你好,百花山
60. 死还是活
61. 尾灯
62. 告诉你吧,世界
63. 把春天送给你
64. 真的
65. 血
66. 我走向雨雾中
67. 坦白
68. 在峡谷
69. 天啊,云
70. 石子
71. 小木房里的歌
72. 她死了
73. 倾斜的地平线
74. 大墙下的老鞋匠
75. 星光
76. 啊,孤独
77. 童年的我
78. 微笑,雪花,星星
79. 冷酷的希望
80. 在带血的冰河上
81. 诅咒

82. 枫山惨淡

另,从赵一凡家搜查出的诗:

1. 最高的"奖赏"
2. 野花
3. 小小卵石
4. 无题　1972.4.9.(小康)
5. 无题　1972.1.15.(友妤)
6. 无题　1972.1.16.(友妤)
7. 无题　1972.1.17.(友妤)
8. 静的夜呵! 也许又要起风　1972.1.30.
9. 大家都懂事　1972.2.19.
10. 春天……夜晚　1972.3.8.
11. 我的告别
12. 无题　1972.3.8.
13. 闪电的闪念　1972.3.13.
14. 渔歌　1972.3.13.
15. 给廖逊　1972.3.13. 夜
16. 不知道　1972.4.18.
17. 无题
18. 你好,哀愁
19. 无题　1971.3.14.
20. 曾经是个好兵
21. 金丝雀　1972.11.
22. 云南怪事多
23. 社会治安
24. 友谊之歌——朋友的想望　1972.12.11. 晨 3 时
25. 无题

另,赵一凡家搜出的陈铁成的诗:

1. 火车吟 赵一凡的笔迹
2. 我的姑娘是市郊汽车的售票员　2月19日
3. 同志,请您上车
4. 期待
5. 在拖拉机印过的路上　1971.8.17.
6. 老牧马工
7. 舢板　1970.
8. 牧马人之夜　1971.5.3.
9. 夕阳似的微笑

赵一凡把手抄本小说都制作了副本。为了给后世留下"书种",赵一凡或手抄,或将作品拍成胶片,冲晒成扑克牌大小,保存在像扑克牌那样的盒子里。

在1975年1月29日公安局从北京朝内前拐棒胡同11号的赵一凡家抄出:来往信件889件;微缩保存的外国经典文学作品照片底片46张、照片底片一盒,文字照片53张;影集1本,照片303张;手稿59份,零散手稿450页;油印材料489页,"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印刷品7捆(其中一捆已装订成册),内部文件1捆,内部刊物3捆,"中央首长讲话"2捆,文革小报7捆;还有成本的讨论提纲、调查提纲、学习札记、农村问题研究等材料,以及红卫兵图章、自制油印刮板、复写纸等。全部材料装了两辆小卡车。

(2)"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集[32]

湖南知青张扬创作的手抄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1971年在山西、内蒙古等地以《一代天骄》、《归来》等名字流传,其后流传到全国。小说初稿为短篇小说,创作于"文革"前的1963年,其后易稿七八次,经过了写作——流传——再写作的反复过程。

小说讲述:青年科学家苏冠兰与丁洁琼相恋,因家庭反对、社会战乱和小人挑拨离间,被迫离散。二十年后,丁洁琼作为著名物理学家不顾帝国主义的阻挠,返回祖国效力。她发现恋人苏冠兰已与其干姐叶玉菡结

婚，当她悲伤地要离开北京时，周恩来赶到机场做说服工作，丁洁琼决定留下来为祖国工作。五年后，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小说通过丁、苏两个知识分子的爱情故事，歌颂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塑造了总理周恩来的形象。

小说在当时有四点突破，一是歌颂周恩来，二是歌颂知识分子，三是描述了爱情生活，四是提出了爱国主义的新主题。其中对周恩来的歌颂，是导致作者入狱的最重要原因。

1974年10月北京一家报纸的第960期《内部参考》上，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广为流传的情况。姚文元看后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1975年1月小说作者张扬在插队所在地湖南浏阳县农村被捕。

在对张扬的审讯中，办案人员跑到汨罗乡下，用"开除公职"、"开批斗会"和"戴帽管制"等手段胁迫张扬在农村当教师的朋友，逼迫他们捏造伪证。在张扬插队的地方，组织召开"声讨会"，挨门挨户收来社员的印章，炮制"控诉书"，以"广大贫下中农"的名义"一致要求"判处其死刑。为了在法律上立住脚，办案人员给小说中人物分别"定性定案"。女主人公丁洁琼教授是"叛徒"，男主人公苏冠兰教授是"特务"，老地下党员、卫生科学院党委书记鲁宁是"走资派"，老天文学家苏凤麟是"反动学术权威"、"洋奴买办"，美国神甫查尔斯是"帝国主义分子"，另一女主人公叶玉菡是"地主阶级的少爷小姐"。小说的罪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妄图搞反革命复辟"。

办案人员还与当时省委宣传部合作，在1976年6月26日和7月4日发动"人民战争"，以预审处长充当"导演"，召集几十名湖南师范的中文系教师和工农兵学员，对张扬进行围攻批斗，恐吓威胁，拐弯抹角搞诱供。一位教师恶意推论出小说中描写的病毒学、生物学实验，是"蓄意暴露、恶意诬蔑我国从事细菌武器研制"，是"暴露国防机密"，并逼作者承认是其舅舅向其泄露此项国家机密。审讯员推论小说题目《归来》，是出自屈原的"魂兮归来"，是为刘少奇招魂。他们还前往汨罗调查，回来向作者宣布："据我们调查，你在汨罗是谈了屈原的！"

在对地下文学的围剿中，"第四国际反革命案"、"反动小说《第二次握

手》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案件集中反映了"文革"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各种残酷手段,显示出其黑暗,同时也表现出知青在民间文学创作上的顽强反抗精神。

2. 反围剿中的沙龙文学

在1974年的围剿风潮过去之后,沙龙活动又开始逐步恢复。由于政治高压持续不减,部分知青开始返城,面临工作和生活压力,沙龙活动不再像以往那么活跃,大规模的作品朗诵会和文学聚会已经消失,但是文学创作并未停止,活动变得更为隐蔽。沙龙的活动方式和气氛发生了变化,写作变得更私人化,作品交流范围也缩小到少数朋友之间。

林莽说,1974年他从白洋淀回到北京后,在北京某中学教书,很少到朋友家串门,努力从订阅的《外国文艺》中搜索有关外国文学的信息。林莽在1974年写了两首长诗,《悼1974年》、《旅途》。于有泽在1976年写了一些爱情诗,据说当时他开始研究诗歌的色彩和节奏感,并写了《唱片》,是后来纪念张志新诗作的雏形。于有泽还试着写了一些小说片断。赵振开在此时期创作了一批诗歌,逐步走向成熟。沙龙之间的交叉往来虽然减少了,但在1975—1976年间,宋海泉、史康成、栗世征、赵振开等人还有过多次聚会和郊游。[33]

在1974年后,沙龙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更多样化。如《圆号》、《仇恨》中意识流的运用,《波动》中叙述视角的换位。同时,诗歌的现代风格渐趋成熟,预示着现代诗歌的开始进入成熟期。

(1) 刘自立的短篇小说《圆号》、《仇恨》

刘自立在1974—1975年写了8部小说,均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其中包括后来用笔名伊恕发表在《今天》5期上的短篇《圆号》、《仇恨》。

《圆号》描述一对男女从产生爱情到情愫消退的整个过程。小说揭示,当男女感情逐步密切的同时,两人内心开始产生距离。当他们完成了恋人的历程时,便觉得完全还原为独立的人了,他们便在这时分手。"黎明的圆号的音流",象征着精致、曼妙的精神生活。他们在故宫的城墙下,月

色的花园中漫步。在柔美的月色下，她显得神秘、忧伤，“她的臂膀圆润光洁”，而“我感到孤独，无可挽回的孤独”，“她是谁？我用全身的力气搂住她”，“在夜色的鸟声里我感到她女性的线条在我胸膛里川流不息”。在小说结尾时，天就要亮了，黎明中飘荡圆号，两个人都期待黎明，白日的来临意味着神秘情愫的瓦解，而在这破晓之际，那份隔膜和迷惘才显得优美和遥远，如同圆号。

这部小说中有刘自立曾经体验过的东西，也有某些超验的成分。他说：“当时我的生存状态对社会是疏远的，当我沉浸在艺术中，社会上却在轰轰烈烈地搞运动，‘孤独’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即使你进入了人生的形而上，比如人类爱、生命终极的时候，这种孤独也无法摆脱。当时，我并未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我将这种朦胧的经验写进了小说。”这种反映内心丰富性的小说，在当时几乎无人能够理解，因为“文革”是一个关注意识形态的时代。1978 年，《今天》编辑部的编辑们曾就是否发表这篇小说存在争议，在讨论会上，有些人对这种“无情节”小说表示异议，对人物迷乱的意识表示不解；另一些人，包括作家王蒙，则对小说表示赞许。[34]

《仇恨》是刘自立以弟、妹入狱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弟弟”因为父亲的问题而入狱，“姐姐”因为“颓废派”而入狱。在审讯员的分别审问中，“姐姐”在审讯员职业化的“智慧”面前“出卖了”“弟弟”的一些“罪行”，最终导致了“弟弟”的被判刑。小说以意识流的手法描述了爱恨交织的心灵活动，揭示了亲情被人为制造的仇恨所毁灭，以及心灵中美好理想的被亵渎。

狱中特别假释的“他”——衣服上印着罪服徽号的华侨青年，重新与姐姐相见。他回忆起曾和姐姐在恒河岸、在加尔各答度过的童年，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她用纤巧的小手搂住双膝，挑衅式地盯着他。他那木然的男孩的境界就被一举摧破了。他会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姐姐。姐姐无所顾忌地把自己贴在他的身上。她的笑那么诱人，他不能抑制自己的冲动，用手抚摩着姐姐的小下巴。她甩开他，梳理散乱的黑发。她真像印度石窟里的女神，在灿烂的阳光下，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高高地昂起头……”

在狱中，他又看到女犯队伍中一个“昂着头，披着黑发的姑娘。她修长的腿穿着淡色的裤子，头发的末端系着一根红头绳……”他的视线模糊了，“是她，我的姐姐，我的好姐姐……”可是，当他在狱外与姐姐重逢的时刻，仇恨与爱交织在一起，在他的胸中作战。“‘她回来了吗？’他的话音刚

落,一道闪电划破暗空,照亮了他的脸,紧接着一阵霹雳。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一道闪电照亮了他的脸。”他的眼睛里,“掩藏着一种无比淡漠、冷酷、凶残!”他发出了亵渎的语言:“谁说印度有垂死的美?屎!”

(2)赵振开的中篇小说《波动》[35]

中篇小说《波动》,创作于1974.11—1976.6,署名艾珊,“艾珊”是爱珊的谐音,作者赵振开的妹妹姗姗在五七干校中因救助落水的伙伴而不幸牺牲,作者为了纪念妹妹而采用了这个笔名。

小说描写,在河北某小城,两个北京知青杨讯和肖凌相识了。肖凌具有知识家庭背景,父母在“文革”中受迫害先后死去,她在下乡后被招工进小城。肖凌在农村曾与一干部子弟“同病相怜”,怀孕生下一个女孩,后来这个干部子弟的父亲官复原职,他也走后门上了大学,将肖凌抛弃。杨讯也是一个干部子弟,插队时因为农村大旱,他领头反对“交公粮”蹲过“县大狱”。杨讯与肖凌相爱后,得知肖凌有个私生女,两人感情出现裂痕。这时,杨母将他调回北京,而肖凌被杨讯的林伯伯查出有“生活问题”,遣送回农村。当杨讯返回寻找肖凌,肖凌已不幸遇难。

《波动》描绘出一系列小城人物,有市革委领导林东平、党内腐化分子林德发、二流子“工人师傅”二踢脚、流浪者白华。

二踢脚是小说惟一出现的“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堕落、丑陋的形象,他多次试图玩弄肖凌。在肖凌被开除的问题上,“工人师傅”二踢脚起了很大作用。

肖凌、杨讯代表着知青,他们顽强地生活在社会边缘,长期孤立无援,只有流氓白华与他们有着一种心灵上的交流。当肖凌被二踢脚欺辱时,也是由白华出现解救的。白华和他所代表的黑社会,是一个虚构的亚社会,有其独立的伦理、规范、行为准则。作者渴望着“助手”和“同盟军”,虚构了这一并不存在的亚社会,并赋予它某种神秘的力量。

林东平是杨讯母亲的老战友,他与杨讯母亲——解放区领导同志的夫人,曾有“不正当关系”,受到党内处分。小说暗示林东平是杨讯实际上的父亲,林东平使人联想到《牛虻》中的神父,一个虚伪的说教者。杨讯与林东平的关系,是教育与被教育,生与被生,甚至生杀予夺的关系。这种血

缘关系，表现出新生代与权力集团间的精神传承和潜在冲突。处于孤立状态的杨讯、肖凌，如能得到林东平的关照和支持，则可能战胜二踢脚和王德发；而林却实际上站在了二踢脚和王德发一边。这就使杨、肖处于被围困境地。

林东平与王德发生活于同一政治阶层，他们的关系在不断发展，在小说将结尾时，穿粉红色衬衣的苏会计在雨夜将林东平领到家门前，这时王德发突然出现，原来苏会计是王的姘头。作者暗示林东平和王德发可能会共享苏，揭示出林东平的危险处境。作者将林东平放在了一个抉择关头，他必须要在两个社会间作出抉择。也就是林的选择，将决定历史走向，并促使社会发生进一步的转化，产生新的组合，而这种新组合的阵营正在形成。小说写于1975年，修改于1976年，它表明了作者对"文革"历史走向的一种思考。

小说弥漫着一种忧伤和冷峻的诗意。肖、杨的悲剧故事虽然是感情一时的波动，但这种"波动"中却包含着永恒。它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小说中多次出现星光，这星光代表着希望和理性之光。杨讯对肖凌说："只要我们活着就有希望。"这反映出作者在黑暗中等待无法预期何时来临的黎明时，内心绝望的痛苦。

《波动》运用了富于诗意的语言，清新、隽秀，思想深刻，无论是在思想认识深度和艺术水平上，它都是"文革"地下文学中的佼佼者。

(3)现代主义诗歌创作

在1974年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走向全面成熟，并初步形成一种规模。白洋淀诗群和北京沙龙开始广泛和熟练地使用现代主义手法，创作出了一批较为成熟的现代诗歌。

这一时期民间同时流传一些政治旧体诗，它们大多假托毛泽东及中共高层领导人之名，带有政治民谣的性质，内容集中反映上层政治斗争。这些诗流传甚广，相比之下现代诗歌局限于几个大城市的知青沙龙中，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远不如政治旧体诗。

白洋淀诗人栗世征（多多）这一时期创作了《玛格丽和我的旅行》（1974年）、《日瓦格医生》（1974年）、《教诲——颓废的纪念》（1976年）、《同居》

(1976年)等。多多的诗作表达了深邃的理性思考。[36]

花仍在虚伪地开放
凶恶的树仍在不停地摇曳
不停地坠落它们不幸的儿女
太阳已像拳师一样逾墙而走
留下少年,面对忧郁的向日葵……
——《夏》　多多 1975年

只在一夜之间,伤口就挣开了/书架上的书籍也全部背叛了他们/只有当代最伟大的歌者/用弄哑的嗓音,俯在耳边,低声唱:/爵士的夜世纪的夜/他们已被高级的社会丛林所排除/并受限于这样的主题:/仅仅是为了衬托世界的悲惨/而出现的,悲惨/就成了他们一生的义务……/但最终,他们将在思想的课室中祈祷/并在看清自己笔迹的时候昏迷:/他们没有在主安排的时间内生活/他们是误生的人,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他们所经历的——仅仅是出生的悲剧
——《教诲——颓废的纪念》　多多 1976年

白洋淀诗人芒克创作了《十月的献诗》(1974年)、《给》(1974年)、《我是风》(1975年)等。孙康(方含)创作了《谣曲》(1975年)等。其中一些诗作很像沙龙早期的童话诗,不过这种童话诗已经发展得更加具有现代味,内涵更加丰厚。

啊,北京的树林
已落叶纷纷
我每到这里就来和你幽会
请听我说
我是风
——《我是风》　芒克 1975年

我的马尾松瘦长的影子/斜斜地躺在沙滩上//让我的影子驮着你/飞快地跑/翻过大山的驼背/钻进森林浓密的胡须里/在野花的窝里玩捉迷藏/从衰老的大松树上/捡起一个/压得弯弯的月亮//我的心灵火红的栗子/被夏天遗忘在生命的树上//让我的声音抛下锚/停泊在你的门前/我的眼睛在水里歌唱/是散落在海里的星星/我的嘴唇/ 是风,是浪花/轻轻地吻着/你的手臂和肩膀

——《谣曲》 方含 1975 年[37]

在北京沙龙中,赵振开(北岛)创作了《太阳城札记》(1974 年)、《候鸟的歌》(1974 年)、《日子》(1974 年)、《回答》(1976 年)等。他正在迅速走向成熟,并写下了一系列优秀的诗篇,开始奠定自己在诗坛的地位。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在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

——《结局或开始》 北岛 1975年[38]

北岛的身上集中了新生代的诸多特点,他是随着沙龙诗歌运动成长起来的,他的成熟是一个重要信号,标志着新生代的现代诗歌开始进入成熟期。

注 释:

[1]本节材料和观点摘引: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1。
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

[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张聂尔:《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 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

[4]程中原:《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

[5]本节所引的长篇小说版本:《江畔朝阳》(郑加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万年青》(陈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大海铺路》(上海造船公司文艺创作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6]有时候,作者本身可能同时扮演着双重的身份,如郭小林在《兵团战报》发表元旦献诗的同时,也创作了"地下文学"《大雁》。前者以官方文学公开传播,后者则通过手抄方式,在东北兵团和内蒙古兵团知青中流传。同样是表述"扎根派"的思想观念,但两首诗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品格。(见《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

[7]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中国知识青年大事记》载，农林部副部长主持召开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会议，准备以国务院名义向全国印发江青的信，后经请示周恩来，把此事压下了。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顾洪章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 年。

[8]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1。

[9]同[8]。

[10]这首歌由内蒙古知青邢奇根据《美丽可爱的鸭绿江》重新填词。它原是下乡之初由东北传到内蒙古的一首歌颂知青友谊的歌曲。原歌词如下:(一)美丽可爱的鸭绿江，多么令人向往。鸭绿江水轻轻荡漾，一直流入海洋。我们曾经在一起，漫步江岸上，共同谈起美好理想，情意江水长。(二)我们如今在一起，离别可爱故乡。为了建设新农村，奔向祖国四方。双眼含泪别爹娘，迈步到边疆，随着时代的新巨浪，卷入生活的海洋。(三)一盏油灯照泥墙，夜是多么凄凉，回乡路途遥遥在望，前途在何方。再见吧，家里的朋友们，还有我心上的姑娘。我们何时才能相逢，在那鸭绿江上。(李南提供)

[11]知青群体中成为知青模范、知青干部的是少数人群，1973 年 6 月内蒙古兵团统计，10 万名知识青年中，有 4459 人入党，643 人提干。比例分别为 1/20 和 1/155。(何岚、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法律出版社 1994 年)

虽然任何社会的运转，都要吸纳适当人才进入管理和领导阶层，但是知青干部毕竟并不是被"一般社会"，而是被"特殊社会"("文革"社会)赋予管理职能。就在知青干部被组织化、社会化的同时，知青群体仍然处在非社会化的位置，甚至站在亚社会化、反组织化的立场。本文并非指责知青干部都有政治品质问题(像张铁生、柴春泽这样的"知青模范"毕竟是极少数)，而是特别指出作为一个少数群体，当他们进入管理阶层，必然要接受更严密的组织管理，从而受到社会主流意识更严密的控制，并且不可抗拒地成为"文革"社会体制的执行者。

[12]《朝霞》月刊 1974 年 6 期。
[13]《山村新人》(吉林省《山村新人》创作组,赵羽翔等执笔)《吉林文艺》1975 年 1 期。
[14]《中国艺术影片编目》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1 年。
[15]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72/73 级:《翠绿的秧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2。
[16]参见《大汗歌》(知青章德益、龙彼德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1975.2。

大多数工农兵学员是反对江青集团的,如四五运动中,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冲破阻力,在国旗下放置花篮;南京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化工学院的工农兵学员用沥青在列车车厢上刷反江青的标语。1976 年 10 月 14 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师生率先上街游行,庆祝胜利。

[17]《展翅篇》(北京大学中文系 1973 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人民文学》1976 年 2 期。
[18]《理想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6.4. 二版。《理想之歌》的作者是四名北京知青,陶正(男,清华附中高中 67 届毕业生,“三论造反”大字报参与者,陕北延川县插队知青)、高红十(女,北京师大女附中 67 届毕业生,陕北插队知青)、张祥茂(男,北京初中 67 届毕业生,内蒙古丰镇县插队知青)、于卓(女,北京 69 届毕业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知青)。《理想之歌》1974 年 9 月出版。《人民日报》1976 年发表该诗时,编辑要求加入紧跟形势的内容,由于四位原作者不在北京,由在京同学作了修改,加入了“蓬间小雀/一枕黄粱!”等词句。(高红十提供)。
[19]岩佐昌章:《“文革”期间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她的〈理想之歌〉》(由高红十提供)。
[20]高红十提供。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

[22]《毛主席的红卫兵》(故事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6.7。
[23]陈建功:《荷泽惊雷》(短篇小说)《北京文艺》1976.8。
同类小说还有《在大风大浪中——献给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红卫兵小将》(黄虹坚)描述 1966 年 8 月某大学红卫兵在团支书、烈士子弟和贫农后代姚英带领下反对工作组。(《广东文艺》1976 年 5 期)。
[24]《人民日报》1976.3.4。
[25]《北京文艺》1976 年 7 期。
[26] 参见 1976 年《人民画报》、《美术》。
[27]《人民音乐》1976 年 2 期。
[28]1976 年周总理逝世,在传诗热中,成都沙龙成员吴鸿再次搜集沙龙中朋友的幸存诗稿,二次编《空山诗选》。这次仅收入 9 人,计 204 首。但很快在清查"周总理遗言"案中,再次仓促烧毁。杜九森不忍诸友多年心血再次毁于一旦,当夜在焚毁前匆匆抄录,使其中一些诗作得以幸存。
[29]由林莽、张家家、甘铁生、陈墨、邓垦等人提供。
[30]由徐晓提供。参阅徐晓:《无题往事》《天涯》1996 年 5 期
赵一凡等人在 1976 年 12 月底释放,后此案被平反。1976 年"四人帮"倒台后,山西宣判"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张珉、赵凤歧被判死缓,于 1978 年获平反。(由徐晓提供)
[31]公安局搜查纪录的复印件,由鄂复明提供。
郑晓丹因反对"中央文革",于 1968 年 6 月 6 日死于狱中。(见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10 年史》)郑红丹是郑晓丹的妹妹。
由鄂复明帮助考证,《为晓丹烈士建碑》(五首)作者郑红潮为郑晓丹的父亲;第 20 首《梦游人谣》为西班牙诗人洛尔迦所作;第 49、56、59、64、66、78、79 首《吹起吧,那金色的小号》和《五色花》等,均为北岛所作。据杨东平提供,第 26 首《海岸、贝壳、少年》作者是徐浩渊;另第 18 首《你好,哀愁》作者是依群。
[32]张扬:《一次文字狱》《蓝盾》1986.6。

[33]由林莽提供。
[34]由刘自立提供。
[35]《今天》第4—6期连载。参见《蔡其矫访谈录》《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4。
[36]《多多诗选:里程》(油印本)。
[37]《今天》第7期。
[38]《今天》第6期。

第八章

过渡时期的知青文学
（1976.10—1978.12）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江青集团主要成员被捕，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占据中央领导位置的“凡是派”仍然执行“文革”政治路线，于是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才算真正终结。在此期间整个国家经历了两年的过渡时期（1976—1978年）。

在过渡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再次面临重大调整和重建。知识分子自觉地配合对“凡是派”进行的斗争，广大文艺工作者运用文学艺术为改革开放宣传呐喊，有力地推动了权力话语的历史性回归和沿革。

在过渡时期，知青返城风潮兴起，知青群体迅速解体，知青文化群落也随之发生重大的转型。知青创作队伍发生了更新和改组。这一切变革，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一、知青群落的解体与知青文化群落的转型

1. 上山下乡运动的结束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整个社会对于要接收近千万知青返城,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城市就业安置等方面,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从1976—1979年,下乡运动仍旧沿着旧轨道惯性滑行。然而,各地知青不再屈服于命运,他们纷纷踏上了艰难的返城之路。在1979年前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上山下乡知青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的事件,形成席卷全国的知青返城风潮。

国务院在1977—1978年,制定各项户口政策,发布文件,放宽知青病困退条件,并采取"两招一征"、退休退职工人子女顶替等措施,为知青返城和就业提供机会。

1977年重新恢复高考制度,明确提出"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为知青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1977年共有知青考生280余万人,当年录取27.8万人,其中有知青7.9万人。1978年实行全国统考,共有27.1万名知青被录取。1979年,有8.9万名知青被录取。此后,由于多数知青年龄超过国家规定招生标准,进入正规大学的人数锐减。知青中的"新三届"学生,约有43.9万人。[1]

1978年后,《中国青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章,否定和批判上山下乡运动,为终止上山下乡运动,在思想理论上扫清了道路。

国务院知青办于1980年9月1日发出《关于转发"贵州知青办关于纠正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情况报告"的通知》,指示要为下乡知青落实各项政策。这一时期被平反的知青冤案有:"王亚卓事件"、"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张扬《第二次握手》小说案、任毅《南京知青之歌》案、南京知青陈卓然等5人案等一大批知青冤假错案。

文革时期树立的"知青典型"中的极少数人(张铁生、朱克家等),被定

性为“帮派体系骨干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受到法律惩处。一些“知青典型”,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受到处分。此后,又为一些处理不当的“知青典型”落实了政策。

文革十年间城镇自身自然成长的劳动力有1500多万人,又从农村招进1400万人,这批劳动力占据了城镇的工作岗位。1977—1980年,近千万知青返城使城市就业问题一下显得严峻起来。大批知青在家待业,生活困窘,思想苦闷。1979年1—5月,北京待业人员自杀80人,占全市自杀总数的18%。齐齐哈尔市犯罪分子中,待业青年和下乡青年占三分之二。

为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79年7月,向全国推广济南、北京安置知青的经验,把发展轻工业、服务业和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作为安置待业的重要途径。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研究制定解决就业问题的方针政策。《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统包统配”的旧经济体制,力图改变人们一定要进入国家所有制企业的传统就业思想。1979—1981年,全国通过多种渠道安置2800万人就业,平均每年866万人。各地城市知青待业人数显著减少。到1982年,24个省、市、自治区的待业知青基本安置完毕。[2]

返城知青是一个特殊的待业群体,一个重新谋生创业的人群,作为后知识青年,他们在农村、边疆形成的差异再次消失,不同文化、智能、体能的知青,再次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除了部分有特殊社会背景的知青外,他们的社会处境、经济收入都较为一致。在80—90年代,后知识青年独有的一些特征,使得他们长期有别于城市中其他的阶层,形成一个特殊的城市青年群体。

广大知青在1976—1982年经历了返城、待业和创业的艰苦、曲折的历程,这一切为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后知青文学)创作提供了特定的时代背景,也为知青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 知青作家队伍的转型

在过渡时期,“文革”中形成的文艺体制和创作队伍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文革”知青文学的影响持续存在。

过渡时期党的领导人华国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传机构大力宣传华国锋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新的造神运动在1977年党的“十一大”前后席卷全国，各宣传部门大量出版歌颂华国锋的歌曲集、诗集等。[3]各地方文艺刊物都开办了歌颂华主席的专栏。知识青年被指派扮演拥戴华的角色，进行政治表态。

诗剧《重逢在纪念堂工地》，描述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延河畔和井冈山的京、津、沪三地的下乡知青相聚在毛泽东纪念堂建设工地。他们共同回忆起“难忘的1966年八一八”红卫兵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又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接受再教育，与林彪、江青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江青集团妄想篡党夺权，他们“眼望北斗，日想夜盼”，“只等那进军的号角传来”，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粉碎了“四人帮”。他们宣誓要遵照毛主席的遗志跟着华主席继续革命。诗剧把红卫兵、知青十年来跟着毛主席造反斗争的历史，与跟着华主席继续长征联系起来，强调突出了宣誓者的历史身份和新历史任务。

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理解人民的心愿，做出了“建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纪念堂”的英明决定。……
靳：十年前，我们从天安门广场出发……
袁：今天，我们重逢在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前。
杨：来，打开我们当年的语录本，写上我们的钢铁誓言：“忠于毛主席的旗帜，听从华主席的指挥……”

——诗剧：《重逢在纪念堂工地》
知识青年董康定[4]

上山下乡运动在1978年急遽退潮，文革中形成的知青作家群体也受到了剧烈冲击。作为在文革中被“组织化”的知青作家，他们进入了痛苦的失语状态。在经历了痛苦的反思之后，他们最终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从红卫兵到作家》一书，记录了他们在过渡时期的思想经历。[5]

张抗抗：“以前我只知道那么多的教条，那么多的个人崇拜，现在，突然这些都垮啦。只要真的思考，就觉得非常难受。所以我不愿意写作，我要

好好想想这些问题。到底人怎样生活？过去我们社会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对不对"。我到北京西单看了大字报，"这好像是一种启蒙，大字报提出的许多问题让人去思索"，"我想，我一定要把问题想通了再写。我整天想人的生存、人的灵魂、感情方式、思维方式和自己走过的路。我突然有一种觉醒，用三天时间写了《爱的权利》，发表于1979年初。"

张胜友：1977年刚进复旦大学时，我的"思想很狭隘保守"，同班同学卢新华发表了《伤痕》。"在我们班上、系里和整个学校，学生、党委书记、老师，甚至白发苍苍的教授都上台激烈地讨论，这个讨论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我的人格和灵魂是扭曲的，尽管我和我的家庭被压抑，我居然歌颂'四人帮'，这是我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通过这场讨论，我自己打碎脖子上的枷锁，感到这个思想的转变是脱胎换骨的，这不是外边强加的，是自己通过痛苦思索，找到了的真理。"

陈建功："我被那个时代压抑，我反过来歌颂那个时代，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很多中国作家的悲剧。没有尝过丧失人格的痛苦，就无法意识到独立人格的可贵。很多中国作家没有独立人格，这是个悲哀"。"在四人帮倒台之前，我已经发表了几篇小说。不过，都是为四人帮服务的"。"1978年，我考上了北大，在大学一年级，创作了电影剧本《奔向2000》，被邀请到上海与导演见面，导演叫我修改剧本，增加光明面，改了就可以拍。我表示拒绝了，回到北大我写了中篇小说《流水湾湾》，反映红卫兵的忏悔与觉醒。"

陆天明："四人帮倒台后，我经过了一场很痛苦的自省，重新找寻自己。因为我十四岁离开学校，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我埋头读书，尽可能找书看。"

郑万隆："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差不多一年多没有写过一个字，有两年时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我的思想转不过弯来，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一直没有从被粉碎中醒悟过来。到1979年才拿起笔来。"

就在"文革"知青作家进行痛苦反思的同时，一支新的知青文学创作队伍在校园中迅速形成，他们为知青作家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

1977年恢复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后，大批"老三届"知青在77、78、79年考入大学，成为文革后的"新三届"。卢新华小说《伤痕》的成功，推动

了校园文学创作的热潮。各大学的“知青”们,纷纷提笔写自己的“伤痕”,一批文学新秀在校园中崭露头角。[6]

各大学校园都出现了文学群体和油印文学刊物,如北大的《未名湖》、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园》、北京师大的《初航》、吉林大学的《赤子心》等,出现了一批“新三届”知青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7711班有卢新华、王兆军、张胜友、胡平、李晓、张锐、颜海平、陈思和、陈可雄、李辉等;吉林大学中文系77、78级有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等7位诗人;中央戏剧学院78、79级有肖复兴、陆星儿、张继平、乔雪竹、朱晓平、张辛欣等,但在其中起骨干作用的,仍然是在“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有组织化经历的知青作家。

“文革”时期的知青文学一直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官方与民间)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并行发展。组织化的知青文学追随“文革”官方的政治要求,非组织化的知青文学则努力创建独立的话语系统,沿着这条线索,他们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传统。进入新时期,知青作家的体制化传统仍然在发挥着影响,他们一旦转变政治立场就迅速进入了新时期的主流文学,而从民间产生的知青诗人、作家,反体制的立场使他们仍然处于边缘位置。

新时期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有什么准备,受过什么样训练的作家,可以登上历史舞台显示身手。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有组织化经历的知青作家,在新时期取得突出的文学地位并不是偶然的。

3. 知青沙龙的转型——民刊的兴起(1978.12—1980.12)[7]

随着“文革”时代的结束,知青沙龙开始分化和转型。政治压力的消失,作品发表自由的扩大,使民间的地下写作失去了意义。当沙龙的写作逐步进入主流渠道,沙龙也就随之解体。但是,一些沙龙中坚分子并不满足于官方给予的有限空间,要求获得自由的写作权利。在某些沙龙融合于社会的同时,另一些沙龙开始向社团化的方向发展。

在过渡时期(1978—1980年),地下状态的沙龙绘画、沙龙写作开始浮出水面,尝试以一种公开的形式展开活动。民间写作不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开始上升为体制问题。

(1)政治性民刊的出现

江青集团被打倒后，在1978—1979年国内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云南西双版纳知青为回城进行罢工请愿；上海发生"二五事件"，返沪知青拦火车；各地到省城和北京上访要求平反的人群络绎不绝。

1978年秋，贵州"启蒙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诞生，社址设在贵阳八角岩路1号，约有会员百人，主要人员有：杨在行、莫建刚、黄翔、方家华等，并出版社刊《启蒙》。不久该社分裂，李家华、路芒、汪印风等，宣布退出"启蒙社"，别组"解冻社"。原社刊《启蒙》三期，被承认为《解冻》二期，一些新诗学、论人权的文章，以两社名义出版；两社都发表了自己的宣言和论纲，提出要实行民主与法制。

1978年11—12月，各地到京上访者在西单墙贴出一批申诉冤情的大字报，引起群众围观，随后一批民刊也开始在西单墙出现，"民主墙"开始形成。在"民主墙"张贴和出售的民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北京之春》、《探索》、《沃土》、《中国人权》、《启蒙》等，约几十种。它们大多为手刻油印本。

正是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各地的民刊开始涌现，在广州有：《人民之路》、《浪花》、《生活》、《新民主浪潮》等青年工人和大学生的刊物，他们公布编者姓名和社址，公开出售刊物。在此前后各地涌现出的民刊，约有几百家。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北京市公安局把民刊、社团分成四类(基本上是好的，思想格调不健康的，有严重错误倾向和极端反动的)区别对待，《探索》、《人权同盟》等民刊被查禁。"民主墙"宣布移址到月坛公园，民刊运动开始全面退潮。

(2)各地的文学性民刊

在这一时期的民间艺术活动异常活跃。1978年10月11日，黄翔和几个贵州青年在北京王府井贴出《火炬之歌》等诗文，对北京沙龙产生了强烈的冲击。1979年8月《贵阳五青年画展》在西单"民主墙"展出，尹光中等人富于野性的作品，再次给北京民刊人士带来了兴奋。他们油印散发的

《艺术小辞典——非标准的探索》,成为他们的艺术宣言书。

1979年2月26日成都绘画沙龙在成都草堂小学,以"二月画展"为名,正式展出他们的作品,共收沙龙画作200余幅。参展作者20余人,历时15天。参观人次1900人,在省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民间艺术活动广泛开展的同时,一批文学民刊也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1979年3月,陈墨、邓垦和万一、徐坯、冯里、野鸣、建成等人在成都创办民刊《野草》,刊物在盐市口和总府街贴出后,观者如云,有人转抄,有人朗读。《野草》先后登出《天安门》(陈墨)等带政论色彩的诗作、散文,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办了3期便被迫停刊。其后易名《诗友》以手抄方式在圈子内继续传阅。同一时期在成都出现的民刊还有川师的《原上草》,"未名社"的《萤灯》等。

这一时期的文学民刊,大多数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如北京西单民主墙张贴、散发的油印刊物《秋实》(第5期)发表了悼念张志新的几首长诗:《无题——祭张志新烈士》(闻雷)、《血的启示——之一:是谁杀害了张志新烈士》等,言词相当激烈。《秋实》还发表了政治幻想小说《下一代的责难》,讲述由于不注意计划生育,在2015年秋天中国出现严重人口问题。小说前编者按语:"在人口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正确与否,需要争议和商榷,希望读者展开批评和讨论。"

各民刊强烈要求开放报禁。如《秋实》在1979年9月10日登出注册申请:"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第52条条文,我们自愿组成'秋实文学社',出版综合性文学月刊《秋实》,现提出注册申请。具体手续,我们等待通知。"

《野草》在第二期(79.4)发表了鲁连的文章《马克思捍卫出版自由——介绍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上的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提出"为争取制定出版法而斗争","预防性法律不应存在,检查法永远非法","出版自由关涉到普遍的自由。"

在北京一些沙龙中,小型手抄刊物也开始出现。张寥寥、包乐安、鲁双芹等人在"文革"中曾办有手抄杂志《渡过忧愁桥》,在1974年文艺围剿中被迫停刊。1976年复刊后,改名《桥》继续以非政治的文学同人刊物面貌出刊。刊物发表朋友的习作,诗歌和小说、散文,并在1979年举办"狗头

金"小说竞赛，奖品为一个狗头雕塑，围绕着"狗头金"刊物发表了：《树熊都都》（张郎郎）、《最后来的姑娘》（范小玲）、《价值》（张寥寥）等短篇小说。这一类纯文学性质的民刊，在当时并不多见。

在1978—1979年，各地青年自发刊印的刊物也发表了一批知青文学作品，主题集中在暴露上山下乡的苦难，展示知青们心中的"伤痕"。短篇小说《默默祝福》（刘峰），讲述几名出身"黑七类"的知青，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准备偷渡香港的故事。短篇小说《凋零》（燕女），讲述一名北京女知青与男知青同居怀孕被抛弃，终于坚持活下来的故事。短篇小说《你话点算》（华岳）以知青家长的口吻，诉说了子女插队后生活无着落，又受到农民驱赶的种种遭遇。长篇小说《灵光》（澜）通过一个下乡知青的生活遭遇，表现知青精神上的苦闷彷徨，生活上的凄楚悲凉。

这一时期的文学性民刊，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作品大量涉及社会问题，带有强烈的政治情绪。刊物发表的知青文学，大多是问题小说、控诉小说，它们虽然比官方刊物更多地暴露了上山下乡的黑暗，但是人物形象大多概念化，思想内容并没有超出"伤痕文学"的范围。[8]

（3）《今天》的创刊与停刊

1978年12月，北岛、芒克、黄锐一同筹办文学杂志《今天》*。第一届编委有：芒克、北岛、黄锐、刘禹、张鹏志、孙俊世、陆焕兴。他们将第一期油印刊物贴在毛泽东纪念堂的旁边、西单民主墙，北京的大学生和知青成为《今天》的第一批订户。《今天》文学团体开始形成。

1979年1月29日在京的几家民刊在中山公园召开联席会议，《探索》编辑杨光公开提出：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权同盟》的任畹町则提出人权问题。当晚《今天》内部就办刊方针发生了激烈争论。他们确立《今天》的办刊方针是：既坚持文学宗旨，又从道义上支持兄弟民刊。

1979年9月底，星星画展受到干涉，《今天》发起抗议游行。这次游行目的地是北京市委。游行的骨干分子是《今天》和各民刊人士，沿街围观参与群众达上千人。北岛回忆说："六部口前面一出现警察以后，就剩一百多人了，剩下的人全都爬上树、爬上墙去看了，然后就喊'冲啊'什么的，就是都想看热闹。所以当时实际上非常绝望，当时拆了民主墙以后，民主墙

运动实际上成为非常绝望的一个自由先驱运动,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

于是,一个文学刊物应该如何把握它的走向?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今天》内部发生争执。1979年10月《今天》分裂,五名编委退出。芒克、北岛牵头组成第二届编委。北岛担任主编,芒克任副主编,委员有:周郿英、鄂复明、徐晓、陈迈平、刘念春。后黄锐重回杂志做美编,赵一凡在幕后参与编委工作。

北岛回忆说:"《今天》当时处在政治漩涡中,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有多深地卷入政治?因为本身是一个文学杂志。""《今天》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怎么在文学和政治之间作出选择?"《今天》办刊宗旨是文学的,但它发展的轨迹,却一直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左右摇摆。在政治冲击和道义推动下,《今天》多次迈进政治雷区,直到1980年被勒令停刊。

《今天》在1978年12月—1980年12月两年中,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新时期著名的青年诗人不少都是在这里首次登台亮相,许多著名诗作首次在这里发表。

《今天》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诗歌:北岛的《雨夜》、方含的《谣曲》、江河的《纪念碑》、舒婷的《也许》、田小青的《歌手》、顾城的《山影》、杨炼的《蓝色狂想曲》、蔡其矫(乔加)的《风景画》等作品。并出了三个诗歌专集:北岛的《陌生的海滩》、芒克的《心事》、江河的《从这里开始》。特别是发表了一批"文革"时代有历史意义的诗作:食指的《相信未来》、依群的《巴黎公社》、芒克的《十月的献诗》、北岛的《回答》等。这是"文革"十年来沙龙诗歌的一次检阅。

《今天》还推出一批小说:陈迈平(万之)的《风雪交加之间》、甘铁生的《原谅我,兄弟》、史铁生的《没有阳光的角落》、刘自立的《圆号》等作品,并连载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

《今天》编辑部还集合了一批美术、摄影成员,在刊物上发表了马德升、曲磊磊、钟阿城、王克平、陆石、艾未未、夏朴等人的木刻、线条画、插图和摄影作品。编辑部在1979年9月和1980年8月协助举办了两届"星星画展",并在1979年10月协助举办了《自然、社会、人》摄影艺术展。

沙龙现代诗歌经过"文革"十年的曲折发展后,通过《今天》进入收获期。一批沙龙诗人通过《今天》走上社会,得到公众的承认。被称之为"朦胧诗"的新人新作,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热烈争执,为新时期文学注入了新

文化因素。《今天》推出的更富于反抗性的、更具异质的作品(如诗歌《疯狗》、小说《波动》),却被主流社会所漠视、拒绝或批判。

在1978年冬天,当短暂的历史机遇来临时,诗人北岛也恰巧成熟了。北岛在"文革"时期就是沙龙的中坚分子,他是一个"晚熟"的诗人,在创办《今天》时,他的诗名还远不及芒克。但是,他在1978—1980年之间,迅速成长为著名的诗人(就在他承担繁重的组织工作的同时,他写出了《雨夜》等著名诗作),成为现代诗歌代表性人物。他的诗作也成为新生代话语的经典文本。《今天》分裂后,北岛领导《今天》渡过了几次危机,取得了突出的文学业绩。北岛在《今天》的创办、组织和发展方向上,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在1980年12月被强令停刊时,共出版双月刊9期(每期1000册),丛书4种(每种1500册),资料3期(每期600份)。繁重的出版工作全部由手工完成。一批文学志愿者担负了杂志的校对、印刷、发行和联系读者的工作,他们是:赵一凡、周郿英、鄂复明、徐晓、刘建平、李南、王捷、程玉、李鸿桂、崔德英、张玉萍、尹蕾、陈延生等几十人,他们默默地在刊物"作坊"中进行奉献。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强大的团队精神,《今天》才成为坚持最久,文学成就卓著的民刊。

二、民间写作向主流位置的进军与退潮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创作开始成为一种潮流,个性化和个人主义的话语地位在逐渐上升,民间的艺术创作活动方兴未艾。从1978年到1979年,民间文学开始由边缘向中心运动,造成强烈的社会震动。1980年权力政治对话语变革的走向采取了批评、控制、疏导的文艺政策,民间的写作开始全面退潮。

1. 现代艺术和反特权文学的出现

1979年2月,北京油画家37人自发举办"迎春油画展",美协主席江丰为画展所写的前言称:"自由结社是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赋予人民的合法权利,而且画会是一种有利于艺术发展的组织形式"。同月,上海12人画展在上海市黄浦区少年宫举行,展出油画作品多具有现代主义倾向。4月,民间的"北京市油画研究会"成立,提出"政治民主是艺术民主的可靠保证,艺术家个人风格的被承认是'百花齐放'的响亮号角的主和弦"。9月,北京民刊艺术家举办"星星画展",画展连续展出三天,受到警察干涉。"星星画展"和在京民刊组织由西单民主墙前往北京市委进行请愿游行。

1980年夏,"星星画会"成立,并向市美协申请注册。8月20日至9月7日,第二届"星星画展"在美术馆展出,《人民日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广告,观众达8万人次,打破美术馆历届纪录。《新观察》发表了介绍画展的文章。"星星画展"对官方美术界的公然宣战,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9]

"伤痕文学"进入1979年,出现了一批异于以往,更富于挑战性的,以反特权为主旨的作品,如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电影剧本《在社会档案里》(王靖),中篇小说《飞天》(刘克)、《调动》(徐明旭),诗歌《将军和士兵》(陆鉴钊)、《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叶文福)等,其中《假如我是真的》,通过知青问题抨击封建特权,造成社会轰动,引起广泛争论。实质上,这批作品已不是本质意义上的"伤痕文学",而是一种新文学运动的萌芽。[10]

2. 民间写作的退潮

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历时22天的全国剧本座谈会上,对《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女贼》等剧本进行了讨论,会上产生了尖锐的争论。中共中央书记胡耀邦到会作了长篇重要讲话,他说:"我觉得《假如我是真的》这个戏,现在还不成熟,还有比较大的缺点。""把这个戏

照现在这样持久地演下去，还会产生另外什么样的社会的效果，就值得考虑了。”“如果作者自己觉得需要认真修改，那就自告奋勇……改不好，我赞成不演，暂时不演。”同时指出，“不要以为暂时不演的戏，不发表的作品，就是毒草。……我们党鉴于历史的教训，决不会把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我们伟大事业的同志赶跑！”在全国剧本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文汇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文艺创作要考虑社会效果》，提出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

胡耀邦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报》1981年一期发表后，这一讲话精神，开始在各级文化艺术部门贯彻执行。《人民日报》1981年1月14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指出：极少数人提出“要打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切框框”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求对目前创作中出现的某些不健康的倾向和情绪进行必要的批评和引导。各地民间自发的艺术活动在1980年底逐渐停止，反特权文学在1981年初也销声匿迹。

在1980年至1981年初，《文艺报》、《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莲池》以及各文艺报刊，连续发表了批判《苦恋》及反特权小说、诗歌的文章，批评这些作品有严重错误倾向。[11] 反特权文学在大批判的声浪中迅速消失。民间的现代艺术活动、民办刊物也在这一时期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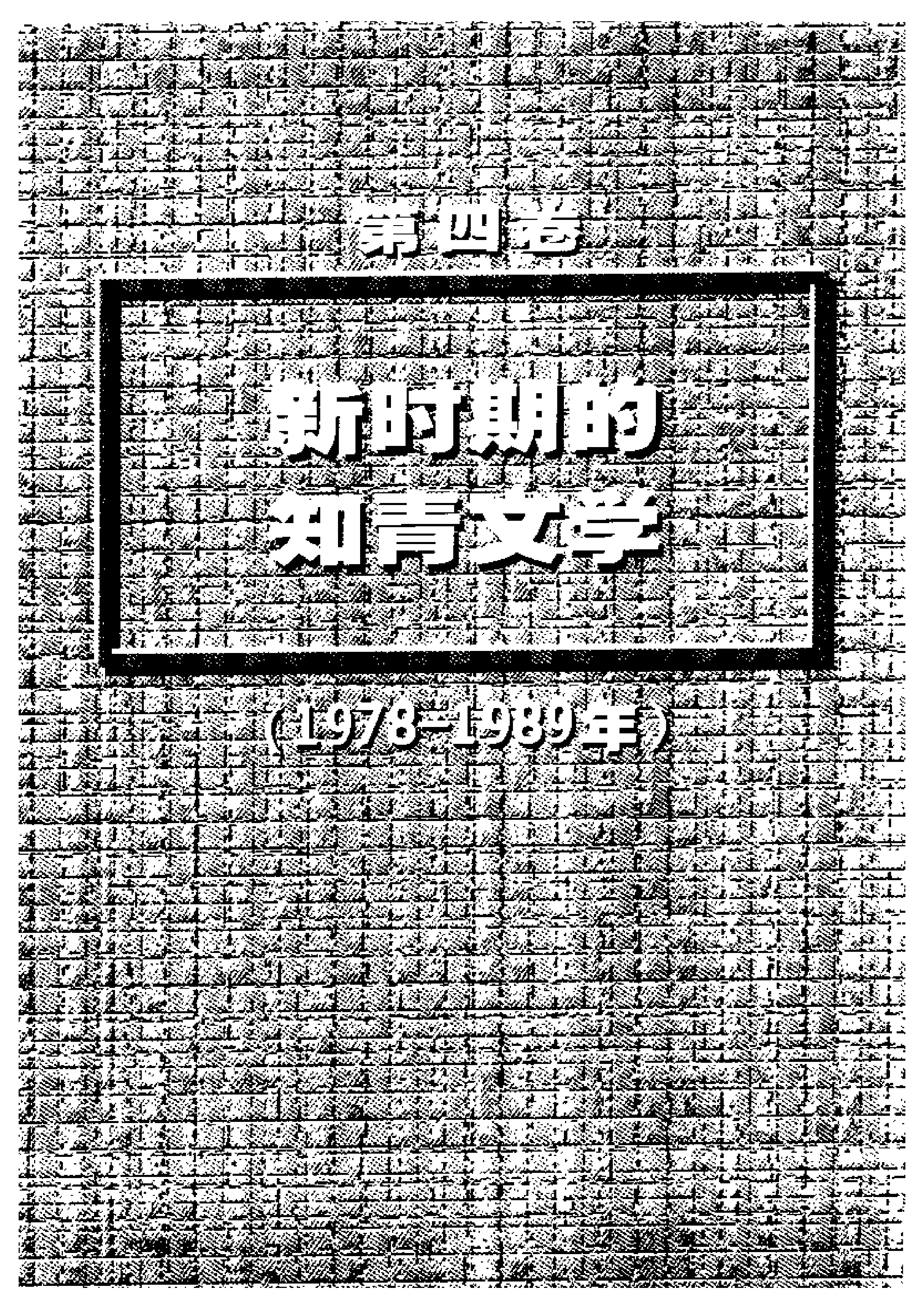
新文艺政策努力将各种话语都引导到主流话语渠道。1978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班主任》、《神圣的使命》等“伤痕文学”作品获奖，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此后，评奖活动每年举行，具体传达权力政治对文学的调控意图，引导着文学的走向。1980年前后，主流话语大胆地展开了有关“朦胧诗”的讨论，将这种民间话语有批判、有选择地吸纳进权力话语。

1978—1980年是新时期艺术的上升阶段，也是新时期艺术最终定型的阶段。这一阶段政府文艺政策的成功实施，使得文艺创作在1980年后能够沿着权力话语既定的轨道，继续繁荣发展。[12]

注　释：

[1]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98.1。
[2]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1。
赵履宽:《1977—1980 中国城镇的就业和工资》 人民出版社 1982.3。
[3]见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一批相关书目。
[4]《黑龙江文艺》1977年9期。
[5]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3年。
[6]冯瑛冰:《大学社团热透视》《作家报》1993.10.30。
[7]由黄翔、鄂复明、陈自强、张寥寥等人提供。参阅《今天》、《沃土》、《桥》、《野草》等民刊。
刘胜骥:《中国大陆地下刊物研究——1978—1982》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刘洪彬:《〈今天〉与民主墙时代——北岛谈话录》《民主中国》1993.1 第13期。
[8]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1。
[9]吕澎、易丹:《中国现代艺术史》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2年。
王克平:《"星星"往事》《九十年代》1989年1期。
《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4。
[10]《争鸣作品选编》(内部资料)北京市文联研究部 1981.12。
[11]《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1。
史超:《暴露为了什么》《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80年1期。
[12]《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1。
《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 1979.10。


第四卷
新时期的
知青文学
（1978－1989年）

第九章

新时期前期的知青文学
(1978—1984年)

一、新时期知青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对"两个凡是"进行批评,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不再轻易使用"路线斗争"的口号,表示要与"文革"政治路线实行决裂。全会一致同意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当局十分注重发挥"改革文学"对群众的宣传启蒙作用,正是这场意识形态革命,促成了"凡是派"的倒台,为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改革文学"大潮涌起之时,知青文学由后权威文学迅速转向新时期文学。知青文学承受了社会的激烈动荡,成功地转化为新时期的主流文学。知青作家积极参加"改革文学"的创作,写作了一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各种文学潮流先后涌起,知青文学横跨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朦胧诗潮"、"新现实主义"等文学发展阶段,伴随着不同文学潮流

登场,知青文学逐渐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

新时期知青文学可以分成20世纪80年代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978—1984年,是改革大潮初起时期,知青文学积极参与思想解放运动,协助权力话语回归和沿革。知青文学的描写对象也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生活,呈现出后知青文学的色彩。后期1985—1989年,是改革深入时期,随着改革艰难、曲折的发展,意识形态发生着深刻变化,知青文学逐步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被置于后景,作品关注点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人生。知青文学逐渐成为开放性的题材。

知青文学在80年代前期(1978—1984),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伤痕文学",主题是:控诉和反思。"伤痕文学"作为"改革文学"潮流中的一支生力军,推出了以《伤痕》(卢新华)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对上山下乡运动、"文革"运动和血统论,进行了批判控诉和反思。主流社会由此赞扬说,知识青年是思考的一代,是不再受欺骗和蛊惑的一代。

第二阶段的是"悲壮的青春",主题是: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作品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描述成一段青春悲壮史,为这场运动涂抹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代表作家是梁晓声。知青文学不再完全否定上山下乡,而是试图客观地、多角度、多层面地再现过去,"挖掘其中的真、善、美的青春的灵魂,去讴歌那以青春为代价的悲壮和业绩和心灵的历程",把青春的苦难变成了人生的骄傲。作品成功地克服了知青个人体验与权力叙事之间的矛盾,将权力话语引入知青叙事,这种"权力—知青"话语为知青文学作为独立题材进入主流文学打开了道路。"悲壮的青春"叙事,为其后的"乡恋文学"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是"乡恋文学",主题是:价值重建。返城后的知青面临生活的新起点,在生存困境中,乡村的经历成为他们奋斗的精神源泉。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成为知青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资源。"乡恋文学"的出现,表明知青文化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在1984年之后,知青作家群体基本形成,在他们面前似乎展现出远大的文学前程。[1]

二、"改革文学"中的知青文学

在新时期,"归来者"作家与知青作家,形成了"改革文学"的中青年骨干队伍。他们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共同担负了权力话语回归与沿革的历史任务。"归来者"文学的"第二种忠诚"和知青文学的"悲壮的青春"的叙事,在"改革文学"中同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两个作家群体和文学创作,成为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两个重要支柱。

1."归来者"文学的"权力—知识分子"话语

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文化战略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合作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他们把权力话语的沿革,作为首要的文化、艺术任务,自身话语的建立任务却被忽视了。

在"改革文学"的大潮中,知识分子配合改革开放,推进权力话语沿革,创造了"权力—知识分子"的二元混合话语形态。这种混合话语既被知识分子认为是自身话语,也被权力集团认为是自身的文化成就。知识分子与权力政治的结盟,推动了权力话语的回归与沿革,"权力—知识分子"多主体话语的产生,造就了新时期文化的光辉成就。

"文革"后一批当年被打倒的老作家(包括打成右派的作家)作为"归来者"重返文坛。王蒙、刘宾雁、丛维熙等"归来者"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作品。1979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批"归来者"的作品集中出版,名为《重放的鲜花》,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归来者"们重新成为当代文坛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声音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流。他们对权力话语的沿革与重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从某种角度来讲,这种声音就是1962年权力话语的重现。

"归来者"以自传体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牧马人》(张贤亮)、《布礼》(王蒙)、《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等，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有人指出："流放者归来后行使的话语权力乃是'期待者'的话语权力"，"他们将劫难化为传奇，创造了一个50年代知识分子受难圣徒的神话。"[2]

《布礼》(王蒙)中年轻的共产党员钟亦成，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党，送到农村改造，仍对共产主义和党的事业矢志不移。"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带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17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

王蒙塑造了一系列钟亦成式的人物——张思远(《蝴蝶》)、曹千里(《杂色》)、翁式含(《相见时难》)。王蒙说："20年来……我得到的仍然超过于我失去的，我得到的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得到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得到的是20年的生聚和教训。""党重新把笔交给了我，我重新被确认为光荣的、却是责任沉重、道路艰难的共产党人。革命和文学复归于统一，我的灵魂和人格复归于统一。这叫做复活于文坛。"[3]

"归来者"们创作了一批"第二种忠诚"的革命知识分子，从维熙笔下的葛翎、鲁泓、范汉儒，鲁彦周笔下的罗群、冯晴岚，张贤亮笔下的许灵均、章永麟，都具有"第二种忠诚"的精神品格。"第二种忠诚"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特殊政治培养出来的。

评论家孟繁华指出："归来者""首先感到欣慰的就是一种'归属'感，他们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归属感化解了几十年的不幸，苦难升华为崇高，灵魂在受难中得到了净化。"孟悦指出："它背后所隐含的还有社会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余威'。""在这种叙述的允诺中，历史一次次被拯救了。"[4]

"归来者"的文学作品，反映出知识分子与当权者两种话语的融合，正是这种融合构成了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特质，这种二元特质又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特质，它对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2. 知青文学的“权力—知青”话语

前期知青文学是“改革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主题,叙述方法明显受到主流话语的影响。

主流社会对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知青文学给予充分肯定。知青文学命名的知青形象,正是主流社会所期望的——“四人帮”的反叛者,改革路线的拥护者,新时期的建设者。[5]

新时期知青作家群主要由“文革”时代的知青作家组成。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之后,他们迅速改变了思想政治立场,重新焕发了创作热情。知青作家能获得崇高的文学地位,首先在于紧跟主流社会。

知青文学与“归来者”的文学一样,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表述。知青文学的建立,只是完成了权力与知青在话语上的结合,“权力—知青”话语,也是一种“权力—知识分子”话语。一些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知青文学作品,从表面上看其成功的原因是打破了某种文化禁忌,但从深层看,它们的成功仍旧是迎合了主流社会的期待。

在20世纪80年代,“右派”作家王蒙、丛维熙、张贤亮等“归来者”的作品,对知青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代表文学主流的“第二忠诚”小说,成为知青文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物,具有一定的示范性。

知青作家与“归来者”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虽然是两代人,但是却在运用类似的叙述策略,叙说着同一种话语。它们都使用“宏大的叙事”,他们同是被放逐者、受难者,同时又是圣徒。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也是“归来者”。

同“归来者”一样,知青文学颂扬苦难,把苦难成为圣者必须要经历的受难。上山下乡运动所造成的苦难生活,在知青文学中被表述为:“那过去的一切,都会变成美好回忆”。梁晓声在早期知青作品中,“塑造了一批以苦难为旗的道德自救、救赎者的形象”,“在历史担当的层面上,他们浅薄而又轻易地滑过去了,从而忘记了自省与批判”。[6] 知青作家同“归来者”一样,轻易地与历史和解了。某些人依据道德收获和文学成就,对历史表达了感激之情。

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知青文学同“归来者”一样，在表述一种归属感，无论是在返城之夜，冻死在哨位上的裴晓云所表现出的“第二种忠诚”(《今夜有暴风雪》、《同龄人》)，还是渴望登上新岸的易杰、暮珍所寻求的理想彼岸(《南方的岸》)，它所表述的一直是寻求一种归属，修复一种信念。

知青文学与“归来者”对乡村的态度也是相似的。张贤亮在《绿化树》、《灵与肉》、《肖尔布拉克》中展览苦难时，忽视了在那个灾难的岁月里，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民的苦难。“归来者”的“苦难的神圣化，恰恰是以遗忘乡村苦难为前提的”。[7]同样，后知青文学的一些作品，把乡村寓意为美妙的少女、伟大的母亲；知青不是落难公子，就是天之骄子。二者对乡村的傲慢态度，都是以某种特权为背景的，或是有国家傲育特权化的支持，或是有国家城乡分治制度的支持。

作为主流文学的知青文学是建立在“权力—知识分子”话语基础上的，正是借助着“归来者”创造的这种复合型的话语结构，知青文学才能建立起“权力—知青”话语，从而进入主流文化。如同60年代的红卫兵话语是通过“文革”文学的写作，逐步蜕变成为独立话语一样，80年代前期的知青文学也正是通过“改革文学”的写作，逐步蜕变成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

正是由于知青作家与“归来者”在“权力—知识分子”话语上达成了思想、文学上的统一，才顺利组成了主流文化的中青年作家队伍，共同担负起权力话语回归与沿革的历史任务，创造出了新时期的文学繁荣。

三、“伤痕文学”主题下的知青文学

20世纪80年代初的“伤痕”、“反思”文学，负载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使命，侧重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性。

“伤痕文学”潮流下的知青文学作品，有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甘铁生的《聚会》、竹林的《生活的路》、陈建功的《萱草的泪》、孔捷生的

《在小河那边》、叶辛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等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大多集中于批判"血统论",对"文革"时代进行控诉和批判。

1.《伤痕》、《蹉跎岁月》——批判血统论

短篇小说《伤痕》(卢新华)1978年在《文汇报》发表后,报社收到近900件信稿,引起一场社会大讨论。继《伤痕》之后,涌现出一系列揭露"文革"暴行和"四人帮"罪恶的小说,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伤痕文学"浪潮。

小说《伤痕》描述,女知青王晓华的母亲在"文革"运动中被定性为"叛徒",她没有毕业就报名下乡,以便彻底断绝与母亲的关系。在农村,她仍然无法摆脱家庭出身的影响,她被迫中断与恋人的爱情,下乡四年才勉强入团。当王晓华回到家中,母亲已经去世,在王晓华的心中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伤痕。小说揭露了"血统论"对知识青年的迫害,极左思想对知青一代心灵的毒害。

卢新华的小说突破了长期以来文学创作只许歌功颂德的禁区,有力地推动了对"文革"歌治的批判。随着改革运动的发展,《伤痕》等问题小说所存在的政治理念过于突出,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等问题开始突出。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些知青作家试图摆脱政治实用主义对文学的束缚,向文学本体回归,向人本身回归。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叶辛,1982年)发表后,有力地推进了"伤痕文学"向深层发展。

叶辛1949年10月生于上海。1969年到贵州山乡插队,下乡三年后开始学习写作。前后出版几十部小说,《蹉跎岁月》是其代表作。[8]

《蹉跎岁月》讲述,下乡知青柯碧舟克服出身的压力,为当地农民建立小水电站。军干子弟女知青杜见春,对柯由怜惜、同情而产生爱情,由于血统论对她的影响,使她中止了与柯的恋情。不久,杜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她的灵魂也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美丽善良的山寨姑娘邵玉蓉勇敢地和柯碧舟相爱,不幸被极左势力杀害。最后,柯碧舟与杜见春两人终于冲破阻力走到一起。

柯碧舟是一个成长的青年,他遭受社会歧视,灰心丧气,一度想投水自尽,是农民平等地对待他,使他逐步振作起来,试图有所作为。杜见春是

一个幼稚、缺乏生活阅历的干部子弟，但是她敢爱敢恨，具有真诚、奔放的性格。杜见春雨夜在皂角树下自杀，柯碧舟前来解救的一段，写得真实、感人。

> 贴身衣衫透湿，浑身水光油亮、披头散发的杜见春跌坐在地，看清楚倒在身旁的是柯碧舟，她气恼地撒野道："你、你来干啥？"柯碧舟吓了一跳，怔了一怔，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讷讷地反问："你……你在这里……干、干什么？""我不要活了！"杜见春眼睛失神地一瞪，"哇"地一声，放开喉咙大哭着，"我活不成了！你、你不要管我！"说着，她摇摇晃晃站起身子，撒开腿就无目的地跑去，柯碧舟悍然不顾地跳起身来，使劲地追到她身旁，一把抱住她，拉开嗓门吼着："不！不成，你不许走！你不能这么做！"杜见春在柯碧舟的臂膀里挣扎着，跺着脚，扭着身子，但想不出其他办法的柯碧舟只好紧紧抱住她，她怎么也犟不过他，最后只得认输地垂倒了头，精疲力尽地倒在他的肩膀上哭嚎着："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啊！"

小说真实地描述了知青生活的时代环境，刻画了农村中的极左干部和知青中的各色人等。特别是柯碧舟、杜见春两个人物的性格的塑造，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的观察、提炼，写得比较生动感人。小说洋溢着青春的激情，具有打动读者的情感力量。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都受到传统小说、戏曲的影响，具有民族审美风格。

小说也存在一些令人遗憾的问题，如流露出的城乡差别意识。作者将美丽、善良的品质集中在山寨姑娘邵玉蓉的身上，把她作为乡村的象征。邵玉蓉在书中只是柯、杜二人爱情的插曲，作者设计突发事件让她死亡。美丽的乡村只能存在于作者的梦中，可以远远的怀念，却不能走近它。乡村既是少女，也是母亲，对她的情人和儿女知青，当然要服从和奉献。一方面作者控诉了血统论所制造的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却接受了城乡间的不平等。[9]

作品还有一些概念化的毛病，农村干部、落后知青等人物被符号化，简单地区分先进与落后等等。但是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不能掩盖小说取

得的成就。

叶辛作为一个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知青作家,能够摆脱"文革"文学的影响,在新时期创作出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应属难能可贵。

2.《普通女工》、《燕儿窝之夜》——伤痕的平复

在20世纪70年代末"伤痕文学"的初期,知青文学集中揭示乡村生活在知青心中制造的伤痕,控诉"文革"罪行;随着"伤痕文学"的发展,到了80年代初,一些作品开始描写知青返城后如何逐渐治愈心灵的创伤,在新时期开创幸福的新生活。"伤痕文学"的思想主题开始从批判转向歌颂。

《普通女工》(孔捷生1980年)中的何婵,是一个带着私生子返城的女知青。在乡下,她蒙受一些人的奚落,回城后母亲不准她走进家门,进工厂又遭到一些人的嘲笑。生活似乎疏远了她、抛弃了她,但她并不怨天尤人,用善良的心和诚实的劳动投入生活,加入四化建设的行列。她在钻锁孔这个极平凡的生活位置上,创造了不平凡的工作成绩,重新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何婵是一个"普通人",她没有宏大理想,好好干活,带好孩子,是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工,时代的阳光也照入了她封闭的内心世界,企业改革在她心灵上掀起了涟漪。她当上生产组长,由只管自己变成开始关心他人,这种责任感的复苏,标志着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信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电影《大桥下面》(上影厂1980年)描写两个上海知青返城后,如何治疗伤痕,重新建立生活。那个隐秘的寄养在乡下的私生子,代表着失去的贞操、乡村的耻辱和痛苦的记忆。在电影结尾,孩子最终得到承认,女主角也重新得到了爱情。影片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镜头,两个市井小人物(修车工和裁缝)的手,自然而真实地相互接近,渴望着相握。这是知青们对建立新生活的渴望,是一种大众的呼声。

1982年之后的一些小说,注意描写时代的彷徨者,或者说是"多余的人",如何抚平内心的创痛,经过痛苦的探索,开始举步追赶时代的潮流。

中篇小说《白杨深处》(陆天明)中的主人公郧辉,受到时代冲击,再也

无法逍遥，意识到"我们要去改变现状"。中篇小说《燕儿窝之夜》（魏继新）中，带着历史伤痕的姑娘们，在抗洪斗争中迸发出生命的火花，经历过痛苦失意，自称"多余的人"的任海萍，面对新时代"隐隐产生出一种对新生活的强烈渴望"。[10]

中篇小说《命运交响曲》（王安忆），作为知青的"我"，对游离于生活之外的音乐教师韦乃川失败人生的审视，批评时代旁观者和落伍者，表达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时代感慨。[11]

由"伤痕"的揭露，到"伤痕"的治愈；"伤痕文学"很快由对"四人帮"的批判，转向对新时期主流社会的歌颂。"伤痕文学"从开端到结束，始终受到政治功利主义的制约，具有庸俗社会学色彩。

四、农村知青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城镇知青的大规模返城风潮，也波及到农村知青，他们纷纷要求国家为回乡知青落实政策，在乡村出现了一阵抗议的浪潮。

回乡知青在50年代曾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城镇知青下乡后，回乡知青开始受到舆论的冷落。在60—70年代，农村发展普及教育，回乡知青人数激增，经过"文革"十年，回乡知青已经数倍于下乡知青。他们是知青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却被国家、社会长期忽视。国家召开知青工作会议和制定相关政策，一直都是以城镇知青为对象。

下乡知青大举返城后，国家开始严格控制从农村招工。1978年国家明确提出："今后城镇用工，基本上不从农村招收。"此后各地开始清退农民工，回乡知青进城的门被关得更紧了，这使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回乡知青与下乡知青之间的不平等更加凸现出来。

1979年8月，贵州省安龙县十多名回乡知青在县城贴出一封致全县回乡知青的公开信，反对近几年在就业、升学、当兵等问题上，对城市知青和回乡知青区别对待，呼吁回乡知青起来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此信在当

地引起了强烈反响。同一时期,各地回乡知青投书《中国青年报》,对不重视回乡知青,表示强烈不满,要求下乡和回乡知青应一视同仁。[12]

长期以来知青文学都集中反映城市知青,很少出现描写农村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农村知青作为一个弱势群体,长期以来被社会所忽视。经过个人奋斗脱离农村的知青,即便能够进人城市,也迅速地被都市文化所吞没。要使反映农村知青生活题材的作品重现于世,必须要有多种条件,或是像50、60年代,农村知青再次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的一个问题,使得主流社会重视他们,或是农村知青的个体生命意识得到苏醒,足以战胜主流意识形态,发出属于个人的声音。

上山下乡运动的退潮,使回乡知青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国家政策对回乡知青的忽视,进一步激发了回乡知青的不满;农村知青再次成为社会政治、经济上的问题,于是反映农村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在中断了二十年后重新出现。导致这一题材作品出现的因素,并不是农村知青代言人的出现,也不是回乡知青自我意识的苏醒,而是由于"改革文学"对农村政治问题的关注,它是作为"改革文学"的农村题材出现的。随着国家对农村知青问题的搁置,反映农村知青文学的作品也随之销声匿迹。

1. "人生大讨论"与长篇小说《人生》

长篇小说《人生》是农村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小说的产生具有深厚的时代背景。《人生》是在"人生大讨论"背景下产生的,这场讨论对小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3]

"文革"十年中,广大青年存在着诸多思想困惑,但是一直未被社会主流承认,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团中央决定在适当的时机将它们公开化,展开一场价值观的大讨论。讨论目的是为了重新树立社会公德,引导青年们更积极地投身改革建设大潮。

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北京两青年署名"潘晓"的长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起人生观大讨论。报社先后收到全国六万多封读者来信。1982年《中国青年》杂志组织对电影《沙鸥》的讨论:"沙鸥用一生拼一块金牌值得吗?"同年7月,第四军医大学空军医学系学生张华为

救掉人粪池的农民牺牲，引起是否值得的讨论。这场有关人生的大讨论，引发了年轻人探讨人生观的思想热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长篇小说《人生》于1982年发表了，小说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小说多次获奖，并被拍成电影。

《中国青年》很快组织了对小说《人生》的讨论。在围绕《人生》的讨论中，有人提出：高加林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片面强调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决不是我们时代青年应有的情操”。有人提出：“高加林是一位有抱负、有理想，不甘于命运之愚弄，富有才干，勇于追求的新型青年”，“他是一位受害者，一位被社会邪恶势力击败的不幸者”。最后，讨论被引申到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生观？

在小说《人生》中，回乡知青高加林是一个像潘晓那样的，遇到了人生迷途的青年。高加林的悲剧，被作者处理成对人生价值讨论的具体答案。《人生》卷首“题言”写道：“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可以说《人生》是一部追赶社会时尚的社会问题小说。

2. 长篇小说《人生》

《人生》的作者路遥，是延川永坪中学初中66届学生，他在“文革”初期一度很活跃，曾当过县红卫兵的头头，返乡后曾与在当地插队的北京知青作家陶正等人发生过交往。可以说，路遥是一个典型的回乡知青作家。作为一个回乡知青，作者经历过被城市隔绝的痛苦，他在作品中传达了这种切身的体验。

小说描写了农村回乡知青高加林、巧珍悲剧性的人生命运。高加林长期徘徊在城市之外不能得其门而入，为了进入城市，他抛弃了“大马河川里最俊姑娘”刘巧珍。他试图由“后门”进入城市，结果失败了，巧珍违心的出嫁，使高加林陷入了痛苦和悔恨。

作者通过高加林的女友黄亚萍的评价，来概括高加林性格：他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于连的个人奋斗思想和机会主义，把高加林引向了歧途，抛弃了纯真的恋人巧珍。于连的人生观念是陈腐的，它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生活环境里必然是要碰壁的。小说的结尾写了高加林从歧途上归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如果从此摒除了于连式的极端利己主义的思想,而将他的保尔.柯察金式的钢铁意志和睿智才华,用于哺育他的土地,他将会成为农村大变革的风流人物。作者劝导农村青年要作保尔,不要作于连。

高加林被驱赶出城市时,作者让他进行了道德忏悔。作者忘记了,当于连走上绞架时,司汤达没有让于连进行忏悔,而是在法庭上对封建等级制度发出公开的诅咒。

作者把巧珍视为一种象征,她是家乡、土地、传统道德和人生信仰的美好象征,这种象征本身就是一种虚构。小说把黄亚萍作为城市的象征,她是狂放、自私的,同样是出于一种理念的虚构。路遥通过两个女性形象,将乡村描述为道德的源泉,城市则成为罪恶的渊薮。

决定高加林命运的是城乡分治的国家政策,小说作者却将农村知青对宿命的争抗,归之于错误的抉择,将一个并不复杂的社会问题,概括为复杂的道德问题。

尽管存在以上这些问题,《人生》毕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部小说的重要贡献在于,第一次把农村知青渴望城市文明、在乡村痛苦挣扎的形象公诸于社会。小说中这样写道:高加林"抬起头,向沟口望出去,大山很快地就堵住了视线,天地总是这么狭窄"。另一段写道:当星夜来临,灯火在城里亮起来时,高加林才站起来,下了东岗,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地张开双臂,面对灯火闪烁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离开了……"

高加林的经历浓缩了中国农村几千万回乡知青的历史命运,他寂寞的青春和对现代生活的渴望,代表着普遍的思想情感,高加林成为回乡知青的典型形象。高加林的痛苦显然具有民族性的、历史性的因素。《人生》的作者没有意识到高加林性格所代表的历史进步意义,把高加林作为人生说教的反面典型。

作者想象力的底线,是国家的城乡制度、户籍制度,"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是不可变更的,必须变更的只有农村知青个人的思想情感。作家宁可背离个人对现实的经验、感悟,也要选择合乎社会制度的结论。一个具有才华的作家,一部伟大的作品,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叙事,最后失足在简单的社会学问题上,犯了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的错误。

3. 同时期的农村知青文学作品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批文学作品反映了乡村知青对城市文明的向往。《鲁班的子孙》中，知青哥向山妹子描述神奇的城市；《哦，香雪》中，向前方无尽延伸的铁轨将乡村妹子的想象带往城市；《爬满青藤的木屋》中，带天线的收音机和下乡知青的刷牙，引起了乡村女性内心的波动。在另一些作品中，城市化的脚步打碎了农业社会的残梦，使古代社会的遗民们逃避不及。《最后一个渔佬儿》中，炸山的巨响惊走了福奎的鱼，但他"情愿死在船上"；《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塔贝顽固地拒绝走上"通往更嘈杂的和各种音响混合的大都市路"。

中篇小说《小溪九道湾》（叶文玲）描述了农村青年人与城市的邂逅。善良的农村姑娘葛金秋进城后成为"小保姆"，她流入城市并没有任何的"野心"，纯粹是为了谋生。然而，城市并不是理想的天堂，她所投奔的主人没有使她这个"小保姆"时来运转，她寄人篱下，饱受屈辱，苦上添苦。葛金秋最后毅然返回实行了新政策的家乡，终于在农村改变了她和一家人的贫苦命运。作者虽然也批判了城乡差别和社会歧视，但将葛金秋的灾难归之于对城市生活的错误选择，认为只有返回农村建设家乡，才是她正确的人生道路。[14]

在文革前17年的农村知青文学，已经表现出农村知青对城市的梦想与憧憬。从20世纪5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回乡知青改霞(《创业史》)、刘玉翠(《春种秋收》)，到60年代初的回乡知青金玲(《山村姐妹》)，都透露出农村知青对城市的向往。到了80年代初，整整三十年过去了，第二代农村知青高加林(《人生》)、葛金秋(《小溪九道湾》)再次叩响了城市的大门。

"改革开放"的城市化进程，必然会唤起千百万乡村知青内心的强烈渴望。乡村知青对城市文明、现代生活的渴望，不仅具有人权上的当然合理性，而且具有强烈的历史合理性，它应合了时代的呼声。他们已经等待得太久太久。他们的渴望和痛苦，正是古老中国急于进入现代化的渴望与痛苦。

第二代农村知青终于等到了改变个人命运的机遇。在80年代初走出乡村的博士生尹昌龙说:“当我们说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是从《人生》开始的时候,也许要说的并不仅仅是人生观大讨论带给我们的思想课程,更重要的是整个中国迈向一个城市化的时代,而我们不得不由此开始新的命运,新的人生。”[15]

80年代反映农村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显然都忽略了中国正在进入高速城市化的历史新情境。“如果说高加林的命运置身在高家村与县城的‘交叉’位置,那么推而广之,及至更大的环境,则可以说中国社会处在城乡的‘交叉’位置。”“现代城市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它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它是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16]

从50—80年代,不同时代反映农村知青的文学作品,都任意改变回乡知青的形象。大多数作品不是出自农村知青之手。农村知青作为一个独特的农村阶层,是一个被社会忽视的弱势群体。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形成一个文化群体,也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他们的文化命运是相当悲剧性的。这个阶层的历史命运给我们的启示是,知识本身并不能改变人的命运,除非这种知识能够被转化为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创造力,而要实现这种转化,需要有主宰自身命运的主体意识。

五、“悲壮的青春”——对知青运动的命名

上山下乡运动悲剧性的结束之后,知青群体普遍产生了沉重的挫败感和困惑,他们渴望对这段人生有一种叙述,一种重新的命名,这几乎成为知青一代人的共同企盼。在共同寻找命名之时,以梁晓声为代表的东北建设兵团的一批知青作家,最先提出了“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他们把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光辉投射在失败的历史上,使它变成了一部辉煌历史。这种“悲壮的青春”历史,被广大知青群体欣喜地接受,他们终于在新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新名字,为自己的牺牲获得了新的光荣。

知青一代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先烈的榜样对他们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是渴望成为英雄的一代。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做出过真正的英雄业绩。“悲壮的青春”虚构出的知青英雄和悲壮青春，满足了他们内心的渴望。

东北建设兵团的知青作家群是知青文学的重镇，他们是一批在新时期具有影响的作家：梁晓声、张抗抗、肖复兴、陆星儿、张辛欣、李龙云、陈可雄、陈爱民、刘进元、何志云、么树森等人。这个知青作家群中，有许多人用作品描述了黑土地上的悲壮青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梁晓声。

梁晓声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白桦林作证》等系列小说，讲述可歌可泣的青春故事，塑造了李晓燕、裴晓云、刘迈克等一批英勇献身的北大荒知青形象。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2年)将北大荒知青的垦荒生活，描写成神奇的传说。在开星“鬼沼”的过程中，充满了血泪和痛楚，甚至是知青主人公的死亡。小说通篇贯穿着一种英雄气概和悲怆情绪。在小说结尾时，作者写道：“我们经历了北大荒的‘大烟炮’，经历了开星这块神奇土地的无比艰辛和喜悦，从此，离开也罢，留下也罢，无论任何艰难困苦，都决不会在我们心上引起畏惧，都休想叫我们屈服……呵，北大荒！”

在《今夜有暴风雪》(1984年)中，梁晓声讲述了另一个美丽的苦难故事，就在知青返城之夜，裴晓芸冻死在哨位上，表现出知青的“第二种忠诚”。梁晓声后来评价知青运动时说：“在人人需要证明忠勇的年代，英雄主义是青春的至离涅槃。葬青春之土地，岂不为神圣的土地？殉土地之青春，正所言贞烈之青春。”

当时的主流文学界一致对梁晓声的小说表示热烈欢迎和赞叹，作家蒋子龙谈到梁晓声的小说时说：“以对历史负责，对一代人命运负责的态度，用积极的理想的光芒照亮人物的性格”，“阅读它的时候时时想到那些大手笔写的史诗”。[17]知青的青春胜利与光荣，也是整个社会的胜利与光荣。当整个知青集团为之欢欣鼓舞时，曾放逐了知青一代人的城市和社会也如释重负。因为对知青苦难的歌颂，也是对国家社会的救赎。

在此之前上山下乡运动一直是文学创作的禁忌，梁晓声在小说中使用了复杂的叙述策略，以保证使小说得到主流社会的接受。不熟悉主流文化叙述，不了解文化禁忌的作家，是难以穿越审查雷区的。在“文革”期间，

曾接受过组织化训练,为梁晓声穿越雷区,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这条创作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梁晓声说:“电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当年曾勒令下马停拍……《雪城》几乎不许播出……《年轮》曾明令不许参加评奖……原因都差不多是——调子太低暗,未表现理想,咀嚼苦难等等。而另有不少评论者,嘲讽我在作品中张扬虚假理想,掩饰苦难,玩味失落的崇高……我的知青作品确曾给我一些浮名,但也常使我陷入左枪右戟不得不横着站的两难之境。”[18]

梁晓声小说的成功,是向主流社会妥协与合作的结果。他把知青文学嫁接在权力文学上,建构出“权力—知青”话语。这种话语中虽然有双重话语主体,但它使后知青群体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声音。在这种复合型话语中,知青生活的私人叙事被偷换成权力的宏大叙事。

孟繁华指出:梁晓声的小说“运用一种叙事化的结构技巧,注重事件的封闭性、可信性以及戏剧性,从而制造出历史必然性的假想,然而,这种通过叙事手法建立起来的所谓必然性,最终仅仅是一种虚幻的象征性意义的结构”。[19]

梁晓声建构的这种话语模式,成为知青文学进入主流文学的钥匙,它为知青文学以后的发展开辟了主流渠道。

在“伤痕文学”中,知青文学还处于准知青文学的状态,随着“悲壮的青春”叙事的出现,在“权力—知青”话语基础上,知青文学开始形成独立的文学题材。“悲壮的青春”叙事的成功,使知青题材重返主流文学,这意识着后知青文学的真正建立。

在“悲壮的青春”小说的创作上,张承志也是一个重要的作家。

张承志在《绿夜》(1982年)中描述了,“我”在返城八年后,重返草原时的复杂心绪。向风雪中归来的知青敞开温暖怀抱的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在劳动中发出格格笑声的天真、单纯的红衣少女奥云娜;虽然遭到厄运,却以顽强的劳动果实来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把脚印留在广袤草原上的知识青年们;那个在严峻考验面前丧失信念者;那个声称庐山、黄山的“表弟”……所有这一切都时隐时现、交相嬗递地出现在“我”的意识流动中。

张承志在小说集《老桥》“后记”中说:“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张承志提出要

“为人民”写作，要有“人民崇拜”。

张承志把知青说成是幸福的人，显然违背基本常识。他把“人民”抽象化，没有民主制度和民主意识的“人民”只是国家的代名词，没有具体条件，抽象地提“人民崇拜”和“为人民”写作，结果很可能造成一种国家崇拜和为国家写作。

六、乡村之恋——价值体系的失落与寻求

知青在返城后，普遍面临就业、住房等困难，生活又一次遭受挫折，离开集体生活，也使他们产生了未曾有过的脆弱和孤独。他们开始对以往的乡村生活以及失落的青春、理想，产生了一种梦幻般的依恋。旧日乡村回忆成为支持知青在城市生存、奋斗的力量源泉，乡村开始被虚构成一片美丽的净土。表达对乡村思恋之情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

“乡恋文学”与“伤痕文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文学流派。“伤痕文学”揭示上山下乡运动的悲剧，“乡恋文学”强调农村生活的价值；“伤痕文学”强调返城后伤痕的平复，“乡恋文学”强调返城后生活和思想上的困境。“伤痕文学”的表述，带有鲜明的理念色彩，无论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批判，还是对新生活的赞美，都体现出主流社会的叙述立场。“乡恋文学”的表述，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叙述自相矛盾，但是它开始回归于知青群体自身。前者体现着主流社会的叙述，后者则开始体现知青主体的叙述。

从“伤痕文学”过渡到“乡恋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杜鹃啼归》（陈可雄、马鸣 1980 年），描述知青面对大学中建立起来的爱情和插队时形成的婚姻，面临着最后抉择，那个决定去留的火车小站，具有历史的象征意味。虽然作者最终还是让主人公选择了传统的道路——回归乡村，但是知青生活的主体性却被突现出来。

如果说“悲壮的青春”使后知青文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创作题材，那么

"乡恋文学"的出现,意味着后知青文学开始进入一种主体独立的表述。从社会学角度上讲,它才是真正的知青文学。

这一时期的"乡恋文学",反映了知青所处的思想困境。知青一代人在精神上,同他们的物质状况一样,达到了破产的境地。"乡恋小说"记录下一段历史的苦闷彷徨,价值的迷失和痛苦的寻找。这种生活的彷徨,正是一种独立诞生的前奏,即使最初寻求的结果是荒谬的,无损于这种寻求行动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独立探索的开始。

"乡恋文学"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从寻找价值立场,到修复价值理念,由最初的情感怀念,发展为毅然踏上返乡之路。

1. 想象中的乡村——农村,精神的锚泊地

《遥远的清平湾》(1983年)中,史铁生回到了虽然贫困,但是充满了温馨的如诗如画的小村,他在记忆中把遥远的乡村,变成了城市之外的精神故乡,变成了一首乡村乌托邦的诗。这是与城市化的物质欲求相对立的一种乡土梦想。知青需要诗意和梦幻的慰藉,"古老的生活情景和生产方式,常被加以美化地描写,也出现对木犁、水磨、窑洞、木屋、清澈溪水、还未留下人工痕迹的自然风貌和景观等的蕴含感情的描写。当然,作家要维护的并不是这些生活和生产方式,维护的是道德范畴上的东西。"[20]

《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中,陈信顶替哥哥下乡,经过了十年农村生活后,终于回到了家乡上海。陈信回城后开始待业,受到熟人、朋友的傲视和怜悯,还要同哥嫂争家中的一席之地,甚至谈对象也到了委曲求全的地步。陈信的价值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苦闷地在黄浦江边漫步。"十年里那点渗透他心灵的,苦苦的而又是甜甜的思念,消失了。十年里那种充实感也随即消失了。他的目的达到了,下一步,他该往哪儿走?人活着总要有个目的地。完成西装革履、喇叭裤、录音机的装备,跟上时代新潮流?找对象、结婚、建立小家庭?……这些都可以开始了,是的,可以开始了,只是还需要很多努力,很多辛苦。并且,如果时装包裹着一颗沉重而不愉快的心灵,究竟又有什么幸福?为了建立家庭而结婚,终身伴侣却不是个贴心的人,岂不是给自己加了负荷。他不由又想起了月牙儿般的眼睛,

唉,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人生的目的地,总归应该是幸福,而不是苦恼的。他忽然感到,自己追求的目的地,应该再扩大一点,是的,再扩大一点。""还有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很长。该怎么过下去,真该好好想一想。又一次列车即将出站,目的地在哪里?"

王安忆创作的同类题材小说《运河边上》等,反映上山下乡运动退潮后,一些知青对生活的思考、探索。它们可以被看做是《本次列车终点》的姊妹篇。[21]

知青运动的火车驶入了历史的终点,但是一代人未来的目的地又在哪里呢? 这正是当时知青作家们试图在"乡恋文学"中解答的时代问题。

2. 价值体系的修复——农村,精神的彼岸

知青的"青春阅历和有限的文化资源使他们无路可投,他们只能再次以想象的方式重返乡村,重返一个虚构的乌托邦。"[22]

《南方的岸》(孔捷生 1983年)试图为返城后价值失落的知青群体,指出一条理想主义的道路——返回农村,重建理想主义的新生活。

这是一部社会学意义上的思想小说,它体现了作者修复价值体系的思考。小说中的场景、人物都是根据先验理念设置出来的。孔捷生在小说后记中,以自己回到海南躬耕的事实,现身说法,声称:"我已寻到新岸,并在这新岸上开始耕耘。"

小说主人公易杰创作了一部知青小说,它缺乏贯穿的主题,杂乱无章,这份小说手稿象征着一段没有理想的青春历史。易杰初恋的女友丽容为了离开海南建设兵团,不惜出卖自己,代表着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割胶手暮珍代表昔日的青春理想。易杰本可以通过丽容介绍和帮助,在电视剧团当编剧,并娶麦老师的女儿小汀为妻,在城市开始新生活,但是易杰决心与暮珍一同返回海南农场,重新开始充满理想的生活。

作者将记忆中的乡村生活变成理想的乌托邦,迷惘的知青只有返回那里,才可以重新获得精神的安适。作者所表述的并不是新的价值观,而是重新修复的旧价值体系,它是一个旧理念的王国。

《南方的岸》记述了对青春的回忆,无尽的感伤情绪,这是一种典型的

时代情绪：

"星光黯淡下去，我割完最后一刀，东方的天际已呈出淡红。萤火虫似的胶灯，盏盏从林段里飘出，纷沓的胶鞋踏上晨光依稀的牛车道。劳动后的笑语在胶园中荡漾。……上午九时许，日光已非常酷烈。龟裂的晒场上反射着刺目的赭红色，我们却挑着胶桶晃晃悠悠地步上林段了。被浓密的树叶过滤了的缕缕阳光仿佛也变得碧绿，林间弥漫着胶乳特有的类似牛奶的芳香。"

"牛车下坡时车轴断了，一边轮子掉下来，白花花的胶乳淌了一地。这意外事故实在不能怪他(阿威)，可我还是暴怒如雷，割胶工们一片哨然，惟有暮珍竟失声痛哭起来。垂头丧气的阿威突然抄起一根锄柄，发狠地向那头无辜的水牛冲去……"

"我们用嫩草擦拭着手上的泥渍，暮珍却又一次扑倒在坟前，发出最后的嚎啕大哭。连周围的白色小野花都在悉悉颤抖……我们都走了，只留下木生。他被那绿林的根须紧紧环抱，永远安息在那温厚的泥土下，只有那无边的绿色林涛和羽茅草茫茫的喧响陪伴着他，那是与这个世界一般古老的山林交响乐……哦，那胶园涛声是首新歌，是我们谱写的无词之歌！"

易杰、暮珍重返海南的行动，具有一种象征性，是对青春的一次回归，一种梦中的返乡。它代表了一种群体性的内心冲动，它是知青在现实中无法实践的梦想。这种情感是真挚而强烈的，它令知青读者眼热鼻酸。

她顺着自己奇怪的思路说下去："这些天……我常望着那里开走的船，就有一种……预感。好像有一天我也会到对岸码头去……买一张船票。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寂静。只有江水在不息喧响。夜和江风把我们紧紧裹挟着。两颗距离很近的心在以同样节拍突突跳动。短短一瞬间，我沿着流年逝波的曲线，游历了冬日的退却和春天的起始，长夜的消融和曙色的上升，越过几百海里的波涛，穿过层层叠叠的山岳，直抵那极目不及的天地吻合之处……奔腾灼热的血潮把我煮沸，种

种突如其来的信息如此杂沓纷纭，像汀线前闪闪发亮的浪头不断崩塌下来，远远超出了人所能及的思考限度，我感到嗓子眼发干，喉咙像粘到一起了。

"暮珍！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咱们一起回去！""回——？""回海南！"流水摇碎了两岸灯火，漾起红色、绿色、金色的泡沫，冲刷着江堤下的泄水洞，发出空谷回声一般的音响，好似辽远的不可抗辩的庄严召唤。……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我终于大彻大悟——当一个人把自己与挚爱的东西紧紧连在一起时，他的生命才呈现出全部价值，他的性格才迸发出全部光彩。

船驶向南方的岸……景物依然，恍如十三年前的同一时刻。是的，一切都未曾了结。当我登上这艘海轮，已逝的青春立时回来了。命运之神把无数耀眼的白昼和深沉的黑夜还给了我，把年复一年挥洒的每滴血每滴汗重新注入我的血管与毛孔。整整一辈人的动静疾徐、生死歌哭全都在冬日沉酣的梦中复活，跟历史一同斗转星移，尽情呐喊着，成为新时序的主调的和声。

作者孔捷生试图用道德标准来衡量知青运动，他说："我们老知青在那个非常年代里仍然做出了贡献，用刀斧和锄头这些原始工具使千年荒山变成了胶园，一辈人的青春化为汗水滴在祖国大地。怎能因为我们的些微奉献远抵不上十年浩劫的空前损失，便觉得毫无价值呢？"这种以主观精神取代客观事实的泛道德主义，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

一些知青批评这部小说的结尾脱离现实，结尾太浪漫，太理想化，破坏了小说的完整。孔捷生反驳说："任何民族，她的青年一代缺了理想，缺了志气，便将要衰败灭亡。我真希望中国的青年变得更浪漫一些，与那种市侩式的'现实'离得远一些……"他坚持认为知青重返农村将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此时富庶的广东农村已经开始城市化，社办工业和小城镇出现的事实本身，就足以颠覆《南方的岸》所描绘的乡土社会蓝图。孔捷生1981年春节，回到家乡珠江三角洲，看到时髦的男女、电视机和两三层的洋楼；大队开会没提半句植物与动物，只是公布队办工业的财务情况。乡村发生的一切都使孔捷生感到惶惑。[23]旧的思想方法，旧的理念竟然使他看不到现

实,而在《南方的岸》中,继续修复旧的价值体系。

"返乡"可以说是"乡恋文学"的极致。在这一时期,描写知青"返乡"的作品,还有郑万隆的长篇小说《同龄人》,小说讲述女青年孟珊珊不愿同丈夫出国,带着叹息和沮丧从插队的边疆山村回到城市,她从父辈和同辈的生活强者身上受到教育,吸取力量,她终于认识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自我归宿中,而在振兴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事业里!"她感到自己的心灵"在山那边"才是充实的。于是又毅然回到山村。电影《我们的田野》(北影厂,编剧:晓剑,导演:谢飞),影片中的男主角在大学毕业后,毅然重返北大荒,影片中出现美丽的白桦林和广阔的原野,童声合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这种催人泪下的场景,唤醒了知青对于青春的记忆、逝去的理想,再次给予他们一种梦幻般的抚慰。[24]

有评论家指出:"这些为理想主义所哺育的,或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文化资源的青年理想主义者,除了格瓦拉式的冲动外,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即便回到农村又会怎样。""对乡野的怀恋只是他们的一种精神需要而不是现实需要;对他们来说,乡野生活是可向往的而不是可到达的,是可欣赏的而不是可经验的。对乡村的怀念使他们有一种情感的完整,而对城市固守则保证了他们生活的完整。""知青一代作家当时的处境,考虑到他们已经告别了旧的东西,但又没有确证的东西可供依附。"[25]

后知青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破产了。在旧船沉没之后,所有的水手在风浪中渴望的是一只新船,一个新的彼岸,如果没有,他们就会在痛苦中幻想出"南方的岸",甚至愿意重新登上带来灾难的旧船、躲入旧港湾。但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整个中国包括海南,都开始了改革的浪潮,旧生活已经一去不返。

3.乡恋诗歌

就在一些知青小说家们试图借助乡村资源,重新修复旧价值观念时,一些知青诗人丢弃了宏大叙述手法,把乡恋变成了个人的事务。这是一种全新的叙述立场——私人立场。

在这些怀念乡村的诗作中,知青诗人们记述了他们对父老乡亲的思

念,从表现上看这些诗歌,依然在歌颂人民、土地,但是已经转向个人的情感记忆。他们所说的人民、土地,是属于个人的人民、土地。因为他们使用个性语言来表达个人的情感,摆脱了外因(权力)的介入,人民、土地和国家一类抽象的概念,真正成为个体生命的组成部分。这种本质性的转变,使这些诗歌具有了新时代的气息。[26]

梅绍静,生于1948年,1967年北大附中高中毕业。1968年到延安插队。出版过诗集《兰珍子》(1975年)、《唢呐声声》(1983年)、《她就是那个梅》(1986年)、《女娲的天空》(1990年),现在《诗刊》社工作。

《她就是那个梅》 梅绍静 1984。

……

不是你把我从大路上唤回你窑里来的吗?
不是你给了我第一阵哭声?

能哭出声来的孩子才能活下去,
那一天,我也叫你家的公鸡嘴对过嘴?

也许只有我一个人吧,在这个世界上,
想起那天就觉着羞愧!

你拉着我的手一股劲叫唤梅啊,
你慌乱中的呼唤又催出我多少眼泪?

可是那天以后,我好好地活下来了,
像颗野果子,我也包着兜着活着的滋味!

啊,母亲!我长在这儿多像马茹子啊,
显眉显眼的,可也叫你放心!

什么时候起,外乡人问我是谁,
你就在那人面前说:"她是我的梅!"

什么时候起,你在草窠里寻着几颗野鸽子蛋,
在洼洼上撸着一把杜梨儿。

也这么叫着我:"来!我的梅!"
我想不起来了啊,唤梅的母亲!

我总是看见一个学生女子走在那沟沟底,
她就是那个在你怀里哭过的梅啊,母亲!

这首诗记载了乡村母亲对知青的真挚情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母子爱,表达了个人心灵深处的情感秘密。母亲对梅的爱,使农民、土地变成梅的农民、土地,这种情感是属于他们(母与子、农民与知青)的私人财富。

叶延滨:男,1948年生。1969年赴延安李渠公社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文学系编辑专业。现为《诗刊》社副主编。

《干妈》(组诗节选)　叶延滨 1980年

她没有自己的名字

她没有死
她就站在我的身后,
笑着,张开豁了牙的嘴巴。

我不敢转过脸去,
那只是冰冷的墙上的一张照片

她会合上干瘪的嘴,
我会流下苦涩的泪。

十年前，我冲着这豁牙的嘴，
喊过：干妈……

叶延滨为他的干妈和大娘写了一系列的诗，《灯——一颗燃烧的心》讲述裹着小脚的大娘冒着风雪跑了三十里山路，为知青娃买一盏新罩子灯，好让他在夜晚读书；《我愧对她头上的白发》讲述那个四十年前曾演过"兄妹开荒"，"挖掉了穷根根眉梢梢笑"的新媳妇，却在共和国的年代"没牙的嘴啃着掺糠的窝窝，佝偻的腰背着沉重的柴草，贫困——熬尽了她生命的最后一滴血，枯了，像一根草……"。诗中出现的是具体的生命和情感。

农民对知青的善良、慈爱，在诗人心中唤醒了崇高的人性情感，他们因为这种普遍的人类之爱，而获得对人生的领悟。诗人对人性的发现，是一种全新的发现。在国家、阶级淡出的同时，人性、博爱的概念开始进入诗歌写作。

由于"文革"民间诗歌写作传统的介入，这一时期的知青诗歌创作取得了明显高于知青小说的成绩。在"乡恋"题材上，"乡恋诗歌"同样取得了超过"乡恋小说"的成就。乡恋诗歌的个人化表述，已经包含着对新价值体系的发现和建设。

七、"文革""地下文学"的公开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批在文革中写作的"地下文学"和具有沙龙背景的小说，先后在有影响的杂志上公开发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批评。

这一时期，沙龙现代诗歌也浮出水面，"朦胧诗"作为一种民间的话语，正式进入主流社会，对诗歌界和社会造成巨大震动。围绕"朦胧诗"的论战，扩大了新诗歌的影响。沙龙诗歌最终被接纳进主流话语，被写入文学教科书，在那里占据了一页位置。

未被主流社会承认的那些具有叛逆精神的"地下文学"的作品，在20

世纪80年代仍然处于"民间"状态。在新时期,这些未被主流社会接受的沙龙诗人们是寂寞的,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甚至比"文革"时代还要孤独、寂寞和孤立无援。

1. 沙龙诗歌的公开化和被主流化

(1)有关"朦胧诗"的论争

《今天》杂志创刊后,北岛、芒克、舒婷和食指的诗作,开始在大学校园、文艺圈和青年工人中间流传。随着1979年文艺界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江河、舒婷等人的诗歌首先在《诗刊》等正式刊物公开发表,引起了社会的注意。

1980年《福建文学》开辟"新诗发展问题讨论"专栏,对舒婷诗作展开争鸣。4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代表们就青年诗作与西方诗"不期而遇"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光明日报》5月7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谢冕),介绍新诗歌的挑战。《诗刊》第8期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朦胧诗"由此得名,诗界的争论被引向全社会。其后《作品》、《文汇报》、《星火》、《诗探索》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981年学术讨论会,相继就"朦胧诗"展开广泛争论。

1981年《诗刊》第3期,发表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认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美学原则的崛起。……崛起的青年对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的姿态。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的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

评论家程代熙、洁泯、敏泽、李元洛和诗人周良沛等人,纷纷撰文与孙绍振论争,批评这种"美学原则",具有唯心主义色彩,是一种脱离人民和时代的"自我扩张与自我欣赏"。[27]

围绕着沙龙现代诗歌的这场激烈论战,无论是在现代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是相当表层的。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许者,对新诗歌的形成和时代精神,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显然,80年代的主流社会还没有能力

接纳"文革"时代产生的这笔"地下文学"遗产。[28]

新诗歌的本质是对"文革"话语的颠覆,对"人民"、"时代"、"小我和大我"等一系列基本语汇的颠覆。在这场有关"朦胧诗"的论战中,赞成与反对的人都没有意识到,新诗歌不仅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而且是建立在知青亚社会基础上的新文化。新诗人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他们是一个新社会的代言人。

舒婷的成名作是《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这首爱国主义颂歌,掩盖了她的叛逆性格,舒婷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形象,受到了评论界的赞誉。同样主流社会是通过《回答》来认识北岛的,把他视为年轻一代反抗"四人帮"的代表。主流社会通过这两首诗来理解这两位诗人,并决定接纳他(她)们。这两首诗,无论从诗歌的艺术形式上讲,还是从思想深度上讲,都不能代表他(她)们两个人的最高水平,甚至曲解了诗人的思想和艺术的本质。主流社会所接受的北岛、舒婷,是传统意义上的诗人。主流社会对新诗歌传达的新文化人格和思想特质视而不见。这是主流文化对他(她)们有意的忽略和曲解。

(2)现代诗歌的胜利与危机

在20世纪80年代初,沙龙诗歌迎来了收获季节,一些沙龙诗人获得了崇高的荣誉。诗歌界承认并接受了"文革"沙龙现代诗的遗产。现代诗风影响了一代青年人,许多新诗都带着沙龙诗歌的印记。现代诗歌开始取代政治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流。

诗歌进入了多元化的、个人的语言创造时期,表达具有现代人情感的丰富世界。尽管现代诗歌受大众欢迎的程度,在80年代远远不及小说、戏剧,但是现代诗歌的成就,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成就上都远远超过了这一时期的小说、戏剧。

在"朦胧"的命名下,人们当时最为关注的是带有"朦胧"色彩的诗歌,"朦胧"成为人们心目中新诗歌的典型形式。在这些朦胧诗中,仍然带有童话诗的痕迹。

沿着鸽子的哨音/我寻找着你/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小路

上/ 一颗迷途的蒲公英/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我找到了你/那深不可测的眼睛

——《迷途》　北岛

你在梦中呼唤我呼唤我/孩子你是要我和你一起到公园去/我守候你从滑梯一次次摔下/一次次摔下你一次次长高/如果有一天你梦中不再呼唤妈妈/而呼唤一个陌生的年轻的名字/那是妈妈的期待/妈妈的期待是惊喜和忧伤

——《梦话》　傅天琳

即使是对“文革”的控诉,也不再作为民族、社会的代言人,而是使用个人的语言,表述个人的情感。如果说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1979年)还有集体主义和政治理念的痕迹,到了《雪白的墙》(1980年)则几乎完全转为个人表述。

……
永远地不会在这墙上乱画,
不会的,
像妈妈一样温和的晴空啊,
你听到了吗?

妈妈,
我看见了雪白的墙。

——《雪白的墙》　梁小斌

《会唱歌的鸢尾花》(舒婷 1981年)是80年代中国诗歌的重要成就之一。诗中回荡着童话诗的余韵。

现在我可以做梦吗/雪地。大森林、古老的风铃和斜塔/我可以要一株真正的圣诞树吗/上面挂满/溜冰鞋、神笛和童话/焰火、喷泉般炫耀的欢乐/我可以大笑着在街上奔跑吗

它所包含的细腻情感，正是现代的、历史的和经典的，带着阿赫玛托娃的细腻。

在你的胸前/我已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你的呼吸的轻风吹响我/在一片丁当响的月光下

我们可以从中听到沙龙现代诗歌鲜明的、标志性的语言：

向/将要做出最高裁决的天空/我扬起脸/风啊，你可以把我带去/但我还有为自己的心/承认不当幸福者的权利，我还是你的不会做算术的笨姑娘/无论时代的交响怎样立刻卷去我的呼应/你仍然能认出我那独一无二的声音

在这童话般的梦境中，会突然地出现哀伤的句子："如果子弹飞来/就先把我打中"，它们体现着"地下诗歌"的风格：

到那时候，心爱的人
你不要悲伤
虽然再没有人
　　扬起浅色衣裙
　　穿过蝉声如雨的小巷
　　来敲你的彩镶玻璃窗
虽然再没有淘气的手
　　把闹钟拨响

诗人在诗行中留下了真正战斗者的标志——丰富的心灵，以证明她是为了人，为了自由而斗争，而不是为了"主义"，或是为了诗人的桂冠。它使我们窥见了现代文明殿宇的美丽、庄严。如果说朦胧诗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不如说是新人的崛起。

就在许多人对改革欢欣鼓舞，为时代唱赞歌时，却仍然有人感到窒

息。对生活的这种感受的差异,正传达着一种民间的立场。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把头转向身后
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那棵昂着头
怒视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
它的头几乎已把太阳遮住
它的头即使是在太阳被遮住的时候
也依然在闪耀着光芒

走近它
走近它你便会发现
它脚下的泥土
每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攥出血来

——《阳光中的向日葵》　芒克 1985 年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知青正在分化为不同的文化群体。因为新诗歌是一种异质的文化,要理解沙龙诗人,需要有相同的话语背景。由于长期接受主流话语的熏陶,阅读沙龙诗歌对于广大知青来讲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在知青作家群体内部,也出现了诗人与小说家的隔膜。就在舒婷写出"大道扭动触手高声叫嚷:不能通过/泉水纵横的土地却把路标交给了花"(《会唱歌的鸢尾花》)的诗句,指出时代的路标并不在大路上,而要在田野中寻找时,一些知青小说家还在沿着主流社会的理念寻找价值的彼

岸。

在新时期的条件下，知青一代内部的话语阻隔，不仅没有削减，反而在继续加深。在一部分人与别一部分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条价值观、思维方法和语言表述上的鸿沟。知青群体并没有理解和接受，“文革”时代由小部分知青创造出来的民间话语传统。

广大的知青，甚至包括大多数的知青作家在80年代的思想发展，是沿着社会主流理念的发展渠道，随着时代变革的步伐，一步步完成思想迁移的。在90年代，他们才跋涉到沙龙文学的思想认识高度，其间经过了十年的路程。

在“文革”10年中成长起来的晚生代，对“朦胧诗人”既缺乏理解，也缺少敬意。他们迅速掀起“第三诗潮”，并且喊出“Pass 北岛、舒婷”的声音。舒婷在1987年列举了在1986年已经出现的各种诗歌流派，“包括目前尚处于潜流的诸多流派；以四川为重心出现的非非主义、整体主义和莽汉主义等，还有南京韩东、付立的感觉诗派、上海宋琳等人的现代都市派、黑龙江朱凌波、浙江詹子林等人的体验派，等等。他们之中有些人声称：‘已完成了自己的坐标系，完成了对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舒婷说：“去年提出的‘北岛、舒婷的时代已经 Pass！’还算比较温和，今年开始就不客气地亮出了手术刀。”这是一次可悲的文脉断裂。[29]

1987年爆发的“后朦胧”对“朦胧”的桂冠之争，带有强烈的定尊卑，分亲疏的意识，晚生代与新生代的首次代际冲突，竟然是一次争夺名位的冲突。后者中的某些人着迷于朦胧诗人的荣誉，他们要的不是受难的荣耀，而是荣耀本身。生长于“文革”时代的某些晚生代诗人，没有能摆脱封建权本位、知识本位的影响。

“第三诗潮”迅速涌起，宣言书和理论体系是完整的，行动路线是明确的，意志是坚定的，没有迷茫、犹豫，也没有受难。在朦胧诗为代表的现代诗歌向主流诗歌胜利进军时，轻易的胜利已经为全面退潮埋下了伏笔。现代诗歌的胜利，是以民间传统的丧失为代价的。后朦胧得到了沙龙诗歌的旗帜和口号，却遗弃了它的精神。

2. 对沙龙小说的争论与批评

"文革"结束后,一些沙龙小说逐渐公开发表,引来了一系列争议和尖锐批评。

《波动》(北岛)在1982年发表后,引来了各方面的批评。《文艺报》1982年第4期发表易言的《评〈波动〉及其他》,认为《波动》、《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等小说的发表,使"革命现实主义遇到了某种挑战;文学创作出现了分化,非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思潮已经有端倪可寻了……一种以存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学流派,已经在社会上(主要是青年中)的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

有些人认为:对《波动》等小说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对自由主义和自由化进行抵制和斗争,它就有泛滥的危险,同时也会给那些坚持"左倾的人以粗暴干涉的借口"。[30]

《公开的情书》(靳凡)在1980年公开发表时,获得一片好评,但也有一些尖锐的批评。有人指出:小说在激情和诗意后面,潜伏着两个比较突出的弱点,一是老久和老嘎颇有一点以精神领袖自居的味道,流露了某种"救世主"式的狂傲和庸人的气质;二是这些有思想、有作为的青年,大都有藐视他人、脱离群众的倾向。小说呼喊着:青年们"向前走啊,向前走就有路!"但是,通向未来的路是什么?怎么走?小说中并没有答案。[31]

《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在1981年发表后,在青年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由于小说中的宗教内容,引起广泛争议。《光明日报》、《青年文学》等报刊发表文章,对小说的主题及思想倾向进行讨论。王若水在1983年和1985年前后两次著文,批评《晚霞消失的时候》。王若水批评南珊及其宗教哲学,企图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的道德尺子来衡量历史,把一切战争都视为野蛮而加以谴责;将"心灵"和"头脑"对立起来,将"人类"和"立说者"对立起来;以"退缩到她个人的小天地中去,独善其身,离开了社会斗争而去寻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实行禁欲主义,从人道走向神道。[32]

小说作者在《谈谈南珊》中辩解说:"实际上这个小说就是以出身问题为基本题材而写出来的,…… 忽略了这个问题,许多故事情节和人物命

运是很难说清的。""这部小说也可以看做是一部一位老红卫兵的忏悔录。"[33]

由于多数批评者与作者在思想立场上无法达成共识，又不肯承认文化多元的合理性，硬要搞思想一统化，从而使这场批评成为一场政治批判。许多批评者对小说的民间背景缺乏了解，忽视作品产生的历史环境，批评主观武断，流于表面。

地下文学的价值并不仅在于思想理念的突破，而且在于文学背后所具有的一种生命实践。小说所传达的思想，是通过血泪教训获取的生命知识，而不是来自某种西方理念。它们本该受到人们应有的尊敬，遭到的却是冷漠、粗暴的态度。

沙龙小说虽然形成了一阵波澜，但是没有对主流文学的堤坝造成具有威胁性的冲击，就迅速地消失了。

注 释：

[1]《文艺报》1985年举行的一次关于文革题材的讨论会上，戴继新第一次提出"老三届作家群"的概念。在《文艺报》办的内部刊物《文艺情况》登出后，引起一些非议。戴继新著文说："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已持续出现过三次高潮。每一次浪潮都曾产生过史诗性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同样，反映'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代作家所能彻底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除活跃在文坛上的中年作家外，还将必然落到'老三届'作家群和今天处于20岁上下的青年人身上。……'老三届'作家群有三大特点。其一是能独立思考，其二是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历史责任感，追求民主和科学；其三是实干，凡事绝不停留于口头上，有坚定的奋斗目标。'老三届'中涌现出的作家群，是历史形成的。他们中间酝酿产生出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作品，是历史的必然。"（戴继新：《血污和泥淖中站起来的一代》《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孟繁华：《1978——激情的岁月》（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山东

教育出版社 1998.5。
[3]王蒙:《我在寻找什么》《文艺报》1980 年 10 期。
[4]孟繁华:《1978——激情的岁月》(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5。
[5]冯牧在 1984 年出版的《知青小说选》序中说:"收集在这部书中的近二十位作者所创作的二十几篇佳作,内容和风格各不相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充满着作者从不同侧面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浓烈的生活气息。这本书,像镜子似地反映了一代青少年的面貌、性格和心灵,反映了他们是怎样在那个时代的滚滚洪流当中沉浮,挣扎奋斗和拼搏,而终于成熟起来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6]坷垃:《在道德失禁中作秀——梁晓声批判》《十作家批判》陕西作家出版社 1999.11。
[7] 孟悦:《历史与叙述》　陕西教育出版社 1991。
[8] 叶辛:《蹉跎岁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6 一版。
[9]参见《桑那高地的太阳》。知青主人公谢平的两个恋人,都是农民;女知青齐景芳是一个山东回乡青年,代表支边群体;桂荣是场长侄女,代表着边疆的土地。谢平与齐景芳在草垛上发生了性关系后,就被拖拉机碾死了。她们代表着纯洁的乡恋、开垦的土地,她们都甘愿奉献和牺牲。(《桑那高地的太阳》陆天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10)。
[10]《新时期文学六年 1976.10—1982.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1。
[11]《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3.6。
[12]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 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1。
[13] 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5。
[14]同[13]。
[15]同[13]。
[16]李书磊:《都市的迁徙》《1985——延伸与转折》　山东教育

出版社 1998.5。

根据中央电视台(2001.8.14)报道,国家计划在未来二十年,平均每年新增加20个城市,通过县改市等办法,每年增加城市人口1200万人。同日新闻报道,北京市的垃圾正以每年2.6%的速度递增。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高速城市化的历史时期。据专家预测,未来二十年中国城市将从目前的30%发展到70%。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6.3亿左右,城市化将达45%。(《已见端倪的我国城市化浪潮》《中国青年研究》2000年2期)

2001年是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之年,大中小城镇不同程度的开放。政府宣布从10月1日起,2万小城镇的户籍全部开放,只要在小城镇有固定住所,合法收入的外来人口均可办理小城镇户口。中等城市宁波,取消对落户指标限制,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实行用工登记制度,取代"临时居住证"。

40余年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户口藩篱被打破,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将会逐步形成。此刻再来看"城乡分治"的历史悲剧,自然会产生一种新的历史眼光。

[17]蒋子龙:《从兵团到文坛》《不惑文谈》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

[18]梁晓声:《我看知青》《北京文学》(中国知青专号)1998.6。

[19]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5年。

[20]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5。

[21]《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3.6。
王安忆:《两个69届初中生的对话》《上海文学》1988年3期。

[22]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5。

[23]孔捷生:《旧梦和新岸——并非谈创作的创作谈》《南方的岸》后记 北京出版社 1983.2。

[24]费声:《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　成都出版社 1993.10。

反映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坚持扎根乡村的知青小说,还有短篇小说《塔》(张抗抗)、《达紫香悄悄的开了》(陆星儿)。(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2)

[25]李书磊:《"达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文化测量》《文学自由谈》1989 年 3 期。

[26]《北京文学》(中国知青专号)1998 年 6 期。

梅绍静:《她就是那个梅》　作家出版社 1986.8。

[27]程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 年 4 期　洁泯:《读"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后》《诗刊》1981 年 6 期　周良沛:《有感"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文艺报》1981 年 10 期 贺敬之:《李季文集》序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版。

[28]李东:《朦胧诗潮与"第三诗潮"》《中国 80 年代人文思潮》(曹维劲、魏承思主编)　学林出版社 1992.9。

[29]同[28]。

[30]《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1。

[31]同[30]对《公开的情书》的讨论和批评,既有粗暴的指责,也有比较客观的批评。

[32]王若水谈《晚霞消失的时候》先后发表于《文汇报》1983.9.27—28 , 1985.6.24。

[33]礼平:《谈谈南珊》《文汇报》1985.6.24。

第十章

新时期后期的知青文学
(1985—1989)

一、新时期后期知青文学的历史背景

1. 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

1978—1987年,"改革开放"由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对外开放也由点到面,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展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986年6月,邓小平听取汇报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随后,他指示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工,权力要下放,精简机构。不能照搬西方,不能搞自由化。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

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设想和初步启动,向权力话语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也为文化变革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宽松环境。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文化被大量介绍、引进国内,各门类的学术理论开始全面建设,并且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文化思想日渐活跃。文化丛书派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介绍西方学术著作,第一批翻译书目的109种中,绝大多数为德、奥非理性主义,以及西方左派作品,其中包括:梅洛—庞

蒂、利科、傅科、德里达、荣格、韦伯、曼海姆、加缪、马斯洛等的作品。这些西方思想家的作品被完整系统地翻译成中文,数量之多,品种之全,是空前的。1987年丛书编委会又出版了"人文研究丛书"。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其中包含若干子系列,如《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绝大多数的译著为1949年以来首次出版,作品包括:胡塞尔、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马里坦、萨特·德·波伏娃等。1988年理论思想界还出版了一系列国内社科著作,其中包括《拯救与逍遥》(刘小枫)等有影响的著作。[2]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掀起的"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中,人们在文化中去寻求历史的答案,许多人认为现代化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现代化。文化丛书的主编甘阳首先提出:东西文化冲突,不是"中西冲突",而是"古今冲突";东西差异,不是空间差异,是时间差异。此后,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开始被广泛接受。

经济高速度发展,政治体制改革造成的宽松文化环境,文化思想界的学术建设,以及文化大讨论,都推动着艺术迅速发展。随着个人意识的增强,美学形态也开始发生变化。

现代绘画开始全面兴起,出现全国性的现代美术浪潮,一批现代绘画民间组织在各地出现。1984年9月"北方艺术群体"在哈尔滨组建。1985年10月,江苏举办《大型现代艺术展》展出超现实主义作品。1987年5月"红色旅"成员举办的《第一驿》展览在南京艺术学院开展。这其间活跃的民间社团还有:江苏新野性画派、徐州现代艺术展、厦门达达、湖南0艺术集团等;画家群体及流派之多,作品样式和内容之广泛,达到五色令人目盲的地步。1989年2月,《中国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出了来自各地的800件现代作品。短短几年,中国现代美术走完了西方美术几十年的道路。先锋美术与意识形态产生了尖锐冲突。[3]

1985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泛滥",王若望等人多次在公开场合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1986年28个大中城市的高校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民主,反对腐败,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1987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先后把在党内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至此学潮逐渐平息。[4]

2."权力—知识分子"话语的变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为意识形态变革提出了新任务和新目标。

权力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全面回归，促使话语沿革的内在动力已经消解，如何重新启动话语变革，将这种变革引向什么方向，成为当时意识形态的焦点。在这一时期，文学界出现了"寻根文学"，社科界出现了"中西比较风"，形成了一左一右的同步发展。

文化变革的诉求通过两种路径，形成了两种文化方向。社科界侧重政治体制变革的实际操作，其文体是研讨和舆论宣传，意识形态上倾向激进。文学界侧重民族文化重建，其文体是文学思考与小说叙述，意识形态上趋向保守。

文学界采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和表述方式，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幽深文化意境；理论界采用逻辑性的思辨语言，从西方文明中寻找思想营养，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这一切为90年代社科、文学两界分途埋下了伏笔。

"改革文学"曾在批判"四人帮"、"凡是派"，推进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在其历史任务终结后，开始逐步模式化，年度"优秀小说评奖"活动也失去了号召力。

进入80年代后期，文学思想主题和形式开始发生重要的流变，出现了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种文学思潮，出现了"寻根"派、"先锋派"、"新写实"、"新历史"、"新体验"、新潮小说、后新潮小说。在文艺批评界出现了文艺社会学，文艺哲学，文艺心理学，文艺文本学和文艺文化学。随着港台文学的引进出版，俗文学与雅文学、港台文学与大陆文学也开始并存共荣。

80年代后期文学多元化发展，是在体制内展开的，并没有超出主流意识形态，所谓多元不过是主流话语的分化、扩张，只是旧主流话语向后新时期的新型主流话语的一个过渡阶段，它为90年代新型主流话语("权力—商业")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权力—知识分子"话语变革阻滞的原因,在于话语的两个主体之间产生矛盾,从而使话语转型难以实现。如果说,话语的多主体性在新时期之初,推动了意识形态的沿革,到了新时期后期,它反过来又制约意识形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3. 知青文学多元化的发展

在主流话语势衰的形势下,在政治变革的氛围推动、裹挟下,知青文学开始走向多元化、泛题材化。评论家张奥列在1985年指出:"作品的内涵超越自身题材,这是知青文学的新趋向。上山下乡运动,是个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历史现象;知青题材,大概不会是文学创作的永恒题材。但它的内容可以不断拓展,主题可以继续深化。"

知青文学开始寻求建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话语表述,先后开创和推动"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发展。

"寻根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小说,带有建构民族文化的宏大理想,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潮流。知青文学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代表作品有阿城的"三王系列",上山下乡在阿城的小说中,只是一种文化表述的背景。"寻根文学"的建立,表现出了知青作家的勃勃雄心和文化历史责任感。

"悲壮的青春"叙事在80年代后期,由中、短篇小说发展为长篇小说,开始形成一种宏大叙事的结构,并在主流话语中正式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权力—知识分子"转型的背景下,"权力—知青"话语开始发生流变,在"第二种忠诚"的思想主题中,注入了政治功利主义的内容。

民间写作的传统,在这一时期继续顽强地发展,出现了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一些评论家针对"伪现实主义",称它们是"真现实主义"。

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知青文学开始转向对后知青生活的描述,一些黑色写实小说试图把日常生活直接呈现出来。随着理想主义价值观的消解,生活开始被还原为生存本身,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对于解构一元化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它也为90年代的价值虚无主义、生存主义的文

学埋下了伏笔。

80年代后期的经济大潮、社会转型,严重影响了民间写作的发展,在缺乏知识分子群体理解和支持的环境下,民间写作开始了漫长的冬季,进入休眠状态。当90年代的知识界在失语后,重新探寻和发掘民间写作传统时,民间写作才重新受到重视。

二、"寻根文学"中的知青小说

"寻根文学"在1983年兴起,到1984—1985年蔚然成风。许多知青作家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他们积极踊跃地投身于"寻根文学"创作。从郑万隆表达寻根理念的《黄烟》、《空山》、《野店》,到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以及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王安忆的《小鲍庄》,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还有杭育之提出的"吴越文化",贾平凹营造的"商州文化"等,知青作家参与创作了大量的"寻根文学"作品。

许多知青作家对"寻根文学"进行了充分的肯定。韩少功评价寻根文学说:这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郑万隆说:要"在原始文化中找到现代艺术的营养",从而揭示"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之谜"。[5]

寻根显然具有国际文化的背景,寻根文学中出现的神秘主义的描述(神话、巫术、传说),明显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有评论家指出:"这次寻根热的兴趣是为了与世界对话,反过来要与世界对话,则必须寻根。"可以说,"寻根文学"的浪潮,是对兴盛一时的西方文化思潮的直接回应。[6]

阿城在《文艺报》(1985,1,8)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阿城的

“文化断裂”说,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寻根”影响下,许多知青作家试图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阿城“三王系列”演示传统的圣贤境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阐扬传统文化的博大、神秘,韩少功、王安忆的作品阐述了传统文化构造的精妙。这些作品明显带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过分强调民族文化的恢复,而忽略了传统文化的批判,忽略了借鉴西方文明是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重要前提。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严重背离了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导致这一文学流派最终走向衰败。

1. 阿城:《棋王》(1984年)

在“寻根文学”中,阿城取得的文学成就最高,当时评论界认为“它的老辣纯熟的形式面貌,独到的艺术力度,以及内底里透露的作家自觉意识的深度和全面的眼光,都使文坛震动。”[7] 阿城的代表作“三王系列”(《棋王》、《树王》、《孩子王》),始终贯穿着对传统文明进行寻根、阐扬、弘大的主题思想。在阿城的眼中,乡村生活推动了知青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他在知青身上寄托了延续传统文明的希望。

《棋王》的主角王一生,本是一个寒窘无依的“棋呆子”,通过下棋沟通了生命与宇宙的联系,由此参禅入道。王一生身遭乱世,守心如一,洁身全性,是“道家生活哲学的具体形象化。”他全神全性,把人生提升到审美的境界。王一生的形象显示了千百年中国士大夫的生活理想和精神榜样,小说通过对民族人生观和心理素质的具体展现,传达出对民族文化的肯定。

作者在王一生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文化理想。小说围绕着王一生,设置了一些具有陪衬性的人物,主人公“使一切染上世俗色彩的人物和行为都黯然失色。譬如脚卵,由于丧失了起码的精神依附,虽然可爱,但在王一生面前,也是极可怜的。”[8]

小说以“我”为叙述线索,从客观视角描述了知青群体生活场景,同时讲述了王一生的个人传奇。在故事的前部,王一生的行动还是融合于知青群体之中,个人与群体线索齐头发展,但是故事发展到高潮——参加棋赛和车轮大战,作者转换了小说结构,把王一生上升为叙述中心,小说转变为

单一线索，从而造成了叙事结构的断裂。小说结尾时，王一生参禅悟道的单一线索，无法归拢前部所展示的多条线索，也无法涵盖知青群体形象的文化内涵。结尾神的诞生与叙述者代表知青群体的(荷锄野唱)顿悟，两者成为了互不关联的双重叙述。可以说，作者中途对王一生叙述的升格，是造成结构分裂的重要原因。

作者把王一生的“吃”和“下棋”即生道和心道，称之为圣贤境界，把这种生命的领悟归之于王一生个人的独悟，把王一生从知青群体中拔高出来，达到个人神化的地步。要说这种圣贤的形象，来源自于传统，不如说来自于“三突出”。“三突出”、“三陪衬”和“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不仅破坏了表述，而且撕裂了结构本身。

王一生悟道后，成为有别于知青群体之上的圣贤。一个圣贤诞生了，建立现代社会的希望也破灭了。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社会中不存在圣贤，只存在普通的公民。将一种至善的价值观念负载在一个人物身上，显然是一种陈旧的文化观念。

2. 孔捷生:《大林莽》(1985年)

在“寻根”的影响下，一些知青作家试图重新恢复人与大自然的传统关系，表达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解。极左意识形态的反自然、反日常性，在传统的“天人合一”关系上显露出来。

孔捷生在《大林莽》中，揭示了“文革”时代人与大自然的敌对关系，他试图通过这种对立关系，展示出知青一代“革命理想主义”的荒诞性。

《大林莽》讲述，海南某农场要在大山坳的风口处，夷平山林，种植橡胶。农场派遣几个知青进入森林进行勘察。在恶浊瘴气的林莽里，迷路的知青们举行了性命攸关的“遵义会议”，一方要悬崖勒马，为生存而斗争，一方仍执迷不悟，坚持继续勘察。谢晴在走上绝路时，还“坚信自己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一定能顺利抵达光荣的彼岸”。作者通过简和平发出这样的质询：“既然行动本身已没有意义，你不认为拯救人的生命是高于一切的目的?”人究竟是什么，是目标还是手段? 在战友生命垂危时，谢晴由狂热变冷静，恢复了人的感情，在临近死亡时思想有所觉醒。

有评论家当时指出:小说中神秘的林莽,具有象征意味。阴森、恶浊的森林"既是自然形态,更是人格化的社会形态。""他们那愚昧的意识,荒唐的行为,可悲的结局,恰是错误年代的社会产物。扭曲的林木,如梦如幻的景致,正是时代的病态,社会畸变的隐喻。""《大林莽》可以说是一个大寓言。"[9]

《大林莽》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十分相似,也书写了知青与自然的斗争与牺牲。但是,《大林莽》却揭开了知青运动内在的荒谬性。"梁晓声笔下的裴晓云,在暴风雪中没有生与死的念头,她安然地、含笑地、满足地离开人间。《大林莽》中,邱霆之死,则罪有应得,破坏大自然者,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谢晴、简和平等人不甘心灵魂的毁灭,不轻易付出弱小的躯体,他们为生存而抗争。作者不是片面地表现人为征服自然而献身,而是渴望着人与自然像音乐般和谐一致。"在梁晓声的小说中知青的牺牲还染上悲壮和崇高的色彩,在孔捷生的小说中则带有戏谑,小说越严肃地表现愚蠢的虔诚,也就愈见其荒谬性。[10]

20世纪80年代初,人道主义的讨论,明显影响到这篇小说。小说明确提出人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孔捷生将人道主义引人"寻根文学",对"悲壮青春"的主题进行批判和超越,在当时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有人指出: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主义走向了没落。"神性的镶饰与尊严的虚伪为我们带来的仅仅是虚荣的满足和无知的欺骗,怀疑并抛弃它们,回到真实的自我,不正是文学的幸运吗?"[11]

三、"改革文学"中的知青小说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文学"开始退潮,由于退潮过快,"改革文学"作品产出的高峰恰与退潮的低谷同时出现。因为"改革文学"形成既定模式,要求创造者技艺更精良,在相对狭小的创造空间中,整体技艺普遍提高。"改革文学"的高水平作品,基本出现在后期,但是影响力却大大

减弱。

知青文学在80年代后期的"改革文学"中，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一些知青文学中，改革的主题与知青主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许多知青小说具有突出的"改革文学"的色彩，它们从知青生活的角度，表现复杂的社会矛盾，反映社会变革中的尖锐冲突。这类小说往往带有主题先行、庸俗社会学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因为触及时事而轰动一时，终因艺术形象的苍白而迅速衰落。

这一时期知青作家的"改革文学"，立场开始向体制外转移，向非组织化发展。它们表明了知青作家群体的文化主体意识的提高和文化自信心增强。应该指出知青作家的非体制状态，是由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条件促成的，缺乏自觉的、强烈的内在动力。这一切都为90年代知青文学的重新主流化、体制化，提供了可能性。

1. 柯云路:《新星》(1985年)

柯云路是著名的北京知青作家，曾创作《新星》、《夜与昼》、《衰与荣》、《孤岛》、《汾城逸闻》等多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星》是一部典型的"改革文学"，由于直接触及时事，倡导"清官"政治，迎合了一些群众盼望"清官"的思想，被改编拍成12集电视连续剧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1986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目。

《新星》讲述，前知青李向南当上县长后，老县长顾荣和地委书记郑达理成为他改革的对立面。顾荣的哥哥是省委书记顾恒、顾荣的侄女顾小莉又在县委宣传部挂名当副部长，顾小莉爱上了李向南，而李向南的旧日所爱、老同学林虹又是省委书记顾恒的前儿媳。这场改革中的路线斗争，带有宫廷政治的气味。经过充满了阴谋的政治斗争后，李向南也有了一双"肮脏的手"。小说作者试图在政治道德上，区别政客与政治家的差别。作者让李向南对县办主任、前知青康乐说："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既是肮脏的，也是最崇高的。问题是你搞的是什么政治！"

小说把主人公李向南描写成一个具有政治智慧的新型改革家、新型政治家。李向南曾插过队、上过大学，在三十二岁就登上了县一级的政治

舞台,展示出政治新人的光彩。李向南是一颗政治"新星"。

有评论家指出,《新星》提供了改革阶段的新鲜信息,具有一定的政治前瞻性。"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作者在发生于1982年的故事情节里,向我们预示也许还要在若干年之后才会形成的较为广泛的生活现象,即当年'老三届'的一代青年,历经坎坷之后,又经受严格的教育之后,成为国家县一级或更高一级的领导人。在我们党提出培养、提拔符合'四化'条件的干部之后,特别是提出培养第三梯队的口号之后,人们的眼睛已经转向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这篇小说"传达了有价值的社会信息,它告诉我们属于第三梯队的、中国新型政治家、改革家,具备了怎样的气质,怎样的知识结构、怎样的心理、感情。""它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写改革,着力写改革家作为新型政治家的侧面。它把我们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年轻化了,带有一种理想色彩,""这部作品的主人公的产生(1982年),比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人物,要稍稍提早了几年。也许,就这个意义来讲,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12]

评论家们所说的小说价值,当然不是艺术价值,而是它的社会学价值。《新星》实际上是一部政治畅销小说,作者表达的是一种政治诉求,表现的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政治。

小说主人公李向南的身上,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气味。李向南本身是一个有高层背景的干部子弟,搞的是贵族政治,走的是上层路线,显露出作者的价值观念中的权本位思想,具有新权威主义的色彩。同时,它对"老三届"应该及时接班的吁求,也带有小集团主义的狭隘倾向。这部小说试图通过文学,直接干预上层政治路线,文学观念明显受到"文革"文学(文艺为政治服务、"三突出"等)观念的影响。

2. 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1987年)

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是一部具有"改革文学"色彩的知青文学作品。小说在《当代》1986年4期发表后,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获得评论家的好评。

陆天明是著名的上海知青作家,曾两次上山下乡,在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生活了十二年。“文革”期间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大型话剧《扬帆万里》(1973 年)、《樟树泉》(1974 年)等,塑造了一批扎根边疆,投身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大全的知青形象。“文革”结束后,陆天明从为知青唱赞歌到悲悯他们的命运,经历了艰难的调整。《桑那高地的太阳》发表后,陆天明作为知青作家,再次受到广泛重视,有人认为北大荒有梁晓声、海南有孔捷生、新疆有陆天明。

当时的一些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对“中国当代社会态势的深深洞察”,暴露了社会中存在着极左思想和封建遗毒的阴影,通过桑那高地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一部分及至全体,揭示出“文革”发生的多方面(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历史、体制)的原因,对改革具有启示作用。[13]

现在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小说,可以发现小说更深层的思想内涵,以及它的历史局限性。小说明显接受了“归来者”小说的影响,但是却对“第二种忠诚”的主题进行了初步的解构。

小说描述街道团委干部、中队长谢平支边后,由于不了解场部的派别斗争,不肯俯首贴耳的表现出奴性,与政委、陈干事代表的官僚体制发生冲突。他的入党预备期满了,不能转正,被惩罚性地下到边远的骆驼圈。被冤屈的赵队长和分场长老爷子对其恨铁不成钢,像调教生驹子一样,来调教他,将他派到五号圈跟劳改犯“撅里乔”去放两年羊。撅里乔故意欺压、折磨谢平,这就是老爷子说的“调教”。赵队长教导他,“如果你今后还真的想为桑那高地,为中国做点事情的话,就得学会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当谢平表示怨愤时,赵队长痛苦地捂着胸口,颤栗地叫道:“你怎么到今天还不明白我们呢……”

政委下场视察,车被陷在路上,政委当场训斥老爷子。在战斗集体中养成的对上级的本能的尊重、服从使老爷子控制和战胜了自己,带头冲进泥塘,带 15 个人把 9 辆车抬过了 20 米长的水淹路段。谢平也参加了抬车,紧挨着老爷子,想让老头省点劲,从那以后谢平“深深地感到自己确实是个‘窝囊废’,多么会委屈,多么会叫苦,多么会撒娇,多么会冲动。真他妈的整个一只嫩羊羔娃”,从这一天起,谢平开始认同骆驼圈的生活准则,懂得了赵队长、老爷子的“第二种忠诚”。

十三年过去后,当谢平被改造成一个合格的“牧马人”,老爷子又认为他木讷、迟钝,没有使用价值,压下他回沪的调令,令他率领分流的部属,开

进荒原,而自己则带领一帮骨干亲信移居县城,甚至连自己的侄女,也不愿许配给他。

主人公谢平最大的痛苦,是得不到老爷子的信任和重用。他想喊:"十四年来,我听了你的,按你的调整,在骆驼圈子做了我应该做的和所能做的一切。现在你反倒先来嫌我没用。十四年来,我想用我的一切来证明我是你的'自己人'。我以为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你会原谅我,你已经容纳了我,不再计较我鲁莽、幼稚,单纯的以往所走过的弯路。我想我已经捐了一条虔诚的'门槛',但没想到首先是你……我的分场长,我的老爷子,我的父亲,这十四年来我在活人中惟一认可的长辈,却始终没忘了我的过去。……这就是我付出了十四年生命的代价后所应该得到的报应?!"

作者对老爷子的奴性进行了合理解释——无条件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于是奴性就转化成了美德;奴性人格变成了富于忍耐、勇于牺牲的伟大人格。其实,老爷子对上是当权者的奴隶,对下又是农工们的奴隶主。如果说政委、陈干事领导着封建王国,那么老爷子的"第二种忠诚"正是这座王国的基础。谢平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正是其蜕变为工具和奴隶的过程。

作者在小说结尾写出了谢平"第二种忠诚"的幻灭,他的恢复党籍、取消处分,不是由党委讨论决定的,而是由基层干部、群众努力争取,通过政治权谋的运作才得以成功的。这一情节隐伏着作者对组织的动摇、怀疑和一种深刻的失望情绪。

作者为谢平未来的生活设计了两条道路,在江南小镇(启龙镇)渡过宁静的余生,或是回上海再轰轰烈烈的干一番事业:前者是远离社会,甘心作一个无才补天的"废物",后者则是继"中队长"之后,再作一名共产党员,一个社会的成功者。这是一种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生活选择,代表了不同的生活价值体系。主人公一度在两种生活之间徘徊。

小说结尾,谢平终于得到了党委的决定:撤销处分和转为正式党员,上面"盖着鲜红鲜红的印章。像太阳。"清白的政治身份和党证,对谢平仍然重要。谢平还是体制内的人,他仍然要做体制内的人。谢平的理想虽然幻灭,却没有公然叛逆的勇气,他并不是桑那高地上的另类,只是体制内的觉醒者。

这部小说凝聚了作者对体制多年的认识,其中不乏尖锐、独到的见

解。作者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边地被改造的知青，又一次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作者指出在体制内，保持做人的尊严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小说赋予主人公谢平最突出的性格，就是不肯屈身做人。变得木讷的、愚忠的谢平，13 年中一直固守着自己的底线——做人的尊严。作者已经明确意识到体制与独立人格，是一种冰炭不能相容的关系。

在与体制之间的种种恩怨纠结之时，在组织的光环消失之后，"第二种忠诚"开始走上机会主义路线。作者让主人公在体制边沿上徘徊，甚至允许他有时犯规越界。（如小说中，谢平决心丢弃党票的瞬间思想闪念。）体制作为一种理念，在"归来者"的心中，已经不成为一种障碍。在政治功利的驱动下，越界现象将随时发生。

四、"悲壮的青春"——宏大叙事的形成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悲壮的青春"逐步发展形成一种宏大的叙事，它们由原来的中、短篇小说，发展成为长篇小说。在 1985 年后，出现了全景式的史诗性作品。叙事的内在结构、价值体系也逐渐完备。"悲壮的青春"叙事，在社会和知青群体中建立起稳固的话语统治地位。

在这些史诗性作品中，融合了"乡恋文学"的因素。但是"乡恋文学"中特有的痛苦和彷徨消失了，农村的苦难成为一种奉献式的受难，乡村生活开始成为一种神话，它们给宏伟叙事提供了舞台，两者开始合并成同一种宏大的叙述。

"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往往要表现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和"苦难崇拜"。张承志的草原系列小说，表现人民崇拜，大苦与大爱的结合。在梁晓声的小说中，也表达了对苦难的赞美，对群体和大我的热爱。这些内容虽然在早期知青文学中已经有所表现，但是宏大叙事中它们成为叙事的基本要素和特点。

1. 梁晓声:《雪城》(1988年)

《雪城》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后知青文学,它第一次完成了对知青返城后生活的全景描述。小说发表后,拥有大量的读者。《雪城》在20世纪90年代被拍成电视剧,造成了更广泛的影响。一般社会群众对知青返城后生活和思想状态的了解,主要通过《雪城》等影视剧作品。

如果说《今夜有暴风雪》是"悲壮青春"的边疆篇,那么《雪城》则是"悲壮青春"的城市篇。《雪城》无论在戏剧性情节、叙述策略和思想情感各方面,都像是《今夜有暴风雪》的续篇。如果说,以往知青们要征服的是荒原,那么现在他们要征服的是城市。

小说集中反映了,知青群体如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生存的位置,这一艰苦的求生过程,也正是价值体系崩溃与重建的过程,知青的革命理想主义,开始蜕变为生存斗争的装饰物。

《雪城》上集,描写东北某城市的20万知青在1979年底集体返城,长期待业,在饥饿线上挣扎。市里专为解决一批干部子女的就业问题,举办"师资培训班",市长夫人为干部子女内定了150个名额,对外却发1500份报名表作为幌子。当知青们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参与闹事的知青郭立强被无辜枪杀,最后引发了20万待业知青大游行。

小说展现了这一时期知青"悲壮的青春"。知青徐淑芳被继母逼出家门,被迫去当卸煤工,恳求背48公斤的木箱,因生活所迫曾想到自杀;还有知青豆芽菜的惨死等场景,这一切苦难、屈辱,构成一篇知青的城市血泪史。它引发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恨。这种群体性的、社会性的苦难由谁来负责,这青春的欠债向谁来讨还?这一切最终被归结到特权阶层压迫和阶级冲突。

在上集的结尾处,积蓄的愤怒爆发了。二十余万返城待业知青举行示威游行。公安局长带着数百名刑警队员组成双重散兵线,拦阻游行队伍。队伍逼进,双方对峙。

知青严晓东说:"开枪啊!拔出枪来开枪啊!""只要我一句

话，我们就会将你踏在我们脚下，将你的刑警队踏在我们脚下！”“我们并不想闹事！但如果拿枪吓唬我们，那是愚蠢的！我们不过要求城市关注我们的存在，指给我们一个起点！我们他妈的只要一个起点！有了一个起点我们会证明我们这一代人不是废品！……”刑警队的蓝色方阵连连后退。严晓东将警帽给老局长戴上：“您戴上吧！我们连您的警帽也不想踩坏！”“我们是累了，累极了，但我们这一代还没垮呢？市长同志，请您检阅吧！”严晓东说罢，朝后一甩湿漉漉的头发，转身高喊：“全体……立正！向后……转！正步……走！……”“防空洞发出震响，如城市的巨大心脏在搏动。”马路突然塌陷，“无数‘兵团服’跳了下去……”

一触即发的事件，在瞬间化解。强大的示威，更显出一代人的“第二种忠诚”。在这里作者再次显示出，他在《今夜有暴风雪》中使用过的巧妙叙述策略。在戏剧冲突的构置上，与《今夜有暴风雪》有着惊人的相似。

作者在本书中，再次游刃有余地施展他的叙事策略。市长夫人是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她一手制造了震动全市的“考卷事件”，而市长却被塑造成“正义”的化身。他而对威胁要对示威知青开枪的公安局长说：“当你开枪时，站在你枪口前的将是我！”作者任意转换叙述立场，从而导致小说的主题含混不清。

在小说下集，描写了知青返城七年后，在1986年不同知青的生活命运。生活在社会底层，受苦、受屈辱最多的知青人物，作者赐予了最多的幸福。娶了穿糖葫芦女人的苦孩子姚守义当了厂长，治厂有方；苦难深重的徐淑芳不仅当了厂长、而且嫁给了品貌俱佳的外商；而市长女儿、心理变态的老姑娘姚玉慧嫁给了战斗英雄（双目失明、断了一条腿的军人），表现出作者对不同阶层的情感。

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祸福，都按照作者的个人好恶进行了随意的设计，这种命运的分配完全不具客观性。其实所有这些人物都不过是作者阶级划分的符号，表达出他对不同阶层、生活环境下人物的主观态度，以及为实现强烈的戏剧性、情绪效果，进行的任意配置。在这方面，作品带有通俗文学特点，影响了这部小说的严肃性。

小说中反复强调生存苦难和做人的道德尊严，但是它们不是指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苦难和尊严，而是特指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的苦难和尊严。是否生活在社会底层和经济地位低下的人，就天然地具有道德优势；而生活在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天然地缺少道德呢?

知青返城后，平民知青共同面临生存危机，但知青们所经历的奋斗场景是多种多样的，《雪城》集中描写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部分知青，能否代表大多数平民知青的遭遇是值得怀疑的。他们在生存线上的血泪挣扎，如徐淑芳背木箱式的苦难，显然是一种旧社会式的苦难，其中不乏想当然的地方，显然作者并不了解这一时期返城知青所遭遇的更深层、更复杂的痛楚和迷惘，例如《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烦恼人生》(池莉)所描述的那种日常苦难。我们不否认小说所描述的苦难的真实性，而是说这些描述是个人化的、随意的，它过于外在，并不具有普遍性。作者在写作中流露的思想情绪，受到了成长环境、生活经历局限；在进行宏观叙述时，丧失了应有的客观性。

梁晓声心目中的知青群体，实际上是以社会底层市民为中心和参照的。小说既热衷于伦理性又对乱伦关注，既有反社会倾向又有权力崇拜。小说中存在着许多"文革"时代的政治思维和旧话语，其理念是悖杂的、相互矛盾的。

《雪城》虚拟出一个强大、团结的知青"集体"和永不衰竭的集体主义精神，实际上是一个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大集团主义。作者在小说中发出誓言"城市城市……我们和她们终将有一天征服你！我们征服过北大荒的荒原，我们也一定能征服你！"这些表述都极大地满足了知青群体的内心需求，虚拟的知青集体，成为他们在城市求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

2. 张承志：草原系列(1978—1989年)

张承志是著名知青作家。他的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北方的河》分别获1978年、1981—1982年、1983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文学评论界对他既有高度评价，同时也有非常尖锐的批评。

张承志在小说中，往往使用巨大的尺度，无论是在自然地理的空间广度上，还是在历史的时间长度上，都显示出一种超出个人尺度的伟大。作者把宏大的自然界——江河、草原，当成了自己的化身，无限地放大自我。他孤独地面对着这些北方的河流，没有人能进入他的世界，他的河流在天上，而不是在人间。

评论家们认为张承志是人民的歌手，他的《阿勒克足球》、《白泉》、《红花蕾》、《静时》、《绿夜》等等都是人民的颂歌。他们赞赏作者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所说的：在额吉——母亲这个普通的单词中，包含着动人的、深邃的意义。[14]

有的评论家则指出，张承志所描述的"人民"，带有明显的古代性。《黑骏马》中奶奶骄傲地宣称："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来没有把一条活着的命扔到野草滩上。不管是牛羊还是狗……"她宽容了奸污索米娅的黄毛希拉，说："知道索米娅能生养，也是件让人放心的事呀！"老奶奶、索米娅和奥云娜、额吉过着逆来顺受、平静乃至麻木的生活状态，她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蒙昧中生死，这一切被描述成一个古老民族深沉、坚忍的美德。人类的历史被描述成静止、沉重、迟缓，以至于周而复始的生活，个人生命在历史面前是渺小的，不足道的。张承志赞赏的这种人民实际上是古代的人民，而不是现代社会的人民。[15]

有的评论家注意到张承志的"苦难崇拜"。《黑骏马》中的受难的额吉、索米亚，被当作偶像涂上了神性的光环。《春天》的故事中，乔玛追赶马群，怀想着姑娘粉红色的身影，在天地一派宁静中冻死在春的雪原上。在《金牧场》中，被砍了头的向日葵，苦从伤口和鲜血中流淌，爱仍在明艳的火苗里闪跳。这种大苦和大爱的结合，在90年代最终发展成为伊斯兰哲合忍耶派反抗复仇的精神。[16]

评论家们指出，张承志大量地使用象征手法，表达抽象意念。理晴说："从1982年的《黑骏马》到1984年的《北方的河》，再到1985年的《黄泥小屋》，张承志总是反复吟唱着这一个抽象的主题。"[17]陈晓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张承志眼中，实际上"草原成了世界图景的基本样态，是他关于存在世界的'无视象'。"所谓无视像，实质上是对新时期现实的漠视和否定。[18]李今指出："人们也许早已注意到了，张承志经常以'走'作为小说的结构线索，而情节越趋淡化，以至'走'甚至可以成为情节本身，如《大坂》，

《九座宫殿》、《终旅》、《残月》、《晚潮》等等。"[19]许多评论家赞叹"张承志的精神长旅没有止境"，"让他的主人公们为着一个信念和精神延伸着智者的思想之路"，"它出自一种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伦理学的深刻的自觉"。[20]有评论家说，张承志是"孤独的理想主义者"，"张承志在绘雕现代男子汉的强悍心态上独树一帜"。[21]

实际上，作品主人公们不停地寻找，正显露出作者内心在不停地抵抗和逃避着什么。是什么东西强大到足以令他畏惧，逃避到蛮荒的草原和黄土高原？张承志为什么选择了蛮荒的草原和少数民族居住地，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20世纪70—80年代，张承志从未明确表明对社会变革的具体立场，他的政治态度含混不清，几乎所有作品都回避社会改革的现实。人们对他的思想、政治立场，缺乏了解，难免出现各种误读。到了90年代，张承志的《心灵史》发表后，评论界对他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随后出现强烈的批评。许多人意识到，他的所谓"走"，其实是一种"出走"，是对社会、时代的"出走"。从城市到草原，从城市社会到游牧社会，到最终选择了伊斯兰教，这是一个不断"出走"的过程。

张承志描绘的古老蛮荒，静止恒定的孤立世界，同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形成鲜明对比。虚构的古老草原显然是针对着正在进行现代转型的中国社会。张承志歌颂巨大尺度的自然，歌颂人民的忍耐，歌颂苦难，已经显露出由马克思主义转向伊斯兰教的征兆。它们与"文革"社会形成的权力崇拜、领袖崇拜，有着文化上的、思想上的联系。

五、"新现实主义"的知青文学
——从批判现实主义到新写实主义

在新时期，"主题先行"等"文革"创作理论受到了批判，但是"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的创作理论由于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得到了继续肯定。"两结合"创作方法，产生于大跃进时代，又经过"文革"文

学具体实践，实际上已经成为先验主义、理性主义创作方法的代名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创作中，理性主义作品占据了重要位置，它们以"两结合"作品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自称为是现实主义。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些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写实作品。它们摒弃所谓从生活本质出发，按照本质寻找细节，进行改造组接的理念创作方法。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精神气质和形式手段上，都不同于"两结合"作品。评论家们针对这些作品，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像一个大口袋，被装进了各种有写实主义特点的知青小说。其中包括具有人道主义关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也有价值立场退位的新写实小说。其实这两种知青文学，源自完全不同的文学传统，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价值理念。

批判现实主义的知青文学具有沙龙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传统，而新写实主义则具有商品社会的背景，是一种新的价值立场。在小说内容上，前者内容侧重于上山下乡时期的前知青生活，后者内容侧重于返城后的后知青生活。两者都涉及人的生存困境，前者投入了人道主义的关照，而后者则把生存视为生命的本质。前者试图从人道立场重建价值体系，后者则试图用生存主义对旧价值体系进行解构。

80年代末，一方面是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则是新写实小说的走向兴盛。从批判现实主义到新写实主义，表现出知青文学在理想主义失落之后，向价值虚无主义的逐步滑坠。

1.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人道主义的关怀

在新时期的知青文学中，真正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十分罕见。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可以说是极少数的几部作品之一。

朱晓平的小说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评论家提出，朱晓平的小说并不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它树立起一面鉴别伪现实主义的镜子。它使人们重新审视"两结合"理论及作品的真实可信性。

其实新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回归的争论都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这

部小说的重要性在于,它继承了"文革"民间写作的传统,从人道的立场出发,探索新价值体系的重建。

作者从个人生命实践出发,运用个人眼光来审视现实生活。由于采取了人道主义的立场,小说对传统社会的揭露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朱晓平:桑树坪系列(1985—1990年)

朱晓平生于1952年,西安市知青,曾在陕西农村插队,农村的贫困生活曾对他造成极大的震撼。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后于1985年开始创作桑树坪系列小说:《桑树坪纪事》(1985年)、《桑塬》(1986年)《福林和他的婆姨》(1986年)、《私刑》(1990年)等,每一篇小说的发表都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和震动。

桑树坪是陕西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落,家长制的家庭公社,残酷的族规、家规和私刑,令人想起黑暗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在恶劣环境下愚昧无知地生存着,但他们那种淳朴务实、坚韧不拔的精神,又使人看到了一个民族的令人难以想象的韧性和生命力。

朱晓平对中国农村社会有着诸多深刻的发现,并进行了逼真的描述:饲养员金明,挪着一双残缺的腿去乞食(《桑塬》);美丽年轻的寡女彩芳,为抗拒残忍的婚姻投井;外姓人王志科因为占了两口窑,而被乡民诬陷入狱(《桑树坪纪事》);温柔贤淑的青女被阳疯子福林摧残成了疯子(《福林和他的婆姨》);金同、福龙因为丢了驴和苞谷种,心甘情愿地接受村民残酷的私刑(《私刑》);在桑树坪这无数悲剧后面,是支配一切的严酷法则——生存。

在小农经济的简单劳动中,人的价值就在于强健的四肢。在桑树坪,人这样一个万物的灵长,其地位沦落到还不如一头牲口,因为人的力气没有牲口大,所以,当金明双腿被截掉后,悲怆地喊:"留下我这一钱不值的命做啥哩?没有腿还不是个死!"

人们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吃饱肚子,婚姻的目的就是为了延续香火,男婚女嫁是桑树坪生存法则的一部分。严酷的生存环境滋生出鄙陋习俗和买卖婚姻。在一切行为都围绕着生存这根轴心转动的环境中,爱情这种

东西成为有害的奢侈。彩芳爱情的悲剧不是简单的是非善恶可以说清的，它有现实合理性的一面。

在桑树坪这样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环境中，需要有一整套严格的秩序和法规，需要有一种维系农庄团结、一致对外的信念。在这种情形下，血缘联系就成为一条最现成、也最可靠的集团纽带。王志科这个入赘到女家的外姓人，只因遵照妻子的遗嘱把儿子的姓由李改为王，一字之差，竟招来杀身之祸！全村人联名诬告他有杀人之罪，夺去他占的两孔窑，最后惨死狱中。[22]"桑树坪的人，因历史的、经济的、宗族的、伦理的关系被结合成一个整体，他们的生命都维系在这个整体上，离开了桑树坪的土地，他们就不复存在，因此，桑树坪也就成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自我'。"[23]

狭隘保守、麻木不仁的文化心理，使桑树坪的人们活得心安理得，中国农民的全部韧性，有一半来自这种狭隘和保守的心理。正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文革"极左的专治制度得以横行。农民痛恨公社那些脑系，但惧怕他们手中的权力。他们任由脑系们压榨自己的血汗，甚至吃掉他们胜过命根子的耕牛。

李金斗在桑树坪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这个家庭公社的首领，李金斗身上积淀着传统文化的烙印，集中了农民的心理特征，愚昧与精干，坚韧与残忍，善良与自私，正直与狡黠，纯朴与鄙陋，这些性格都和谐地集于他一身。李金斗固然精明，但"他的头脑中只有一个桑树坪，只有当他思索着桑树坪时，他才显示出精明"。他没有自我意识和独立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只要事件超出了桑树坪的运作模式，他就会惘然若失，束手无策了，例如他在与公社干部交往时，常变得一筹莫展；他在处理干女儿彩芳婚事，当彩芳不肯妥协时，他"一头栽倒在地，头和脸往厚厚的尘土中使劲拱着，他哭，呜呜大哭"，"他在尘土中爬着滚着，爬到墙边，头沉重地一下下朝墙撞击"。[24]

一些评论家认为，李金斗是"迄今为止新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成功的农民形象之一"。这一形象的魅力来自它高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李金斗形象的塑造，是朱晓平对中国农民性格的深刻发现。朱晓平还刻画了桑树坪惟一的局外人李言老汉，他是一个出外打过工，见过外面天日的农民，但他每天以酒度日，是一个对生活不抱希望的幻灭者，他是农业社会的一个陪葬品。

李兆忠指出：桑树坪像历史的活化石，不仅可以证明过去，也可以说明今天，甚至还可以预测未来。它为我们提供了人类历史、民族历史感性的、立体的、具体的素材。这是一笔极为珍贵的财富。

桑树坪系列是当代中国还普遍存在的古代生活的真实纪录。在现代文明未照临之前，中国人还没有能力来关照、纪录这一文化的能力，作者的人道主义立场，是理解和发现桑树坪村落本质的思想基础；正是凭着现代文明思想，才可能在古老的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消失前的一刻，纪录下历史真实的一页。

作者叙述上的成功，首先在于他能够恰当地处理自己和农民的关系。作者承认自己在广义上，也生活在桑树坪的生存法则之下，他甚至承认桑树坪法则存在的合理性。有评论家指出，朱晓平接纳了金斗、金明、福林等人物，他常为他们的生存境遇而宽待他们的弱点和残忍，他理解他们的生存法则，他为桑树坪的人而叹息。朱晓平不是一个智者、强者的形象，而是一个单纯的、弱小的书童一般的记录者。[25]朱晓平知道，农民的命运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也联系着自己的命运。他理解农民在贫困中的绝望，他由此获得了描述中国农民的恰当立场。

贺绍俊、潘凯雄指出，朱晓平代表了知青文学的新流向，知识青年的主角位置在逐渐让位给只充当背景的农民，用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来描写农民；用个人眼光去发现农民、理解农民、描写农民。这种情感立场和叙述目标的变化，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完成了对城市与乡村、知青与农民之间隔绝与冲突的跨越。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朱晓平一直没有找到他在桑树坪的实际位置，他只是一个外来人，他还没有把农民命运的叙述与个人命运的叙述联结在一起。虽然这种要求是苛刻的，但却是合理的。至今还没有这样一部小说，能够将知青与农民的复杂关系充分、深刻地表现出来。

(2)老鬼：《血色黄昏》(1987年)

《血色黄昏》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老鬼(马波)为北京知青，1969年到内蒙古兵团支边，在1975年动笔创作长篇小说《八年》，历时3年于1978年完成初稿，作品先后被14家出版

单位退稿，又历时8年。这部用血泪写成的小说，后经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努力，改名《血色黄昏》，于1987年夏天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7次加印，发行近50万册，并有英、日文版和港、台多种版本。

这部小说迟迟得不到发表的主要原因是，作品与新时期的文化环境存在着冲突。在1987年，人们对生活和艺术的认知都发生了变化，视野也更开阔了，在这样的时机，原本不被接纳的缺席者，终于在作者与出版者的共同努力下挤入"话语的盛宴"。

由于"文革"以来的报告文学，甚至知青回忆录，都没有深入介绍过知青的真实生活，甚至社科研究也非常稀缺，所以这部全面反映内蒙兵团知青的小说不仅具有审美价值，而且具有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价值。该书编辑岳建一说："这是一枚留给未来世界与未来文明的精神化石，足以供后人去考证，去感应，去触摸，去审视一个非常时代非常的青春生态、精神生态与文明生态。"这部小说所描写的生活内容是如此广阔、深邃，可以说是一部知青生活的百科全书。

小说全面展示了兵团的政治生活运作，上至兵团总部，下至连队组织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的场面。小说具体描写了一个知青连队的政治生活，如现役干部（牛连长和指导员沈大肚子）如何领导"开门整党"。小说通过"方处长审问"、"分化瓦解"等章节，描写了一系列的师、团级干部形象（如师保卫科雷科长、方处长、赵干事和团部李主任）。通过一场死亡了69条人命的"救火"事件，作者揭示了兵团干部从上至下（从救火的当时正在玩女人的高层领导，到瞎指挥的四连连长、指导员）的腐败和无能。小说描写悲剧发生后，《兵团战友报》竟然发表文章，称"这场救火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有关领导人没受到处理，有的还升了官。

小说真实地反映了知青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一系列知青的个性形象，如林鹄、刘英红、雷夏、金刚、徐佐、罗湘歌等，形成了一个知青形象的画廊。小说集中刻画了主人公林鹄的内心世界——畸形的友谊与背叛，被知青群体遗弃的绝望，追求爱情时内心的善恶交战。林鹄的形象，具有一定的社会典型性。他尚处于人格发蒙阶段，暴戾、多疑，思想方法单一，同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着倔强、刚直不阿的性格。他在"文革"社会压迫之下，不仅没有奴性化，反而萌生了要与这个黑暗专治制度斗一斗的决心。

小说展示了知青群体和个人作为"社会人"、"生物人"的真实性，知青在社会组织中的不自由与性的苦闷。在具体细节的捕捉上，在对生命形态的体认上，作者表现出现代性的敏感和锐利。这部自传体小说毫不掩饰地记述了主人公畸形人格和兵团上下丑陋的生活，显示出一种现代审美品味。虽然小说还带有习作的痕迹，但作者的艺术才华和思想认知水平，远远超越了新时期的绝大多数知青作家。

《血色黄昏》是知青运动几十年以来，最具有价值的一部知青长篇小说。它描述了知青真的人生，真的历史。在"悲壮的青春"叙事之后，知青的历史通过《血色黄昏》，终于得到了还原。它是知青文学的一块里程碑，至今还没有一部知青长篇小说达到和超越这部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

这部小说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作者文学修养不足，结构、层次不够缜密，内容文字粗率、简单。次要人物的性格塑造，显得粗疏草率。作者的粗蛮性格显得缺乏文明的浸润，加之流露出的贵族习气，影响了小说可能达到的人道主义高度。[26]

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具有深厚的民间写作背景，作者的整个创作活动与知青沙龙和民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7] 这部小说是地下文学继沙龙诗歌、部分中短篇小说之后，对新时期文学的最后奉献。在释放了积蓄的能量之后，民间写作进入了冬眠状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失去了民间写作的有力支持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入低谷。

2. 新写实小说——日常生活的呈现

1985年前后，具有写实风格的，反映城市知青日常生活的小说开始出现。这种新小说无论在生活视角、思想观念上，都有很大变化。虽然它们引起一些评论家的注意，但未能进入话语中心，暂时处于边缘的位置。

这种写实小说将市井生活，以一种无事件的日常面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小说展示生活本然的、甚至阴暗的面貌。作者采取了客观、超然的立场，语调冷峻，夹杂调侃，揭示生活的荒谬感。对这种价值退位的小说，姑且称之为新写实小说。

(1)李晓:《继续操练》(1986年)

李晓的作品集中描写丑陋的生活场景,鄙俗的小人物,关注环境对人的扭曲异化过程。

他最先发表的两篇小说《机关轶事》、《继续操练》,描写知青返城后的经历。《机关轶事》描述,经过上山下乡锻炼,又努力考上大学的知青大学生,在进入大机关后,看到各种丑陋现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争权逐位,贪婪欺诈,他们的理想再度幻灭。《继续操练》的两个主人公,在学校已经开始尔虞我诈,毕业分配到社会上,仍然勾心斗角。小说结尾,两人双双惨败,一齐回到栖身四年的学生宿舍回忆当年,两人决心"继续操练"。

李晓接着发表了一组反映知青在"文革"期间插队生活的小说。《屋顶的青草》、《浪漫主义和病退》、《小镇上的罗曼史》、《七十二小时的战争》,揭露四个知青到农村插队,从被迫参加欺骗、发展到为了个人目的去损害他人,对他们性格的形成进行了剖析。这组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曾出现于《继续操练》中的研究生"四眼"、知青集体户的"蟹兄"、"博士"和"林肯"。他们在乡下没有"悲壮的青春",他们都是一些偷鸡摸狗之徒。

系列小说描写了四个知青为调进工厂、返回上海,以及在上海为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所进行的种种艰苦搏斗。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去争取起码的生存条件,他们牺牲了做人的准则,丢掉了人性中的美好善良。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仍然落个啼笑皆非的下场。

"林肯"以各种稀奇古怪的办法"病退"回到上海(《浪漫主义者和病退》),在哥儿们帮助下,以封闭厕所的办法夺回了被强占的住房(《七十二小时的战争》),然而别人又开始封闭厕所。

《小镇上的罗曼史》中的"蟹兄"因无法按领导要求弄虚作假,失去了上调机会,城里女友与他断绝通信,妻子调进县办工厂后抛弃了他。"文革"一结束,他回到上海后马上找了一个女朋友。他说:"命让我一个人孤零零无牵无挂留在乡下,为什么,就是要让我笑在最后,能回上海去。这他妈不是命吗?"显出一脸的志得意满。

李晓笔下的这四个知青,在不断的生存搏斗中,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心力交瘁,遍体鳞伤。李晓后来又写了《小站》,通过一个知青在小站的生活,表达出对人生的迷惘。

此后李晓追踪着知青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变迁,创作了《海内天涯》、《我们的事业》,表现知青在新时期的各种遭际。他们有的从政,有的求学,有的去香港,有的做生意。《我们的事业》(1988年)展示了物质对人性的异化。司法人员为了邀功领赏而不顾刑律,对犯了诈骗罪的主人公判处死刑。行刑前主人公突然欣慰地想到自己的"皮包公司"参加了人寿保险,而忘记了这本身就是自己设下的骗局。在李晓的笔下,当年的知青受骗者最终也成为了骗子,成为骗局的牺牲品而不自知。[28]

(2)池莉:《烦恼人生》(1987年)

《烦恼人生》描写开始步入中年的知青生活。这部小说与《普通女工》(孔捷生1979年),在情节结构、形象塑造、叙述方法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一个写的是回城之初未能割断乡村情结的知青,一个写的是已经融入城市生活的中年知青,后者似乎是前者的续篇,但无论是观察视角、价值立场都发生了变化。

《普通女工》中的何婵,插队时和男知青钟常鸣相恋怀孕,钟提前回城上学,从此信息全无。何婵回城后在一家锁厂当女工,住在一间由盥洗室改成的小屋里。她工作兢兢业业,一心想把儿子抚养成人。回城三年,何婵的伤口仍无法愈合,她无法直面现实,她知道钟常鸣的地址,她本该去找他,与他组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或是彻底分手,各奔前程。但她却默默忍受着一切,明知总有一天会遇到他,却有意无意地躲着。何婵是一个充满了理想的青年,她不懂机器维修,就借来专业书吃力地啃起来,后来她当上了组长,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下放农村时曾与漂亮大方的女知青聂玲相爱,两人回城后分手。印家厚找到一间被老婆称为"猪狗窝"的房间,娶妻生子。他整天被烦人的琐事弄得精疲力竭,他觉得生活有如一场梦。印家厚曾想报考电大,目的只是为了便于提级,找房子,加工资。他整天绕着小家庭转,一天之中要听很多话,受很多气,干很多活。早上起床听老婆唠叨住房困难,然后匆匆带四岁的儿子去赶早班车,午休要去看幼儿园里的儿

子,还要给老父、岳父选生日礼物;要处理与女徒弟的感情关系,处理与厂长、工友关系,要安慰老婆,教育儿子。老婆还骂他:"窝囊巴叽的,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算什么男人!"他从不回想青年时的往事,当一个过路的老知青在给他的一封信中提到他过去的初恋,引发的却是他对现实恼人生活的成串联想,他已经无暇回忆。印家厚已经失去了浪漫,他断然拒绝了徒弟雅丽姑娘对他的情意,他体会到:"雅丽怎么能够懂得他和她分不开呢?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分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怎么样呢?"

《普通女工》基调是明朗向上的,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烦恼人生》基调却是灰色的,带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哀愁。作者揭示的是一种生存状态,这是一种小人物的生活,在生活重负下挣扎的人生。从《普通女工》到《烦恼人生》的变化,展现出了知青文学的一种流向。[29]

(3)王安忆:《69届毕业生》、《流水三十章》(1987年)

《继续操练》、《烦恼人生》等黑色写实小说引起人们注意的同时,王安忆在1987年先后发表了具有黑色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69届毕业生》、《流水三十章》。王安忆在这两部小说中,讲述了女知青雯雯、张达玲没有事件的平淡如水的日常人生。

《69届毕业生》描写69届上海初中毕业生雯雯,由红卫兵而下乡,由下乡而返城,最后结婚生子,平淡无奇的生活。雯雯的生活中缺少必要的事件,她是动乱时代的边缘人物,躲过了大多数人注定要经历的许多痛苦。雯雯已走过三十年路程,她"仿佛是永远地渴望自身的成熟,仿佛永远地在寻求对她来说是从未有过的、也从未达到过的人生阶梯。""当雯雯三十岁那一年,生下一个六斤七两重的儿子下地时,她才感到一个生命的诞生会是这么痛苦,而又是这么幸福。雯雯到了这个时候才通过儿子的诞生回到了生命的起点。"在结尾时,雯雯思考生命的意义:生活本身并无所谓的意义,如果有,那也只在你自己的内心生活之中。

《流水三十章》"是一部当代心理长篇,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独白小说,而以心理剖析的手段去描摹一个女性的精神历程。"小说共有三十章,以农村、城市相互交替进行叙述。

王安忆说:"《流水三十章》共四卷,第一卷写童年,第二卷写少年,然后插队八年,是第三卷。前三卷犹如地狱,很黯淡。最后一卷是成年,在不安地走过了好多年之后,张达玲的人性复苏了,这是我追求的颂歌感。""她那似乎是平庸甚至被世界所抛离的人生,却是在心理中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创伤,所以到了她这般年岁却是又有着别人所难以体验的境界。"在她明白皇甫秋对她的重要时,他却走了,她等待、寻觅皇甫秋时,孤独的她开始与世界建立起联系,完成了自我的拯救。"经过了三十年那么多的梦魇,那么多的失眠,终于能够安怡地熟睡,换来一个明朗的清晨。"[30]

张达玲其实是另一个雯雯,她们都是生活在上海的当代女性,她们内心的期冀、渴望非常的相似,她们渴求浪漫,又甘于庸常的生活。作者赋予这种人生,以一种平淡、凄婉的美丽。作者似乎通过这两个形象在说,人生本无所谓价值,生活的意义只存在于人的主观想象之中,这或许正是作者想要提供的一种价值审视。

王安忆的这两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内心生活与具体社会现实很少发生深刻的联系,其个人世界飘浮在没有历史、社会刻度的内心记忆中。也许作者想把她们的生活,写成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真实。小说描写的这种日常的现实,是一种缺少人生高度的现实,它只是一种贫乏心灵的记录。作者不能用一种人文精神来映照女主人公生命的苍白、薄浅,而是把这种肤浅视为人生的真相。

从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叙事体系的解构来说,王安忆与李晓、池莉的小说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既没有痛苦的悸动,也没有反叛的宣言,他们冷静地拆解着价值的大厦。价值虚无主义的"发现",是对单一价值的反抗,它打破了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但由于作者缺乏文化创造力,所以他们的作品是一种贫乏的"人生真相记录"。这种"蚂蚁意识"的叙述,导致个体生命丰富性描述的丧失,人物简化为生存哲学的符号。

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已经预示着"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退位。它虽然在80年代末暂时处于边缘,但在90年代逐渐占据优势,最终进入后新时期话语的中心位置。

注　释:

[1]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1949—1989年的中国)》 河南

人民出版社 1989.11；汤应武:《1976 年以来的中国》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10。
[2]仲维光:《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之一》台湾《当代》73 期 1992.5。

仲维光在文中说:80 年代中期,北京形成几个文化群体,青年体改委派(以《未来丛书》的金观涛为代表)、文化书院派(以汤一介、李泽厚、庞朴等 50、60 年代进入学术界的老知识分子为主)、启蒙派(多为科学院、社科院等机构的学者)、北京社科院经济学所派(以陈子明、王军涛等为代表)和文化丛书派(主要成员为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哲学系,以及社科院哲学所、宗教所、文学所的青年研究员)等。

[3]高名潞、王明贤等:《中国当代美术史 1985—1986》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先锋美术的主要成员是晚生代,这种美术活动社团化的走向,并不是接续民间传统的文脉,它本身并不诉求民主,它们是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自然产物。现代审美需要参与商业空间,为它们提供了强大冲动。所以在 90 年代"权力—商业"话语系统形成之后,主流文化就吸纳、包容了它们。

[4]陈先奎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风云录》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4。
[5]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 年 4 期。
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 年 5 期。
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 年 9 期。
[6]蔡文轩:《中国 80 年代文学现象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5。
[7]钱滨:《〈树王〉ABC》《当代作家评论》1985 年 5 期。
[8]辛晓征:《读阿城小说散记》《当代作家评论》1985 年 5 期。
[9]张奥列:《知青题材的超越——对孔捷生〈大林莽〉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1985 年 6 期。
[10]蓝天、苏丁:《浅析〈树王〉的深层结构》《当代文坛》1986.4。
[11]刘武:《怀疑的时代》《当代文艺思潮》1986 年 4 期 关于人道

主义的讨论，参见：《为人道主义辩护》（王若水）《文汇报》1983.1.17《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胡乔木）《人民日报》1984.1.27。
[12]李国涛：《很有光彩的〈新星〉》《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2期。
[13]胡德培：《对时代和历史的反思——评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当代文坛》1987年5期。
周政保：《太阳，让大地燃烧起来吧……——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1期。
[14]李今：《张承志小说诗的素质》《小说评论》杂志1987年3期。林为进：《从草原深处找到旋律的两位歌手——张承志和艾特玛托夫》《小说评论》1988年第4期。
[15]蔡翔：《在生活的表象之后——张承志近期小说概评》《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6期。
[16]陈国恩：《张承志的文学和宗教》《文学评论》1995年5期。
[17]理睛：《张承志的世界：超越与超越之后……——评〈黑骏马〉、〈北方的河〉、〈黄泥小屋〉》《小说评论》1986年6期。
[18]陈晓明：《复调和声里的二维生命进向——评张承志的〈金牧场〉》《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5期。
[19]李今：《张承志小说诗的素质》《小说评论》杂志1987年3期。
[20]汪政、晓华：《感悟三境界——张承志、阿城、汪曾祺创作比较片谈》《小说评论》杂志1986年5期。李以建：《张承志的困惑和矛盾》《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1期。
[21]林为进：《从草原深处找到旋律的两位歌手——张承志和艾特玛托夫》《小说评论》1988年第4期。
[22]李兆忠：《激流，在深层涌动——读朱晓平的四部中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3期。
[23]贺绍俊、潘凯雄：《桑树坪里话"自我"——朱晓平部分小说创作漫评》《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3期。
[24]同[23]。
[25]蒋荪、邵永胜：《突破，在坚守中实现——读朱晓平的"桑树

坪"系列作品》《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3期。

[26] 这些问题在马波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铁与血》(1998年)中,暴露得更为充分。

[27] 马波与内蒙古知青亚文化群落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八年》的初稿曾在《今天》编辑人员中传阅,听取意见。(由鄂复名、李南提供)

[28] 李子云:《知青作家与李晓》《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5期。

[29] 夏和顺:《知青文学的一种流——从〈普通女工〉到〈烦恼人生〉》《当代文坛报》1988年8—9期。

[30]程德培:《她从哪条路上来——评王安忆的长篇〈流水三十章〉》《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1期。

第五卷



后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1990-2000年）

第十一章

思想重建与文艺论争

一、后新时期的文学界与理论界

1. 后新时期的文学界

1992年1—2月，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推动了经济改革的又一次高潮。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非公有经济应占有“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概念。随后开始了产权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改革。

所有制改革有力推动了经济迅速发展，但由于存在权力寻租，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出现分利集团、地方恶势力、黑色经济，造成社会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等负面影响，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陷阱。[1]

在所有制改革和经济大潮的历史背景下，“权力—知识分子”话语全面解体，文化艺术产生机制也开始发生变化。文艺一方面继续“唱好主旋律”，一方面逐步转向商品化的工业生产，更多地受到市场经济的制约、调控。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全面兴起。港台武侠、言情小说、西方畅销书、电视剧和广告文化风靡一时。图书市场与出版界、评论界、文学界、报刊、电视媒体之间形成一体化的市场机制。文学读者开始大量流失，文学刊物纷

纷停刊，诗歌、小说的销量锐减，许多作家转向可以赚钱的影视业，严肃文学丧失了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崇高地位。主流文学开始进入衰变时期。

(1)“权力—商业”话语体系的建立

随着经济大潮的到来，意识形态在控制能力减弱的情况下，逐渐从僵化说教转向诉诸情感的心理暗示，注重运用通俗文化和现代媒体的教化作用。“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迅速蔓延，恰恰是通过官方所控制的宣传机器的有力配合，才得以扩展”，大众文化只是消解了精英文化却丝毫也不曾抵抗主流文化。[2]

主旋律与商业结合制造出90年代的文化时尚。文化工业的生产，躁动的社会氛围，商业化的炒作，批评界的行业化，造成了文学创造力旺盛的假相。商业化在后新时期，为意识形态注入了新的活力，避免了全面衰败的局面。

在1989年之后，随着理想主义的退位，价值的虚无化，严肃文学失去了价值坐标。主流文学由理想化阶段进入了庸俗化阶段。主流文学开始走通俗的路线，政治与商业相结合，逐渐形成“权力—商业”的话语系体。

主流通俗文学是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商业化文学，它是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合流的产物，在90年代后期，它成为实际上的主流文学。

(2)“痞子文学”与“生存文学”

在1989年之后，由于整个语境的突变，严肃文学跌入低谷，一蹶不振。“痞子文学”借着文化工业的推动，迅速占领了失语中的文坛，取得了商业上的极大成功。

激烈的社会动荡，造成心态浮躁，作品认真严肃，很少有人愿意读，不过如没有一点末世的感慨，纯作笑谈，也无法吸引读者。“痞子文学”似有是非又无是非，最为适当，于是成为市井的消闲和谈资。

“痞子文学”中的痞子们，做事横行莫测，姿态浮器下流，遭遇的人不是流氓就是骗子，从教授到商人，都是魑魅魍魉之辈。他们四处周游，看尽荒唐世态。他们有一种窥视癖，在窥到一些无耻时便有一种刺激满足。在替读者发泄牢骚时，却可以感到他与这种丑陋、粗庸有着共生的关系。名为

嘲笑，实为赏鉴。这正是旧体制没落和瓦解的一种文化表现。

"痞子文学"将崇高化为笑谈，惨痛化为热闹，戳戳主子的脊背，嘲弄一下知识分子，是一种"二丑"式的文学。作者玩世不恭，似正似邪，变幻莫测。实际无所谓立场，就是他的立场。他是一个"看客"，他有障眼法使人看不清他。读看有一种看不清他，却被他看了的感觉。[3]

随着价值的消解，生活意义被还原为生存本身。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新写实主义由边缘进入叙事的中心，蜕变为"生存文学"。进入90年代末，这种恒定的日常生存(《一地鸡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开始逐步发展为无序的日常生存(《糖》、《上海宝贝》)。如果说知青作家表现的"恒定的日常"，在表达生存的贫困状态，那么生于60、70年代的晚生代，表现的"无序的日常"则表达生存的厌足状态。前者强调繁殖是人生的基本价值，后者则强调官能享受是人生的基本价值。前者渲染物质匮乏的酸辛，后者则痴迷地罗列时尚消费品。

物质匮乏的经历促使一些知青作家虚构了人类存在的动物性情境，幼年的富裕生活则促使晚生代虚拟了消费性情境。新人类的"生存"与知青一代的"生存"，两者之间有着一种逻辑的必然性。从活着到消费着，二者之间都是一种动物性的状态。[4]

继"痞子文学"之后，"生存文学"被主流社会改造、吸收，以大众文化的面目(《来来往往》、《美丽的家》)进入了主流文化。一批"生存文学"作者，遇到时代压力便机会主义地转向"主旋律—商业化"话语，正符合其"生存主义"的哲学逻辑。"生存文学"开始回避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酷现实，粉饰生活。"生存文学"的主流化，表明了新写实主义对一元化价值观进行解构的企图，最终遭到了失败。[5]

2. 后新时期的理论界

作为后新时期的20世纪90年代，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知识界经历了1989年的剧烈震荡后，一度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这一时期文学界称之为"集体失语"，理论界称之为"思想短路"。在沉寂的三五年中，文化知识界开始分化、重组。

在80年代末期，文化界已经出现了文学、社科两界分途的迹象，进入90年代这种分途日渐明显，思想理论界和文学界开始分化为两种知识群体。它们在90年代初分道后，经过10年发展，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机制、两套话语系统。90年代初，当文学界被“痞子文学”占据之时，社科界开始了学术规范的重建；当“生存文学”与主流话语合流时，理论界开始清算黑格尔主义；到了90年代末，文学界被完全主流化、商业化的时候，在思想理论界却已经形成了体制外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

理论界反思80年代的文化运动，开始注意到激情多于理性，学风空疏的问题。90年代初的思想重建，是从两项基本功——学术规范、思想人格——做起的；走的是正、拙、大的路子，起步之初显得迟缓、沉重，几年后却呈显出整体性(思想方法、知识构成、文化立场)的变化和提高。[6]

(1)知识分子话语的重建

历史事变促使理论界学人首先对80年代的文化、政治理论进行重新梳理，检讨错误的根源，从质疑思想理论的预设，到清除学术腐败。

理论界开始意识到80年代西方文化译介中存在重大的失误。文化丛书派由于对黑格尔主义轻车熟路，没有花力气清除独断论，介绍、宣传的所谓“西方思想”，实际上是一战后敌视西方近代文明、敌视自由主义的德国文化传统和西方左派理论。80年代的文化讨论缺乏学术空气，只是一场文化宣传运动；文化讨论的目的，只是为了给改革派制造舆论，进行意识形态宣传。[7]90年代的编译工作从马克思主义有关联的法、德理性主义，转向对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介绍，如对英美经验哲学的介绍，学人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巨大变化。90年代(除1994—1995年客观原因外)出版界对西方社科著作进行持续、大量的译介出版，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80年代。

在90年代初，腐败对知识界的侵染处处可见，既有功利主义的配合意识形态，也有机会主义的贩卖行为。学术规范是学术界存在的基础，学术规范说到底要建立在学术良知上。没有学术尊严，也就没有学者自身的尊严，对学术的严正态度，正是学者人格的体现。理论界开始强调自我约束，认真坚守自己的学术位置。这一时期，理论界学人普遍由从广场向学术岗

位转移。

随着规范化的提出,理论界开始纠察学术上的不规范行为。有人指出,社会科学在意识形态左右下,已变成“应用社会学,一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科学”。有人指出,学术界面临百废待兴,有些投机者想混水摸鱼,“这些人对于学术既缺乏虔诚之心,也无意于艰苦的学术劳作,他们不过假学术以谋其私,甚至自觉地去追求知识权力。于是,从不惮其烦地卖弄新概念到以各种形式公开或半公开地剽窃。”

有的学者留意失范的案例,对违规案例进行解剖。冯象批评点名批判一部法学著作,调查表格、统计数字不合规范,数字漏洞百出,先入为主循环论证,具有“勇敢的报告文学式的品质和目标”,集中反映了现阶段中国法学的全部病症和弱点,“是学术失范的典型,是治中国法学者必读的反面教材”。正是通过这种学理上诘问、规范上的督责,理论界开始逐步建立、落实学术规范。[8]

在重建学术的过程中,还展开了学术“本土化”的讨论。有人指出:“本土化”应理解为一项跨越国界、族属的全球性运动,通过对“普适性真理”的质疑,对“地方性”特征的辨认,共融一个世界性的学术体系。既要防止狭隘民族主义,又要使规范化与本土化二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这场学术讨论,从一开始就具有宏大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它确立了知识界在90年代继续坚定地走向世界。[9]

黑格尔是意识形态的重镇,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学基础,也是中国当代哲学、政治的主要思想预设。思想界在90年代初进行历史反思时,不约而同地重新面对黑格尔。全面打破黑格尔历史哲学统治的历史时机,在90年代中期终于到来。《顾准文集》于1994年发表,在思想理论界产生了热烈反响。有人指出,90年代思想界对黑格尔主义的清算受益于顾准,远远大于哈耶克、波普尔。同年,张中晓60年代研究黑格尔的《无梦楼随笔》发表,同样引起了广泛关注,张中晓被称为“告别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上的第一声啼血的杜鹃”。[10]

对黑格尔主义的清算,对于知识界的意义十分重大,它动摇了五四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惟理主义思想传统。唯理演绎的思想方法开始被质疑,经验归纳的思想方法被广泛接受。这场思想革命打破了哲学一元化的格局,铲除了一元社会的思想基础。

随着90年代后期一批西方学术理论(如哈耶克、洛克)的译介,对顾准、陈寅恪和胡适等人的一系列自由知识分子的研究介绍,自由主义思想渐渐为知识界所了解。知识分子普遍转向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11]

在90年代中期,形成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新儒家)、激进主义("新左派")三大思想潮流,出现三足鼎立,相互论争的局面。到了9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逐渐成为文化思想界的主要思想潮流。[12]

(2)文艺论争

理论界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必然要与90年代的主流文学发生冲突。由此引发了"二王之争"和"二张之争"等文艺论争。这一系列论战推动了价值规范的重建。

"二王之争"是自由知识分子与体制内知识分子的首次公开冲突。1995年朱学勤等四名上海学者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试图用自由主义原则重建价值体系;王蒙批评"人文精神失落"的提出不当,是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不满;此前王蒙称王朔小说是"躲避崇高",批评王朔是拒斥大众文化,缺乏宽容精神;由此引发了"二王之争"。[13]

论战涉及到知识分子道德良知和正常人格。有人指出,王蒙对"左"的恐惧心理"经过漫长的政治变化,已经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14]有人则尖锐地批评了王蒙凡尔赛式的机会主义哲学。[15]

这场论争中,王蒙实际上成为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王蒙一直是多重身份人物,他的《坚硬的稀粥》(1991)曾受到体制内"左派"的攻击。[16]在"二王之争"后,他的双重角色再也扮值不下去了,因为经过90年代初期的思想变革,体制外已经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知识界。

"二张之争"由主流文学界挑起。许多人不满王朔为首的"痞子文学"占据文学界中枢,便提出"需要文化英雄文学斗士"的口号,打出"抵抗投降"的旗帜。1995年"抵抗投降丛书"首批推出《无援的思想——张承志卷》、《忧愤的归途——张炜卷》。王朔在《北京青年报》(1995年8月31日、9月7日)上发表批评张承志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从而展开了"二张之争"。

张承志在90年代成为宗教领袖,并积极扮演民族主义的角色,把他树

立为知识界“抵抗的旗帜”，自然引起了理论界的警觉，于是理论界开始介入“二张之争”，进行“拔旗”。几方面参与的论战，显露出不同话语间的激烈冲突。[17]

在90年代中后期，理论界挟文艺论争的余勇，开始了对新时期、后新时期文学的总批评和再估价。这场批判涉及到许多文学界的著名作家：张炜、张承志、张抗抗、陈忠实、余秋雨、王蒙，以及钱钟书、梁晓声、苏童、贾平凹、汪曾祺等人。这场批判实际上是理论界在20世纪末对80—90年代文学的一场全面清理。[18]

随着批判运动的发展，2000年余杰发表文章质询“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引发了“关于忏悔”的论争。这场论争，涉及到自由的普遍准则、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以及新道德清洗运动，它实际上是价值重建运动的深入发展。[19]

9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艺论争不仅是对个别权威的否认，而且是对一种文化品格的否认。论争与批判中离不开普遍价值规范和道德准则的立场，论争中普遍采用的规范和准则，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的规范、准则。文艺论争的最主要成果，就是价值规范在知识界的重新建立。

二、知青学人与知青作家

进入20世纪90年代，知青一代已经人过中年，并成为各学科的骨干，作为一个代际文化群体，他们之间的思想冲突，已不局限于群体之内，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思潮与社会文化冲突。知青这一概念在思想重建和文化冲突的过程中并不重要，只是出于知青文学史书写的特殊需要，本节才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正面讲述，而选择了知青群体这一十分窄小的视角进行描述。

知青一代的文化精英在90年代开始分化，分裂成文学与社科两部分，前者由80年代成名的知青作家为代表，后者由思想理论界的知青学人为

代表。曾经历过组织化的知青作家，再次与主流文化合流。曾经是"68年人"和"食指群"的知青学人则再次走入民间，发掘和继承民间传统。在一系列文学论战中，他们扮演了相互对立的文化角色，出现了理论界知青学人与文学界知青作家相互对立的局面。（学界知青内部和文学界知青内部也有分化，从而增加了变局的异数。）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不稀奇，知青群体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在不同历史阶段（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都曾出现过相互对立的群体、组织，发生过尖锐的政治、文化上的冲突。这些历史冲突为90年代的文化对立，提供了历史背景。

在"文革"运动中，由于"阶级路线"的影响，中学生分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由于江青集团的政治阴谋，知青分成了"扎根派"和"不相信派"。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知青返城后面临共同的生活压力，使他们再次团结起来，并在抵制左倾思潮上统一了立场。进入90年代，随着知青群体的分流，知青群体开始出现不同的"族群"，并且产生了话语（"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冲突。

在20世纪90年代，知青群体内部的文化思想冲突再次形成。由于知青群体已是一种虚拟性存在，所以这种冲突是在全社会的空间，以超知青群体的形式展开的。学界知青学人对文学界知青作家的批评，体现为体制外知识分子对体制内知识分子的批评，表现为民间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抗争。

1. 知青学人

（1）从广场到书斋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大潮的兴起，价值虚无主义和机会主义哲学开始盛行，知青学人中有的弃文经商，有的从广场转向书斋，开始致力于新价值体系的探索和建设。

这些知青学人意识到，他们在知识准备、思想方法和人格形成等方面，都先天的薄弱。一切必须从头做起，从基本功打起。一代人只有真正

做到术有专攻,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有人指出:中国学人成长的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是中国当代思想的底本。“饱受左派和极权文化蹂躏与阉割的中国文化,要想重新获得生育能力,中国的人文精神要想再生,还要经历一两代人的砥砺。”[20] 知青学人自觉地完成了由广场政治到学术岗位的转变。

1996年朱学勤发表《寻找68年人》的“寻人启事”,追寻当年乡村“精神飞地”、“民间思想村落”的成员,寻找1968年民间思想界的“食指群”。他呼唤知青学人发扬思想型红卫兵的传统,不要忘记青年时代的青春理想。他说:你们当年“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你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这是你们的命运,注定你们不可能雷同上下两代人。前十年中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了问题,更遗忘了勇气。你们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学院里的学理,不应该是用来换取学位的,那是同辈牺牲近百人才换来你一个人的思考机会与发言权力。”[21]

在90年代一系列文化思潮、学术事件和论战中,一批知青学人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就是朱学勤呼唤的“68年人”,有过1968年思想探寻的历史,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后考上大学,许多人还在西方经过规范化的理论学习。可以说,他们是“老三届”的“幸存者”,继承和发扬了知青亚文化群落的文化传统。

(2)从发掘到重建

知青学人积极从事民间思想的发掘工作。他们在一些杂志开辟“民间语文”专栏,并先后出版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杨健 1993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 1995年)、《顾准日记》(丁东 1999年)、《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 1999年)、《遇罗克遗文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 1999年)等研究资料;出现了一批研究早期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如《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谢泳 1999年)追踪了一批20、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足迹。

1998年知青学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推出了《中国知青史——初

澜 1953—1968》(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大潮 1966—1980》(刘小萌),知青史涉及到经济、教育、人口与资源,涉及到中国当代社会的古代性因素方面,从而在国家民族曲折发展的大背景下,勾勒出了知青一代人的历史命运。1999 年经过民间沙龙的群体努力,推出了《沉沦的圣殿——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该书提供了知青亚社会形成、发展,知青独立话语的创造与传播的第一手资料,这是知青亚文化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展示。它成为知青文化创造的一部秘史。

这三部书的出版从各方面证实了"悲壮的青春"、"青春无悔"叙事的虚构性,为知青群体进行历史反思,超越主流社会对自身的命名,为民间写作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历史经验。

在这一时期,对历史上存在的"百慕大三角",知青学人们纷纷从事"探险和打捞工作",希望能"在战争的废墟之上","从星散的幸存者中间创造一种联系,建立一种延续的网络"。林贤治说:"这是自赎,也是拯救。未来只能产生于众多个体的拯救行动"。"在最黑暗最危险的深处,应当有我们建立的网络,去延续'五四',延续鲁迅以后星散的知识者和思想者,去维系一种精神。惟有它,才能导引我们摆脱困境,挑战命运之神。"[22]

朱学勤总结历史经验,反思"红卫兵——知青"一代人乌托邦道德理想的荒谬性。他在《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中,认真精算卢梭的政治神学。他指出,"一个真诚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不淘洗内在冲动,不确立外在边界,他的理想追求越执著,他的存在方式越危险,他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罗伯斯庇尔,一个潜在的雅各宾党人。"朱学勤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的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这本书是对红卫兵激进理想的批判性总结。[23]

朱学勤等四个中青年学者在《读书》(1994 年 3 期)发表文章,批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的失落,他们提出:知识分子能否在庙堂以外建立岗位,继承和发扬人文精神,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是否应该建立一套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规范,一个新的精神中心?这是一个非常现实地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问题。不应放弃价值的普遍主义,同时要有一个限定,人文原则在实践中必须是个体主义的,没有这一限定,普遍主义可能走向反面,走向道德专制。这是 1989 年之后,首次提出重建价值体系的问题,并提出了重建的自由主义准则。"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人文精神的重建实

在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它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讨论。

发掘与重建工作的意义,在于接续文脉,传承文化。它贯通了知青与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联系,使几代人的经验汇合起来,传承下去。文化界半个世纪以来,各代相互隔膜,几代青年人都要自我做古,知青学人开始抵制这种坏传统。老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知青学人相互了解、相互尊重,这是文化界从低谷走向高峰的重要标志。

知青学人还踊跃参与"二王之争"、"二张之争"等一系列文艺论争,并在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4]

(3)新人文学

由于主流文学日益远离开了现实生活,无法回应社会对价值缺失的强烈欲求,狭义上的文学已不能体现后新时期的文化精神。90年代的代表性文体,由狭义的文学(小说、诗歌、戏剧等)转向更广义的文学(散文、杂文和文论)。文体发生变迁的现实基础是1989年事件后的思想重建,它所依赖的文体是学术的(这种文体是理论建设、学理阐述,以至思辨、论争的主要工具),典型文本是社会学著作和杂文、散文。

90年代的代表性作品,并不是那些获奖的长篇小说,而是产生重要影响的社科论文、论战杂文、回忆录。它们具有相当丰富的审美内涵,体现着作者的人文情怀。其中不少佳作是出自知青学人之手,如《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朱学勤1994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1995年)、《城市季风》(杨东平1997年)、《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1997年)等,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社科著作。

这一时期知青学人创作了不少优秀杂文,《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以经验主义的立场方法,明辨是非,寥寥数语就使"复杂的谬论"在常识面前现形。《城头变幻二王旗》(朱学勤)、《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徐友渔)等在论辩中产生的杂文,说理明晰,思辨深刻,笔锋犀利,有着一定的审美价值。

这一时期,一些十分优秀的散文并不是来自主流文学界,与80年代的"改革文学"没有传承关系。它们是从民间传统延续下来(或是接续民间传统),是从另一个根子上生长起来的,代表性的作品是民间沙龙成员的散

文。《今天》成员和白洋淀诗群成员在1994年先后发表回忆文章，这些文字自然、朴素，记录着一代人精神的不屈探索。如《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多多）、《永远的五月》（徐晓）、《诗的往事》（齐简1994年）、《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潘婧1994年）、《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关于朱育琳先生逝世廿五周年》（陈建华1993年）等，这批散文记述了动荡不安的时代人生，还原了历史的多样性，展示出个人灵魂的丰富性，有着情操示范作用。与其说是它们的艺术性征服了读者，不如说是他们的心灵和人格震撼了人们。这些作品显示出新文化"主体"正在走向成熟。

每当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文学面对未来的"历史情境"，往往做出理想主义的瞻望，创作出新人形象，对大众进行道德上的示范和情感上的感召，唤起人们为实现新社会的美好理想而奋斗——这就是卡里斯马典型的意义。这批社科著作、散文和杂文虽然数量和影响有限，但是它们传达出新文学的信息。

这种新文学的感召力，在于叙说者进入"示者"角色。这意味新文化有了主体，价值有了承当者。它向"看者"（社会）提供了一个"被看者"，一个道德和价值的承当者。他们是一群经得起"窥视"的人。这预示着"看客"的文学将被"示范"性文学所取代。

2. 知青作家

知青作家群在1989年历史事件的冲击下，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随着理想主义的幻灭，一些作家转向价值虚无主义，创作了通俗文学和生存文学；有的作家皈依宗教，成为某宗派的领袖；有的作家开始社会科学著作的写作。

(1)从理想主义到庸俗主义

随着理想主义的全面幻灭，"新写实"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走上了全面庸俗化的道路，以"日常生存"的面貌由边缘进入主流话语中心。

"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池莉、王安忆，在90年代成为表现"日常生存"的代表，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

在1991年池莉就明确地表达了庸俗的生存主义,她说:"我不篡改客观真实。所以我做的是拼版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刀剪,不添油加醋","只有在艺术把生活表现为毫无秩序,就像生活本身的样子时,我们才接近真理。"[25]"如果再用从前时代的激情,用高大全的人物形象,用虚构的理想中的人情味做成糖食端给人们吃,人们吃吗?"[26]

她的作品反映芸芸众生和粗俗、琐屑的日常生活,《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金手》、《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等,均带有生存主义色彩。《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四"企图给猫子命名("你的名字叫人")时,猫子却"睡着了"。有评论家指出:这个具有讽刺性的寓言,暗示了五四启蒙传统的终结,也宣布了知识分子终极关怀的破灭。[27]

王安忆在1997年创作了长篇小说《长恨歌》。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描述了30年代上海女影星半个世纪灰暗、平淡的一生,这一形象不过是女知青雯雯(《69届初中生》)、张达玲(《流水三十章》)的翻版。平淡如水的日常生存,成为一种永恒的日常生活。

在90年代后期,庸俗的"日常生存",成为"主旋律—商业"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池莉在90年代末,转向通俗文学,创作了反映市井知青恋情的《来来往往》(中篇小说1998年)、《小姐,你早!》(中篇小说1999年)。其中《来来往往》在1999年被拍成电视剧后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王安忆的《长恨歌》也在2000年获得茅盾文学奖。

庸俗的"日常生存"逐渐形成一种潮流,对"悲壮的青春"叙事形成全面的解构。可以说,进入90年代末,庸俗的"日常生存"成为"悲壮的青春"的终结者。

长篇小说《眺望人生》(何顿1998年)可以说是"悲壮的青春"叙事向"日常生存"过渡时期的产物。作者将浪漫传奇故事与日常市井生活组接起来,小说采取了时空间跳接的手法,将知青传奇与返城后的庸常生存,诗意的乡村初恋与平庸的中年婚外恋,两种历史场景剪辑在一起,使二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以女主人公的死亡和知青纪念会做结尾,当纪念会上年过半百的知青们集体齐唱老歌时,弥漫着一种怅然若失的情绪。作者带着深深的依恋之情,为这一代人的生活划上了句号。进入世纪末,"悲壮的青春"开始变成遥远的神话传说。[28]

(2)宗教题材的写作

在后新时期,随着知青一代人步入中老年,一些知青作家开始进人宗教领域。在一些知青作家的作品中,开始明显地反映出宗教哲学对于文学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承志公开宣称自己皈依伊斯兰教,柯云路积极参加生命神秘现象的探讨,史铁生从个人生命体验出发进行宗教思索。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思想立场、方法和道路。[29]

A. 张承志:《心灵史》(1990年)

《心灵史》发表于1990年,它记录了哲合忍耶七代宗师的事迹和二百年间回族同胞捍卫信仰,反抗满清王朝血腥镇压的心史。文学界部分人对《心灵史》予以极高评价,充满了溢美之辞,但更多的人对张承志归皈宗教的行为感到惊异,同时表示出了审慎的沉默。

张承志自称获得了神谕,他说:"人与神的倾诉秘授确实有过,那种体验已经能串连我的人生。"他在《金牧场》中记录下这样的情景:他跪在痛哭流涕的杨阿訇身边,面对青砖拱北,浑身颤抖,难以自持地"投入一个伟大的怀抱"。

张承志由马克思主义转向伊斯兰教,变化虽出人意外,却在情理之中。两种学说差异虽大,但都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法有一定联系。张承志宗教信仰的形成与左翼激进主义具有密切的关系。他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和命名人之一,当左翼思潮退潮的时候,仍然坚持着"文革"时代的政治理想。他在80年代发表的《北方的河》中,指责那些打砸抢的人,"他们不是真正的红卫兵"。在90年代发表的《金牧场》中特意安排了日本左翼学生运动的场面,来印证自己60年代的革命激情是一种世界历史潮流。

《心灵史》1990年出版后,他显示出已是一个撰经者、一个精神教主,决心为理想承担世间的苦难。他在《清洁的心》(1994年)中,宣扬民族主义,蔑视知识分子。张承志经历了由左翼政治理想转向信仰宗教的过程,最终在伊斯兰教的民众中,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把革命理想和宗教理想融合在一起。[30]

仲维光指出：世纪末动荡的社会犹如即将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它隐藏着各种危险的变化。人们应该注意南斯拉夫种族冲突和难民潮的历史教训，南联盟前领导人就是现在的民族主义甚至宗教主义极端分子。张承志成为宗教领袖的变化是这种时代潮流中的一朵浪花。张承志在民主、人权意识薄弱的社会中玩弄宗教主义、民族主义，是十分危险的，甚至超过当年红卫兵带来的危险。人们必须警惕那些自以为占有真理，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各类权威主义者。[31]

B. 史铁生：《我与地坛》(1993年)

史铁生属于知青作家群中的异数，他与民间文化群落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是民刊《今天》的作者之一。史铁生在农村插队时得病导致双腿瘫痪，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为了尊严而进行的抗争，促使他通过个人生命体验去思考人生的终极价值。[32]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质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的壮烈理想。"

在史铁生的笔下，经常出现不懈追求的形象，《山顶上的传说》中，拖着残疾之身的养鸽人，昼夜不停地寻着丢失的鸽子；《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临终将那张无字的白纸传授给小瞎子。他在《礼拜日》中说："上帝把一个东西藏起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儿找。"史铁生就是那个寻找世界终极本质的人。

史铁生是从个人生命体验出发，步入宗教疆域的。这是中国古人曾走过的平实、稳妥的道路。史铁生的整个精神探求过程，一直指向对个人生命价值的思索。在他的宗教情怀中，贯穿着一种现世的、思辨的立场，有一种"祭如在"的儒教精神。

(3)社会科学和自然哲学的写作

一批知青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凭借着丰富的生活经历，充沛的政治热情和天赋才情，创作出了合乎时代要求，反应读者心声的作品。但是，

作为"老三届",他们受教育的程度、知识的积累,都先天的欠缺,很难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进入后新时期,社会发展对知青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完成由生活型作家向学者型作家的转变。有的人由于不能更新知识结构,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理论界在"学术规范"的大讨论后,开始形成严格的理论规则。"学术规范"化提高了学术门槛,开始抵制文学家随便到理论界串门的现象。一些知青作家,以文学思维和文学表述试图介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受到理论界的坚决抵制。

A.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1997年)

梁晓声在90年代连续发表政论性随笔《九二断想》、《九五断想》、《凝视九七》等,站在"平民立场"发表社会议论;1997年他发表了带有社会学性质的作品《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被报刊、电视台广泛宣传,但受到理论界的严厉批评。[33]

有人指出这本书四不像,"是政治理论?但是更多的是感性的描述。是长篇小说?但却缺少情节故事的贯穿一致的人物。是社会学著作?但我们看不到必要的统计资料数据和严谨的学理。"作者缺少数据,就用感觉分析,分析无法完成,就运用个案故事补充,故事也不足以说明问题时,就借用道德激情。由于作家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只能一味把社会经济问题道德化。[34]

作者将生产力比喻成一柄梳子、洗发剂,阶级被生产力"梳"成阶层,从此"很难重断胶合在一起",从此不会再发生阶级斗争,不再产生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似乎只要经济发展,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隐患。他指责资产者为富不仁,却对政治体制政革避而不谈。

该书的理论基础是《毛选》四卷和"文革"时期毛泽东提倡要读的马列六本书,理论相当陈旧。书中不讲学理的地方,随处可见。

古希腊法律规定公民不得携带武器参加集会,立法者卡龙达斯因自己不慎误犯,毅然自刎而死。作者说:"一个伟大的立法者,显然比我们常人更加深知法的神圣性,因而才不惜以自己的死向我们后人进一步申诉这一点。"作者举这个例子,本想说明立法者是最好的执法者,反而证明了立法者同时兼任执法者是荒谬的、不现实的。

作者在谈到反腐败时说:"无论是毛泽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忧患,还是邓小平'要出事,就出在政权内部'的警告,其实都暗喻着一种青虫和林木关系的可悲啊!"毛泽东的话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说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指的是邓小平。邓小平的话,是在90年代初说的,批评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条语录出自不同时代,都与反腐败无关。该书理论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B. 柯云路:《发现黄帝内经》(1998年)

柯云路以文学方式连续闯入多种学科,他先后发表几百万字的不同学科专著。被一些人称之为以思想见长的作家,有人将他的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创作"改革文学"时期,发表了《新星》等长篇小说。第二阶段,写作"生命科学"著作,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表系列气功学著作。第三阶段,写作"成功学"著作,于1995年开始文化与教育研究,发表了《情商启蒙》(1997年)、《把孩子培养成学习天才——高效学习指导法》(1997年)等著作。[35]

柯云路对人体神秘现象产生兴趣,在80年代晚期,写作出版了《大气功师》(1989年)等著作。90年代他出版了《生命特异现象考察》(1994年)该书再次成为畅销书,被传媒称为"本世纪思想文化史上比较重要的作品。"他还组织拍摄了24集《生命科学探索》电视系列片。柯云路声称:"证实特异功能是困难的,也正因此,证实人体特异功能,就将引发整个思维变革,时空逻辑变革,从而刷新科学、哲学文明。"[36] 他试图通过探索神秘现象,创立柯氏"人体——宇宙学"体系。

柯云路的探索超出了一般科学规范,遭到怀疑、诘难和批判,被指责为"伪科学"、"欺世盗名"、"骗子"。有人认为,从李向南到大气功师实质上都是一种"造神"心态的反映。面对人们的指责,柯云路1994年宣称:"我想告诉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柯云路绝没有陷入迷信,柯云路也并不发昏。他没有走入沉溺幻想的误区。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冷静、更清醒。他没有私心与偏执。他热爱人类,他相信真理。他确信他的种种研究与发现,都将汇入下一个世纪——新世纪的科学文明、哲学文明、艺术文明之中。"[37]

1998年柯云路发表《发现黄帝内经》,介绍"当代华佗"胡万林在新疆

行医收治疑难病症数万人，并称全面破译胡的医学理论与技术奥秘。胡万林造成多人死命被判刑后，柯云路称：作品描写胡万林的“个人人生经历及传奇的一些细节是否百分之百的确切，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从总体上把握”。[38]

柯云路有志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却缺乏科学、哲学方面的知识准备，试图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科学领域而有所建树。他在80、90年代发表的有关人体生命的研究著作，缺乏严谨的学术规范，基本上是一种报告文学。在科学实证方面，他也拿不出科学的办法。这些缺失，加上气功界龙蛇混杂，为柯云路90年代末期的重大失误埋下了伏笔。

柯云路在《新星》中，塑造了一个救世主的角色李向南，他以高干子弟的身份进行宫廷政治式的政治改革；柯云路在小说创作上表现出的新权威主义观念和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与后来转为气功学派领袖，在人体研究方面表现出的藐视科学的非理性倾向，这二者之间显然有着一条思想发展的轨迹，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

注　释：

[1]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1。

[2]杨扬：《大众时代的大众文化》《文艺理论研究》1994年5期。

民间性、非主流的通俗文学，一直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如黑幕小说《天怒——反贪局在行动》1996年、《天意——中纪委在行动》1998年、《羊的门》1999年、《国画》1999年，先后被查禁；如盗版的海外社会小说《叫父亲太沉重》1993年、《黄祸》1994年等，它们属于“非法出版物”。

[3]有评论家认为王朔是市井平民的代表，“痞子文学”是“市井的狂欢”，实际上王朔们是军干子弟中的红小兵群体，成长在“文革”时代的部队大院（“文革”时期最安全的地方，并享有特权）。有人指出：王朔没有放弃大院歧视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遗传，他冒充平民是一种推销作品的策略。

王朔在《无知者无畏》中说：“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太多的

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任何一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都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黄式宪指出：这是以无文化(或低文化)去反文化，将知识、知识分子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律作为讽刺对象，自己(无文化的现代痞子)反倒冒充社会主角、艺术的主角。(《〈顽主〉“三T式”价值颠倒的神话》《中国电影报》1989.7.5)。

王朔的小说，充满了封建流氓色彩。他在《过把瘾就死》的“卷首语”中说：“其实一个元帅不过是一群平庸的士兵的平庸的头儿，和一个流氓团伙中的‘大哥大’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他的小说中，虚构了一个流氓、骗子的世界。

王朔一直绕开敏感问题，有时故意在原则问题上显露一下自己的鲜明立场，以表明自己绝非“持不同政见者”。《一点正经没有》中，有人拿一张人权请愿书请顽主们签名，“我”恶声恶气地说：“少拉我们犯错误，我们这点人权够用了，多了还不会使呢！”“你们就是鼓吹‘全盘西化’那帮吧？”杨重说：“什么东西？骂两句共产党就成了英雄了。明告诉你们，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的高家庄，就是怎么着也轮不到你们坐庄。”(《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4]刘恒、池莉、方方、刘震云等新写实作家在90年代转向“生存主义”的文学。

“恒定的日常”表现没有事件的单调、乏味的日常生存，代表作品有《风景》、《一地鸡毛》、《长恨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无情地拆解理想主义。作家刘震云说：“过去有过宏伟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开始吧。”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小说原作对张大民贫困和没有尊严的生活，进行辛酸的调侃，在影视剧中张大民则时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小说在1999年被拍成贺岁片，2000年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并搬上评剧舞台，受到政府宣传褒奖。

无论是60年代的大饥荒、上山下乡，还是返城后的待业经历，都对知青作家的心理造成深刻的影响，正在类似于小

农经济的生存价值观的基础上，他们由此虚构出贫困、恒定的日常生存。

进入9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生长在相对优裕、富足生活中的新人类作家，开始表现没有事件的、无序的日常生存。生存逐渐变成一系列官能刺激的场景。代表作品有被称为"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的《糖》、《上海宝贝》和《八月未央》等，描写所谓后现代生活。这是7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的"无序的日常"生存。

为了生存可以不计一切的价值理念，奠定了生存文学的哲学基础。物质极端贫困下产生的生存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蒙昧的古代文学。新人类的所谓后现代文学并不是建立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实际上接续的是古代叙事的传统。

[5]《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生存文学与文化主流合流的例证。该剧的续篇《美丽的家》，被拍成2001年贺岁影片，描写贫嘴张大民、云芳一家搬进了新居，开始新的"幸福生活"。参见《北京晨报》(2000.10.1)《北京晚报》(2000.10.8)

有关评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演出报道，见：《北京日报》(2000.1.30头版头条)《"张大民"们的新生活》(市民拆迁系列报告)。刘恒、王新民：《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新剧本》2000年5期。

[6] 徐友渔：《90年代的社会思潮》《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1999.12。

[7] 仲维光说："德国究竟是不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对于德国人和欧洲人来说却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除魏玛共和国短暂的几年外，德国一直是一个极其专制的国家，并且不断地和西欧诸国进行战争。德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断地攻击近代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在世界上已讨论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问题之后，在绝大多数人已认为这个时代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束的时代之时"，中国思想界"却仍然像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陷在意识形态、德国

和西方左派的迷宫中"。(仲维光:《北京文化丛书派的工作及思想——8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研究(一)》《当代》第73期1992.5)

[8]冯象:《法学的理想与现实——兼评龚祥瑞主编的〈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书评》1995年1期。

[9]梁治平:《规范化与本土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双重挑战》。张静:《规范化与专业化》《中国书评》1995年1期。

[10]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思想界对黑格尔的彻底批判,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期思想探索。

顾准在50年代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定罪为"反革命分子",家破人亡,病逝于1974年。顾准立志要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希望通过对希腊城邦研究,了解东方为什么没有出现共和制度,而形成了专制主义传统。他指出黑格尔主义的"终极目的"起源于基督教传统,结合了在地下建立天国的"至善"目的论,构建了哲学化的神学。"希特勒是黑格尔主义的行动家","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张中晓是50年代的文学青年,因胡风案被打成右派。他在60年代研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时,对黑格尔的先验史观进行质疑,"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相反,它是既往人类行动的成果和将来人类行动的开始。走到哪里算哪里——实验主义历史观也。"在哈耶克、波普尔等人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十年后,《无梦楼随笔》在1994年才得以公开发表。

王元化在80年代还在用黑格尔辩证法批判"文革"艺术的抽象思维方式。1989年在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写书后跋时,他意识到要重新认识经验主义。在1992年,他明确地表述了如下观点:"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里斯玛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己需求的公意,只

是一个假象，一场虚幻。""过去我十分迷恋黑氏关于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哲学，认为这是他的辩证法所创造的一大奇迹。现在应该从这种逻辑迷雾中清醒过来了。"（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思想的时代》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1）

[11]李慎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 2000 年）

[12]进入 90 年代，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开始成为三大政治思想潮流。它们在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的重大理论存在尖锐的冲突，各自都发表了一些专著、文章，所有的论争、辩驳，都还属于知识分子内部的冲突。

来学勤认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差异在于，新左派朋友提倡批判市场机制，而自由主义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特别强调要建立权力监督机制。（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亚洲周刊》2000 年 4 期）。

姚新勇、王世诚认为：新左派试图从中国的五六十年代，寻找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经验，其着眼点是对准西方资本主义，而本土更多地被当成了参照系。他们对本土相当的隔膜。他们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文学兼哲学"，这决定了他们更擅长从文学的、道德的、精神的层面看问题和言说问题，短于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来认识和探讨极权制度内部的问题，从而存在着滑向体制卫道士的危险。他们不知道人文道德批判与政治、制度的批判分属两个领域，人文道德批判可以是无条件的，而制度层面的改造则更需要理性和专业知识。

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整体性对立，是一场"虚拟的'路线斗争'"。实际并不存在着一种与自由主义对立的新左派集结。人为制造所谓的路线之争，将误导出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冲突。自由主义并不是无批判的制度保守主义，新左派理论也有助于推进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应放弃党同伐异的争吵，构成一种批判与重建相辅相成的建设性关系。

(姚新勇、王世诚:《虚拟的"路线斗争"——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思考》《粤海风》2000 年 7、8 期)

[13]王蒙:《王朔的挑战》《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0,《躲避崇高》《读书》1993 年 1 期。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文艺争鸣》1994 年 6 期。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读书》1994 年 3 月号。

[14]谢泳:《内心恐惧:王蒙思维的特征》中华读书报,1995.5。

[15]朱学勤:《城头变幻二王旗》《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 1999.12。

[16]《写实的多种可能——〈小说月报〉第四届百花奖小说漫评》(王干)《小说月报》1991 年 7 期。《话说这碗"粥"》(王蒙)《读书》1991 年 12 期　《评小说〈坚硬的稀粥〉》(王长贵)《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 年 1 期。《文汇读书报》(1991.10.19)对王蒙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控告《文艺报》与慎平侵害他名誉权的报道。(《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7]"抵抗投降书系"张承志、张炜卷出版后,引起"二张之争"。《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晚报》、《文论报》等媒介发表相关论争文章。其中张颐武的批判文章最具代表性。

相关的材料见:萧夏林:《时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抵抗投降书系"前言)。张颐武:《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新神学:对于今天的恐惧》《文学自由谈》1995 年 2—3 期)。张颐武:《文化冒险主义:狂躁与恐惧》、《再说文化冒险主义:矫情与迷乱》(《文论报》1995.7.15/9.1)。陈晓明:《只有一个张承志》(《文论报》1995.7. 15)。《读书人王朔说文坛风云》、《且听王朔分解》(《北京青年报》1995.9.7/8.31)。祝晓风:《九五文坛第一事——关于"抵抗投降书系"的一份备忘录》。(《文论报》1995.9.15)。邵燕祥、刘心武等:《历史转型与知识分子定位》(《钟山》1996 年 1 期)。毕胜:《直言不讳说名家、批评家与作家对话文体、张承志与

"红卫兵符码"》(《中华文学选刊》1996年5期)。余杰:《皇帝的新衣——关于"张承志现象"的思考》(《火与冰——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4)。

[18]毕胜:《直言不讳说名家、批评家与作家对话文体、张承志与"红卫兵符码"》《中华文学选刊》1996年5期。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

[19]参见《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余杰)、《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反思余秋雨批评》(郝雨)、《当下文坛的道德清洗运动》(朱大可)《2000中国年度文坛纪事》漓江出版社2001.1 祝勇:《你有权利保持沉默》大象出版社2001.1。

[20]仲维光对许良英、方励之、金观涛,这三个分别生于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个案分析对比,他指出:社会环境和接受的教育是一代学人成长的关键,时代在学人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受到优良大学教育(扎实的基础训练和良师指导),生长于开放社会或社会转型期的学人,要比生长在封闭社会接受封闭教育的学人,具有更开阔的眼界和胸怀。即使在封闭社会中,受过良好学术训练和知识框架的人,仍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保持和世界的联系。

20世纪20—30年代出生的学人可以用科学、民主化解和代替意识形态,而40年代末出生的学人却基本上是为意识形态服务。主义对于前一辈人是一门学说,对于后一辈人来说,则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讲,过问政治意味着诉诸权力,注意力过于集中在上层内部的权力之争。(仲维光、还学文:《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德国鲁尔大学出版1994)

[21]朱学勤:《寻找68年人》(1996)《书斋里的革命》 长春出版社1999.12。

[22]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思想的时代》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1。

[23]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 上海三联书店1994.9。

[24]在“二张之争”中,知青学人与知青作家发生了正面交锋。张颐武指出:张承志、张炜的话语是一种“新神学”,带有“反现代”及“反理性”的强烈冲动,“对于目前的文化的多元共生、众声喧哗的恐惧而导致一种极端主义的情绪”,他们对世俗生活极端厌弃,将人划分为“污浊的”与“清洁的”两类,甚至主张“以暴易暴”,或以“恨”处世、“死亡”冲动等极端主义的原则,并承诺要为读者提供终极“解脱”。这是一种狂热的文化冒险主义。(《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新神学:对于今天的恐惧》《文学自由谈》1995年2—3期。《文化冒险主义:狂躁与恐惧》《文论报》1995.7.15)

仲维光指出,“卫道的张承志”与“顺道的王朔”之间的冲突,只是“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张承志作为纠察队长在1966年“第一次‘抵抗投降’”,“手提一根宽皮带,身穿褪色的军装,带领队员,鞭挞老师校长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好不威风。”第二次他成为“联动”,“我有幸被张承志组织并为首的二十几个人群殴,两颗门牙差点被张承志一拳打掉”。“文革”中他被保送到了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历史系。“1975年右倾回潮,张承志和他的朋友经历了第三次抵抗投降。”“他的‘抵抗投降’从来没有反叛过社会和掌权的统治者。”“文革”后,产生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张承志没有和上述任何一类人同流合污,“从模仿艾依玛托夫开始,描写自然和‘人’,绕过了令他尴尬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随着时代发展,他当然也要变,1991年后他成了伊斯兰教派的精神领袖。“他什么时候抵抗过投降呢?”(仲维光:《卫道的张承志,顺道的王朔——鸡蛋是从大头吃还是从小头吃的争论》1995.12)

[25]《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3期。

[26]池莉:《中国不需要矫情》《小说选刊》1992年5期。

[27]孙书文:《边缘与解构》《21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

[28]《眺望人生》何顿 作家出版社1998.4 专题讨论:《眺望人生》

《新创作》1998年5期。

何顿(何斌)1958年生于湖南长沙,1977年到开慧公社开明大队下乡。1979年考入湖南师大美术系,1989年发表小说,已出版多种中、长篇小说,被评论界视为90年代"新状态"或"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

[29]季红真:《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宗教意识》《文学评论》1996年5期。

[30]张承志:《清洁的心》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31]仲维光、还学文:《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 德国鲁尔大学出版1994年。

[32]《我与地坛——史铁生散文小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杨晓敏:《突围:生命的追求——史铁生论》《上海文论》1990年5期。《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

[33]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12。

[34]河拉:《在道德失禁的激情中作秀——梁晓声批判》、《十作家批判书》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1。

[35]方克强:《小说家与现代神话——评柯云路的"人体——宇宙学"三部曲》《作家与争鸣》1998年6期。

[36]柯云路:《生命特异现象考察——前言》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10。

[37]刘沐:《柯云路,该醒醒啦!》《作家与争鸣》1998年6期。

[38]方克强:《小说家与现代神话——评柯云路的"人体——宇宙学"三部曲》《作家与争鸣》1998年6期。《谁来管一管胡万林》《科技日报》1998.11.6。鄢烈山:《柯云路是否涉嫌共同犯罪?》《南方周末》1998.3.13。

第十二章

后新时期的知青文学

知青文学在90年代经历了由盛至衰的过程。

90年代前期,"知青文化热"持续升温,席卷全国。知青文学以通俗文学、电视连续剧的方式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知青文学在90年代持续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虽然知青群体已经融入城市,特征日渐淡化,但是知青群体作为一种虚拟性存在,仍具有实用价值。他们是习惯于集体生活,精神上依赖于集体主义的一代人。知青文学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精神家园,一种话语权势。

进入90年代后期,知青群体的分流达到极致,他们中既有百万富翁,也有下岗工人,贫富差别十分悬殊。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经济利益,都已经两极化。知青作为一个虚拟的群体继续存在,对于强势群体已经是不必要的了。对于他们而言,昔日的群体话语(知青文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这就为知青文学的衰落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知青文学在90年代后期,逐渐出现颓势,题材日益泛化,作品数量锐减,终于在世纪末开始全面退潮。

一、对知青运动的再命名

1. 命名，再命名——从“青春无悔”到“劫后辉煌”

90年代初“知青文化热”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北京的东北知青1990年率先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岁月回顾展》，参观的知青和亲属达15万人次。继“北大荒知青回顾展”之后，各省、市知青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天津、成都、昆明、广州、南京、武汉、厦门等地知青先后举办了“青春无悔”、“春华秋实”等知青岁月回顾展，各种知青研讨会、知青联谊会、老三届同学会、知青返乡会先后成立。[1]

北京北大荒支边知青于1990年举办的《黑土地回顾展》和“回顾展”组委会组织编写的《北大荒风云录》，首次提出“青春无悔”的口号，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形中为各省市的纪念活动和回忆录的编写，提供了思想主题。“青春无悔”是在后新时期，对知青运动史的一次再命名。

“青春无悔”口号的产生过程，表明了这一重要命名，从一开始便受到主流社会的影响和引导。《黑土地回顾展》在策划、编辑之初，冒有一定风险，必须与主流意识形态寻求某种妥协，达成一种和谐。梁晓声说：“《黑土地回顾展》绝大部分文字出自我笔下。姜昆他们做了局部的删改补充。出自我笔下的文字，总体调子似太沉重和悲怆。姜昆他们加入些轻松的亮色。我认为他们的删改补充是必要的。否则，‘回顾展’也许难以成为事实。”[2]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青春无悔”的命名，原来是由“悲壮的青春”的命名者梁晓声参与提出的，难怪两者之间如此的水到渠成。梁晓声已经指出，“青春无悔”的提出，是在主流社会无形压力下提出来的，虽然不能说是言不由衷，多少有一点身不由己。在当时不可能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反对“青春无悔”的主题，展览根本就无法举行。

主流社会不无欣悦地接受了“青春无悔”的口号。虽然相当多的知青

在当时就表示不满,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没有发表的渠道。

"青春无悔"成为各地知青回忆录的中心思想,整个群体以"个人方式"将"青春无悔"演化成为一部个人口述历史。这种口述历史,风行了整整十年。

"青春无悔"作为返城知青的新精神源泉,在90年代的"城市奋斗篇"中被续写下去。梁晓声反映知青返城生活的长篇小说《雪城》、《年轮》,先后被拍摄成电视连续剧,产生广泛影响。按照"青春无悔"的叙述逻辑,必然会推导出返城后的"劫后辉煌",这是被一种信念(先验理念)所确认的。

《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一书在1995年出版,以28位知青成功者的奋斗事实,印证了注定的"劫后辉煌"。[3] 描写知青到海外"洋插队",取得劫后辉煌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迅速成为畅销小说,《北京人在纽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受到社会广泛的欢迎。

此后"劫后辉煌"成为90年代后期知青群体的新神话,作为新的精神加油站,继续为知青群体提供精神支柱。在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1998年)的纪念活动中,不论是上千的大型聚会,还是几十人的同学聚会,都由"劫后辉煌"的主题来凝聚,被"辉煌"的气氛所笼罩。一些知青聚会,无形中成为集体分享成就与光荣的聚会。

2. 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分歧——"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

(1)主流社会对知青话语权利的控制

60年代以后,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是由"文革"当局制定的,知青返城后对这段历史的再认识,也是在当时主流话语指导下做出的。知青群体从未对决定自身命运的这场运动,以及自身的性质进行过独立的判断和命名。因为知青在社会上一直属于弱势群体,从未获得过充分的话语权利。

80—90年代有关知青运动的文学描述,一直受到传媒严格的控制。

长期以来，人们可以在电视中看到根据梁晓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却不会看到另一类知青作品（如《波动》、《血色黄昏》）。所有涉及知青历史和活动的宣传、报道，都被严格限定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

90年代初，重新出版了新时期的知青小说，如《蹉跎小咏叹调——知青小说》（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内收16位知青作家（王安忆、徐乃建、甘铁生、韩少功、陶正、陈村、梁晓声、张承志、张蔓菱、史铁生、乔雪竹、李海音、陆星儿、吴欢、铁凝、阿城）的代表作品。

中央电视台在1996年前后，曾播出知青回访陕北、内蒙古、东北兵团的采访节目，舆论导向是非常明晰、坚定的，主题基调必须是"青春无悔"、"劫后辉煌"。一个在电视屏幕上谈论回城后如何成功奋斗的知青，受到了许多知青友人的责难，他认为自己被冤枉了，原来"第12演播室"的主持人在采访他时，曾答应完整地进行报道，但在播出时却将有损"辉煌"的部分删节了。

1993年后，知青研究著作的出版受到限制，直到1996年才逐步开禁。社科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才出版了相关的史料和学术著作。定宜庄、刘小萌的两部《中国知青史》，是近年最为重要的史学著作，但中央电视台图书栏目从未进行介绍。各报刊的舆论导向对有关知青的报道一直施加着影响。知青的社会形象，仍然被意识形态所塑造。"知青"从来不是他们自身，而是主流社会制造出来的一个"他人"。知青一直是话语的缺席者。

社会的每一点关注都使知青群体受宠若惊。1997年在延安插队某知青的孩子患病得到战友帮助，一度成为传媒炒作的热点，事后被知青们津津乐道了许久。在第12演播室拍摄的知青电视专题报道播出后，部分知青在三味书屋开会座谈，一些从事社科工作的知青，对专题片宣扬"青春无悔"进行批评，一个在座的女知青痛苦地叫道："不要说下去了，如果这也是错的，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呀！"全场一时哑然。

徐友渔指出：说来可怜，这些从来无缘涉身于社会话语空间的人，一旦听到公共话语提及自己的过去，一旦见到自身的身影掠过历史画面，就喜不自胜，而不去追问自己的形象是否被歪曲。没有人追问，这形形色色的"我们"，这随叫随到的"我们"到底是谁？林春激愤地指出：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多数"并不存在，"在通常情况下确实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支

配,大多数人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走的,而沉默的、清醒的人从来只是少数"。[4]

(2)知青群体内部的话语分歧

知青内部被主流社会承认和支持的强势小群体,总是自命为知青的代言人。在"文革"时代是如此,在"文革"后仍然如此。事实表明,知青在90年代的话语权力也被内部的小部分人所染指。这些族群实际上参与和协助了主流社会对知青形象的塑造。

1994年秋,北京举办《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由始至终贯穿着"青春无悔"的主题。主持人的朗诵词,引用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主办人显然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自负,流露出志得意满的情绪。[5]

金兆钧说:他参与策划《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时,提出应以知青创作歌曲为主,在讨论中却有大多数知青没有听过这些歌,"相反,他们对《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等'宏大叙事'的歌曲如数家珍,感情至深,以至于最后的演出版本我私下认为基本上是一场——红卫兵组歌。其原因我也在争论中才恍然大悟:至少这些老三届们几乎全是在70年代中期就已经上大学或当兵了。"某些人具有特殊社会背景,或是幸运经历,他们不大可能听到平民子弟中流行的知青歌曲。《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的演出,"最终拍板取决于可以出资的已经进入新经济权力集团的老三届们,而不是那些为自己下岗着急、为孩子入学而劳碌的老三届们。"[6]

1998年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不但没有促成群体间的联系,反而打破了知青群体统一的幻象。人们开始注意到知青之间存在的经济、社会地位上的广泛差异性。不同的思想观念在座谈会、纪念会上发生了矛盾;一部分人大谈"青春无悔"、"劫后辉煌"的老调,促使另一部分知青中途借故退场。只是因为知青已经不是一个实存的群体,加之聚会的短暂,避免了双方现场的公开冲突。

知青群体内部"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的话语分歧,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知青"族群"的思想、文化立场的分歧。多数人的"族群"无职无权,少数

人的“族群”具有一定经济、政治上的实力，后者是“宏大叙事”的支持和操纵者。

“私人叙事”一直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缺乏传媒支持，大多是以文字的方式进行表述，而“宏大叙事”本身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长期占据话语中心位置，可以通过影视、歌舞等大众媒体进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商业化推波助澜。少数人握有话语权势的人，动辄站出来代表知青大多数发言。“私人叙事”明显地被“宏大叙事”所掩盖。

“宏大叙事”的基础是国家主义，“私人叙事”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宏大叙事”是一种重整体轻个人的价值观，“私人叙事”则是一种尊重个人的价值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代表了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

二、知青回忆录的出版

1. 90年代前期的回忆录

(1)基本面貌

在90年代前期，各省市知青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这批回忆录首次全面反映上山下乡运动，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工作。它们集中反映了90年代后知青群体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思想认识。它们是历史在知青心灵中的记忆，也是时代对知青心灵的一次检阅。[7]

在这批回忆录中，《北大荒风云录》（黑龙江生产兵团知青回忆录1990年）和《草原启示录》（内蒙古知青回忆录1991年）出版较早，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由于内蒙古牧区知青的亚文化背景和民间写作历史，《草原启示录》中有关牧区的篇章，带有更多的民间色彩。这两本书反映出知青群体中已形成的不同文化传承。

随着回忆录写作的发展,对青春的情感回顾,逐步转向理性的反思,出现了一批知青访谈录,如:《蹉跎与崛起——55位知青的人生道路》(知青文化丛书,何世平主编1992年)《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金大陆编1994年)、《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金永华主编1995年)等,试图对上山下乡的这段人生经历进行理性的归纳、总结。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部分史学作品,如《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1955—1979年》(杜鸿林1993年)、《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费声1993年)、《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何岚、史卫民1994年)等。除《漠南情》是一部反映地区知青运动的严肃史学著作外,其他的作品都没有超出纪实文学范围。它反映了知青运动史书写的条件尚不够成熟。

各地知青回忆录的编写,大都是由本地知青作家、知青名人组成编委会,然后刊登征稿启事,最后进行编辑出版。采取非专业化的、粗放的、简单的编写方法。有的作者急于宣泄被压抑的情感,有的想要炫耀神奇经历,生活困窘知青的稿件很少。大多数稿件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叙述缺乏个性。稿件征集上来后,即使编委会不满足于内容的单一、重复,对有尖锐看法和悲观色彩的文章,仍然不能采用。在现实条件下,他们只能采取"青春无悔"的编辑方针。大多数回忆录,能够征上来稿件,顺利出版已属不易,也不再有更高的奢望了。

(2)文学特色

在前期的回忆录中,出现一批优秀的散文。其中文学成果比较突出的有:《草原启示录》(1992年)、《回首黄土地》(1996年)、《东方十日谈》(1994年)。

《草原启示录》具有民间的背景,一些散文是内蒙古知青当年支边时的生活札记,如李三友《放羊一天》、李大同《雅干锡力日记》等,反映出牧场文化部落的思想面貌。某些文章显露出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如《额吉淖尔日记》(夏航),真实记述了一个女知青错综细微的情感体验。《想当初》(邢奇)记述了牧区古典诗歌群落的生活,具有史料价值。相关内容在四卷五章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回首黄土地》的回忆文章，大多采取了散文形式，带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形成一种淳朴、简约的文字风格。许多篇章具有人道主义的情怀。《老善娃》(陆小娅)讲述，陕北老汉想招作者做过继子的婆姨，后来老汉出彩礼讨了婆姨，却在正月初一被拒之门外连个白馍没吃上，跳崖而死。《"来婵儿"》(王小强)讲述，知青教师与农村女学生的"爱情故事"，来婵儿当时只有11岁，"身材瘦小得与年龄不相称。一脑袋乱草似的头发，一身被汗水浸透过不知多少遍的烂衣裳，黑黑的一双小手，严冬腊月还光着脚丫，满山遍野地跑。不同的是，她有一对略微发黄的大眼睛，大得与她那张肮脏稚气的小脸几乎不成比例。"这些文章流露出作者与乡亲的血肉联系。

《东方十日谈——老三届的故事》是一本故事集，集中了不同类型的散文，其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有很大的差异。

《我的人生"三大纪录"》(刘宝华)记述东北兵团2师12团5连于1970年冬天，开进荒原的经历，讲述垦荒的苦难和连队干部的腐败。《一场山火》(卢民)讲述东北兵团某连参加救火，由于副连长错误指挥牺牲14名知青的事件。《借书三记》(肖复兴)，记述了文化专制时代的个人读书经历。这些文章中没有猎奇和炫耀，文字简朴，叙述客观，富于感情。

另一些作品，采取了"传奇"的文学样式；赞美的是传统道义和品质，如《"鸡公"斗蟒蛇》、《卢小雪抗婚》(戴周麟)和《"天兵天将"录》(傣金龙)等。《"鸡公"斗蟒蛇》描写贫困的知青孝子，勇斗巨蟒。《卢小雪抗婚记》讲述知青哥用假手榴弹保护山村姑娘。这些知青被描述成具有侠义品格的传奇人物。有的文章(如《"天兵天将"录》)则满足于奇闻逸事。它们明显受到古代笔记小说和唐代传奇的影响。

(3)生存主义与人道主义

知青回忆录虽然都是当事人口述笔录，但是很难说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回忆录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是"悲壮的青春"、"青春无悔"。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大多为血泪史、磨练篇、悼念亡友等带有传奇性的故事，越苦越光荣，似乎不悲壮、残酷就不足以向人道，它们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

许多回忆具有猎奇性，这些故事很像是《天方夜谭》。这些回忆还是

一种古代叙事,而不是现代叙事。它忽略了一般性场面的描述,忽略了个人情感的价值,忽略了历史反思。尽管不同省份的回忆可以相互对照,均有史料价值,但是思想内容和观察视角的大多雷同,降低了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A. 生存主义与古代叙事

许多知青回忆录对知青生活的理解,明显带有生存主义的哲学立场。

《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在诸多回忆录中,是比较出色的一本,它开始注意到对回忆内容进行分类,对思想进行归纳总结。它存在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在第三天的前言中说:"大凡有经历的人,在检阅人生时,总能拎出一串串'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或惊险,或怪诞,或荒唐,或惨烈。这并非是做作和编造,也并非是巧合和奇遇,实在是因为人生的经纬被某种犯规性的张力撑开后,生活的跨度和节奏突变了,生命便要承受种种(有天灾也有人祸)的袭击和冲撞。有的因为年轻,因为狂热,因为脆弱,被噩运吞没,成了冤魂;有的因为勇敢,因为机智,因为坚韧,则拥抱了幸运,成了强者。"

《东方十日谈》的传奇故事令人联想到古代传说和童话。古代童话往往讲述,主人公与神秘莫测的命运进行游戏,反映了古代农民崇拜命运、崇拜狡猾、崇拜胜利者的价值取向。它拒绝的是脆弱和噩运,赞许的是勇敢、机智、坚韧和幸运,服从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当年上山下乡的环境类似于丛林,插队当地家族、派系的复杂性,食物的稀缺,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文革"政策的多变性,都造成生活的不可预期性,转化为一种莫测的命运感。一些知青把这种社会的古代性和动荡性,当成了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和生存规律;从生存哲学出发,建立自己的人格观、价值观。编者所赞许的品格,实际上来源于生存主义的需要,它们是一种类似于丛林走兽式的品质。

在许多知青回忆录中,片面地歌颂苦难,缺乏抗争强权的描述,有的甚至流露出对权力的崇拜。显然,不仅掌权者会被权力腐蚀,受压迫者同样被权力腐蚀,压迫也具有腐蚀性。

在某些回忆录中,知青描写在农村如何偷鸡摸狗,不仅毫无羞愧之

感，反而有些洋洋自得。孟子说"无恒产而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之能"，作为无恒产的下乡知青，特殊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他们的二流子习气。说得好听是江湖气重，说穿了实际上是流氓无产者的品质。恶劣的社会环境，导致知青群体中普遍流行道德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

B. 生存主义与人道主义

许多知青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饥饿的经历。许多文章的主题就是吃，如《鹰汤》、《什么都吃的南蛮子》、《知青生活断忆》等，他们吃死猪、黄鼠狼、猫头鹰，吃一切可以放进嘴里的东西。叶延滨说：我在陕北插队近三年时间，最大的愿望有三个，"第一是吃，第二是吃得饱，第三是能吃到一顿好饭食。"（《黄土塬上的破窑洞》）宋元说："生存是当时的首要任务。我们第一回明白了吃饭的真正意义。""如何搞吃，成为知青普遍具备的基本特长。"（《一个巨大的话题》）[8] 文章如果仅止于此，就不可能具有严肃意义，它既不属于文学的命题，也不是现代思想的命题，它们甚至不属于人道主义的范畴。

许多回忆录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这样一类生存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二律背反"问题。《青春方程式——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1994年）是柏林自由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女知青研究课题，带有妇女研究性质。该研究课题试图对中国女知青的婚姻、生育等女性特有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可是当事人的自述，令人费解地绕开了女性问题，把调研工作引入了怪圈。

大多数叙述者都忽略了女性对生活的独特视角，重点阐述如何走出农村，幸存下来。作为"女性口述史"，它们毫无特色，编者承认"这纸上的故事，远不是我们心中的故事"。女性立场消失的同时，叙述中大量涉及到自杀、截肢、精神病等，更尖锐、更残酷的生存问题。

《第一次的茉莉》讲述，女知青插队到一个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困村子，当北京来的军代表在知青座谈会上允诺说：谁能扎根农村就给他所在的村子一台拖拉机。这位女知青毅然站起来说："我。"为了一台拖拉机，为了拯救一个村庄，她舍弃了相爱十年的男友，她的命运也就此被改变了。叙述者的回忆充满了痛苦与矛盾。显然，在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情境中，谈不上人道主义，也谈不上女权的问题。[9]

如何将人道主义立场带入历史回忆,对于知青来讲还是一道难题。知青作者横跨古代和现代两种社会,面对着生存和人道两种法则,是承认"文革"时期农村社会的古代法则,服从它的现实合理性?还是超越历史现实,坚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呢?这种"二律背反"给回忆者带来了很深的困惑。

2. 90年代后期的知青回忆录

90年代后期的回忆录写作,由老三届扩展到小三届(69、70、71届),沿伸到"文革"前支边知青的回忆,如同大潮由中心波及到边缘。不同城市和地域的各届知青先后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留下自己的青春足迹。

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知青回忆录的出版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

全国各地出版社策划、组织出版了一批知青回忆录,如《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国知青情恋报告》(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8)、《老三届采访手记》(朱文杰,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9)、《老知青写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0)、《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这些回忆录,大量采用照片,并附有对图片的说明性文字。

各地的报刊杂志也开辟了相关的纪念栏目。《北京文学》1998年6期发表《中国知青专号》。《厦门日报》1998年9月"人生"版推出《老三届故事》特辑。《新创作》(长沙市文联、长沙晚报联合主办)1997—1999年开办知青专栏"那年那月"。此外,还出版了《中国知青诗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1)写作规模与角度的变化

1998年前后的知青回忆录书写,其规模、深度较90年代前期有了一定的进步。

《老知青写真》(裴雨林、黄进基、金大陆、田大卫1998年)打破城际界限,对京、津、沪等大中城市的北大荒知青,进行了跨城际的征稿,首次实现

了打破城际界限的集体书写。

长期以来对知青弱势群体的报道一直很少，弱势群体往往回避知青聚会和回忆录的写作，所以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这部分群体恰恰最能体现上山下乡运动的实质，反映这一运动的实际结果。一些回忆录编者，开始注意反映弱势群体的声音。《老知青写真》编者阐述该书的编辑方针说："本书特点之一正是集中聚焦这些普通人"，"倾听普通人的心声格外重要"，"正是不同的感受，汇成了对那个年代知青生活的客观真实的反映"。

有的作者开始关注留在乡村的知青。《北大荒羁旅》（朱晓军 2001 年）一书，着眼于仍然留在北大荒的两万知青的生活。作者多次赴北大荒的建三江、红兴隆、宝泉岭、牡丹江等垦区，走了二十多个农场，采访了一批留在当地的知青。

作者伤感地写道："他们与曾养育自己的那座城市越来越遥远了。随着父母的相继离去，他们与城市的脐带渐渐萎缩了，枯干了脱落了……当他们回到那座在情感上属于自己的城市，发现那些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家门的街道消失了，那座被思念抚摸得铮亮的故居不见了，在那陌生的街道，陌生的楼宇之间，走着陌生的人，蓦地他们感觉到在这座城市已是外乡人了……"[10]

留在农村当地的少数知青，有的成为当地的骨干，但相当多的人患有多种疾病，无钱就医；有的为了子女的未来，携子女回城就读，两地分居。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进行了十年，它也影响了知青几代人，影响了他们的家族史。这部分知青就像是凝固的历史，将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悲剧持续到世纪末。他们就像是一面镜子，从另一个角度映照出了一代人的命运。

（2）浓重的自恋情绪

进入 90 年代后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到中年的知青一代，难免要依恋青春，并渴望得到肯定。回忆录的编者、作者都把书写这段历史，作为向世人证明的一次难得机会，想为世人和后代，留下一段值得夸耀的悲壮、传奇的故事，一个英雄主义的集体群像。回忆录是他们为青春树立的一座纪念碑。

《武汉知青回忆录》的代序说："如今，当年的'知青'们，已经齐齐整整

地走进了中年。我们的孩子们,也到了我们上山下乡的年纪,只是比我们那时更高大更健壮更漂亮。"知青一代"他们还会老下去。他们终将告别这个世界。但他们以自己特殊的生命岁月凝成的青春塑像,会站立在这个世界上。"[11]

《北大荒羁旅》(朱晓军)用北大荒垦区年产90亿公斤的粮食和"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来证明北大荒知青的青春价值。与此同时,作者自相矛盾地介绍了国内媒体报道:北大荒要退垦还荒,北大荒的大面积湿地是自然之肾,大面积开发使其均化洪水的功能下降,洪涝灾害率加大。"青春无悔"的结论,不攻自破。

吉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可以说是主流话语的代表。该丛书,共收了12位著名知青作家(陈建功、高洪波、肖复兴、叶辛、赵丽宏、陆星儿、张抗抗、王小鹰、毕淑敏、范小青、叶广基、贾平凹)对青春时代的回忆录。丛书总序称,这些著名知青作家可以代表整个知青群体,成为评判上山下乡运动的权威代言人。[12]

丛书高唱"青春无悔"、"劫后辉煌"的颂歌,对老三届充满了溢美之辞:

> 作为一代人而言,他们是不可逾越的,无论从政、治学、经商、务农、做工、弄文,还是个体民营,他们在各条战线上都充当着中坚力量,都为共和国的振兴而不懈地努力奋斗着。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是一种人生境界;失于东隅而乐天奋进更是一种时代精神。反思历史砥砺修身而不再做傻事则是一种桑榆智慧。这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
> ——《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后记 1998年

丛书的编者批评了重新书写知青文学的企图,否定了生于60、70年代的晚生代参与知青文学写作的必要性。编者说:近来"颇有一种似乎标新立异的说法,认为'知青文学'似乎不应只能由知青中的精英来写,或者干脆不应只能由知青来写,或者主张写也只能是大骂一通才算到位,把那个时代再揭个鲜血淋漓才算真实……知青文学还是由知青们来写最好,只有亲历者才有亲知……局外人的评价又有多少是中肯有据的呢?"

同类反映主流话语声音的出版物,还有《老三届采访手记》(太白文艺

出版社 1998.9)。该书中辑录了著名知青作家 53 人的语录,这批"知青作家语录"是他们在世纪末对知青运动的一种历史性的总结和反思。

对一代人的青春价值如何评判,是大多数知青难以解开的心结。急于证明自己的青春价值,证明自己的英雄主义,这种情绪的背后,恰恰掩盖着一种青春丧失的绝望和焦虑。

(3)古代的叙事立场

后期回忆录同前期一样,仍然充满了大量蒙昧的、难以理喻的传奇记录。上山下乡被晚生代视为"天方夜谭",难以理解和相信,除了历史隔膜之外,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古代叙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历史上曾发生过类似的历史遗失的可悲情况。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述了公元前 6—5 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城邦间的战争,《历史》在书写希腊史时,采用了古代文化的历史叙述,在书写亚细亚落后民族的历史时,则采用了当地上古文化的传奇叙事。如《历史》中记载,埃及小偷偷走了国王的黄金并玩弄了公主,得到了国王的敬佩,并数招为驸马。这种离奇、神话般的故事竟成为埃及的正史。只有脱离了上古叙事的希腊民族才拥有了古代历史记录,而仍处于上古社会文明中的亚细亚民族的历史,则仍然沉沦在"山海经"般的传说之中。[13]

在现代社会,人掌握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命运不再神秘,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现代文学早已超越生存的命题,它侧重表现人们内心思想情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从现代文化体系看来,知青当事人的身份并不能保证叙述的可信性。如果当事人不能找到现代的、人道的价值立场,他们的历史就无法融入现代话语体系,从而使这段经历失去真实性。要使青春岁月不被湮灭,他们就必须使自己成为现代人,使自己的表述成为现代的表述。

许多学者对知青回忆录提出了批评。徐友渔指出:"若干年来,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书籍、文章有如汗牛充栋,但很少见到有人从人权、从个体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受教育权、居住权、择业权的角度谈问题。""广大农民明明也是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到的一方,这场声势浩大的迁徙运动无疑也涉及到了他们的基本利益,但从来没有文章从农民的角度作评论和检讨

……"[14]应该从人权的角度来审视这场运动,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去关心具体的人,因为是具体的知青个人承载了这场运动。

90年代全国各省市的知青回忆录,都表述同一个主题"青春无悔",一千六百万知青的生命实践、思想历程,被知青们自觉归纳到一个又一个思想主题中去,这一事实反映了知青一代独立意志的缺失。长期以来,知青群体的集体主义光辉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在群体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许多人仍然依恃集体的幻想来生活,仍然生活在旧思想方式的束缚中。

在整个90年代,知青回忆录的编写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处于群体一般性书写的阶段,写作是集体性的、仓促和浮泛的,只是为了满足知青群体的一种社会性、情感性的要求。没有出现具有保留价值的个人回忆录。没有出现编辑、记者、作家、社科工作者和出版社的联合工作,没有形成专题、学科的研究。长达数十年涉及千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只得到这样贫乏的收获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三、知青文学的影视化和商业化

进入后新时期,严肃文学开始全面萎缩。知青文学主要通过影视媒体,通过通俗化、商业化的渠道发挥影响。如果说80年代知青文学是建立在"权力—知青"话语基础上,那么到了90年代,知青文学是建立在"权力—商业—知青"话语上。

在文化工业和娱乐业迅速发展的90年代,知青题材作为一种商业资源,它所具有历史主题、传奇性和受众群体等因素,受到娱乐业的注意。在市场因素的推动下,图书、音乐和影视市场开始染指知青题材。如1995年4月北京音乐厅连续两周上演献给"老三届"音乐会《呼唤——我们心中的歌》,全部由专业人员演出,明显带有商业色彩。另一典型例证是90年代流行一时的歌曲《小芳》。歌曲作者是未曾下乡的晚生代李春波,他装扮

成一个知青,运用了戏剧性的叙事手法,讲述了一个甜俗的故事:"一个姑娘叫小芳,生得美丽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坐在小河旁","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渡过那个年代"。这就是晚生代制造的知青传说。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在2000年有一则曾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鼓励下岗工人的公益广告,它是由保险公司投资拍摄的。片中"公益歌曲"《老王》的作者,也是一位晚生代。歌中唱道:"哦,老王,你曾经上山下过乡,'大有作为'在广阔天地闯荡","你像一颗螺丝钉,被拧上陈旧的车床","清晨起来你的叫卖声,大饼、油条、热豆浆。哦,老王,老王,我祝你身体健康!"知青被塑造成为一个勤劳、老实的下岗工人形象。这是主流话语制造的另一种知青传说。

在文化商人、娱乐业染指知青文化资源的情况下,一些知青小说被先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这些反映知青生活的通俗传奇剧,有很高的收视率,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1997年中央电视台和16家省市电视台,委托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进行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在26部反映强烈的电视剧中,全国抽样调查的结果,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电视片,《孽债》列第10位,《年轮》列13位,《北京人在纽约》列14位。在大城市抽样调查中,三片排名均有所提前,如深圳抽样结果《北京人在纽约》列第6位,《孽债》列12位,《年轮》列13位。(《雪城》由于某种原因,未被列入调查名单。)这是与包括《宰相刘罗锅》、《包青天》在内的诸多剧目竞争出来的结果,成绩可谓不俗。[15]

在80年代,社会大众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了解,主要通过几部电影(《我们的田野》、《今夜有暴风雪》、《大桥下面》),主题是"伤痕"、"悲壮的青春",人物还是个别的、小群体的,内容也是片断的;到了90年代,社会大众通过电视连续剧,对知青的了解则从上山下乡扩展到红卫兵、知青、返城青年的全过程,成为全景式的、史诗性的,文学主题也发展为青春无悔、劫后辉煌。如果说80年代的成功,是作品与观众在精神上的契合,那么,到了90年代,则是作品与观众在商业消费上的契合。

知青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类似于弱势群体,社会大众对待知青群体的态度,一般是漠不关心;至多是对有戏剧性、传奇性的知青故事发现一点兴趣。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知青文学的内容,影响到知青形象的塑造;要

使处于弱势的知青群体被主流社会接受和广泛注意，为了赢得社会抚慰和赞叹，有时就不免做出些英雄姿态或小儿女态。

1993年4月《中国电视报》在介绍电视连续剧《中国知青部落》时这样写道："迄今为止的历史，也许可以证明如下断语：没有一个时代，有如此众多的青年，如此集中的经受这么多困顿磨难、惆怅和迷茫，这么多的人生变幻，以及最后的理想主义的覆灭与重建。"[16]

1995年3月，电视台同时播出反映知青返城后的生活状况的大型电视连续剧《遭遇昨天》、《荣辱商界》。20集电视连续剧《遭遇昨天》写一批陕西延安插队知青，返城后再次相遇后，社会地位、人物关系发生错位、颠倒，相互间发生感情纠葛，造成婚姻关系的重新组合。20集电视连续剧《荣辱商界》写三位同在北大荒插队，后来分别担任三大公司的总经理的同学，他们在感情、权力、经商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观念和作法。这些剧目都以通俗化、商业化的手法来处理知青题材。[17]

1. 电视连续剧《雪城》、《年轮》

《雪城》(梁晓声1988年)、《年轮》(梁晓声1994年)于1994、1996年被黑龙江省电视台先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反响，并受到报刊好评。

长篇小说《年轮》从1961年写到80年代，描写了几个知青由"文革"前到新时期，将近二十年的人生变迁，整整一代人的历史跨度。梁晓声说："《年轮》于我，初衷并非是重操什么知青题材的'旧业'，而是写一些曾当过知青的城市中年人今天的生活形态。"[18]

《年轮》是《雪城》的姊妹篇，它继续着《雪城》悲壮的青春故事。主题思想由"悲壮的青春"发展为"青春无悔"。

《年轮》随意设置人物命运，通过戏剧性的人物关系，造成强烈的戏剧效果。"青春无悔"中，开始渗入一种人到中年的愁绪。作者评价步入中年的知青，是被时代定型后，又被发展的时代遗弃的一代人，群体意识正在沙化。

电视连续剧《雪城》、《年轮》播出后，在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从而真正确立了"青春无悔"在后新时期知青文学中的主题位置。这是梁晓声继

"悲壮的青春"叙事后,对知青文学叙事的又一重要影响。

2. 长篇小说《孽债》的发表与拍摄

在上山下乡运动退潮后,知青返城后的问题曾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在80年代曾产生过许多反映知青就业、婚姻问题的文学作品。进入90年代,知青留在乡村的子女问题,开始被媒体报道出来,由于这一问题带有伦理色彩,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反映知青子女进城寻父的长篇小说《孽债》(叶辛)1992年7月出版,这是一部具有商业化色彩的通俗小说。《孽债》1996年被上海电视台拍成电视连续剧后,有很高的收视率。小说也由于电视剧的宣传,一时成为畅销书。这部小说和电视连续剧造成的震动是极其表层的,它并未真正打动知青和整个社会,引发什么心灵震动,它不过是讲述一件历史的逸事,为都市提供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

叶辛在1982年曾创作反映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孽债》的发表正好是在十年之后。叶辛在90年代已经成为公认的著名知青作家,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常委,中国作协理事。时过境迁,叶辛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蹉跎岁月》与《孽债》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是浪漫主义的,后者是世俗化的;十年过去了,很难再从《孽债》中看到作者以往的理想情怀。澳大利亚出版家曾问"孽债"一词的意思,老翻译家任溶溶将其翻译为"难以还清的感情债",得到了作者的首肯。在小说中,这种感情债并不是指上海知青对云南人民内心所欠的感情债,而是指城乡男女的私人情债。

作者对边疆情缘和都市婚姻都不曾加以渲染和美化。"乡恋文学"中的美丽乡村已经消逝。没有美丽的田园,没有美妙的梦想,只有直截了当的两性相悦。从云南来的孩子、前妻,也不曾作为人民的代表加以神化,云南孩子到上海后,跟着坏人卖毒品、玩女人,前妻则不过是一个衰老、忠厚的乡下女人。

当年的男知青沈若尘只是在回忆中对前妻子有些许歉疚,更多的则是诚惶诚恐地面对妻儿的怨愤。沈若尘是一个怯懦的上海男人,里弄女人的议论,妻子的吵闹回娘家、报复性地与人通奸,儿子用铅笔刀刺伤前妻女

儿美霞,以及美霞的出走,这一切把沈若尘搞得心力交瘁。由于上海没有给外来人提供空间,美霞被迫离开上海,但在她上火车时,却表示一定要通过考大学回到上海。

小说真实地表现了大都市的人欲横流,脆弱的家庭,狭小的弄堂,寂寞空虚的男女,夫妻间性的维系。小说描写,沈若尘与妻梅云清行过房事之后,在性事的圆满快慰中思考,如何向妻子交待自己有一个私生女。小说描述了各种性事(夫妻性生活和各种偷情),这些性事的描述究竟是服务于主题,还是由于一种商业策略呢?

> 他嘴里呼出的气息不好闻,她把头转过去避开他急促的喘息。他的手轻抚轻揉任凭他抚慰着。反正她今天是不去上班了,上午要去会安永辉,她的儿子。晚起一点没关系。再说,即使起早了,屈显亮也出不去,总得等八点过后,弄堂口马路上人流稀少些,他才能离去。随他吧。自从程锦泉去了日本,她每天拂晓醒过来,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很久没有男人伴她在清晨欢悦嬉戏了。
>
> 屈显亮的手带着磁电让她歇息了一夜的躯体感觉舒畅和荡遍全身的刺激。他的嘴也探索般吻着她身体裸露的部位。这小子,他该去漱个口再来吻她的。她的头摇来晃去不让他亲自己的嘴。她毫不掩饰地轻哼轻叹着表示自己感觉到的快意。
>
> ——《孽债》

在叶辛笔下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青年,如今已经完全市井化了,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它们曾成功抵御了农村的改造,却在返城后迅速消失在大城市生活的海洋之中。在《孽债》中,除了那几个从云南来的孩子可以证明他们曾有过一些非常人的经历外,他们已经完全不具有异于市井的任何文化品格。上山下乡运动像是一场幻梦,消失在人生的长河之中,在知青心中留下的伤痕,也不过是一笔令人心烦的孽债。

四、"悲壮的青春"叙事的发展

"悲壮的青春"叙事，在90年代开始发展成为一种历史的表述。在这一期间，出版了一批描写知青运动全景的报告文学，将叙事的理念变成了历史的真实画面。

"悲壮的青春"叙事，在90年代发展为"青春无悔"、"劫后辉煌"，描述由乡村转向城市，由知青生活转向知青后的生活，由插队转向城市创业、海外创业。

1.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
——"悲壮的青春"叙事的历史化

在90年代出版的一批大型知青报告文学，对"悲壮的青春"叙事，进行了历史化的表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反映云南知青返城内幕的《中国知青梦》(邓贤 1992年)。

成都知青邓贤为撰写这部长篇报告，采访了3000公里的边境线，27个农场，几百名知青，首次引用相关政府文件，全景式地再现了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悲壮历程，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血泪控诉，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激烈批判。这在90年代初，是十分可贵的。这部作品出版后立即在知青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知青梦》没有能超出"悲壮的青春"叙事的框架。如果说，《今夜有暴风雪》是一部文学史诗，那么《中国知青梦》就是一部历史的史诗。它将"悲壮的青春"的虚构叙事变成为历史的真实场景。

邓贤在1990年刚完成《大国之魂》长篇纪实报告，记述抗战期间中国远征军的悲壮历史，已经形成史诗的创作风格。在《中国知青梦》中，作者

再次采用了宏大的叙事,宏伟的场景,全景式的扫描。作品中充满了各种苦难的场面,传奇的经历,悲壮的激情宣泄。

请愿、卧轨、游行等集体行动、返城目的非常明确。知青请愿代表一再申明,自己决非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具有成为标准城市居民的资质。一代人乞求的只是被社会接纳,被国家接纳,被体制接纳。我们不是要求知青群体做超出利益的行动,而是反对把简单利益趋动美化为一种超私利的博大精神,混淆成忠诚奉献、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云南知青并不是作为抵抗上山下乡运动的反叛者和觉醒者,而是作为失败的逃亡者,争相逃离农村。知青群体作为败阵的军队,他们必须面对失败,并且进行反思。而《中国知青梦》却把巨大的崩溃、苦难,变成一场史诗般的颂歌,它为知青一代人洗刷了耻辱,使他们躲过了心灵的自责,获得了廉价的安慰。

作者以理想主义的情怀赞颂"悲壮的青春",他所掌握的丰富历史资料,由于难以通过狭窄的理念瓶颈,无法得到充分开掘。这是一部充满激情,却缺乏思考、缺乏新发现的著作。

孟繁华指出:"80年代以来,云南知青当年种植的橡胶树,已有90%,甚至100%地死亡了,它无情地诠释了那场荒唐的空想运动。即便如此,面对死者和古战场般荒芜的橡胶林,邓贤仍诗性地赞叹:'不管怎样说,这些拓荒者的生命没有白白燃烧,她们毕竟化作胶林,化作照亮边疆夜空的星群,化作装点山川大地的一片新绿。不论她们是否创造过伟业,作为一代人曾前仆后继为之献身的拓荒大业的永恒坐标,她们的殉难本身不就是一种灿烂,一种理想主义和人类精神的生动化身么?"'这种不能成立的悲壮使邓贤仍没有超出梁晓声的认识框架。他们急于评价自己,证实自己,这种青春自恋症削弱甚至淹没了对这场荒谬运动的反省和认识能力。"[19]

《中国知青梦》这种"悲壮的青春"叙事,是用"苦难崇拜"偷换历史主题,以一种悲剧价值取代现实价值。其实苦难并不能天然地给人带来荣耀,作为奴隶而受苦和作为战士受难,两者并不相同,前者只配得到蔑视,后者才能得到敬仰。

满脑子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知青,无法面对青春无意义的历史现实,只能把苦难当成自己的荣耀,视为骄傲的资本。这种苦难崇

拜，只是一种虚幻的自我圣化。这种变态的心理，说到底是源于知青群体性的心理失衡。《中国知青梦》对苦难的歌颂和崇拜，迎合了他们的这种精神需求。如果说，上山下乡曾是一场悲剧，炫耀这种苦难则只能使它变成一场可笑的闹剧。

2. 长篇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悲壮的青春"叙事的发展："劫后辉煌"

90年代初，一批反映知青"洋插队"的作品开始出现，如报告文学《国际大串联》（张胜友）《中国知青在外国》（丁雨雨）等，在图书市场的影响下，还出现了采用畅销书的写作方法的小说，如晓剑的《中国知青在海外》，用20篇启示录（现代、灵魂、欲望、拼搏、荒蛮、生存、文明、爱情、仇恨、神圣、社会、沉沦、乡恋、文化、罪恶、尊严、流浪、丑陋、死亡、命运），分述了知青在国外的种种神奇经历。[20]

自传体长篇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于1992年发表，很快成为畅销书，作者周励本人也成为传奇人物，报刊杂志对作者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报道。这部长篇小说被称为中国知青在海外洋插队的一部奋斗史。它在"劫后辉煌"提出之前，就完成了这一命名的文学叙事。

周励在小说中描写，她在红卫兵时代的理想和反叛精神，在北大荒的浪漫爱情；通过一个中国老妇传奇般地前往海外后，又在美国经历了圆满的爱情与性，勤奋加上智慧使她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最后被人称为"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部个人传记体的纪实小说发表后，被视为中国知青征服西方国家的一份历史记录。[21]

人们一直期待着"悲壮的青春"在返城后造成"劫后辉煌"的神话，这种神话在中国大有市场，当一个海外的传奇神话出现时，取得巨大的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人们热烈欢迎他们期待已久的作品。但是文学批评界却对小说的通俗手法和世俗观念感到反感，小说虽然继续再版热销，但是其文学价值开始受到质疑。

由于周励在小说中指责某些中国留学生，于是有人在海外华人报纸上指责小说虚构。随后一些留美学生在国内报纸上著文，指责周励编造谎

言。有人说,周励以贩卖壮阳药物起家,她的生意也决非如她所说的那么成功,小说扉页上她与市长的合影,只是一种游客身份,绝非成功的证明等等。虽然这些指责只是一面之词,但是对"劫后辉煌"的叙事起到了某种解咒的效果,人们开始对故事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由于《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把财富、地位当成了成功的标志,知青留学生的"揭露"就具有了强大的杀伤力。它从一个方面显示出,知青精神在海外的巨大成功,来自观念的臆造,同时也表明,叙事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带有浓厚的世俗性质。

在90年代,一部小说如果不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它的社会影响力将是有限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因为女主人公嫁给外国商人的情节,影响了这篇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使这部小说的影响很快消失。《北京人在纽约》(曹桂林)显然更为幸运,这个在纽约创业的光辉故事,通过改编成电视剧在大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90年代后期,一些真实反映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生活的纪实性作品,先后在国内发表。如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钱宁)等著作。一个可悲的事实逐渐显露,"劫后辉煌"只是一种先验理念,一种价值虚构,而不是一种客观事实。

1999年,旅美作家陈燕妮的《遭遇美国》在国内出版,该书记录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真实经历,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在打破"美国梦"的同时,也打破了知青"劫后辉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神话。陈燕妮在2000年又出版《美国之后——50个旅美学人的归国》,介绍了留美中国学生的回国潮,讲述他们为何放弃在海外的发展,归国创业。知青在海外创业的神话,至此完全破灭。

五、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

1. 官能主义的生存——"中国知青部落"系列

"悲壮的青春"叙事,随着价值理念的崩溃,在90年代开始逐步衰落。

“宏大叙事”的价值核心处于虚位以待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机，生存主义乘虚而入，李代桃僵，成为“宏大叙事”的理念内核。在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以生存主义立场展开“宏大叙事”的长篇小说。

这些作品，使人联想到日本的官能小说和生存文学，《雪国》、《金阁寺》、《忧国》、《楢山节考》，以及《日本沉没》、《油断》等各种自然灾难、能源灾难的小说和影片。日本作为岛国，资源有限，地震不断，具有强烈的民族生存意识。在生存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官能主义的审美，例如日本民族对樱花和切腹的审美态度。存在决定意识，80—90年代生存哲学在中国兴起，根源于中国大陆在这一时期生存环境急剧恶化，产生了类似日本的资源环境。

从客观上讲，中国现当代已经进入资源稀缺，人口过剩，竞争过度的社会环境；从主观上讲，知青一代经历了三年饥荒、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返城待业，切身的经历对他们性格造成深刻影响。禁欲的年代恰恰是一个对食色充满了强烈欲求的年代，当“文革”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消解后，被压抑的官能意识开始浮出水面。

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批表达生命原欲的小说，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荒山之恋》）等，赞颂生命的原始、蛮野，表现非理性的官能冲动。

在1989年之后，随着价值理念的崩溃，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下，国家主义与官能主义开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蜕变出一种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具有新的价值观——生存至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是一种新的价值理念，新的道德理念，新的审美立场。这种道德价值和审美立场是与封建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联的。

（1）《中国知青部落》（1990年）

郭小东是著名知青作家，他15岁到海南当知青，被选拔为工农兵学员，后在大学任教。1993年已出版：《中国当代知青文学》、《逐出伊甸园的夏娃》、《诸神的合唱》、《南方的忧郁》、《转型期文学风度》等作品集。

“中国知青部落”系列，是郭小东影响最大的作品。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在1992年被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二套节目和十几个大

城市电视台播出,并在京、沪、穗和汕头召开了首播式、研讨会,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这套系列小说,代表了"悲壮青春"叙事在90年代向官能主义蜕变的走向。[22]

A. 宏大叙事和神格人

《中国知青部落》是"中国知青部落"系列的第一部,它沿袭了"悲壮的青春"的宏大叙事。作者用夸耀的口吻大谈"胜利大逃亡",五万知青集体写血书、集体大离婚等宏大场景,将知青的理想幻灭、青春毁灭,变成了生命力张扬的史诗。小说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为主题,表现出一种超个人审美尺度的"大尺度"审美观。

为了达到"宏大叙事"的规模,作者将历史事件与小说虚构混淆在一起。在楔子中,作者运用新闻采访、报告文学和政论文体,叙述1979年知青返城的真实历史事件;在后面又采用传奇小说手法,描述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作者把完全不同的文体硬性结合在一起,其目的就是要用虚构的人物(神格人)扮演历史重大事件,由诠释历史上升为编造历史。神格人演绎历史的结果,就是使历史成为神的历史。

"宏大叙事"的建立离不开神格人的创造。在价值体系崩溃后,生存主义取代理想主义成为新的价值立场。作为这种价值观的代表,就是充分体现生存主义观念的神格人。权欲、性欲、死亡恐惧三者构成了神格人生的基本要素。

小说的基本主题是性与死亡。死亡成为生命存在的镜子,只有通过死亡恐惧和求生本能才能更清楚地反映出生命的粗犷存在,体现出超人生命力的强大。

作者塑造的主人公侯过,"是知青部落中的领袖人物,他是中国第三代的极端典型。既是固执的利他主义者,又是雄浑的精神理想主义的奴隶。他渴望炼狱,渴望悲壮,渴望灵魂的完善与升华。……他领头上京请愿、卧轨。在战友们回城之际,又毅然奔赴战场。"小说极力渲染侯过在战场上的死亡恐惧,使之成为对生命存在的欣赏、赞叹。临阵脱逃和军事法庭审判,虽然是侯过的污点,却恰恰构成了他官能感觉丰富、生命力伟岸的人物品格。侯过上峨嵋山当了苦行僧,走上禁欲、自虐的道路。这个人物成为官能主义的符号,升华为富于生命力的神格人。

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倾向。女知青夏云"把国家的命运看得与自己的生命和爱情一样神圣。于是，她钟爱生命，向往爱情，也就义无返顾地把这一切贡献给神圣的卫国战争。"

当请愿的知青登上返城的列车，广播里传来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消息。"检票上车的人流，开始出现了逆向运动，已有一些知青从火车上撤下来"，一个知青抢过执勤人员的喇叭呼喊："同志们，知青朋友们，我们也是知青，我们已经决定不回城里去了。我们决定上前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错为了回城，我们不顾一切，不顾后果地闹事，写血书、静坐，卧轨，上北京请愿，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了。而这样证明我们的一切，是对的吗？不……人民宽恕了我们，体恤了我们，在他们宽容的同时，我忽然发现了我们一代人的缺陷是多么深重。……我们19号车厢的36名男女知青决定上前线，我们的血也应该洒在南线战地上。我们将用36具躯体筑成一道森严壁垒的堑壕。向昨天告别吧，知青朋友们，用我们的血，我们的勇气和胸怀，来证明我们永远不是窝囊的一代人，不是被耽误的一代人，不是胡闹的陷民族于危难的一代人。我们不再错误，不再狂热，不再漠然地生活。现在，是我们报效国家，证明我们自新自我的时候了。"

要求返城的知青，转而要求参加越战，这段描述与《今夜有暴风雪》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国牺牲是"第二种忠诚"的另一种表白，它表达了国家至上，暗示着知青急于回到社会秩序中、回到国家体制中的焦虑和渴望。

B. 官能主义与文学

小说描写的情境是丛林式的、非人的情境。在人的生存都成为问题的情境中，人道主义和基本人格不可能实现，反而成为生存的障碍。以生存为前提的情境，是兽性发挥的最佳情境。小说不是揭示人倒退为兽的可悲，而是赞叹兽性的官能体验。

小说描写了兽奸与自阉："知青许心元站在一棵倒树上，正对着一头母牛……他叫喊着，说着含糊不清的话。也许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他一次

最尽情的释放。”老兵胜德与傣族少女发生性关系后，由于“极度忏悔和耻辱膨胀了、煮沸了的血流”，“抽出步枪刺刀，撕开裤裆，抽出生殖器，一刀挥去……”

作者对性冲动表示赞许，认为它体现着生命力和生存的潜能。傣族少女为老兵胜德生了孩子，他的将军父亲来看他，他却留了下来，像是牛的精灵在神秘的沼泽中徘徊。作者把性繁殖能力符号化为一种神的图腾。

小说直接诉诸官能，制造情感刺激和官能刺激。饥饿、性饥渴等人的基本官能感受，成为文学表述的内容和审美对象。这些描述是以作者的深刻体认为基础的，反映了物质匮乏的环境对作者的影响。

这部小说采用了诗的语言。红卫兵、知青领袖、神秘荒原、高脚杯、连衣裙、女性乳房，以及宗教信仰等词语，并不代表事体本身，只是富于刺激性的字眼。当泛滥的激情，失去控制时，这些词语就构成了一种神志不清的梦呓。

性冲动与死之恐惧、生之奉献，这几种情境的对比描写，都在突出人的官能性生存。显然，脱离了人道主义，官能主义只能是一种兽性主义。它们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道德观和审美观。

(2)《青年流放者》(1994年)

《青年流放者》是“中国知青部落”系列的第二部。作者在自序和后记中，重申生存主义的写作原则：“我是以纪实为原则，以还原人的原始精神和生存真相作为创作规则”。“每个人都是天使，又是魔鬼；每个人都很现代，又很原始；每个人都很利他，也很利己；每个人都很伟大，又很庸俗。”作者声称：这部小说是为知青和下一代人写的，旨在传达历史的真相、人的真相。

小说展示的所谓现实世界、历史真相，只是生存理念的一种虚构。小说运用红卫兵运动、知青岁月与新时期，三个时代不同时空的跳接组合，以达到人生命运的戏剧性对比；作者设置几个知青领袖，几组恋情，这种组合是为了满足戏剧性情感跌宕的需要。小说中充斥着各种符号化的传奇人物。支撑故事的人物关系，并不是个性关系，而是一种理念的关系。

A. 知青群体的形象

作者"希望能于一种道德沦丧或享乐主义的泥沼中，峭拔出一种卓而不群的思想者来。"于是塑造了一批高大、深沉的男子汉形象：

知青作家汉肖邦是一个被女人们崇拜、追逐的知青作家。他是一个拯救者、施予者。汉肖邦拒绝了仰慕他的简妮发来的出国留学邀请信，毅然决定与被弟弟抛弃的残疾姑娘结合。作者称汉肖邦是"作品中最沉重最忧患而又最形而上的人"。

知青指导员麦灿辉，由于误伤人命，恋人牺牲，看破红尘，作了墓地守门人，"以出世的方式济世；以成仁去显示成功、代替成功，""终于从笼中鸟的命运降临中，寻找到另一条追近雄鹰成为雄鹰的道路"。

作者还塑造了一系列传奇式的人物。曾偷渡香港、台湾，并在台湾集中营组织过暴动，后来成为巨商的知青林尤福；流入黑社会，后返回黎母山插队地自杀的欧阳海子；"伪现代派"四处钻营的任晓远。他们都是作者要褒扬的人物，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知青群体特有的优秀品质——顽强的生存能力。这里面没有法律概念，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生活才注重过程，求生存只能注重目的。生存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价值。

这批"高、大、奇"的知青形象，明显受到"三突出"的"高、大、全"模式的影响。作者并没有走出神化人物的历史怪圈。

小说不乏对财富的描写。知青林尤福，建了34层四星级的知青大饭店，光饭店门口的全国第一石狮就花费了几十万。小说还多次提到财富的象征——名酒路易十三，流露出对财富和权势的仰慕。

> 路易十三上来，浸在冰桶里。小姐先倒了一点点在杯子里，摇匀了，送给黄阿杰，请他品尝。黄阿杰很老到地抿了一口，点点头认可，小姐便给欧阳斟上。酒气浓香，香了半个餐厅。许多食客都往这边张望。惠如楼常有大客，但路易十三却不常有。黄阿杰面露得意之色。欧阳海子也有些兴奋，他毕竟是第一次喝如此昂贵的洋酒。一口下去，就是几百元钱。他心中揣摸着这酒的分量。
>
> ……黄阿杰不在意，他一个劲地催促欧阳海子下筷。第一道菜是生吃龙虾，那龙虾被从头至尾剖开，剔出晶莹的虾肉，撒

上红萝卜丝和香菜,生蘸芥末吃,像吃日本料理。

这条龙虾足有二三斤重,少说也值七八百元,还有鱼翅等等,吃得欧阳海子有些不好意思。

——《中国知青部落》第十五章

作者炫耀的"劫后辉煌",不过是权势、金钱、名位,散发出世俗主义的庸俗气息。

B. 陈旧的性道德

系列小说表达了陈旧的性道德观念。小说将女人分成纯洁和下贱两类,或者加以神化,或者进行贬低。两性交往往往被描写成男子自大狂傲,女性逆来顺受。

小说表现出一种施虐倾向。美丽的女知青往往有着学术权威、民主人士的家庭背景,当其沦落为性压迫对象时,更易于产生官能性刺激。小说中不乏性施暴和受虐的描述。(比较典型的,如第一部第十章、车剑洪与肖湘的畸恋和性强暴。)

小说多次描写,男性凭借意志力抵抗下贱女人,塑造出道德纯洁的伟男子形象。守墓人麦灿辉与初恋情人、为人作妾的过气歌星、酒吧老板娘欧瑾重聚,毅然挣脱她的纠缠。[23]

她缓缓解去肩上的吊带,那件黑色镶金线的晚礼服无声地滑矢在红毯上。她紧闭双眼,以一种完全的迎接他的姿态,躺倒在地毯上。她完全把自己裸露在他面前,连同一切曾有过的耻辱和放荡。……她呻吟着,那声音像哭嚎像重创之后的哀号。许多年来,她在梦里向往着一个传奇般的强硬的剽悍野性的男人,这个男人此刻就在自己的怀抱中。……欧瑾整个儿压在他身上。他本能地紧紧搂住她,全身颤抖着,手脚发凉。他从未经历过女人的一切。他不知道这种诱惑是来自于女人,还是萌生于自己内心的躁动?他几乎晕眩了,几乎处于听任欧瑾摆布的境地。……他突然看见师父就站在那儿,怒目圆睁。……他看见师父手中托着一粒金光闪闪的舍利子,那舍利子是师父的珍

藏，也是他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根。

——《青年流放者》第八章

小说将官能肉欲与宗教禁欲，两种境界形成戏剧性的对比。这种描述不过是性欲与死亡恐惧对比的另一种表述。

2．蒙昧主义的生存——《中国知青秘闻录》1993年

《中国知青秘闻录》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知青长篇小说。作者晓剑是著名知青作家，曾写过《世界》、《长河》、《青春梦幻曲》、《中国知青在海外》等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并创作电影剧本《我们的田野》。[24]

《中国知青秘闻录》与"中国知青部落"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用虚拟人物贯穿历史事件，以达到"宏大叙事"的效果。小说把类人猿（杨之洋）放在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河口农场械斗、四五事件、云南知青返城请愿）的核心，从类人猿的角度来诠释历史。上山下乡成为类人猿表演的历史舞台。

如果说"中国知青部落"树立了官能主义的神格人，那么《中国知青秘闻录》则树立了蒙昧主义的神格人。作者将知青杨之洋塑造成类人猿，一个原始、野蛮，半神半兽的复合型人物。作者在序中说："主人公绝非仅仅是一种象征，他是某个特定年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类人猿，一种尚未进化为文明人的高级动物，抑或是由文明人退化为缺乏人权、秩序和法律观念的高级动物。""当人们失去理智，尤其是当社会也失去理智的时候，兽性便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从几乎每个人的心底蛇行出来，统治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

类人猿的生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人物，其母匆忙下嫁给三轮车工人。"三岁的他便由一个大学系主任的公子成为了一个只会卖力气、发酒疯、说下流话、干仗义事的男人的儿子。""他有一股流氓无产者的气质，为人处事时时像个黑社会小头目。""他爸爸虐待他母亲的方式被他全用到了女老师身上，而他爸爸吊打他的方式则被他一丝不差地用到了男老师身上。"他冲人民大会堂是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破四旧时，他只身活捉了北

京著名流氓集团“九龙一凤”,用皮带抽死了当过伪警察局长的老头子,搬倒了万安公墓中二十多个坏人的巨大墓碑,敲毁了颐和园佛香阁上五十多个小佛爷的脑袋。类人猿到云南后,只身打死了熊、虎、野猪,诅咒死了压追知青的杨副连长,开枪打死了闹事的知青。他参加了农场械斗、天安门事件、知青返城请愿。他后来在缅甸从事贩毒成为巨富。

他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知青大聚会,参加的20多个当年的联动分子,现在已是知名作家、国家军火商、美国可口可乐驻京高级职员、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影视明星、厂长、港报驻京首席记者、日本外交官夫人、国家机关副局长等;狂饮之后,一阵高歌《造反有理》、《知青之歌》、《大返城进行曲》。

“他一丝不苟地做到:他绝不欠这个世界任何一点东西,也不许这个世界欠他!”当年知青偷吃了农场的猪,他后来往农场寄了一头重达250公斤的纯种美国瘦肉型公猪;王连长曾送了他一套国防绿军装,他以“一套价值一万港币的真正英国伦敦高级裁缝制造的西装回报,据行家判定,这套西装只会穿在外国总统和一些千万富翁身上。”他在边境贩毒时被打死,临死前还挣扎着说:“我在瑞士银行有一百五十万存款,把它取出来,建一座知青纪念塔。”

类人猿的情人田萍决心为他写一部长篇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红卫兵领袖、知青头、虔诚的理想主义和献身事业的苦行僧。”“一个真正的类人猿,他的名字叫中国知青。”

猿是兽性的象征,是史前人类,半人半兽的状态。作者崇尚处于蒙昧状态的原始生命力,把兽性作为一种理想的品格,赋予整个知青群体。作者声称:“到死我也不会后悔在‘为这一代人唱赞歌’的旗帜下描绘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那些知青领袖们。他们勇敢地在祭坛前作出牺牲,虔诚地在灵魂的炼狱中忍受煎熬,像圣徒一样享受着悲壮,瞻望着辉煌,渴求着救世,期待着承认。”而类人猿就是这一切赞美之辞的集中代表。

蒙昧的类人猿,满脑子封建道德,既有权力崇拜,又有金钱崇拜。类人猿神奇的人生,实际上是平庸、可怜,自恋和狂妄的人生。作者要为知青一代人树立的典型形象,实际上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的愚氓形象。

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类似于二战时期第三帝国的艺术、日本的官能小说。不过它们远没有后者的精致、唯美,显得更野蛮、蒙昧。

生存主义的“宏大叙事”,品位粗俗,思想陈腐。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

都没有达到"悲壮的青春"叙事初期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

六、知青文学"私人叙事"的产生

90年代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价值开始多元化,一些有个性的知青文学作品开始零星出现。它们是知青文学主旋律下的杂音,声音是微弱的,并不被人重视,还是一种边缘性的书写。个人化、多元化的表述,开拓了知青生活场景,使其更广阔、更丰富性,它们展示出知青生活的日常场景,传达出他们日常思想,合乎常识的事实。

这种"私人叙事"与著名知青作家的"宏大叙事"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话语,它们大多具有民间写作的背景,实际上代表了两部分知青"族群"在思想、文化立场的分歧。"私人叙事"的产生,暗示着一种能够负载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的新知青文学的萌动

长期以来,知青群体一直是被虚构的一群人,被命名符咒隐匿的看不见的一代人。在生活常识面前,各种命名、神话都被消解。回到生活的常识、常情、常理,成为知青一代走出命名的重要一步。

1. 长篇小说《黄金时代》、短篇小说《马但丁》——自由主义的声音

进人90年代,知青题材开始进一步泛化,知青生活开始退成背景,出现了一批以知青生活为背景,展示性主题的文学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1997年大陆版)、李晶、李盈的《沉雪》(1998年大陆版),这两部小说首先在海外出版,先后获得台湾《联合报》的文学大奖,此后几经曲折才得以在国内出版。《黄金时代》反映70—80年代的性意识,云南知青生活只是一种背景。《沉雪》描述出身"黑五类"的女知青在东北

兵团的苦难经历,其中有反映同性恋的内容。由于它们都触犯了文化禁忌,被迫到海外寻求发表的机会。《黄金时代》在1993年获台湾《联合报》第12届中篇小说大奖,直到1997年才在国内正式出版。它们"出口转内销"的曲折命运,证明90年代早期的大陆文学界还无法接受非主流的作品。[25]

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到云南插队,1976年考入人民大学商业管理专业,1984—1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后辞职专事写作。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时代三部曲》和随笔、杂文。1997年4月病逝后,开始受到文学界关注,并获得普遍赞誉。

许纪霖说: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谱系上,王小波似乎是某种异类,他有一份英国式的清明理性;他似乎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文化的内部,会有王小波这样的人出现。一个罗素的信徒、热爱理性和思考的自由主义者、独立不羁的民间撰稿人。

《黄金时代》(王小波)是《时代三部曲》(《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中最优秀的一部。它由三篇风格样式各不相同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组成,文笔十分精妙,但是贯串人物王二的性格不统一,大结构也不够协调。

《黄金时代》只是半部伟大的小说,前半部精彩绝伦,后半部则黯然失色。在云南乡村部分,王小波把性爱写得天真无邪,如火如荼,洋溢着浪漫主义气息。陈清扬把"斗争破鞋"当成一种"色情表演",出完斗争差,两人便开始了"伟大友谊"。陈清扬在交给组织的汇报中,详细记录下爱上王二的瞬间,"因为他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王二与陈清扬的男欢女爱是对专制时代的反抗。

在小说的城市部分,王二和陈清扬却成为正经人,他们拿着结婚证去饭店开房,性爱开始变得乏味而丑陋。青春的爱情只是一种春梦,如今散发出朽败的气息。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以"通俗喜剧"收场。小说没有说明,两个主人公为何变得如此平庸。

在此后的两部中篇《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里,质朴、清纯的王二,变成世故、油滑的小市民,沉迷于"性"趣之中,小说笼罩着灰暗的官能气息。小说显露出作者性格的两面性,冷峻孤傲和意趣低靡。

《三十而立》中，小人物王二已经成为芸芸众生，他的豪言壮语是，绝不做正经人。王小波在这里采取了消极、保守的姿态，他已经退到了自由主义的底线。

在《似水流年》中，王二再次面临抉择，他开始考虑：是否做一个好样的。当线条提出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时，王二想："这需要一支博大精深的史笔，或者很多支笔。我上哪儿找这么一支笔？上哪儿去找这么多人？就算找到了很多同伴，我也必须全身心投入，在衰老之下死亡之前不停地写。这样我就有机会在上天所赐的衰老之刑面前，挺起腰杆，证明我是个好样的。但要作这个决定，我还需要一点时间。"

可以说王小波一直在舍身入世和犬儒主义的退避之间徘徊，由于思想彷徨造成了小说出现结构裂痕和内容前后矛盾。

在"时代三部曲"的后两部，王小波在《白银时代》中，玩弄穿插、反讽、调侃和游戏性分析，被评论家称之为"寓言化的塑料玩具"；他在《青铜时代》中更转向对小趣味的关注，更带有操作性。评论家吴励生批评说："由于王小波过多地出于智慧的大快乐，而削弱了真切的生存感受"。

显然，王小波一直在回避《黄金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于是，他要戏谑、要游戏、要操作。王小波的游戏追求的不是人的普遍自由，而是个人对现实生活的超脱。这是一场虚假的游戏，戏谑显得沉重、苦涩，我们不再能感觉"黄金时代"那样自由的飞翔。真正的游戏不是超脱，而是一种超越，超越现实局限性，面这需要勇敢的承担。何多指出："面对严峻的生存现实发问，才真正可能把问题尖锐化，才真正可能从生存意义上呈现出'思'的力量。可操作的是有趣的，而精神坚守着的毕竟是不可操作性。"[26]

后来，王小波似乎下了决心，他的散文、随笔显露出战斗的锋芒。人们把他当作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来怀念，这是他所以获得如此多敬爱的原因。只可惜他过世得太早。

《马但丁》是王小波在70年代初插队时期的短篇习作，实际上只是一篇文学札记。《北京文学》1998年6期为纪念知青下乡30周年，出版"中国知青专号"，特意将王小波的这篇遗作找出来发表。

小说开篇写，"马但丁醒来了，但他不知这一次是不是真的醒来。因为今天早上他睡了还要睡，这实在是一种要不得的怠惰。但是终于他爬起来了。像一只猫似的打着呵欠"。为了不让村里人看见他的懒相，但丁在

出房之前练习走正步，这时“他已经是个标准的农民架式了：好像插了木棍的人皮标本。腰板僵硬的，谁看了都会说：好憨的小伙子！”

陈老太太请但丁去吃饭，盛情难却，马但丁只好前往。当陈老太太把稀里糊涂的一盆瘟羊杂碎端上来，但丁不禁失声叫道：“我的上帝呀，你为什么抛弃了我！”瘟羊杂碎、65度的地瓜烧酒，这些农民奉上的美味，加上屋中的臭味，使但丁跨出陈家的大门，才拐了一个弯就吐了。

当别人关心地询问但丁为什么垂头丧气，他竟然装出十二分悲切的样子，泪珠成串地滚下来，令人心碎地说：“我的女朋友……死了！”然后又伤心地大哭起来。他“卑鄙地编了一套罗曼史，编得活灵活现，连自己都惊叹自己的天才。大家咂着嘴惊叹他是一种多么令人惊叹的生物。”最后，马但丁溜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准备大笑一通，可是笑不出来，反而感到想哭。

与传统的知青文学大相异曲的是，马但丁既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也不是一个热爱思考的人，他是一个偷奸耍滑的知青，整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从没有人将知青描写成这幅不成器的样子。马但丁人物虽小，篇幅虽短，但是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人物和生活。它作为拼图的一角，它显明了王小波心中的时代图景。

作为一种民间写作，一种异类的声音，这篇小说的价值到了90年代末，才被人们所认识。

2.散文集《老知青聊斋》——回到常识

散文集《老知青聊斋》在1994年发表，作者邢奇是内蒙旧体诗群的核心，曾和北京知青共同创造了“打油体”诗。他的散文没有道学气，表现出自由、随意的风格。[27]

散文描述的对象是知青、牧民和草原。他在散文中调侃知青受意识形态影响，加之年幼爱幻想，对现实世界的认知虚幻不实。

《述异》讲述边疆战备空气紧张，“某日晚，包外下夜之人忽见北方有白光生于天际”，划空而过，众遂生核爆猜想，几日后某知青查书，认为看到了北极光。《行针》中知青某乙求学针灸，某甲为某乙隔皮裤行针，某乙“心中大喜，知遇异人，自此拜学不辍”。一日乙腹部不适，请甲为其治，以

便切磋技艺,不想刺人哑门穴,瘫痪十余日,遇到正牌医生方得救治。某乙学针的壮志由此毁灭。

作者对知青没有美化之心,对贫下中牧也毫无恭维之意。这些牧民不但不高大,甚至活得窝囊,同知青一样滑稽、平凡。

《达瓦额吉》达瓦额吉一生未成家,因抱养一子名达瓦,牧民便以她儿子的名字呼为达瓦额吉(蒙语:达瓦的妈妈),由此其名反失。额吉五十开外,貌若古稀。长年放马,不善家务,家事交给儿媳,自己捡牛粪、挤奶干糙活。一次知青随其绊马,竟然被她带迷了路,听到狗叫她才找到家。一次她找知青,自述耳聋。知青一看,耳道深处全是棉花,原来额吉前几日因耳痛,按偏方将棉花蘸黄油塞人耳中,前塞未取,后塞又继,顶向深处,而她浑然忘记。额吉形象不见高大,反觉可笑。

邢奇没有所谓"人民"的观念。他知道现实中的人民与他自身无异。接受"再教育",使作者看到生活原本的样子。

作者对大自然和草原生活充满了好奇,对草原上的动物和自然环境进行细致的观察。

> 大草原上,雨霁虹出,彩虹随意而起,潇潇洒洒,形式不拘。有时奇大,横空出世,倘非偌大之草原,绝无偌大之虹拱,所谓气贯长虹者,定是此虹。有时奇近,竟从马前而起,仿佛伸手可及,趋而触之,却又不可得。有时只有半架彩虹,一端插天,一端向地,欲入不入,两端虚浮。有时数道同出,或遥相起笔,东涂西抹,俱成奇彩,或上下相叠,成同心之弧,两重者最多见,也偶有三重四重者,彩虹居下者实,居上者虚,叠拱之两侧时有短虹旁护,其短常如两竖,不成弧度,若天公抹过长虹之后,尚有余彩,又信手于长虹两侧添了两笔。
>
> ——《雨》

《袍衾》讲述,知青初下乡讥笑牧民的衾袍,后来旷野无遮难以出恭,冬日起夜穿衣受冻,方知衾袍"日则为衣,夜则为衾,怀物为囊,出恭为厕"的妙用,纷纷换上衾袍。《马》对马的耳、眼、鼻、唇、齿、颈、背、腹进行了详细观察描述,对马的热爱跃然纸上。《蝇蛆》描述蝇蛆无孔不人,刁钻古怪

的习性,为造物之奇而惊叹。

邢奇的散文使知青生活由绚丽归于平实,将意识形态的玄虚化为笑谈。他的散文描述出真实、活泼的知青生活图景。

3. 短篇小说《谁为我们祝福》、《归去来》——"乡恋文学"的续篇

"乡恋文学"曾是80年代知青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乡恋文学"与"悲壮的青春"一道,曾给返城知青提供精神上的寄托。进入90年代后,随着旧思想的解体,对乡村的不同声音也开始浮现出来。"悲壮的青春"、"青春无悔"的口号开始被一些知青视为谎言,对乡村生活的怨愤之声不绝于耳。这种情绪在一些知青作家的"新写实"小说中,也反映出来。

《厦门文学》1995年10月号发表短篇小说《谁为我们祝福》(谢春池),将"乡恋文学"的乡村之恋,演变成了乡村之恨。

赖家村的支书赖金宽以招工指标,诱奸了厦门女知青白小云。由于女知青黄淑君拒绝了赖支书的非礼要求,赖支书便将招工指标给了白小云,黄淑君被在厦门的男友抛弃,服毒自杀,险些丧命。赖支书还诬陷白小云的男友何志雄打人,将他押送公社。

多年后,女知青黄淑君办了一家饰品公司,请何志雄到厂里兼职副经理。工厂在贫困山区招了六十多个山里妹子,其中包括赖支书的女儿赖小梅,插队当年她只有四岁,现已长成美丽少女。何志雄把当年怨恨报复在赖小梅身上,不料两人发展为同居关系。小说结尾,何志雄带着赖小梅在商场购物时,遇到了知青时期的未婚妻白小云。当白小云知道小梅就是赖支书的女儿,脸色苍白地离去。历史在昔日知青情人(何志雄和白小云)的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

插队时知青没有权力,未婚妻被迫卖身,多年后乡村干部失去了势力,他的女儿则成为知青报复的对象。城乡之间权势地位的变化、转移,通过性侵犯的方式表达出来。小说传达的某些观念是错误的(如权本位、男权思想),但它第一次真实地传达出了知青对乡村的怨恨情结,这是在80年代那个语境中不能、也不敢表达出来的真实情绪。这种把乡村完全敌对

化处理的小说，在80年代从未出现过。它透露出知青与乡村之间除了感恩、仰慕之外，还有仇恨怨愤的另一面。

何志雄与仇人的女儿同居，形式化地再现了知青与乡村之间恩仇莫辨的关系，谁能为这种无望的情感祝福呢？知青与那段葬送了青春的历史、造成痛苦的乡村，要达成生命的和解，其希望还是相当渺茫的。

如果说谢春池的《谁为我们祝福》，表现了知青与乡村的复杂情结。那么，韩少功的《归去来》则验证了还乡梦的彻底破灭。

在《归去来》中，小说主人公黄治先"在走访一个乡村时被误认为当年的知识青年马眼镜，尽管他一再申辩也无济于事。然而，当他逐渐进人马眼镜这个角色之后，或者说，当他逐渐重新被马眼镜的事迹、被乡村的真实情境所占据的时候，他惊慌失措了——他终于拒绝了重演这一段历史的光荣而仓皇地出逃了。"农村对于知青来讲，是一个"虚设的情感家园"，"它不可兑现，它的功用仅止于对精神焦虑的一种拯救、抚慰和疗治。" "乡村人把苦难当成生活本身，当成自然的承受，而不像那些纷涌回城的知青，把他们在乡村的苦难当成'资本'，当成'英雄'创生的历史境遇。"[28]

"乡恋文学"在90年代走向其主题的反面，这其间有着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一切命名迟早要接受历史的考验，特别是接受知青个体切身经验的检验。主流的声音不可能永远掩盖历史的真相，不可能抹煞个体生命的呼声。一元化的叙事向多元的、私人的叙事发展，是一种不可抵御的文化趋势。

七、晚生代与知青文学

1. 晚生代对知青文学的批评

知青一代十分关注下一代人对自己的评价，因为无论是知青群体，还是知青文学都需要有一个参照系来加衡量，这个参照系就是年轻一代，因为他们代表着未来，这是知青为什么重视年轻人意见的原因。

在纪念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的活动中，一些组织者有意识地邀请生于六十年代的晚生代参加，倾听下一代人的意见。在一些讨论会上，晚生代们重新评判上山下乡运动，严厉地批评了作为主流文化的知青文学。

1998年11月28日晚，厦门市"书缘书友会"第四期读书沙龙，举办有关知青运动讨论会，与会五十多人，在会上主要发言的是生于60、70年代的晚生代。[29]

他们在会上批评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没有力度。应该从体制上分析这场运动，正常的制度安排是正视个人的利益，并设计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以维系脆弱的道德，招工、招生的机会掌握在个别人手里，必然诱发或逼出招工招生人的兽性。"需要建立一个自由的体制，把选择的权利还给每个个人。"

他们批评知青文学"追求外观的宏大或作为反常事件来控诉"，"缺少特别的、个性化的东西"，"是一种策略性的叙事，是一些人通过宣示其罗曼斯化的苦难证明在80年代获得的些许话语权势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叙事恰恰遮蔽了很多至今通行于世的苦难。这样就为当下文学留下大量的'祛魅'工作。""他们应该留下他们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知识"，"超越各种定见的实际的历史"。[30]

《北京文学》1998年6期"知青专号"，开辟晚生代批评专栏，他们尖锐指出：国家"法律上保证了知青在农村的特权地位，这也就同时将农民以及所有乡下人都置身于一种被欺负的境地"，"当时的农村，在被迫接受了城里来的知青的同时，也被迫接受了一种屈辱，一种不公。""在'知青文学'中，农民完全被'他者'化，他们是一种风景。在这件事上也许农民的陈述是来了一群莫名其妙的人，偷了我们的鸡，骗了我们的闺女，然后拍拍屁股走了，也许对农民来说，你们的'苦难'根本就不能成立。这涉及到乡土中国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涉及到我们的文化在上层和下层、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断裂，'知青文学'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实质上是加深了这种断裂。"必须反对这种"知青话语霸权"。[31]

知青文学对历史认知的欠缺和谬误，广大读者(包括知青群体)的不满，以及这一题材具有的巨大文化资源，都为晚生代参与知青文学创作提供了条件。一个评论家甚至说："真正好的'知青文学'恐怕还是要由局外人来写。"[32]

2.晚生代创作的知青文学

一位知青作家曾把知青文学的未来书写寄托于下一代人，他理想化地认为"即使老三届一个个死尽，他们也会化作不安的灵魂，震颤着，骚扰着后代的心灵以及后代的历史，犹如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一浪高于一浪。并不只是参加过战争的父辈们来写，而是他们的后代来写他们一样。"[33] 但是在晚生代的笔下，知青文学开始被拆解，呈现出一种阴暗、荒诞的场面，高大悲壮的知青形象，变成一种流氓无产者的无赖相。

未曾下过乡的年轻作家们创作了一批知青小说，如韩东的《下放地》、李洱的《鬼子进村》、刘醒龙的《大树还小》等，这些作品从农民的立场，表现上山下乡运动。

中篇小说《大树还小》，展示了农村孩子所了解的知青故事。在农民看来，知青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好吃懒做，偷鸡摸狗，将垸里的年轻人带坏。农民秦四爹与知青文兰相爱，知青白狗子为了知青集体的脸面，硬要拆散他们。秦四爹说："现在这个世道，喜儿不像喜儿，黄世仁不像黄世仁。"秦四爹等文兰回来，等了一辈子，可是文兰没有回来，跳江自杀了。秦四爹将一万元交给父亲，说："我用不着它了，原准备文兰回来，现在全送给大树，治好了病再好好读书，做一个我们自己的知青。"小说尖锐地批判了知青的社会等级观念。

《北京文学》1998年6期（中国知青专号）发表了知青小说数篇，编辑者为了推动知青文学更新发展，特意推出晚生代创作的反映知青生活的短篇小说《枪令》、《忆苦月》。

短篇小说《枪令》（赵刚）讲述，四小队的知青户"刚进村时六个人犹如六只嫩公鸡，整天喔——喔儿地乱叫唤，走村串户唠唠叨叨地告诉村里人说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什么什么的，可一年时间不到，六个人中便逃走了一半"，"剩下的三个人的家庭成分很有点问题"，一个是"右派"，一个是被批判的江湖艺人，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他们的出身注定了与招工、病退、推荐上大学无缘。

"天色渐亮，老队长披着一件黑棉袄扛着锄头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前

面;后面跟着三个拖着农具,趿着鞋子怪模怪样的瞌睡虫。三只虫子在清晨的空气中接二连三地打着哈欠。一开始的哈欠是真实的,但是随着人一点一点清醒哈欠就成了他们发泄不满的方式,这时候的哈欠多少有点表演色彩,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玩弄并利用着哈欠,瘦弱的刘永的哈欠像似一种轻声的叹息,你一不留神他已经结束了;相反郭大海则是另一个极端,他的每一次的哈欠都极尽夸张之能事,不仅嘴张得跟海似的,动静也大,吐气忍不住要嗷——哇怪叫一声,声音之嘹亮,动作之夸张能把人吓得笑起来。但是老队长不笑,从来不笑,三个人跟在老队长的身后嗷——哇、嗷——哇地一阵接一阵地乱叫后便来到田地。村里的劳力已经干得热火朝天了。"

三个知青人田间休息时玩气枪,还声称打了十好几只鸟,要烧菜吃。队长便下令他们打鸟,只要能打下十只,工分照算,还放一天假让他们睡觉。可惜他们枪法欠佳,一无所获,最后还是用每只二分钱的价格向贫下中农的孩子手中买了十只麻雀。

在小说结尾,三个人枪毙"贫下中鸟",刘永兴奋地接过枪压上子弹,大声宣布:"我代表人民判处土匪头子座山雕死刑!"然后三个人依照顺序枪毙了王连举、鸠山等恶霸地主日本鬼子及其叛徒。第九只鸟轮到李南京,他瞄准的身子在颤抖,"脸上挂满泪水,一张脸已经被悲愤和仇恨挤压得变形了。他咬着满嘴的眼泪朝刘永和黑子喊道:'我代表我自己……判处历史反革命分子我爸爸死刑!'眼睛一闭,'啪'地打了一枪,一枪打出去之后人'噗嗵'扑到地上……刘永和黑子足足愣了两分钟,黑子叹了一口粗气,走过去拣起枪压好子弹端起来朝树上最后一只活鸟瞄了一会儿,放下了,又端起来,嗡声地说:'我枪毙四类分子郭××!'刘永舔了舔嘴唇,艰难地说:'这一只就算咱俩的爸爸,你一块毙了吧!'"

小说描写的场面很像卡通片,农民则被描写成一群有尊严感的劳动者,知青则是一群可怜二流子,无赖粗鄙,有暴力倾向,是一种被"阶级斗争"、"阶级路线"压垮的形象。

短篇《忆苦月》(刘汉太)讲述,青海生产兵团某师在全体知青中开展"忆苦思甜"教育月活动。某部八连连续吃了八天"忆苦饭"的成功经验,被登在师部简报上。

"忆苦饭"是一种由猪饲料、红柳叶、苦艾根和芨草茎掺和着麸子捏成

的窝头。高原的开水只有60度，蒸得半生不熟。八连指导员何一鸣监视着大家把它吃下去，他说："忆苦饭是思想饭政治饭教育饭进步饭，是精神营养的最佳添加剂。"他表扬了几个人："靳明哲忆苦饭吃得多，陈士明忆苦饭吃得快，赵芳草态度端正，尹春波带着感情……"何一鸣自己却在厨房开小灶，用他自己的话说："哪能特殊化，面条免了，就吃馍，来两根大葱，一盆酱。"

老职工归娃子忆苦，忆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简直是一幕人间惨剧。河南信阳一屋一屋的死人，冒死逃荒的路上，死人倒得像麦捆一样。结果归娃子遭到批判。出身小业主的知青赵芳草编讲了催人泪下的血泪史，她哭得位不成声，最后昏倒在台上，台下口号震天：不忘阶级苦！誓作革命人！扎根大西北！解放全人类！一周后，赵被吸收入团，并任命为团支部书记。出身地主的知青李一达也照方抓药，结果被发现是地主出身，被连里的老兵"卫黑皮"痛打一顿，不堪凌辱，卧轨自杀。李一达受辱和自杀并没有庄严感，在他自杀前"整日里缩着脑袋低着头走路。连里谁也不搭理他。他像个臭虫似的。几天后，他失踪了"。

作者把知青描写成一群奴隶，有的愚昧无知，有的失魂落魄，有的奸滑献媚。这就是知青在年轻一代人心中的形象。上山下乡运动在他们眼中，就是这样一幅可怜可悲的图景。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期发表的知青作家的小说《西尼气之旅》、《夜诊》仍然沿袭着主题先行的单一性思维定式，在取材、表述上都毫无新意。

《夜诊》的作者系北京赴吉林大安插队的知青，小说以第一人称歌颂夜间出诊，落水牺牲的知青女赤脚医生雨。"他望着她微微鼓的肚子，想象着那些病危的农民，怎样经她的银针一扎，奇迹般地站起来。又想象着鼓起的肚子里边的小生命，也是一个聪明美丽的女孩，他感到天都大了，泡面也阔了。'雨，医学院来录取通知了。'他笑眯眯地放下橹，慢慢地俯下身，耳朵贴在她的肚皮上……"

对比两代人创作的知青小说，我们不禁要问，谁能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历史知识，是晚生代作家，还是知青作家？如果一个知青作家丢弃了个人亲身经历，去描写一个理念上存在的故事，那么他的知青身份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并不要求知青作家做超越时代的理性思考，而是要求他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感悟，不要盲目地追随流行的社会理念。

知青文学的衰微,为新创作主体的加入准备了条件。晚生代如果能够参与知青文学的写作,将会带来新视角和新风格,对于知青文学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90年代后期,知青文学开始全面退潮,在新时期成名的知青作家开始放弃知青文学的写作,作品的数量开始锐减。

在1998年的知青纪念活动中,一些知青作家表现出一种厌倦情绪。有人公开提出:告别"知青情结",走出"老三届"。有人表示不愿凑趣,人云亦云地随大流,希望远离这种"中心话语"。对于他们来说,知青题材的创作已经结束,或者已经难以超越。[34]

进入20世纪末,知青文学似乎已经走到它的历史终点。进入21世纪,大批"老三届"知青正处于下岗再就业,"劫后辉煌"的命名已经被现实无情地消解,知青作为一个虚拟群体已经成为一种散漫状态。知青群体进入等待命名的空白期。

知青一代已经进入了中老年,已往知青文学的欠缺和谬误,能否得到弥补、纠正,知青文学如果重新书写,希望能否寄托于民间写作? 知青文学题材是否会进一步多元化、泛化? 能否出现再度的繁荣? 这一切都有待于新世纪的写作实践来给予回答。

注　释:

[1]1994年2月,武汉地区的知青由武汉市公关协会领衔,在武汉展览馆举办反映武汉地区50万知青下乡运动的《武汉知青岁月回顾展》,参观人数逾万,省市新闻传媒及时作了报道。(董宏猷主编:《我们曾经年轻——武汉知青回忆录》　武汉出版社 1996.6)

1994年秋,北京举办《共和国的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纪念活动贯穿着"青春无悔"的主题。北京的报刊、电视台对晚会进行了报道。

1995年9月,厦门大同中学召开"老三届、知青走向未来研究会",提出建立"知青学"。10月1日《厦门晚报》举办《在

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老三届、知青走向未来学术研讨会》。年底,厦门文学杂志社和闽西日报社在龙岩举行“老三届、知青促进老区特区文化经济发展座谈会”。1995—1998年期间,厦门各中学成立“老三届同学会”,举办“老三届、知青文学研讨会”,并发起知青作家代表团重返闽西“红土地、蓝海洋”系列活动。(谢春池主编:《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12)

1996年湖南电视台播放反映湖南江永知青返乡活动的电视片《人生如歌》,荣获当年省的电视节目优秀奖。1999年,湖南卫视开设谈话节目《有话好说——知青岁月》上、下集,播出后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新创作》1997年2、6期)

各地知青还踊跃参加支援农村的建设,捐资助学等活动。1993、1995年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和宝泉岭管局先后邀请知青回访北大荒。知青代表与黑龙江垦区签订多项经贸协作意向协议、专利技术项目单,以及投资和技术升级换代等。(顾洪章、胡梦洲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

随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的到来,纪念活动很快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潮。各地知青在1998年自发地进行了各种纪念活动,“知青们重回插队的地方,包专列的,组车队的,‘情绪’依然深厚。一个接一个的知青、老三届聚会、展览、征文,营造出的怀旧气氛浓烈逼人,知天命或快知天命的老三届人似乎又复归‘喧嚣’,来一次最后的疯狂了。”“这一系列的活动构成了‘交响’,也是一种‘绝唱’,即从此不再会有如此规模,如此浓烈色彩的纪念活动了。”(朱文杰:《老三届采访手记》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8.9. 裘雨林、黄进基、金大陆、田大卫:《老知青写真》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10)

[2]梁晓声:《我看知青》《北京文学》(中国知青专号)1998年6期。

[3]王江主编:《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光明日报出版

社1995.1。
[4]林春:《"清醒的少数"》《读书》1998年5期。
[5]顾洪章、胡梦洲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
[6]金兆钧:《"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两面神效应》《读书》1998年4期。
[7]在前期各地知青出版的回忆录有:东北兵团知青回忆录《北大荒风云录》(1990年)、湖南知青回忆录《辉煌的青春梦》(1990年)、内蒙古知青回忆录《草原启示录》(1991年)、云南知青回忆录《青春无悔》(1991年)、四川知青回忆录《知青档案1962—1979年》(1992年)、山西知青回忆录《老插话当年》(1993年)、南京知青回忆录《难忘鄂尔多斯》(1993年)、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1996年)、陕西知青回忆录《回首黄土地》(1992年)、《情系黄土地》(1996年)等。《我们曾经年轻》还特别编辑:文化大革命前(1956—1965年)老知青回忆和文化名人谈知青运动。这批知青回忆录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8]见《难忘鄂尔多斯》、《蹉跎与崛起》、《新创作》。(1997—1998年"那年那月"专栏)
[9]刘中陆主编,臧健、田小野副主编:《青春方程式——50名女知青的生活方程式》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该书由德国教授罗梅君资助出版。由于当时不能以"女知青"作题目,所以将"女知青"作为副题。该书出版后,部分内容译成德、英文在国外介绍和发表。
[10]朱晓军:《北大荒羁旅》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1。
[11]胡发云:《难忘的知青岁月》(代序)《我们曾经年轻——武汉知青回忆录》(董宏猷主编)　武汉出版社1996.6。

各省市知青自发组织出版的回忆录扉页上,都题有庄严的献辞,如《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扉页献辞:纪念厦门知青插队30周年,纪念厦门老三届离校30周年。谨以此书献给:已经长眠异乡和故乡的还在异乡和故

乡生存的老三届同学知青伙伴和我们的年轻与年小的后代。(谢春池主编:《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9.12)
[12]《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总序说:丛书的作者都是这场知青运动的亲历者,也是这一代人中活跃在当代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代表人物,对于这场知青运动,他们当有更为深刻的体验,更为清醒的领悟。相信他们的叙述,他们的辨析,对于今天的人们对 30 年前的那一段历史,对 30 年来历史的认识是有帮助的。《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5。
[13]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出版社 1997 年。
[14]徐友渔:《知青经历和下乡运动——一个体经验与集体意识的对话》《北京文学》1998 年 6 期。
[15]《中国电视观众现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16]顾洪章、胡梦洲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 年。
[17]刘晓军:《"老三届"文艺又成热点》《光明日报》1995.4.5。
[18]梁晓声:《我看知青》《北京文学》(中国知青专号)1998 年 6 期。
[19]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5。
[20]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2。
[21]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出版社 1992 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移民海外的前知青创作的反映上山下乡的文学作品,大多采取了激烈的批判立场,如:张戎的《鸿》(长篇小说 1993 年)、杨必的《毒蜘蛛》(长篇小说 1998 年)和陈冲导演的《天狱》(电影 1995 年)。
[22]《中国知青部落》郭小东,花城出版社 1990.9 /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2　修订本《青年流放者》("中国知青部落"第二部)郭小东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4.9。
作者在第二部的后记中称,计划创作中的"中国知青部

落"第三部名为《立地成佛》。

90年代初,具有官能主义倾向的知青小说,还有《天伤》(王山)、《岗上的世纪》(王安忆)等。

《天伤》描写下乡前夕,老红卫兵与顽主进行兽性的角逐。作者说:"老红卫兵和玩儿主们又都带着累累伤痕奔赴了广阔的农村。他们是知识青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整整一代人。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中,在决定共和国命运的各个关头,他们之间,还要进行争夺命运的交战吗?"

《岗上的世纪》描写女知青李小琴为了离开农村,用肉体引诱干部杨绪国,经过七天七夜性交,洗净了双方精神的卑污,一场性交易变成灵魂的升华。

[23]同样场景,曾出现在《中国知青部落》中,丢弃爱情改嫁大款的安静静一心要向林大川献出自己的爱,在性欲冲动的时刻,林大川毅然摆脱,告别以往的情感。

[24]晓剑:《中国知青秘闻录》　作家出版社1993.3。

晓剑,1952年生,云南知青,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编剧班,毕业后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1989年调海南师院工作。已发表上百篇中短篇小说,出版长篇及小说集20余部,7部电影剧本搬上银幕,10多部剧本搬上电视屏幕。

[25]王小波:《黄金时代》　花城出版社1997.5。

李晶、李盈:《沉雪》作家出版社1998年。

[26]何多:《一个被误读的文坛异数》《十作家批判书》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27]邢奇:《老知青聊斋》　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6。

[28]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

[29]《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1994年)一书曾特意收入了当代大中学生评价老三届的文章。多数文章对知青一代赞许有加,个别文章带有令人不安的恶意。

《可悲的一代》(宗和):"没有热情没有良知没有自尊没有真诚没有知识没有信仰没有青春的他们,在某一天政策的

关照下回到了城市，就像一片燃烧过的灰烬席卷城市的每一个旮旮旯旯，城市的日照度为之降低，城市的暖色调为之抹暗，这批灰溜溜的逃兵很快在家乡安营扎寨，在取得本城购粮证后，迅即会同那些留守在城的同届人，开始对生活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报复，以补偿历史和时间对他们的不公。过去他们是牺牲品，现在他们则要做刽子手，他们不再讲良心，他们变得贪婪，伪饰和不择手段。现在他们所要做的全部事就是凭藉他们从毫无人性的生活经验中悟透的厚黑之学和尔虞我诈的本领来夺取一个位置，然后再苦心经营。功夫不负苦心人，他们很快成了社会舞台上的主角，用各种伪成果填补青黄不接时期的空当，为巩固阵地，他们驱赶和排挤一切威胁到他们地位的力量，无论老的还是新的。"

[30]《每一个人都应该追问——一次关于知青运动的读书沙龙》(李钢根据读书沙龙 1998 年 11 月 28 日记录整理)。《我知道，我是一个永远的知贪》(谢春池)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12。

[31]《寻找命运的契合点——后来者谈知贪一代》(张颐雯整理)《我们——"我知道，我是一个永远的知青"评论集》(谢春池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9.11。

[32]李敬泽的发言《北京文学》1998 年 6 期"知贪专号"。

[33]肖复兴:《绝唱:老三届》　东方出版社 1999.5。

[34]张抗抗说:"说来惭愧，新时期之初，我那几篇引起普遍关注的作品——《夏》、《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都不是'知青题材'。与其他同年龄的作家相比，我的'知青小说'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我早已不是一个'知青作家'了。'知青'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曾经有过的一种身份……30 年过去了，如今我们的视野，已穿透'知青'生涯，投向人类共同的未来。我们有更多值得关注的事物……"见张抗抗:《大荒冰河》(后记)《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5。

后　记

一

1996—1998年，我将“文革”艺术史的部分章节，拿到《中国青年研究》杂志上发表，产生了一些反响。1999年的夏天，岳建一约我写一部介绍中国知青文学发展的史稿。我原计划只写“文革”知青文学，但岳建一提出，将知青文学局限于“文革”10年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写一部“通史”，要从50年代写到“文革”后。虽然工程浩大，但考虑到体例的科学性，我只能从命。

岳建一致力于“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的事业，他提出知青一代不仅是“文革”的受害者、受难者、受骗者，也是那场浩劫最主要、最主动的参与者，应该直面历史与直面自我。作为亲历者参与写作的知青文学的首要义务是“抢救与还原真实的历史”，“知青文学的精魂是具有民间立场的民间记忆。民间记忆虽然有着贫寒的烙印，但却是自主、自由、自尊的，是高贵、生动、富有个性、品性、灵性、血性和骨质的，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只有流行的、统一的、通俗的记忆的知青文学，而缺乏真正民间记忆的知青文学，肯定是没有希望的”，“是提倡恢复民间记忆的伦理、禀性、品格的时候了”，“中国知青文学的希望在于真正进入民间文本的时代”。我赞同他的这一观点，本书的写作中体现了这一思想。

初稿完成后，先后请李南、定宜庄、刘小萌、张华、丁东、刘迪通阅了全稿。根据定宜庄、刘小萌的意见，修改了个别命名，扩展了知青回忆录一节，增补了索引，最终确定了本书的书名。根据张华的意见，对一些重复的文字进行了删节，降低了文学批评的复杂性，使观点更具倾向性。根据丁东的意见，补充了内容，并对个别字句进行了调整。

自1993年以来，在调查沙龙、民刊和内蒙古诗群的过程中，曾蒙李南

多次给予帮助。在本书写作中，她两次通阅全稿，在书稿上留下了大量的批注，她提供的资料和修改意见，纠正了命名、史料上的诸多失误，弥补了很多疏漏。

我还请研究生庄稼昀、司徒志岚代为查寻新时期知青作家的批评资料。司徒志岚曾阅读本书的一至三稿，提出修改意见。

对本书写作助益最大的三本书是，《中国知青运动史——初潮》（定宜庄）、《中国知青运动史——大潮》（刘小萌）和《沉沦的圣殿》（廖亦武主编）。它们引发了我在读《法国革命史》时才有的强烈激动。我在本书中摘引了许多他们的资料和观点。

本书采用的红卫兵文学、知青文学资料，大多是在1997年之前为写作"文革"艺术史搜集的。当时许多朋友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杨东平、鲁燕生、鄂复名、徐晓拿出了他们长期搜集和收藏的宝贵资料(手抄诗、手抄杂志、照片、藏画)。李联琮先生向我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红卫兵小报。鄂复名帮助我对一些年代不详的沙龙诗作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王好立、仲维光、史保嘉、张郎郎、张寥寥、鲁双芹等人向我描述了沙龙文艺的日常生活场景。芒克、林莽、甘铁生、宋海泉、潘青萍向我讲述了白洋淀知青的生活和写作。

我到上海和成都等地去搜集材料，得到了张龙明、刘明厚、李章、贺星寒、谢庄等人的热情周到的照顾和指点。孙恒志、黄翔和邓垦、陈墨等当年沙龙主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找来沙龙的朋友与我进行座谈。

没有老师、朋友们的帮助，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本书，我在这里向他(她)们表示由衷的感激和敬意。

二

以往的知青文学，为知青群体写下了太多的过誉之词，这些文字迟早要接受后来者的批判。与其等待后人批判，不如由我们自己来严正地审判

自己。我们留给后人最可宝贵的东西，是那些失败的历史教训。

进行历史的批判时，我是心怀痛惜的。因为我批判的对象，包括我自己。我知道要获得尊严的生活，就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不再会有集体的相互依傍，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选择一条个人救赎的路。

在采访中，高红十清楚我对《理想之歌》的批判立场，仍然无保留地向我介绍了自己参与《理想之歌》创作的经过，包括当时的心理活动，这些资料都成为本书批判的材料。谢春池给我寄来许多资料，我表明要把他作为组织化文学的典型来写，他仍然打来了热情的电话。我曾读过他们两人的反思文章，他们的行为使我理解了古人的一句话：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已经证明了实现救赎的可能。

本书难免要触及历史上的旧事，对此笔者一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只就某文章而涉及某人的名字是不公平的，特别是“文革”时期，但是在书写历史的时候这又是不可避免的。本书是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相信我的这种心愿在书中已有所体现。

本书试图发掘民间的写作传统，可能在批判旧神话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神话。根据一些专家的意见，本书在修改时调整了对沙龙人物的评价。本书对民间作者的肯定，只是就彼时彼地，历史只能说明一个人的过去，并不能说明他的现在和未来。

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同阶层背景的知识群体间仍然存在着一些磨擦，我想它只是一种“傲慢与偏见”，迟早会被消除。在自由知识分子之间，一定会建立一种超越阶层利益的平等、互敬、协作的关系，因为这是现代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必由之路。

三

知青一代经历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思想解放运动、经济体制改革；知青一代目睹和参与了一系列惊人的社会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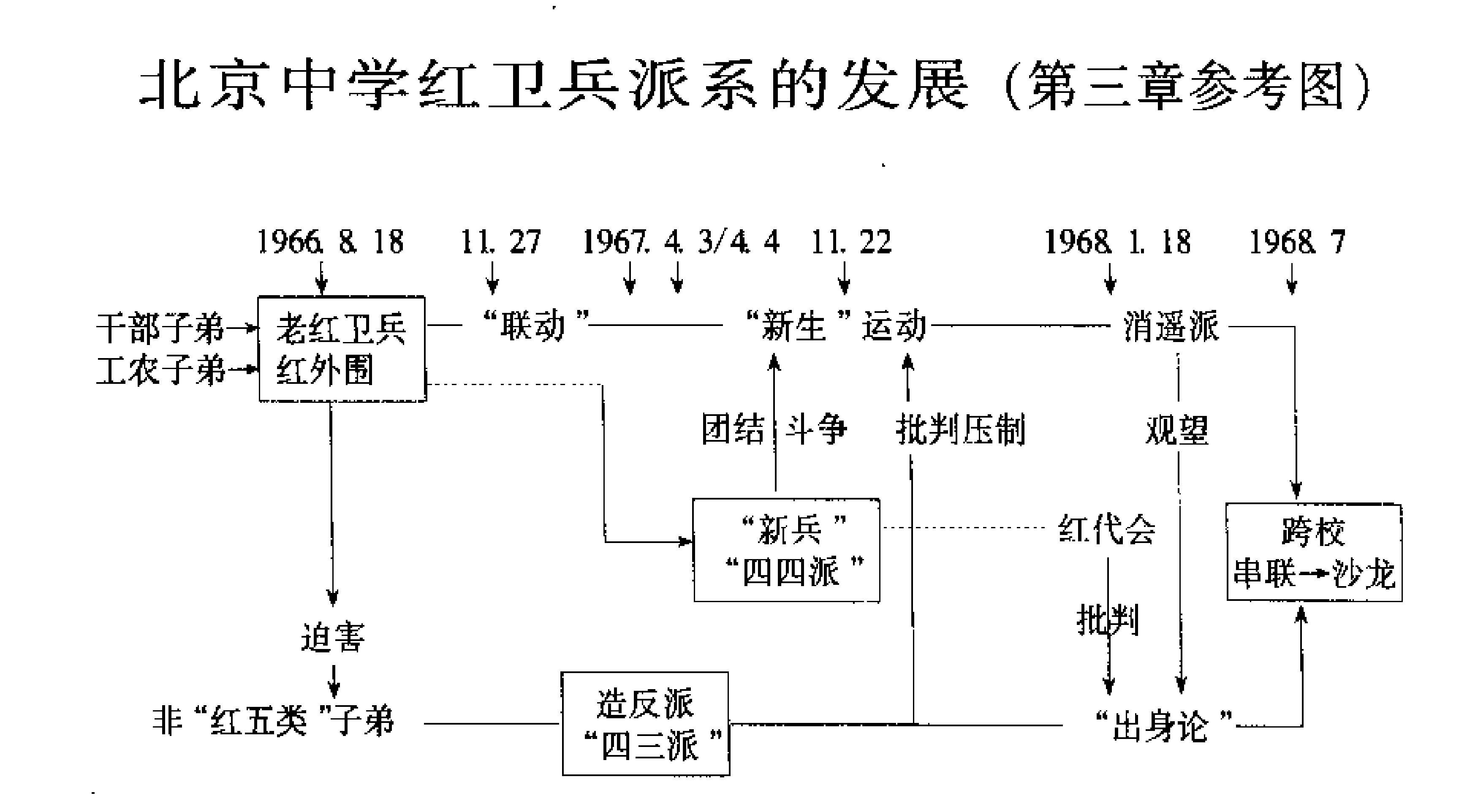
革和历史事件。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代人的灵魂深处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体验到了灵魂的崩溃与重建的生命过程。

虽然我在"文革"中读过手抄本,在上大学期间邮购过《今天》,但是我对沙龙文学的真正认识还是在1989年之后。我在90年代通过个人探索,逐步接近沙龙文学的民间传统。我的精神终于成长到,可以读懂沙龙现代诗歌,可以与白洋淀诗人们交谈的层次,我比他们——我的同代人,在文化上、精神和人格上落后了十年。我的思想成长过程具有一定典型性,反映了整个知青群体的思想成长。

我对早年的沙龙怀有敬意,想把这段历史以及它所体现的自由精神介绍给更多的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当事人",我意识到对这段历史负有责任。我也想通过研究一代人的历史,对个人生命达到一种理解,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传达我对青春的怀念和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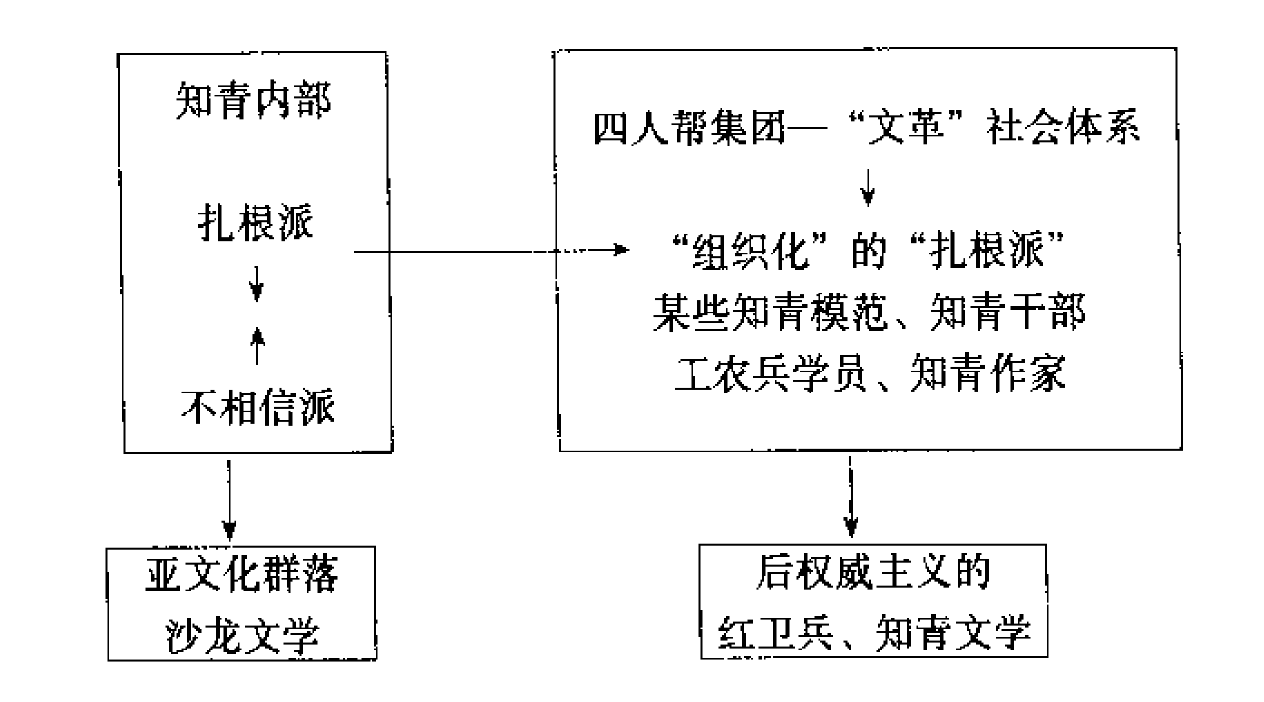
本书预想中的读者群体,不仅有知青、社科工作者,而且有当代大学生。我深感下一代有了解前一代人的必要,这绝非自恋情结或老年心态,而是出于文化传承的需要。据我所知,文科大学生对中国当代历史的了解很有限,本书注意介绍不同时期的历史环境,尽量多提供一些具体的形象,增加文学史的可读性。希望青年读者阅读后,不仅对知青文学有一个清楚的印象,并且能够通过知青一代的经历,了解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2001年9月　于中央戏剧学院



北京中学红卫兵派系的发展（第三章参考图）

上山下乡后期的知青群体（第七章参考图）



新时期知青文学的发展（第九章参考图）

1978
权力话语沿革与回归

1985
“权力—知识分子”话语变革

“文革”知青作家
反思
“权力—知青”话语
伤痕文学、乡恋文学
“悲壮的青春”

知青文学多元化
寻根文学、改革文学
新写实主义

民间知青写作
公开化
民刊、反特权文学
朦胧诗、沙龙小说

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资料索引

人名索引

杜九森(九九)
多多(栗世征)

G:

郭沫若
郭路生(食指)
郭小林
郭小东
甘恢里
甘铁生
高红十

H:

黄翔
杭育之
韩少功

J:

贾平凹

K:

孔捷生
柯云路

L:

刘自立
刘恒
鲁燕生
鲁双芹
林莽(张建中)
林贤治
陆天明
卢新华
梁晓声
李晓
路遥

老鬼(马波)

M:

牟敦白

芒克(姜世伟)

马嘉

P:

潘青萍(潘婧)

彭刚

R:

戎雪兰

任公伟

S:

孙恒志

孙康(方含)

宋海泉

史保嘉(齐简)

史铁生

舒婷

T:

谭小春

W:

伍立宪(哑默)

王靖(彭忆东)

王好立

王江

王安忆

王小波

吴鸿

X:

徐浩渊

徐晓



重要名词索引

名词

新生代
"后工农兵文艺"
权力文学
权威文学
后权威文学
"扎根派"与"不相信派"
组织文学与非组织文学
对"地下文学"的围剿与反围剿
工农兵学员
黄皮书
亚文化群落
内蒙古诗群
白洋淀诗群
现代主义诗歌
童话诗
民刊
民间写作
改革文学
伤痕文学
寻根文学
乡恋文学
"新写实主义"
"悲壮的青春"
"第二种忠诚"
归来者
文化丛书派
自由主义
知青学人

"权力—知识分子"话语
"权力—知青"话语
"权力—商业"话语
生存主义和生存文学
官能主义
"青春无悔"
"劫后辉煌"
私人叙事
宏大叙事
"二王之争"
"二张之争"
晚生代

本书引用的知青文学作品及相关资料

资料

[1951—1954]
王汶石:《沙滩上》、《夏夜》(短篇小说) 时间不详
马烽:《结婚》(短篇小说)1951《韩梅梅》(短篇小说)1953
李准:《林业委员》(短篇小说)1954
康濯:《春种秋收》(中篇小说)1954

[1955]
《夏天的故事》(电影)编剧:孙谦,导演:于彦夫,长春厂

[1958]
《朝阳沟》(六场豫剧)编剧:杨兰春
《她爱上了故乡》(电影)根据康濯小说《春种秋收》改编,编剧:谢力鸣,导演:黄粲等,长春厂

《金铃传》(电影)编剧:左邻,导演:刘沛然,八一厂

[1959]
柯蓝:《洋土结合》(短篇小说)
冯金堂:《红姑娘》(短篇小说)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电影)编剧:马烽,导演:苏里,长春厂

[1960]
柳青:《创业史》(长篇小说,第一部)
李准:《耕云记》(短篇小说)
《耕云播雨》(电影)编剧:李准,导演:魏荣,北影厂

[1962]
管桦:《雾》(短篇小说)
《春潮浪》(独幕话剧)编剧:胡凡沸
《生命的火花》(电影)编剧:邓晋,导演:东方,西安厂

[1963]
郭沫若:《邢燕子之歌》(诗歌)
公浦:《岔河村的姑娘们》(短篇小说)
邓晋:《军队的女儿》(长篇小说)
《又一个回合》(独幕话剧)编剧:胡丹沸
《春光曲》(六场话剧)编剧:金剑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电影)编剧:马烽,导演:苏里,长春厂
《朝阳沟》(豫剧舞台艺术片)编剧:杨兰春,导演:曾未之,长春厂

[1964]
沙丙德:《彩色的田野》(短篇小说)
刘厚明:《秋夜》(短篇小说)
韩文洲:《外队专家》(短篇小说)
李准:《清明雨》(短篇小说)

浩然:《艳阳天》(长篇小说)
《小车老板》(二人转)吉林省地方戏曲剧院“二人转”实验演出队创作
《社长的女儿》(豫剧)河南省商丘专区豫剧团创作
《远方青年》(大型话剧)编剧:武玉笑
《耕耘初记》(现代扬剧)江苏扬剧团
《耕耘初记》(现代京剧)江苏省京剧团根据同名扬剧改编
《草原雄鹰》(电影) 根据话剧《远方青年》改编),编剧:武玉笑,导演:凌子风等,北影厂
《青山恋》(电影)编剧:艾明之等,导演:赵丹等,海燕厂

[1965]
刘厚明:《秋夜》(短篇小说)
刘柏生:《第一次当队长》、《锄头的故事》(短篇小说)
黄天明:《边疆晓歌》(长篇小说)
《在广阔的天地里》(报告文学集)
《新社员》(小话剧)编剧:宝坻县社员赵勤、王文煜、张久英、张刚维等
《年青一代》(大型话剧)编剧:陈耘、徐景贤
《金钥匙》(川剧弹戏)四川省温江专区农村文化工作队
《一颗红心》(三场眉户剧)山西临猗县眉户剧团创作组
《红梅岭》(歌剧)编剧:裴斐,陕西省歌剧院演出
《向阳川》(歌剧)甘肃省歌剧团集体创作,石玺、田广才执笔
《山村姐妹》(电影)编剧:刘厚明,导演:张铮,北影厂
《军垦战歌》(大型彩色纪录片)编辑:杨振亚、邓晋,解说词:郭小川,八一厂

“文革”前沙龙诗歌:
叶三午:《无题》1960
张郎郎:《鸽子》、《理想》1962
陈自强(陈墨):《蚯蚓》1962、《灯花集》1963—1964
黄翔:《独唱》1962

伍立宪(哑默):《海鸥》1964
邓垦(雪梦):《归来啊,我远方的恋人》、《春波梦》(叙事长诗)1964
陈明远:《华山松》(自由体)、《七律·雷雨》1964

[1966]
《造反歌》北航附中红旗
《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清华附中红卫兵

[1967]

红卫兵歌舞剧、现代京剧:
《红灯照》(歌舞剧)首都艺术院校革命造反联络站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歌舞剧)北京中学四三派红卫兵
《井冈山之路》(歌舞剧)清华井冈山兵团
《毛主席的红卫兵》(歌舞剧)林院、农机、北邮、中央歌舞剧院等组织联合创作演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歌舞剧)北京中学四三派红卫兵联合创作演出
《红卫兵战歌》(歌舞剧)北京中学四四派红卫兵联合创作演出
《收租院》(歌舞剧)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革命造反派联合创作演出
《红灯照》(舞剧)中国戏曲学校东方红
《一月风暴》(歌舞剧)上海歌舞剧院造反派
《红卫兵万岁》(歌舞剧)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等组织联合创作演出
《文化大革命万岁》(杂技歌舞剧)上海杂技团、上海戏曲学校、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联合编创
《毛泽思想胜利万岁!》(歌舞剧)红卫兵成都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山城风暴》(歌舞剧)重庆"八·一五"
《晋阳红旗颂》(歌舞剧)红色造反联络站所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联合

编创
《白毛女》(现代京剧)中国京剧院红卫兵
《平原作战》(现代京剧)中国京剧院红卫兵
《敌后武工队》(现代京剧)北京京剧一团红卫兵
《草原英雄小姐妹》(现代京剧)戏曲学校红卫兵

红卫兵话剧:

《平型关》(大型话剧)总政话剧团红卫兵
《海港风暴》(大型话剧)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造反派
《新时代的狂人》(大型话剧)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造反派
《张思德》(大型话剧)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造反派
《五月春雷》(大型话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造反派
《五洲风雷》(大型话剧)中央戏剧学院长征战斗队
《敢把皇帝拉下马》(大型话剧)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千岛星火》(大型话剧)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海港风雷》(大型话剧)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
《海港风暴》(大型话剧)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大型话剧)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等老红卫兵联合演出,申小杰、胡滨、徐稚稚等执笔
《在列宁的故乡》(大型话剧)北京东城区红卫兵联合编创,吴西平、安平、孙丕平执笔
《阿芙乐尔重开炮》(大型话剧)北京四四派红卫兵联合编创
《历史的一页》(大型话剧)编剧:郭路生,北京市东城区红卫兵联合演出
《红卫兵战歌》(声乐套曲)北京中学四四派红卫兵联合创作演出
《红卫兵组歌》(声乐套曲)北京 101 中学老红卫兵

红卫兵诗歌:

吴若:《吴传启三哭》
吴克强(武汉新华农东方红):《放开我,妈妈!》

淮海八三一铁路《工程战报》:《血债要用血来还》
吕凉(武汉):《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
高粱(陕西):《在北京》
雨石(浙江):《从韶山唱到天安门》
鸿耶(东北):《五月之歌——献给美国兄弟》
佚名:《为了毛泽东,我们何惧牺牲》
北京二十六中红尖兵:《某公三哭》
王靖:《满江红·寄国际红卫兵》
北京四中东方红公社"千钧棒":对老红卫兵歌谣的回敬诗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歌选集)

红卫兵小说:

清华井冈山:《刘修外传》(章回小说连载)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清道夫:《王妖丑史演义》(长篇连载)
北航红旗《照天烧》战斗队:《彭贼外传》(小说)
林震:《巴黎公社的后代》(短篇小说)
叶明山:《三走蛇山》(短篇小说)
佚名:《序幕》(长篇小说连载)

沙龙诗歌:

孙恒志:《别京门》(五律)
杨三白:《海洋之歌》(诗歌)
郭路生:《海洋三部曲》、《命运》、《相信未来》、《鱼儿三部曲》
徐浩渊:《满江青》(七绝)
甘恢里:《挽歌》、《生命》(诗歌)
邓垦:《春波梦》(叙事长诗二稿)

文艺大批判:

《与工农兵相结合,彻底砸烂旧文艺界——告全国文艺界革命同志

书》上海文艺界八个红卫兵组织的公开信 1967.2.5

《毒草示众》人民文学出版社锄毒草战斗组 1967.6

《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美梦》(旧北影厂 1961—1970 年电影剧本选题规划)北影厂狼牙山战斗兵团 1967.6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15 年上演剧目表》(200 个剧目)北京人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旗红卫兵 1967.6

《周扬集团在外国文学方面推行名洋古黑线罪恶史》人民文学出版社革命造反派、红代会新师院鲁迅兵团 1967.6

有关《出身论》的论战:

《出身论》"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中学文革报》1967.1.18

《〈中国青年〉是推行惟出身论的罪魁祸首》本报编辑部《中学文革报》1967.2.10

《文化大革命以前有无血统论》北京 4 中红旗《中学文革报》1967.2.10

《工农兵谈"出身"》《旭日战报》(特刊)北京轻工业学院旭日战斗队主办 1967.4.8

《一对兄弟两只疯狗》金猴战斗组《红鹰》北京轻工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鹰》兵团主办 1967.3.16

《棒喝〈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卑劣手段》《东风报》首都中学红卫兵司令部主办 1967.3.19

《〈中学文革报〉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喉舌——兼评反动的〈出身论〉》人大附中赤胆红心红卫兵《首都风雷》1967.1.27

《他们为什么不敢表态? ——浅评'左'点比'右'点好》北京女二中《伏虎》战斗队《中学文革报》(1967.3.6)

[1968]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诗选)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

王靖(彭忆东):"三寄"(寄往事、寄广阔天地、寄国际红卫兵)、"三别"

(少年别、父兄别、从军别)
史保嘉(齐简):《临江仙·记康宁的四条热带鱼》、《满江红·答友人》
孙恒志:《七律·无题》
甘恢里:《赠友》、《回忆》(诗歌)
郭路生:《酒》、《烟》(诗歌)
甘恢里:《芙蓉花盛开有时候》(短篇小说)
陈自强:《疮痍》(长篇小说)、《乌夜啼》(诗歌50首)
张木生:《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
徐浩渊:《陕西农村考察报告》(调查报告)
北京四中老红卫兵集体讨论,孔丹执笔:《时代——使命——准备(讨论提纲)》
王好立:《读书札记》
赵金星:《历史哲学》

[1969]
臧平分:《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政治幻想诗)
佚名:《军队的女儿》(政治幻想诗)
李仲琪:《农迎你》(诗歌)1969—1972
何友中:《思念》(诗歌)1969—1972
杨光熙《蒙古包赞》(诗歌)1969—1972
李志伟:《马群下夜》(诗歌)1969—1972
尹占华:《五律·秋思》1969
赵秉宜:《七绝·下雨》1969
叶小静:《七绝·牧羊女》1969—1972
刘玉平:《找马》(放马杂记之二,打油体)
施小明:《清平乐·冬牧》
邢奇:《虹》、《晨》(七律)、《四季》、《包中即景》、《骑马》、《生活小照》、《初冬未雪已寒》、《油灯半暗》(打油体)
李三友:《阿巴嘎的春天》(散文)1969—1972
李大同:《赠干锡力日记》(散文)1969—1972
王唯本(内蒙古知青):《一年》(中篇小说)1972

佚名(内蒙古知青):《小青马》、《打狼》、《五年》(散文)1969—1972
陈自强:《孤星集》(诗歌48首)、《残萤集》(1963—1969新诗200首)、《砚冰集》(1963—1969诗词500首)、《中国新诗大概选》(第一分册1918—1928)
毕汝协:《九级浪》(中篇小说)

[1970]
王靖:《决裂,前进》(讽刺长诗)
杨东平:《第二步》(诗歌)
郑义:《兴安行》、《阿荣行》、《海山行》(札记)
佚名:《逃亡》(短篇小说)

[1971]
徐浩渊:《海岸·贝壳·少年》、《如果我能够》、《给自己》、《给我的好立》、《给依群》、《一颗星星在升起》(诗歌)
王好立:《我站在轮船的左舷》(诗歌)
依锡群(依群):《给你》、《纪念巴黎公社》(诗歌)
谭小春:《在拖拉机印过的路上》(诗歌)
孙康:《唱下去吧,无产阶级的战歌——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篇政论诗)
郑义:《闪闪的红星》(短篇小说)

白洋淀诗群:
岳重(根子):《三月与末日》1971、《桔红色的雾》1972、《白洋淀》、《深渊上的桥》(时间不详)
姜世伟(芒克):《致渔家兄弟》1971、《十月的献诗》1974、《给》1974、《我是风》1975
栗世征(多多):《回忆与思考》、《密周》1972、《万象》、《致太阳》、《手艺》1972—1973、《教诲——颓废的纪念》1976
孙康(方含):《在路上》1973—1974、《谣曲》1975

张建中(林莽):《26个音符的回想——献给逝去的岁月》1974
宋海泉:《海盗船》1973、《流浪者之歌》
潘青萍:《行香子——和戎雪兰》1969
孔令姚:《友情——赠潘婧》1971
赵哲:《无题》1971
周陲:《情思》1971

[1972]
广州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编:《踏遍青山人未老》(报告文学集)
郭小林:《战士爱边疆》(《兵团战士》报1972年新年献诗)
张国全:《道路》(四幕歌剧)、《新年》(独幕剧)、《队长》(短篇小说)、《海燕》(中篇小说)、《中国与世界》(长诗)、《格尔丹》(叙事长诗)(以上1972)、《白皮书回忆录》、《大江三部曲》(长诗)(以上1973)
岳重:《致生活》
李向真:《五律·插队五年》
邢奇、施小明、刘玉平、陈达实、董士芳:《马背上的歌》(半旧体诗71首)
刘小阳编:《扎洛集》(新旧体诗80首)
甘铁生:《第二次慰问》(中篇小说)
野鸣编:《空山诗选》(成都沙集诗选,收14家150首)

[1973]
郭小林:《考验我们吧,时间——和青年战友共祝新年》(《兵团战士》报1973年新年献诗)
广东人民出版社:《峥嵘岁月——上山下乡知青短篇小说集》
《扬帆万里》(大型话剧)编剧:陆天明
赵振开(北岛):《五色花》、《金色小号》、《你好,百花山》(诗歌)1973—1974
王江:《梦》(长篇小说)

[1974]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72 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理想之歌》(长诗)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文艺宣传队:《前进——年轻的兵团战士》(诗表演)
上海人民出版社:《农场的春天》(知青短篇小说集)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边疆主人》(短篇小说、散文集)
江雷:《剑河浪》(长篇小说)
郭先红:《征途》(长篇小说)
《山村新人》(六场话剧)吉林省《山村新人》创作组
《樟树泉》(四幕话剧)编剧:陆天明
《延安的种子》(电影剧本)编剧:华彤
赵振开(北岛):《太阳城札记》、《候鸟的歌》、《日子》(诗歌)
张扬:《第二次握手》(长篇小说)
牟敦白:《霞与雾》(中篇小说)、《夜茫茫》、《胎衣》、《快跑——89 次列车正点发出》、《脸谱》、《季风之歌》、《在船上》(短篇小说)
刘自立:《圆号》、《仇恨》(短篇小说)1974—1975
赵振开(北岛):《波动》(中篇小说)1974—1976
张寥寥:《日蚀》(六场话剧)

[1975]
张抗抗:《分界线》(长篇小说)
《人老心红》(淮剧)上海市人民淮剧团创作
舒婷:《赠》、《船》、《心愿》(诗歌)
赵振开(北岛):《结局或开始》(诗歌)

[1976]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73 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展翅篇》(诗歌)
唐巍:《反击右倾翻案风》(诗歌)
李小雨:《红卫兵颂》(诗歌)

刘薇词:《每当唱起红卫兵战歌》(歌曲)
齐金发词:《每当唱起红卫兵战歌》、《我爱红卫兵日记》(歌曲)
清华附中红卫兵词:《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歌曲)
清华附中、北京31中两校教师:《毛主席的红卫兵》(故事集)
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972、73级工农兵学员《翠绿的秧苗》(短篇小说集)
陈建功:《荷泽惊雷》(短篇小说)
王士美:《铁旋风》(长篇小说)
陆天明:《火,通红的火》(四幕话剧)
《雁鸣湖畔》(电影)编剧:张笑天、王维臣,导演:高天红,长影厂
《征途》(电影)编剧:薛耀先等,导演:颜碧丽等,上影厂
《寄托》(电影)编剧:高缨等,导演:叶明等,峨眉厂
赵振开(北岛):《回答》(诗歌)
《空山诗选》(成都沙龙诗选 吴鸿再编,收9家204首)内收:《独白》陈墨1971、《夜巡》徐坯1966、《迟开的荷花》白水1969—1970、《鹰嘴岩》吴阿宁1973、《中秋寄云南》吴鸿1974、《透明的翅膀》蔡楚1975、《南昌,我在呼唤》野鸣1976、《抢水谣》九九1972

[1977]
董康定:《重逢在纪念堂工地》(诗剧)

[1978]
卢新华:《伤痕》(短篇小说)
孔捷生:《在小河那边》(短篇小说)
甘铁生:《聚会》(短篇小说)
郑义:《枫》(短篇小说)

民刊发表的知青小说:
刘峰:《默默祝福》(短篇小说)
燕女:《凋零》(短篇小说)

华岳:《你话点算》(短篇小说)
澜:《灵光》(长篇小说)

《今天》发表的作品:

诗歌:《相信未来》(食指)、《巴黎公社》(依群)、《十月的献诗》(芒克)、《回答》、《雨夜》(北岛)、《谣曲》(方含)、《纪念碑》(江河)、《也许》(舒婷)、《歌手》(田晓青)、《山影》(顾城)、《蓝色狂想曲》(杨炼)、《风景画》(蔡其矫),《莫生的海滩》(北岛诗歌专集)、《心事》(芒克诗歌专集)、《从这里开始》(江河诗歌专集)。

小说:《风雪交加之间》(万之)、《原谅我,兄弟》(甘铁生)、《没有阳光的角落》(史铁生)、《圆号》(刘自立)、《波动》(北岛中篇小说连载)。

[1979]
张扬:《第二次握手》(长篇小说)正式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放的鲜花》
王靖:《在社会档案里》(电影文学剧本)
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大型话剧)

[1980]
叶延滨:《干妈》(组诗)
梁小斌:《雪白的墙》(诗歌)
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短篇小说)
陈可雄、马鸣:《杜鹃啼归》(短篇小说)
孔捷生:《普通女工》(短篇小说)
靳凡(金观涛):《公开的情书》(中篇小说)
《大桥下面》(电影)上影厂

[1981]
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诗歌)
北岛:《波动》(中篇小说)

礼平(刘辉宣):《晚霞消失的时候》(中篇小说)

[1982]
舒婷:《双桅船》(诗选集)
张承志:《绿夜》(短篇小说)
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短篇小说)
王安忆:《本次列车终点》(短篇小说)
陈村:《蓝旗》(短篇小说)
魏继新:《燕儿窝之夜》(中篇小说)
叶辛:《蹉跎岁月》(长篇小说)
路遥:《人生》(长篇小说)

[1983]
史铁生:《遥远的清平湾》(短篇小说)
王安忆:《命运交响曲》(中篇小说)
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篇小说)
孔捷生:《南方的岸》(长篇小说)
《我们的田野》(电影)编剧:晓剑,导演:谢飞,北影厂

[1984]
梅绍静:《她就是那个梅》(诗歌)
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1984—1986
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知青小说选》

[1985]
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诗歌)
孔捷生:《大林莽》(短篇小说)
朱晓平:桑树坪系列:《桑树坪纪事》1985、《桑塬》、《福林和他的婆姨》1986、《私刑》1990
柯云路:《新星》(长篇小说)

[1986]
李晓:《机关轶事》、《继续操练》(短篇小说)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三十人集》(黑龙江知青作家小说选)
贺绍俊、杨瑞平主编:《知青小说选》四川文艺出版社
陆天明:《桑那高地的太阳》(长篇小说)

[1987]
池莉:《烦恼人生》(短篇小说)
马波(老鬼):《血色黄昏》(长篇小说)
王安忆:《69届毕业生》、《流水三十章》(长篇小说)

[1988]
多多:《多多诗选:里程 1972—1988》(油印本)、《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散文)
肖复兴:《哦,老三届》(报告文学)
梁晓声:《雪城》(长篇小说)

[1990]
林莽:《林莽的诗》(诗选)
郭小东:《中国知青部落》(长篇小说)
张承志:《心灵史》(长篇小说)
《北大荒风云录》(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回忆录)
《北大荒名人录》(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人名录)
《辉煌的青春梦》(湖南知青回忆录)

[1991]
《青春毋悔》(云南支边生活纪实)
《海南不会忘记》(电视专题片)郭小东、晓剑撰稿,张泽熔编导,广东电视台摄制
《草原启示录》(内蒙古知青回忆录)

[1992]
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自传体长篇小说)
叶辛:《孽债》(长篇小说)
晓剑:《中国知青在海外》(长篇小说)
张胜友:《国际大串联》(报告文学)
丁雨雨:《中国知青在外国》(报告文学)
郑贤:《中国知青梦》(报告文学)
《知青档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纪实 1962—1979》(四川知青回忆录)
《回首黄土地》(山西知青回忆录)主编:王子冀
《绿色的浪漫——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纪实》编辑:贺鹏、陈文斌
《蹉跎与崛起——55 位知青的人生道路》(知青文化丛书)主编:何世平
《蹉跎小咏叹调——知青小说》四川文艺出版社,内收 16 位知青作家——王安忆、徐乃建、甘铁生、韩少功、陶正、陈村、梁晓声、张承志、张蔓菱、史铁生、乔雪竹、李海音、陆星儿、吴欢、铁凝、阿城的代表作品。
《中国知青部落》(8 集电视连续剧)根据郭小东同名小说改编,广州电视台拍摄。

[1993]
陈墨、蔡楚:《鸡鸣集》(诗集)
史铁生:《我与地坛》
晓剑:《中国知青秘闻录》(长篇小说)
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自传体长篇小说)
杜鸿林:《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 1955—1979》
费声:《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
《难忘鄂尔多斯》(南京知青回忆录)
《老插话当年》(京、津、太原等地山西顿队知青回忆录)
《历史为平凡作证》(知青画册)

《中国知青部落》(电视连续剧)编剧:郭小东,广东省电视台拍摄

[1994]
邢奇:《老知青聊斋》(散文集)
郭小东:《青年流放者》(长篇小说,"中国知青部落"第二部)
金大陆编:《苦难与风流——老三届人的道路》
何岚、史卫民:《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
《青春方程式——50名北京女知青的自述》主编:刘中陆(柏林自由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雪城》(电视连续剧)编剧:梁晓声,黑龙江省电视台拍摄

[1995]
谢春池:《谁为我们祝福》(短篇小说)
金永华主编:《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
王江主编:《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
《遭遇昨天》(电视连续剧)
《荣辱商界》(电视连续剧)

[1996]
杜九森:《九九谐诗》(诗集)
徐晓:《无题往事》(散文)
钱宁:《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报告文学)
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
顾洪章、胡梦洲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情系黄土地——北京知青与陕北》主编:孙立哲
《我们曾经年轻——武汉知青回忆录》主编:董宏猷
《年轮》(电视连续剧)黑龙江省电视台拍摄
《孽债》(电视连续剧)上海电视台拍摄
《北京人在纽约》(电视连续剧)北京电视台拍摄
《人生如歌》(湖南江永知青返乡活动电视片)湖南广播电视台拍摄

[1997]
邢奇:《华年》(诗选)
王小波:《黄金时代》(长篇小说)
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1998]
郝海彦、滕为、朱吉余、岳建一等主编:《中国知青诗抄》
王小波遗作:《马但丁》(短篇小说)
赵刚:《枪令》(晚生代短篇小说)
刘汉太:《忆苦月》(晚生代短篇小说)
何顿:《眺望人生》(长篇小说)
马波(老鬼):《血与铁》(长篇小说)
柯云路:《发现黄帝内经》
朱文杰:《老三届采访手记》(报告文学)
田大卫:《老知青写真》(报告文学)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 1953—1968》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 1966—1978》
章德宁、岳建一主编:《青春极地》、《青春炼狱》、《青春祭坛》(纪实文学)。
《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内收 12 位知名知青作家——陈建功、高洪波、肖复兴、叶辛、赵丽宏、陆星儿、张抗抗、王小鹰、毕淑敏、范小青、叶广基、贾平凹的回忆录。

[1999]
《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主编:谢春池
《告诉未来——湖南知青纪念文集》主编:郭晓鸣、彭崇伟
《沉沦的圣殿——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主编:廖亦武
谢春池:《我知道,我是一个永远的知青》(文学评论集)
陈燕妮(旅美作家):《遭遇美国》(报告文学)
肖复兴:《绝唱:老三届》

《有话好说——知青岁月》(湖南卫视谈话节目)

[2000]
陈燕妮(旅美作家):《美国之后——50个旅美学人的归国》(报告文学)
陈墨主编:《野草之路》成都野草文学社诗文选

主要参考书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1
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讲义)1983.12
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人民出版社 1989.7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12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9
赵无眠:《文革大事年表》明镜出版社 1996.10
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田园书屋 1997.6
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 1949—1989年的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11
第四次文代会筹备组起草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理论政策研究室:《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1979.10
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5
汪名凡:《中国当代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李计谋、王居瑞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1
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5
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5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 1953—1968》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1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 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1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1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1
史卫民、何岚:《知青备忘录——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3
刘胜骥:《中国大陆地下刊物研究——1978—1982》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1990
仲维光、还学文:《意识形态阴影下的知识分子》德国备尔大学出版 1994
张明策划、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4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 1999.12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上海三联书店 1994.9
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 1999
贺雄飞主编:《思想的时代》(《黄河》忆旧文选)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1
孟繁华主编:《九十年代文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ZHONGGUOMINJIAN
WENBEN

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中国民间文本

民间观察丛书　民间境界丛书　民间记忆丛书　民间阅读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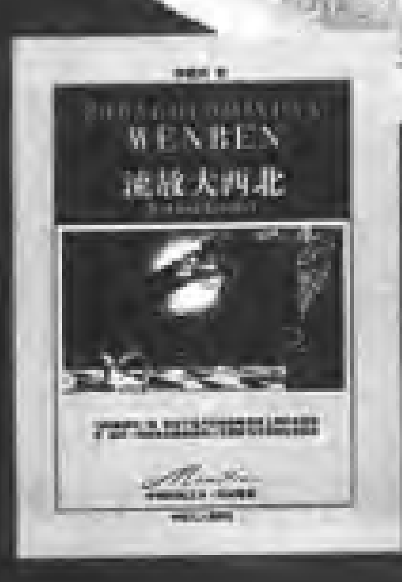
MinJian











独立品格
自由思索
大美境界

献给曾经是孩子的知青和知青一代的孩子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让真实的历史在这里凝固为化石　碑林和铜鼎铭文

请未来世纪的文明记住：太阳系这颗最壮丽的行星上

曾经有过怎样空前绝后的一页历史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尤重长篇纪实文学、长篇非虚构文本及长篇纪实小说，提倡记忆的自尊、自主、自立、自强和记忆的精神品性、灵性、个性及血性。《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拒绝表述记忆的僵化、矫饰、轻浅和圆通。《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鼓励将记忆靠近良知的自我解剖与灵魂酷审。《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有心从虚饰中突围，深刻楔入人类精神的真实处境，从而获得一种广阔而深远的历史感与人类感。

献给曾经是孩子的知青和知青一代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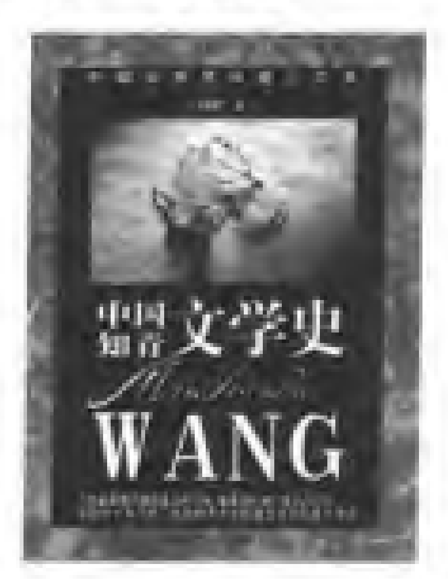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让真实的历史在这里凝固为化石 碑林和铜鼎铭文

请未来世纪的文明记住：太阳系这颗最壮丽的行星上

曾经有过怎样空前绝后的一页历史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尤重长篇纪实文学、长篇非虚构文本及长篇纪实小说，提倡记忆的自尊、自主、自立、自强和记忆的精神品性、灵性、个性及血性。《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拒绝表述记忆的僵化、矫饰、轻浅和圆通。《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鼓励将记忆靠近良知的自我解剖与灵魂酷审。《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有心从虚饰中突围，深刻楔入人类精神的真实处境，从而获得一种广阔而深远的历史感与人类感。


Remember
记忆
1


Remember
记忆
2


现时代面影丛书
鲁迅档案：人与神
左右说丁玲
巴金：从炼狱走来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曾焰 著　长篇纪实小说

闯荡金三角

亲爱的读者：

这是一群知青万劫不覆的流亡异国史。

作者以深痛莫解的文字，还原了知青流亡金三角的真相，像一道血淋淋的闪电，探入了亲历者们万千苦难和恐惧的底蕴，令人目眩而又惊心。读下去吧，朋友，这里是东方古大陆最严酷的又一时辰：一群群沦为贱民阶级的“黑五类”出身的中国知青，不堪新的人种歧视和阶级斗争酷境，逃难异邦，在革命造反者们无所不在的血腥追杀中，亡命莽林，亡命荒岛，亡命缅甸人烟稀少的深山腹地，依然危机四伏。漫道少年英气尽劫去，天地安知游子心。有的形似土匪，大义认真；有的心如古墟，纵欲人生；有的用心险恶，为暴发不义横财挑起内讧、枪战、火并；更有的生死穷达，不移其操，仅剩蓬头苦胆，也要心忧天下，以超越命运的执拗，解救同胞于血雨腥风。一任石上啼痕斑驳，白骨几缠草根，殉难、殉义、殉情、殉善，殉不甘生命尊严被追杀殆尽的人事，一览极苍茫。置身其间，你将为隽秀嶙峋而又富有表现力的缕述心存感动，为遭尽劫的青春、爱情、生命震撼，为海内外同类题材中前所罕见的人性力量惊叹。于是，不是传奇胜似传奇的一页幽邃历史，从此不再虚悬于历史。嗟呼！

——编者

内容介绍：

金三角原始莽林腹地，万壑幽奇，足迹明灭。

一同明灭的，还有一群群中国知青流亡异国的万劫不覆的真相。乾坤疮痍深，苍生何罪有。主人公们心死甚于身死，于惊险万状中偷渡出境。从此，开始了红色蒙昧中的逃生、逃荒、逃窜、逃匿，亡命天涯，无所皈依。从此，血雨腥风，净土无几，活着便难以走出生存的恐怖、无奈、追杀、绝境和变化的闹剧。从此，本该是求学的青春花季，却无险不弄，无祸无患，无奇不有。从此，集体夺枪越狱，大闹缅甸法庭，行乞莽林村寨，采玉猎兽垦荒。从此，武装接应逃难知青，潜返国内散发传单，内讧火并自相残杀，以宝石行贿解救同胞；更有暴发横财者，沉湎酒色者；胆识卓远者，苦胆忧天下，至情至义，历尽沧桑而九死不悔。该作以自然、生动、深邃的诚实及隽秀嶙峋的行文，深入一页罕为人知历史中最深隐、最动荡、最确凿的领域，深入亲历者们真实命运的原生形态，深入形形色色亲情、爱情、友情深痛莫解的苍凉、悲烈与凶厉，寻幽觅微，出经入纬，使曾经难以索解而又沉重似铁的历史真相不再虚无。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王泽恂 著 长篇纪实文学

逃亡

亲爱的读者：

当太多记忆沦为荒漠时，作者以血以泪以二十年心力，将深埋在荒漠下的记忆沉重地托起。从此，新疆大漠荒风深处，一种知青逃亡险恶万状的史实，不再像塔里木河一样，消失得一片荒茫。从此，逃亡者穿越荒漠"死亡之海"的足迹，以尿解渴、以鼠肉死禽野果充饥的绝谈抗争，乘独木舟漂泊在曾经波浪滔滔的塔里木河的身影，逃亡在天山雪峰绝壁的呼喊，浪迹江湖时的沿街行乞、装扮瞎子、卖血谋生的经历，耸立成了历史。从此，逃亡者们曾经有过的绝痛深深的耻辱与锐痛深深的情恋，不再枯涸在血脉里。从此，知青当年自编自唱的流浪者之歌不再久绝——"我流浪走过多少地方，我看这世界就像屠场。善良的人啊你再不要梦想，自己救自己才能走出荒凉……"一似天地玄黄，又逢人造洪荒。这里是古大陆最混沌而又蒙昧的岁月，一如时间的尽头，无昼无夜。知青主人公们可以浪迹天涯海角，却逃不出言出祸随、以文罗难的阶级斗争恢恢天网，逃不出谎言四伏、告密四伏、虐杀四伏的阴剧。朋友，你向这个世界深深地望去吧，每一寸光明里都凝聚着本真的历史，每一位逃亡者都浑身披沥着耻辱的污垢，每一个灵魂都没有活着逃离，每一具骨骼里都饱满着低劣的、半原始的愚忠的髓液。主人公穿越塔里木河及其两岸星罗棋布的湖泊、原始森林逃亡时，各类水鸟遮天蔽日，各种野兽出没无常。主人公告别塔里木河（曾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时，由于人为的毁坏，只剩下满目荒漠，一切都消失了，消失得连遗迹都荡然无存。主人公愕然诘问，人世间有了劫难可以逃亡，大自然遭遇了劫难可以逃亡到哪里去呢？呜呼！

不忆其痛其耻，才能惊警长久，永诀其耻其痛。

——编者

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知青逃亡者不堪其辱的逃亡史记。主人公因言获罪，从此受尽凌辱和酷刑，被剥去爱情、英气、尊严、性灵和人的一切禀赋，活得像畜牲，终于不堪折磨，开始了逃亡生涯，从塔里木河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死亡之海"，从内蒙古武斗现场到江南水乡、山林，曲曲折折，履遍隅边，阅尽森罗万象而又被极端圣化的阶级斗争闹剧，更阅尽凌驾于一切戒律之上的谎言。非有人的企望，由然沦为"罪人"。知青"罪人"们的"罪行"荒诞得一如神话：一言不慎，一次胸明，一个表态，一次收听外国广播电台……皆会被劳教、囚禁、判刑、污辱、捆绑、吊打、批斗。批斗五花八门，有文斗、陪斗、武斗、窝里斗；有团伙在地像畜牲一样任人牵着游斗；有满身披沥墨水、粘痰、唾液的围斗；并且被勒令做出各种最丑恶的姿势。于是，知青中有了出卖告密者、摇尾争宠者、落井下石者、集体下跪请罪者，有了相扶相携者、舍胆仗天者，有了"一定活下去"的石破天惊的雷鸣，有了在惊险万状的追捕中集体穿越天山绝境的悲壮大逃亡。至此，人类的蒙昧年代中最黑暗与最目眩的一页，不再历史性地滑出历史。一并载入文字的，还有塔里木河（曾是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及其两岸原始森林人为地荒漠化的令人惊骇与痛心的本真情境。作者以拒绝虚饰的精神，极肝沥胆二十年，五移其稿，虽然尚有粗砺之处，却更有一种酷暖，一种苍凉，一种直逼知青流浪生活底蕴的长驱直入，读来令人震撼，催人泪下。

中 国 知 青 民 间 备 忘 文 本

杨志军 著 长篇纪实小说

大 祈 祷

亲爱的读者：

日与月与，尽无日夜。

这里真实的红色荒诞，有别于宇宙间一切生息，渊渊浩浩，难以穷极。读下去吧，穷荒绝漠内外，每一希望都是绝望；每一现实必是死亡；每一命运都不能选择；每一爱情都只剩下最无奈、最混沌、最原始的禽兽欲望；每一土地都积冤、积贫、积愚、积弱、积病深重；每一宇宙之子都被劫尽魂魄，空留廉耻深深恒健深深而又栩栩如生的皮囊。于是，背对苍茫莽莽的昆仑山脉，一群充满理想和热情的知青，仅仅因为一次十分平常的小型聚会，便被判重刑，被流放于大漠无限荒寂的深处，被轮番游斗，被愚化、畸化、奴化。于是，知青主人公们人生全部的作为、理想乃至活着的意义在于逃跑、申诉、寻找无罪见证人：从监狱逃，从荒原逃，从狼嗥深处逃，从食人土匪窝巢逃。于是，终于没有逃出披着人皮和神皮的丑类们制造的辽阔深远而又血腥奥渊的荒诞。这独特于一切正史、野史、神话乃至寓言记载过的荒诞，更在于以神圣的名义对人的精神的漫长的流放，直至流放成无骨无血、无精无气的生物，流放成血脉里、基质里也融入了太多荒诞的白发老翁、老妪，流放成勤于卑琐、庸俗和善于麻木、无耻的行尸。曾经横亘在古大陆上的红色荒诞，没有谁可以企越，绝耻深深而又无所不在无奇不有。值此时过境迁之际，我想，作者直面和直証史实、史弊的努力，或许会是善于遗忘的世界里一道骇亮的闪电。

——编者

内容介绍：

一群心性纯真而又有理想有抱负的男女知青，因为一次平常的小型聚会，遭到逮捕，被判处15至20年徒刑，并且流放于莽莽昆仑山下的荒酷深处。从此，他们被监禁、游斗，被驯化、畸化、兽化。从此，他们屡逃屡囚，屡囚屡逃，人生的全部作为乃至活下去的目的在于逃亡、申诉、寻找无罪见证人。从此，他们自发抗争，割腕自杀，精神失常，惨遭轮奸。从此，他们始于荒诞胜似传奇的真实经历，惊天动地而又绝痛绝耻震撼。从此，他们跋涉于穷荒绝漠，漂泊于戈壁格勒河，挣扎于食人土匪巢穴，混迹于移民原始部落，蓬头垢面，身裹兽皮，甚至茹毛饮血。从此，他们性饥渴、性摧残、性放纵，连最纯洁的爱情也沉陷于原始的荒诞的兽欲的深渊。他们依然还在申诉、逃亡，精神却先于肉体崩毁了，一如行尸。当主人公们终于没有逃出披着人皮和神皮的丑类们制造的辽阔深远而又无所不在的荒诞时，已经成了勤于庸俗和善于麻木的白发老翁、老妪。

作者曾以浮雕般力度，推出过长篇纪实文学《无人部落》，现在又以坚实的笔触，以深刻揭示红色荒诞真相的不懈努力和创作实践，沉郁凝重的行文，完成了这一三部曲的作品。读来震撼巨深，惊叹不已。

中　国　知　青　民　间　备　忘　文　本

杨健 著　长篇史志

中国知青文学史

亲爱的读者：

历史，是人类精神生命与文化生命的行迹。

一片失去本真行迹既久而又讳莫如深的古大地，会有独立、自由和富有民间识见的历史行迹记述吗？一个产生过太多愚忠文学、健忘文学、卑怯文学、麻木文学的知青群体，会有不再漠视自己血泪体验的真正的史记和文学吗？会有纵深深入自身混沌的烛火吗？道有险夷，颠沛者知。作者以亲历者的深醒，拒绝趋奉，秉烛远行，探入知青文学的原始基质、原始孕育和原生血脉、原生形态深处，探入渊渊浩浩的史料中有思想含量的活质，探入"杀！向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混蛋，杀"、"白宫红场捣贼穴"、"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投身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山下乡干革命，红卫兵斗志还是那样旺"的文学旷史荒诞及种种衍变。作者说过，"与其等待后人批判，不如由我们自己来严正地审判自己。"这是一种怎样的忧思、承担与胆力！朋友，读一读这部书吧，因为心灵最高贵的善良就是正视历史，因为最卑贱的惰性就是漠视历史，因为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独特于太多圆通、卑怯、浮躁文字的知青文学史，因为该作也是一枚聚蕴了诚实品性的化石，从此将去承迎风剥雨蚀，刀霜剑寒，以给后人留下辨别、考证和思索的原质，更因为字里行间透有一种民间精神不息而生生。

——编者

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具有自由思索和民间立场的知青文学史。

作者以坚韧的努力与敏锐识见，从将近半个世纪浩瀚的知青文学资料中，穷本溯源，剥伪存真，精炼出独特于太多流行的、统一的、通俗的言说的真知，形成了这部具有思想含量的中国知青文学史志，缜密、生动、翔实而又富有真相、真况容量。尤为可贵的是作为文化、生命、精神浩劫年代的亲历者，其作其文拒绝讳言知青文学衍生中的自愚、自阉、自蹈、自膺、自恋，直逼其深远的历史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直取其血脉、细胞、基因乃至遗病与顽痛，精剖细析。内中有关奠定知青文学基础的红卫兵文学的卷章，原始资料丰富，系多年的收集、积累，不为多见。全书字里行间，奔涌着冷凛的批判意识和拒绝趋奉的执拗的诚实，读来或汗颜或惊警或不悦，百感莫辨。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王子冀 庞沄 编著 长篇摄影纪实

守望记忆

亲爱的读者：

陆海升迁，沧桑衍化，黄土高原隆起。一同隆起的，还有人祸无尽，战乱不绝；还有一个又一个世纪政客、痞子、暴君、帮主、骗子、屠夫巍峨而又绚丽的牌坊；更有"世上苦不过受苦人"的悲歌一代代唱入苍茫。于是，横亘在西北天宇下的土地神话般地贫瘠，流徙、流亡、流放者如蚁。及至20世纪中叶，成千上万既缺乏知识又被剥夺学业的少男少女，正史称之为知识青年，轰轰烈烈而来，凄凄惘惘而去。从此，人为地变农民的遗民历史而为市民（未成年者极多）的流民历史，构成了独特、复杂、丰富而又荒唐的千古一页。历史的本真，是需要民间记忆的品性和骨质来支撑的。本真的历史，是再造尊严而不是卑贱、卑怯、卑鄙的灵魂和历史的巨大精神资源。感谢王子冀、庞沄两位编著者，从民间立场出发，不辞辛劳地集合起九十多位历史参与者的记忆，以当年的图片，以具有穿入原生状态力量的文字，更以对父老乡亲的挚情和洞穿陕北风情的幽深目光，完成了这部动人至深的长篇摄影纪实。置身其中，一如沉入有生命的疼痛、悲悯、迷茫和辽远的人造洪荒。你将不仅看到触目惊心的贫穷与蒙昧，还将领略贫弱生命深处令人为之唏嘘为之尊敬的痛苦。尤其令人尊敬的，是星光般闪烁于图文之中的作者的自省精神。

读下去吧，朋友，这里的记忆尚未霉湿和风干。

——编者

内容介绍：

这里的贫穷，依然是亘古的贫穷

这里的蒙昧，依然是亘古的蒙昧

这里的严酷，依然是亘古的严酷。

九十多名历史的参与者，曾经挥别青春，走进西北天宇下贫穷、蒙昧、严酷而又苍凉万端的黄土高原腹地，走进悠悠升起的信天游深处，与原始般劳作的父老乡亲日出同作，日入同息，几近同化。虽然他们没有走出人祸浩浩的阶级斗争天网和颠倒文明进程的庄严的闹剧，却悖逆了教科书一贯说教，以血以泪以难挽的韶光，亲验了中国社会最底层令人心碎的真情，逼近了真知。今天，九十多名真实记忆的恪守者，以图以文，以锋利的生命细节和锋利的历史细节，更以被欺害、被愚弄、被荒唐过的亲历，努力还原着原生状态：那准备上山打游击的愚忠，比人种歧视更人为、更残酷、更具封建世袭性的《血统论》，越穷越破坏生态的无知；那与乡亲们一同在太阳下捉虱蚤的情状；那白毛巾、羊皮袄、大裤裆、百纳鞋、红兜肚和历尽国殇依然生生不息的陕北民歌、转灯、闹秧歌、撒旱船……那活化石般存在而又有别于一切碑载文化的丰富的陕北风情；那瘦骨嶙峋的知青脊背、凄凄荒草中隆起的知青孤坟，无不可感可触，动人至深。尤其震动人心的，是作者没有讳言知青们无辜打死农民行乞者的事实。是鉴而历史？是拷问灵魂？该书以拒绝虚饰的民间记忆品格昭示：

人类最本质的尊严与文明，在于正视自我。

国 知 青 民 间 备 忘 文 本

野莲 著　长篇纪实文学

落荒

亲爱的读者：

那是《血色黄昏》出版不久的一天，一位陌生的憔悴女子找上门来，哽咽泣诉。原来，她正是该书涉及的一个人物。我被《血色黄昏》背后更为真实、惨烈、不忍卒闻的故事深深地震撼了——人间竟有这样的旷世绝情！她说，我想写出来，你是《血色黄昏》的责任编辑，同意为我出版吗……十年过去了，她突然寄来一尺厚的稿件。原来，她在极其艰难的困境中，不舍昼夜，数易其稿，发愤写作至今。此后，在我的苛求下，她又三易其稿。前后累计二百万字，历时 12 年，并且广为征求意见，终于成书。这是何等罕见的坚韧！畅想，凡是读了这部以生命以血泪为代价书写的 38 万字的作品，纵有铁石心肠，也难禁怆然泪下。曾经是花蕾一样美好、年轻的生命，除了贫穷、不再年轻和不堪回首的记忆，几乎已经是一无所有。朋友，读下去吧，你将洞见是什么击碎了纯洁的爱情梦想，虐杀了人的天赋权利，夺走了生命中一切最实质的生命；你将目睹最诱人而又最苦涩的爱情里，伏满了怎样的幻灭、毁灭和骗局；你将领悟人可以忍受的精神痛苦极限是什么，谁在以动人的名义杀人、戕人、弃人，谁在为谁埋葬生命的终极意义；你将为茫茫文明荒野的深邃、辽阔、恐惧动魄，为放逐者远去的灵魂漂泊、困顿、苍凉惊心。不必慨叹，能够走出遗忘的，必然很重，重如历史；不能步出悲剧的，终将很轻，轻如亘古的晚霞。

——编者

内容介绍：

浩莽、神秘、深邃的内蒙古大草原腹地，群狼与野

跟踪在狼嚎深处的，还有一位纯洁、善良、貌美草似的北京女知青。她深挚地爱上了知青领袖——当年的造反派首领，从此，被掳去了思想，一同寻找反修防修的真理；从此，她爱得苦涩、焦虑、恐惧、迷茫、失落、惨烈、苍凉，心碎得都在滴血；从此，由盲目到盲从，受到"知青反革命小集团"、"内人党"牵连后，因为抗拒揭发以整个生命爱着的知青领袖，遭到监禁、斗争、诱供、劳改、凌辱，受尽折磨。深怀"牧人"大志的知青领袖获罪思想，被捕入牢，不堪非人的虐待，绝食、装疯，自杀未遂，最后，因为恐怖，更因为仅有领袖之志而无领袖人格，出卖了亲哥哥、嫂嫂，险些酿成人间惨祸。他成为自由人后，又为生死相许的女主人公设下陷阱，惊心动魄。是自劫？是人祸？是天意？武斗、抄家、夺权、逃难、行乞、拒捕、跪哭、盲从、内讧、劫狱、暴动、自焚，尽在这千古轮回的人造混沌中，读来似曾相识而又不忍回视。

本书，是来自历史瓦砾的生命史记。

本书，是一位历尽沧桑的女性义无反顾地捧出的心灵珍藏。

中　国　知　青　民　间　备　忘　文　本

杨志军 著　长篇纪实文学

无人部落

亲爱的读者：

你阅读书中的文字，将像踏破旷世的茫然。

鸿蒙未变，晦暗不明。知青们以童贞般的信念，赴艰蹈苦，投身青海高原腹地的拓荒事业，竟是投身东方最古老蒙昧的文明荒野，投身愚昧最无耻的肉刑，投身自我阉割与互相阉割的灵魂屠场，被以革命的名义公开掠夺去包括七情六欲在内的人的一切天赋权利。人人愚忠、卑琐、奴性、安命、虚伪、无耻，活得像小丑，像罪犯，像奴隶，像动物，却没有与动物同等的生存权利。自阅读《血色黄昏》以来，十多年了，我很少有过这种颤栗于灵魂和心肉里的震撼。一句玩笑便会判刑，一个眼神就遭逮捕，甚至一声放屁也要获罪。一个女知青因为错戴了纪念章，被五花大绑地押进荒漠的大坑里惊恐致死。知青们没有娱乐，唯一的欢愉就是释放青春能量的偷情。当读到一个孱弱的女知青被知青打手们脱去衣裤，说是剥去反革命的伪装时，作为编辑，我难禁唏嘘。女知青双手捂住羞处，哭着喊着："我怎么了呀我怎么了？"这声音穿透时空而来，直到今天依然震耳隆隆，不绝于天地。一个个、一群群自杀、冤杀、谋杀，虐杀者的骨骼风化了，不会风化的是一切幸存者的记忆。

感谢作者，从深邃的历史洞见和记载本真记忆时拒绝卑怯、圆滑、苟且的生命精神，为一个时代还原了一页历史，为一群知青还原了一缕浮魂。

——编者

内容介绍：

荒远、冷僻、悲怆、惨烈的青海高原腹地，属于生命的禁区。公元 1965 年，成千上万的知青奔赴这片类似月球地貌的不毛之地，开始了我们这颗行星上最独特、最动荡、最痛苦的人生与命运。从此，所有的劳作都是破坏生态平衡，所有的思想都是自我屠戮，所有的爱情都在劫难逃，所有的青春和生命都匍伏着耻辱、恐怖与杀机，所有的愚昧、黑暗、荒谬、残酷都是以最革命和最神圣的名义。说错一言，获罪逮捕；写差一字，劳改三年；一句玩笑，判刑十载；一次求爱，百死一生。情侣出卖情侣，情书如同战书。莫须有的知青地下复仇军、知青流浪反革命集团、知青暴乱、知青成立中华大帝国案件、知青篡夺毛主席地位阴谋……五花八门、无止无休的阶级斗争致使哭声盈耳，同类相残。于是，知青们集体地畸化、丑化、奴化、兽化，人人成为最低弱、最盲目、最卑琐、最无情而又最不堪一击的生物。那出卖灵魂也出卖肉体的艺术，跟随遥远故里的割腕自杀，最赤裸裸在荒漠、西藏、中印边境的逃亡，知青大野合的变态与颓废……无不以原质、原色、原义的本真，托起了惊天动地的悲烈与空前绝后的历史的殷红。

这是中国知青精神行旅不堪卒阅的挽歌。

这是东方古大陆最荒莽而又苍凉的大鸣。

作者以浮雕般力度的行文与切割般锋利的解析，使旷古未闻的历史真相从此具有化石般的巨量、品格和意义。

中　国　知　青　民　间　备　忘　文　本

吴传之 著　长篇纪实小说

泣 红 传

亲爱的读者：

苍凉上古径，孤狼向空山。

无限深邃而神秘的大西南腹地，曾几何时，一似时间的尽头，分不清昼和夜，只有放逐、无奈、告密、武斗、冤案、恐惧、苟安，只有荒诞而周密的恢恢天网和难以走出东方最古老黑暗的沉重足音。作者，分明是在以激活的记忆与逝去的青春——为历史作证！请直面这极其严酷和令人心碎的生存环境吧，请直面这似曾相识而又过于逼真的灵魂群雕吧，请直面这沉没在蒿草深处而又苍凉万端的爱情景观吧。言之凿凿，书之确确。其中，既有洞穿中国知青精神的幽深目光，又有宽弘而复杂情感的聚合；既有丰富、纤细、质朴、深厚的日常性，又有沉浑、雄逸、深远的博大律动。置身在充满古典热情而又意蕴深幽的文字里，你将神折于一种凄厉得近似残酷的美感，为看似不动声色的行文里竟然渗透了那么多难言的甚至是地老天荒的压抑和沉重心绪，为还原的真实世界悲悯，为如此惨烈和苍凉的大唱唏嘘。朋友，读罢这部灵魂的孤本，你将觉出一滴滴最红最鲜的血正从自己心壁上滴落……

——编者

内容介绍：

是创世荒诞轮回？是史前神话重现？

该作极具突入知青精神世界的穿透力，以精致的古典艺术品质和雄浑、动荡的非凡气韵，强化了纪实小说的本质力量。星月沉浮，变历沧桑，不曾消失的是大西南一隅的这块聚集汉、彝、藏民的地方，星罗棋布着知青墓碑和新老知青故事，不是传奇却胜似传奇。于险恶环境中，品学兼优的，卖友求荣而丧失尊严；大义认真的，以文罹难竟死有余辜；孤怀傲视的，逃亡深山终遭亲人枪杀；顽劣幼稚的，聚众占山为匪，武斗成性，甚至劫掠"山寨夫人"；忧国忧民的，陷身于汉彝同胞杀声入云、围追堵截的汪洋大海之中。如此天意人事里，形形色色的绝境、绝恋和绝唱，万象尽有那野性中的圣洁，鬼火照亮的灵魂，历尽劫难而又太过辉煌和惨烈的爱情，无不具有岩画般的美感与力度。幽旷的生活情致，深邃的人文景观，看似无所寄寓，清丽典雅，却也渗透了深沉悠远的意蕴、混沌之气与复杂的审美意识，读来荡气回肠，感慨万千。

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逍遥 著　长篇纪实文学

羊油灯

亲爱的读者：

有谁愿意回首爱情的持久凌迟？

有谁如此回溯青春的荒如古墓？

当大多生者们的集体遗忘比死者们的集体沉默更深邃时，我们将徜徉在一对男女幸存者伤口的殷红里，去陷身远比内蒙古草原暴风雪更为冷酷、恐怖、动荡的阶级斗争，去彻悟什么是制造这场空前混乱的灵魂？去洞悉生命中的一切都死去后，唯一不死的爱情有着怎样艰难而凄美的燃烧？去细腻而深入地触摸载满太多酷刑、血腥、流放、欺诈、暴虐、内讧、出卖、骗局、自杀的知青爱情世界里，有着怎样的自然属性、生命底蕴、道德境界和没有死透的人性精神？去分辨失去脊骨的血肉之躯与本无脊骨的血肉之躯有着多少区别？去谛听悄然透青的野草深处相知相偎的呢喃，走向沉沦、麻木、虚无和大崩溃的知青诅囚们，颠沛远去的足迹何以陷入东方最古老的血色？

唯当同情者，可以论自新。

你将看到，不是一切江河都比非河汹涌，不是一切自虐、自剐、自劫、自戕、自毁都可以自救，不是一切生还都可以逃脱更深刻的死亡，不是一切精神屠戮可以灭绝一切精神。

该作以拒绝卑怯、圆滑、矫饰与苟且的纪实品格及诚实的忏悔精神，更以深具个人性与感召力的悲悯情怀，深入知青个体与集体生命中"最神秘、最深隐、最恒久"的领地，读来百味莫辨，百感横集。

——编者

内容介绍：

这是一部知青情侣在红色恐怖岁月中的精神史记

1967 年 11 月，男女主人公相偎相携，与红五类、黑五类出身的同学们一起来到内蒙古边陲，从此，命运有别地陷身于阶级斗争的狂飙中。有的知青胸中有术，深不可测，志在成为可以呼风唤雨的政治领袖；有的知青趋祸避福，以情以义，沦为令人为之心碎为之悬胆为之歌哭的"反革命杀人主犯"；有的知青不堪恐惧，精神崩溃；有的知青出卖告密，落井下石；有的知青同室操戈，整人无情；有的知青浪迹草原，屡情奸淫……相爱的相离，相许的相弃，相知的相疑，相亲的相欺、相残、相劫，没有谁的灵魂真正幸存。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更是历尽监禁、流放和凌迟。作者以义无返顾的坦荡精神，直趋知青性爱世界的冲突、失落、焦虑、孤独、耻辱、苦涩、绝望、无奈的实地与底蕴，予以缕析亦予以拷魂。该作从容、温文、幽默的行文下，虽然流动着惨烈的凄美和彻骨的悲凉，却也峥嵘着生命的旷达与自救的坚韧，读来令人扼腕叹息，长思不已。

中 国 知 青 民 间 备 忘 文 本

刘汉太 著　长篇纪实小说

狼 性 高 原

亲爱的读者：

本书披露的历史真相，太似神话而不像历史。

在黑暗以真理的名义谋劫青春、良知和爱情的日子里，思想——一切文明进化的本源，也经历了最残酷的禁弃。于是，茫茫昆仑山下，荒蛮、贫瘠、严酷而又苍凉的戈壁滩，一如苦苦知青的生存境界，险恶万状，无日不在演进。这里，人人盲从、迷信、愚忠、无奈、卑鄙、丑陋，人人又使他人更加如此丑陋；人人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人人又成为他人的恐惧，并且自己对自己进行最彻底、最痛苦、最无耻的出卖和灵魂凌迟。这里，要求血统纯正，忠诚纯粹，履历纯净，尊严，荒诞而又虚伪。这里，无罪的人们，争先恐后地交代罪行，有罪的主犯，却被赋予神圣的政治光环。这里，人格集体地畸形，个性集体地消失，尊严集体地沦丧，即使良知没有麻木殆尽者，或四处流亡，或以卵击石，或作木一般于息息生生之间。呜呼，谁为为之？八万万龙种经数千年繁衍聚居之地，竟至此极也。阅读期间，几度心碎，不能自已。朋友，你将领略作者历尽沧桑而百折不挠的诚实，为不忍目睹的历史真相惊心，为难以置信的民族精神衍化动魄。屏息叹息，时间的声音正在空间隆隆穿过，那是宇宙核量以奔啸而行的不可抗拒的消息。

——编者

内容介绍：

历史真相在这里凝固了，像青铜一样沉重。

青海高原的格尔木腹地是狼的世界，然而，畸形岁月里，司令的人们比狼更为可怕。人人争先扮进灵魂屠场，自我告密，自我揭发，自我践踏，自我屠戮，连性错乱、性饥渴、性梦幻的细节也要袒露出来，自己对自己进行残酷的羞辱、批判，"刺刀见红"，直至"脱胎换骨"得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个性，像野兽，像小丑。知青们的爱情，一如知青们的命运，更是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劫难：逃难、灾难、死难。有的吞食刀片，有的沦为乞丐，有的投井自杀，有的不如蝼蚁……从陷入绝境而后集体绝食，集体卧轨，集体请愿，集体徒步游行，到走向自尊、自尚、自省，同一太阳下醒来的知青们开始寻找生命的真实与意义。作者以深刻的思悟，不妥协的诚实与良知，采访写作七年，终于将历史真相还原为可感可触、有血有肉、惊心动魄的历史真相，读来令人震撼、唏嘘、慨叹、长思不已。

中　国　知　青　民　间　备　忘　文　本

成坚 著　长篇纪实小说

审问灵魂

亲爱的读者：

当你徜徉在被还原的历史废墟里，直面太多的绝痛、绝恋、绝境、绝唱和绝耻时，一如穿行在太阳系这颗最黑暗行星最痛苦的动荡深处，极视不见，极听无闻。现插录几段主人公的痛说，留作备案以备忘。

他是在最最痛苦的时候，希望我给他一点点精神支撑呀！我呢，却将他推到绝望和死亡的境地。我自私呀，你们说，我算什么东西?!（邹建设）

历史会饶恕我们的荒唐吗?可我不能自包。我甘愿走上灵魂的法庭。（孟舒枫）

你们这种人，一旦昭示真相，别说当官了，做人都不配。别说人性了，你们连动物都有的一些兽性都不具备。你扪心自问，除了私欲和既得利益，自己还剩下什么?（乔伟）

把钱收回去吧，我不要！我问你，我数不清的痛苦、屈辱，值多少钱?我失去做女人、做母亲的权利甚至没有做人的权利值多少钱?我每天都心像刀割一样看着女儿在歧视中长大，那种生活在痛苦中又永无出头的感觉值多少钱?我虽然是一个被人长期看不起的女人，但更是一个有尊严的母亲，你买得你我的尊严吗?（卫红）

呜呼！一日血色知数千年历史，谁为为之?

——编者

内容介绍：

神话般荒诞的年代，制造出神话般荒诞的闹剧。

一群男女知青被放逐在荒蛮的大山深处——壮民摇篮之乡，几乎与世隔绝，却依然生活在阶级斗争的恢恢天网里，血腥而又灭绝人性。本书以还原东方古大陆最黑暗一隅的力行，再现了知青们精神废墟的真相——告发父母、卖友求荣、婚姻无着、诬忠诌谀、整人斗人、纵情色欲、偷鸡摸狗，极人世可悲之状，无不来自畸形的精神家园与生存恐惧。悲夫！男主人公身在深山，却日夜渴望爆发世界大战，以遂鸿鹄之志。大梦破灭后，他精心设计了一场极为残酷的爱情骗局，希望从此逃出悲剧却步入了一场更加深远的悲剧，从此危机四伏得令人惊心动魄，无日不在滴血。当他位高权重时，终于自食苦果——亲情爱情错乱得万劫不复，直至众叛亲离。

是人格颓废?是良知商谐?是人遇洪荒?

毕竟有苦胆忧天者，幽幽地叫着不甘泯灭的良知。

爱情骗局的同谋——男主人公的情侣，临终前昭示了骇人听闻的真相，甘愿走上灵魂的法庭，请求审判。